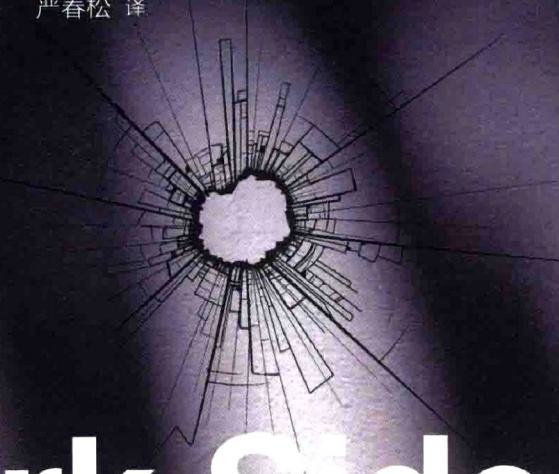



民主的 阴暗面

解释种族清洗

[英] 迈克尔·曼 著 Michael Mann 严春松 译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更多资料请关注我的网易博客<http://ntccy2009.blog.163.com/>

那些最骇人听闻的事件

殖民主义的种族灭绝、亚美尼亚、纳粹大屠杀、柬埔寨、南斯拉夫、卢旺达……

那些残酷度稍轻的案例

近代早期的欧洲、当代印度、印度尼西亚……

残忍的清洗是近代的产物

它是“民主的阴暗面”，产生于 demos（民主/民众）与 ethnos（族群）概念相混之处。

当同一片领土上，两个对立的种族民族主义组织都声称自己拥有国家主权时，危险产生了；当弱势的一方由于外部的支援而不愿屈服、选择战斗，或者强势的一方认为自己能够骤然展开锐不可当的武力行动时，冲突便升级了……行动升级并不只是“邪恶的精英”或者“未开化的民族”的杰作，它同样产生于领袖、激进分子以及种族民族主义的“核心拥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

曼的解读聚焦于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关系，令人信服地阐明了种族清洗的源头及升级过程，有助于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迈克尔·曼是宏伟思想的多产者，这本巨著中天才、雄辩和发人深思的内容俯拾皆是。从书名开始，本书就引发了一场争论，它借助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来重塑我们对人类历史中最坏方面的理解，借助现代的观点来重塑我们对古老历史的理解。曼将缜密的实证研究与权威的对观念的掌控结合在一起。字里行间都有值得称赞、讨论或深思的观点。对它的讨论仍将持续多年。

——本·基曼（Ben Kiernan），耶鲁大学种族灭绝研究项目主任



三辉图书



上架建议：政治学 社会学

ISBN 978-7-5117-2105-1



9 787511 721051 >

定价：98.00 元

民主的 阴暗面

解释种族清洗

[英] 迈克尔·曼 著 Michael Mann 严春松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by Michael Mann
Copyright © Michael Mann 2005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 / (英) 迈克尔·曼著；严春松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117-2105-1

I. ①民… II. ①曼… ②严… III. ①种族政治学—研究 IV. ①D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4577 号

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

出版人：刘明清

项目统筹：李伟为

责任编辑：贾宇琰

特约编辑：王嫣婷 杨晓琼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960 毫米 × 1300 毫米 1/32

字 数：641 千字

印 张：25

版 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本书所获赞誉

《民主的阴暗面》的这些论题极具启发性，很显然，对于这些案例，它的立足点相当牢靠，它给出的解读也非常丰富，这为历史社会学方面的分析复杂度设立了新的标准。

——《社会学》 (*Sociology*)

迈克尔·曼的《民主的阴暗面》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使人们向着阐明造成如此后果的具体社会研究和社会状况前进了一大步……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新左翼评论》 (*New Left Review*)

对历史社会学的挑战尤其有意义，很少有学者具备比迈克尔·曼更加全面的（能力和学识）去完成这项任务。他将种族灭绝与民主联系起来进行阐释，产生了一种比较新奇的效果。

——《政治研究评论》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曼的书为研究残忍的种族清洗作了十分有价值的贡献。他大范围地聚合了各种观点和亲历者讲述，这种能力使他的努力适时且值得，这对任何研究或处理种族冲突方面问题的人都非常有用。另外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是，曼的这本书到达了一种层次，它能同时满足他的同代人和学生们的好奇心，而这也必然会激起更多的对这一论题的探询。

——《东南欧政治》 (*Southeast European Politics*)

从许多方面来说，迈克尔·曼都是一位不寻常的社会学家……曼的作品如今已跨越 40 年，人们能在经典社会学传统中找到它的根源，这种传统强调将有经验基础的、比较的和历史的研究置入到促进世界历史发展的宏

观过程中去。这种方法有些过时……但是，这种追随了韦伯、马克思、托克维尔、赖特·米尔斯、雷蒙·阿隆和其他先辈的方法，让曼能够去处理一些宏大的议题——国际事务权力史、种族清洗、帝国、国家形成等等——在这些议题上，他对理论与实践的平衡，他跨学科吸引力，很少有同代社会学家能够相比。……曼对国际关系的热情在社会学家中是很少见的；这使他充满潜力而极有成效地结合了两个学科，而此前在这方面还从未产生过大的成果。

——《千年：国际研究期刊》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本书在历史维度上让人印象深刻。

——《加拿大社会学期刊》线上版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Online*)

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曼拿出了一份有力的分析，足以引人深思……如今，种族清洗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媒体菜单中的一个稳定部分，每个关注种族清洗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英国社会犯罪学》(*British Society of Criminology*)

在《民主的阴暗面》中，迈克尔·曼审视了民主化与种族清洗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多数社会学家不同，曼并不爱用术语。即使这本书很厚重，但所有抱着非学术想法并耗费精力去读这本书的人，都会觉得物有所值。

——《新闻日报》(*News Day*)

社会学术语全无，历史大数据充足，这份研究为外行读者开辟了足够的通道。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民主的阴暗面》……是一本强大的书，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引出了一套阐释这些悲惨事件的宏伟社会学理论……曼的作品代表了当代历史社

会学的最高水平——广博、论据充足、富有趣味、密切关乎当下——所有的读者都必定会对他的结论满怀敬意。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尽管我对曼的理论有所保留，但这部作品明显是重要的。而且，他的构成了本书大部分内容的案例研究，叙述清晰，细节丰富，优秀到足以令人生畏。作为一部 20 世纪阴暗面史书，《民主的阴暗面》很难被超越。

——《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

《民主的阴暗面》是一本比早先的同类作品更具革新性和启发性的书。与主流的种族灭绝研究相反，曼的作品有意疏远于法律框架。

——雅克·森密林 (Jacques Semelin) 法国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

这本书对于政治社会学、对于理解暴力种族清洗的复杂现象都是重大的贡献，对于这个长文本中反映出的全球视角和研究的力度与准确度，对于曼将这些材料整合成一系列严格阐述的解释性议题所作的努力，人们必将印象深刻。

——弥尔顿·J. 伊斯曼 (Milton J. Esman)，康奈尔大学

在这部充溢着庞大知识和有力论证的作品中，迈克尔·曼试图对现代最残忍的暴行给出一些一般性的解释……曼的知识面十分广博，他的分析视角充满了启发性。

——艾瑞克·D. 韦茨 (Eric D. Weitz)，明尼苏达大学

曼描述了一个政权所经历各个阶段——它沦落到施行种族清洗或大屠杀的过程，原打算让一个种族比另一种族受惠的计划是如何被扭曲、激化成一个意料之外的“D 计划”的——全面的种族谋杀，以及那些“普通”民众是如何参与到对这一计划的支持中的，这些都是他表现突出的地方。

——里马·伯恩斯-麦高恩 (Rima Berns-McGown)，多伦多大学

迈克尔·曼的《民主的阴暗面》作了一个极好的尝试，它通过聚焦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关系，从理论上阐明种族清洗的源头与升级。

——铃木进（Susumu Suzuki），韦恩州立大学

在这本重要而充满挑衅性的书中，这位杰出的社会学家提出，凶残的种族清洗事实上是我们现代民主时代的丑恶一面，“它属于我们的文明，属于我们自身”……在种族清洗这个领域，曼的阐释绝非定论，但本书无疑已跻身最成熟深刻的作品之列。

——G. 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普林斯顿大学

前 言

因为我以前的著作忽视了人类行为当中的极端行为，所以我对善恶就没有给予太多考虑。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很容易把它们归入两种全然不同的类别，同时也将它们与日常生活完全分开。在探究了种族清洗问题之后，现在我已不那么肯定了。虽然我无意要在道德方面模糊善恶边界，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它们确是相连的。恶并不是从我们的文明之外，从另一个独立的我们很想称其为“原始”王国那样的地方中来的；恶乃生于文明自身。

看一下三位历史杰出人物曾说过的话吧。我们往往把托马斯·杰斐逊总统视为启蒙理性的化身。实际上，正是以文明进步的名义，他宣称，美国印第安土著的“粗鄙行为”“使根除成为正当”。一个世纪以后，西奥多·罗斯福，一个体面的现代人，当说起印第安人时也持同样态度，“根除最终是有益的，一如其不可避免”。又40年后，第三位领导人说，“是伟大与崇高之神发出的诅咒让德国必须踏过死人的尸体以创造新的生命”。这位就是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他被恰当地视为恶的化身。但他与他的同僚阿道夫·希特勒可以说仅仅是在追随美国人的脚步。正如我欲在此证明的，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已是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现代性、我们对进步的看法，以及我们引进民主的尝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是我们未被看见的一面。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种族清洗的施行者并不是以一种单独一类的坏人（或施恶者）的身份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是由作为现代性核心的冲突创生出来的，此类冲突包括出人意料的动辄

升级和屡屡失败,冲突期间个人被迫作出一系列更加特殊的道德选择。有些人最终选择了他们知道将产生可怕结果的道路。我们可以指责他们,但同样重要的是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其他人(包括我自己)能够长吁一口气,(庆幸)我们自己还没有被强迫去作出这类选择,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届时也会令人失望。本书的基本论题是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来自我们的文明,以及我们的人民,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与我们自己没有两样。

在尝试理解他们的过程中,我要感激很多人。现在的这部著作主要是借着对他人的原创成果进行二次分析之后所形成的作品。本人的研究聚焦在这个可怕论题的令人压抑的那一端,重点放在施行者(施害人),而不是英勇的抵抗者,甚或是高贵的受害人。我只能对我的许多消息(证据)提供者表示崇敬或赞赏——那些见证了他们所经历的恐怖的幸存者,仔细叙述其所见的旁观者,那些为撰成独立报道和为军事调查与审判法庭作出贡献的人,以及那些已将他们的事业奉献给理解所发生之事的学者们。

过去几年来我从加州帕罗奥多(Palo Alto)行为科学院高级研究中心举办的群体暴力索亚研讨会中获得了很多灵感。我要感谢诺曼·奈马克(Norman Naimark)、隆·素尼(Ron Suny)、斯蒂芬·斯特德曼(Stephen Steadman)和鲍勃·扎荣茨(Bob Zajonc),我的共同组织者;感谢中心主任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还要感谢所有参加研讨会的学生和特邀发言人。他们都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智力支持。

我更要特别感谢希尔默·凯泽(Hilmer Kaiser),他用他在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方面杰出又饱含热情的专业学识激励着我。我还要谢谢雷蒙德·克沃尔基安(Raymond Kévorkian)的好心,将其未发表的重要手稿交给我,同时谢谢奥德尔·包兹库特(Ödul Bozkurt)从土耳其语译过来的文章。对于在纳粹种族屠杀方面得到的帮助,我感谢伊恩·克肖(Ian Kershaw)和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提供的权威性研究指导,感谢克里斯托弗·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和乔

治·白劳德(George Browder)对一份早期文稿的批评,以及马丁·塔哈尼(Martin Tahany)的德语翻译和彼得·斯特玛托夫(Peter Stamatov)的马扎尔语翻译。马克·卢佛尔(Mark Luper)对一份早期的关于共产党清洗的草稿进行了有益的批评。亚历山大·米利塞维奇(Aleksandra Milicevic)经常纠正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无知,我还庆幸能与司各特·施特劳斯(Scott Straus)一起讨论他关于卢旺达的卓越研究。帕特里夏·阿赫麦德(Patricia Ahmed)曾帮助我收集关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材料。我还要谢谢大卫·莱廷(David Laitin)对我的核心论点的激烈而有益的批评,尽管我担心我的修订恐怕还不能使他满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为我提供了慷慨的研究基金和富有才华的学生(我这里已提到了其中四位的名字)。与平时一样,约翰·霍尔(John Hall)给予了总体性知识方面的支持,而尼基(Nicky)和路易丝·哈特(Lousie Hart)、加雷思(Gareth)以及劳拉·曼(Laura Mann)则一直在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研究项目中保持头脑清醒。

作者写于洛杉矶

2003年12月

目 录

前言 / 1

第 1 章 论点 / 1

第 2 章 以往的种族清洗 / 43

第 3 章 “我们,人民”的两种诠释 / 69

第 4 章 新大陆的种族灭绝性民主国家 / 88

第 5 章 亚美尼亚 I:进入危险区域 / 140

第 6 章 亚美尼亚 II:种族灭绝 / 177

- 第 7 章 纳粹 I:激进化 / 228
- 第 8 章 纳粹 II:1500 名施害人 / 270
- 第 9 章 纳粹 III:种族灭绝事业 / 304
- 第 10 章 德国的盟友与援军 / 355
- 第 11 章 阶级清洗:斯大林,波尔布特 / 406
- 第 12 章 南斯拉夫 I:进入危险区域 / 438
- 第 13 章 南斯拉夫 II:含谋杀意图的清洗 / 475
- 第 14 章 卢旺达 I:进入危险区域 / 536
- 第 15 章 卢旺达 II:种族灭绝 / 563
- 第 16 章 反事实案例: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 595
- 第 17 章 与当今世界种族清洗作斗争 / 629
- 参考文献 / 664
- 索引 / 727

第1章

论点

74岁的巴蒂莎·霍查正与她77岁的丈夫伊泽特坐在厨房，火炉让房间很暖和。他们听见了爆炸声，但没想到塞尔维亚军队已经进了镇子。接下来，她只知道有五六个士兵闯进了前门，问：“你们孩子在哪？”

士兵开始殴打伊泽特，“打得太狠，他倒在了地上。”她说。士兵一边用脚踢他，一边开口向他要钱，又问老两口的儿子藏在什么地方。之后，当伊泽特还在地上朝他们看的时候，他们杀了他。“他们往他胸口开了三枪。”巴蒂莎回忆说。丈夫就在她眼前死去，而士兵们从她的手指上扒下结婚戒指。

“我还能感觉到那种痛。”她说。他们射出子弹……最后他们踢巴蒂莎和一个与他们待在一起的10岁的男孩，并让他们滚出去。

“我甚至还没出门，他们就点燃了房子。”……她丈夫的身子已在火中。在那一刻她垮了。她站在街上，淋着雨，没了房子，没了丈夫，除了身上的衣服，一无所有。最终，几个陌生人开着拖拉机路过，把她弄上了车。巴蒂莎的女儿后来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难民营里找到了她。

巴蒂莎柔情地看着一张她与伊泽特在一起的照片，低语道：“没有人明白我们看到了什么，遭受了什么样的痛苦。只有上帝

知道。”〔1〕

这就是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在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施加于科索沃的贝拉尼卡(Belanica)村子的一户人家的情形。施害人(perpetrators)是塞族人,他们运用谋杀和蓄意破坏等手段将当地阿尔巴尼亚人吓跑。然后土地即可被塞族人据有——这是“我们的历史性权力”,他们说。今日科索沃的情况则刚好相反,自 1999 年以来阿尔巴尼亚人一直在驱赶塞尔维亚人。科索沃现在遭到清洗的不是阿尔巴尼亚人,而是该地几乎所有的塞族人。

若变换一下民族和地点的名字,则此类事件可能发生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德国、爱尔兰、美国、巴西。种族清洗是现代大恶之一。我们知道犹太大屠杀虽然就某些重要方面而言独一无二,但它作为种族灭绝的案例并非独一无二。所幸世界上的种族灭绝依然发生很少,但它们是被夹在更多的数不胜数的较轻事件当中,然而仍然属于蓄意谋杀性清洗。

本书给出了对这类可怕暴行的一种解释。为明晰起见,我现在以 8 个一般论点的形式将它摆在书的最前面,内容从宏观到微观,依次相继加入一个总体解释中的各部分内容。我希望在本书的进程中通过详细考察那些包括大屠杀在内的真正最恶劣的清洗案例,来证明这些论点。

1. 我的第一个论点:蓄意谋杀性清洗之所以变得寻常与大的历史年代有关。蓄意谋杀性清洗是现代现象,因为它是民主的阴暗面。这里一开始我得说清楚,我不是在说民主国家施行种族清洗是例行现象,这样的例子是极少的。我也不想否认民主是一种理想,我赞同

〔1〕 我们也知道——多亏了《洛杉矶时报》记者约翰·丹尼斯泽斯基(John Daniszewski),他关于贝拉尼卡的生动报道登在 1999 年 4 月 25 日这天的报纸上。

这种理想。然而民主总是携带这种可能,即多数人可能会对少数人实行暴政或欺压行为,而这种可能性在某些类型的多民族环境下会带来更加不祥的后果。

这一论点包含两个部分,关涉到现代性与民主。种族清洗本质上是现代现象。尽管并非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在史前占统治地位的很小群体中很可能非常常见),但只有到了近代后它才变得更加多发,同时更为致命。在20世纪,因为种族冲突而死亡的人数大约7000多万,远超过前几个世纪的数字。此外,常规战争也越来越将敌对国家的全部人口作为敌人。“一战”期间平民占死亡人数比重不到10%，“二战”期间蹿升至一半以上,而在90年代进行的战争中,占比已超过80%开外。本来大多是族群间性质的内战,现正在取代国家间战争而成为主要杀手。或许已有2000万人死于其中,尽管数字不可能精确(对该数字有人大胆作了预测:切斯特曼,2001年;费伦及莱廷,2003;哈夫,2003;马库森及科普夫,1995:27—34)。

在我2003年写作本书期间,族群及宗教冲突还在持续激化——在北爱尔兰、巴斯克地区、塞浦路斯、波斯尼亚、科索沃、马其顿、阿尔及利亚、土耳其、以色列、伊拉克、车臣、阿塞拜疆、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克什米尔、缅甸、斐济、菲律宾南部、印度尼西亚诸岛、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苏丹、索马里、塞内加尔、乌干达、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刚果、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些冲突当中有一半以上包含了真正的杀戮行为。当你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某种种族危机很可能正在爆发而变成电视屏幕或报纸上的暴力行动,而同时发生的其他冲突事件则不会被认为有什么新闻价值。20世纪够糟了。21世纪也许会更坏。

2001年9月11日实施的蓄意破坏及其“引发的反恐战争”,将有谋杀意图的族群与宗教纷争的恐怖印刻在全世界民众的意识中。它尤其被北方富裕国家——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它们一直被确保免受这类事件的影响——牢牢铭记。“9·11”的袭击和对阿富汗及伊拉克的报复性打击,本身都未抱有种族清洗之目的,然而它们却迅速地与在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逊尼派与什叶派、伊拉克人与库尔德

人、俄罗斯人与车臣人、克什米尔穆斯林与印度教民,以及阿富汗各部落之间包含有清洗意图的族群—宗教冲突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其中一些似乎正在一步步引领着大国的外交政策。

因此,令我们觉得不幸的是,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不是原始的或外生的。它属于我们的文明,属于我们自身。大多数人都说这是源于世界上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是对的。然而民族主义只有当它被政治化并代表了民族国家中对现代民主理想的歪曲时,它才是危险的。民主意味着由人民当家作主。然而在现代,所谓人民(people)逐渐开始意味着两件事。第一是希腊语单词 *Demos* 的含义,意思是指普通人(ordinary people)、群众(大多数人口)。所以民主就是由普通人、群众当家作主(rule)。但是在我们的文明中,人民还意味着“民族”(nation)或者另一个希腊词汇 *ethos*(种族集团),即族群(ethnic group)——一个共享一种相同文化、相同传统遗产继承感受的群体(people),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民族(或其他族群、其他地方的人民)。然而如果人民是在他自己的民族国家中当家作主,以及如果是从族群的意义定义人民的话,那么民族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性可能会超过作为民主核心的公民多样性。如果由这样一种人民来当家作主,会给其他不同族群的人民带来什么呢?回答通常是令人不快的——尤其是当一个族群形成大多数的時候,因为它随后即可实行民主却又专制的统治。正如威默(2002)指出的,现代性是由族群与国家主义原则所构成的,因为公民权、民主以及福利制度都与族群及国家性的排他形式联系在一起。我承认在清洗运动兴起过程中,一些其他的现代性特征起了辅助作用。我们将看到一些现代的职业军队已受到全歼敌人的诱惑,而当代意识形态如法西斯主义等也同样残酷无情。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此观念,即要杀掉的敌人是整个民族(people)。

我谨用几个副论点来阐明我的第一个论点。

1a. 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是民主时代的一大危险,因为在多种族状态下,民治理想开始使得 *demos* 与占支配地位的 *ethnos* 交织在一起,产生了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这样的有机观念,它们鼓励对

少数民族施行清洗的行为。之后,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也随着 *demos* 与 *proletariat*(工人阶级)交织在一起而误入歧途,带来对其他阶级施行清洗的压力。这些都是民主理想变形为含谋杀意图的清洗最普遍的方式。

1b. 在近代殖民地,某些背景下的殖民者民主政体是真正具有谋杀性的,比更为专制的殖民政府还要厉害。殖民者对殖民地机构控制越多,清洗就越具谋杀性。这将在第4章中给予证明。它是我在民主政权与大屠杀之间发现的最为直接的关联。

1c. 新近走向民主化的政权比稳定的威权主义的政权施行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的可能性更大(蔡爱眉,2004,也有此论点)。当威权主义的政权在多种族背景下趋于弱化,*demos* 与 *ethnos* 最可能开始交织在一起。反过来,稳定的威权主义政权在这样的环境下往往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这导致它们力求平衡各种强大群体包括来自族群的诉求。然而有少数高度专制的政权于此有所偏离。它们鼓动多数主义群体变成一个鼓动人民反对其少数派“敌人”的群众政党国家。本书第7章至第11章中讨论的纳粹政权等是专制政府,不是民主制国家,尽管它们确实是从号称民主化的环境中诞生的,但那只是它们随后加以利用的工具。它们是将人民作为 *ethnos* 或 *proletariat* 进行动员。它们是本副论点的部分例外。

1d. 稳定的按制度化运作的民主制政权,要比正在进行民主化或者威权主义的政权较少可能实施蓄意谋杀性清洗。它们已保证了不仅是多数人参加选举和多数人统治,而且还确保了宪法对少数人的保护。但是过去它们并没有这样高尚正义。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施行了足够多的种族清洗,才有了今天的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的公民实体。往日,清洗与民主化曾携手同行。自由民主建立在种族清洗的顶峰之上,尽管在殖民地之外它采取了制度化强制的形式,而不是大屠杀。

1e. 实际真正在施行谋杀性清洗的政权绝非民主的,因为那将造成术语上的自相矛盾。因而这些副论点预先就适用于种族冲突升级的早期阶段。事实上随着升级的展开,所有施行清洗的政权都变得

越来越不民主。民主的阴暗面就是在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行进中产生的畸变歪曲(perversion)。

鉴于这些复杂关系,我们在当今世界的民主与种族清洗之间找不到一种简单的全面覆盖的关系——正如费伦和莱廷(2003)在对近来爆发的内战(多数是发生族群之间)的量化研究中所证实的。但我本人的研究不是一种静态的比较分析,而是历史的和动态的,谋杀性清洗伴随现代化与民主化的进程而一直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出现。它过去主要出现在欧洲——欧洲人创造发明了民主制民族国家。

欧洲人生活的国家现在是牢固的民主制度,然而其中大多数也已经历了种族清洗(类似上述论点中的1d)。当今世界清洗的中心已转移至南方。除非人类采取规避行为,否则它就将继续扩散,直到民主政权——但愿是未经历过种族清洗的那种——统治世界。这之后它才能平息下来。但若我们希望它再更快一点消失,那我们现在就必须勇敢地直面民主的阴暗面。

2. 种族敌意往往出现在种族胜过阶级成为社会分层中的主要形式的时候,出现在引起与引导对种族民族主义的阶级般感情的过程中。过去清洗极为少见,是因为大的历史性社会多数是划分成阶级的。贵族统治集团或其他小的寡头统治政府高高在上,主导着社会,他们极少会与普通民众分享一种共同的文化或民族身份。实际上他们蔑视人民大众,经常不将他们当人看。整体的人民或民族(the people)并未穿过一道道阶级划分而显露其存在——阶级胜过了族性。

即使是第一批近代社会也被阶级政治所支配。自由代议制政府第一次作为一种调解阶级冲突的方式出现,使得它们(指社会)给人一种多元的人民与民族感。它们容忍某些民族多样性。然而当现代争取民主的斗争涉及全体人民对被界定为外来的统治者的抗争时,一种包含全体人民的民族感就诞生了,且它经常能唤起阶级怨恨。整个人民群众被视作一个维护自己根本民主权利的、反对上层帝国阶层掠夺的工人大众阶层;帝国阶层曾反驳说是它们在将文明带给落后民族。今天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在其声调上是属于坚定的无产

阶级性质的,而将其压迫者以色列视为剥削榨取和殖民主义的——有美帝国主义撑腰,但以色列人与美国人则声称他们是在保护文明,不让其受到原始恐怖主义者破坏。这类论点同从前的阶级敌人所持论调相仿。

族群差异与其他社会差异缠绕在一起——特别是阶级、宗教和性别。种族民族主义在其能够唤起其他剥削意识的地方表现最为强烈。最近关于种族民族主义的著述中,最严重的缺陷是,这些著述几乎完全忽视了阶级关系的存在(布鲁贝克,1996;哈钦森,1994;史密斯,2001)。其他人则错误地将阶级视为物质主义的,将族性视为感情用事的(康纳,1994:144—164;霍罗威茨,1985:105—135)。这干脆就是将以前数代以来的作者的缺陷倒过来,他们认为阶级冲突占主导地位同时无视族性。眼下这种颠倒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不仅是在学者中间。我们的媒体充斥了对种族纷争的报道,同时却普遍无视阶级冲突。然而现实中这两类冲突在互相激发。巴勒斯坦人、迪雅克人、胡图人等等相信他们正受到物质上的剥削。布尔什维克和毛主义者认为地主与富农阶级在剥削着整个国家。忽视族性或忽视阶级都是错误的。有时当中一个或另一个会逐渐占支配地位,但这将包括对剩下一个的唤起和引发。性别与地区性情感也适用于这种情况。

实际上,蓄意谋杀性清洗不发生在相互独立同时平等的对立族群当中。单是差异是不足以产生太大冲突的。导致问题的不是基督教与穆斯林的对立,而是穆斯林于其中感到遭基督徒压迫的环境(或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南非真的履行了它自己提出的分开然而平等的种族发展的隔离主张,非洲人是不会反叛的。他们反叛是因为(所提出的)种族隔离政策(apartheid)是一个幌子,实际包含的是白人对非洲人的种族剥削。要形成一种严重的种族冲突,有一个族群必须被视为在剥削利用另一方。反过来,帝国压迫者在其“文明水平”面临被“原始主义”战胜的威胁之时会采取自以为正义的暴行,正如上层阶级在受到革命的威胁时所做的那样。

3. 蓄意谋杀性清洗的危险区出现在当(a)声称代表两个十分古

老族群的组织都对同样土地中的全部或一部分宣称拥有它们自己的国家主权,(b)这一要求看上去似乎对它们具有足够的合法性以及若干看似可靠的将其付诸实施的机会之时。几乎所有的危险事件都是有二个族群参与的,这里二个集体都相当强大,这里二个对立的对政治主权的要求都被摆在十分古老的种族差异感的最高一层上——尽管不是放在一般所称的古老仇恨(或宿怨)之上。族群差异被顽固不变的对政治主权的对立要求恶化成严重的仇恨,甚至到要采取清洗的危险境地。我按不同特点分列出社会中的权力的四大来源:意识形态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以及政治上的。谋杀性种族冲突主要关乎政治权力关系,尽管随着它的演化也会包含意识形态、经济以及最终的军事权力关系。我本人关注的基本上是对种族清洗的政治解释。

4. 以下两种情景之一的出现会触到谋杀性清洗的边缘。(4a) 实力稍逊的一方因为相信援助会从外部到来——通常从一个周边国家,也许是它的同族的家乡国家(见布鲁贝克 1996 年的模型)——而受鼓舞并选择战斗,不想屈服(因为屈服减损了冲突的严重性)。在这个局面中两边都对同样的土地提出政治主权要求,双方都相信他们拥有实现目标的方法手段。例如,南斯拉夫、卢旺达、克什米尔以及车臣的情况。当前美国展开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旨在消除这样的外部支持,给它贴上恐怖主义标签(见第 17 章)。(4b) 较强一方以为它具备了如此的具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以至于它能够几乎不承担物质或道德风险而强行造出一个属于它自己的、被清洗过的国家。在殖民主义移民的例子中,如在北美、澳大利亚以及后面将要讨论的切尔克斯,情况就是这样。在亚美尼亚与犹太人例子当中这两种情形都有,因为占统治地位的土耳其人与德国人相信他们必须要采取先发制人手段,以阻止较弱的亚美尼亚和犹太一方与威胁要大得多的局外来者结成同盟。所有这些可怕的最终结果都是通过两边之间的互动产生的。我们不能仅仅用施害者的行为或信念来解释升级行为。我们需要考察施害人与受害人群体之间——以及通常还包括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一方或双方须得

首先决定开战而放弃和解或操纵手段,但这一选择非同小可。

5. 越过边缘走向谋杀性清洗的施行发生在有争议的领土上,在此,行使主权的国家已经在通常会导致战争的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中陷入了派系化和激进化状态。激进分子呼吁通过对已觉察的种族敌人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走出这种政治及地缘政治危机。事实上,在对立群体之间的种族冲突历史十分古老的地方,这通常总多少带点仪式化、循环性和可控性。相反,真正的谋杀性清洗是不期而至的,也是原本并无打算的,它是从像战争一样的危机状态中产生的。再反过来看,在国家与地缘政治都保持稳定的地方,即使最严重的族群紧张事态及暴力行为也往往是在较低的暴力级别上循环发生,且不会失控,正如我们在第16章的今日印度所见到的那样。然而在政治制度不稳和受战祸影响的地方,暴力可能会导致大屠杀,比如哈夫(Harff)对全世界政治清洗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2003)。

政治不稳定分不同形式。有一些国家正处在分裂并进入派系化状态(像胡图族控制的卢旺达国家);还有的国家已被武力控制,正在拿出新的巩固措施,坚决压制不同政见和宗派主义(如纳粹国家)。在某些全新的国家,巩固与控制极不平衡(如在新的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人的国家)。但是这些不属于稳定和团结紧密的国家,不管是民主还是威权主义的。它们也不经常是政治科学研究者揭示的最可能会产生内战的失败国家(21世纪初的刚果是一个例外)。处在最残酷阶段的种族清洗通常是受国家引导,而这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团结和行动能力。

6. 蓄意谋杀性清洗极少是施害行为人的初衷。你极少会发现从一开始就策划大屠杀行动的邪恶天才。甚至连希特勒也没有这样做。谋杀性清洗典型地以一种C计划而出现,它仅在前面两种应对已洞察到的族群威胁的方案失败之后才会形成。A计划的典型是一种以妥协或直接压制形式表现出来的经过详细筹划的解决方案。B计划是一个为应对A计划失败而做出的更加激进的压制方案,在面对暴力行动上升以及出现某些政治松动的态势下酝酿得相对匆忙。当以上两种方案均告失败之后,有些计划制订人就变得更加激进了。

为理解其后果,我们必须分析一系列产生升级的互动过程所未预想到的结果。这些连续的计划方案可能既包含事在必然的又包括更为偶然的升级行为。施害人或许从一开始就在意识形态上决意要把族群中的非己团体(out-group)从他们这里清理出去,当较温和的办法无效时,他们便似乎必然要进一步加大决心,通过采取越来越激进的手段,排除一切障碍。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这样:犹太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与其说看上去像一个偶然事故,还远不如说是无情克服其前进途中一切障碍的意识形态上的逻辑升级过程。但是,对青年土耳其党来说,解决亚美尼亚问题的最终方案就好像更带有偶然因素,它是从1915年他们认为处境突然变得令人绝望的判断中产生出来的。

轻描淡写这样的意向性会引起道德上的不快,这经常让我不得不与那些代表受害人讲话的人展开争辩。对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图西族人,对一些被殖民地化的土著民族,以及对其他人等的所有的种族灭绝,都是蓄意实施的,铁证如山。然而幸存者喜欢强调其压迫人的预谋。这很可能主要源自他们从痛苦遭遇中寻找意义的需要。还有什么比将这极端的遭遇视为偶然事件更坏的呢?在《李尔王》中,埃德加说起他的遭遇:“我们之于众神就像苍蝇之于任性的孩子。”我发现这是个对人类很有诱惑力的理论,但我看受害人未必会这么想。我不是真的坚决主张谋杀性清洗是偶然行为,而只是说它要比以谴责为中心的理论所能给予的解释远更复杂,也远更有可能性。它最终的施行是蓄意准备的,但是走向蓄意行为的路径通常是迂回曲折的。

7. 有三个主要层次的施害人:(a)指挥政党国家的激进精英,(b)结成多暴力的准军事部队的激进分子团伙,以及(c)提供大量但非大多数民意支持的核心拥护者。精英、激进分子和核心拥护者都是谋杀性清洗到来前作为惯例的必要准备。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总体上怪罪恶意的领导人或种族集团。那等于是认为领导人真正有操纵局势的魔力,或者认为全部的民族都真正惊人地目标专一。这两种认识都与社会学家所了解的关于人类社会本质的一切知识不相符合。在我所有的研究案例中,每一个当中的精英、激进分子和核心拥

护者都是以十分复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他们形成了体现世俗权力关系的社会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权力运用分三种不同方式:精英的自上而下,民间压力的自下而上,以及准军事部队从侧旁的强制。这些压力互相作用,从而产生了像在所有社会组织中发现的世俗关系——特别是上下级、伙伴关系以及事业发展等。这对施害人的动机有巨大影响,正如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的。

核心拥护者的概念揭示出谋杀性清洗在有利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暴力三者相结合的环境下更易引起反响。主要的核心拥护者包括各族群难民和来自边境受威胁地区的人员;那些更加依赖国家维持基本生存和价值观的人;居住和工作在导致阶级冲突的主要经济部门之外的人(他们更倾向于阶级冲突模式胜过种族主义冲突模式);那些已被社会化的、视身体暴力为解决社会问题或获得个人腾达的一种方式的人,如士兵、警察、罪犯、流氓及运动员等;还有那些被男子汉气概的意识形态吸引过去的人——努力要让世界承认他们的年轻男子,他们是受年长男子的带领,而后者是在暴力早期阶段经历社会化过程的。因此包含在清洗组织之中的分层的主轴是地区、经济部门、性别和年龄。激进的种族中心主义组织往往含有一个通常的阶级结构:领导来自上中层阶级,普通成员来自下层——真正的脏活累活经常是由工人阶级去完成。

8. 最后,普通人被正常的社会结构带入执行谋杀性种族清洗行动当中,他们的动机更为世俗得多。为理解种族清洗,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一种权力社会学,而不只是一个专门的将施害人作为受到困扰或犯有精神病的人的心理学——尽管有些人可能会是这样。正如心理学家查尼(Charny, 1986:144)所言,“大规模杀害人类的行动执行者大都是日常的人类,即我们根据当前人们接受的按心理健康职业给出的定义而称之为正常的人”。

若置身于类似的情景和同样的社会结构之中,你或我或许也有可能去参加谋杀性种族清洗行动。没有哪个族群或民族(国家)天生刀枪不入,能够幸免。很多美国人与澳大利亚人过去干过有谋杀性质的清洗之事;一些犹太人与亚美尼亚人——20世纪受伤害最

深的民族——最近犯下了针对巴勒斯坦人和阿塞拜疆人的暴行(话说回来,这些受害人群体中的一部分也是施害人)。不存在什么德行高尚的民族。宗教往往强调在所有人类中原罪的存在,强调人类为恶的能力。实际上,若置身于恰当的环境和核心拥护者之中,我们几乎都有能力犯下这样的恶行——甚或还享受它。然而用原罪来解释这种举动就不够了,因为我们为恶的能力只有在本书探讨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实现。就清洗行为而言,这些环境并不怎么原始或古老,倒是更偏现代。现代性中有某种东西大规模地释放出这一特别之恶。

鉴于社会种类的杂乱和独特,我的论点不可能是科学的法则。它们甚至不能与我所有的研究个案完全符合。例如,纳粹种族屠杀就不严格适用论点 3(来解释),因为犹太人没有对德国任何领土提出主权要求。在第 7 章我提供了一个修正过的间接的论点 3 版本,按此就德国的种族民族主义者来说,犹太人似乎应当与合伙参与其他群体对政治主权的要求存在干系(特别是作为所谓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在每一个案例中我查验自己的论点在此适用的程度,指出必要的区分和修改意见。第 2 章和第 3 章提供了从古代到现代清洗行动的简史,显示种族清洗怎样从原初十分罕见,到在欧洲人的世界中变得流行——先是以保持从属于阶级冲突的相当温和的方式——的过程。大屠杀在人类大部分历史进程中是普遍存在的,尽管它异乎寻常。然而,在早期国家中,谋杀以便将某一个民族清除(“清洗”)出去是稀有的。随着救世宗教以及由人民来统治天下之理念的10 到来,事情变得更危险了。之后本书的经验核心部分由一系列对近代爆发的最坏的谋杀性清洗的研究组成。在这所有当中,我从最普遍的进入危险地带的原因,一直叙述到导致急速越过边缘进入谋杀性清洗的实际事件,再到其施害人的情况。

我的分析还必须要面对两个方法上的困难。谋杀性清洗很少,应当庆幸。然而我们怎么能够对这么稀少的事件形成归纳结论?难道不能是每个个案各有各的原因吗?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纳粹及其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独一无二的;卢旺达的图西人和胡图人的情况也一样,他们在国中相互杂处,无法退回自己的领土。所有的个案都

有我必须给予尊重的特性。第二,仅仅考虑这些个案也许只覆盖了那些确实升级为大屠杀的事件,却忽视了更多大量存在的种族紧张缓和的例子。这大概就是社会科学家所说的对因变量取样。因此,本书第16章考察了当代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以理解为何多种不同的种族对立导致程度不同的暴力。最后的第17章回顾了我的论点并概览当今世界的几种趋势。

词语解释:族性,民族,种族清洗

族性(ethnicity)不是一个客观的词。族群通常被定义为享有一种共同文化与共同血统的群体。然而文化本身是暧昧不清的,血统则通常是假想的。一种共同的文化可能指一个相对精确的特征,比如像一种共同的宗教或语言,但也可能只指一个共享一种生活方式的要求或主张——这是不可能被精确定义的。共同的血统对任何一个比氏族或家族更大的群体[我称之为一种小族性(micro-ethnicity)]来说,都是具有神话色彩的。未来对DNA分析的使用将很可能揭示出相对固定的人口共享明显的相同的遗传因子,但这对大多数号称具有种族共性的大群体来说就不是这样了。称自己为塞尔维亚人或德国人或苏格兰人的人,实际上是很多更小的血缘群体的后裔,这种小群体经常搬迁,与周邻相互通婚。许多大群体对所谓共性的声称实际上是将大量的血缘群体集合在了一起。本书讨论那些由生物学或亲属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所形成的大族性(macro-ethnicity)。本书注重的冲突族群没有一个是天生的或原始的,它们及它们之间的冲突是由社会创造出来的。

它们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被创造出来。一种共同的语言对把德国人团结在一起是重要的,但对塞尔维亚人就不(他们的语言与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一样)。宗教对塞尔维亚人是重要的(他们的正统的基督教有别于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及阿尔巴尼亚),但对德国人(分成天主教和新教)则并非如此。种种文明与种族的理论帮助给予欧洲人一种共同的获得开化和成为白人的感受,与他们的殖民地属民

形成对照。经济上占支配地位还是从属地位能够形成身份标志,军事力量也能。帝国的征服者们常通过给他们认定为有自己独立特性的群体或部落分派特殊的角色来创建大族性。最后,一种作为独立国家或省份的共同的、政治历史具有普遍的重要性——就像苏格兰人,他们在语言或宗教上都与英国人无异,然而却拥有自身特殊的政治历史。正因为有这种多样性的存在,用族群自己或其邻里使用的语汇为各种族性分别下定义会更为稳妥。

族性是指一个被自己或别人界定为拥有共同祖先和文化的群体。所以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就是由一个这类群体的成员把另外一个这类群体从他们认定为属于自己的地区中清除出去。民族(nation)是同时还拥有政治意识、对特定领土声明具有政治主权的群体。民族—国家(nation-state)出现在有这样一个群体且有自己主权国家的地方。并非所有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都拥有或向往(desire)民族—国家。有些只在一个更广的多族群国家之内提出地方自治或者具有法规规定的权利的要求。

族群之间有很多相处方式,多数情况下谋杀不在其中。自有全球化的新闻媒体以来,少数几个包含大屠杀的事件已经被印刻在我们的意识当中。但让人欣慰的是,它们数量极少。非洲大陆只在出了真正的坏消息之后才会作为主角出现在西方媒体中。然而在非洲,一个其中所有国家都是多种族国家的大陆,也只发生过几次谋杀性种族清洗事件。费伦和莱廷(1996)估计所有严重的种族暴力加起来,也不到所有在非洲发现的多种族环境数字的1%。表1.1给出了各种族关系下包括暴力与清洗两方面行为的发生程度。这使得我们能够将谋杀性清洗与非谋杀性清洗区分开来,也能同其目的不是为了种族清洗而爆发的大规模暴力与杀戮区分开来。它只与对平民的暴力清洗有关,不包括通常被战争规则合法化的大规模杀戮行为。

表1.1包含两个维度:某个群体被从一个集体社区中排除(清洗)出去的程度和为达此目的而使用的暴力的程度。请记住族群是从文化上界定的,如果文化消失,他们就可以被消除,即使未发生肉体上的清除。人可以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标志。但我不会与对种族

清洗这个词汇的通常理解唱反调,只将文化根除包括在内,除非在这类事件中给清洗这个词加上引号——就像我在表中做的那样。但重要的是区分清洗及“清洗”可能会采取的各种形式。

表 1.1 中使用的词语将贯穿全书。表格第一行以含非重大暴力的政策开始。第一行第一列含把握处理种族差异的理想方式,即对所有族群给予平等对待和尊重——多元文化主义。有些多元文化国家根本就把族性抛在一边,他们对所有人一律平等看待,而不管他们是何族性。他们的宪法没有提到族群的权利,同时政党与社会组织(除了文化方面的)也没有围绕族性而成立。这是多元化种族移民国家的共同理想,如美国或澳大利亚那样。因这类移民群体无法拿出合理的理由说明这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因而他们对现存国家也就不构成威胁,而宪法也就能够不惮风险地忽略其族性。因此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有许多人盼望能有一种具多元文化特征的文化,但同时又有一个不分种族高低的政体。这样他们的政治就会更多地关注阶级、宗教、性别等等,而更少地关注族性。

在更容易变得危险的情境下,事情就不同了,在此,一个个族群控制着一块块不同的领土,或换种情况,他们盼望能够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地区性自治体。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文化理想要继续不分种族地表现于政治领域就有困难了。他们没有忽视族性,而是通过对不同族性的集体性担保使其明确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这或许是通过结成同盟或邦联的方法(族群拥有一定程度的地区性控制权,如在当代的尼日利亚),或者联合的(consociational)方法(他们被保证能分享中心权力,如在比利时)。这类(法律)保证旨在使所有大的主要群体受到国家约束。此处的政治关乎族性,也关乎阶级、地区、两性等其他方面,但最终它们都可能是种族妥协的政治。赞助性行动计划是对以上方式的更加温和、开放的演绎,确保在个人层面上对非己团体提供保护。宽容是承认多元文化主义现实的一个更加温和、更为常见的表达方式。容忍暗示着我们对非己团体抱有敌意但努力试图克服它。不幸的是,这些最初的政策大多是理想的,而非现实世界的方针政策,大多数族群关系没有这么宽容。

表 1.1 社会(或种族)团体间相互关系中的暴力与清洗类型

清洗类型		整体	
暴力类型	无	部分	整体
1. 无	1. 多元文化主义/宽容 2. 联合/同盟主义	部分放弃身份,例如,通过自愿的方式采用官方语言	自愿被同化
2. 制度性强制	歧视	1. 官方语言限制使用规定 2. 隔离	文化压制
3. 治安性压制	有选择的治安压制	1. 部分治安性的对非己团体的语言及文化的压制 2. 治安性非己团体移民/迫离家乡	1. 整体治安性的对非己团体的语言及文化的压制 2. 人口交换 3. 治安性驱逐出境和强迫向外移民
4. 暴力镇压	全面的治安性镇压	1. 集体迫害、种族暴乱、某种类型的强奸 2. 暴力移民/迫离家乡	1. 野蛮驱逐出境和向外移民 2. 生物学上的:绝育、逼婚、某种类型的强奸 种族文化灭绝
5. 未预谋的大规模死亡	错误的战争、内战及革命计划、自相残杀	冷酷无情的战争、内战、革命计划	种族文化灭绝
6. 有预谋的大规模杀戮	威慑性及内战的镇压,系统性报复	1. 强迫改宗 2. 政治灭绝 3. 阶级灭绝	种族灭绝

注:深色底纹部分表示本书讨论的谋杀性清洗区域当中的核心部分,浅色底纹在此表示谋杀性清洗会偶尔发生的临界区。

第一行接下来的两列包括族群衰弱或未遇暴力而消失、遭清洗但经全体同意的事件。这发生在较后阶段的西欧的种族同质化时期。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或英国,政府根本不需要什么强制手段就消除了少数民族语言(或小语种)。少数人群承认自己的地区性语言——比如布列塔尼人的凯尔特语或威尔士语言——确实落后,剥夺了他们的孩子在近代社会获得成功的机会。多数美国或澳大利亚的移民同样是出于自愿而努力掌握英语,不教他们的孩子自己原来的语言,还放弃了许多其他民族文化习惯。他们的后代可以保留的仅仅是一种作为德国人、斯洛伐克人或威尔士后裔的情感意识。因而自愿同化产生了一个清洗过的社会,它不是通过占主导地位群体的敌意行为而是经由积极的诱因实现的。美国或澳大利亚的白人移民群体在追求经济和身份地位提高及社会融入,并成为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的过程中失去了大多数他们早期的种族身份特征。这是一个相当温和且无关大局的清洗形式,唯让那些珍视传统文化保护的人感到痛惜而已。实际上,清洗这个词用在这儿可能并不合适(即使是在给它加上引号之后)。

14

第二行包含的是暴力第一次升级至制度化的强制。歧视很可能是所有政策中最为常见的。它限制非己团体的权利但允许成员保留其族群身份特征。典型的歧视一般包括优先雇用,拒绝对住宅区发放贷款和承保,负面的文化成见,粗鲁无礼的人际行为以及警察骚扰。大多数国家歧视一些少数民族(少数人群体)。非洲裔美国人在蓄奴制废除后150年以及民权运动开展50年的今天仍然遭受着歧视。例如,在美国有一项被嘲讽为“黑人时驾车”^{*}的过错,警察让黑人把车停到路边,原因是他驾驶的是一辆“太好”的车。所有像这样的歧视应当令人悲叹,但它又比本表接下来的其他内容要好得多。

严重的歧视会限制人受教育、参与投票、担任公职或者获得财产的权利。占支配地位的群体还可强迫非己团体用自己的语言作为教

* driving while black,按译者的理解,是对酒后驾车句式的仿构,故有此译。——译者注(本书凡标*处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一一标示)

育及公共领域正式语言。隔离是地理性的局部清洗：非己团体以隔离或受奴役状态集中居住。这可能要比整体清洗中较为温和的形式更具压迫性。毕竟，许多奴隶想要逃离压迫（它将带来一个遭更多清洗的社会）但被武力阻止。这里种族政治与阶级政治继续齐头并进。种族隔离的南非在其白人社区施行的几乎是通常的阶级政治，在非洲人和有色人种社区也有这样的一些迹象，然而总体来看是种族支配了政治。

下一栏，“文化压制”，包含整体清洗，尽管只是通过公共机构的强制。公共机构压制非己团体的文化，后者的身份特征就这样被主要群体强行同化。该群体的语言可能会被学校或办公室等禁止使用，其宗教被取缔，其独特的家庭用名被从法律上修改。虽然以上都是强制性的，但通常是法律认可的，极少涉及身体暴力，除了要制服一些对政策的零星抵抗（这下一行涉及）。这类压制通常不被看作种族清洗，特别是如果其最终成功。之后，经过一段时间，一般而言，它就不可能作为清洗而被两个群体中的任何一方记住，举例说，威尔士人被同化为一种主要由英格兰人规定的不列颠人身份。威尔士人一般都为他们确信自己已保留下来的威尔士特质感到自豪，而不会为他们已失去的可能更大的文化特征而骄傲。另一个例子是普罗旺斯人或阿基坦人*，他们实际上被全部同化为法国人身份。许多非己团体成员会采用向外迁移的办法应对所有这些压迫，像大批爱尔兰人所做的那样。这也是一种部分强制、部分自愿的清洗方式。

15

身体暴力从第三行开始，包括有选择的治安压制。“有选择的”意思是它是瞄准持不同政见者，通常是第二行政政策的反对者。“治安性的”意味着压制依然是有秩序的，是通过已成惯例的合法手段——尽管这都将包括有限的身体暴力。第一列包含专门针对抗议者的压制；第二列上升到一种压制非己团体的部分身份特征的尝试。后者也包括对来自主要群体的移民的治安性植入，将土生的非己团体从

* Acquitainians, 或从 Aquitaine 即 12 世纪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公国演变而来。

其家乡驱逐,尽管不是从整个社会中驱逐。一个例子可能要算自17世纪以来新教苏格兰人在乌尔斯特(Ulster)农场的定居,强行赶走数千名爱尔兰天主教农民。第三列升级到治安性整体文化压制、人口交换、治安性驱逐出境和向外移民,一种种类广泛的由国家执行的清洗行为,强制然而通常不太暴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政策通常都包含一个相当稳定的国家存在,相信它仅仅是在执行法制。

第四行引入严重的身体暴力。在第一列,这方面依然是按照惯例并有秩序的。全面的治安性镇压瞄准藏匿反抗分子、暴动分子、反叛分子或恐怖分子的群体,代表官方给予他们血腥的惩罚,以强令该群体的主干部分屈服。如果这是例行公务,国家将会运用专业化的准军事部队,其名号对外部团体而言是臭名昭著的,如哥萨克人或爱尔兰王室警吏团。接下来两列内容包括受控制较少的暴力。升级到带有暴力的局部清洗包括移民/迫离家乡,就像大多数欧洲的开拓殖民地行为所表现的那样;集体迫害和平民暴动,不同种类和不长时间的暴力形式,包括暴乱与抢劫,加上若干谋杀与强奸,集合各种各样的动机:当局想方设法将政治紧张态势驱入非己团体中;地方政府享受着抢劫、暴力和强奸;种族清洗分子试图通过恐怖的手段把他们吓跑。集体迫害总能诱发一定程度的向外迁移。共同的受害人是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中国人。接下来的这次升级是野蛮驱逐出境和向外移民,包括用足够的暴行使得非己团体成员只能逃跑——就如近年来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情况一样。一种更具种族主义形式的清洗会用到只此一家的生物学策略。非己团体被通过限禁性的婚姻或性行为政策剥夺了再生产能力,也许还升级到强制绝育或者强奸,其意图是使妇女不可能再怀有非己团体身份的孩子。生物学清洗往往以女性为中心的理由十分明显:母亲身份是确定的,父亲身份仅是推定的。

第五行升级到大规模死亡的暴力,它并非主导群体的政策想要的结果。第一列包括政策错误,经常是通过让族群屈服于他们不能适应的劳动条件,或者是通过革命者用愚蠢的政策寻求实现重大的社会转变而留下的——例如中国的“大跃进”,无心地让数百万人丧命。由此可知,一旦错误被认识到,政策就会被放弃,这样非己团体

就不会被消灭。在此我不想为施害人开释,因为死者数目可能极其庞大。绝大多数大的错误与下一个类别,即被列为冷酷无情的政策等紧密相连。这些政策并非直接有意要杀害灭非己团体,但是主导群体对非己团体的看法如此负面,以至于它不是特别在乎最后是否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不十分符合大跃进领导层的情况,然而其应对灾难之迟缓程度确实反映了对受害人生命关注的相对不足。战争与内战在冷酷无情类别中尤为突出,特别是通过将废料抛在乡间或者轰炸城市对平民造成的破坏。限制性事件是西班牙人最初对加勒比海诸岛的殖民化,在殖民者集体意识到他们对土著造成的影响时,实际上几乎所有当地人都死了,这件事成为标准的种族文化灭绝。

种族文化灭绝指的是无意中灭掉了一个群体及其文化。这通常极其冷酷无情,而统治群体甚至欢迎消除这非己团体。种族文化灭绝成为殖民开拓者和土著民族之间许多可怕冲突的主要方向,其中发生的绝大多数死亡源于统治群体带给非己团体的种种疾病,这些疾病又因居留地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的恶劣而进一步恶化,后者并未有意杀人,但它确实让当地人不堪重负,几至死亡。更多这方面内容见第4章。

最后,第六行讲的是有预谋的大规模平民杀戮。儆戒性镇压是我对绝大多数历史上更为凶残的帝国征服的称呼——例如,战争中对整个城市进行屠杀以便吓唬其他城市屈服投降。近代以来的军事行动包括不加区别的对城市进行轰炸,如在德累斯顿、东京和广岛。罗马人有时以每10人一个的抽签方式,处死十分之一的反叛士兵。在20世纪40年代的巴尔干半岛,游击队每杀死1个德国人,德国军队就杀掉50个当地平民。反叛分子与恐怖分子通常只能从事小规模这类暴行,尽管“9·11”是一桩非常大的暴行。今天,所有儆戒性镇压理论上能够在国际法名义下作为战争罪或反人类罪而被起诉——尽管那些赢得战争的人极少受到起诉。内战通常比国家间战争包含更多的平民杀戮。

接下来是意在局部清洗的大屠杀。强迫皈依提供了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皈依,要么去死”,就像“二战”期间克罗地亚天主教乌斯

达沙部队让塞尔维亚人做的那样。在集体迫害过程中,犹太人经常被给予这样一种选择。有些非己团体成员被杀害,要么是因为抗拒,要么是因为施害人希望借此告诉大家这选择是动真格的。经历局部清洗后大多数宗教存活下来,但整个文化却没有。政治灭绝,一个最近创造的词,是指想针对目标是一个受害人面积更广、受惊吓人范围更宽的群体的整个领导层和潜在领导层的杀戮(见哈夫和格尔的定义,1988:360)。这可能会与儆戒性镇压重叠,尽管政治灭绝具有一种让清洗更加干净的意图。消灭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的意图是要破坏非己团体的文化特性,而因儆戒性镇压被吓到屈服的地区则可以保留它们的特性。通过将所有受过教育的波兰人杀害,纳粹打算消灭波兰文化特性,就像布隆迪的图西人将受教育的胡图人杀掉,蓄意消灭胡图文化特性一样。

17

我加了一个我自己创造的词——阶级灭绝,以指有预谋的对整个社会阶层的大规模杀戮。既然这可能比强迫改宗或政治灭绝谋杀意图更加明显,我已经用箭头将其指向而不是直接放在种族灭绝类别当中。红色高棉是最坏的施害人,斯大林主义者犯下短暂罪行。受害人阶级被认为是不可挽救的敌人。阶级灭绝似乎独属于左派分子,因为唯有他们愿意相信他们没有对立的(剥削)阶级也行。右翼的资本家与地主政权一直承认他们需要工人和农民来为自己干活。因此印度尼西亚军队和伊斯兰准军事部队在1965—1996年对至少50万印尼共产党的支持者实施的大屠杀,尽管不相称地杀死了贫苦的农民,却是针对一种政治的而不是阶级的敌人——是共产党,而不是农民或工人。它是政治灭绝,而不是阶级灭绝。像红色高棉以及斯大林主义领导下的共产党政权,它与*与错误和冷酷无情交缠在一起。这三种类型都可被以战争罪或反人类罪提起公诉。

最后是种族灭绝,1994年由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创造的一个词。联合国修改了莱姆金的定义,即种族灭绝是一种蓄意毁灭一个种族、民族或宗教群体的犯罪行为。这一定义有时受到批评,原因

* 指阶级灭绝。

是它既包含太多又包含太少。联合国加了一条：“局部”毁灭可算种族灭绝。局部种族灭绝只在地理概念上才有意义。1851年加利福尼亚殖民者企图消灭来自欧文斯山谷的所有印第安人，就开始了地理意义上的局部种族灭绝。1994年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指挥官作出的杀死所有斯雷布雷尼察男人和男孩的决定，或许也可以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因为当地妇女不能靠自己养活自己、成为一个能够独立生存的群体。然而当杀戮行径与强迫驱逐出境，如发生在距普里耶多尔不远的清洗混在一起时，这好像就不是一种地方性的种族灭绝了。但是，反过来讲，种族灭绝应该包含比族群更多的内容（安德烈普洛斯，1994：第1部分）。种族灭绝是意向性的，以消灭一整个群体为目的，不仅是从身体上而且是从文化上（摧毁它的教堂、图书馆、博物馆、街道名称）。然而假如只有文化清洗，我将称它为文化压制而不是种族灭绝。种族灭绝总是由大多数针对少数人群，而政治灭绝恰好相反。

18 本书以表中最坏行为即底纹最深的区域为重点，我将其总称为谋杀性种族清洗。同时还用浅纹为三个相邻小块着了色，承认这些临界区也可能会包含一些有谋杀性清洗。我没有将很多这样的方块称为种族清洗，像部分学者做的那样（如乔纳松，1998；史密斯，1997）。

作出这些区分揭示了种族清洗的两个自相矛盾的特征。一方面，绝大多数清洗是比较温和的。谋杀性清洗并不多见。因为制度上的压制度度相对较轻，同化占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今天大多数发达国家遭受过种族清洗，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单一民族（亦即至少70%以上的人口认为自己是一个族性），而在往昔，它们中多种族特征的程度要高得多。所以我们有两个主要问题。这样的清洗为何发生？又为何只在其中几个事件中它才变得真正凶相毕露、杀气腾腾？这些是本书必须给出回答的最重要的历史问题。

相互对立的种族清洗研究路径

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在撰写个案研究和形成我的

理论研究方法过程中,我心存感激地引用了大量文献。在此我将显露出来的主要理论困境简明列出,同时表明我自己对此的态度立场。

原始,古代,还是现代?

与我的第一个论点,即强调现代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人将种族清洗看作一种原始的回归。责备“原始”民族带给我们心理安慰,因为这样就能把带谋杀意图的塞尔维亚人或胡图人的仇杀(以及其他非洲部落的仇恨)看作远离我们文明现代人的孤立现象。然而这样的原始人必将包括来自所有大陆的群体,时间上同属近代以及文化上接近我们的19世纪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和20世纪德国人。我在洛杉矶写下这些话,当地令人赞赏的宽容博物馆(Museum of Tolerance)或能使人强烈回忆起往日那令人惊骇的纳粹最后解决方案。然而它却完全忽视了就在洛杉矶当地,由欧洲殖民者对丘马什印第安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本书谈历史的几章将证明,种族清洗已成为我们的现代性和文明的一部分。

不过,原始也可能有一种更具弗洛伊德色彩的意义。在社会化、礼貌、超我和压抑的表层下,藏有着攻击本能、本我甚或还有死亡愿望(thanatos)的隐秘地带。去除或破坏社会化顶层的稳定后,人类即回归原始暴力,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如是说。然而这是误导。在我所有的个案研究中,施害人以他们自己的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化过程结成了社会组织。施害人不是自发地从他们的超我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当仇恨与暴力爆发,与其说它们是传统社会化压力释放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因为新的压力到来而产生的。原始理论不太可靠。

原始论多少由那些写作跨越世纪的古代仇恨的人作了修改。例如,他们说,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自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以来就一直相互争斗,使得巴尔干半岛成了“一个纯粹记忆区”,在此“每个个体的感觉和记忆都影响了冲突民族总体的‘给暴力施加乘数效应’的运动”(卡普兰,1993;参见武利亚米1994:4)。尽管这是在

19

胡说,不过巴尔干冲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数度爆发。史密斯(1986:第2章;2000:第2章)已提出了一个理解它的他称之为长期存在(perennialism)的总体框架。他认为种族对抗是古老的,但与其说持续不断(continuous),不如说长期存在(perennial)。他看到一种最小的连贯性,其理由是族群一直坚持共享一个名字、一个祖先的神话、一种历史感、一种文化、一种对某特定领土的联系、一种休戚相关感。但这些只是间歇地猛然涌进了历史记录,特别是由战争、边界争端或大迁徙促成的。因而,近代国家能够把根深蒂固的集体特性调动起来。

这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收回以上观念。直到过去几个世纪之前,大多数历史国家中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并没有共享同样的文化,因此也就不可能共享一种共同的种族身份特性。阶级通常要胜过族性,直到近代。这一模式开始因为救世宗教(salvation religions)的出现而削弱。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产生了一种各阶级共有的宗教文化。但是决定性的转变来自现代民主政治理想赋予一切人包括所有阶级和两性以公民地位之后。事实上,史密斯最近提出的概念种族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同意了我以上的很多说法。他说,近代民族主义者已重新在各种神话、回忆以及传统的帮助下阐释了一个真实普通大众鲜活的过去,使得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包含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他们确实重新作了阐释,尽管这种过去的真实性,以及在回忆与神话之间保持何种程度的平衡还有待观察。

但为什么族群之间会相互仇恨呢?其理由是古老的还是近代的?在公民权被强加到更古老的宗教断层线上时,事情就变得更加危险了——如对犹太人、对巴尔干半岛各国和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以及对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那样。但是,不管史密斯怎么说,这段历史作为一种近代族群迎来的(发展)顶峰(crescendo)性质,要多于作为一种长期现象的一再反复(perennial recurrence)——尽管会有例外。各个阶层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世界统治下遭受了多少世纪的时断时续的压迫。它们的民族集体身份感很可能是最古老的。不过,今天一些最坏的种族对抗确实要追溯到大约一个世纪前

左右。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对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解释是一种近代的虚构,因为战争实际是在两支我们今天看来多种族的军队之间进行的,一支忠于奥斯曼苏丹,另一支效忠某个塞尔维亚王子。19世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创造了一个专属于塞尔维亚人的军队的科索沃神话(在以前的数个世纪中它是一个专属于基督徒军队的神话),而塞尔维亚学校学生被这样教育已有一个世纪了。所以神话真的在当代塞尔维亚人的意识中埋得很深。

20

诚然,一种种族对抗的年代并不必然与谋杀倾向相关。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丹麦—瑞典人之间的对抗也很古老,但是两百年来他们没有带来伤害。而在我的个案研究中,严重的种族清洗前曾有预兆——争端、暴力事件,也许还有集体迫害,曲折延续了一段时间。格尔(2000:50—53)说,在“实际上所有的”发生在1986—1998年间的所谓“种族叛乱”之前都有过重大的旷日持久的政治争论,在此期间暴力逐渐升级。哈夫(1998)强调前三个月的短期升级,而邦德(1998:118)和格尔(1998)谈到周、月甚至年。南斯拉夫冲突时现时停地贯穿了整个20世纪。年代尽管重要,但我们必须要对时间更近的升级提出解释。

施害人:民族主义的大众,还是威权主义的精英?

我的第7个论点对施害人作为精英、激进分子和核心拥护者等提供了一种多层面的阐述。但是两个远更素朴的观点占了上风——施害人是整个族群或国家精英。当在日常言论中,我们说德国人、塞尔维亚人等做这做那时,我们已经在习惯上支持了第一个观点。实际上所有关于南斯拉夫的族群战争的书籍,都不时要描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等集体角色,甚至我自己也许已在几个这样的集体名词中跌倒而没意识到。一般流行的对种族清洗的解释经常明确地赞成这一观点,一些学者也表示赞同。戈德哈根(1996)说,德国人总体上拥护一种“根除主义者的反犹主义”意识形态,并且在大屠杀发生之前的半个世纪就已经这样做了。奇怪的是,

他的著作在德国人中颇受欢迎。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戈德哈根是不正确的。达德里安(1995:121—127)说,土耳其的尚武价值观加上伊斯兰教信徒的褊狭,产生了土耳其文化上的一种杀灭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的倾向,这也是错误的。西加(1995)用副标题如“塞尔维亚人的优越感”和“作为濒临灭绝民族的塞尔维亚人”表达了他对南斯拉夫种族战争的观点。我给这些观点奉上民族主义称号,因为是民族主义者主张民族是一个单一角色。这称号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戈德哈根、达德里安和西加都在谴责民族主义——但却用了复制民族主义思想类型的方式。然而整个民族或者族群从不集体行动。施害人是一些或一部分德国人、一些塞尔维亚人、一些胡图人,来自于核心拥护者、特别地区、年龄组、经济部门等等,其中种族民族主义价值观、国家主义以及赞同暴力的集体共振最为强烈。种族民族主义者首先必须要制伏自己本族群体中的不同政见者。事实上他们经常杀掉比来自非己团队更多的本族人——政治学家称之为自己人团体管理(in-group policing)(布鲁贝克和莱廷,1998:443;莱廷,1995)。假如族群确实随着冲突升级而变得更为同质化,这正是我们必须要给予解释的。

21

把民族主义具体化的危险在今日之广为人知,使得一些学者已经转向相反角度,即所谓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把族性和族群冲突看作是由社会组织,通常是由精英,从本可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偶然事件中构建出来的,创造出了仅为局部和临时的种族身份(布鲁贝克,1996:第1章)。即使事情真是这样,一旦一种种族身份被通过社会构建出来,它可能会带来深刻和持久的感情,以至于它变成制度化甚至结构性的。一些种族特性深入沉淀,变成制度化;其他一些特性就更具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我的个案研究必须要注意这两方面,建立起深入持久的种族特性。

最常见的对怪罪于整个族群的替代是怪罪于精英,特别是国家精英。据说暴行发生在当人民臣服于恶意操纵的领导人之时。民主与人民被看作一样热爱和平的,而领导人与精英则更可能具有谋杀倾向。按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民主、和平与宽容据说是出现

在个人处在由志愿机构提供的充满生气的、密集的社会关系中时,机构保护他们不受国家精英的操纵(普特南,1993,2000)。这是幼稚的。激进的种族民族主义者通常正是由于他们的市民社会网络较之他们更温和的对手更加密集和更能煽动才成功的。纳粹就是这样(见本人著作《法西斯主义者》,第4章;哈格特维特,1980;科沙尔,1986),以后我们将看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胡图民族主义者也是这样。市民社会有可能会是邪恶的。

然而种族清洗已长期被作为国家的问题对待。费恩宣称:“20世纪有预谋的种族灭绝的受害人之遭谋杀为的是实现国家追求新秩序的计划。”(1984;参见霍罗威茨,1982;史密斯,1987)鲍曼在分析大屠杀时说,近代国家的武器、交通和管理技术已经使大规模的代表官僚机构的杀戮的效率提高了一截(1989)。奈马克说,种族清洗是近代国家最发达阶段的一个产物,体现了它对“秩序、透明和敏感性”的需求(2001:8)。人权组织一如既往地将种族清洗怪罪于国家精英身上(见1995人权监督手册;参见布朗,1996)。南斯拉夫内战经常被怪罪于米洛舍维奇和塞尔维亚精英阶层(布朗,1996;加尼翁,1997;格伦尼,1993)。费伦和莱廷说(2000),近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大规模的种族暴力是由精英们寻求获得、维持或提高他们对政治权力的掌控权而激发出来的”。

民主和平理论也证明代议制政府是摒弃武力的,极少发动战争,几乎从不相互为敌(多伊尔,1983;查评论见巴卡威和拉菲,2001)。这是源于自由主义的信念,即如果人民的意愿得到自由表达,它将是摒弃武力的。拉梅尔说,一个国家越是威权主义,它就越可能杀害它自己的或其他地方的平民:“权力杀人,绝对权力绝对杀人。”他像复述祷文一样重复着(1994:I, 12—27;1998:I)。在某种同义反复的意义上他是对的。谋杀自己的大批公民的政权不可能被视为民主制——他们不可饶恕地侵犯了民主中的公民自由部分。但是对拉梅尔来说,是民主中的选举部分确保了社会和平:施害政权通过威权主义手段得到权力,而不是通过自由选举。

然而有几个令人烦恼的例外情况。17世纪以来的欧洲移民,如

果生活在立宪政体而不是威权政府下,则可能会带来更大程度的种族灭绝。或许殖民者民主制度(settler democracies)最好被描述为种族统治(ethnocracies),一个族群的民主,正如耶夫塔克(1999)就当代以色列的情况所提到的。苏联与铁托的南斯拉夫通常抑制种族冲突,而他们的倒台导致了种族战争爆发,因为多数人族群寻求建立种族统治(贝辛格,2002)。布拉斯(1997)和坦比亚揭示印度次大陆的种族暴力在选举政治兴旺时增加,在军事管制下减少。“多数主义民主”是“胡图力量”(Hutu Power)1994年施行种族灭绝时的口号,而北爱尔兰新教徒与斯里兰卡人谴责他们的天主教和泰米尔对手破坏(大多数人的)民主。威权主义国家与种族清洗之间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关联关系。

像我一样,辛德也把威权主义政权看作是能比民主制更好地抑制种族紧张态势的政体,除非民主政权业已被牢牢地制度化。他还把新踏上民主化道路的国家看作最不能抵御种族民族主义的国家。他指出尽管人权观察委员会报告将种族战争怪罪到威权主义政权的头上,但实际上所有他们的对象——斯里兰卡、印度、南非、黎巴嫩、以色列、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俄罗斯、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最近都举行了公开竞争的选举,其间强大的反对派团体比政府更具民族主义色彩”(2000:267)。但辛德还是将民主过渡的破产怪罪于恶意操纵的精英们:“民主化在国家的强势集团意欲避免将真正的政治权威交给普通公民之时产生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冲突是作为精英们竭力说服人们接受分裂性民族主义观念的副产品而出现的。”(2000:32)这过于将其简单化了。请注意最坏的施害政权具有一种特殊的形式。斯大林主义的政权和纳粹的都是政党—国家(party-states),是倚赖在一种经过广泛动员的群众运动基础之上的独裁政府。暴行经常是自下而上发生的,地位低的激进分子要和政治经济精英算账。政党—国家出现在20世纪的所有事件之中。除了殖民主义的殖民事例——其源于自下而上的压力——一般总是不可预见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来自侧翼的强大压力的结合(才)导致了最坏的暴行。

政治学家还指出,种族战争往往发生在国家衰弱和派系分裂的地方。民主转向搅乱了国家原先正常的一套冲突管理办法:旧的国家已崩溃,新的还在形成中(贝辛格,1998,2002;格尔,1993:361—363;2000:36,236)。有些人说不是在强大国家而是在失败国家出现了最多的大规模杀戮行为,常常属于一种非常混乱的无政府的类型(埃斯蒂等,1998;费伦和莱廷,2003;波森,1993)。然而本书研究的是更有预谋地设定目标的种族清洗,它似乎应当包含政府继续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纳粹、青年土耳其党及米洛舍维奇政权没有失灵。派系分裂和激进化国家相较失败国家更有可能遭遇种族清洗。民主与谋杀性清洗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关系,但它要比许多国家主义理论家承认的更加复杂、更具双面性。最终,谋杀性种族清洗几乎总是由国家精英领导的。但是,再说一次,这是国家分裂、重建和激进化的结束程序(end process)。我们必须解释这一过程。

理性的、感情的或守持规范的施害人?

政治学家对种族暴力的研究越来越受理性选择理论的支配(下文简称为理性理论)。这一理论是说,人类行为产生于理性的个体竭力追求使他们的效用函数最大化的过程。它往往强调经济动机,通过对效用偏好形成几个简单的假定,力求达到最大节约目标,并期望能(或许仅在其奇思狂想中)将人类行为放入代数公式。

理性理论有用,然而有限。它在应对颇具功利主义色彩的经济学家的争端时最为自如。莱廷(1998,1999)揭示对国家官方语言的争论极少上升为严重的暴力,因为它们能够在理性角色之间取得妥协。以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少数民族为例。因为哈萨克语是国家公共部门的语言,一个俄罗斯人或能经学习哈萨克语而改善自己的职业前程。他不需要放弃他的族性,因为他还能够在家里说俄语。莱廷找到了一个倾覆点或连续过程。起初,一个俄罗斯人只从学哈萨克语中体验到一点点收获。假如他真的学它,别的俄罗斯人可能会排斥他,而哈萨克人可能还不接受他。但是如果一个或更多

的这些因素开始变化,学哈萨克语的回报就会增加,学俄语的回报则下降,直到对每种语言的预期收益变成一样。当它们开始转变,一个倾覆点即由此形成,同时一个连续过程开始了,向着所有俄罗斯人学哈萨克语这一此时更有用处的目标。然而假使哈萨克人仍然不给俄罗斯人工作机会,俄罗斯人或许会反过来一连串转为移居俄罗斯。莱廷说,这意味着,“一旦一批达到临界点的俄罗斯人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这批俄罗斯人就将离开”。但是即使强迫向外移民,离大规模杀戮还有很长的距离。这种语言问题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问题,与工作很有关系,人们可以通过讲一种以上的语言来保留自己的种族身份。

然而对立的语言可能不会被当作同样世俗而是同样神圣的,表达了那种真实的信仰。苏丹人真的会就阿拉伯语还是基督教语言在其国家中占据主要地位而杀掉对方。严重的暴力确实在其他后苏联国家爆发了,尽管不是针对语言问题。它转向对国家边界地区的争端,涉及多数族和少数族人口。对立的种族民族主义组织将同样的一片土地称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少数人群体受到隔壁新国家的帮助(贝辛格,2002:287)——正像我的第3和第4个关于族群的论点一样。这是感性的,同时也是功利的,它可不怎么服从于理性理论。

理性理论家也尝试去理解情感。他们以恐惧为重点。瓦因加斯特(1989)说,被种族民族主义者告知是根除目标的人也许会理性地决定反抗(或逃亡),即使根除的可能性极低。因为它假如真的发生,那就玩完了!所以因恐惧驱使的先发性的暴力或可解释表面看上去不合理的暴力行为。卡利瓦斯(1999)也证实在阿尔及利亚若干群体遭到屠杀,即使目前看上去尚未带来伤害。既然人们认为他们会在将来构成威胁,最好“先报复了再说”。拉布什卡和谢普斯尔(1972)说,随着紧张态势升级,对立的集体都转而开始害怕遭到灭亡。然后他们的精英阶层可能参加“竞争性喊价”,在极端的种族民族主义情境中相互较劲争胜。(结果)这削弱了稳健的对手,而使他们集体被鼓动去行使暴力。反过来,这使得另一群体的最坏的恐惧成为事实,因此对两者而言,对遭灭亡的恐惧获得了起初没有的真实基础。

以上是非常现实的场景,尽管它们可能过分悲观了。为什么稳健的领导人会遭到削弱?他们能带来和平,一个值得想望的目标。既然战争与暴力代价昂贵,双边正常地都应该更喜欢外交协定。费伦(1995)提出战争与暴力在其中貌似合理的三种方式,尽管客观来看,它们并不合理。

1. 安全困境(波森,1993),意思是每一方使它自己更加安全的努力都使对手更少安全。升级迫使双方集体躲在自己的暴力战士后面。恐惧与一种屈辱感导致被激怒的先发制人的杀戮。这或可解释许多杀人者的古怪观点,即他们才是实际上的受害人。这种两难困境意味着在冲突局面中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导致产生进行第一次打击的攻击动机。我已经将此纳入我的关于种族的第4个论点(4b)中。

2. 义务履行问题,指的是升级源于不大情愿去真正地付出行动来支持协议,这使得对手也不愿意履行义务。迪尔凯姆很久以前就说过,“并非所有在契约中的内容都是契约性的。”要契约有效,共同的准则是必要的。工具理性并不支配人类行为。我们必须研究准则、价值观和社会身份怎样形成并帮助我们判定我们的利害观念。我们把自己交给我们信任的人,但信任是怎样产生的,又怎样下降?这里我们肯定需要一种比理性理论所提供的解释更具社会性的解释。

3. 信息失灵,指信息只有一方面知晓。例如,在炫耀武力、虚张声势的恫吓下,对手并不知道它只是虚势,所以不必要地将自己武装起来,导致了进一步的升级。森斯坦(2000)认为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他借用实验性和陪审团研究指出,局限在一个团体之内的漫长讨论往往使它走向比之前一般观点更为极端的形式。在族群关系紧张期间,一个团体或群体可能早已对非己团体有了多少带有负面的看法。它越是只在自己内部商谈,就越会变得对非己团体拥有更多负面看法。然而这又一次地涉及准则、价值观和身份标志。人们究竟是怎样把自己界定为主要属于一个族群而不是具有一个跨族群的身份特性,如阶级?

问题是所有这三个过程都预先假定了准则、价值观和身份结构(的存在)而理性理论家却没有详细指明。他们倾向于假定族群身份特性和相互对抗已经存在。他们的角色太稳定了。然而相关的集体角色有很多,有一些诞生在升级本身这一过程之中。基于与国家、阶级、职业、地区、代际和性别等因素相关的身份标志,时而构成族群身份标志时而又不再是,而不断改变着族性的特征。贝辛格(2002)指出,随着苏联的解体,受种种情感、准则和利益等因素的激发,在苏联境内迸发出一道突如其来的充满种族民族主义敌意的浪潮。参与者被自己吓了一跳,迅速改变轻重优先和政治策略。大批群众犯下了他们原不知道自己也能够犯的仇恨罪。前苏联政治家转而加入了他们曾经一直鄙视而今日得势的种族民族主义阵营当中。

最重要的,谋杀性种族清洗极少看上去是理性的。德国人怎么会害怕犹太人——德国人口的0.7%?大多数被施行谋杀的群体遭受了比他们假使妥协受到的伤害还要多的伤害。德国、卢旺达和南斯拉夫被扔进历史的荒漠,米洛舍维奇在接受审判,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领导人遭谋杀身亡,余者担惊受怕,唯恐成为下一批暗杀或起诉的对象。难道理性就没有引领他们走不同的道路吗?

明显的回应是,自何时起理性支配人类行为? 马克斯·韦伯(1978:1,25)找出了四种人类行为主要类型——工具理性的、习惯性的、情绪性的(亦即感情性的)和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行为,正如理性选择理论研究的那样,在人类事务中显见地重要。但在权力关系或种族身份内化*的地方,如果我们被本群体其他成员告知我们受到了威胁,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采取习惯性行为,不加理性地算计。然后我们用这个群体的团体认同来界定我们的利益。只有在这种认同消失之后我们才工具性地计算我们的利益。在战争中我们习惯性地服从一个杀人命令,即使我们与受害人毫无仇恨。然后,随着种族敌意的升级,情绪性行为出现,对个体自己群体的爱与对另一个群体的恐惧、仇恨和愤怒可能会越过工具性关注。最后,我们可能会进入

* 即因适应而进入或成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价值理性行为,不计代价地把我们自己献给某些目标。这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行为。当人们愿意为追求价值而冒险甚至冒生命危险,工具理性可能会一时降到次要地位。韦伯的几个分类看来好像对种族清洗非常重要。所有四个类型将进入我列出的将在本书后文讨论的施害人动机当中。

理性理论要求一种真实世界不存在的精确和简洁水平。它为我们设定了一个令人赞叹的理论目标高度:我们应当尝试重建可变的与变化中的角色偏好,包括价值观、传统和情感,以及工具性目标——在总体的和变化的权力环境当中。实际上,我的第6个论点提出了动机的理性重建(要求)。我试图找出族群领袖的一连串计划,按形式把他们的原初主要的目标定为计划A,然后是随后的调整计划——计划B、计划C等依此类推。这一方法论有时会显得太像纲要、太重理性,因为人的意向经常是模糊的、处于流动之中的。但是它会证明是有用的,因为谋杀性种族清洗从不是由种族民族主义者设计的最初方案,而我们一定要能重建他们的目标的连续流。但这同时会导致更加一般性的动机问题。

施害人的动机:普通人还是狂人疯子?

有成千上万的人协助参与了最坏的谋杀性清洗。一个超过其他一切的问题让见证人绞尽脑汁:看上去明明白白的普通人怎么可能犯下谋杀性清洗之罪?一个简单的对比常被提出:他们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只是置身于非常特殊的环境,还是说,他们就是意识形态上的狂人?

最著名的答案是在斯坦利·米尔格莱姆的实验中给出的。他让普通美国人对智商测试中答错的实验者给予最厉害的电击。他们被告诉说,科学家正在测试电击是否会帮助改善智商测验分数(实验者穿着白色的实验室服装)。这些普通人(不区分男人与女人)中的65%,在被叫用手推动受害人旁边房间的一根杆子来让他们狠狠痛一下的时候,服从照做了。推的时候他们能够听到从墙那边传过来

27

受害人痛苦的叫声。30%的人如果让他们自己把受害人的手往下按向一个承载电流的盘子时还会这样做。有几个人很热心地加入实验,看上去很享受施予他人痛苦。但大多数人显得十分难受不安。在电击达到较高程度时,实验对象大声喊实验者停下来。但是尽管他们经受了道德和身体上的严重不适,他们还是继续忍受痛苦做下去——因为他们无法做到去拒绝科学的权威。米尔格莱姆(1974: 10)评论说:“有些实验对象心里完全清楚他们正在干的事是不应该去做的,但就是无法做到让自己公开与权威决裂。”不过,他不是像这实验看上去的那样带有施虐狂特征。痛苦不是真实而是虚构的。“受害人”是他的搭档,也没有真的输送电流。

米尔格莱姆想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命令来自一个合法的科学权威,普通的现代人也会去杀人。更多的人会服从间接杀害(从隔壁房间),所以政府的办公桌杀人(desk-killing)可能要比某人亲自去谋杀来得更容易。并非随后所有研究都支持他的结论。有一个研究发现,大多数实验对象在可能伤害受害人的轻微痛苦和痛苦之间作了区分,他们拒绝施与后者(布劳,1993)。但是一项对加州大学学生的研究则令人不安。他们被命令在监狱的背景中扮演囚犯和监狱长。当学生看守人开始出现残酷和专制的倾向时,实验不得不放弃(黑尼等,1973)。这些实验表明普通人如果在合法机构授权下是能够做出残忍行为的。没有实验能模仿真实的谋杀,但我们从时常出现的丑闻知道像监狱、济贫院和孤儿院这样的机构,必须要对内部员工向所管人员滥施淫威保持高度警惕。

米尔格莱姆的书参考了对最后解决方案的研究。但其中的施害人和其他事件中的一样,实际上分成好多不同类型。我从施害人身上区分出9种常见的动机。

1. 意识形态型杀人者相信谋杀性清洗的正义性。他们特别多地出现在施害人中的较高层,追从韦伯的价值理性——谋杀性清洗已预先被假定受到了高级目标支持。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或许会在某些环境下(如战争)或在核心拥护者当中,如已经在非己团体手下受难的难民,得到响应。20世纪的医生和生物学家发现,族性和人种

的生物医学模式尤其具有吸引力。但是最常见的意识形态动机是自以为正当地把杀人说成自卫。杀人者声辩他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2. 偏执型杀人者受更加世俗的意识形态驱动,特别是基层最普通的施害人共享一些其所在地及所处时间的偶然偏见,而开始了韦伯所谓的情绪性(感情性的)行为。犹太人、穆斯林和殖民地上的土著唤起了施害人对他们身体的厌恶。我们都知道偏执型的人在差异很大的环境下,或会为自己对不喜欢的少数民族的虐待行为进行开脱——特别是在感受到他们威胁的时候。

3. 暴力型杀人者被谋杀本身吸引。少数施虐狂将谋杀作为一种情感上的愉悦。更多的人是不得已而为之,暴力于他们是一种情感焦虑的释放或者挣脱。杰克·卡茨(1988)描述了美国的暴力犯罪的“魅力”。他说谋杀通常是一种高度情绪化的行为。最为常见的一种遭威胁感导致令人浑身不舒服的个人屈辱感,继而就是以自以为道德的激愤除掉它。“愤怒,”他说,“因屈辱而躁狂。”种族仇恨可能会将这种威胁—屈辱—愤怒的三位一体置换成一个集体层面:胡图人觉得受到图西权力的威胁和羞辱,他们开始行动,任何一个图西人都让他们怒不可遏。一个更具得胜感的情绪可能会包含在施用蛮力的过程中,就如任何学校校园里表现的那样。既然武器能战胜阶级差异,它们使得处在下层的人们能够体验到对富裕群体(像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或图西人)随心所欲地运用权力的欢乐。这些是普通人当中最坏的一些特征。但还有喜欢将暴力当作解决社会问题合理手段的核心拥护者——士兵、警察、罪犯、暴力体育高手或足球流氓等等。

4. 恐惧型杀人者感受到切实的威胁,担心如果他们不去杀掉对方就会给自己的生命或肢体带来伤害。这些是在身体上遭到了强制的并不情愿的杀人者。这里的动机是工具理性。

5. 追名逐利型杀人者受雇于涉及谋杀性清洗的组织。遵从杀人命令在他们看来具有物质好处,可带来更好的飞黄腾达机会——或如果他们不帮着杀人,会出现比现在更坏的前景。这在较为官僚机构化的谋杀性清洗中更加常见。

6. 物质主义型杀人者受到通过抢劫或夺取受害人的工作、企业或财产可获得的直接经济利益的诱惑。有些是从监狱中释放的囚犯,只要他们答应杀人。这同样是高度工具性的动机。

7. 遵守纪律型杀人者被有合法编制的行政管理机构控制着,在此不服从命令被视为偏常。必须服从指令在他们的思想中高于一切。所有现在、过去或未来的不同国籍或各个民族的人都能被来自上面的压力变成遵纪守法者。他们或会成为韦伯意义上的习惯性杀人者。

29

8. 伙伴型杀人者迫于同伴压力而只好与之保持一致,特别是害怕失去同伴对他的感情支持。这使人想起韦伯的情绪性行为。它与布朗宁(1993)对普通德国警察所犯的大屠杀罪行的解释有部分相通之处。

9. 官僚机构杀人者受制于现代性的官僚政治。他们的服从带有习惯性,在韦伯意义上,它由已制度化的例行公事造成,使他们陷入了在现代社会中制度化了的、阿伦特(1965)提出的著名概念——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当中。这是米尔格莱姆观点最适用之处。普通现代人会去谋杀,鲍曼(1989)和卡茨(1993)说。巴托夫(1996)持相同意见,他将这一困境的起源一直追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机械、理性和无人性的杀人机器。

所以我们有一个阵容庞大的潜在的杀手队伍——意识形态的、偏执的、暴力的、恐惧的、追名逐利的、物质主义的、遵守纪律的、伙伴式的和官僚机构中的。此种多样性的存在加强说明了我的第8个论点,因为它从根本上使得普通人参与到谋杀性清洗之中。有些施害人是为了他们坚信是理想的东西,亦即意识形态的理由而去谋杀,有些人喜欢或将其尊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最佳办法。凶杀性机构是遵守纪律的、伙伴式的、有望出人头地或能借机大捞一把的,有些则是官僚机构。如此庞大的施害人群一定已包括了一些相当普通的人。既然这些仅是理想类型,几乎所有的施害人都有一种以上的混合动机。这一连串动机往往会在临到谋杀的那一刻“定格”(freeze)。既然几

乎没有施害人从一开始就打算到外面去杀人(论点5),他们早期的动机肯定会有不同。因此,我要追溯他们修正动机并使之社会化至符合谋杀行为的可能性的过程。

我们也不应该把个体从其所在环境中抽离出来。我们总是想要在这种特殊的人类行为领域中采取一种个人化的研究路径,这部分是因为法定过失问题的绝对重要性。我们会为个人性行为而对这个人进行审判甚或判其死刑吗?然而我们又忍不住在尝试理解这种行为时采取个人主义方式。任何已思考过这类事件的人都可能问过这样的问题:“假如我在这样的环境下被命令去杀害男人、妇女和孩子,我会干什么?我会坚持什么样的道德准则,会有怎样的勇敢行为?”然后我们或许想起我们自己是怎样怯懦、墨守成规,或对名利有如何强烈的欲望——反省我们自己连更不起眼的小事都做不到:帮助贫困的或受迫害的人。显然,这类普通的人性弱点在协助谋杀中具有重要作用。

但要回答“我会怎么做”的问题,我们恐怕必须把自己放回到那个时代,把自己当作一个在当时占据着同样位置的人。一个像我一样的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可能会支持保守的民族主义,对纳粹事业表现出些许同情。学生有可能会更倾向纳粹,因为纳粹赢得了德国1931年的自由全国学生选举。假使我是一名当时的生物学或医学教授,我有可能会沉浸于科学的种族主义研究,而在这过程中肯定会得到激进纳粹主义的响应。作为一名写过一本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著作的社会学教授,我不无忐忑地发现有一位前辈。奥托·奥伦道夫对法西斯主义的学术兴趣使他成了一名纳粹。他的带点儿自以为是的个性起初让他与纳粹领导层不和,但是之后他就负起责任,同意担任可怕的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谋杀小队之一的头头。他的小队谋杀了9万人。1951年他在纽伦堡被处死。若置身于这样的环境,我们中的许多人也许会走到距离谋杀性种族清洗非常近的地步。

我的因果模型：社会权力的来源

为解释谋杀性种族清洗，我们需要包括权力互动的总体模型。我运用我在前一本历史著作中使用的社会权力四来源模型（见曼，1986,1993）。我将种族清洗作为四套相互关联的权力网的结果加以研究，它们对清洗的取得完成都是必要的，但其中一个可被看作是因果链中的主要环节。

意识形态权力指的是对人类社会中价值观念、准则规范和程式礼制的调动利用。我没有暗示意识形态是虚假的，只是说它超越了类似经验和科学的东西，所以包含了无法验证的因素。在与我用意识形态差不多一样的意义上，有些人采用了文化这个词，不过，我因视文化为一个过于模糊且包括多方面内容的词而避免使用它。种族冲突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83）著名的格言“民族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表明在我们直接的生活经验中并非显而易见，完全的陌生人也有可能与我们共享一个族群或民族的身份特征。这样一种古怪的观念必得由意识形态创造出来，因为它大大超越了我们的实际经验。我们需要一种因果理论，解释在什么特殊环境下和依靠什么机制文化/意识形态帮助产生了装满仇恨的种族身份。德国人真正了解犹太人多少，以致竟会将他们视为对其集体生存的威胁？施害人如何进一步发展到实际杀戮行为，以致战胜道德禁令“汝不可杀戮”？一些领导人和激进分子怎么发展至受“价值理性”驱使而让所有工具理性受损？

各种意识形态通过多种通讯网络传输，其中一些网络拥有比其他网络更多的知识资源与说服手段。它们将社会团体和大众传播媒体调动起来，如举行群众游行与集会、发放印刷品和采取无线电视广播，所有这些都可以获得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权力。然而人民不是文化笨蛋。他们接受让他们的世界具有若干合理意义的思想体系，同时还主动重新对其进行诠释。给种族清洗提供充分理由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真实且不断增多的历史冲突的基础之上，尽管它们必须与另

外那些通常也在提出貌似合理解释的意识形态相斗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我将强调它们的对抗在大多数情况下难分高下的性质,至少在升级的早期阶段。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通讯手段的控制可能为种族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更大的意识形态权力。不过,这是需要作出解释的过程的一部分。

经济权力也很重要。所有清洗事件都涉及物质利益。通常,一个族群的成员慢慢开始相信他们拥有一个与非己团体分隔开的集体的经济利益。正如我在第2个论点中表述的那样,族性能够胜过阶级。阶级感情被移到了族群关系当中。被压迫群体确认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剥削民族,把它自己视为一个被剥削的工人阶级民族(像卢旺达的胡图人一样)。剥削者认为它的帝国统治为劣等族群带来了文明。针对来自底层的革命威胁而为帝国作出的这种辩护,是我称之为帝国修正主义的东西——在纳粹、塞尔维亚人和图西人当中它太明显了。

31

阶级感情的移位也发生在种族特有经济(ethnic niche economy)中,在此少数裔群体在劳动分工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犹太人、印第安人或中国商人,爱尔兰人或印度劳工。但是,尽管可能导致歧视和政治抗议,但它极少升级到大规模暴力(格尔,2000:229)。像语言问题一样,它是工具性的,可以通过妥协而得到解决。最坏的事件似乎发生在大众阶级感情,能够被表面上像真的一样移入到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群体(如犹太人或中国人)当中的地方,像蔡爱眉(Chua,2004)着重指出的那样。但是大多数种族特有经济对上层阶级太有用了,最终他们不会同意消灭掉它。因此康纳(1994:144—164)和霍罗威茨(1985:105—135)指出经济利益很少是种族冲突的主要原因。蔡爱眉(2004)将卢旺达和南斯拉夫的种族灭绝和谋杀性清洗追溯到市场剥削的尝试有点勉强了。

然而在市场受到彻底垄断限制的地方,比如在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体中,或者在排他性的土地所有制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一个以某一族性为主的国家可能会不让其他族群拥有土地、获得工作或得到营业执照。国家控制成为最重要的实现物质繁荣的方式,强化了

种族民族主义者建立自己国家的动力。在刚脱离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国家可以控制主要的工业和外国援助,根据族性分配它们的利益。针对这样一种珍贵的国家地位的争夺可能会导致对输家的谋杀性清洗。土地所有制也具有天生的垄断性质。与资本和劳动力不同的是,土地是有限的。拥有即意味着排除了他人对它的使用权。一个族群拥有即排除了其他族群拥有。在农耕社会这会对生命造成威胁。因而,殖民主义的殖民产生了尤其带有谋杀性质的针对土地所有权的种族冲突。占取土地而不需要当地劳力,经常带来种族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殖民主义清洗独独是以针对经济权力资源的直接冲突为主的。

一旦谋杀性清洗被发起,更多世俗的经济冲突也开始显露出来。受害人被抢走珍贵物品、房屋和衣服,在种族暴行之上又增添了世俗人类的贪婪。但这需要先决条件,为了从抢劫我们的邻居中获得利益,我们一定要在军事上强于他们。意识形态与政治制裁一般也阻止我们去抢劫邻居。我们认为这在道德上是错的,并会遭到法律的制裁。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意识形态和政治抑制会瓦解。贪婪也不能解释20世纪种族清洗的加速。在所有历史上的战争、报复性劫掠以及种族暴乱中,财产与物品被粗暴地攫走。这是历史定律。事实上,经济没收在清洗中通常是第二位的,并且也很少对引发清洗起重要作用,一开始清洗对低层施害人具有不成比例的吸引力。

假如群体确实以族群概念来认同自身及其经济利益,族性可能会胜过阶级。但是这要求资本主义者、工人、小资产阶级、地主、农民以及族群内的其他人,开始将他们自己看作是具有共同经济利益的人。这对种族民族主义者不是一个轻松的意识形态任务。族性或民族在近代并没有从总体上胜过阶级。甚至在我研究的个案中,民族主义者也不得不战胜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强调部门或阶级冲突是主要的物质问题。

军事权力是由社会组织并集中起来的致命暴力。这在最坏的种族清洗事件的后期阶段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军队、警察部门和准军事部队是军事权力的主要代表。我将考察它们的资金筹措、新人招

募和平时训练：谁有接近枪炮或参加军事训练的机会？谁赞成把暴力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有无暴力职业专门训练让人适应谋杀需要？

绝大多数的 20 世纪种族清洗事件发生在战争或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混乱时期（梅尔森，1992：第 9 章；奈马克，2001：187）。常规战争可能会根据决定战俘与平民待遇的规则而展开，但是规则之间有差距——比如今日平民的轰炸和心理虐待，以及早几个世纪的攻城战争和依赖农村提供给养。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战争减少了大家共同的规则，能把平民变成敌人。“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场出现了针对敌方士兵与平民的种族主义暴行；东线战场出现了法西斯分子的暴行。内战和带有强烈种族因素的分裂战争对身陷敌后的族群来说是危险的。当其（指谋杀性清洗）能够以较低军事代价实现并且几乎不用担心得到什么报复（见我的论点 4b）的时候，参与谋杀性清洗的诱惑力就提高了。军事行动可能会带来实施原先并未计划的针对平民的暴行的战术性诱惑。长时间的攻城战争诱使攻城者在攻城之后洗劫城市。游击战争诱使游击队员杀害平民。一位储备力量固定的军队的高级将领面对一股流动性更强的敌人时可能会袭击平民居民点，以迫使敌人进入更加静态的防御，就像谢尔曼将军针对大平原印第安人时所做的那样。这些都是可能产生谋杀性清洗的军事权力的特征。

政治权力是对社会生活集中化的、领土性的规制。我提出暴力在针对对立的政治主权声明时升级最快（参看霍罗威茨，1985；威默，2002）。我的论点从“危险中的少数派”课题的量化数据中得到了佐证。为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世界上种族政治叛乱提供了最好解释的变量是针对前 5 年的政治抗议，一个不稳定、分裂而压迫性的政权，地方人口的集中，广泛的政治组织以及来自外国拥护者的支持；除了人口集中外其他都是基本的政治变量。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文化和政治歧视有可能导致族群的抗议，但却很少升级到叛乱的水平（格尔，2000：234—236）。

政治权力天生是领土性、权威性和垄断性的。意识形态局部是

私人的,实质是自愿的,经济生活包括市场选择,军事权力通常是制度化的,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但是我们必须习惯性地服从一个国家的监督,我们不能选择哪一个——要么留下,要么离开。对立的主权要求最难达成妥协,最有可能导致谋杀性清洗。谋杀性清洗最可能出现在这种地方,在此两个族群中的诸强势集团旨在“以人民的名义”于同样的领土上取得合理合法且有能力实现的对等国家地位(rival states),而两个族群中的弱势一方则得到来自外部的援助。它在面临不稳定、派系化的政党国家的形势下恶化。这就是本著作的主要论点,它表明,在解释这一特殊而邪恶的人类行为领域的过程中,政治权力关系最终是决定性的。

第 2 章

以往的种族清洗

34

本章想要表明既然在前现代阶段阶级通常胜过族性(论点 2), 那就不存在什么种族清洗(论点 1)。尽管大屠杀对于人类历史显然并不陌生, 但早期历史上的政权极少有预谋地去消灭或赶走整个平民人口。征服者一般需要有人接受统治; 他们想要让人臣服并接受奴役, 不是要除掉这些人。但有人不赞成这种说法, 宣称谋杀性清洗在古代和近代同样存在, 并引用了臭名昭著的亚述人或迦太基人摧毁希腊城邦国家以及罗马人摧毁努曼提亚和迦太基这类例子(乔克和乔纳松, 1990; 普里兹公爵, 1994: 4—5; 弗里曼, 1995; 乔纳森, 1998: 第 17 章)。史密斯(1997)宣称“种族灭绝存在于人类历史各个阶段”, 但根据不同历史年代他区分了不同类型——征服性的、宗教的和近代的种族灭绝。

没有哪个年代垄断了大屠杀。早期年代可能比现在更加残忍, 更加容易杀戮, 比如凭借公开的折磨和处死手段。我们现代人更喜欢保持一段距离的间接而冷酷无情的杀戮。我们从一个安全的高度扔下炸弹, 却惊骇于斧与剑的屠杀(柯林斯 1974: 421)。在往昔年代对待下层阶级, 包括普通士兵, 比今天要残忍得多。处罚严厉, 杀一儆百, 鞭打寻常事, 处死不稀奇。敌方的下层阶级受到的待遇更糟。军队有农村提供给养; 攻城者在夺城途中一路洗劫, 抢掠和强奸妇女。但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中, 史密斯着重指出, 人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 而不是因为他们是谁, 而被杀死。谋杀不独属于近代, 然而为了清洗特定身份的人群而进行的谋杀, 则是属于近代的。

即使就清洗而言,我也必须修正这一表述。流动中的征服者目的在于在土地上定居耕种或自己放牧,他们有强烈的经济动机把当地人赶走,有可能展开野蛮的驱逐,如果驱逐导致饥荒,就会进一步恶化到种族文化灭绝的地步。有几个事件中,这可能会导致地方的种族灭绝,就像一些匈奴人、蒙古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那样。如果入侵是由牧人对定居地所为,则当地人死亡率可能会很高,因为牧人比农场主需要更广阔的土地。不过,大多数习惯上被描述成征服行为的古代的人口大规模移动,其差别是很大的。说印欧语系语言的人(几乎所有欧洲语言都是从它这里来的)很可能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征服,而是经过一个数世纪之久的传播先进的新石器时代农业的过程。伦弗鲁(1992)推断说,实际上没有人会比他人多移动几英里。大多数早期历史上被假定的征服者实际上是逐渐取得权力的。多卢克哈诺夫(1994:394)认为,中东的闪族人起初以流动牧人的身份出现,生活在很少迁徙的农民周围。他们接受了大量的农耕文化,以劳工、雇佣兵和商人的身份进入城市。最终,闪族人起而反抗,将农民征服。之后他们建立起大帝国——阿卡德(Akkadian)、赫梯(Hittite)等等——开始统治农民而不是除掉他们。

我们对更近的侵略者,如征服罗马帝国的野蛮人,了解最多。法国南部加龙河谷(Garonne Valley)的西哥特人征服者可能是典型代表。他们仅占谷中当地人口比重的六分之一。布朗(1996:57—62)说他们不被视作来自“外层空间的侵略者”,而是作为熟悉的邻居,以前经常参加保卫帝国不受其他入侵者侵犯的行动。他们招纳罗马的叛徒,寻求通过暴力改善自己命运的穷人。除了“偶尔令人恐怖的大规模的袭击”(像匈奴大帝/匈奴王阿提拉的那种)——它会有相当的破坏性,他们总是把“毁坏草地,破坏乡村和毁掉橄榄林”作为一种迫使对方屈服的方式。抵抗者被杀死,妇女遭强奸,而另外的死亡来自于营养不良和疾病。“目的是给予不多不少的伤害,以说服当地头领慎重考虑还要进一步抵抗的问题:希望他们会向一个新的最高君主进贡或敞开他们的大门。”哥特族人不想对文明民族进行清洗,他

们想通过后者让自己变得文明。东哥特王国国王狄奥多里克这样总结：“一个适于工作的哥特人想做一个像罗马人一样的人；只有一个贫困的罗马人会愿意做一个哥特人。”他在描述单边的同化，即限于两个民族中相似的社会阶层之内。上层阶级的哥特人成为了罗马人；一些下层阶级的罗马人变成了哥特人。蒙古人与中国人在中华帝国（指封建王朝时代的中国）的衰弱时期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这些野蛮人奉行的先是儆戒性镇压，后是局部的阶级同化，而不是清洗。这很可能是在野蛮人征服更开化民族当中最常见的模式。随着征服的继续，他们使得更多民族被他们的文化和身份特性所同化。到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到达中东时，参加征服的“蒙古”军队大多数是沿路抓来的突厥士兵。接下来可汗统治的领地在种族方面极其混杂——后来转信了伊斯兰教。

既然避免劳动曾经是文明的全部（现在仍然是），野蛮人需要有人被他们统治，为他们干活和创造剩余财富，如果杀了受统治的人，他们将不得不自己干活。极端之时，他们或许会杀掉或驱逐制造麻烦的整个精英人群或不服从的城市及地方上的人口。屠城一旦发生，就会导致成千上万的死亡，如在前面提到的努曼提亚和两个希腊城邦国家发生的那样。他们被树立为一个榜样。但征服者吸收那些确实屈服的精英。既然大多数帝国与野蛮人征服了他们的近邻，他们就不将后者当外国人看待。古代征服者的凶恶是意在给其他城市及地区发出一个促使其投降的儆戒性信号，它并没有着手更系统性的清除。

大多数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都是非常国际化的，蕴含着能导致暴动的族群及宗教紧张态势。就最坏的情况来说，这可能会升级到集体迫害；疯狂的、短暂的指向少数人群的暴力有可能会从公开的紧张关系和统治者的分而治之战略中产生。尼禄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将基督徒作为罗马大火和进攻犹太人的替罪羊就是明显的例子。战争偶尔会发生歧差，正如它现在还会一样，误入种族文化灭绝之途。荒芜国土，焚烧庄稼和家园以及杀死动物导致大规模平民死亡——被毫无人性地视为可以接受的损失。由一些统治者表露出来的愤怒、

报复、惊慌、酗酒或妄想狂(阿提拉、帖木儿或恐怖的伊万似是明显的例子)也许会强化恐怖。极端的事件在那时受到强烈谴责。正如史密斯(1997:232)提醒我们的,认为这样的行为只在近代才引起一种恐怖感是不符合事实的。

罗马为摆脱迦太基控制已奋斗了一个世纪。到罗马占得上风之时,报复的欲望十分强烈。迦太基必须被摧毁(拉丁语:Delenda est Carthago)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了。它被夷为平地,据说当时在地上撒了盐以阻止庄稼再生(若从所需盐量来看的话,这很可能是杜撰)。大量迦太基人随后死去。然而,这种待遇是罕见的,因为罗马征服者容忍了古迦太基文化。它在西班牙继续存活了至少三个世纪,在北非和撒丁岛存活了五个世纪,直到罗马帝国接近灭亡。古迦太基上层阶级几乎立刻就获得了若干政治自治权,他们开始被同化,之后又轮到下层阶级(洛佩斯·卡斯特罗,1995:157—159,210—219)。

早期历史中的族性

不难作出总体性的解释。正如欧内斯特·盖尔纳(1983)和我(1986)指出的,历史上多数大国是上层阶级的私人所有物,他们的文化不同于群众的文化。用吉登斯的术语说,这些是分阶级的社会。诸族群存在着,但是在大型社会里其中一两个精英阶层统治着其他族群。因此由一个民族或以它的名义对另一个民族进行大规模清洗是不常见的。在全部民族共享同样的集体身份和政治诉求的社会里,这更是一种危险。全部民族崛起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伴随着宣扬一切阶级和地区皆有同样的灵魂和获救能力的救世宗教的兴起而到来。这让社会神圣领域民主化,但世俗领域却并未如此。完全的大族性(macro-ethnicity)出现在第二阶段,伴随着对世俗民主的强烈愿望,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的种族清洗的可能。而这就使得大族性主要受制于现代性的约束。

在人类历史上,族性意识一直非常普遍。一切社会的基础构成

都是地方性和亲属关系,如果这种联系世代不变,它们就会产生一种共同的种族群体意识。人类学家研究过的许多这样的氏族和部落群体都是非常小的小族性。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们也许会扩大成为一个稍小一点的民族(people)。早先历史上的较大国家都无例外地是由许多这样一点点大的族群组成。然而较大单位是大族性吗?阿卡德人、赫梯人或亚述人共享一种超越宗教和阶级的共同特性吗?

多卢克哈诺夫(1994)总结了考古学家对最早中东文明时代的族性的了解。约公元前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带来了大量松散的将许多小群体连接在一起的“社会文化互动网络”。此时几乎不存在什么由文化封闭或集体意识发展到种族身份的现象。只是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前3000年较小的、紧密的酋长制氏族部落出现之后,才出现了某些族群自我意识。但当这些酋长部落被更大的有文字的文明吞没之后,族群边界就随之弱化。统治阶层、牧师阶层和商人可能会属于独特的少数人族群,而与各地方的农业人口大多数格格不入。阿卡德、赫梯、亚述及乌拉尔帝国即属于这种情况,它们是被军事权力集合在一起——而不是因为共享的文化,更不是种族团结。实际上,因为全区大多数的征服者都讲闪米特语,它们中的书面形式之一阿卡德语就成了遍布整个中东的精英阶层都使用的共同语言,虽然任何地方的老百姓都不讲这种语言。这不是一个由族性凝聚国家的时代。

社会与地理距离显然是关键:某种共享的族群身份能纵横相跨多远?地理空间越小,人口越密越平等,交流就越容易,从而更可能形成一种共同族群意识。让我们考察一下社会权力四种来源的基础结构。

1. 意识形态权力主要通过语言、文化学习和宗教传播。大量前现代社会里的普通百姓都不讲共同的语言,而且他们不识字。精英阶层也许会说或讲一两种共同的官方语言,它们不是通常的本土语言。像阿卡德语一样,希腊语、拉丁语和波斯语,与大多数帝国所操的语言没有关系。

古代宗教情形各异。有些是受阶级束缚的。在美索不达米亚平

原, 宗教仪式是为了居住在普通人不能进入的宫殿庙宇中的权贵们的利益而私下举行。调和宗教(syncretic religion)对各种各样的地方宗教兼收并蓄, 形成了一种官方层面的松散的众神的集合。而在大众层面能否发生相当的融合则令人怀疑, 尽管某类崇拜会散布得很广。统治者一般会宽容流行的和地方的宗教。当亚历山大大帝到达孟菲斯的时候, 政治权便(expediency)要求他必须对埃及的神灵表示敬意。作为回报, 他被同意担任新一任法老。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据称憎恶埃及的动物祭品, 然而有墓碑显示他曾亲自参加祭礼。只要群体尊重官方的神灵, 他们就能够继续奉持他们喜欢的任何宗教。因为基督教不愿意遵守这样的规矩, 所以遭到了迫害。在一神教的救世宗教兴起之前, 宽容或调和主义在大多数帝国中是普遍的, 是时伊斯兰教保持着宽容, 印度教则选择调和。宗教加强了多族性, 而不是大族性。有些宗教文化甚至跨越了多种族国家, 如在苏美尔和希腊那样, 这给绝大多数阶级的人民一种在种族上要么属于希腊要么属于苏美尔的感觉(也许不适合奴隶), 但这并不含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城邦国家花了大量时间相互打仗, 希腊人只是在他们面临可能的波斯霸权地位时才团结起来对付波斯人。换种情况, 他们与波斯结盟和与波斯对抗的可能性一样大。

难道就没有原民族(protonational)的宗教, 在此宗教或许可以帮助凝成一种大族性身份? 犹太教通常被引为主要的例证。耶和华确实成为了全部犹太人的神。对他的崇拜成了犹太族群身份感和犹太人渴望政治自由的核心。但是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认为这比圣经传统认定的发生时间要晚得多, 应是在以色列国覆灭之后, 并且部分是因为波斯统治者鼓励臣民形成稳定的集体特性。即使那样, 它也仅适合于巴勒斯坦, 以色列国土的一部分(汤姆森, 1992:422)。在罗马人统治下犹太人确实构成一个种族问题, 它已变得异乎寻常地抱团, 充满反抗精神并处于受迫害状态。亚美尼亚人在晚近的历史中构成了同样的例子。但我怀疑可能还曾有许多这样的情况发生。

2. 经济权力也很重要。大多数早期的自给自足经济属于小规模的经济, 将举步可达的距离之内的村庄与庄园融合在一起。富人能

够驱车走更长距离；那些靠近通航水域的人可将货物传输得更远。商人将贵重货物运载到遥远距离之外，然而大部分人口在经济方面还是局限于地方范围。城市，尤其是主要城市，向其腹地输送出密集的网络。灌溉，特别是自成体系的水利经济，为一些大的乡村地区提供了这类网络。首都与其腹地，非同寻常的生态条件，高度有效的帝国政权，以及商人、手工匠和统治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或许会产生某种融合，尽管在文化方面商人通常具有世界性和超越国家的特点。近代早期欧洲国家主要城市周围的自治县内出现过一阵民族意识的骚动——例如伦敦和巴黎的周围。但是遍观整个前现代社会，我们极少发现能够产生大族性团结精神的高度一体化的经济。用经济术语说，这些是分阶级的社会。

39

3. 军事权力创造了历史上大多数的大国家。服兵役是寻常家庭最能感受到国家之重和借以向国家奉献忠诚的地方。然而大多数军队士兵是从角斗士阶层或通过封建征兵形成的，他们的忠心更多是献给他们的阶层或封建主，而不是国家，献给民族的就更少。征兵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大族性黏合力，特别是在公民战士乃是准则的地方，尽管这些人通常必须足够富裕，能够为自己提供武器、盔甲和马匹。亚述帝国建立在受过高度训练的步兵之基础上，后者是从帝国中心地带征召来的农民。他们很可能共享着一些其统治者的尚武文化和战争的战利品，这产生了一种覆盖全部阶级的亚述人意识。帝国然后就类似一种种族统治，即一个族群对多种人口的统治。罗马在其最早期的共和国岁月中有点类似这种味道。但是随着亚述与罗马的扩张和彻底的帝国化，他们的军队就从帝国的各种族群中征召士兵。他们对帝国的忠心似乎并没有成为一种族群身份。

4. 政治权力是最后的因素。君主制统治着国家，产生宫廷与代表大会中的“进”与“出”，后者通常是按区组织的，负面影响着整个王国的大族性形成。罗马元老院构成一个局部例外而希腊城邦构成一个重要的例外——独立城邦国家的公民中一个强有力的集体责任调动工具。在邦联形式的城邦国家中，如在希腊、苏美尔和腓尼基的那些地方，政治基础机构通过提供更有力的地方身份削弱了可能的

族群身份。

国家行政机关确实试图使它们的一些臣民部分地同质化。中国的官僚体制作为一个整合工具而闻名,尽管它受阶级束缚,只将地方的某一中上阶层带入帝国的汉族文化认同之中。中华帝国超凡的长寿命和关键的领土的连贯性很可能让它成了例外。在历经数百年的汉人统治之后,普通农民似乎也将他们自己看作是汉人了。像许多其他征服者一样,希腊和罗马的精英们经常与被征服的精英通婚,将精英的孩子带到首都和宫廷接受希腊或罗马的语言及文化教育。经过这样的政策之后,一般人都认为,在罗马统治下不到 100 年,要分辨精英阶层的原来身份,尤其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被征服民族,已经不可能了。罗马士兵也与被征服地的妇女结婚,在边陲地区定居下来。与本土精英的消失同时发生的是罗马的道路修建、城市化、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的经济整合,以及兵役制和税收制度的标准化。因此一种身为罗马人的意识在人群中广为普及了。从公元 212 年起,公民身份变成普遍现象,尽管因为伴生而来的阶级差异的扩大,它失却了真正的内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从未属于同样的族群群体。就像在几乎所有帝国中一样,这是一个单面的、贵族性的文化。

40

亚述的例子

说在古代世界中也能找到种族灭绝的学者总是要举亚述人为例。史密斯(1997:224)称:“亚述几乎每年都要发生种族灭绝。”(参见贝尔-菲阿尔科夫,1996:7;拉梅尔,1994:11)这让我们感到奇怪,他们怎么可能还有什么臣民存在呢?实际上,亚述人是犯了虐待犹太人的错误,后者的编年史成为了世界最大宗教的神圣文本(圣经)。《以赛亚书》和《列王记》详细记载了他们的暴行,同时他们自己的铭文印刻似乎也证实了它们。随后的巴比伦及波斯帝国政权相对温和。

但是在征服和随后对反叛的处理过程中,亚述人表现得与其他征服者一样,只是更具系统性。在一个国家面临亚述军队而选择自

愿屈服的同时,他们是臣服于隶属制度,即间接的亚述统治。他们保留了政治自主权,通常是在原来的本土统治者统治之下,但要纳贡。其人民成为这多族群帝国中的又一个族群。如果依附者反叛,然后很快又屈服,它的统治者及他的亲密盟友可能会被处死,由另一个地方统治者代替,而进贡的要求会比原来高。抵抗越激烈,镇压越重。持续的战争或反叛可能会导致整个占支配地位的氏族被消灭,直接统治开始,依附国会被并入亚述帝国本土其中的一个省。但大多数被合并的民族在文化上能存活很长时间。始终不退的反叛或艰苦的围攻很可能会引发儆戒性的镇压,最坏可导致驱逐之后的政治灭绝。

历时5年的巴比伦起义以长达15个月的被围阶段为终点,公元前689年亚述王西拿基立(Sennacherib)的亚述军队攻下巴比伦,此阶段结束。街上到处是尸体,幸存者遭驱逐,城市变为一片废墟。在其他巴比伦城市,一些领头的造反者被活活剥皮剜肉受尽严刑并被处死。大量地方出现抢劫和焚烧庄稼行为,饥荒死亡因此发生。报复的动机很明显,因西拿基立在巴比伦叛乱中失去了儿子。但是这样的野蛮行径也是现实政治——恐吓和震慑别人。它产生了效果。巴比伦土地上之后再无造反起义发生,直到公元前652年,此时某些驱逐行为被认为已是对下一次起义的足够惩罚,就像公元前627年的驱逐被认为是对其后的起义的足够惩罚一样。在这样的时刻,亚述还建造浮雕、印刻铭文公开宣告镇压的级别以及其运用理由,表明了其行为的儆戒性质。

犹太王希西家(Hezekiah)意识到他加入了一次反叛是犯了一个大错误,这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反叛同伙已弃他而去,与西拿基立达成了交易。孤身落在耶路撒冷,希西家眼看着亚述军队占领他的其他城市、抵达各个城门。亚述人统帅给了犹太人一个选择——说的是希伯来语,以便让守卫者能够明白——要么继续战斗至死,要么调转枪头指向希西家:

不要再听从希西家:因为这是亚述王说的话,用一个礼物与我订立协议,对我宣示效忠,然后你们每一个人吃掉自己的葡萄

藤和无花果树,饮干自己储水罐中的水;直到我来,把你带到一个像你自己的家乡一样的土地上,一个满是谷物和美酒的地方,一个到处是面包和葡萄园的地方,一个到处流淌着橄榄油和蜂蜜的神奇乐土,而你活着,不会死去。(《国王》第2篇18:31—32)

他在给予他们为反叛者准备的传统的亚述选择:死或治安性驱逐。

亚述人擅长驱逐。总共驱逐的人数可能要在100万以上。但是这些驱逐行为涉及的死亡人数非常之少,不像本书中讨论的大多数近代驱逐行为——从切罗基人的“泪谷”^{*}到车臣人遭末世沙皇及斯大林驱逐,再到1945年犹太人的死亡大游行。亚述人的浮雕表明,士兵驱赶被驱逐者,但沿路的亚述官员必须为他们提供饭食和居住的房子。在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之后,他们以家庭为单位被安置在农场或适合他们技能的城市职业中,大多数人享有与当地一样的自由或当地人一半的自由。该政策充满工具理性。驱逐出境消除了制造麻烦的国家,而不是民族。精英与士兵可能会被杀害或受到奴役,反叛者信仰的神的形象和雕刻被捣碎,以摧毁其国家的意识形态。然而人民是重要的资源,驱逐行为帮助重建了亚述。经年不断的战争耗光了人口,特别是在主要的打仗和征兵区域。那些具有经营技术的被驱逐人员被给予了优待,他们被补充到熟练劳力当中。到一定时间,他们也许会被地方人口同化,但正如奥迪德(1979:86)所言:

亚述人对一个人的态度首先并最重要的是基于该人的政治倾向和他所居住的领土,而不是看他的族群—民族身份;领土的完整性而不是民族的纯粹性决定着亚述人对被征服人口的

^{*} vale of tears, 又称 trail of tears, 即“眼泪小道”, 皆指切罗基族印第安人被驱往保留地的悲惨旅程。

态度。

与声名刚好相反,甚或是最军事化的古代帝国也不推行种族清洗(贝金,1992:61—93;弗雷姆,1992;加拉格尔,1999;格雷森,1982;亚马达,2000)。

我已论证,大族性和族群清洗在古代是罕见的。较多社会是通过被阶级约束的单面的贵族同化来进行统治的。被征服的精英遭同化,获得新统治者的文化身份,这样大族性身份特性就受到了阶级的限制。曾有大规模暴力发生,但几乎从未走向对整个民族的清洗。

救世宗教:灵魂的民族(而不是身体的民族)

这种情形随着救世宗教——保证给予所有阶级和地区在同样的宗教团体中的成员地位——的出现而开始改变。一神教加快了这一步伐:每个人都必须要通过相同的仪式崇拜同样的神。国家成为“信仰的捍卫者”,“最大的天主教权威”,等等。基督向世人宣讲所有人皆可获救的教义,并被认为站在穷人和被压迫者一边反对富人和统治阶级。当然,教会和国家颠覆了这一哪怕是关于灵魂方面的声音;而在世俗领域则不存在平等。国家不属于人民,而属于王公贵族。民主化教育的施与对象是灵魂而不是身体,因而能够向族群化方向演进的也是灵魂。伊斯兰教内部差异更大也更为宽容。在印度教中,阶级、地位和族群成为亚种姓,因为该宗教是属于调和性质的,地方神灵被允许进入众神殿堂。像佛教一样,它保留了神圣和世俗之间,宗教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救世宗教中宽容最少的宗教(莫尔,2000)。它施行了更多的宗教清洗,其杀人是为了他们是谁而不是他们来自哪里(史密斯,1997:233)。

42

不过,主要被当作清洗目标的少数人群不是族群,而是基督教异端、穆斯林、麻风病人和犹太人。这些人有时因为被认为给国体带来不洁而受到谴责。绝大多数异端都有某一个地区作为据点,而随着这一概念的衍变发展,它或许会被认为是属于族群的。不过,一切目

标都可能会发生改宗现象。

法国南部的阿尔比人在 12 世纪末和 13 世纪初吸收了卡特里派或清洁派 (Cathar) 异端。地区性和城市的怨恨情绪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人们被从责任的道德宇宙中驱逐、剔除,然后遭到了镇压。当他们的贝济耶据点被攻下的时候,编年史家说其 8000 个居民中的大多数遭到了屠杀——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另一个据点被攻占之后,编年史家说庄园主和 400 名骑士被屠杀了。在第三例这样的事件中,城堡的女主人遭剥皮、羞辱,被扔进洞中,然后被活埋。大多数学者认为编年史家夸大了史实,然而暴行还是特别让他们震惊,因为其违反了中世纪战争中的阶级意识规则。庄园主、骑士和一位有地位的女士被杀害。“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某人说。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卡特里派宗教精英、纯洁派或波梵缔 (perfecti), 都被给予了一种选择:认罪或死亡。如果他们真的承认他们的异端之罪,他们将被宽恕;如果不,他们就被绑在柱子上烧死(巴伯,2000;奥谢,2001)。这对他们是坏消息,但它不是种族灭绝[正如史密斯(1997:231)及乔纳松(1998:51)所表明的]。它是冷酷无情的战争和强迫改宗。宗教被视为信仰。改变信仰你就获救了。

43

虽然犹太人遭集体杀害,然而有比它多得多的人被强迫改宗,还有比它多得多的人是出于恐惧而“自愿”改宗。有些国家,通常是在群众或教会的领导下,在中世纪末期驱逐犹太人;这后来发展到通过强迫驱逐出境进行宗教清洗。这或许表示了一种信念,即犹太人不能被改造,他们的身份特性超出了单单的信仰因素——尽管同样他们也不该被杀害。但虽然宗教是主要动机,犹太人却还因据称的经济榨取而受到攻击。由于被禁止拥有土地,大多数成功的犹太人是商人、企业家和受到大多数社会阶级诟病的银行家。但是主要的迫害发生在犹太人在广泛的政治斗争中陷入进退两难的时候(就像发生在 20 世纪的那样),如十字军反对异端和穆斯林时,以及抵制征税者和债权人阶段。两种联系都只有最小程度的可信性。犹太人曾从穆斯林帝国迁出,与伊斯兰教有不错的关系。犹太金融家曾被国家用来作为贷款和榨取税收的工具(尼伦伯格,1996;罗思,1995:第 2

章和第3章)。

这发展到一种“灵魂的民主化过程”并明显地影响到了大族性的身份特性。救世宗教是写在书上的宗教,鼓励了群众对本土语言识字率的提高,这又促进了文化在欧洲各国家的所有阶级和地区当中的共享程度。这与伊斯兰教不同,因为伊斯兰教所使用的阿拉伯语和突厥语言都不局限在(这些)国家之内。黑斯廷斯(1997)认为这带来了14世纪末期的一种英语民族身份意识。他强调指出,到那时为止一个单一的本土的日常语言已成为除了外围区域之外的所有国家和地方的主要语种;已有足够多的圣经印册是用英语译文出版,这确保了天主教宗教能有效地被盎格鲁化。这一英国特色的宗教核心又被普通习惯法、一套统一的郡县行政管理制度、王室对天主教教会的控制以及新兴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登台(像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当中的圣徒)而强化了。(此时)甚至还出现了否定外国人的看法。黑斯廷斯说英国特色在16世纪已被充分制度化,此时亨利八世取得国家宗教独立地位,民族主义已被充分表现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黑斯廷斯认为英格兰是欧洲的第一个民族国家(nation),其后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荷兰和18世纪末的法国(参见格林菲尔德1992年对英国民族主义的早期诞生的不同看法)。

但这种看法忽视了阶级差异。只有30%—40%的人口是受过教育的。事实上,彼得·伯克认为提高识字率拉大了文化差距。中世纪的阶级,他说,共同参与形成了一种由节日、狂欢节、街头戏院、逗熊(bear baiting)、焚烧巫婆、吟游诗、饮酒歌等组成的文化。精英们也参与了,但同时又还保留了专属于他们自己而不让群众分享的文化,他们轻蔑地称后者为“多头怪兽”和“反复多变的群氓”。圭恰迪尼(Guicciardini)在其《侍臣论》中写道:“谈论人民实际上是在谈论一头疯狂的野兽。”(伯克,1978:27)然而伯克说书面宗教拉大了阶级之间的文化距离。宗教变得更加带有教条色彩,更加晦涩难解,更加脱离一般通行的仪式。他说,这逐渐导致了精英从他们早期参与过的大众文化中退出。因此,英语族群是否超越了阶级是有

疑问的。

戈爾斯基(2000)舉了一個更有力的 16 世紀到 17 世紀的荷蘭的例子,認為所有後法國革命時期的民族主義因素都已在當時出現。他找到了兩個民族主義神話。一個將荷蘭人看成是聖經中的選民,一個新的以色列,被上帝選定承擔捍衛真實信仰的責任;另一個神話把荷蘭視為古代抗拒帝國暴政的巴達維民族的後裔。這樣人民、民族、主權和國家就融合在一起了。戈爾斯基認為民族主義小冊子在當時的發行勢頭是如此之猛(在一個有 80% 識字率的人民中),以至於幾乎所有的荷蘭人都讀到了這類神話。因地區性地緣政治的緣故,他的描述似乎是可信的。荷蘭人接受路德教義,尤其支持加爾文教,後者具有一視同仁的平等獲救觀,認為重要的是多讀聖經。但這使得荷蘭人受到來自強大的天主教西班牙和奧地利統治者的攻擊。荷蘭統治階層若想要有任何勝利的希望的話,就需要動員人民,而人民需要統治階層的軍事和政治組織。靈魂的平等鞏固了一種跨階級的民族解放鬥爭,它也許是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正如戈爾斯基指出的,英國朝着同樣方向的運動因宗教內戰的爆發而流產。英國人抗擊的不是外國人的侵犯,而是自己的同胞。因此,在 18 世紀之前宗教削弱了他們共同的民族身份意識。只有當新教被牢固確立為一個占支配地位的正統觀念或信仰時,它才能够孕育出英國的民族主義(科利,1992)。

黑斯廷斯和戈爾斯基正確地強調了現代主義的民族理論都經歷過一種過於一致且過於晚近的走向民族主義的運動。政治連續性、地緣政治學以及社會和地理距離各自起了作用。英格蘭以及在較少程度上的蘇格蘭,曾作為在一連串平穩接續的國王統治下擁有基本相同邊界的王國而長期存在於世。兩個王國時斷時續地相互打仗,加強了它們擁有相互區分不同特性的意識。蘇格蘭的低地核心較小,英格蘭東南和中部的核心也不比前者大多少。荷蘭共和國同樣小。要讓它們的普通階層與地主、牧師階層,以及與處於受外部攻擊威脅時的土地有某種基本的認同,甚至讓這些人的結合被稱為一個主權的人民,在 16 世紀和 17 世紀期間,並非難以置信。然而政治拉

了后腿。王侯贵族拒绝这样的念头,即中产阶级能够积极参与政治世界活动了。经枢密院同意即可影响内阁决议的国王统治一切——有时有一个由贵族、绅士、高级牧师以及商人自由民组成的立法机构。这些是发生在处于地理核心的更小欧洲国家内部的单面贵族同化逐渐往下的延伸。到16世纪时,有些或可以被视为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使其地理及社会核心产生民族吸引力的国家。但它们不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更大的国家依然是通过征服或对具有另一种传统的领土的朝代继承而形成的集合体。法国人、奥地利人、西班牙人和俄国人面临两条路:进入朝代中心的王国或进入他们自己独特的有历史意义的土地。两种忠心都不是民族性的。

45

因此在经历了这样的几百年之后,种族清洗依然少见,不像宗教清洗。精英还在被同化,群众依然遭忽视——除了在其中任何一个偏离了宗教正统的时候。然而在宗教边疆区原民族特色出现得较早。阿姆斯特朗(1982:第2章)将伊斯兰教世界—基督教世界的边界看作是“民族先于民族主义存在”的主要地方。更浅的断层还位于西方与东方以及天主教与新教基督教会之间。在这里,清洗走得更远。它首先在西班牙出现——

宗教边疆清洗:西班牙、德国、爱尔兰

伊比利亚半岛在中世纪的西欧独一无二地属于多宗教地区。半岛除北面的一个小角外都曾在公元8世纪和9世纪被伊斯兰教征服,但是伊斯兰统治者宽容宗教少数派——条件是他们保持服从,同时鼓励犹太人移民进入。当时在西班牙的犹太人数量可能比在整个基督教欧洲其他地方的加起来还要多。之后基督教在半岛上的复地运动*又吸纳了穆斯林(摩尔人)和犹太人。在基督教王国巴伦西亚,摩尔人依然占绝大多数。这期间间歇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集体

* reconquista,指中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国家为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被侵占的土地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

杀害,而在对伊斯兰国家的战争的时候,摩尔人有时还因为被当作第五纵队分子而受到迫害。然而总体的模式是共处(*convivencia*,“住在一起”),它遭到了某些制度性强制的破坏,这些强制体现的是歧视,语言和文化上的压迫,以及改宗的间歇压力。即使是改宗者也保持着些许的独特性,他们获得了相当的财富与权力。仍有大量人依然保持穆斯林或犹太人身份,直接受君主保护,并由君主通过法律进行控制。作为回报,他们付给君主更高的税款。

在 15 世纪末西班牙走向统一。阿拉贡和卡斯蒂尔、费迪南德及伊莎贝拉的王室在 1479 年合并到了一起。但是他们的统治并不顺利。奥斯曼土耳其对地中海基督教国家的压力一天天增大,西班牙贵族抗拒君主统治,所有权力角色都在争取捞得新王国油水的机会。冲突的一条主线涉及对改宗者充满嫉妒的“旧基督徒”。罗思(1995)观察到,在旧基督徒贵族、低级别的骑士还有教士之间形成的共同反对改宗者联盟的力量日渐壮大。统一过程增加了西班牙教士的权力,降低了教皇的控制权。天主教既代表着西班牙的统一又表达了捍卫统一的手段。1481 年,阿拉贡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权力被延伸至整个王国以便提高教义的纯洁性。在以上的宗派主义背景下,君主统治集团发起了他们针对最后的摩尔人王国格拉纳达(*Granada*)的战争。谁料战争竟会持续那么长,耗费了那么大代价,并且那样激烈,完全出人意料,结果是,战争加剧了统治阶层内部的紧张,又加深了对摩尔人及其他少数群体的敌意。1487 年,当马拉加在经过一场惨烈的战斗被拿下后,当地摩尔人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残酷对待:杀戮加奴役。

同样在此阶段,宗教裁判所加大了力度。其 90% 以上的调查是欲在改宗者当中查出异端。1491 年,其程序公开化,示范审判成为教会与国家打击异端的宣传工具。尚不清楚的是,宗教法庭显示的不利于改宗者的证据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许多的判罪是因为改宗者秘密奉持犹太宗教仪式,因为犹太人与改宗者之间暗中串通,还有许多人相信犹太预言家预言的弥赛亚来了——而那是撒旦! 在 15 世纪 80 年代大约有 1000 名以上的改宗者被处死。因为战争成本所

46

困,国家还有一种经济动机——没收犯人的财产。已经死去的改宗者身后继续遭到审判,这样他们的财产就可以被夺占。裁判所还认为余下的犹太人社区构成了王国中的瑕污,毒害着改宗者,鼓励他们堕落。从1483年起,在赫雷斯、塞维利亚和萨拉戈萨的犹太社区被控犯有毒害邻里罪。这些犹太人被驱散到西班牙各地。在1490年和1491年,出现了由年轻人领导的对犹太人发动的零星攻击,这些人是从低级贵族,即西班牙绅士(caballeros),中选出的。

1492年1月,格拉纳达最终投降,西班牙完成统一,成为天主教国家。1492年3月31日,就在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之后,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颁布敕令,命所有犹太人在4个月时间之内离开西班牙。这与他们此前的大多数行为如此不符,所以人们一直很难对此进行解释。它与预谋没有太大关系。犹太人曾在书中叙述了天主教的一种关于完成复地运动的必胜信念。托尔克马达,裁判所的负责人,在宗教和军事阶层的帮助下,对君主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数百年来修道会总是走在反对伊斯兰斗争的前列,并在十字军暴行中有突出表现。宫廷中有些派别感到一个更加天主教化和更军事化的国家现在是有可能的。君主似乎一直在屈从于压力而不是在执行自己制定的政策。

敕令的目的不是把犹太人赶出去,而是逼着他们皈依。他们的预计是,大多数人都会皈依。如果他们留下来,他们可能还会被征以最高的税收。如果他们皈依,皈依者的同化将不会再被单独的犹太社区的存在所破坏。以敕令中的话说,犹太人将不再“唆使忠诚的基督徒离开神圣的天主教信仰”。君主们说,地方驱逐行动未能成功阻止“因参与前面提到的犹太人活动和与他们说话而造成的对基督徒的邪恶和伤害”。不存在任何来自群众的压力或者暴力:这是精英所为,与群众无关。甚至是在精英当中也存在很多的不同意见。极少有外迁移民失去他们的财产,因为他们能够将其卖掉,而传统的不许西班牙人将金银带出国门的禁令在现实中被忽视。在西班牙的全部8万犹太人口中大概最多有不超过约1万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离开西班牙。绝大多数人只是搬到了相邻的葡萄牙,从这里他们还能继续

47

掌控他们在那边的事务。当葡萄牙人 1497 年进行大规模犹太人皈依运动时,有一些西班牙犹太人又返回了西班牙,正式在此皈依(卡门,1993a:44;罗思,1995:285,303—307)。以上是通过制度性同化和治安性驱逐相混合的办法完成的严厉清洗。

然而一个被允许在全国范围内恣意横行的裁判所是不可能被轻易停下来的。升级虽无规则,却是累积性的。犹太人、皈依者以及摩尔人等,在 15 世纪 90 年代感到深处压力之下。有一些人采取了暴力抵抗,引来进一步报复。格拉纳达和巴伦西亚不成功的摩尔人反叛导致他们被强迫皈依或从西班牙驱逐出境。西班牙的政策传到其他地中海国家,增加了整个地区的紧张态势。西地中海构成了威胁基督教世界的边界。来自边界之外的伊斯兰压力对里面的所有非基督徒形成压力。在接下来的两个 10 年里,西班牙犹太人的向外移居数增加,最后总数大约在 4 万到 10 万名之间(对犹太人口数量和离开的数量,学者意见都不一致)。葡萄牙、普罗旺斯及几个意大利州也出现了向外迁移。大多数是向东进入了更加宽容的奥斯曼帝国。许多皈依者也在外移,重新定居在基督教世界的正对面,在此他们可以更好地隐匿自己的身份。1502 年的整个政策也被用于还在西班牙的摩尔人:离开或皈依。

还出现了新的种族论调。甚至在 1492 年之前,天主教极端分子就一直在通过提出更简单的证据,即血液——“血液清洗”(limpieza de sangre)来回应证明异端的困难。既然污秽的“闪米特人”血液有可能会传染品行端正的基督徒,那么所有的犹太人都应当被赶走。这是真正的近代反犹主义,将宗教等同于种族,这在以前的欧洲历史中极少有过表达。任何祖先是犹太人或摩尔人的后人都应被赶出西班牙。虽然这种论调招致大量反对并从未成为王室政策,但秘密团体的确阻止了那些有不纯血统的人进入军界或宗教教派,以及一些教堂、大学和行业协会。与此同时发生了另一件事。1576 年,裁判所获得了一直期望的管理改宗的摩尔人,即摩里斯科人(Moriscos)的权力,扩大了活动范围。按 1609—1610 年的王室敕令,所有剩下的摩里斯科人都被驱逐。大概约有 30 万人遭遇了强迫驱逐出境。在巴

伦西亚出现了有武装但未起作用的抵抗,其间估计有1万摩里斯科人死亡。西班牙被清洗了一遍(本部分资料来自多明格斯·奥尔蒂斯与文森特,1994;爱德华,1999;弗里德曼,1994;卡门,1993a, 1993b;克里格尔,1994;蒙特,1994;罗思,1995)。

费迪南德、伊莎贝拉和他们的继任者绝不是疯子。不管他们扮演信仰的捍卫者是出于何种欲望,他们总是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其主要目标不是他们的犹太人或摩尔人臣民。他们屈服于来自要求进行宗教清洗的重要人物的压力,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第五纵队的论点似乎很有道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执行命令为好,所以就结束了西班牙数百年来并非完美的宗教宽容。与此同时,宗教清洗获得了国家甚至某些种族主义的色彩。虽然许多西班牙人是混血(费迪南德自己家庭两边都有犹太血统),但王室中有一小撮人成功地论证了新犹太人和摩尔人不能被信任。这不是大屠杀,因为死亡仅产生在严厉的(但常令人怀疑)审判之后或武装抵抗期间。但它是全然的宗教清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有族群性质。在欧洲境内这非同寻常。它没有反映民主的阴暗面,我会证明较晚的清洗也不是。西班牙实际上是在沿着反方向走,目标是绝对君主制度,尽管主要的清洗者并不是君主。然而国家与人民应当统一在一个单独的国家信条上的理念却是新的,这预示了一个世纪之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诞生。在族群和国家这两种意义上,驱逐犹太人与摩尔人都是通向现代性的一个独特的桥梁。

但是到了16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了。在法国、德国和爱尔兰出现了宗教内战。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让德国与波西米亚受到严重破坏。神圣罗马帝国的人口减少了300万到400万,即15%—20%(帕克,1984;拉布,1964)。比士兵多出很多的平民死亡,大多数是因为营养不良以及由残酷的战争引起的疾病。军事上出现了对暴行的战术诱导。既然国家不能够从经济上维持战争所需要的规模,军队就在“以战养战”的原则下依靠乡村提供给养。

* 原文有误,此处应为17世纪。

士兵们毁坏庄稼、家庭、村庄和小镇。他们杀掉平民中的男人，强奸妇女。他们的惨无人道还受到了宗教调和派的帮助。新教徒谴责天主教徒是偶像膜拜式的、“倒退性的”，是“迷信”、“魔鬼的教义”；天主教把新教徒视为被异端“施了邪魔”，说他们推行杀婴、食人和滥交（伯克，1978：168—169）。很多强迫改宗现象出现。当新教波西米亚被天主教势力重新夺回，该地区被强行实施重新天主教化，有15万新教徒逃往其他地方。很多的男性难民深陷穷困与痛苦，迫于无奈而当兵。阶级差异不见了：各阶层的人都可能被杀害！

49 最坏的暴行出现在马格德堡，一个新教徒集中的城市。当其于1631年被天主教军队攻占时，估计约有3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死或葬身由天主教军队点燃的大火之中。该市在数年之内都处在人口稀少状态。这不能全然归因于宗教狂热主义。对一个拒绝投降的城镇进行洗劫本在常规的战争规则之内——在这样一个受阶级限制的时期，它的制订完全没有对中下层人民生命的半点顾及。它是正常的反击，抢劫是犒劳士兵的正常方式。在长期围攻战中，如在马格德堡发生的那样攻城者在战壕中遭受的生活匮乏通常要比城中的守城者遭受的更多。他们需要复仇和劫掠。然而马格德堡还是震惊了欧洲；在小册子和布道中，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的，它被公开谴责为野蛮和非基督方式。这样的暴行极少是有预谋的。强迫改宗或驱逐出境是宗教战争中最坏的有预谋的政策，尽管战术诱导产生了更糟的结果。这不是族群的而是宗教的清洗，而且因为改宗被认为是上策，所以它不会是有预谋的。

“三十年战争”是在含多种族军队的多国联盟部队之间进行的。但它却以国家性解决而告终。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君主的宗教就是他王国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而君主能够将其付诸实行。任何外来国家都不应该来帮助少数派。但是随着此时国家权力凌驾于宗教之上的制度化，清洗将主要通过制度，而不是武器。几个志士被焚，几家宗派组织被遣散，然而大多数人选择了皈依或发誓忠心，接受制度化的二等公民强制待遇。大多数新教教会现在是作为原民族教会由国家掌管。虽然天主教仍然是一个跨越国

界的信仰,但它的国家现在正在将当地教会改造成合乎它们自己目的的机构。清洗正在从某种宗教基础向国家基础转变,原因是灵魂正在部分地被国家化。西班牙已是第一个,不过西欧已经跟上,而东欧东正教会的全国各分支机构之间存在分歧。

但是,宗教清洗可能会与族群及全国在欧洲文明边界上的情感缠绕在一起,这里(欧洲文明中)已发现了更多的原始民族。立陶宛的东部和爱尔兰的西部边疆就是这种情况。我着重讲爱尔兰。英语国家企图让一个它认为是落后与未开化的国家归顺服从,宗教在此加强了这种企图。讲盖尔语的爱尔兰人,特别是住在西部、生活条件更为贫困的爱尔兰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他们运用更加简单(更为野蛮)的战争手段。英国人完全可能会把爱尔兰人当作是文明程度较差的人,就像他们当时对苏格兰高地人的看法一样。

自1250年以来,爱尔兰的大部分地方曾被盎格鲁-诺曼/英国封建主统治。但移民(定居者)寥寥,封建主向英国王室要求自由。许多人变成本地人,爱尔兰语复兴。王室以强制同化回应。《基尔肯尼法案》(1366)取缔了爱尔兰语言、爱尔兰姓氏和爱尔兰体育。更多的移民引起了针对土地的直接冲突(见第4章讨论的殖民地中发生的事情),有些爱尔兰人被驱逐到岛的西部。然而英国的移民依然极少,而许多人被同化,讲起了盖尔语,成了所谓的老英国人,即以前的英国人。在16世纪,英格兰与苏格兰变成新教国家,但讲盖尔语的爱尔兰人与大多数的老英国人定居者仍信天主教。诗人埃德蒙·斯宾塞,一位驻在爱尔兰的王室官员,认为解决方法是谋杀性清洗:“大的行动肯定要作为手段,但饥荒必须也是途径,因为除非爱尔兰遭遇饥荒,否则它是不可能屈服的……一个统一的政府不能没有统一的宗教……两个对等的对立者之间——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不可能达成什么适当的协议。”(黑斯廷斯,1997:82—84)残酷战争开始了,最后英国人在1607年赢得了战争。盖尔人此时开始被赶出大部分公共王国领土。更多的英国和苏格兰新教徒移民来到这里,而更多的本土爱尔兰人被强制驱逐向西。

内战重启了冲突,使之更少族群性而更具宗教性,并多少带有点

原始民族的味道。既然它也最终使得苏格兰王国和爱尔兰王国纳入英国统治下,那么它同样是一场帝国战争。宗教纷争使得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上层阶级的原民族怨恨更加普遍。大部分爱尔兰的新教徒是比较虔诚的高教会派*,因而支持国王,像爱尔兰天主教会一样(讲盖尔语的爱尔兰人和老英国人都属于它)。这一联盟让国王一党在爱尔兰占了上风。战争以盖尔人起义开始,其间有4000名阿尔斯特**新教徒被屠杀,另有大约8000人死于饥饿、寒热或被遗弃户外——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克利夫顿(1999:109)将此称为“操作错误导致的大屠杀”,而非有预谋的行为,然而暴行对以后的事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因为新教宣传者让英国人相信有成千上万的新教徒死去了(康诺利,1992:16;惠勒,1999:8—12)。

内战在爱尔兰延续了更长时间。但在1649年,克伦威尔率领他令人生畏的清教徒新模范军侵入了爱尔兰。他由于对1641年大屠杀***的复仇情绪以及对一个充满“教皇和野蛮迷信”的“未开化”民族的轻蔑而变得更残忍,凭借儆戒性镇压手段,实现了对爱尔兰的最终征服。他宣布

他将为了弘扬基督教义、建立真理与和平而领导一份伟大事业,去反对未开化和嗜血的爱尔兰人以及所有他们的支持者与同谋。

他传令让德罗赫达城(Drogheda)的守兵投降。驻防指挥对此做了拖延,于是克伦威尔命令他的炮兵炸开城墙,亲自率领进攻。洗劫城市乃当时战争之常规。克伦威尔向议会报告事情经过:

* High Church, 基督教圣公会中的一派,与低教会派相对,强调保持天主教传统和教会的权威地位。

** Ulster, 这里指爱尔兰讲盖尔语的凯尔特人古王国。

*** 即以上阿尔斯特大屠杀。

我命令他们不浪费城中任何可作武器之物,我想,那天晚上他们杀死了2000人……我相信这是上帝对这些未开化的有罪之人的正义审判,他们的手上沾满了大量无辜的鲜血;它将有利于阻止未来的鲜血四溅……现在请允许我讲讲这件令人激动的事是如何完成的。它就在我们心中的某些地方;一项伟业之完成,不是依靠权力或武力,而是靠上帝之灵。这不是很清楚吗?能让你的手下如此英勇地进攻的,正是上帝之灵,是上帝给你的人以勇气……故而才有了这次愉快的成功。因此永远都是:唯上帝配享所有的荣耀。

不久之后又有数百名投降者被杀害。克伦威尔评述道:

我相信我们杀死了全部的守卫,我不认为当中有30个人死里逃生。逃脱的人在去巴巴多斯的路上被安全地看管着。

当韦克斯福德驻防指挥也拖延了投降时,克伦威尔重复前举。城市被炸了个遍,一些逃跑的平民也被似乎已失控的士兵杀死。克伦威尔几乎没阻止他们。克伦威尔再一次将责任归于上帝:

以他正直的正义,上帝给了他们一次公正的审判,让他们成为士兵的猎物,他们在他们的劫掠生涯中已让太多家庭成为猎物,于是只好用血来偿还他们施加于各种不同的贫困清教徒生命之上的残暴行为。

在这两个城市中有约4500人被杀死,包括四分之三的守卫和约两三百位平民。韦克斯福德守卫是爱尔兰人,但德罗赫达一半的士兵是英国新教保皇党人。这就比单单的宗教与族群清洗的结合包含了更多内容。但当罗斯的驻防指挥提出以信仰自由作为投降条件时,克伦威尔回答得很干脆:

如果你说的信仰自由意味着动员群众的自由,我看最好还是让你明明白白地知道,但凡是在英格兰议会拥有权力的地方,那都不会得到允许。

在芒斯特,克伦威尔寄出了一份表述混乱且十分恶毒的反天主教宣言。他说他无意要“彻底根除天主教宗教”,但仅仅是因为“根除这个词预先假定了某样东西已经生根成形了”。整个文件的基调表明他已决心采取所有必要手段清除爱尔兰的天主教势力(对克伦威尔的引言取自阿博特,1939: II, 107, 126—127, 142, 201)。

以上是克伦威尔在爱尔兰最开始的几场战役。他在发出信号:投降或死亡——亚述人风格的儆戒性镇压。它起到了作用,爱尔兰人最后投降了。但这也算是极其残酷的战争,因约有 15% 的爱尔兰人口,即 30 万人以上,死于这 20 年的战争之中,大多是因为营养不良和各种疾病。

52

英格兰内战的进行更具绅士风格。出现了几次对拒绝投降的守卫军队的大屠杀,但除了被困于受抢劫的沦陷城镇,大多数平民逃过了直接伤害。科斯特(1999)说,屠杀在抵抗最烈的地方最惨,天主教和爱尔兰士兵意志最坚,所以危险也最大。人们普遍认为最残忍的将军是最有经验的保皇党人鲁珀特王子。总死亡人数约为 18 万,占英国人口的 4%—5%。即便在苏格兰战役中,克伦威尔也礼待了对手,他对战败者从宽处理,对伤者给予了安抚。即使在苏格兰军队入侵英格兰、渗透远达伍斯特时,其最后的战败也没有带来野蛮的报复行动。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导人被处死,数百名士兵被运往新大陆。然而在爱尔兰,宗教狂热、种族蔑视以及对 1641 年的报复心已经让鲁珀特强烈想赢的心理走向极端。天主教徒伴随针对阿尔斯特游击队的焦土战役而被杀。当地人被勒令滚出整个地区,不然就会被击毙。一些官员比其他官员尤为凶残。查尔斯·库特爵士被他的天主教敌人描绘为“三倍残酷的屠夫和喝人血的变态恶魔”,上校托西尔命令手下屠杀所有被俘的爱尔兰人。但是保守主义者艾尔顿(在克伦威尔离开爱尔兰后任总指挥)把托西尔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免除

了他的职务。艾尔顿为他的士兵与当地天主教妇女通婚感到吃惊——当时,阿尔斯特天主教男性短缺。因此,他下令,所有并非发自内心地皈依新教的妇女都要被驱逐,而她们的丈夫都要被降级(惠勒,1999)。在此,我们看到新教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差异。

克伦威尔的宗教清洗还受到了以保卫文明、反对野蛮的名义进行的清洗的推动。但德罗赫达不像马格德堡。克伦威尔处死了延误投降时间的守卫,但他没有杀死平民。这完全在当代常规战争规则之内(克利夫顿,1999:119)。每个城市都被“正确地”预先传令投降,而且克伦威尔也没有选择妇女或儿童为目标。所以这不是把一个整个族群作为目标的谋杀性清洗。毋宁说,它是一种消灭武装抵抗的尝试,为的是使宗教清洗能够通过更温和的制度途径来进行。

它做到了。爱尔兰三分之二的土地上的地主被1652年的《殖民法》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其土地被认为是参与1641年的大屠杀得来的。他们的土地被分给了伦敦商人、克伦威尔的士兵和苏格兰殖民者——都是新教徒。1600年,90%的爱尔兰土地是天主教徒所有;1685年,这一数字降到22%;而到1800年只有5%了。一直到18世纪70年代以前,反天主教刑法还包含着大量的歧视内容,逼迫着天主教继承人和未来专业人士正式改宗(康诺利,1992:145—147)。但几乎所有受剥夺的爱尔兰人都保持了无财产的劳动者身份。有几个天主教财产所有者被驱逐至西海岸,在这里他们得到了小块的土地(克利夫顿,199:123)。爱尔兰语言在公共领域趋于衰落,然而在下层阶级中地位仍然稳固。到19世纪中叶,爱尔兰各阶级的父母都急切想让孩子们学习属于现代和世俗成功的语言——英语。虽然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英国或苏格兰移民后裔,但爱尔兰并不算一个标准的殖民地。正如康诺利(1992:111—122,294—313)指出的,爱尔兰就在英格兰与苏格兰的隔壁,其居民在容貌、宗教和文化上属于欧洲。狭窄的海域两岸存在着大量的双向移动,有很多的同化现象发生。盖尔人游牧作业被英国的土地保有办法(tenurial practice)所代替。集体改宗的尝试并不积极。精英阶层当中曾发生强制同化,同时群众当中却存在着严重的歧视现象。但是英国人没有施行

集体清洗。爱尔兰继续包含两个宗教群体——正如我们在今日之冲突中所看到的。在1969年至2000年间约有3300人被杀害,尽管双方实际上都无意消灭对方。

欧洲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这段时间经历了更为严厉的、与宗教边疆区族群因素缠绕在一起的宗教清洗。在西班牙,种族反感与清洗增加了;在爱尔兰,它们减少了。这很可能主要是由于边疆威胁的严重性的差异:伊斯兰教对基督教地中海国家的威胁在主要清洗阶段依然很强大(它只在1572年勒班多战役之后才开始缓和),而西面的天主教爱尔兰人的威胁在逐渐减小。再往东,穿过战争状态的俄国、奥斯曼和波斯帝国的边疆,谋杀性清洗也在基督教、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群体之间展开(利文,2000:149)。族群—宗教清洗只在政治与宗教威胁相互加强的地方蠢蠢欲动。即便这样,大多数杀戮也不是有预谋的。它发生在事件越出了控制能力的地方。清洗是系统性的(特别是在西班牙),但谋杀性清洗不是。马格德堡和德罗赫达与早期历史中数不清的其他攻城事件的相似程度,超过了与我后面几章所述事件的相似程度。

宗教清洗与政权形式之间没有关系。在西班牙,对犹太人和摩尔人的清洗是受到了世俗和宗教界精英的推动,而君主们本身并没有去推动它。在宗教战争期间,新教徒一般竭力追求有限代议制政府,而天主教徒支持更大的君主权力,两边同样都留下了暴行。在英格兰,清教徒支持最大代议制政府,最少财产特许权,他们也是痛恨教皇的队列中最为狂热的,具有最强烈的将其从土地上清除掉的愿望。由于在军队中占比高,他们也拥有实现目的的军事权力。但总体上说,这不是一个可归因于民主化的清洗阶段——除了在灵魂上。它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变成约80%的一神教之时就结束了。

54

本章纵穿一片宽阔的历史领域,其间我指明了,种族清洗很少见到,因为大族性也很少见到。族性极少战胜距离或阶级。然而随着救世宗教的传播普及,宗教开始穿越阶级和其他边界,引出原民族的民主过程和灵魂的清洗。但世俗问题依然为阶级和其他分层坐标所控制。随着宗教清洗目的的逐步实现,欧洲的情况似乎正在好转。

第3章

“我们，人民”的两种诠释

自由主义的诠释

对人民应当统治的理念最著名的表述如下：

55

我们，美国人民，为了缔结一个更加完善的联邦，建立正义，保证国内安定，提供国防安全，促进普遍福利，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后代能享有自由的恩福，谨颁布和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美国宪法的序言中描述的“人民”现在让几乎所有近代国家合法化，它被毫无保留地视为一种好的道德集体。事实上，它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已设计出的统治形式当中最好的。但是如果“人民”的两种含义，普通人（demos）和种族集团（ethnos）相融时，问题就产生了——对居住在同样领土上的其他族群来说。公民的特权可能会包括对其他族群的歧视。发展到极端，非己团体可能会被人从这人民的土地上排除和清洗出去。

然而可以区分两种不甚相同的人民：分层的人民和有机的人民。如果心中所指的人民是多种多样的和分层的，那么国家的主要角色就是在相互竞争的利益团体之间进行调停劝解。这将会趋向于通过相互让步解决分歧，而不是去对他们实行清除和清洗。分层的人民

现已是西北欧的主体。然而若人民是有机的、单一而不可分的、是属于种族的,那么它的纯洁性就可能会通过对偏离常道的少数派的镇压而得到维持,这可能导致清洗。在欧洲,这一危险在中东部地区开始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

绝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观念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据说因为它们的宪法把保护个人人权作为放在其他一切之上和最重要的位置,从而是有益的。但这实际上不是自由民主建立的根据,因为团体的权利和规约才真正是对自由民主更加关键的东西。利益团体斗争的制度化,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制度化,通过产生一个分层的,而不是有机的人民,确保了宽容和抑制清洗因素的存在。尽管如此,自由民主国家现在已经施行了大规模清洗,有时还上升到种族灭绝——大社会群体被认定是处在分层的人民之外的殖民主义环境背景除外。

66

当然,人民并没有真的“颁布和制定”美国宪法。这是由 55 名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多财产的中年白人绅士,一起在费城某地关门研究两个星期之后完成的。他们声称代表了 13 个殖民地的人民。但谁是这人民? 国父们没有把妇女、奴隶和本土美国人的意思包括进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想把缺乏财产的白人包括进来,尽管他们被身边汹涌激荡的革命过程不断推向这一目标。英国当时的政治家通过将人民与下面的普通大众分开,来界定人民。普通大众包括底层阶级、一群人、群氓——肯定不属于人民的那部分。“我们,人民”由有财产人士的群体、当时被称为利益集团的人组成(绅士、商人、制造业主、手工艺者等)。这些利益集团被承认存在利益分歧,所以协调他们的利益以使他们所有人与这个国家都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就很重要。他们意识到公民内部有分层现象。事实上,公民的权利在当时也是分层的,因为人民有资格享受“主动”的公民权,而普通大众只能拥有“被动的”公民权。普通大众确实拥有法律权利和民权,但不享有政治权利。

接下来让所有人获得全部权利的运动也受到阶级的支配。这里是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进入了工业化。对扩大选举权资格范围的争端以这样一些问题为主:财产线从哪里划分? 雇员或仆佣(他们被许

多人认为不具备形成独立判断的能力)应该拥有选票、担任法官或者公职吗?某些阶级能比其他阶级有更多选票吗?一个阶级中的一些担负着更大责任的人能够先获得资格,以便与其阶级中的其余人分开吗?人们承认这些多元的阶级和层次的利益有可能达成妥协,但他们不能得到消除。人民不是单一和不可分的,而是多元和分层的。实际上,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已经在政党中被制度化了。派别化利益集团——内团体和外团体,辉格党与托利党——已经存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阶级冲突把他们变成了近代的以“左与右”和“宗教与世俗”形式对立的党。所有人都同意他们的冲突不可能被废除或者超越,而只能被妥协。而既然自由国家是利益之间的主要调停者,那它就是一个有限的国家,几乎不能拥有其自身的权力。因此,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都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抑制,阶级与民族的发展紧紧缠绕在一起。

阶级之后不久又增加了年龄与性别因素。只有户主应享有完全权利吗,以及,在什么样的年龄其他人可以被认为已拥有了独立判断能力呢?然后是某种年龄或阶级的妇女可被认为比其他妇女更具政治责任心的问题。这里提出了第二个抑制条件。阶级、年龄和性别都是分层的,但它们通常都不将人民分隔成几个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一定会相互生活和工作(以及爱与恨)在一起。甚至是在严重的阶级冲突期间,工人与雇主也花费他们大量的非睡眠时间来相互合作。不同年龄的人民,男人和女人,一起生活,共同构成家庭。尽管在不同阶级之间会发生住宅区隔离,但它们同时又有相互依赖的习惯。这种相互依赖抑制了绝大多数的在我们一人民与由阶级、年龄或性别认定的非己团体之间潜在的厌恶情绪。

阶级冲突的制度化是近代西方的主要政治成就,它产生了自由主义,继而是社会民主国家。阶级、年龄和性别依然是相互抗争的利益团体,人们承认它们之间的冲突的合法性,这类冲突在多党制下已被制度化了。因为这种政体形式并未想要消除剥削,新的被剥削群体每年都会站出来提出新的要求。但是自由主义体制中的阶级冲突不是通过将自己在本地的对手清洗出去解决的,更不是通过大规模

屠杀。不过,如果阶级没有通过互相让步解决争端而是采取压制,则会出现一种不同的结果。一种向下方向的阶级冲突的螺旋式发展可能会导致革命,就像在中欧和东欧一些地方发生的那样(曼,1993:第16—18章)。成功的革命者随即有了自己独特的专利:有机的“作为无产阶级的人民”,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

但是在西北欧到18世纪末有两样事情正欲完成:宗教冲突下降(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自由主义的阶级制度正在超越种族团结。随着每个国家中宗教同质性的实现,族群冲突得到了缓解并集中到更为世俗的语言问题上。这使得它更少带有谋杀性质。虽然我们不能信奉一种以上的救世宗教,但我们可以说一种以上的语言,特别是在它没有神圣地位的地方。我能够学习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官方语言,以便在公共领域取得物质上的成功,同时在私人 and 感情领域保留我的母语。通过这一途径我可以获得一种以上的族群身份。但是在公共领域的500年时间,大多数欧洲国家寻求单一语言文化,而这确实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衰颓。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欧洲已被清洗,地方及地区性语言和文化已经消失了。不过所使用的主要手段一直不是很暴力,其最高程度也是制度性强制。

它们也没有超越阶级。如在前历史中一样,同化是单边进行的,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地从贵族依次往下。沿海的威尔士人在12世纪和13世纪曾被盎格鲁—诺曼封建主征服。英国移民镇的种植园随后。统治者周期性地取缔威尔士语言,限制相互通婚以及不让威尔士人担任公职,但这些行为不如在爱尔兰那样持久,也更少被执行。58 国王们很高兴地用威尔士弓箭手作为对付在克雷西和阿让库尔的法国国王的决定性武器。1400年以后,威尔士不被认为是个边疆社会(不像爱尔兰);1500年之后,它被看作是一个忠心的,甚至是保守的王国的一部分。1509年英国康维——有英国殖民主义者居住着的种植园镇之一——的资产阶级,请求对威尔士人实行更多的差别性待遇。他们埋怨说:“让一个威尔士人在威尔士担任任何公职并不比让一个‘法国人’(frinchman)在卡利斯(旧称加来),或‘苏格兰人’

(skotte)在巴威克(旧称贝里克)担任官职更为合适。”* 不幸的是,请愿被送到了盎格鲁—威尔士国王亨利七世手中,后者即位后的鼎盛时期曾带来英国人与威尔士封建主之间长期的贵族单边同化。然后,他的儿子亨利八世,通过他在1536年颁布的《联合条约》(Act of Union)将威尔士并入英格兰,强制推行一种管辖,一种法律,一种语言。条约中说任何只能驾驭“威尔士语的人不可以在他的王国之内拥有或享受任一形式官职或费用”。可是法案并未在威尔士人当中激起有组织的反对,因为绅士阶层乐意于被给予与英国人同样的制度待遇(詹金斯等,1997;罗伯茨,1997;史密斯,1997)。

也许有90%的人口只讲威尔士语言(1800年还有将近70%)。他们现在被官方排除了担任公职的资格,然而他们从来就没有担任过公职。如在英格兰一样,90%的人口不被包括在政治中。有作用的是那余下的10%:贵族、绅士、商人和行会里的人。英语已被广泛作为官方文件语言,而这10%当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学了英语。他们承认英语是一种高级语言、统治语言、职业与商业语言。绝大多数人积极参与到这个世界当中,因而终于获得了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技能——像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做的一样。公开场合讲威尔士语现象减少,尽管私人场合还未见下降。

将英语语言强加给威尔士人的制度性强制,部分地是因为英国人的国家性剥夺,部分是因为威尔士精英阶层的阶级背叛。伯克(1978:270—272)观察到从16世纪一直到18世纪发生的“上层阶级退出”的大众文化现象。波西米亚人贵族从捷克语退回到德语,受过教育的挪威人退回到丹麦语,芬兰人退回到瑞典语,等等。但是说威尔士语的贵族绅士还在一个使用双语是显然的个人晋升策略——同时也是为他们的保留者和依附者提供保护的途径——的世界舞台上行动自如,从容不迫。1563年,圣公会承认要让威尔士人改宗并使其变为新教信奉者需要一本威尔士语言的圣经——群众唯一能

* 作者故意用两个形声相似的错误称呼表示其非本地人,未必适应到本地工作,威尔士可想而知。加来、贝里克分别在法国和英国。

明白的语言。这个计划促进了威尔士人的文化水平。最终,随着跨人中间的和处于下层的人民被允许进入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国的公共领域,英语开始普及到下层阶级。在19世纪期间英语严重侵蚀了威尔士语言。在那以前,同化还是单边的和精英界的。与爱尔兰人不一样,威尔士人自愿被从顶层开始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地受到破坏。后者(威尔士)正在成为一个分(阶)层然而又是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

到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西北欧国家都受到了语言上的清洗,最后剩余部分自愿被同化。法国的少数群体已大多接受了雅各宾派观念,乐意看到他们的孩子学习法语这种现代语言。说布列塔尼语言(Breton-speaking)的父母将他们的语言与落后和缺乏机会联系在一起。在公开场合,威尔士人或布列塔尼语屈从于一种英语或法语语言和身份。语言清洗被完成,先是通过武力,然后是制度强制,最后是自愿被同化。事实上,尽管爱尔兰曾屈从于更加凶恶的清洗,但爱尔兰父母们在最后阶段还是与开头并无二样地屈从了。

只到临近最后,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和19世纪中期至末期的其他地方,国家性身份才完全出现在底层阶级身上。尤金·韦伯恰当取名《变为法国人的农民》(1976)的著作已成为当代经典。在其中,他描述了法国大多数的乡村居住者甚至到1870年都如何不把他们自己当作法语国家的成员。巴黎周围的地区,法国的县,确实构成部分例外,因为它们为首都服务。但是韦伯推论说,大多数法国男人与女人都有更远的地方视野。农民只在当国家基础结构实际上已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通过服兵役、国家教育以及铁路和动力交通,才成为法国人。我还要再加上国家性经济市场和生产系统;国家政治基本建设——成为制度的国家性政党、国家机构、国家服务;以及国家性宗教。但是1864年教育部长杜卢伊让他的教育督察员调查全国所讲的语言。教育部然后草拟了各省语言技术的国家性地图。在布列塔尼省,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及几乎整个南方,40%或以上的人口不讲法语,尽管他们报告说就在调查的那一刻,在7—13岁的学校学生当中该数字要降到这个水平的一半(两张地图在塞杜

等人那里重新制作)。一个访问南部洛泽尔农村地区的督察员问村庄学校的孩子：“洛泽尔位于哪个国家？”没有人能回答。到19世纪80年代，另一名学校督察员发现了更多的说法，报告说：“他们说他们在洛泽尔，而当他们翻过山时就到法国了。”（吉布森，1994：178）他们现在知道法国在哪了。但它原来是在其他的某个地方。

康纳（1994：221）提到在1880年到1910年间欧洲移民很有意思地回答美国移民局官员的话。当被问及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惊人一致地用“地方、地区、省以及诸如此类的词”指称自己，不用国家这个称谓。但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来自于一系列关于家庭生活的一整套行为做法的统计。苏珊·科特·沃特金（1991）比较了1870年和1960年在15个欧洲国家中不少于500个地区的数据。她收集了关于生育率、婚姻和非婚生子女的资料。人们多长时间结婚一次，他们有多少孩子，以及这些都合法吗？这些确实是个人隐私行为，产生于由妇女和男人在他们自己私下的关系往来中作出的千百万次的个人决定。但她发现了清晰存在的一般趋势。1870年，差异在国家之中要比在国家之间大得多。与其说存在一种法国或德国家庭模式，不如说存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模式，其中一些穿过了国界。但是到了1960年，家庭在所有这三个问题上都大幅度地国家化了。现在有了一个法国的、德国的和英国的关于一户有多少孩子，是否在孩子出生前结婚，以及结婚频率方面的家庭模式。这些在1870年前都不存在。民族（国家）诞生得太晚——无论合法或不合法！

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单一种族的，因为它们随着在核心地区的统治阶级把自己界定为属于一个单独的族性，把统治强加于其他地区和族群之上而形成的。经过若干世纪之后，它们通过部分强制部分自愿的方式实现了对外围族群的同化，先从贵族开始，然后顺着阶级构成往下。1688年之后，英国所有主流新教界财产所有者被确认为政治公民——不管他们是说英语、威尔士语还是苏格兰特色的盖尔语。对爱尔兰盖尔人、持不同政见的新教徒以及天主教徒的禁止规定在接下来的140年之后被废除。在1832年的特许经营权标准化之后，所有每年具有自由处理财产达15英镑的英国、威尔士、

苏格兰或爱尔兰的成年男子都是完整的政治公民、人民。他们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不列颠人”(Britons)(科利,1992),但他们同时也知道他们拥有第二族性,如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不过,这些身份之间的冲突,其重要意义现在比阶级冲突要小得多了。

61 每个国家都以独特的方式将阶级与族性混融在一起。三个国家具有更多的多族性特征。在比利时,特许权首先由一群在公共场合讲法语的佛兰芒资产阶级支配,因为他们把法语视为现代高级语言。佛兰芒和法国精英十分容易地相互同化。佛兰芒资产阶级不愿向下唤起佛兰芒群众,而法国精英很高兴获得佛兰芒高雅文化,后者当中具有大量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内容。在西班牙,占统治地位的卡斯蒂利亚精英未能大量地同化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精英,但在此,阶级与民族政治运动一直在持续。在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第三共和国分别存在着左、中、右三个派别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派。在多语言的瑞士,中央国家虚弱,大多数政府处在州一级上。因为22个州中的18个是单一语言,瑞士就像一个微型民族国家的联邦,每个微型国家都受阶级政治支配,而族群合作在相对次要的联邦层次上进行(拉布什卡和谢普斯尔,1972:208—212)。比利时、西班牙和瑞士的代议制政府以一种很独特的方式,通过联合和邦联的形式,处理多族性问题。这些独特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形式,对当今南方世界中那些更具有多族群特点的国家来说,可能会非常有用。

暴力清洗一般限于西欧的外围,这里族性与阶级或会相互加强。在此被剥削阶级还被认定为具有种族特殊性——实际上是被看作文化及文明上的劣等种族。18世纪80年代由盎格鲁化的苏格兰地主对他们租用的农场工人(crofters)实行的高地清除(highland clearances)就属这种情况,导致大量的向新大陆的强制性移民,许多人死去,并且盖尔人最终撤回到高地及岛屿的最西北处。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外围也有相似影响。这方面的痕迹还存在于苏格兰、威尔士以及布列塔尼人这些把自己看作是被英法帝国主义者剥削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自我意识之中。极端的例子有爱尔兰,这里宗教仍然加强着

族性和阶级。英国人在支持(新教)地主相对于(天主教)佃农和租户的权利方面的歧视行为加重了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虽然它是以对单一庄稼过度依赖、导致马铃薯枯萎病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危机开始的,但它因为英国不愿意干预市场力量,加上对原始的天主教农民无情的冷漠而加重了。结果是一次种族文化灭绝,其间数千人死亡,还有数千人逃往美国。

这是早期自由民主在欧洲的最黑暗部分。其他地方,非己团体可能会受到歧视,但他们极少被赶走,更少遭谋杀。他们的精英自愿被同化或被制度化强制进入主流身份。之后,群众也跟着这样了。如果当代西欧包含同质化相对较高的民族—国家,这大都是因为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清洗方式的结果。自由欧洲黑暗面还在其他地方,在殖民地出现。

社会有机论的诠释

民主化理想,与资本主义和工业一起皆稍晚才传播到欧洲中心及东部。起初,这些地区向西面和北面寻找民主理想的灵感。但三种差异导致他们吸取了社会有机论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概念,这给了民族主义运动一个胜过阶级运动的机会。

第一,民主理想在这里出现得较晚,其时政治理论已经成熟到获得这样的理念,即整个人民必须统治,包括人民和普通大众——尽管它还只是主要限于成年男子。所以早期盎格鲁—美国类型的有限财产化的特许经营权的倡议完全被更为一般的要求所代替。为求控制群众,精英们发展出另一种部分民主的形式——不限制选票但限制议会支配地位。所有男性都可以投票,但他们的代理人必须与一个君主共享权力。德国的帝制(Kaiserreich)是原型,在此一个帝国议会(Reichstag),一个由男子拥有普选权背景下选出的议会,与一个基本上为二元的国家的皇帝及其部长分享权力。通过提高行政权力,这第一个差异将中央集权论者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提高到自由主义层次之上。

第二,现在,大家希望国家对其公民更加积极,提供通讯设施、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公民军队。用佩雷兹-迪亚兹(1993)的话说,国家成为了“道德工程的承担者”。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国家主义者的计划被高速推进:极右派通过原始法西斯主义者(protofascists),中间偏右通过对社会天主教的保护政策,以及中间偏左通过像德国桌椅派社会主义者、英国新自由党、法国激进共和党及俄国地方自治会知识阶层。只有极左派落在后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依然坚持乌托邦或公社主义的最小的后革命国家的理念。在20世纪,国家主义迅猛势头不减,影响了世界大多数地方。

第三,本区以多种族的王朝帝国为主。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罗曼诺夫王朝(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伊斯兰/土耳其)就涵盖了许多具历史意义的省份和王国。各代王朝并未试图以一个国家的要求来让自身同质化和合法化。事实上,他们还鼓励比当地人有更多经营技术的少数群体进一步迁入进来,如德国人或犹太人。任何愿意充当边境地区移民士兵的群体也受到欢迎。不过,他们不完全是多元文化的,因为王朝更依赖一个单一的核心的族群或宗教精英,他们能够动员其他族群及宗教庇护一依从(Patron-Client)互惠关系网络,对一些少数群体采取差别措施。所以随着从属阶级开始要求政治代表权,它就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的族群冲突缠绕在一起了。

失去特权的精英起初只为他们自己要求代表权,如在早期的西北部一样。然而,当面临来自底层的压力,他们开始以“整个”人民的名义,表示反对帝国主义种族地位及其地方扈从的意见(曼,1993:第十章)。这孕育了一种左派的对民族主义的诠释。民族,它提出,将像无产阶级一样崛起,从而推翻它的剥削者。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科拉迪尼1911年发明了无产阶级民族这个称号。它恰当地描述了受更强大的敌人威胁的许多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等会怨恨过去波斯尼亚/土耳其和现在的塞尔维亚的统治,罗马尼亚人会怨恨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怨恨捷克人,以及几乎每一个人都不满以前的处于统治地位的德国人、俄国人和土耳其

人。随后,三个帝国的人民——德国人、俄国人和土耳其人(以及包括1867年以后的匈牙利人)——以他们自己的反民族主义行动回应。他们声称,他们的现实生存,受到了这些暴乱的威胁。之后他们变得特别担心——就像塞尔维亚人后来在南斯拉夫一样——他们定居在国外的同族人现在可能会成为由其他族群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的被剥削的少数裔群体。

但是首先到来的是社会有机论的民族—国家的理想。我以19世纪80年代的奥地利为例(施密特—哈特曼,1988)。1882年,三位年轻的奥地利政治家提出了《林茨纲领》(Linz Program),准备建立一个新党,德意志人民党。纲领将德国民族主义、普选权和进步社会立法结合在一起。它对自由主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以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给予同样的谴责。三人宣布自由主义者倡导保护利益集团冲突的宪法,而他们支持民主的“实质”。他们的合法性,他们说,是建立于人民的团结、“一切人的善”和“人民的利益”。计划中的党从未成形,三人分裂,各自去建立自己的党。阿德勒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卢格尔成立了基督教社会主义党,舍内雷尔成立了日后取名泛日耳曼的党。这些是战时奥地利的三个群众党,其中两个产生了大规模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这些年轻的奥地利人拥护一种作为有机体的人民和国家的概念。人民,他们说,是一体和不可再分的,是结合在一起的,是形成整体的必要部分。因而它的国家就不需要建立在多样性或者冲突的制度化基础之上。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能够代表整个人民,最终超越人民内部各社会集团之间的任何利益冲突。阶级冲突及部门利益不会得到妥协,只会被超越,转移至国际冲突领域。随着20世纪的开始,超越性的行动代表可以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理念出现了。这些超越性民族与国家的观念帮助孕育了战前法西斯主义理论。而占主导地位 and 处在从属地位的族性的恐惧相互助长,创造了一个“安全困境”。奥德(协定)激起了捷克19世纪90年代的民族主义。反过来,两者又都激起了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季索(Tiso)是战时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领袖,当他把国家界定为“一个具有单独起源、单

独地理类型、单独性格、单独语言、单独习惯制度和单独的相同目标的文化的人们的社区,它们构成“一个完整领土上的有机整体”时(上述关于斯洛伐克的引述来自内德尔斯基,2001:221—223),他是在代表全部三方讲话。民族主义,像阶级冲突一样,依靠与有同样思想的其他人的冲突而发展壮大。

64 有机民族主义有两个潜在的恶。第一,它可能会从民主走向威权主义的国家主义。单一的左翼或右翼政党需要维持内部政党的民主,然而极少数能实现这一点,这样的任务往往落到一个精英或独裁者的身上。谁来表达人民的被假定的单一本质?鉴于人类群体的现实多样性,一个由精英或独裁者领导的国家公开表示要用一种声音说话。季索的代表基尔希鲍姆宣称,“由于观点的多样性和人为形成的很多条道路,一种自愿走向单一路径的倾向是无法出现的,因此权威性的方向指引的需要就逻辑必然地产生了。”第二,有机主义促进了这样的理念,即少数派群体和政治对手可以从国家的正式成员中被排除掉。

因而这些民族主义者逐渐相信(1)一种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经久不变的国家性格、灵魂或精神;(2)他们对最终将表达这一点的国家的权利;以及(3)他们排除具有不同性格、只会削弱民族国家的非己团体的权利。他们讨厌多种族国家,有时甚至对同化表示怀疑。于是19世纪末东部的少数群体感到了从自愿走向强制同化,随后是被逼向外迁居的压力。在1870—1910年间,超过500万的非犹太人东欧人从他们作为少数群体的地区迁出——特别是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德国人和斯洛文尼亚人(马勒斯,1985;皮尔逊,1983)。但在新的族群一种族称号凌驾于旧的宗教称号之上的地方——就像他们在欧洲对犹太人和穆斯林所做的那样——事情发展到了最坏程度。这里我主要讲犹太人,穆斯林放在下一章。

犹太人数百年以来一直是宗教与经济怨恨的目标。“杀害基督的人”因被禁止拥有土地或拥有公职而被迫担当了名声不佳的经济中间人的角色。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政治精英的一般怨恨也可能发到他们身上。一场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给予农民不用造反而表现

其不满的机会*。集体迫害包括暴力、抢劫和强奸。如果有关于犹太拐骗基督教婴儿或进行了仪式性谋杀的谣言传开,则谋杀也可能就跟着到来。然而极少有人蓄意要除掉犹太人。他们太有益处了。皈依后的强迫同化被周期性地尝试(就像对穆斯林一样),但这也就是清洗通常到达的程度。两种新的升级出现:(1)日趋上升的民主化情绪导致犹太人被剥夺完全公民权、被称为国家中的异族人,以及(2)有机种族主义理论更多的是把犹太人视为一个种族而非宗教的非己团体。

在俄国犹太人最多的地方,情形最糟。俄国集体迫害升级到谋杀性清洗。在1881—1883年间犹太人作为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替罪羊,因为有一个犹太女人是杀手之一。政治家和媒体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沙皇当局似乎也不愿意干预。内政部部长弗莱夫可能帮助酝酿了这次集体迫害,尽管他公开表示他想要的只是同化加一些文化清洗。不过,这些主要是来自底层的事件。在工业化的城市,事件从比例上来说要大得多;它们通过现代公路和铁路网传播,主要施害人似乎是现代工业中的工人。事实上,集体迫害经常就像当代的俄罗斯罢工,是有年轻和单身的,封闭在一种暴力、酗酒以及男性亚文化环境中的男性工人(最近从农村来的移民)参与的暴力事件。经过接下来的几十年之后,现代劳工骚乱针对的对象转移到并在之后一直放在犹太人身上(弗里德格特,1987;克里尔,1993;温,1992)。但还是有比有预谋的谋杀多得多的殴打、强奸和抢劫行为的发生。

接下来的这次俄国暴行更具政治性,因而也更具谋杀性。它发生在1903—1906年,受到了与日本的战争和1905年革命的刺激。犹太人被认为是躲在其他威胁性敌人后面的幕后指使者。集体迫害随着对征兵的不满转移到犹太人身上;当犹太人被当作社会主义者遭到被保守政治家怂恿的反革命暴徒袭击时,迫害就变得更为致命。沙皇政府被暴力规模(3000名犹太人死亡)惊吓,但又承认集体迫害

* 意思是农民乘机通过参加杀害犹太人而宣泄其生活中的不满。

能够用来激起广大右翼的支持。沙皇的私人信件反映了对革命领导人当中犹太人占的过高比重的不安。从这时起,反犹主义就成为俄国右翼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显著特点了。这使得更多年轻的犹太人左转或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表示支持,强烈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有机体论鼓吹者的理想;1914年前的几十年中有250万东欧的犹太人向西迁移。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推升了这一广大地区的社会有机论的民族主义。它摧毁了绝大多数多民族国家,降低了传统保守主义者对群众的不信任,提供了一个中央集权干预和计划可能如何实现发展的经济模式,而且通过大规模公民军队,它还提供了一个军事的、继而准军事的公众集体寻求国家目标的行动模式。正如我在《法西斯主义者》(2004)中指出的,许多军队老兵和政治激进分子信奉准军国主义。除了俄国与西班牙内战之外,右派比左派更擅长这方面。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甚至在西班牙),内部纷争中每死亡一名右翼,至少就要死掉两名左翼。左翼谈论革命与武装斗争大都仅止于此——夸夸其谈。当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暴力行动小组(squadristi)组织准军事进攻时,意大利左派即为之提供论证。阶级分析保护了绝大多数左派免受军事主义的威胁,但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失败。

有机论的右翼分子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主要政治敌人——布尔什维主义,与国外的敌人联系起来。德国与意大利的右翼分子袭击斯拉夫人,尽管犹太人依然是全东欧喜欢的目标,这里一种犹太—布尔什维克的理念似乎最不可信。布尔什维克人不是反犹主义者。列宁谴责反犹主义,1921年中央委员会中21个人当中有6个是犹太人,犹太人在契卡*这个秘密警察指挥机构中占了尤其高的比重。反犹主义右翼分子有极好的机会将犹太人与施虐者和刽子手等同起来。犹太人在基层布尔什维克中并不占很高比重,但真正多少比例

* Cheka,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简称肃反委员会,苏联的第一个政治警察机构,1917年成立。

不重要;这是第一次犹太人被允许在他们自己的社区之外担任任何显著的政治角色。

紧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整个俄国、乌克兰、波兰、巴尔干国家、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右翼分子领导当地人口谋杀犹太人(马勒斯,1985:62—64)。尽管许多左派分子也是反犹主义者,但他们的领导人通常意识到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违背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而眼下俄国产业工人也正被马克思主义组织起来,所以要比在沙皇时期较少倾向于参加族群集体迫害。

俄国内战期间的乌克兰曾发生过对犹太人的谋杀性清洗,期间所运用的方法预示了“二战”期间远更严重的大屠杀。大约有5万到15万名之间的犹太人被杀,约占乌克兰全部犹太人的3%—10%。其中有不到10%的犹太人是被红军或乌克兰无政府民兵组织杀死。估计有四分之一是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杀死,而超过一半是白军所杀。战争中还出现很多的儆戒性镇压行动。村庄与城镇如果被认定与敌人存在合作行为,将得到毫不留情的待遇。因为犹太社区有时与红军部队串通,而红军又似乎是祸害乡村程度最轻的部队,犹太人为此受到惩罚。他们易于受罚,因为他们是当地人口中的少数派,待遇地位一般不如红军。

右翼意识形态经常拥护清洗。乌克兰民族主义军阀(盖特曼)用“让犹太人去死和打倒共产党!”“让犹太人去死!为了东正教的信仰!”以及反对“我们古老的敌人,以及他们的代表犹太人”的口号来召集他们的农民党派。在他们的敌意中混合了对外来压迫的仇恨——一个受到全世界犹太人帮助的俄国政府(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和东正教在宗教上对“杀害基督的人”的犹太恐惧症的内容。白军领导人发表了更多的政治反犹主义意见,将俄国的不幸怪罪于“犹太—布尔什维克同谋”之后的“病态微生物”——后来的党卫军用的语言。甚至是更加自由主义的白军,立宪民主党人*,也没

* Kadets, 1905—1918, 又称人民自由党, 主张彻底改革俄国政府, 采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

有谴责集体迫害,因为迫害为他们的事业带来了广泛的支持。舒尔金(Shulgin),白军司令邓尼金身边的一名政治家,震惊于这次残暴,写道:“一个恐怖的中世纪幽灵潜行在基辅的街头。”但是他还是认为犹太人应该为他们在布尔什维克疯狂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在整个世界面前坦白与忏悔。舒尔金希望“这次恐惧折磨将会为他们指明正确的道路”。失败之后,逃亡的右翼分子带给西方臭名昭著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一个伪造的讲犹太人注定征服世界的小册子。政治流亡者帮着在欧洲人民民族主义者当中播种种族/宗教仇恨。年轻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读了《议定书》。他在日记里倾吐说该书“解释了一切并告诉了我们下一次我们必须与谁战斗”(阿特舒勒,1990:284;凯内兹,1992;莱文,1993;迈耶,2000:377—389,513—526)。

67 但以更温和手段采取的清洗也有更多的令人尊敬的支持者。拆迁清洗——部分自愿但大都是强制驱逐——是由采取了伍德罗·威尔逊国家自决主义的1918年条约正式批准的。在他的讲话中,威尔逊总统从头到尾混淆自由民主与有机民主的概念。他说,睦邻国家(Entente Powers),正在为争取“代议制民主”和“民族自决”而奋斗——两者的结合实践中代表了每个多数民族的民主。当时美国正处于多种族高峰阶段,因为上一个十年它已接收了其史上最大的移民流入。但是美国移民没有去挑战国家,美国人往往(今天还是这习惯)是用个人,而不是集体的标准,来看待少数派权利。个人权利受到宪法保护。美国政治家,比如威尔逊——就像当时的英国和法国政治家一样——认为创建一个个人权利受到宪法保护的单一性民族—国家就足够了。

凡尔赛代表以一打新国家取代了俄国及奥斯曼多国帝国中的奥匈帝国和欧洲国家。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每一个国家都被有效分派了一个包括至少65%人口的占主导地位的族性。任何对此不满者有权在一年之内改变他或她的国家。人们估计少数派可能会搬迁到一个他们在那可成为多数族群的一部分的国家。一年之后,那些保持原状不动的人只好希望他们的国家会尊重保证少数派

权利的条款。但大多数国家没有这么做,而睦邻国家没有兴趣,国际联盟则缺乏权力去执行它们。国际联盟的秘书长、哈布斯堡历史学家查尔斯·麦卡特尼进入到问题的核心。他指出,对一个少数派来说,四件事情是可能的:修改边疆以让少数群体最少化;向外移居和人口交换;“身体杀戮”;或离开民族—国家形式的宪法(海登,1996:735)。麦卡特尼喜欢最后一个选择,但民族—国家的理想对他来说是过于宏伟了。

随即出现的结果就是对少数人群的歧视加上强制向外迁移。战争中已出现了大规模的难民潮,但和平协定又增加了难民流动量。截至1926年,出现了将近1000万的欧洲难民,包括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交换的150万,在希腊与保加利亚之间交换的28万,200万波兰人,200万以上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以及20万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这些数字令人难以置信。有超过6000万的欧洲人在1914年以前由一个外来列强统治,而1914年之后则仅有25万人。在东欧,从属民族从占一半人口减少到占四分之一。公民权现在大量地与族性等同起来,而少数群体有沦为二等公民的危险。人们认为这要比让族性混在一起好。奥斯曼帝国的种族冲突最近带来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和对希腊人的野蛮驱逐。多种族的奥斯曼帝国已变成了一个土耳其共和国,不要亚美尼亚人或希腊人,甚至不要它的大多数阿拉伯人。人口交换,然后再给予一些区别待遇被认为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受到大国的鼓励,包括欧洲的与美洲的国家。

68

所以,有机的民族—国家主义浪潮激荡在两次战争期间的半个欧洲——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希腊、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要求国家摆脱外国统治实现民族解放的社会有机论团体也在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和克罗地亚人中不断增多。布鲁贝克(1996:第3章)证明两次战争期间的种族关系让三种主要角色类型受到质疑:本国少数派(亦即在他们现在的国家中形成一个少数群体)、全民族化国家(nationalizing states,在此多数派民族希望国家仅体现它的身

份特性,即社会有机体民族主义)和国外的家乡国家(即原本在此是少数派的祖国)。犹太人与吉卜赛人将构成第四类卑贱者国家:没有家乡国家的少数派。但是本阶段初期最危险的特征是令人尊重的保守主义者在向有机民族主义靠拢。与以一个基本上被动的人民的名义(像过去一样)为他们温和的中央集权统治辩护相反,保守主义者开始通过动员民族主义背后的人民与左派展开竞争(曼,1995)。保守主义者与社会有机论的民族主义者加入到了威权主义组织的势力当中,后者攫取了除捷克和保加利亚国土之外的以上提到的所有国家及组织的权力。这将加重少数群体、民族化国家和家乡国家之间——以及与卑贱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之间的冲突。

社会有机论者也谴责左翼分子为国家的准种族敌人。自由主义者被谴责为外来的国际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被谴责为国际主义者或布尔什维克,一个带有俄国和亚细亚含义的词。宗教少数派与少数民族为本国以外的国家服务。截至20世纪30年代,单一的只想同化少数派的企图正在趋于消失。德国人和捷克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以及其他群体声称拥有不同的本质,部分是生物学的,部分是文化的,但都不是很容易会变化的。为保护他们民族的有机统一,他们在教育以及行政方面对少数派实行差别政策,减少少数派的交往自由,希望能引导他们向外迁移。然而地缘政治学起了一个调节作用。几乎每一个本国少数派都是另一个国家的多数派,通常是邻居。邻国之间避免报复的外交能够缓和清洗民族主义。只有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没有家园,没有抵御社会有机论的民族国家的保护人。但是如果中欧与东欧的地缘政治平衡被打破,则一切少数群体都有可能受到伤害。

结 论

现代性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民主观念。西北欧洲的政权承认公民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冲突。他们试图将其制度化而不是压制它,所以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而不是社会有机体的民主制度形式。阶

级胜过了族性,就像它在以前的大部分历史中一样。但在中欧和东欧,民主化斗争日益使地方族性处于与一个外来帝国统治者的竞争之中。这里族性开始与阶级齐平,尽管还没有胜过它,因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多种族环境下,一个大多数族性能够通过大多数人民实现统治,因为选举成为了族群普查。贝尔-菲阿尔科夫(1996:48)正确地总结说:“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自由的理想、自决和代议制民主。”民主化有它的阴暗面。这里面潜在着非常阴暗的一面,因为族群世界不像阶级,并不是那么相互依赖。他们能够住在他们自己的社会有机体国家中的被清洗过的社区。

这些趋势开始鼓励将国家建立在族群同质性之上的想法。它们鼓励欧洲人考虑通过人口转让解决族群争端和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它们带来了拥护放大的民族国家主义的愤怒的难民,并且又落在更广泛的科学种族主义之中。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所有多国组成的帝国的失败,其公民战争也激起了准军国主义。不过,政治反对党一般只是受到取缔和囚禁,而少数民族及宗教少数派只是遭受了歧视和一些强制性的向外迁移。反犹主义大多依然是无计划的,其最坏的过分的暴行是短时间的集体迫害。社会有机体论组织依然很小,而战后的一阵准军事杀戮已沉寂下来。我们能将纳粹的种族灭绝追溯到这些先例,因为纳粹是一种现代科学、现代政治和现代社会传统的最极端的倡导者。不过,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些清洗趋势会怎样结束。只有在事后,即厘清了“通向奥斯威辛的曲折道路”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他们最后形成了世界迄今所见到的目标最为单一的种族灭绝政权。

第 4 章

新大陆的种族灭绝性民主国家

“一旦我们不得不对哪个部落举起斧头，我们就不会将斧头放下，直到该部落被根除或赶离密西西比河……战争中，他们会杀死一些我们的人；而我们将灭其全部。”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看到像这个人一样从事谋杀性清洗的施害人，这是其中第一章。但他绝不是殖民主义狂热分子。他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

前两章指出谋杀性清洗直到最近之前并不常见。我将危险的社会有机论民主概念追溯到 19 世纪的东欧与南欧，将它们与西北欧洲占主导的更宽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了对照。然而最自由的国家也有殖民地。在那里社会有机体与自由的我们一人民的两种概念并存。一方面，殖民者把自己分为多种利益和阶级，而他们在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政党代表了这种多样性。另一方面，这整个的人民具有单一的“文明”的性质，不包括“当地人”、野蛮人、东方人等等。这种差异后来被重定为种族性的。“低等种族”不是我们一人民的一部分。

因而我此前称为自由的一些国家在现实中是两元的，在许多英里以外的殖民地上，它们存在着极其阴暗的一面。欧洲人当中的阶级妥协、代议制统治以及宽容等形成在针对庞大非己团体的可怕暴行之上。最坏的情形，在美国与澳大利亚，发展出迄今为止可能世界上最为成功的清洗。它们是由殖民者民主政体（国家）完成的，先是事实上的，然后是理论上的。这就是本章的悲惨故事。

殖民主义清洗的一般模式

实际上,所有欧洲的殖民地都是被暴力征服的,但只有一部分后来遭到谋杀性清洗。我将研究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高加索以及讲德语的西南非洲的不同情况;并将论证它们越是体现殖民者民主,不管是事实上还是理论上的,谋杀性清洗就越多。不过(不幸是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因果分析),它们也因为其他影响到清洗程度的因素——如经济类型或对当地人的统治类型,而有所不同。所以我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各个殖民地当中在威权主义和民主时期之间的变异,而把少一点的注意力放在殖民地之间的差异上。

71

经济权力

与本书讨论的其他情况不同,此处种族冲突的背后直接针对的是谁应该拥有和使用土地,是当地人还是殖民主义者的经济冲突[史密斯(1997:229)称之为功利主义的种族灭绝]。但是有五种殖民地经济主要类型会导致殖民者给当地人带来逐级升高的暴力水平。

1. 贸易。在欧洲人只与当地人做生意,而不在其土地上定居的地方,他们人数极少,无法强加太大力量。在贸易确实导致征服的地方,小部分的人通常还是能够确保间接统治——通过保留了很多权力的当地精英来实现。在亚洲经常就是这样,它靠近欧洲后勤领域的边缘。贸易居留地在初期进入之后并不经常有大量的种族清洗。最坏,它可能会蜕变为局部的政治灭绝,清除部分的本土领导阶层。但也需要其他地方精英充当贸易合伙人和委托的统治者。关于贸易殖民地的讨论到此为止。

2. 抢劫与纳贡。这在殖民化早期是重要的。西班牙侵入美洲之初大量进行金银抢劫。这可能导致在抢劫过程中的屠杀,但在随后的种族清洗中就不会。就贡品而言,征服者需要活物。我将讨论西班牙在墨西哥的抢劫和纳贡情况。这前两个类型大致对应于由菲尔

德豪斯(1965)和弗雷德里克森(1988)区分出的四种殖民地政权中的第一种——占领型殖民地,这里殖民政权寻求军事及政治控制和经济纳贡,但并不寻求控制土地或劳动力。

3. 运用分散劳力的居留地。大量的殖民者农业是小规模的,使用稀疏分布在殖民地中的本地劳力。虽然一开始的土地占领会涉及暴力,但严厉的镇压在后来并不实际,也无人考虑清洗——不管使用的是自由、契约甚或是奴隶劳动力。这种经济类型基本对应于菲尔德豪斯和弗雷德里克森的混合型殖民地,该类型还被他们视为典型地体现了西班牙殖民化的特色。它在本章中不占重要地位。

4. 使用集中劳力的居留地。采矿业和种植园一般总是要用到大批集中的劳力——受到严密并常常是残酷的监督。菲尔德豪斯和弗雷德里克森认为这些种植园殖民地是由葡萄牙人率先建立起来的一种类型。由于劳力有剩余,当地人会被毫无人性地分派过多的劳作直到其死亡。如果劳力稀缺,殖民者或会稍加抑制。尽管惨无人道,但这种类型的居留地通常并不导致蓄意的谋杀清洗,虽然它有时带来种族文化灭绝,却由于残酷劳动作业的意外死亡要求而从其他地方进一步引进劳力。我将简单提及而不将其作为重点。

5. 不需要本土劳力的居留地。殖民者使用土地,但用的是他们自己的或其他的劳力,而不是本土的劳力。这是菲尔德豪斯和弗雷德里克森的纯粹居留地殖民地,他们认为它首先是英国人开创的。马克斯·韦伯说纵贯历史的“征服农民世界的过程”一直试图“消灭”当地人口(1958:165)。欧洲人需要肥沃的土地,而通常这土地已经有人居住了。如果当地人口是稀疏分布的采猎者,他们就需要较大的生存空间。尽管当地像北美洲一样有大量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但大批的殖民人口还是会对住宅区构成压力,给当地人带来很大的困苦。因为大多数殖民地经济较之本土经济生产力要高得多,他们创造了大量足够继续征服与清洗的经济剩余。这类殖民地是本章重点。它们施行了大屠杀。

不过,即使在这里,还是有两种较轻的清洗形式可能发生。某种土地分割现象有可能发生,以致两个社区之间可能会出现居住隔离。

欧洲人可能会拿走大部分优质土地,但生存对两者来说都依然会是可能的。这就是殖民者所说的保护地或保留地。另一种可能,当地人被同化,一些人成为小额财产所有者,大多数人成为劳动力。如果本土社会是分层的,单边贵族同化或会出现,同化精英而非群众。这些是主要的经济变异形式。

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也带来对待本地人的不同变化形式。较小的殖民者和贸易团体有时并不对土地提出正式政治主权要求。但他们对垄断的欲望鼓励了政治要求,绝大多数殖民者是以国家的名义到来的。一落地,欧洲人就插下一面旗帜,找来一些当地人,用一种完全让人听不懂的语言对他们作一通长篇发言,声明这片土地及它的人民属于女王(或共和国)。这个对土地和人的垄断的政治要求是不可商量的,可能会招致坚决的抵抗。但是欧洲人经常不能执行这一要求。三种类型的政治执行带来逐次上升的暴力。

1. 治外领土法权。欧洲人不能征服世界上最强大的对立国家,如中国、日本或奥斯曼帝国。但是他们能够获得治外法权,依据它,他们的商人将可以不受当地法律管辖,而享受特权或垄断权。有时这招致了很多暴力,如中国的鸦片战争那样。但是它没有带来清洗,因为当地人被认为是有用的贸易伙伴和消费者。我将在第5章中讨论奥斯曼帝国时提及治外法权。

73

2. 间接统治。欧洲人能够实现征服——通常在当地盟友的帮助下,但尚未强大到足以自己进行统治的程度。他们不得不满足于间接统治或形成受保护国。当地统治者被允许继续统治,他们对殖民地当局表示忠心并向其纳贡。间接统治包含妥协和有限的暴力及清洗。不过,进一步的殖民浪潮一般会给殖民主义当局带来寻求更多直接统治的压力。

3. 直接统治。在他们占主导地位的地方,欧洲人坚持直接统治,包括要当地统治者和群众完全屈服于他们的权力和法律。这总是发生在有大批移民到达和逗留,并声称这是他们的国家,“人民统

治”——但不包括当地人——的地方。这些地方现在都产生了对同一领土争夺主权地位的冲突(我的论点 3 和 4)。

但是,不管采取哪一种权力执行形式,殖民政府几乎从不杀害超过征服所需要的当地人。他们需要活着的人交税和服兵役。所以在殖民者想消灭当地人口的地方,政府就会遇到一种困境。他们易于成为摇摆不定的角色,在更极端的殖民者和较温和的教会之间进退两难(见后)。但是在地面上,通常是殖民者而不是他们自己控制着领土,特别是在新开拓的边疆地区。这里常常在它成为理论上的殖民者民主制度之前就早已是事实上的殖民者民主制度了。无论哪一种,对本地人而言都是坏消息。

欧洲人一般能够比土著掌握更优越的政治资源。阿兹特克人与印加人能够调遣资源,但只是通过松散和脆弱的民族与城邦国家联邦形式。欧洲人能够分而治之,给予结盟的精英间接的统治和单边的贵族同化,从文化上经同化使精英而不是群众获得一种文明身份。不过在北美洲,土著通常分裂为许多部落、氏族或民族,每一种都具有分裂倾向。首领有很大自治权但没什么权力,极少数首领能够达成包括单边贵族同化的交易,因为他们不能提供稳定的间接统治。19 世纪,美国政府机构进一步利用了这一政治弱势。他们声称,根据一项与一个人数量较少,由迫不及待的、挨着饿的首领组成,准备同意用广阔部落土地换得一钱不值的奖赏的不具代表性的团体达成的交易,他们与一个印第安民族签订了条约。反过来看,在欧洲人开仗的地方,如在殖民化早期阶段的大部分时期,当地人的生存因此获益。但当一个殖民地的权力被给予了由欧洲对手拥有的对一块领土的完全主权时,对当地人来说这是坏消息,因为他们的控制权全部没有了。

军事权力

74

冲突是用战争解决的。欧洲人武装而至,寻求征服。军事权力的均势根据人数和技术以及组织能力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欧洲人极少的地方,他们不能够轻易征服,但他们不断用更强大的军事组织

与技术弥补人数上的不足。一些战争代价很高,因为土著可能长时期都会很危险,但如果殖民资源能被集中使用于战争,则战争的结果通常是没有疑问的,特别是在19世纪生产出快射枪之后。假如欧洲人希望实行谋杀性清洗,他们能够越来越多地这样做,而自己不受什么风险——也许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征服者集团都更容易(我的论点4b)。但军事权力也涉及战术问题。正如在第1章中指出的,某些战争类型更加可能从战术上诱导士兵采取更多针对平民的行动。

意识形态权力

我们看到侵入罗马帝国的野蛮人实际上是它的邻居。但欧洲人现在通过一次航海革命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起初他们看上去像外星人一样。阿兹特克人争论第一批征服者(conquistadores)是否是神,因而致命地延误了他们的回应时间;夏威夷人据称曾争论库克船长是否是罗诺神(Lono)——如果他们真这样认为的话,那对库克船长将是致命的,而不是他们。这些是当地人对巨大差异以及欧洲经济、军事、政治和生物学权力——意识形态权力的主体——的意识形态进行解释的例子。族性的社会建设根本就不需要,没有哪个欧洲人会怀疑谁是当地人、谁是欧洲人,尽管当地人不得不修正他们的身份意识。他们以前没有集体地把自己看作当地人——他们是各种各样的氏族、世系、民族和国家,现在被迫把自己构造成整个不同于白人的集体。尽管如此,殖民地的种族冲突具有一种事实性,本书第1章讨论的构造理论对它不太合适。

优越性并不全然是客观的,因为殖民主义者行为野蛮、诡计多端。正如特里杰(1994)所说,有很长时间他们的行为确保了他们不会被当作神。但是若从经济、军事、政治资源等方面看,殖民主义者是优越的。殖民主义者用取自他们自己历史中的模式来解释这一点:“高级”文明战胜“低级”文明,文明战胜“不开化”或“野蛮”。这正是历史与进步的本来意义。它是不可避免的,是上帝的旨意。做文明人还包括个人卫生、服装和行为方式的理念,能够与“肮脏”的不穿衣服和“无拘无束”的土人进行令人厌恶的人际交流。土人经常因

疾病而死在他们面前,似乎身体不能适应在更高级的文明状态下生存。

75 历史与进步的文明模式意味着,殖民者要形成一套作为他们给予土人任何待遇的辩护理由的优越性意识形态很容易,这使他们免于道德风险(如论点 4b 指出的)。我们不应该为他们对土人的轻蔑感到奇怪。它似乎是自明的。

当然,欧洲人像土人一样,是细心的观察者,也会注意到差异。如果他们发现复杂的城市、纪念碑、灌溉农业甚或气势不凡的民族,他们就修正自己的判断。实用需要也影响着他们的意识形态。如果他们需要通过当地精英实现间接统治,或者如果他们需要当地人作为稳定的性伴侣,他们就调整观念。

基督教使他们的模式复杂化了。它强化了野蛮—文明的两分法,因为只有基督徒才拥有真理。教会还说基督徒有权根据发现权剥夺非基督徒的土地。然而甚至野蛮人都被认为具有灵魂。土人是真正处在“自然状态”的——自然人,但他们应该被引导至真正的信仰——之后再是文明。改宗包含同化、清洗文化,但不包括剥夺生命。基督教加强了剥夺但削弱了谋杀性清洗。之后的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带来了世俗的调节性意识形态。所以宗教/人道主义团体力量越强大,谋杀性清洗越少。这给了我们第三个殖民主义角色,职业意识形态工作者——教会、宗教教派、传教士、人道主义组织。在开始的征服和土地占有后,他们通常在对待土人时更加克制,尽管他们不会不沾有种族偏见,或记住自己在剥夺土人物质方面的利益。

生物学/生态学

权力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形式位于我的四因素模式之外。欧洲人在温带居留地区具有生物学权力优势,在此他们不慎携带了致命的病毒微生物。第一次与欧洲人接触(特别是与他们的动物)的土人死于各种欧洲病毒——他们对此还没有形成免疫力。病菌很容易成为大多数土人人口的最大杀手,尽管他们工作在食物短缺

和生育率下降的环境中,但后者是由欧洲人更主动地造成的(桑顿,1997)。病毒流行症伴随着欧洲人的渗透,使得征服容易得多。这是温带区的种族文化灭绝中的主要成分——强化了欧洲人的权力优越意识。

生态学也很重要。清洗在新大陆的温带区广泛得多,这里对欧洲殖民较适宜。这主要是指美洲,澳大拉西亚*以及横穿非洲的小面积温带区。这就是欧洲人强加的被克罗斯比(1986)称之为生态帝国主义的地方,满地是欧洲的人、草、动物和病菌微生物。结果是一场浩劫性的、记载当中最大的一次人口清除。

76

1788年第一支舰队到达澳大利亚以前,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很可能刚好超过30万。到1901年只剩约9.3万人。最低是1921年,此时大约存活着7.2万人。一个世纪损失几近80%!之后土著人口趋于稳定。1961年后它甚至开始增长(史密斯,1980:12,69—70)。

在美洲,有着大量殖民人口的地区失去了90%的当地人口。在整个大陆总的前哥伦布人口可能在6000—10000之间。有超过一半的人死去(斯坦纳德,1992:74—75,81—87,118,146,266—268)。在现为美国人占据的地区,前哥伦布印第安人口估计数一般在400万至900万。在美国1900年人口普查时印第安人口只有23.7万,至少损失了95%。最后因而也是最能让我们确定发生的根除,是在加利福尼亚。据西班牙传教士估计,在他们1769年到达这里之时应当有31万当地人。截至1849年,即淘金热开始的那年,人口已经减为一半。在这之后随着居留地的扩张这一数字甚至掉得更快。到1860年,在建州10年之后,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口数字只有3.1万了——仅12年后损失率就高达80%!第三帝国也存续了12年,杀掉了欧洲70%的犹太人。最后,事态趋于平息。到1880年时加利福尼亚还有2万以上印第安人口。在20世纪,他们的数量略有增长(阿尔马格,1994:10.7万至13万,但所有数字都是粗略估计;桑顿,

* Australasia,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的岛屿。

1997)。这场浩劫怎么会发生的,它的意图是什么,以及谁是施害人?我考察在运用政治权力的那些人(殖民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精英)、运用意识形态权力的那些人(主要是神职人员)和运用经济权力的那些人(殖民者)之间的种种变异形式。军事权力可能会被国家或殖民者运用。生物学权力被他们所有人运用,通常是非故意的。

墨西哥

西班牙人第一次进入加勒比群岛,没有面向有组织国家,通常是经过私掠巡航冒险。他们杀掉当地精英,采用强制手段让当地人在他们的庄园和矿井上过度劳作。他们逼迫当地妇女与他们发生性关系,这样就少生养一些印第安人。他们的猪和羊毁坏了养育当地人的植被。但是最重要的,欧洲动物携带着多种病菌,它们使当地人口,包括那些甚至从未见过征服者的人,遭到了毁灭。在可怕的种族文化灭绝中当地人口被消灭——非故意,然而却带有很大的冷酷无情的成分。

77 在大陆上,西班牙人遇到一个先进的文明。科尔特斯指出这些印第安人“比其他岛上的印第安人具有高得多的智力。事实上,他们给我们的印象是拥有足够一个普通公民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生活处事的理解能力”。虽然受到阿兹特克人可能投入战斗的军队规模的威吓,他知道他们的分歧,引用圣·马克的话说:“每个自我分裂的王国将遭到毁灭。”(托马斯,1993:576,245)科尔特斯把在阿兹特克统治下不安分的城邦国家招为盟友。他的初始 A 计划是强加主权,同时允许盟友有一定政治自治权,然后抢劫金银,设立定居点,改造灵魂。他的传记作者,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高兴地承认,“为了把光明带给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也为了变得富裕,这是我们所有人类共同追求的”(转引自法里斯,1984:29)。

在征服期间,最坏的西班牙暴行发展至儆戒性镇压。约有 20 个被疑为背叛的墨西哥城镇,那里的男人被杀,妇女和孩子被奴役,建筑被焚毁。偶尔有受害人被狗撕碎。更为常见的是,西班牙人站到

一侧,而他们的本土盟友撕碎他们的前统治者,然后吃掉他们。这就是由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尔主教发出的谴责,而征服者仅否认细节。有人为摧毁特皮克(Tepeaca)辩护(是对谋杀12名西班牙上尉的报复):“给予上述惩罚是为了本地的安宁……也是为了吓唬自然人,让他们不敢加害西班牙人。”但是西班牙人经常在他们认为某人藏匿了金子的时候失去自控能力。富有的阿兹特克人被拷打,被逼问说出藏金子的地方;有些人遭剖腹以查找吞下的珠宝。这些是破坏了一般被称为工具理性行动的情绪宣泄。在阿兹特克都城特诺奇蒂特兰陷落之后,那里许多的首领被处死。但其他居民被允许平安地离开这座被摧毁的城市(托马斯,1995:243—245,262,434—439,459,527,544)。

当时有一种战术诱导,它让你离开谋杀性清洗,对友好、中立和敌意的当地人作出区分。盟友非常需要。这种战术要求对诱使征服者放弃不加区别的屠杀行为是决定性的。在其儆戒性镇压中,征服者是传统的帝国征服者,所以他们的A计划不是以种族清洗为目标。解决办法包括对本地人发号施令,他们必须所有活都干,如果必要的话,采取强制。但他们已从加勒比经验中获得教训,所以在墨西哥他们搞出了一套监护征赋制度(encomienda)。王室颁赐西班牙殖民者土地并将土地上的人民作为事实上的农夫。他们不允许赶走当地人,还必须要保护他们,尽管劳动条件会非常严酷。

因为殖民者绝大多数是男子,他们需要女人。西班牙对种族多样性的宽容确保了许多本土伴侣成为了妻子,在稳定的异族通婚制度下生育子女。相关的数字——本地人远超欧洲人——意味着本土婚姻和生育继续在异族通婚制度下进行。本地人中没有出现严重的生育率下降。征服也披上了凭“最高的天主教陛下”的宗教合法性的外衣,并总是包括拯救灵魂的神职人员,因而本地人受到了同化。祭司与宗教教派在国王和总督辖区力量非常强大。西班牙绅士阶层正在为争取在新西班牙建立指挥所而努力,对对手虐待本地人的控诉可以让对手不能担任公职(指控是针对科尔特斯自己的)。神职人员对异族之间和本地人的婚姻举行同样的仪式,帮助调节政权。

西班牙指挥官利用当地人作为委托统治者,后者听命是因为他们希望保持他们的权力与财富。他们不得不改变,但这经常是表面现象。私下里他们根据自己意愿践行风俗和仪式,而西班牙人也学会了避免打碎偶像。当地精英参加军事远征,接收监护征赋制度和西班牙头衔,他们的女儿嫁给西班牙官员。当地人还成为牧师和教堂乐师;他们利用法庭,经常控告西班牙人。他们的子女养成了与征服者难以区分的习惯和词汇(托马斯,1995:559—560,577,589—590)。地区性差异主要由相对的数字决定。1800年时西班牙人占墨西哥城人口的50%,所以对这里实行直接统治。但他们在中部高原和尤卡坦半岛的人口一直保持在4%以下,所以就不得不通过能够保留其地方权力的玛雅封建主实行间接统治。玛雅人说他们将同化西班牙人,而不是被同化(法里斯,1984:第1章,第2章)。在尤卡坦,他们做到了。

所以西班牙长期定居的B计划包含了单边贵族同化——精英的同化。尤卡坦的中部和南部直到19世纪中叶之前未被征服(其他分散在南美大陆的印第安共和国也没有)。曾经有过一阵猛烈的反叛、镇压以及种族主义意义上的种姓纯洁的执行时期,但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主要由梅斯蒂索人(mestizo,混合型种族)组成的阶级/种姓在统治着印第安人。墨西哥、危地马拉和秘鲁都经历了其中外围印第安人被残忍赶离家园,甚至被白人或梅斯蒂索人精英根除的种族清洗阶段(Centeno,2001)。但是总体上说,比起北美,存活下来的当地人口比例高得多。族性与阶级相互缠绕,在整个墨西哥和拉美很多地方还是这样。

凶残的原始征服、抢劫和压榨劳工使西班牙人跻身于历史上最恐怖征服者的名单之中。在墨西哥阿兹特克山谷,疾病是西班牙统治第一个百年中的90%的人口损失的最主要原因——一种种族文化灭绝。不过,西班牙人依然少于当地人,不得不通过当地精英进行统治,同时需要当地劳力。西班牙政府与天主教会添加了更温和的压力。西班牙统治变温和了。而澳大利亚和美国走的是另一条道路。

澳大利亚

79

澳大利亚的殖民主义化过程开始于1788年,经19世纪得到巩固。当时,英国的军事及政治权力要远强于当地人。土著仅能调动小股具有原始武器的分队。有一个甚古怪的A计划:建立一个需要地方农业的罪犯定居地。其间的假定是当地人会与殖民者做生意,帮助他们耕种土地,然后逐渐接受文明。也许必须炫耀一次武力,但没人在一开始就想好了要彻底根除他们。这是国家主导的,因为在罪犯流放地也需要英国武装部队。唯一的神职人员是为军事机构服务的。然后将服刑期满的囚犯释放进殖民地的做法,加上即将出现的自由移民浪潮,意味着殖民地需要较少的本地劳力。因为地形更适合于放牧而非耕作农业,居留地覆盖到很大的区域。土著是采猎者,其生存需要更广阔的土地。因此关于土地,主要是河流、水洞、野生动物和食用草,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土著没有战争所需的军事或政治组织,但他们抢劫食物,投刺牛羊,偷盗面粉,偶尔还杀死白人。

对欧洲人而言,猎人似乎太过原始。他们几乎不穿衣服,浑身肮脏,他们缺乏国家、神和文明水平。很多殖民者把他们视为有智力的动物;其他人把他们看作长着成人身体的孩子;还有的人走向激进化,视他们为寄生虫——污染和疾病的来源。从19世纪中叶起达尔文理论被曲解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绝大多数欧洲人相信存在两类生物(黑比奇,1988:54,80;马库斯,1994:第1章)。既然他们看上去不存在阶级区别,没有人能被看作比其他人更文明——那就不可能有单边的贵族同化现象。尽管白人之间存在很大的阶级差异,但所有白人地位都排在所有当地人之上。族性胜过了阶级。教会的弱势不能对这种意识形态提供任何人道上的反对意见。既然土著人没有通过他们的劳动为土地增加价值,他们也就对土地没有权利。既然他们不习惯于农业,大多数殖民者就宣称不能使用他们的劳动力。直到19世纪末因劳动力短缺,殖民者才被迫真正开始尝试使用土著

居民。在此之前,土著人被认为是游手好闲和缺乏大脑,没有钟点时间或地点意识,不能接受劳动纪律。所以土著人不能使用,只能被驱赶。殖民者回应以 B 计划,用武力将他们赶离居留地区——起初叫驱散,即治安性驱逐。

80

它在一开始似乎看上去并不是太残酷,因为这个广袤的大陆对容纳两个种族来似乎足够大了。然而宗主国的工业革命刺激了养羊农场的扩张(为了羊毛),继之是养牛农场(工业化战争意味着在均匀的劣质草地上饲养的牛能够产出用于润滑枪支的硬脂油)。羊和牛吃光了食用草,饮干了水源,毁掉了野生动物。土著人被驱赶至更荒芜的内陆去面对饥饿。他们把土地看作是他们的;他们觉得他们有权享受其产物。他们继续偷取牛、羊和任何他们能够发现的其他东西。有时他们干脆将其破坏,希望能迫使白人离开。偶尔他们也杀害白人。这类抵抗招致了白人呼喊“根除黑魔”的大规模报复。至少有 2 万土著人,也许有更多,在零星的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边疆小型战斗中被殖民者杀死,有些是以肆意屠杀的形式。死掉的白人,其数字大概不超过 200 人。随着驱逐走向野蛮并蜕变为地方性的种族灭绝,这也成为了边疆殖民者的 C 计划。殖民者觉得他们是被土著的抵抗和侵蚀逼到了这一步。殖民者是“自卫”,而在边疆地区,殖民者能够先斩后奏,不需要寻求上级的政治准许,这几乎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风险。

也有过一些种族文化灭绝,尽管疾病不像在西班牙美洲那样是直接杀手。土著往往更多地受害于长期接触。最致命的疾病是社会性的。在边疆地区,白人男子占主要部分,殖民者迫使土著妇女与其发生性关系。出现过少数的通婚现象以及更稳定的事实婚姻,然而更多出现过的是诱拐、强奸和因饥饿引致的卖淫。很快就有了比当地人多出很多的殖民者。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共同阻碍了土著人口的繁殖。年轻的土著妇女被与土著男人隔开,确保更少的纯血统和更多的混血婴儿。性病广泛侵袭了白人定居点边缘的土著人营地,带来了不会使用酒精、营养不良的人口中的身体退化和早死现象。到 19 世纪 50 年代时绝大多数白人认为该种族就要灭绝了。

殖民者的行为与殖民主义管辖者的意图相反。所有总督都宣布了对当地人友好的意向,敦促殖民者为当地人“联合他们的爱”并资助受保护地(保留地)。他们表示要给予当地人英国法律的全面保护。英国人仅允许有限的殖民自治直到世纪中期,而甚至在此之后也一直试图抑制清洗。当不列颠 1889 年同意西澳大利亚建立自治政府时,它试图保留对当地事务的控制权。然而远在地球对面的威斯敏斯特议会不感兴趣,仅给予其有限的资源。殖民者具有事实上的地方控制权,特别是在偏僻的内陆地区。一个西澳大利亚邦土著主要保护人的农场主/金矿矿主提出:“如果政府把眼闭上六个月,让殖民者按自己的方式管理当地人,那将会使抢劫破坏行为停止。”(黑比奇,1988:97)殖民当局缺乏贯彻仁慈保护主义的资金和地方支持。在实践中它不得不将其放弃(马库斯,1994:23—29;罗利,1970:第一部分)。

81

在地方殖民者和当地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军事差异:枪与矛之间,骑马的年轻白人和各年龄层参与的土著家庭之间。殖民者对偷盗牲畜的标准的报复是在晚上包围一个土著营地,黎明时进攻,男人、妇女和儿童一并杀戮。这是专断正义。在一次偷盗事件发生后,一个土著营地被攻破,“男人、妇女和儿童一概被射杀。有些人跳进河里,在准备游走时被射中。他们的尸体随后顺流漂浮经过居留地”。这次偷盗后被查出是一个白人雇员干的(罗利,1970:112—113)。当饥饿的土著人偷取面粉时,殖民者就把有毒的面粉袋子放在那让他们看见。殖民者极少需要叫上士兵来帮助他们弄走土著人。一名昆士兰州的土著说出了土著人的看法:

我们被从我们的土地赶出、射杀、毒死,我们的女儿、姐妹和妻子被从我们身边夺走……在基尔科伊(Kilcoy)毒死了多少人……他们偷了我们过去常从此获取食物的土地,而当我们感到饥饿去取一点面粉或杀一头牛吃时,他们就用枪打死我们,或者把我们毒死。他们为了我们的土地而给予我们的全部,就是一年一条毯子。(转引自罗利,1970:158)

在引进负责任的州之后的日常武装上,殖民者依赖他们自己的地方准军事部队——由地方白人领导,由失去部落的土著组成的当地警察部门。这使得道德罪责能够落在土著人的身上,证实了人们对未开化状态的一些成见。他们的任务是用火枪驱散当地人。有一个官员在审讯期间被问及:“你不认为还有其他的与他们交流的方法了吗,除了向他们射击?”他回答:“是的,我不认为他们能够明白任何东西,除了向他们射击。”(罗利,1970:158—163)这些疯狂的杀人被他们委婉地形容为“驱散”或甚至“与当地人共进野餐”,不像北美洲殖民主义者通常直截了当地承认为“根除”。法庭对当地人没什么实际用处。在19世纪40年代前,他们都被认定是不能明白法律的土著人。然后殖民当局允许土人举证,然而殖民者陪审团照样对其不予理睬。白人几乎从未为他们的暴行而遭审判(马库斯,1994:46—48)。

82

于是在殖民者、传教士和英国政府之间形成了被罗利称为一种紧张三角的关系——殖民者是最强硬派,教士推崇改宗和联合,而英国政府主张妥协。殖民者之间的争端一般由“了解土著人”并总结说“他需要一个有力的帮手”的“专家”决定。社会达尔文主义帮了忙。有一个世界,其中土著的式微是历史的必然:他们没有未来,所以现在除掉他们吧。日后的首相穆尔黑德宣称:

昆士兰现在在做的各个国家都在做……殖民主义者作为白人来到这里并将要消灭黑人……低等种族必须在优越种族面前屈服……尝试和倡导一种穷人能苟延残喘——其存在必然会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明先进面前终止——的行动计划是错误的……黑家伙不得不消失,他们也必须消失……土著种族不值得保存。如果没有了土著那将是一件好事情。(马库斯,1994:36—37)

在远北和内陆的猎人中有大多数的能存活进入到20世纪的纯血统幸存者,尽管更多的混血土著人住在白人居留地的边缘,勉强维

持生活,受人蔑视,还要战胜恶劣的卫生条件、疾病和酗酒。在约1870年后更多集约农业或工业发展起来的地方,幸存者的土人群体找到了一些稳定工作的机会。1900年后旨在“保持种族纯洁”的“白色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让亚洲劳力流失,一些雇主无视工会和劳工党反对,将目光转向土著人。到20世纪初,政策已调整为保护,就是说,隔离——D计划的一种。法律阻止没有官方通行证的土著人进入城镇。有些州具有掌管婚姻的权力,阻止土人相互通婚或不让非纯种人与白人结婚。然而一定程度的人口复兴让大家认识到,土人是不会消亡的。既然大规模杀戮现在是完全不可能了,这个问题就此告一段落。

所以强制性同化(E计划)——一个全球性去殖民化和去激进化的产物——从20世纪40年代直到7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同化被认为是可能的,尽管混血被视为更容易发生的事件;土著只要放弃他们的部落关系和文化就可以成为公民。各州,除了维多利亚之外,都可以让土著人的孩子脱离他们的父母,被放在白人机构或家中的孤儿院里抚养。这个阶段在到了1972年选举产生的高夫·惠特拉姆的劳工党政府上台后才告结束。完全的公民权自此被公开宣布,“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失去的自决权力”得以恢复。土著人现在拥有了完全公民权并拥有了自己的文化及组织的自由,尽管在实践中这样的多元文化主义是与歧视结合在一起的(黑比奇,1988;亨特,1993;马库斯,1994;罗利,1972)。这还远非完美,然而较过去历史相比已是好出许多了。

可是南方的塔斯马尼亚岛未参与这一改善。它的生态环境不同。该岛处处适宜于欧洲小型农业,并且这很早就发生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殖民者拥有充分权力、同时不想使用土著劳力时发生了什么。在1804年他们到达岛上时,岛上大约住有4500名土著人。每一个纯种土著人都在不超过80年时间之内被消灭了。最后一个男人死于1869年,最后一个女人死于1876年。一些混血存活了下来。当场射杀、“打猎宴会”和投毒面粉在这里更为常见。该岛的殖民地当局敦促联合,但在1830年中尉总督亚瑟在立法议会上屈服于

殖民者压力,宣布在全岛发起一场大规模“驱赶”运动,以将余下的2000名土著人集中起来,全部放在保留地上。这是一场失败,因为土著人躲过了追赶他们的人。保留地政策现在被交给当时的“协调员”乔治·鲁宾逊执行,此人一直不带武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并相信他们不会制造威胁。他在土著人当中的影响使他能够将他们集中起来。假如他们是呆在了农场和放羊牧场的边缘,殖民者可能已将他们全部杀光了。然而鲁宾逊的治安性驱逐政策令人哀叹地具有同样的结果。最后的土著人被运送到一个小岛上,挤在一起,几乎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疾病与营养不良在接下来的20年里伴随着白人的漠不关心带走了他们的生命(科克尔,1998:第7章到第11章;休斯,1987:414—424;罗利,1970:43—53;史密斯,1980:70)。塔斯马尼亚是殖民者要求土地不要求劳动力的极端例子。这是一种轮替完成的种族灭绝,其中无任何人特别设计,然而对它的发生,大多数人又都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一个事实上的殖民者民主政体在殖民主义政府屈服放弃的时候成为了施害人。

全澳大利亚都是这样。从19世纪50年代起,殖民者民主政体实际掌控着一切。罗利说:“没有哪个土著民族曾更彻底地听凭典型的殖民者民主政体的支配,这里议会的标准就是殖民者的标准。”(1972:23,72,132,137)清除以许多短期的滚浪似的殖民渗透、抗拒和驱逐的阵势出现——有时继之以突然的、大都没有预谋的种族灭绝性行动。计划采用的语言——A计划、B计划、C计划,等等——在稳定的政治制度建立以前可能对偏远的内陆地区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不合适。这种集合一直持续到劳动力出现短缺,其后是变化中的全球政治和人道主义环境,这些方面迫使决策者采取更多的同化性的以及最终更具多元文化特点的行为举措。

美 国

从几个方面来说,北美殖民化处在澳大利亚和墨西哥情形之间。当地人构成一个中等威胁水平,战斗中令人生畏,运动时坚定不移,

但仅以小团体形式投入战斗。他们的文明水平又似乎低于欧洲人。这里与当地人的贸易比在澳大利亚多,但没有很多东西值得抢劫,像墨西哥那样。既没有出现可怕的初始征服和奴役,也没有出现后来的广泛的被西班牙帝国同化现象。但殖民者对土地的压力表现得与在澳大利亚一样冷酷无情。

这是经累积而发生的,不存在长期的预谋:一种由东向西多次波及全国的种族文化和种族灭绝情况一同出现。早期,殖民者很少,武装较差,像易洛魁人和休伦人这样的民族可以挑动法国人反对英国人。但1763年英国人的胜利结束了东部的地缘政治空间,就像后来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对西班牙人的胜利给西部的影响那样。贸易极少带来可怕的后果。纳什(1992)指出,印第安人通过贸易给人的形象比永久居住地上的印第安人形象要更温和。贸易导致了对当地人的原始但可爱、也许无知有时还很危险的固定看法的形成,但是他们仍然被认为能够迅速接受欧洲人的观念和货物。从事贸易的印第安人同时也有用处,不会被赶走。

但是殖民者中的农场主,而不是商人,最终占了支配地位。他们需要劳力,但他们早期的抓缚印第安人做依附劳动力的企图失败了。这些采猎者荒废了土地;他们没有对其进行改良,无所事事了。从约翰·洛克到当代撵走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人,欧洲人已经论证那些耕种和改良土地的人才有资格享有土地。新大陆于是成了真空住所或未被任何国家并入辖区的区域,一个“没有人的”家或国土,上帝对文明民族的恩赐。他们没怎么准备去使用当地人、把他们改造成基督徒、与他们通婚或从文化上同化他们。清教徒理论上希望改造他们,但感到没有办法这样做,他们有时把自己的惊人暴行——像不顾印第安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死活,放火烧他们的村子——描述为“上帝嘲笑他的敌人”(纳什,1992:84)。

第一次种族灭绝事件出现较早,发生在1622年的弗吉尼亚和1637年皮阔特战争期间的新英格兰。殖民者不断到来,一个十年接一个十年,一浪接着一浪。一些人耕作印第安土地,有的养牛,有的

85

开矿。单单是修建公路、打桩和后来的铁路就吓跑了野生动物。但他们也将野生动物猎杀殆尽,因为城市中无尽的欲望而供售皮肉。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恶化,他们就此死去,即使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幸存者依靠政府提供基本生存物品,但这些是用他们的土地换来的,有时并不合算。殖民者具有政治及军事权力来实现这些可怕的目的,而自己不用冒什么风险。生病的与饥饿的土人被大规模强行驱逐,他们在其传统土地之外的生存机会很小。印第安人拥挤在越来越小的打猎场和保护地上。很多欧洲人意识到这当中包含无情的种族文化灭绝,但他们什么也没做。这激起了一些饥饿和愤怒的勇敢者对殖民者农场的偷袭和偶尔的叛乱。当印第安人反抗时,欧洲人回应以报复——实际是骇人的行为升级。有些人公开倡导种族灭绝。

欧洲人发现了在他们自己和当地人之间文明水平上的差异。当地人不识字,“崇拜神像”、“信仰异教”、“赤身露体”和“肮脏不堪”。在他们来这之前,这是一个“满处野兽和野人”的土地,“一个隐秘和荒芜的旷野”。殖民者能够区分具有不凡气度及军事技术的大平原印第安人与穿着很少的加利福尼亚猎人,后者被描述为“野兽”、“猪”、“狗”、“狼”、“蛇”、“长鼻子猴”和“猩猩”。但归根结底,印第安人是“野人”。神圣的天意以疾病的形式让大家看得很清楚。约翰·温思罗普将1617年的天花流行看作是上帝“减少”土著人口、“为清教徒腾出空间”的做法。威廉·布拉德福德写道:“让印第安人大病缠身和具有这样的死亡率,即1000人中有950人以上死去,是为取悦于上帝。”主的信奉者,他说,只能对“上帝无边的善和旨意”表示感谢(引自纳什,1992:136;斯坦纳德,1992:238)。不管他们对当地人做了什么都可以通过意识形态来辩护。有人说,英国人是受了处理“野蛮的”爱尔兰人的经验的影响,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正如第2章指出的,英国人希望强制同化,不是清除爱尔兰人。但是甚至居住在新大陆的当地人当中也会造成污染——这意味着印第安妇女和儿童也处在危险之中。意识形态本身带有种族灭绝成分。

但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它改变了形式。受从非洲奴隶获得

的经验的影响,给当地人贴的标签从“野蛮”、“异端”或随意与动物的对比,变为种族标签。将种族按不同的生物类型或数千年对气候、生态和疾病的适应程度作科学分类,然后加上一套僵化刻板的腐朽成规把种族与等级制度联起来,把身体、性情和道德因素联在一起,将种族的全部象征符号看作是自然的和上帝给予的(斯梅德利,1993:第4章到第7章)。文明可以习得,但种族是确定的。上帝加上科学强化了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使得欧洲人与印第安人很难和平相处。

反对倾向比在西班牙殖民地弱。英国殖民主义国家往往较殖民者群体更为温和,这部分地是出于帝国竞争时期的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他们想要印第安人作为相互反对的后备士兵,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当局比殖民者更愿意尊重印第安条约。在这一时期,印第安民族实际上能够通过和一个相对成功的欧洲强国结成军事联盟而提高自己的权力和组织水平,就像易洛魁人在北部和克里克人在南部所做的那样。但是在战争沉寂下来之后,获胜的不列颠王国政府对殖民者的控制权已少于西班牙王室。圣公会也不再处于垄断位置。各种教会更加靠近他们服务的白人殖民群体。虽然地方祭司和新教牧师可能比他们的全体教徒更温和,但却没什么权力。正如在澳大利亚一样,他们起的是传教士以下的第二位的人道主义作用,是早期主要的要求同化而不是清除当地人的压力集团。

86

有一个很大的例外: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州的贵格会。他们对印第安人坚定的和平主义态度不仅保护了好几代的地方印第安人,还把从其他受清洗地方逃出来的人带过来。贵格会不能阻止疾病的传播。他们也不能长期保留对他们的地区的政治控制权。最终,大多数印第安人死去。北美也受到世俗启蒙运动的影响。像传教士一样,这类组织希望通过教育让当地人变得文明。印第安人也许是野蛮人,但他们属于同样的人类,拥有理性并经常是高贵、有尊严、勇敢和聪明的,能够适应他们的环境。通过教育他们肯定能够让自己变得尊重私人财产,尊重工作、文化和宗教。这要求印第安人放弃猎人文化、部落秩序和对土地的共同所有制。相互通婚原则上得到鼓励,

但不会有文化妥协,不存在多族性(希恩,1973:10;华莱士,1999)。这将是自愿同化——野蛮人会想要变得文明。华盛顿与杰斐逊总统,几个战争秘书和联邦印第安办事局都在这一同化工程上与传教士和学校紧密合作。他们警告说任何抵抗将遭遇必然的失败,但他们没有准备把同化当作是强制行为。这不受绝大多数殖民者的欢迎,他们反对一切同化。

该项目吸引了一些印第安人,然而这分明地与对印第安人持续不断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相矛盾。既然印第安人了解的殖民者贪婪、剥削和不守信用,逐渐他们就同样以白人给予他们的轻蔑的程度看待白人。同化也不能给他们带来物质利益,直到他们放弃养育了他们的部落集体主义制度。不像墨西哥,大多数北美印第安社会是平等的。首领极少有特权或什么财产会急于通过单边贵族同化来加以保护。种族胜过了阶级。哪个群体都对相互通婚没有太大兴趣。尊贵或重要的殖民者和商人做印第安妇女孩子的父亲,但他们极少让他们合法化。固定的种族间联盟在男子过剩的南方殖民地上的边疆商人和劳动者当中更为常见。混血在印第安人社区被接受,但极少几个想加入白人群体的印第安人或非纯种人,大多数都遭到了拒绝(纳什,1992:280—285)。已经成为私人种植园管理者的切罗基人在19世纪20年代被拒绝,当切罗基人取得永久政治地位时,佐治亚州不愿接受他们。为了驱逐切罗基人,该州竭力游说,1834年它达到了目的(尚帕涅,1992:133,143—146)。

87

到19世纪20年代时,慈善家已开始意识到同化的失败。所以他们转而倡导保护,将印第安人治安性驱逐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新部落地区。他们推断说,这样做,要优于通过土地占取、谋杀和退化手段一步步清除,为同化延迟发生留出时间。但当19世纪30年代期间驱逐行动发生时,它们被证明是致命的。许多印第安人死于途中,幸存者只是给更西面的印第安人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实际是普通的殖民者在他们当地的国家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拒绝与印第安人为邻,不管他们已同化还是未同化。而许多印第安人也不想按提出的条件同化。

最终,在19世纪末出现了对文化压制和隔离同化相结合方式——一个有时被称为“杀掉印第安人,但保留人类”的政策的一些调整。印第安人现在作为一个边缘化的亚阶级被放在外围保护地上接受同化。20世纪早期的这一冷落政策的反讽是,正如霍克西(1984:243—244)指出的,让印第安文化存活了下来,即使在处于赤贫的环境下。借此基础,才有了当前的印第安人复兴。

加利福尼亚受到了更多的西班牙影响,西班牙人在此定居80年,直到1848年被美国征服。但是西班牙政府在这里的势力很弱,只有少数的士兵和管理者保护着几个殖民者和传教士。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的核心机构是加利福尼亚方济各会传教团。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拯救灵魂,但他们还建立了全面的农业社区,以让这类生灵存活下去。他们以高度强制手段,寻求一种仁爱的目的。

弗明·拉休恩神父,一名巴斯克人,15岁就获得圣职。24岁时他是设在墨西哥的方济各会的一名教士,然后在加利福尼亚传教团任职达30年,成为他们的第二负责人。他的意图是仁爱,他想通过改宗与同化拯救印第安人。他知道这很困难。印第安人“没有教育,没有政府、宗教或对权威的尊重,同时他们毫不知耻不加节制地追求所有他们凶残的胃口指示给他们的东西”。他怎么能将“一个野蛮的种族改变成一个人性的、基督教的、文明的和勤奋的社会”?“这只有通过对他们进行去自然化才能完成。显然,这是一项极为艰苦的任务,因为它要求他们采取违背自然的行动。但这任务正在被依靠耐心和不懈的努力而成功地得到实现。”印第安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不同于西班牙的理性的人(*gente de razon*)。当他们处于上帝创造的自然状态时,他们应当宽仁地被当作自由人对待。尽管是野蛮人,但他们不能被剥削,更不能被赶走或杀害。

然而一旦印第安人受了洗礼之后,一切都变了。他们现在是处在秩序的权威的统治之下,而秩序成为了一个牢笼。被迫在田里工作了长时间之后,跟着的是数小时被迫用拉丁语祈祷,他们连一个字也不懂。印第安姑娘晚上被锁在家里。如果印第安人表现出任何独立性,或者拒绝工作或祈祷,他们就被带上镣铐、鞭打,然后被迫背诵

88

更多的拉丁文。如果他们逃走,士兵们会强行把他们带回来,带上镣铐,更多地鞭打他们。有时他们被割掉一只耳朵或在唇上烫上一个烙印。印第安人很难逃脱,因为独立的印第安村子不会接纳他们。在传教团内,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被紧紧地塞在一起,印第安人被迫在营养不足的情况下干重体力活。传教团中的印第安人的骨头比加利福尼亚自由的印第安人小得多,他们逃脱疾病而幸存下来的可能性也小得多(斯坦纳德,1992:138—139)。这些就是表 1.1 中所说的革命性错误——受被放在第一位的对某种价值,亦即韦伯的工具理性信念的追求的驱使,意欲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变迁,结果反而带来了灾难。方济各会完成了地方种族文化灭绝,非故意,然而却是毁灭性的。在传教期间有一半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死去,几乎都是死于疾病,这些人被引入到这个区,又被过多强制劳动并被给予过少食物,他们因此虚弱不堪。

欧洲旅行者说他们看上去淡漠,没有目的,没有希望。乔治·辛普森爵士以前曾是哈得孙湾公司的负责人,在这里他对地方印第安人表示了仁爱,并鼓励他们与他的雇员通婚。但 1841 年他在加利福尼亚指出:“这类结合的子女——很多人精神上过于哀伤以至于甚至不想结婚——人数上减少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他们肯定很快就会从他们父辈的土地上消失,这样一种结果,似乎不约而同地会从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明部门中产生,这些最终要归于神秘上苍的不可言说的智慧。”(拉·佩劳斯,1989:18—19;帕迪森,1999:249—250)甚至这个温和的白人也将其最终结果理解为神圣的天意。实际上方济各会就是 18 世纪的毛派主义者,意图改善世界,但结果却造成对它的大破坏。

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牧场主更讲究实用。被剥夺的印第安人可以作为自由劳工参加劳动。他们通婚更多,同时谋杀则远远要少。西班牙人的计划是将对剩余印第安群体的隔离和强制同化集合起来。在墨西哥 1821 年从西班牙获得独立之后,事情似乎开始有进一步改善迹象。新的墨西哥政府受启蒙运动观念影响,1826 年公开宣布解放大多数传教团中的印第安人,1833 年传教团被世俗化,它们

一半的土地分配给了印第安人。不幸的是,一个遥远国家的仁爱被穷凶极恶的地方殖民者官员破坏了,后者自己攫取了大部分土地——又回到殖民者民主(菲利普,1975:第2章)。然而,在这时,新一批的移民几乎都是盎格鲁人。1848年他们从墨西哥手里夺去了加利福尼亚,使它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州。这使蓄意杀戮发生率确定无疑地显著上升了。

大多数土著的死亡仍然不是来自谋杀。虽然我们缺乏准确的数字,但最大的杀手是疾病。在加利福尼亚,疾病、营养不良和饥饿等相互联系的原因类型导致大约60%—80%的土人死亡,直接杀死的约占10%,其余大多数要归于生育失败致死。蓄意杀戮通常是因为冷血或在一种非均势力量到了非得应用谋杀才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才发生。但是以上类型中没有一个是能够完全与另一个相互分开。营养不良、饥饿和低生育率经常是可以预料的,来自于殖民政策,而疾病也不全是偶然的。疾病在营养不良的土人被塞在一起的地方传播得最快,就像在加利福尼亚传教团和位于边缘地带的许多美国印第安保护地中的情况那样。殖民者并非不知道那里包含的病毒机制,然而他们极少采取针对流行病的措施,而他们自己对它是有免疫力的。他们也不是不满足于结果。纳什(1992:300—301)比较了白人对疾病在印第安人中的传播和疾病在黑人奴隶中的传播的反应。因为奴隶很珍贵,白人世界试图阻击奴隶中的流行病。奴隶被注射了防天花疫苗。印第安人没有。事实上,有些殖民者还故意引起疾病。有关将带病的毯子送给印第安人的报道臭名远扬,尽管极少。

更重要的是(如在澳大利亚)性别虐待和疾病。印第安妇女被强奸或因贫困走向卖淫。所以她们传播着性病,这对印第安人要比对白人致命得多。没有人采取什么控制措施。酗酒使印第安男人堕落并让他们送了命。然而尽管政府机构及传教士尝试了控制办法,殖民者仍照样按习惯将酒作为支付印第安土地和劳力的报酬。其缺乏人性是再明显不过了。他们要么有意造成印第安人死亡,要么对因他们自己(指殖民者)的行为导致的死亡欣然接受或无动于衷。印第安人出生率灾难性的下降也是由殖民者的性行为引起的。在1848

年到 1860 年间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口从 15 万下降到 3.1 万,而白人人口从 2.5 万上升到 35 万。1860 年家庭普查数据显示,印第安人口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迫使印第安两性隔离造成的。年轻的印第安男子幸存者能够仅为糊口而工作,而数量更多的年轻的印第安妇女能够生育孩子——但是要与白人。年轻印第安男人和印第安妇女不能住在一起从而生育印第安人。对人口繁殖的最后一击出现在 19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期间大量涌进的盎格鲁矿业主要求所有妇女参加工作。矿区的印第安男子现在更可能被根除而不是受雇用(赫塔多,1994)。

90

谁造成了这致命的乱局? 让我们先考察一下政治精英。英国殖民政府以及之后的美国联邦政府一开始准备施行有限驱逐加部分同化的 A 计划,将一些印第安人转移,使所有人皈依基督教以及维持阻止完全同化的种族障碍。面对进一步的大批移民的浪潮,美国开始转向强行驱逐结合以保留地作为隔离的 B 计划。其在理论上来说对印第安人生命与文化的再生是足够的。但在联邦政府与最高法院通常更倾向于安抚和人道的同时,边疆地区的州/地方政府则更加照顾殖民者的利益。法院最终承认合法构成的印第安政府可以凭最高权力就他们的土地订立条约。差异随着时间增大,此时东部联邦政府政治家依赖于印第安人不再占突出地位的选举人团,因此在与土人的关系上他们能够维持一种公正开明的态度。联邦政府早就成立了一个印第安事务局。它的官员不得不执行官方政策,但他们在应用时经常采取相对人性化的方式。有些地方印第安人执行官挪用局里资金及物资供自己所用,确实败坏了与殖民者及商人的关系往来,并且一般来说是他们主动出卖了印第安人(尼科尔斯,1978:10—19)。然而绝大多数高层执行官员在为节制进行游说。

边疆地区选出的州一级官员往往更加极端。土地蚕食和抵抗的循环驱使他们制定更加严密的政策。在 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南方立法机构成功地迫使通过了驱逐出境政策,而不管印第安人在到达终点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极少有地方政治家支持赠送土地或税款,以使得印第安人在被驱逐后的隔离保留地上的生存能够得到维

持。他们逐渐相信驱逐,伴随根除主义的言辞,将能够使它们二次当选,而呼吁宽容和保护,特别是纳税人给予保留地补贴或赠送土地给印第安人,则不能。殖民的民主制度又一次成为坏消息。

这在加利福尼亚表现得很清楚。加州 1850 年的宪法确保了白人男子普选权,当时年代最先进的民主制形式。但它同时授权对任何逃离保留地或被发现四处游荡的印第安人强行留置或永远作为契约劳工。立法院授权殖民者民兵组织执行召集点名任务,1850 年和 1851 年支付他们 110 万美元。既然小面积且处于边缘的保留地不能养活按预定要驱逐至此的印第安人口,实际中民兵们就杀死了与他们驱逐的人数一样多的印第安人。立法院从未提出反对。加利福尼亚立法院和加利福尼亚国会代表阻止了总统与印第安事务局几次试图向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提出订立非正式条约的意向,包括赠送大量土地,加上补贴与帮助其改善的技术援助。加利福尼亚立法院实际上反对承认任何印第安人对本州土地的权利。但之后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如此强硬的最终后果,因为已经没有更向西的、可将印第安人打发到那里去的地方。

91

已拒绝走通过留足足够保留地而达成协调路径的州长伯内特,现在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局面。殖民者人数很少,武装又差。他们对印第安人土地持续不断的侵蚀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抗。而到目前为止一直组织松散的印第安群体正在把更多的权力转交给战争首领(菲利普,1975:第3章到第5章)。印第安人的威胁好像正在增大。伯内特的回应不是协调,而是升级到种族灭绝。他宣布“一场根除战争将在两个种族之间继续直到印第安人灭绝”。他的继任者,麦克杜格尔州长,对此表示同意:战争“必须也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对许多部落的根除战争”(赫塔多,1988:134—136)。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从未敢发表像这两位加利福尼亚州长这样公然公开的根除主义言论。他知道绝大多数德国人是不会同意的,而他们两位州长以为绝大多数(白人)加利福尼亚人会同意;所以他们留下了“确凿证据”,希特勒没有。下一任州长毕格乐,也未比前任好过多少。他写信给军队表达他对印第安人的观点:

这些野蛮人的行为有时以一种相当于食人族的凶残而出名……他们似乎对白人怀有一种本能的仇恨,而这是出自他们的天性的原则,时间或命运都不会损害它。这种仇恨原则是遗传的……这些印第安人的性格与行为意味着白人与印第安人无法和平近处。

毕格乐在信结尾时请求军队把所有印第安人从四个县中清空。弄到哪里去,他没有讲。但他提出请加利福尼亚民兵帮忙(海泽,1993:189—191)。

在边疆州许多政治家、殖民者和他们的媒体都是此类腔调。明尼苏达州长拉姆齐宣称:“苏族印第安人必须被根除或永远赶出州边界以外。”这成了一个流行的口号:“要么根除要么驱逐。”他的民兵指挥官是西布莉将军,一位以诈骗印第安人和联邦政府闻名的前皮货商。他发起了一次成功的针对苏族桑蒂人*的根除战争。共计有770名幸存的桑蒂人在1863年被从圣保罗来的气垫船拉走。明尼苏达白人立在河堤排成一线,朝印第安人投掷石块,诅咒谩骂(布朗,1970:50—65)。科罗拉多州长也差不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得到了丹佛出版社的支持,在1863年间,该出版社的27篇印第安人报道当中有就10篇公开倡导根除(丘吉尔,1997:172)。为回应1871年印第安人盗走马牛、杀死四个白人的两次偷袭,一个由两名最重要的图森公民领导的团体袭击了一个与偷袭毫无瓜葛的阿帕切人**村子。他们屠杀了144个阿帕切人,其中只有八个是男性。许多女性受害人是被先奸后杀。丹佛新闻社祝贺杀人者,评论说:“我们仅遗憾数字没有加倍。”一阵在东面出现的激愤致使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将这次暴行描述为“纯粹的谋杀”,并施加压力将首犯交付审判。

* Santee Sioux, Sioux 是苏族印第安人,又称苏人;Santee 是苏族印第安人联盟的一个分支。

** Apache, 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部落。

法庭上大量控告证据被呈示出来。陪审团在花了19分钟考虑之后宣布他们无罪(布朗,1970:202—205;科克尔,1998:220—221)。陪审团几乎从未真的认为杀害印第安的人有罪,因为他们是由地方殖民者组成,而在大多数州,印第安人的证词不被作为不利于白人的证据(关于加利福尼亚方面,见海泽,1993:11—14)。

联邦政府与军队经常保护印第安人,而传教士大声抗议,就像一些殖民者和几个地方政治家和几家报纸已在抗议的那样。可如果印第安人反抗并杀死白人男子或妇女的话,则几乎白人中所有的分歧都可以弥合。几个在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边界的莫多克(Modoc)部落的印第安人用计诱使坎比将军参加一次谈判会议并杀了他。这之后是全国一片要求报仇的声音,对此威廉·特库姆塞·舍曼将军设法表示了意见。他要求不仅杀掉肇事者小集团而且要屠杀与驱散整个部落“以便莫多克的名字从此消失”。在拉科塔苏族(Lakota)印第安人举行反叛并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杀死了80名美国士兵之后,舍曼将军又设法表示了意见。他写道:“我们必须怀着一种报复性的热诚与苏人作斗争,直至他们被根除:男人、妇女和儿童。”1876年在小比格霍恩河* 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死引来了同样的全国性声讨。之后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战争,所有苏人土地被剥夺,1881年,坐牛** 最终投降(厄特利,1994)。

印第安人对公正开明的总统抗拒驱使他们接受C计划,如果他们不接受驱逐出境就将面临种族灭绝。看一看20世纪前最著名的五位总统。当印第安人与英国人站在一起时,华盛顿和杰斐逊就忘记了启蒙运动。华盛顿指使他的将军向易洛魁人进攻并“踏平所有居住地,一直到该地不仅是被占领而且是被摧毁”,以及不要“在全部毁灭他们的居住地实现之前去听和平的序曲”。他把印第安人比作狼,“都是食肉兽,尽管形状不同”。他宣布印第安人必须被赶到密西

* Little Bighorn, 1876年6月25日美国陆军中校卡斯特率领的军队与一群大草原印第安人在这里发生战斗,前者全部被杀。

** Sitting Bull, 19世纪美国达科他州印第安人首领的绰号。

西比河以西,任何剩下的都必须以武力消除。杰斐逊在印第安战争期间也改变了声调。他几次重复建议要么彻底摧毁敌意部落,要么将其驱至密西西比河以外:“没有比彻底压制他们的野蛮不敬和残忍行径更好的事了”;“而眼下就是赶走他们的季节”;他们“凶残的野蛮行为就是根除他们的理由”;“如果任何时候我们不得不对任何部落举起斧头,我们将不会将其放下,直到该部落被根除或赶离密西西比河……战争中,他们会杀死一些我们的人;而我们将灭其全部。”1813年,他以为被击败的克里克人会“在将他们迁至密西西比河以外的我们为他们安排的定居点的条件下屈服”。无论华盛顿还是杰斐逊都从未用根除主义的语言谈论过进入文明状态的英国敌人。杰斐逊还支持白人攫取土地。在其任总统期间,有20万平方公里的印第安土地被他的执行官夺得。方法,他告诉他的官员,是用计使他们负债,迫使他们卖出他们的土地。随着剩下用于打猎的土地不足,他们将不得不学种农业,然后被同化。如果他们抗拒,他们就必须被镇压;如果他们只是变消瘦,然后饿死,那就证明了他们不可避免的覆灭命运。他喜欢的政策是同化,然后驱逐,但如果这两者失败,则根除就可能跟着而来。杰斐逊还说他相信印第安人(不像黑人)与白人内在的种族平等地位(华莱士,1999:78),但高级文明必须战胜低级文明。虽然今天许多的美国人知道两位总统都蓄奴,然而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凶残则极少有人知晓。

安德鲁·杰克逊留下了一个较模糊的声名。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投票权被延及所有白人男子,然而他却是以一名印第安人杀手著称。修正的观点认为杰克逊只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家,针对南方州立法院驱逐令的压力,准备帮助印第安人反对白人强占土地和其他非公正剥夺行为,但最后承认驱逐最终是唯一保护印第安人不受白人侵害的方式(普鲁查,1994)。这是粉饰。当印第安人抗拒时,杰克逊凶相毕露。当一名白人妇女被克里克人抓作俘虏时,他宣布,“我将深入到克里克镇中,直到俘虏以及抓她的人被交出来;我认为我应当踏平他们的村庄,烧毁他们的房屋,杀掉他们的战士,抓捕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直到我确实让他们交出俘虏,以及抓人的人。”普鲁

查(212)对这样的观念作如下评述：“明确直率，表述有力，他对有敌意的印第安人采取了一种直截了当的政策。”这套用词使我想起我们在由高级官员写的更近时期的种族灭绝的党卫军档案中发现的委婉用语。“表述有力”(hard-hitting)没有表达清楚他在施行大规模屠杀的意思。杰克逊在其他场合控诉“擅长骗术”和“没有同情心的野蛮人”——“我们被谋杀的同胞的血必须要偿还。盗匪应该从地球上被扫除干净”。他吹嘘说：“我已保存了我在所有场合杀掉的人的头皮。”原则上他认为“与印第安人相处恐惧要比爱好”。他敦促他的士兵杀死妇女和儿童。不这样做就相当于追赶“一头在岗上的狼而不首先知道它的洞穴和狼崽在哪里”。印第安战争是所有这些表述的背景，它们帮助了他成为总统。一旦上任，杰克逊就撕毁了印第安条约并发起强行驱逐行动。他声称他的1830年清除法案是一种宽容行为，而1万名克里克人，4000名切罗基人和4000名乔克托人在恶名昭彰的眼泪小道(Trail of Tears)上死去了。

林肯卷入印第安事务的时间少得多(本段参见尼科尔斯,1978: 3,76—128,187)。作为一名年轻的政治家,他运用他在黑鹰战争*中的军事经验去塑造一位对抗印第安人的战士形象,同时他赞美扎卡里·泰勒原始的军事才能和温菲尔德·斯科特对切罗基人的驱逐行动。不过在他任总统期间,印第安人只是一个枝节问题了。他要面对的只是一个重大决定。他曾批准了军事远征和明尼苏达的土地强占。这激起1862年的苏人起义,军队进行了镇压,抓获了309名叛乱者。他需要决定是否批准对他们的处决。地方人士和州长拉姆齐大肆叫嚷处决所有309人,因为白人难道不是在起义中被杀死和遭强奸了吗?林肯受到来自根除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两面的竭力游说。他看上去似乎已经开始更同情后者了,然而(如其一贯地)林肯妥协了,同意仅仅处决39名印第安人。这未让任何一方满意,但化解了局势。他很高兴摆脱了这件事,他自己将其描述为一个“令人不

94

* Black Hawk War,1832年美国与印第安人索克部落和福克斯部落集团在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发生的武装冲突,结果是美国政府攫取了大片土地。

快的课题”。但它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处决,而对其中每一位俘虏的不利证据都嫌不足。几乎所有其他的俘虏不久就因为恶劣的监狱环境而死去。但是林肯的所为确实使他成为总统当中相对温和的一位,尽管他同样持有普遍的看法,即印第安人将在一个优越的白人文明面前消失。正如他 1863 年不够慎重地对一个来自白宫的部落代表讲的:

白种人人数量众多又很富裕,因为他们开垦土地,生产面包,依赖地球的产物而不是野生动物来维持生存。这是差异的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个……我们,作为一个种族,不像我们的红种兄弟那样,天生喜欢相互争斗和厮杀。(尼科尔斯,1978:187)

在 1863 年间出现了一场白人之间的激烈内战!事实是白种人更可能相互杀戮以及杀害他们的红种兄弟。

在 19 世纪末,当轮番的种族灭绝几乎已结束的时候,第五个伟大的民主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已不再需要为它增添什么了。印第安人几乎消失了。不过他确实宣称根除“最终是有益的,正如它不可避免”,以及在所有战争中最高贵的就是对野蛮人的根除战争。“我还不至于过分到认为唯一的好印第安人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但是我相信十个中有九个是,同时我不想对第十位的情况了解得太细。”〔1〕总统们,尤其是更民主的重视其选民需要的总统,能够体现一种自负的帝国种族主义精神,它助使政策越过傲戒性压制(镇压)——它依然是一个最终的实用政策——走向种族灭绝。因为镇压印第安人的抵抗以及抢占土地被视为正当,导致他们会受到这样的诱惑。这些总统中有多少在今天会因为种族灭绝而受到国际战犯法庭起诉?四个,我认为——除了罗斯福,他的言辞没有配合以行动——尽管林肯的判决会较轻。

95

〔1〕 这些对总统讲话的引用来自希恩(1973:206,209,244)、斯坦纳德(1992:119—122,245—246)、华莱士(1999:65,235—238)和科克尔(1998:206)。

在边疆从普通的殖民者当中产生了大多数的实际杀人者,他们怎么样?因为清洗在新的殖民区域是以较小的一阵一阵势头出现的,每个殖民群体只是必须要剥夺一些当地人的权利以便得到期望的土地。然后下一波地方清洗可能会是由其他人干的,然后再到下一波,一直到地方清洗全部完成。这整个过程可能要花5年至50年的时间,它的暴力与谋杀会根据白人和印第安人相对数量的多少、抢占土地的快捷程度以及印第安人的抵抗能力而变动很大。在任何一次中,只有几个欧洲人抢占土地,而被谋杀的人更少。随后的数代人经历的只有和平,因为印第安人已被击败和迁往其他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在殖民者当中形成严密的计划,无论A、B或C,都不是真正合适的,因为地方特殊性、高度制度化的地方州的数量不足以及他们自己的贪婪和意识形态都会驱使他们快速考虑各种不同的清洗方法。之后他们就可以作为爱好和平的美国人定居下来。他们的子女没有污点。只有几个地方上的创始人才与种族灭绝有关。

杀人者通常用自卫或报复作为先前对印第安人犯下的暴行的辩护理由。然而这实际上是升级行为。当一个印第安人为了他的妻子被强奸而强烈报复,或在快饿死时去偷了一头牛或一匹马,自觉正义的殖民者升级行动就开始了。一位加利福尼亚农民作证说:“我相信他们每杀死一头牛就有10到15个印第安人被杀。”远离实际边疆的圣弗朗西斯科《公报》,代表了加利福尼亚节制派的声音,倡导保护,亦即人性化隔离,而不是根除。《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一个叫麦克尔罗伊的人的社论,这人的一头鹿被偷走了。他以杀死一个印第安男人和他的印第安妻子以及又弄伤第三个人作为报复。然后因为印第安人也进行报复,麦克尔罗伊被杀。但是一个白人男子的死亡把加利福尼亚民兵带了进来。他们找到一个印第安营地,杀死9个印第安男人(其余逃掉了),然后屠杀了40名毫无防卫能力的妇女和孩子。这份报纸在另外一次还报道了一个36人组成的民兵分队在寻找杀死一名白人的杀人者时发现了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子,杀死了该村除两三个人以外的所有150名居民——男人、妇女和孩子。另一个军队编制的上尉得意地写道:“杀掉的人数我自信地报告不低于

75名,而对它事实上达到了将近这一数字的双倍我也几乎毫不怀疑。”一名具有不同认识的上尉批评一名认为一个印第安人偷了他的牛而杀死两三个印第安人的牧场主。第二天,牛找到了。印第安人随后为他们死去的亲友报仇,杀死了牧场主。上尉现正试图阻止进一步升级(海泽,1993:42—43,63—79,84—90,95—97,156—157,245,249—250)。

96

报复行动包含对周围所有的印第安人的怪罪。三名密苏里州白人他们说他们将射杀他们碰到的第一群印第安人,因为印第安人偷了他们的马。一位更有反省能力的殖民者评论说:“这种为其一个成员的行为而报复整个种族的不审慎行为导致了所发生的冲突中的一半。”(麦迪逊,1994:316)印第安人会做同样的事。报复是相互的,各方都否认是自己先采取了暴力。但白人更加可能使杀戮升级,他们不大加以分辨的杀戮与他们所宣称的目标自相矛盾,因为这疏远了更多的印第安人。要么暴怒战胜了理智,要么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完全的根除。白人升级行为占大多数,不仅是因为他们优越的武器和组织能力,这还因为优越、更文明的团体更会因来自底层野蛮人暴力抗拒而产生情绪上的不快,同时一种受意识形态诱导的、殖民者经常在面临“野蛮”“不洁”的印第安人时会体验到的“道德震颤”又使之变得更加严重。他们的世界似乎颠倒过来了,引起恐惧、惊慌和与实际威胁不相符的镇压——正如我们从被引述的总统以及将要在所有一边倒的谋杀性清洗中看到的。毋庸置疑,清除印第安人在选举中会受到欢迎。没有类似于那些寻求废黜黑人奴隶制的抗议组织,直到19世纪80年代印第安权利组织形成——太迟了以至于救不了太多人。

清洗中的军事权力由军队与殖民者民兵组织共享。军队因其优越武器和通讯条件能够杀死远远更多的印第安人。它含有多种多样的观念。它受命维持和平,阻止印第安人偷袭,镇压印第安人起义和执行迁往居留地的驱逐行动。有多种战术伴随这些目标。占主导地位的A计划是一个综合的胡萝卜加大棒战略:通过谈判形成治安性驱逐至被隔离的保留地的条约,结合对那些不愿意谈判的印第安人的儆戒性镇压。在运用这一政策过程中,地方军队单位有时站在

印第安人一边反对殖民者。加利福尼亚的档案记录里面记满了军队军官抗议对地方印第安人实行清洗的材料。为了保护他们,有些军官将他们的枪瞄准殖民者,而不是印第安人;有些人给予印第安人军队食品津贴或用他们自己的积蓄为他们购买必需品(海泽,1993)。在西南部,克鲁克将军对阿帕切人等其他部落采取实用主义,有时是调停行动,喜欢谈判胜过战斗。其他将军早先在其他地方也这样做过。

然而内战之后,军队制定了B计划,升级了在战争期间学会的残酷无情战术,偶尔还进一步滑向针对大草原印第安人、阿帕切人以及其他的更可怕的好战民族的地方灭绝的C计划。舍曼是军队总参谋,谢里登是大草原军队司令。舍曼1866年向秘书解释他的战术:

我的观点是,如果有50个印第安人被允许留在阿肯色和普拉特之间,我们将不得不要保卫每一个中途站、每一列火车和所有铁路作业队……50个有敌意的印第安人将牵住我们3000名士兵,不如尽早把他们赶走,(至于)他们是被印第安监察委员会成员骗出去还是被杀掉则没什么区别。(布朗,1970:157—158)

97

印第安人精于小规模流动作战,分散军队会正中印第安人下怀。所以将军试图趁印第安人在他们冬天居住的村子歇息的时候攻击他们。这样勇士们将被迫站出来为保护他们的妇女、孩子和财产而战斗。军队相信它的火力将会赢得阵地战的胜利(厄特利,1994)。而火力将会被引向企图从他们的村子逃走的成群的男人、妇女和孩子。如果他们成功逃脱,他们就失去一切所有,而这将毁了他们在这土地上生存下去的能力。如果逃跑失败,他们将一起死去。舍曼的下级,桑伯恩将军,为这种种族灭绝战术感到震惊。他写信给内政部秘书,宣称:

对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强大国家,现在与几个零星松散的游牧民族进行战争,又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一个最损颜面的奇观,

是无与伦比的非正义,是最令人憎恶的国家性犯罪,早晚会有一天,其必然会为我们或我们的子孙招来上天的惩戒。

但是谢里登将军直接称这些战术的批评家为“善良虔诚的牧师……是那些毫不留情地谋杀男人、妇女和孩子的野蛮人的帮凶和教唆犯”。这是对报复的辩护。谢里登在一次几个科曼切人* 前来投降的著名交流会上把他的意思表达得还要清楚。科曼切人的首领用他知道的仅有的蹩脚英语向谢里登介绍自己:“Tosawi,好印第安人。”谢里登回答:“我所见过的唯一的好印第安人是已经死了的印第安人。”谢里登发明的这句话已在西部家喻户晓。在被复述时,他的句子成为臭名昭著的“唯一的好印第安人是一个已死了的印第安人”(布朗,1970:157—158,170—171)。舍曼和谢里登依然在指挥印第安战争。没有出现天谴,他们的政策依然受到边疆的殖民者和政治家欢迎,他们成功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军事战术的变化在谋杀性种族清洗中很常见。它或许以敌人的初始仇恨为前提,但它也有自己的战术逻辑。它会产生于剥夺由非战斗人员提供的敌人的供应基地的需要,或打击已混入平民队伍的游击队的需要。两者在19世纪大平原印第安战争中都很突出。勇士并没穿着特别的制服,因此任何印第安男子都有可能充满敌意。为保险起见,最好把他们全部杀光。但战术变化还来自于将敌人锁定在位于男人、妇女和孩子混在一起之场所的固定地点的防御(阵地防御)之战术需要。最坏时,这样的战术诱导能使儆戒性镇压滑向种族灭绝——就像他们在这里所干的。

98

然而殖民者民兵组织凭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资助,成为了一个更加日常性的种族灭绝推进力量。他们是非全日制的自愿部队,领一份工资,有时以赏头皮的形式。“我的打算是杀掉所有我遇到的印第安人。”上校奇文顿,一位前循道宗** 牧师和科罗拉多第三民兵营营

* Commanche,疑为 Comanche 之误。

** Methodist,基督教的一宗,在英国称循道公会,在美国称卫理公会。

长说。他力劝他的手下“杀光剥光,无论大小”。“小”指孩子,因为如他所说,“虱子卵会变成虱子”。一位军官试图说服科罗拉多州长埃文斯与印第安人谈判。“然而若我达成和平,我拿科罗拉多第三民兵营怎么办?”州长回答。“他们已被召集来杀印第安人,他们就必须杀印第安人。”1864年在桑德河(Sand Creek)他们干了。奇文顿的部队杀了105名印第安妇女和儿童及28个男人,他们的身体后来被肢解。有人看见男民兵带走了用女性处女膜和其他部分做成的战利品。奇文顿的行为邪恶而且愚蠢,因为他毁掉了大多数夏延人和阿拉帕霍人(Arapaho)首领的权力,后者一直在敦促与白人实现和平(布朗,1970:86—93;斯坦纳德,1992:171—174)。这不只是做戒性镇压了,它是地方种族灭绝的一种尝试举动。有些批评家试图把奇文顿和他的州长交付审判,但未能成功。奇文顿依然是丹佛的英雄。

华莱士(199:218)评论说殖民者们是民兵组织,所以对任何反对他们的理想政治家都加以警告。武装巡逻兵、民兵和牧场部队把他们自己称作“拿着武器的自由民族”,自愿者根据技术成为放牧者和猎人。东部民兵领导人征召“有经验的森林工人”,西部招“抗击印第安的战士”,有些人是职业杀手。科克尔(1998:187—188)叙述了“休格富特·杰克”——一个全球范围的杀手——的成长经历。他还是个男孩时被从英格兰送到塔斯马尼亚,他在那里杀害土著。然后他作为一名暴力民兵成员出现在加利福尼亚,最后变成亚利桑那州的一个专杀阿帕切人婴儿的变态杀手。

这是少数美国的人道主义者和历史学家百年来一直试图公开的可怕故事。与奴隶的后代不一样,被谋杀的美国土著的后代寥寥无几,且都被边缘化了。种族灭绝是种成就。正如根除主义者声称的,从土著民族的清除当中,一个新的文明诞生了。这就是更加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家讲故事的方式。希特勒和希姆莱在思考他们自己的种族灭绝(途径)时都把美国的种族灭绝例子作为参考。

更近的殖民主义清洗：高加索地区与西南非洲

99

殖民主义清洗不能永远进行下去。到 20 世纪,受影响最严重的殖民地上的土著民族日渐消失,土地成为殖民居住区。第一批新的国家会忘记他们的起源,而以他们独特的与世无争的德行欺骗他们自己。然而后来者如俄罗斯、德国和意大利则又犯下暴行。在第 10 章我会讨论最后的案例,在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这里我想讨论在高加索地区的俄罗斯和在西南非洲(今天的纳米比亚)的德国的表现。

进入 19 世纪末,我们突然发现殖民主义国家中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现代国家与现代军队。俄国殖民主义扩张还以横跨大陆为特色,因为它的统治覆盖到整个亚洲。俄国人成百万地往新征服的地区上定居,引起了另一场俄国人与当地人之间以土地为中心的经济冲突,最终导致后者权利被剥夺。俄国人用通常的文明与野蛮的两分法从意识形态上对此进行辩护。哈萨克人与其他游牧民族是在“浪费”土地,因而必须让位于更优越的俄国农民文化。一位驻高加索的俄国总督宣称:“温和,在亚细亚人眼里,是软弱的标志,而出于纯粹的人道,我是毫不留情地严厉。一项处决可使数百名俄国人免于毁灭,使数千名穆斯林免于叛国。”

一般的俄国政策就是儆戒性镇压:对那些反抗的人显示凶残以便说服其他人更听话地屈服。该政策最坏时是对车臣人,这些顽强的山地战士经 19 世纪 50 年代末残酷的战争之后终于归在(不稳定的)俄国统治之下。但西高加索的突厥民族,特别是切尔克斯人,被认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文明程度甚至更低,被分成了若干小的氏族。有很多的小规模游击队抵抗运动,但没有一个能够签订和平条约。他们还居住在高加索的一个更具战略性的地方,靠近奥斯曼帝国;他们是穆斯林,而奥斯曼人支持他们反对基督教俄国。

俄国军队偶然找到了解决方案[由霍尔奎斯特(2003)、利文(2000:304—315)、申菲尔德(1999)等描述]。俄国总指挥部受到当

时针对整个民族的系统性、“确定性”战争理念的影响,不顾一切地进行现代化以便不被其欧洲竞争对手甩在后面。收集关于这些民族的统计数据是当务之急,指挥部官员开始以据称是仔细的人数计算与后勤准备为基础开始有组织的驱逐。当他们的名人米柳京成为1862年战争部长时,他迅速推行这一政策,接下来的三年里军队攻打并焚烧了主要的切尔克斯村庄,杀死所有抗拒的人,逼使人口离开。该政策被公开宣布是减少人口,不是根除。截至1865年,主要遭攻击地区的50万左右的切尔克斯人中只有大约10%的人还在那里。总体上,估计有150万切尔克斯人被赶出,而代之以俄国的移民。估计有15万切尔克斯人被重新在俄国各地安置,50万被赶出,强行驱逐,越过边界进入奥斯曼帝国。

还剩下约有100万人不知去向。其中大多数很可能死了,估计要占到切尔克斯总人口的一半。绝大多数人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谋杀性清洗当然是故意的,但不是种族灭绝。俄国军队烧毁村子和庄稼,把人口赶到马路上,明知许多人会死去。受到震惊的俄国人对此表示抗议,但被告知说,已经太晚了。“真的有任何人能挽回伤亡吗?”叶夫多基莫夫伯爵对一位批评家说。俄国当局已曾在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高加索地区针对其他制造麻烦的“原始”民族实行过残酷无情的战争和傲戒性镇压,但这次更严重。

本例结合了帝国傲戒性镇压、近代军事主义和近代殖民主义早期的一些最坏的特点。但是,它并不适用我的第一个论点。尽管我对俄国殖民者缺乏真实证据,然而主要的施害人似乎是接受了军队高级指挥部——许多年以来保持威权主义的机构——劝告的沙皇国家。这看上去像是一个具有现代、精确和科学特色的军国主义在从其他方面上看是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谋杀性清洗的事件上面加上了它自己印记的个案。我们不久就将看到另一个这样的例子。然而它是一种对主权的争夺,一个外部的盟友增加了弱势一方的抵抗决心,所以我的第4个和第5个论点在此适用。我还注意到一个结果,它在下一章中将被证明是有影响的。它让超过50岁的切尔克斯人、车臣人和其他穆斯林作为异常痛苦的难民留在奥斯曼帝国。

在西南非洲,我能够再一次指出三种主要的角色类型。第一个是意识形态的,这里主要指莱茵兰传信会(Rhineland Missionary Society)。截至1904年,它是最温和的角色,赞成将殖民化作为将当地人基督教化的机会,换言之,也就是部分同化他们的机会。它不赞成除了机构同化以外的方法。它反对德意志1904年至1905年的暴行,并给柏林施压让其阻止它们。这一主张受到德意志议会,即帝国议会(Reichstag)中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代表的支持。他们在这里只是少数派,但他们的人道主义呼声让德意志政府感到尴尬,这最终影响了政策变化。

第二个角色,夹在中间派的和经常派系化的两者中间,是殖民地中负责向柏林殖民地部报告的殖民地当局。它处于首相和皇帝双重领导之下。皇帝保留对外交政策的权力,指挥独立于帝国议会之外的武装力量。因为皇帝不是一个强力统治者,军队指挥们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这就将对1904年的事件造成升级性的影响。地方当局管理者试图让殖民地保持安定和慢慢扩张——两个难以协调的目标。地方当局准备与部落集体中听话的领导分享某些权力。这一被保护地的形式,不是一个直接的殖民地,体现了一定的间接统治特点。德国政府还想让非洲人作为顺从的劳力参加劳动,并曾给予他们法律上的——尽管不是政治上的——权利。这是一种官方的歧视政策,甚至是部分的隔离,但伴随着一些保护措施。它从未指向谋杀性清洗。不过,同时发生的致力于鼓励更多白人移民的政策导致更多的土地剥夺、治安性驱逐当地人以及反抗。

西奥多·洛伊温少校,1894年到1904年间保护地的总督,很小心地不去刺激当地人。他意识到深层次的冲突,谁应该拥有土地的问题,对第二大部落群体和绝对最大的养牛户赫雷罗人*尤其关系重大,他们需要非常广阔的牧场放牧。随着白人殖民者的扩张,他们要求那些土地中最好的土地。他们通过结合武力、诈骗性的条约和恶意运用信贷,划去部分土地作为支付被认定的土人债务等手段而

* Herero,西南非洲班图语系族群。

得到了更多。种族纷争是常年性的。洛伊温试图通过对各非洲部落群体进行划分和制定规则以及不让殖民者占取太多来减少纷争。他将部落首领联合起来,增加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人民的权力,同时剥夺非洲群众的权力。他总的来说以这种策略取悦了他的柏林上级首长。部落精英经常愿意服从,以为他们的地位与殖民地统治阶层平等,而比没有文化的白人殖民者群众的地位要高(布莱,1971:88—91)。他们想要单边贵族同化政策。他们自己欺骗自己。有些人幻想一个差不多与墨西哥人或印加贵族——一个新的梅斯蒂索人统治阶层中的男性一样的未来。在非洲这是不可能的。种族主义太强大了,非洲部落首领与贫穷的白人不相等,尽管政治实用主义会暂时掩盖这一点。

洛伊温明白德意志政策的自相矛盾,也知道自己在走钢丝。管理者,一方面,“依据有疑问的条约从当地人手中拿走土地并让自己的同胞为了此目的而冒着生命危险,另一方面又对帝国议会的人道主义原则充满热情”(布莱,1971:68)。殖民地的经济顾问保罗·罗尔巴克博士表达了一个更无情的逻辑:

对西南非洲进行殖民化的决定本来的意思就是……想要土著部落放弃他们以前在上面放牧的土地以便白人能够有土地放牧自己的牲畜。当这一态度受到来自道德法则立场的质疑,回答是,对像具有南非土著这种文化水平的民族来说,损失他们的任性放纵的民族野蛮主义和他们的发展而获得一种服务和依赖于白人的劳动者阶级身份,是最高程度上的基本“存在法则”……任何论点也不能证明保存任何程度西南非洲种族的民族独立,民族繁荣或政治组织,会……与人类的发展有同样的好处。(科克尔,1998:301)

罗尔巴克诉诸人类更一般的利益来回击道德质疑。进步,他继续解释说,将来自于“用最大可能的工作效率”使“非洲种族”服务于“白人种族”。他以最先进的世界历史词汇,表示支持彻底的剥夺,迫

使官员进入准奴役状态。他没有思考如何消灭他们。任何官员都没有。

第三个群体由殖民者——以住在首都温德和克(Windhoek),一个隔离的、种族主义的白人飞地周围的人为主,和想进入部落土地同时不用赫雷罗人劳工的农场主组成。以下是一份由殖民者为回应帝国议会代表对他们给予当地人待遇的批评而寄往柏林的请愿书:

从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期我们的土著就生长为懒惰、凶残和愚蠢的人。他们越肮脏,就越感到自在。任何在土著中住过的白人都觉得要想把他们当作欧洲意义上的人类根本就不可能。他们需要以无尽的耐心、无比的严格和无限的正义,经过好几个世纪的训练,才能成为人。(布莱,1971:97)

殖民者还在催迫进一步驱逐,以一切必要的手段。一名传教士给予他们严厉批评:

赫雷罗人对德国人的不满的深层原因是一般的德国人把土著看作或多或少基本与长臂猿(baboon,他们喜欢用的描绘土人的词)处于同样层次的生物来看待。结果,白人把他们的马与牛看得比土著还重要。这样一种思想就孕育出了残酷、欺骗、剥削、非正义、强奸,以及并不少见的谋杀。(德雷克斯勒,1980:167—168,注释6)

因为许多殖民者不能区分部落首领和没有土地的劳动者,他们的日常行为就破坏了洛伊温的策略。当一个德国面包师把一个颇有名望的赫雷罗人副首领从他的店里鞭打到门外“直至流血”时,他惊恐不已。他斥责面包师如此虐待“一个气度不凡、令人尊敬的人,特别富裕的养牛主”(布莱,1971:86;德雷克斯勒,1980:136)。这样的事件削弱了单边贵族同化——事实上,这位首领成为后来1904年起

义的领导人之一。殖民者也感到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任何抵抗迹象都引起被“在暗处的野蛮人”吞噬的极度恐惧。一丁点的暗示土人抗拒的行为常导致殖民者施加凶残的惩处。而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攫取更多土地与财产的一个借口,因而他们有意刺激非己团体。

殖民者不具统治权力。总督统治着殖民地,殖民者无时不为他们没有能力削弱洛伊温的“虚伪的温情主义”的政策而感到恼火。另一份请愿书上说:“建立对土人的控制是政府的功能,但只有在它拥有足够的处置能力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仅道德压力还不足以将我们的法律施加于黑人种族。”(布莱,1971:79—81,84—85)但是殖民者确实拥有两项重要的地方权力。他们将自己人安插到百姓法庭当中,这样就由他们审判由非洲人提交的声称遭遇鞭打或强奸等恶意对待的大多数案件。他们几乎从未认定一个白人有罪,同时拒绝接受仅基于非洲人证词的证据(德雷克斯勒,1980:133—136)。

第二,这是在殖民者具有大为优越的资本、知识来源和运用法律机会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发现在现在的法律框架内剥夺非洲人土地较为容易,而殖民地当局通常无法约束他们。肆无忌惮的法庭非正义和殖民者抢占土地是通常的土著人暴动的导火索。

在1904年1月,赫雷罗人最高首领塞缪尔·马哈雷勒——到那时为止是德国人温顺和忠实的扈从——被他的副首领强逼作最后的选择。他写信给他下面的部落头人说他们应该避免杀害妇女、儿童、传教士、英国人、布尔人*、杂种人或纳马人(Namas,周边的部落群体)。这一命令大都被贯彻了。他们杀死了120至150名白人,其中仅3名是妇女,7名是布尔人。因为赫雷罗人进攻未能攻占城镇或营地,他们的成就主要在于更孤单分散的农场(布里奇曼,1981:74)。暴动完全出乎白人预料,后者的种族主义导致他们低估了赫雷罗人。别指望德意志男人会有慈悲。赫雷罗人不要俘虏而是将尸体肢解。进攻是由被激怒的勇士发起的,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获得自由的最后机会。要么赢了,要么死去,这是马哈雷勒的规劝。起初他们确实赢

103

* Boers, 荷兰裔南非人或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后裔南非人。

了,把殖民者赶出了部落的土地,夺得他们所有的牛。

从以前的殖民地事件中我们知道,要招来凶残的报复一般需要杀死 100 名以上的白人,而且还要有人错误地认为这当中也包括妇女和孩子。一名传教士描述殖民者的反应:

日耳曼人心中燃烧着不可原谅的仇恨和可怕的报复欲望,你甚至可以说他们正想饮赫雷罗人的血。人们这些天所有听到的就是“彻底铲除他们,绞死他们,射死他们,直到最后一个人,不留活口”等这样的词语。我心里发颤地想着未来几个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日耳曼人毫无疑问会施加严厉的报复。(德雷克斯勒,1980:145)

既然整个殖民地似乎都受到了威胁,柏林就即刻参与进来。然而某种分裂出现了。洛伊温和他的殖民地部门上级想先进行一次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再继之以谈判。然而将军们倾向一个更加无情的军事战略。赫尔(2004)说德国军事思想已经将攻击性战争的信条推进到最终极限。胜利被界定为彻底的摧毁(vernichtung)。这个词的意思有点模糊,但是在殖民地环境下更难把敌方参战人员与平民区分开来,而他们也不太可能与德国军队作战。怎样获取胜利?彻底的摧毁(annihilation)这个词逐渐表示舍曼将军曾用过的同样战术,攻击走动的土著村庄居民和氏族家庭,以引出勇士们进入战斗。该战术又伴随着最近由西班牙及英帝国首创的战术:把非战斗人员圈围在集中营里以便孤立叛乱分子。

104

争论一开始集中在谁来率领被派往殖民地的军事远征部队。温和派更易接近帝国宰相冯·比洛,但激进派,通过冯·施利芬总参谋长,有更多机会接近皇帝(布里奇曼,1981:63)。听从冯·施利芬的意见,皇帝任命冯·特罗塔上将为总指挥。他有非洲经历,曾残酷镇压了 1896 年东非的一次暴动,还帮助镇压过 1900—1901 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冯·特罗塔说:

我了解非洲足够的部落。它们拥有完全相似的思想倾向，就它们只屈服于武力来说。运用以十足的恐怖甚至残忍行为的武力手段过去是现在还是我的方针政策。我将让造反部落变成河水中流淌的鲜血、漂浮的尸体而彻底消失。唯有这样才能播种某种新的能够经久存在的种子。

他接着说，“对待非人类我们无法做到按人性化的方式进行战争”，后又声称“皇帝只说他期望我无论如何把叛乱镇压下去”。这够糟了。然而经殖民者怂恿和种族主义强化，冯·特罗塔和他的军队升级到了种族灭绝。1904年10月他发布一个公告，为任何抓住一个赫雷罗人的人提供赏金。公告在最后说：

在德意志领土内每一个赫雷罗部落的人，无论武装非武装，有或没有牛，都将被射杀。妇女或孩子不允许留在领土内：他们将被赶回到他们的民族中或遭射击。这些是我对赫雷罗民族说的最后的话，伟大德意志帝国的大将军。

他告诉他的军队，“此项命令之后将不再允许有男性俘虏”。但很多妇女和儿童也被他的士兵打死。一个目击证人作证：

战斗过后，所有落到德国人手中的男人、妇女和孩子，不管受伤与否，都被毫不留情地处死。然后德国人又开始追寻其余的人，所有那些在路边和沙地草原发现的人都被枪杀或用刺刀刺死。大部分的赫雷罗男子没有武器，因而无法作出抵抗。他们只是想带着他们的牛一起逃走。

冯·特罗塔不承认命令枪杀妇女和孩子，但他承认确实有意将他们赶入沙漠等死。他相信许多人有病，这有可能是真的，既然他们处于半饥饿和身体不断虚弱的状态：“我判定让整个民族灭亡比让我们的士兵受感染要更明智……最最重要的，任何在我身上表现出的

心慈手软姿态都会被赫雷罗人视为是一种软弱的象征。”殖民者民兵加入了进来,他们的小分队表现尤其残忍。一位传教士说:“每个成员都像堕入地狱一般狂躁愤怒。他们中多少人已失去了一切。现在是到了复仇的时候了。”

105 火力使得德国人得以将赫雷罗人(男人、妇女和孩子)围在沙漠当中。有毒的水洞加上围在外面的德国人的监视使得大多数幸存者死亡。纳马人——因赫雷罗人的暴动而壮大了胆子——加入进来之后,就遭遇了残酷的镇压,尽管不是种族灭绝。冯·特罗塔写信给冯·施利芬,宣称他拒绝了洛伊温和“老非洲人”以谈判解决的建议。他们认为赫雷罗人是有用的劳动力,冯·特罗塔说。“但是我是持完全不同的观点。我认为赫雷罗人作为一个民族必须被消灭。”这句话他在信中重复了三遍。他的士兵不加疑问地服从他的谋杀命令,有些人还颇有热情(布莱,1971:163—164,179;德雷克斯勒,1980:156—161;赫尔,2004)。

德意志官方军事报告表扬这套战术:

这一大胆的创举最突出地显示了德意志指挥官在追击被他们痛殴的敌人时无尽的精力。种种困难和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以消灭敌人最后残剩的抵抗能力。敌人像一个受了伤的野兽一样被从一个水洞追赶到另一个水洞,直到最后成为它自己环境的牺牲品。干燥的 Omaheke 沙漠会完成德意志军队开始的任务:根除赫雷罗人民族。(布莱,1971:162)

并非每一个人都赞成这样的根除主义。帝国宰相冯·比洛告诉皇帝说这场战役“与所有基督教和人性化原则相违背”。他还说,它还起了反作用,使非洲人的抵抗意志变得更坚强(布莱,1971:163)。冯·比洛、殖民地部门、传教士和一些各方代表纷纷施加压力要求把冯·特罗塔撤下来。甚至一些殖民者也感到了惊恐。压力迫使冯·施利芬在1904年12月命令停止枪杀囚虏。1905年11月,他撤换了冯·特罗塔。

这来得太晚了,已救不了赫雷罗人或纳马人。那些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被投进了集中营,在这里因为营养不良、过度劳累和疾病死亡。截至1911年,1903年时的6万至8万的人口中仅剩有大约1.6万赫雷罗人还活着。其中仅约2000是男人。纳马人损失率“仅”近50%(布莱,1971:150—151;德雷克斯勒,1980:244;赫尔,2004)。既然极少数被驱散的幸存者没有能力把自己组织成一个整体,赫雷罗人就作为一个民族被消灭了。德意志人取得充分利益。皇帝于1905年2月批准了剥夺令,授权占取“该部落全部可流动及固定的财产”(布莱,1971:166)。1907年所有赫雷罗人的土地,几乎所有纳马人的领土都被宣布为政府财产,西南非洲被宣布为殖民地。这是一次成功的种族灭绝。正如罗尔巴克所言,坟茔般的宁静降临在西南非洲。

德意志殖民地政策暗示了无情的驱逐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的暴力,然而没设想过大屠杀。而许多殖民者则更为激进。他们的压力加快了冲突与清洗,他们的偏见阻止了单边贵族同化,而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事实上的赫雷罗人暴动。有些殖民者之后用野蛮行径回应他们100个自己人的被杀。德意志的政策本来很可能仍然会导致赫雷罗人民族的被剥夺和解体;许多殖民者愿意处在这类政策的锋刃上。殖民者随后不失时机地收获种族灭绝带来的利益,继续对殖民地中剩下的非洲土地施加他们的压力。但是他们也没有打算过要进行种族灭绝。

种族灭绝的发生是在三个升级之后。第一,赫雷罗人出人意料地起来造反,推翻了殖民者一直来的期望,引发了他们最严重的恐惧和最凶残的报复欲望。第二,叛乱引起后方德国国内的派别斗争,最后军队势力战胜了占国家另一半的平民的力量。这一派任命了冯·特罗塔作为儆戒性镇压土著的人选,尽管他以前没有干过种族灭绝。第三个升级发生在1904年6月特罗塔到达殖民地之后,此时他发现情况是多么糟糕,殖民地的军事力量是多么分散。然后他提高了回应水平直至种族灭绝。他的军队训练有素,种族主义浓厚,足以执行他的命令,而冯·施利芬在战役期间继续给予其支持。施利芬与皇

帝在国家平民这半边的压力下让冯·特罗塔交权太晚,种族灭绝就通过这些出乎意料的升级行为而突然发生了。假如1905年有国际刑事法庭存在的话,冯·特罗塔上将肯定会根据自己的证词而被控以种族灭绝罪行。如果能找到足够证据,他手下的一些军官和士兵以及一些殖民者民兵成员也会被控以种族灭绝罪。但皇帝或冯·施利芬或许多其他平民很可能不会。

以上只有部分情形与我的论点符合。德意志国家依然稳定和稳固,不适合论点5,而主要施害人是一个受过高度训练、职业的和现代的军队,虽然它的干预是在自下而上的殖民者压力挑起了真正带来威胁的叛乱之后。然而尽管如此,这是一个二元国家,处在一个传统的军事威权主义君主制度和一個更新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争斗之下。赫雷罗人暴动带来他们之间的派系分歧以及权力向军事派别的B计划——儆戒性镇压——的转移。不过,最后的升级更带有偶然性,因为战场上的将军独立地升级到C计划——种族灭绝。虽然这让军事主义国家派吃惊,但它紧闭牙关让行动继续。然后平民国家派,在宗教及世俗人道主义者的敦促下,开始反击。赫雷罗人和纳马人权力遭清除之后,殖民者得以恢复一个更具攻击性的A计划:驱逐出境。又一次我们在这晚来的殖民强国中看见升级来自近代军事主义,尽管在本例中它是受到了事实上的殖民者民主的怂恿和推动。

107

最后,这会不会是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的先驱,促进了具有德国特色的种族灭绝倾向的形成呢?很多人把德国的种族主义看作是赫雷罗人种族灭绝的一个单独事业(例如,科克尔,1998:293)。但是德国的种族主义比其他国家的厉害吗?布里奇曼指出(1981:166—167),这个时候的所有殖民列强都是在自以为正义的种族主义的支撑下严厉地镇压叛乱。冯·特罗塔上将将这样一种政策转变成某种更坏的东西。也许他的自主权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德国特色的,因为这支军队比绝大多数国家更独立于平民控制之外。德国军事主义与纳粹军事主义之间的联系是真实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有些后来卷入的德国人员“一战”期间在土耳其服役,在亚美尼亚大屠杀期间充当土耳其的军事顾问。我的纳粹施害人样本当中的几个成员曾

就住在西南非洲或在土耳其服役,尽管我不能通过这样的人建立任何对后两个事件的直接影响,除了保罗·罗尔巴克,他成为了德意志帝国利益多方面的捍卫者,同时对亚美尼亚驱逐密切关注。但是,他激烈地反对驱逐(凯泽,2001:xxi—xxii)。

1905年,另一个迟来的殖民主义强国,以一支更多受到平民控制的军队,活跃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镇压了摩洛人——一个穆斯林少数派群体——当中的一次叛乱。马克·吐温当时在美国军队中,他写道:“敌人有600名,包括妇女和孩子,我们彻底解决了他们,连一个哭着叫妈妈的婴儿都没留下。”

结论:殖民清洗的模式

我的论点在这一章中总的来说都得到了支持,尽管要作些修正。论点1大部分被支持:殖民清洗确实代表了新兴近代民主的第一个阴暗面。在殖民者享受着事实上的自我统治的地方,从地方实际意义上看,它们就是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政体。他们的谋杀性清洗通常比由帝国当局如西班牙、葡萄牙、不列颠王国政府,它们的总督,加上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及修道会等所实施的要更严重。在加利福尼亚,统治权一从西班牙王室和传教团传到美国取得州地位的殖民者手中,蓄意杀戮随即升级。大多数印第安民族在独立战争中支持英国殖民主义政府,而非独立战争中的殖民者中的革命者。华莱士(1999:17—18)指出,英帝国是等级制度和威权主义的,但种族上是包容性的,而杰斐逊的“我们—人民”观是平等的和民主的,但种族上是排斥性的,因为人民,作为文明人,在文化上是同质的。殖民者民主越广泛,种族排斥性就越普遍,待遇就越糟。但是,两个迟来的殖民地例子,高加索和西南非洲情况有所不同。尽管德国殖民者同样也比殖民主义当局更加极端,但在两个例子中,都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似乎带有鲜明的科学及现代特色的现代军队,越过边界进入了大规模谋杀性清洗。

与第1章中讨论的民主和平理论相反,大多数例子都是民主制

度(国家)之间的族群战争。绝大多数当地人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比殖民者的政治制度更民主,慈善的殖民主义者为此很欣赏他们(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是完美的共和主义者”,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国会的主席布迪诺特(Boudinot)如是说。“每个与他们在一起的人,都完全自由地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杰斐逊说(希恩,1973:111)。民主是直接的而不是代议制,确保了大多数男子(有时也包括女子)能享受比代议制民主制中的公民更大的权利。他们能够在部落大会上自由发言。如果他们不同意他们首领的最终决定,他们可以拒绝参加战斗或在战斗中的任何时候离开。他们甚至可以自由地脱离民族。在很多会议上的一致同意是需要的,它意味着首领必须比在战争时更善于说服和妥协。这也是土著群体的情况,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赫雷罗人和切尔克斯人的情况。但所有这些都适合阿兹特克和(或)其他中美国家*,而他们的对手也不是民主制的。这里不是要推崇一个浪漫高贵的野蛮人的形象。印第安人相互间发生重复并经常是残酷的战争,完全可能比殖民者更凶残。1865年由大平原印第安人做下的费特曼大屠杀(Fetterman Massacre)涉及挖肠破肚,剃去四肢,以及“将私处切断后猥亵地放在人体上”。即使我们怀疑殖民者关于印第安暴行的恐怖故事有虚构幻想的成分,但几个印第安民族沉迷于酷刑虐待,将其作为一个不紧不慢、精心设计的仪式和艺术化的过程,还是吓坏了白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布朗,1970:137;科克尔,1998:201,213—214;希恩,1973:第7章)。

民主和平理论把像印第安民族这样的群体排除在考虑之外,理由是他们没有长期固定的、互有区分的代议制政府。然而有些印第安民族的确形成了这样的政府。最成熟的是切罗基人的政府,19世纪20年代期间引入。乔克托、奇克索和克里克人在1856—1867年间也沿着同样的代议制道路行进,尽管未走太远(尚帕涅,1992)。代议制政府未能拯救他们,因为这仅仅进一步激怒了殖民者国家政府。

* Meso-American,指16世纪西班牙人入侵前美洲印第安文化区,与地理上的中美洲不同。

而民主和平理论在殖民地表现并不理想。美国和澳大利亚是白人的民主而非被谋杀的数百万人的民主。谋杀性种族清洗,最坏时至种族灭绝,是新大陆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关键——先是由殖民者殖民地实施,然后再是独立的“第一批新的民族国家”。这一过程在北美洲、南美的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继续,直到实际上已没有更多的土著民族可以根除,只有保留地保存着一些部落民族剩下的成员。而且不是国家,而是我们一人民(在地方政治家及群众准军事部队的帮助下)施行了大多数的这些行为。当军队成为必需的时候,中央国家成为求助对象,然而地方殖民者民主政府才使其成为必要,它通过殖民者在抢占土地、偷袭/反叛和报复的循环中将法律抓在自己手里。因为地方分子组成的武装小组能够自行行动,因而两分化了局势。局外人经常不得不决定他们要站在哪一边。甚至如果一个殖民者被杀或某个家庭被偷袭牲畜的土著惊吓,局外人自己也觉得很难不激起文明的愤怒——正如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所做的那样。

109

为什么殖民者民主如此具有谋杀性,对此的解释与其他绝大多数情况有所不同。两个族群针对一个单一的经济资源、土地而发生冲突,而大多数殖民者不需要当地劳力耕种土地。经济权力关系独一无二地成为殖民清洗的主要推手。然而财产权也要求殖民者对现在由土著拥有的领土声明排他性的法律上的主权(论点3)。这种经济—政治冲突然后又为论点4b中所描述的军事/意识形态权力的不平衡加剧了。殖民者能够自己不承担几乎任何军事或道德风险地清除非己团体。从19世纪60年代起军事权力变得更加地具有支配力,一种独特的过度杀戮(overkill)的军事战术——对舍曼、米柳京和冯·特罗塔将军乃属常见——开始了。从意识形态上说(除了高加索地区),冲突事关以前没有接触的民族。除了墨西哥,殖民者与土著之间的差异的理念在两边都压倒了任何族群和阶级差异。土著很容易被诬为野蛮人或低等种族,高级种族应该以任何必要的途径超出其他文明一截。这种意识形态上免受道德风险的影响不像在后期发现的种族清洗,因为它没有动员近代民族主义或近代国家主义。

今天,殖民主义清洗在巴勒斯坦和拉美和亚洲的偏远内陆继续进行,将土著民族从其土地上赶走。目前,有关方面正在试图将危地马拉政治家和将军告上法庭,因为他们摧毁了玛雅人高地村庄。

然则正如论点 6 指出的,即使是这样,工具理性的殖民者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有预谋的计划来施行种族清洗。几乎所有杀戮都是发生于偶然或因为缺乏人性、不在乎,但不是实际打算杀人。杀戮分几波进行,涉及征召自不同代际不同地方的施害人。在每一波中实际只有几个人去真正杀人,而他们在自己被非法和威胁性的土著抵抗刺激起来之前也并没有打算要这样做。别的更温和的计划已经试过且失败了。现在激进化成为最后的必要手段。那些激进化分子几乎都是普通的殖民者,他们作为一个组织松散的社会组织敦促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和军事官员采取激进措施——如论点 8 中所说的一样。亡命之徒,处于边缘的没有土地的人以及本土警察可以用来干些腥活,但即使是他们的最坏的一些暴行在殖民者中也是真正受欢迎的。谋杀性清洗最明显的核心拥护者,正如论点 7 中探讨的,就是不断变动的边疆本身。这里是殖民者感到最受土著抵抗威胁的地方。

110

支持论点 5 的证据也有。谋杀性清洗成功是因为殖民者控制了边疆地区,但他们的政治制度还没有被牢固地制度化,不具备绝大多数近代国家都拥有的对军事权力的垄断权。中央国家(及教会)有时觉得这些地方上轮番的新杀戮实在太过分,但他们的命令权达不到那里。殖民者民主在边疆地区是松散和变动的。激进分子可能出现,动员群众和受到地方情绪的欢迎,然后犯下暴行——而正当组成的权力机构依然处于分歧或犹豫当中。本地政治制度也已经遭破坏。白人的侵略、欺骗和撕毁条约在部落会议上制造了分裂主义和危机(尚帕涅,1992)。更年轻的战争统帅和首领让偷袭团体激进化和流动化,为整个民族招来大规模报复。制度化的殖民者或印第安人民主制度,比那些被地方地缘政治危机弄得失去稳定和陷于分裂、留下激进分子能够利用的权力真空的民主制度,要较少可能越过边界进入到施加谋杀性清洗的行为。有了这些关于意向性及混乱的修

正之后,种族灭绝就是由我们—人民统治的近代时期的第一个(致命)谋杀性结果——第一个真正的民主的阴暗面。华盛顿、杰斐逊和杰克逊的谋杀性角色以及林肯的道德含混,显示了这些社会的最伟大民主人士其实是有多少污点。

第5章

亚美尼亚 I：进入危险区域

111 所有我看到的和听见的超过了一切想象。讲“一千零一个恐怖故事”在本案中根本不算什么，我想我是在穿过地狱的一部分。极少的事件——我马上要讲的——匆匆取自此处与彼处，仅能表现一个令人悲叹的恐怖景象的大致概念。同样的景象在我经过的不同地方重复出现，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政府野蛮主义，其目的是通过把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民族人口饿死，实现系统的彻底毁灭；每个地方都是同样的代表这些刽子手的野兽般的毫无人性和同样的受害人所经受的痛苦折磨——就在沿着美斯肯到代尔祖尔的幼发拉底河河畔。

这是伯诺写下的，他是一位纽约真空石油公司的美国代表，其1915年在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旅程出人意料地恐怖（美国档案，1993：III，131）。

这次种族灭绝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完成。它不是“可怕的土耳其人”或“异族的亚细亚人”的产物，像欧洲人经常喜欢认为的那样。相反，它是由“青年土耳其党”，世俗的、欧洲风格的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者施行的。奥斯曼土耳其国家也是欧洲权力政治中的一个玩家，它在“一战”中与德国及奥匈帝国结盟。虽然几乎所有杀戮都发生在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部分但这次种族灭绝是源起自欧洲。尽管这些紧张关系确实很古老但种族灭绝也不是古代种族仇恨的最终爆发。施害国家是多种族的奥斯曼帝国，长期宽容少数群体。虽然

它的宽容程度在 19 世纪末有点收紧,但这不是由于青年土耳其党。直到种族灭绝快发生之前,他们还与亚美尼亚人联盟,一起反对苏丹*。如果通向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路是一条“曲折的道路”,那么通向代尔祖尔(Deir-el Zor)的道路就是积极的迂回道路。下面我想追溯一下它的曲折经过。〔1〕

像在后面几章的其他事件中一样,我试图再现导致进入谋杀性清洗危险区、然后越过边缘进入实际大屠杀的过程。绝大多数关于谋杀性清洗的解释,尤其是关于种族灭绝的解释,都组织和事先准备得过度了。早期事件、早期决定经常被人从不愿意获知的最终结果出发去作解读。这样做,我们可能会漏掉事件的复杂性和偶然性。虽然以前的事件看上去会像一个单独一串的升级链,但对相关角色(当事人)来说,它们可能本来不是他们打算想要的样子。亚美尼亚人叙述种族灭绝的时候经常太轻易地假定早期事件——像土耳其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的出现,1909 年大屠杀,“特别部队”的形成,等等——是土耳其预先准备好了一个最后解决方案的步骤[达德里安(1997a)和克沃尔基安(1999)两人都作此假定]。它们是升级行为,但它们是计划好这样,作为令人不快的总体安排的一部分吗?我们必须对此进行证明,而不应当运用事后认知去假定它。

112

巴尔干背景

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一下背景:一场在整个巴尔干地区和高加索地区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争夺,以奥斯曼帝国被军事力量赶出几乎全

* sultan,指穆斯林统治者。

〔1〕 虽然这两章中表达的观点是我自己的,但我要感激希姆勒·凯泽,他给予我的研究以最慷慨的帮助。不过,文献中还是有一个大的缺陷。我们缺乏土耳其人的直接叙述。我们对受害人知道得更多,这肯定使我们偏重亚美尼亚人对事件的看法。只要土耳其政府继续否定大屠杀,只要土耳其档案馆依然大都关闭,以及只要绝大多数土耳其的解释依然不可相信,这个偏向就还会继续。因此,受伤的只有土耳其。

部欧洲和俄国领土而告终。胜利者是基督教国家——旧的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帝国以及新的包括希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民族—国家(加上一个新的穆斯林国家阿尔巴尼亚)。人们现已忘记当时有多少欧洲穆斯林——只有几个孤立地区,像科索沃或波斯尼亚穆斯林,还能提醒我们——以及他们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后遭遇如何。我在第3章指出过,在欧洲宗教清洗时期,在文明的边疆地区如爱尔兰和立陶宛,情形更坏。如今在种族民族主义清洗时期,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之间的边疆地带,事情甚至还要更糟。

高加索和巴尔干之间过程不一样。在高加索地区,俄国是敌人。正如利文(2000)指出的,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共享着使它们与更西边的帝国分开的特征。它们更加专制和落后,它们的核心省份(马斯科维和安纳托利亚)比它们最受威胁的边界省份(俄国欧洲部分和巴尔干国家)更落后。企图加入大国竞争游戏的它们于是被迫提高其臣民的交税率,增加国家相对于市场经济的规模。税收也最容易从那些没有权力的人手中收取。这使得两个帝国对它们自己的底层阶级和少数群体都采取了更加压制的态度。儆戒性压制(镇压)对所有族群都是正常的。这些不是过度歧视的国家。

113

在巴尔干地区,全部死亡统计都存有争议。大多数的下列数字是来自麦卡锡(1995:1,91,162—164,339),他经常被视为站在争端中的土耳其一边的学者。然而即使我们把他的数字减少一半,它们还是很吓人。他估计,在1821年到1922年间约有550万左右穆斯林被赶出欧洲,500万被杀死或死于疾病或在逃亡中饿死。清洗源自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塞尔维亚和希腊的独立,1877年保加利亚的独立和1912年达到高潮的巴尔干战争。虽然新的国家有时镇压和谋杀基督教少数民族,但它们也试图同化他们。一些穆斯林被强行改宗;其他的作二等公民——我们将在第12章中的前南斯拉夫见到他们。但是绝大多数的穆斯林被杀死或被驱逐。在1877年到1887年间,麦卡锡说,保加利亚34%的穆斯林人口逃亡,另有17%死亡。在1912—1913年最后的巴尔干战争中,他估计有62%的穆斯林(27%死亡,35%难民)从被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征服的土地上

消失了。卡内基基金(1914)报告也承认,这是在以前的欧洲没有出现过的惊人规模的谋杀性族群清洗。它给奥斯曼土耳其人留下了一份痛苦的遗产。大概有50万的奥斯曼基督徒臣民也因为受到其余奥斯曼土地上的类似压力而作为难民逃往北方。许多基督徒还被穆斯林施害人杀死;这些大屠杀,像受到格莱斯顿(Gladstone)谴责而著名的“保加利亚暴行”,自然成为了基督教西方熟知的一类。

然则,正如在绝大多数历史帝国中一样,它们的臣民的族性对奥斯曼统治者来说根本就不重要,只要他们服从就行。不是所有的多元文化都是甜蜜和光彩的。臣民们任何迹象的反叛都受到这类历史帝国惯常的严厉处置。利文认为奥斯曼帝国严厉程度越趋加重,因为不断的失败使它们加紧了对最贫穷居民的税收榨取。在面临叛乱时,奥斯曼帝国,像它的亚述先驱一样,实行表1.1中所说的儆戒性镇压政策,其中屠杀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维持政治顺从的战略。在有些情况下(如在亚述帝国),这种政策又被对叛乱人口的治安性驱逐(也许蜕变为野蛮性驱逐)和以穆斯林移民取代(如本事件)而强化了。间歇性的,这样的帝国战术还包括各方面的极端残酷的战争——就像现在在巴尔干地区进行的。对于帮助敌人的行为的惩罚性偷袭和对整个村镇人口的驱逐反映了毫无人性的对地方人口死活的漠视。几方面的综合——这已不再是更西面的远为安定的欧洲国家所为——就是让奥斯曼帝国获得野蛮与落后之名声的根据。但是巴尔干基督徒正在做同样的事情,而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结合也没有发展到种族灭绝。奥斯曼帝国——像其他历史帝国一样——要的是顺从的,而不是死掉的臣民。

对基督徒和他们的国家的愤恨不只是穆斯林心中抽象的历史记忆。它就携带在难民身上。到现在为止,有大约40万欧洲穆斯林难民(mohadjis)在小亚细亚。许多难民受过教育并且是以前的财产所有人,但现在生活在悲惨的穷困之中,无家可归,忍饥挨饿(布赖斯报告,1972:499)。他们的人数被更多逃离俄国的人壮大了。很多俄国难民是部落群体,能够充当带点野蛮、非常规的士兵。欧洲难民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士兵和能够在意识形态机构和政治组织中清晰表达

其不满的前官员。

到1914年,奥斯曼国土上也比过去减少了多族性特征且更加地单一宗教化了。1820年,他们有60%的穆斯林;1914年穆斯林超过80%。如果他们再失去许多的领土,他们也可能会是一个潜在的民族—国家,因为土耳其人已经第一次成为一个准大多数的人口——还控制着国家与军队。既然民族—国家现在到处都被视为最先进和最强大的国家形式,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此时就出现了,它经常是在痛苦之中。这两种结果都会对亚美尼亚人不利。

尽管这样,绝大多数政治领导人一直到1914年仍保持了比民族主义者身份更强的奥斯曼人意识。帝国的少数派过去长期享有宗教宽容和地方自治。每一个“书上的宗教”都有它自己的米勒特(一个既表示自治又表示民族或社区的词)*,受其教会等级制度的规约。这又受到地方上所有少数群体均可享有的泰法** 特权制度的补充,因而还是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有自身特点的共有的身份意识。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弗拉其人***、犹太人等等知道他们与土耳其人或阿尔巴尼亚人或阿拉伯人或库尔德人或切尔克斯人(全是穆斯林)不一样。这些身份根子很深,不是新构建起来的。任何少数民族群体都能够控制它的大多数地方事务,包括仅影响社区中个人的民间法律事务。反过来,无条件的对国家的政治忠诚是必须的,任何对它的违背将会遭到严厉的处罚。但是如果少数派规规矩矩,不卷入是非,那么这种状况就比该时期的基督教国家的安排远更宽容和更加接近真正的文化多元主义。这不是熔炉而是一种帝国形式的联合主义。同时帝国主义具有某种文化黏合剂,因为一切具有超过地方视野的人也有—种身为奥斯曼人的意识。

* millet, 伊斯兰教用语, 中世纪用来称不信伊斯兰教的少数社团, 奥斯曼帝国以来称享有自治权的宗教团体。

** taifa, 西班牙语, 意为“帮派”或“党派”, 特指11世纪穆斯林西班牙政治大分裂中的一些小国国王。

*** Vlachs, 欧洲民族, 是罗马尼亚和摩尔达维亚的主要民族。

它并不是一个平等主义的制度。在穆斯林中,正式的平等受到了非正式的歧视的削损。相对落后的穆斯林群体,如库尔德人和高加索部落,参与所有的政治机构和军事机构,但土耳其人最终控制着这些机构。阿拉伯埃米尔(emirs)和酋长(sheiks)控制着他们自己的区,但不包括中心。土耳其精英控制着帝国结构系统。虽然他们的族群身份会是土耳其,但他们的政治身份及忠心对象是奥斯曼。即使当土耳其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开始萌芽,但它依然主要是文化上的,奥斯曼的政治身份未受挑战(波尔顿,1997:第3章)。

信仰基督教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既不是经济上落后也不是地缘政治上不受保护。基督教强国已经带来了一个大陆性的包围运动,绕过中东并运用对海洋的控制权控制与亚洲的贸易。奥斯曼与东方的贸易联系——到目前为止是其经济的关键——衰落了,还有随之而去的穆斯林商人阶层。贸易越来越多地依赖欧洲,而这类贸易也正蓬勃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14%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是出口形成的,几乎全部去向欧洲与俄国。两个基督教少数派更适合担任中间人,他们善于从外国外交代表那里获得保护证书。因而基督教国家促进确立了由基督教少数群体对经济的共同控制权。如全世界通行的帝国做法一样,大国迫使奥斯曼统治者给予它们自由贸易特许权甚至治外法权——可恨的投降。明显上升的是法国、英国,然后是德国——纠缠在它们自己的帝国间竞争当中难分难解——为奥斯曼帝国提供资金的意愿(阻止它落入俄国或奥地利的手中)。然而即使这一战术也是双刃的。为防止奥斯曼人赖掉这些贷款,大国已获得了从源头上扣押约三分之一的奥斯曼财政收入的权力。这些税收直接付给由基督教国家管理的公共债务署。向农民收的苛捐杂税明显直接地给了外国人。〔2〕

君士坦丁堡和其他港口城市的更繁荣部分也明显是属于外国人的。只有四分之一的印刷厂在穆斯林手中;只有四分之一的报纸杂

〔2〕 这些关于经济方面的段落大量应归功于基德(1987:第二章,第三章)、基德等(1993)和阿赫麦德(1982:402—405)。

志是用土耳其语写的。40名私人事务银行家全部是非穆斯林，而大部分的伊斯坦布尔的国际商业是由基督徒经营的；他们甚至侵蚀到与穆斯林地区的内陆贸易。许多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变得越来越富裕——甚至在安纳托利亚购买土地——并且他们对一些土耳其人来说似乎是与压迫人的基督教国家联合在一起的。传统的结伴不平等被打破了。经济权力不再支持政治和军事权力。在国家与军队以外的特权位置上的土耳其人少了，同时其中也只有极少基督徒。穆斯林埋怨说当他们去参加打仗时，基督徒获得了对土地和商业的进一步控制权（阿卡姆，1992：61）。如在其他国家一样，民族主义首先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穆斯林中出现，这在此意味着国家部门。因而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特别地带有国家主义色彩：国家被视为获得经济权力与经济发展的道路或方法。

116

然而这不是一个全然的种族特有经济，其中亚美尼亚人仅占有专业化经济角色。200万亚美尼亚人中有70%还是农民，与80%的土耳其人一样。两者都与希腊不同，后者绝大多数居住在由希腊东正教控制的同质化较高的沿海商业和手工业社区。最高级主教代表整个希腊社会讲话。他在社会与经济问题上表现了自由主义，但宪法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希腊人喜欢保留保护他们特权（以及保存最高级主教的权力）的米勒特制度。富裕的亚美尼亚人和亚美尼亚最高级大主教经常与他们的希腊同类具有同样的利益与政治观，但他们对其所在社区具有较少的控制权，因为亚美尼亚人阶级分裂十分严重。亚美尼亚大批农民，以及事实上大多数安纳托利亚内陆的商人与手工艺者，不是太依恋米勒特制度。他们还卷入了与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争夺土地所有权的斗争，并且这种态势正在变得越发激烈。控制土地的理想后来鼓励他们走向了民族主义。对土地的争夺，超过对种族特有经济的愤恨，最终使针对经济权力的冲突变得极其凶险。

因而族性—宗教和阶级相互之间呈现出了复杂的关系。“一战”前，前者根本未胜过后者（见我的第2个关于族群的论点）。富裕的亚美尼亚人在大多数分层指标上都比贫穷的土耳其人排名要高。另

一方面,在危机当中许多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逐渐相信他们的经济利益可以以族群来区分开。奥斯曼政治按两种分层原理组成。用我的第二个一般论点说,奥斯曼情形具有两重性:宗教一族性和阶级还是比较平等的两个分层轴。而就在隔壁的俄国,民族主义愤恨情绪不久就会成为革命性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为什么这没有同样在奥斯曼帝国发生呢?

但是,从地缘政治上来说,基督教少数也能与外国压迫者合理联系起来。在他们撤出巴尔干国家过程中,奥斯曼帝国领导人拥有长久而痛苦的遭基督徒背叛的经历。他们开始后悔相对较少的土耳其人住在两个现在最易遭攻击的边界地区,欧洲进入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东面的色雷斯和邻近俄国的东安纳托利亚那些地区。于是奥斯曼的重新安置政策又复活了。从1911年起一些波斯尼亚难民被重新安置到马其顿,取代当地的基督徒(德罗基,1986:36)。1913年起希腊人巴尔干人口居住者的地位被取代了。现居住者主要是从丢失的土地上来的土耳其难民。这些搬迁当中使用了相当多的暴力,尽管这被其施行者认为是对最近发生在巴尔干穆斯林身上的坏事的报复。

117

然而,又一次,两个基督教群体的地缘政治形势不一样了。希腊人有他们自己的相邻的家乡国家希腊,后者能够从外交上为他们从中斡旋,并有欧洲列强的支持——他们的政治家说(古典的)希腊语!希腊人面临一个选择。如果他们想经济繁荣,他们可以保持在原位不动;如果他们想要自己的国家,他们可以向隔壁搬迁。像希腊人在帝国境内居然试图创建他们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危险几乎不存在。如果米勒特制度失败,有些沿海地区的社区可能会寻求实现与希腊的民族(领土收复主义)统一。然而尽管希腊在蚕食土耳其的土地,可它实际上不可能侵入大陆来保护奥斯曼希腊人。它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奥斯曼崩溃才能产生希腊入侵和对奥斯曼希腊人更具谋杀性的报复行为。

亚美尼亚人得不到这样的保护(更小的马龙派天主教群体也得不到)。它们同样也落在奥斯曼与俄罗斯帝国之间,没有国家。所有

的亚美尼亚国家都不得不从土耳其或俄国的土地上被打造出来。虽然俄国过去曾经常迫害它自己的亚美尼亚少数派(这已经产生了第一次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但俄国政府现在开始考虑利用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内的亚美尼亚人的不满。现在俄国扩张构成了奥斯曼帝国生存的最大威胁。它的战术之一可能会是在土耳其境内培养一支亚美尼亚人第五纵队。俄国领导人开始宣称亚美尼亚人是基督徒同胞,将受到保护。1878年《圣斯特凡诺条约》批准了俄国对东安纳托利亚一片土地的占领,但它同时还要求奥斯曼人在东安纳托利亚省份实行改革,保证亚美尼亚人在那里的安全。国际条约现在习惯性地包含保护基督徒人权的条款。这仅仅是对基督徒吗?许多土耳其人问。一位亚美尼亚幸存者回忆他叔叔的预测结果:“我们越是不断向基督教民族埋怨,土耳其人根除亚美尼亚民族的决心就变得越坚定。”(卡桑基恩,1989:351)因此,亚美尼亚—土耳其的关系包括了地缘政治上以及经济权力上的矛盾。

对亚美尼亚可能不是忠诚的公民的怀疑在一些人感染上了席卷欧洲的民族主义流毒之时似乎得到了证实。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以通常的方式去俄国工作,将语言和文学原则标准化,激起人们心中对中世纪亚美尼亚国家的历史和神话回忆,希望再从俄国和土耳其的土地上创建出一个国家。民族主义在奥斯曼帝国因为米勒特制度的关系传播较慢。绝大多数富裕的亚美尼亚社区的领导人和亚美尼亚东正教最高级大主教还是执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共同自治。他们因此而拥有特权。但是绝大多数更为年轻和贫穷的已政治化的亚美尼亚人的理想现在是集中在一个独立的国家。19世纪60年代分散的地方起义在安纳托利亚开始。更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寻求沙皇的支持,自由主义者寻求改革派的支持,而一些激进分子,则把目光瞄准在土地问题上,与俄国革命者走得更近并开始武装他们自己。

奥斯曼政府的传统使他们更可能镇压而不是调和这些要求。无论哪种情况,他们以前都已见过(就如达德里安1995年强调的)。他们拥有长期而痛苦的基督教少数派在基督教国家的支持下要求政治

改革的经历。在巴尔干半岛各国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改革者起先都是要求地方自治,帝国对此总是积极回应。“没有一个区享有比克里特岛更大范围的行政自治,”杰莫尔·帕夏在其回忆录中说,“但是我们成功说服克里特人放弃他们与希腊人实现统一的希望了吗?”没有,他痛苦地回答,在鲁米利亚(Rumelia)也没有,其被保加利亚、埃及吞并,又被英国占领。在基督教国家的怂恿下,所有这些享有特权的地区都取得了独立或甚至被基督教国家吞并——在这过程中杀害和驱逐了很多穆斯林。杰莫尔把这视为一种总的现代趋势。政治权力下放对哈布斯堡帝国的保护并不比奥斯曼给的更多。民族主义,他总结说,一定要以“坚定”和权力集中,即以核心的帝国民族土耳其人为首的“奥斯曼的团结”去对付。亚美尼亚只能按这样去处理,他总结道(1922:250—251)。虽然土耳其领导人知道几乎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都是忠心的臣民,但他们对这种情况是否会持续下去存在怀疑。实际上,它需要具备来自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双方的政治家的创造力才能避免走巴尔干的老路。它需要一个较古老的米勒特制度所能提供的更平等主义的联合主义制度。不幸的是,两个群体所受到的现代性的教育将引领他们离开联合主义而走向社会有机体的民族—国家的理想。

在19世纪,种族间冲突在追求政治民主的进程中加剧。奥斯曼统治者在宗教/族群团体之间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以便维护他们个人的绝对地位。间或他们让基督教社区支付镇压土耳其农民叛乱的成本,以作为对确认他们的特权的回报。1839年,一位开明的大维齐* 屈服于来自底层的阶级压力,同意给予基督徒法律前的正式平等地位。这在1856年被再次确认。然而这是对伊斯兰法律和奥斯曼传统的背弃,它使得许多习惯于享受法律特权的土耳其人开始持敌对态度。两种政策都会引起种族不满,因为每一种都可以被视为增加了已经在经济上握有特权的基督徒的特权。这进一步让苏丹(指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通过将对社会不满的少数派作为替罪羊

* grand vizier, 一般指伊斯兰国家的首相,此处尤指前奥斯曼帝国首相。

而转移人们对根源于阶级的政治问题的不满——与沙皇施于犹太人的政策一样。苏丹加剧了种族紧张关系向集体迫害方向发展的趋势。

1856—1860 年间的第一次重大集体迫害瞄准的是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马龙派基督教群体。在此共有 4 万人被杀害,靠法国的军事干预才制止了迫害行为。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赤色(亦即血腥的)苏丹”,1876—1909 年在位,试图通过被泛伊斯兰主义合法化的更大的权力集中去实现现代化。他扩大受教育范围,试图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其中有大量阿拉伯和波斯成分)将其标准化,同时建立军队。他废除法律平等和宪法,创建他自己的“哈密德”* 的军营,大都由库尔德人组成,专门负责国内镇压。他们的活动让土耳其人及库尔德人进行了更多的土地抢占。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团体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的暴力行动。1894 年有一些亚美尼亚社区拒绝对奥斯曼当局和地方库尔德首领缴纳税赋。他们的鼓动导致大规模的儆戒性镇压,其中数目庞大的亚美尼亚人死亡(6 万到 15 万之间)。镇压的目标是在西里西亚和东面的城镇,这里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煽动最强,其力量来自对土地争端的利用。指向亚美尼亚人的阶级不满表现为疯狂的抢劫,伴以城市中的大屠杀。然后苏丹派出哈密德军队,表面上是将两边分开,但实际上是强化杀戮。然而,就像俄罗斯帝国中的犹太人一样,亚美尼亚人是政权的某种安全阀。在运用大屠杀表示了支持之后,苏丹又关上了安全阀,阻止进一步的谋杀。开明的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都是后来才想起,是这一可怕的集体迫害对让亚美尼亚开始持敌对态度起了决定性作用(伊泽特·帕萨,1992;米勒,1993:61),这发生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取得任何权力之前。事实上,他们反对权力。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土耳其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盟友。

* 这里当指模仿 1300—1423 年统治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土库曼王朝,亦即哈密德王朝(Hamid Dynasty)。

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

一个处于如此倒退之中的帝国势必遭遇到国内的不满和强烈要求改革的呼声。大城市中出现了抗税起义、罢工和食品暴乱,军队由于不支薪水和有时让士兵挨饿引起哗变。大多数改革者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一个留存在我们的语言中表示年轻、有毅力和很有吸引力的激进改革分子的表述方式。不过,在改革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个称号并不是十分合适,因为绝大多数追随者更多地把自己视为奥斯曼人而非土耳其人。在他们中“奥斯曼自由主义”占主流地位。这就要求西方风格的现代化:君主立宪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扩大教育范围和其他公共服务,对地方文化自治以及更有疑问的少数派政治自治的某种承认。

但是自由主义有三个缺陷。第一,个人与公共权利之间存在一种紧张。这种紧张从未被自由主义者解决,同时这又削弱了他们的凝聚力。第二,因为他们以地方公共权利为中心,他们将它们视为邦联的而不是联合的——就是说,少数派权利将更多在地方集体自治中得到保证而不是在中央国家。这是自由主义通常的偏见。然而邦联主义在19世纪或20世纪早期的现代化国家中并非普遍受欢迎。强有力的集权国家被认为是保卫地缘政治的基本条件。第三,自由主义者支持与外国强权要求的同样的改革。因而他们有时似乎支持外国对苏丹的干涉,因此可以被称作是帝国主义压迫者的走狗。这又因为自由主义有非常世俗的、西方的和看上去非伊斯兰的特点而变得更加容易得多。

120

这样的辱骂出自各种不同团体之口——伊斯兰主义者、宫廷保皇党以及另一个正在崛起的青年土耳其党派别,喜欢一个更加集权的以及最终是民族主义的国家,坚决反对外国人。然而派系划分还没有最后固定下来。团体之间在成员方面发生重叠并从同样的由在行政机关、教育系统和军队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穆斯林组成的核心拥护者当中招收新人。虽然在1902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代表大会上,阵

营得到了清楚的划分,但自由主义者与激进分子仍继续联手共同反对保守的宫廷。

两派都受到了欧洲政治观念的很大影响。在欧洲,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已经占了主导地位,连同两个国家主义思潮一起——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德国李斯特经济学。让这些意识形态思潮适应奥斯曼借帝国无限权力进行外围榨取的经验,意味着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逐渐兴起和自由主义的相应减退。这是一场官员、教师和军官的运动,不是商人和制造商的运动。1905年的事件帮助将这一趋势重新导向亚细亚轨道。一个亚洲强国——日本,让一个欧洲强国——奥斯曼的大敌俄国——蒙受了第一次决定性的现代性失败。日本让自己适应了比自由主义影响更多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许多青年土耳其党为亚洲人羞辱了欧洲人的奇观感到高兴,他们决定加以效仿。

因为知识阶层也受到了全球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早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理论家实际上是世界主义者。那些在国外尤其是在法国受教育的人,表现卓越,前巴尔干人和前俄国穆斯林也同样杰出,他们一开始根本未把自己当土耳其人。犹太人也一样,特别是那些来自世界城市萨洛尼卡(Solonika)的人。社会主义和共济会也促进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一些主要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自己就是混合族性(土耳其/库尔德、土耳其/鞑靼、保加利亚/土耳其等等)。也许是他们个人的对帝国中多族群紧张关系的体验使他们第一个转向民族主义(像泽克在1998:136—137指出的)。但是这些不再是孤立的外围。库尔德人首领第二天通过电报即得到了击沉俄国舰艇的消息。

最有影响的理论家是格卡尔普(阿斯托里安,1995:28—29;兰多,1995:37;梅尔森,1992:166—167)。作为半个库尔德人,1876年他出生在东安纳托利亚的迪亚巴克省。他是一名兽医学大学毕业生、诗人、社会学教授,受迪尔凯姆和滕尼斯影响很深。他论证社会发展经历过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是部落社会,其中语言和种族产生了他(像迪尔凯姆一样)认为是任何社会之核心的规范和仪式团结。部落阶段之后而来的是更广泛的宗教团结——在本区,是伊斯

兰教。最后是第三阶段即现代阶段,其中规范团结依靠民族的文化 and 民族—国家的制度。只有民族文化和国家社团主义才能超越阶级冲突和相互寄生行为,后者在他看来是一个扩大的劳动分工部门带给一个多种族社会的内容。一个希腊/亚美尼亚资产阶级和一个土耳其官僚阶层是相互寄生的,两者都靠掠夺贫困的安纳托利亚农民为生。只有民族,他总结说,能够提供迪尔凯姆所称的集体良心——一种能够将一个具有无计划扩展的劳动分工的近代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道德秩序。〔3〕格卡尔普学滕尼斯的做法,也对文化(一个社区内的准则、价值观和习惯行为)和文明(一个理性的、国际化的科学技术知识系统)作了区分。土耳其文化还陷于中世纪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政治当中。这需要用欧洲的科学—工业化文明来代替。但民族自尊可以与现代性协调。土耳其人能够一边进行现代化,同时保持他们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格卡尔普在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中影响的主要来源是诗,他能够通过他的诗,将其社会学理论通俗化。〔4〕

他的民族概念变得更加土耳其化而非奥斯曼化。鉴于奥斯曼传统,被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强化之后,他把民族准则看成是确凿无疑地尚武的和国家主义的,这对年轻的官僚及军官有吸引力。但他公开谴责奥斯曼多族性扼杀了土耳其的民族精神。土耳其人可以赢得战争,但他们因为同化于被征服者的文化而失去了宁静——一种在帝国修正主义者当中的老生常谈(例如本书后面会见到的德国人和塞尔维亚人)。

〔3〕 迪尔凯姆自己指出民族可以代替上帝作为社会的道德与仪式秩序的核心。他还详细撰写了关于如何利用工团主义公司的帮助对付劳动分工内部的失范和解体倾向。但他从未满意自己对他原初问题的回答:“近代社会如何凝聚在一起”?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他将会对格卡尔普的民族主义方案——以及对将他的社团主义向法西斯主义方向延伸感到不满。

〔4〕 达德里安(1997b:239—240)将青年土耳其党描述为“缺乏任何培养过的意识形态基础”,一帮“嗜血的冒险家”——在将种族灭绝归因于它们时有用,但对理解他们的理想或吸引力没用。

我们成功地征服了许多地方
但精神上我们在所有地方都被征服了。

122

必须拒绝同化。可以给基督教少数群体土耳其公民身份但不能给予国籍,因为他们“将成为土耳其民族国家中的一个异物”。土耳其民族—国家要求军事训练:

什么是责任? 一个声音从上帝的御座传来,
我的民族意识发出回响
我是一名士兵,它是我的司令
我不带疑问服从它所有的命令
且把双眼闭上
来把我的责任尽上。

这些情绪都带有相当的社会有机论色彩,将少数群体排除出国家所有成员之外。鉴于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形势,军事主义倾向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个有影响的理论家是阿奥卢,1869年出生于俄国阿塞拜疆一个富裕的穆斯林家庭,取名为阿加耶夫。年轻时他不把自己认作土耳其人而是波斯人——就像许多为昔日的波斯文化的辉煌而自豪的受过教育的穆斯林一样。但他逐渐注意到俄国对当地土耳其人的剥削,后者经济上受剥夺,政治上遭排斥。他的早期著述强烈要求给予俄国的土耳其人以政治权利,尽管没有运用民族主义词藻。之后他到巴黎学习,受到勒南强调宗教和雅利安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影响。这使得阿奥卢把伊斯兰教什叶派和波斯民族身份认作为民族现代化的关键(波斯人是雅利安人,土耳其人不是)。但回到阿塞拜疆之后他为1905年俄国人及亚美尼亚人对土耳其人犯下的暴行感到震惊。他相信亚美尼亚人不想让土耳其人取得与他们平等的地位。1908年土耳其的政变(见后)使他变成了一名青年土耳其党人。他成了教育督察官,舍弃波斯和伊斯兰,转而支持土耳其身份。他的改

名象征了他对土耳其风尚的欣然接受。他的民族主义与格尔卡普不尽相同。是俄国压迫和分而治之——使穆斯林和基督徒少数不和——的经验导致了这类流亡者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先驱。虽然在人数上屈指可数,但这些作家主导了一些新兴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刊物的方向(阿雷,1992:55;兰多,1995:35—36;波尔顿,1997:68—75;希斯勒,2003)。

这些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源于,他们对在民间和军事机构中担任中层官员并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年轻人的现代化理想,赋予普遍意义和合理性的能力。主要联系是他们任教的教育机构,特别是行政学院(Mülkiye)、战争学院和军医学院,这些机构都位于君士坦丁堡。它们的毕业生将在这里学到的民族主义观念用到更世俗的军队领域和地方管理,特别是在余下的然而遭威胁的欧洲省份马其顿和色雷斯。格尔卡普和阿奥卢都被组织珍视,成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成员,这是一个半秘密机构,后逐渐成为青年土耳其党中更激进的民族主义右翼,有时被称为团结主义者(Ittihadist)。

123

团结主义者然后不均匀地向三个主要政策类型发展。第一个是意识形态权力理论。改革者说一个现代国家要求新的文化和教育黏合剂。他们是基于掌握了现代技术和科学知识的精英管理制的热诚的信奉者。这也使他们变得世俗。他们根本没有强大到足以攻击伊斯兰,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注意到是伊斯兰给了帝国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黏合力。但是在教育和关于语言方面他们显示了他们真正的民族主义立场。他们竭力要求推行一种简化的土耳其语言和文学,清除波斯和阿拉伯语成分,采取一种以更适于民众教育的韵律写成的诗歌形式,因为它符合实际的土耳其语言。格尔卡普自己的通俗诗歌为此作了例证。语言问题主导着民族主义期刊(阿雷,1992)。他们希望让教育免去学费,实现义务教育,采用现代化的土耳其语言。土耳其语被宣布为唯一的教学语言,是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者的一种典型的强制同化政策。

组织本身是精英性的。以后来成为它的“三人领导小组”的三个人为例。塔拉特帕夏来自一个保加利亚改宗者家庭。他的母亲从事

一项被人蔑视的陈放尸体的职业。他的事业以一个犹太学校的土耳其语教师开始,然后他成为政府的一名邮政电报雇员,后升为高级电报官员。恩弗帕夏是一名铁路低级官员的儿子,出生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较贫困的地区。他上了军事学校,是一名优秀学生。他很快凭他的能力晋升到军官团。杰莫尔帕夏的家庭也很卑微——他的祖父曾是绞死苏丹的刽子手。他的父亲是一名士兵。他也在军事学院表现良好,职位上升很快。但是虽然奥斯曼帝国缺乏一个真正的贵族阶层,它的精英已经通过学得的一套表面的西方文化、法国语言以及外交礼仪,而不是技术专家政治知识,实现了现代化。这带来了与青年土耳其党精英领导层的代际地位冲突。德国人斯特默傲慢自大地写道:“出生高贵的土耳其人憎恶这些暴发户。”(1917:255;参较巴顿,1998:190—191;德罗基,1986:34—39;马丁,1971:201;肖,1977:第4章)青年土耳其党精英领导的理想是受欢迎,但他们的语言政策疏远了阿尔巴尼亚、阿拉伯和基督教民支持者。随着这些人的离开组织,青年土耳其党更加致力于土耳其化。

第二个是经济权力理论,大多是在约1910年之后得到了清晰表述。团结主义者告别经济自由主义,转而培植一种由社会有机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并由国家实现协调发展的国民经济。借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传统的德国经济学,他们强调国家干预、保护、废除自由贸易协议、抵制“外来”企业——这大都指基督教徒。虽然这在很多穆斯林中受到欢迎,但它使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感到被疏远,还遭遇到自由主义者的抵抗。它只是在1912—1913年间成功地集体抵制了希腊和亚美尼亚人的商店之后才成为卓越的政策(阿达尼尔1998:59—60;凯泽,1997;基德,1987:53—54;泽克,1998:127—131)。这同土地问题一道,让阶级怨恨情绪改道走向了种族民族主义。

第三个是强调技术专家治国和权力集中的军事和政治权力理论,德国又一次是榜样。技术专家治国制得到了所有改革者的拥护;集中对土耳其人比对少数群体更有吸引力。青年土耳其党形式上接受民主代议制理想,但是,像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承认目前的帝国

与这一理想还有很大的差距。一些人还开始主张只有土耳其人或穆斯林会最终愿意帮助奥斯曼帝国抗击来犯之敌。这就走进了只许土耳其人成为完全公民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的方向。但很可能更重要的是,从实际行为看,该组织正在偏离民主制度。它的核心在军队,由伊斯兰信徒组成,其中大多数是土耳其人。随后巴尔干和北非战役将一些青年土耳其党军官改变成了一切人民战争中的暴力型准军事部队。恩弗的青年土耳其党游击小队(fedais)开始在巴尔干山地上发动冷酷无情的战争。随着帝国受到的地缘政治压力的上升,激进分子也建议将或有二心的少数民族从战略性地区驱逐出去,让土耳其人搬来居住。

尽管如此,所有这些政策都被视为改良主义的,以及以反对宫廷作为目标的。然而亚美尼亚人、希腊人、阿拉伯人以及土耳其自由主义者反对其中的一些政策;他们还威胁所有那些在旧政权中有确定特权的人,包括基督徒中的精英(阿斯托里安,1995:27—31;肖,1977:301—304)。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似对这种反应的强度吃了一惊。他们好像完全没有种族偏见。他们的刊物长篇大论地详谈种族多样性而极少提到种族冲突(阿雷,1992)。有些文章建议朝一种单一的土耳其/奥斯曼身份同化,但他们唯一想到的手段就是让人强制接受土耳其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对同样领土区域提出主权要求的对立的种族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如我的第3个论点)。

青年土耳其党激进化,1908—1913

时至1906年,苏丹政权处于不受欢迎的境地,它的财政资源趋紧,这激起了抗税起义、食品骚乱以及未拿到薪水土兵的游行示威。宫廷不能调动足够的保皇分子去镇压这类挑衅。要求恢复宪法统治的改革派开始将1905—1906年俄国和伊朗的革命作为样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加入了上述许多骚乱,而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分支和中心——土耳其民族主义文化协会,扩大了在安纳托利亚的活动范围。他们与亚美尼亚人比与希腊人或自由主义派别合作更多,因为

他们在对宪法和税收问题上都持激进主义的立场(艾哈迈德,1982;坎苏,1997:29—72,78—79)。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和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在东安纳托利亚的凡城的小型战斗中并肩作战,共同对付奥斯曼军队。阿拉伯的首长更为反动,因为伊斯兰/部落哈里发/苏丹的地位支撑着他们自身的权力。因而这一阶段的政治站队不是在穆斯林与基督教之间。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和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是同盟,不过是谨慎的同盟。

团结主义者的权力基础是在欧洲军队的次级和中级军官中,他们驻扎在萨洛尼卡、埃迪尔内*和莫纳斯提尔(今天马其顿的比托拉)。萨洛尼卡的505个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中有63%是军官。这些几乎全是穆斯林,而绝大多数是土耳其人。因为这是一个非法组织,他们私底下秘密组织起来,收集武器招收士兵,1908年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在一些街头游行的声援下,他们艰难地发动了一场针对阿卜杜勒-哈密德苏丹二世的不完全政变,没有将他废黜而是让他靠边站(坎苏,1997:87—113,221)。要将这些事件描述为一场革命只在一种有限的意识形态意义上才是准确的。底层没有带来什么压力,只是一些小的暴力行为和几乎感觉不到的对青年土耳其党的要求的支持。这是在军事和政界精英之间进行的派别争斗,对群众不会造成改变。虽然青年土耳其党倾向一个立宪的和比较和平的政权,但他们没有打算让“原始和迷信的”民族去统治。相反,精英改革与世俗化将逐渐让国家变得文明并使民主制成为可能(马丁,1971),恩弗·帕夏用民主以及相当有多元文化特色的词汇表达了新政权的理想:

今天独裁政府已经消失。我们都是兄弟。土耳其不再有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穆斯林、犹太人。在同样的蓝天下我们都为自己是奥斯曼人而感到自豪。(摩根索,1918:18)

* 以前的阿德里安堡。原文的 Edine 似应为 Edirne。

有些希腊、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团体在政变后的数月内自愿放下了武器(坎苏,1997:100—101)。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和进步基督教是盟友,因为他们都赞成立宪统治。他们对腐败公务员进行清洗,恢复宪法,允许公开组建政党。半民主的选举开始举行。25岁以上的男性纳税人为一个总统选举团投票,其成员一般是地方名人。这些人然后投票选出实际代表。这涉及全民投票,但地方名人对结果有突出影响。议会然后与行政一起分享权力。这种半民主的体制在1915年基本上还在运转。表5.1绘出了详细的选举结果。

表5.1 1908年选入奥斯曼议会的代表:按族性分的党组排列得数情况(人数)*

族性	CUP 青年土耳其党	独立中间派	君主制保守主义者	总计
土耳其人	43	83	27	153
阿拉伯/库尔德人	1	30	22	53
阿尔巴尼亚人	2	10	15	27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人	0	8	0	8
希腊人	0	22		22
亚美尼亚人	4	7	0	11
犹太人	3	1	0	4
总计	53	C. 153	C. 72	278

来源:据坎苏(1997:附录)推算。我对坎苏数据的推算产生了与他在第238—239页给出总的党派得数稍有出入的结果。至少有3个代表其所属党派以及他们的族性是不知道的(尽管总的代表人数也不是经精确计算出来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是穆斯林。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是基督教徒。希腊代表大多是作为一个集体而投票的。他们往往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是中间派,而在支持君主制和米勒特制度上又是保守主义的。

* 表中的 C. 153、C. 72 表示约 153、约 72。C 是拉丁语 Circa 的缩写,意思是大约在、接近于。

126

但是,值得提出的是,党派标签是肤浅和会变化的。青年土耳其党候选人经常是同样的地方名人,而现在进入了现代性的行列。有些代表一旦被选上了之后马上就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一种他们在大众讲坛上回避的保守主义。表 5.1 表明独立的中间派占主导地位,但不是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绝大多数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青年土耳其党)代表是土耳其人,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下称统进会)也获得了许多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以及阿尔巴尼亚人的投票,并且还和保加利亚与亚美尼亚社会主义者结盟。它基本上没有得到希腊人的支持,后者希望保留他们传统的米勒特特权;它也没有得到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支持,他们的领袖更加向着宫廷。统进会在欧洲和西安纳托利亚收获最大。在东安纳托利亚,本来可能会支持统进会的亚美尼亚候选人被保守的土耳其和库尔德候选人击败(艾哈迈德,1982:405—421)。统进会对帝国中更加现代化、较少宗教性的地区更有吸引力,是其他种族民族主义者的盟友。几乎统进会代表中的三分之二都是官员或教师,而其他代表只占不到三分之一。〔5〕非统进会的男人更可能是律师和有财产的名人(包括阿拉伯酋长),伊斯兰穆夫提和乌理玛在各党中都有,包括统进会,虽然大多数伊斯兰统治集团支持宫廷。我们再次见到青年土耳其党的官僚/教育核心。

127

议会缺乏一种共识。统进会能够让某些立法通过,因为它是最有凝聚力的团体,能够在独立派中寻找支持。但是一切都不得不通过艰苦的谈判来解决,并且得到回报只是因为给了对方不正当的利益。统进会保持它对多种族的支持,而宫廷的权力正在被削减。但在到了要进行积极的改革时,困难就来了。统进会赞成更多的国家集权和单一的土耳其语的教育,但是基督教民和其他许多穆斯林不喜欢。很多基督教的、阿尔巴尼亚的和阿拉伯的政治家只在旧政权被摧垮之后才表现出民族主义立场。尽管如此,一直至 1913 年之

〔5〕 正规陆军军官被禁止获得候选人资格,尽管有一些代表是军官,同时又在军事学院任教。

前还是有一一次次试图去联合和协调的举动,因为青年土耳其党需要一切他们所能找到的盟友。这类盟友数量极少,且对帝国大部分地区没有影响,因此在大多数镇中他们不得不继续通过地方名人和穆斯林神职人员来进行统治。在有些地方甚至当地的统进会领导人也可能对青年土耳其党的理想并不信奉。虽然清洗行动增加了改革派在政治和军事官僚机构中的人数,但他们甚至对欧洲军队的控制也不牢固。许多这样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军官从未参加过实际战斗,他们控制其手下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在族群领域,他们的 A 计划依然是(用表 1.1 的分类用语)一个令人不安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所有苏丹的敌人结盟,包括亚美尼亚人。

但第二年天下大乱。军队哗变之后是 1909 年 4 月西里西亚阿达纳城附近的谋杀性清洗。超过 2 万名亚美尼亚人(加上 1000 名穆斯林)被暴徒屠杀。并不完全清楚是谁组织了这次行动。没有证据可将屠杀与苏丹或君士坦丁堡的其他高级权力机构联系在一起。一些同时代人认为统进会的一个激进的萨洛尼卡派,以纳齐姆为首(关于他后面有更多讨论),参与鼓励了他们的行动(达德里安,1997b: 246—247)。达德里安(1992:274—275)宣称屠杀是统进会已成熟的种族灭绝计划的试验,但他没有为这一陈述提供实际证据。克沃尔基安的研究(1999)表明几位地方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包括主要的阿达纳团结主义者报纸和在阿达纳及塔尔苏斯的统进会分支的负责人)就在发动者当中,再加上保守主义政治家和官员及几个牧师。这些地方名人声称亚美尼亚人正准备武装叛乱,而其中有些人可能真的相信,尽管它很可能不是真的。因为他们控制着送往首都的信息,有一阵子君士坦丁堡当局很可能也相信了它是真的。

大屠杀沉寂下来,但当被派去平息屠杀的士兵在遭到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向他们开火而开始加入到屠杀当中之后,大屠杀就又重新开始了。地方局势非常紧张。阿达纳是一个经历过工业发展的种族分裂的城市。希腊人构成了大部分的资本家,亚美尼亚人构成了最少部分的商人、专业人士和熟练工人。穆斯林对基督教经济权力充满怨恨。在早期迫害阶段逃往国外的亚美尼亚人正回来讨回被土耳

其人与库尔德人夺去的财产。在1908—1909年间许多来自欧洲和高加索两地的穆斯林难民也正被重新安置到这块区域,所以这种种族/宗教冲突中有很大的经济权力成分。

阿达纳的事件与最近在印度次大陆爆发的一些致命暴乱有些相似(按布拉斯1997年和坦比亚1996年的记载,这方面我将在第16章讨论)。同样是被煽起的地方紧张态势,同样是对他们自己的邪恶目标充满狂热,类似的可以利用的事件(在本例中,一个亚美尼亚青年打死两个曾袭击他们的恶棍),类似的轻信最底层的谣言,以及类似的地方政治家及警察与军事当局成为同谋。使阿达纳事件与众不同,以及造成这样可怕的屠杀的原因是(不像印度次大陆)更高一级国家领导层没有果断地干预以平息屠杀或之后惩罚罪犯。克沃尔基安怀疑(但无法证明)青年土耳其党从一开始就卷入其中。我更倾向于认为暴乱升级主要是因为政权的软弱和分裂。青年土耳其党由多种多样的成分组成,而他们还需要与自由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和宫廷保皇派合作。较之于基督教徒,他们更怕被疏远。虽然青年土耳其党形式上与亚美尼亚人结盟,但他们判断,与土耳其派别不同,亚美尼亚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因此他们在帮助亚美尼亚社会方面动作迟缓。他们的分裂还体现在形成了三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一次军事法庭审判为当局粉饰了罪名而将罪责归于亚美尼亚人,而由他们共同参加的两次议会调查的成员则上交了三份差异较大的报告。内阁为亚美尼亚人开释,宣称亚美尼亚人是“到处散播的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挑拨的牺牲品”。

在事实之后,还有一个政权阴谋。达德里安和克沃尔基安都暗示这种阴谋证实了以下念头的存在,即政权曾阴谋策划展开大屠杀。但是掩盖是常见的,而它们并不意味着政权本身应对被掩盖的行为负责。绝大多数土耳其政治家想回避或掩盖暴行。只有少数人(在亚美尼亚政治家和希腊政治家的怂恿下)试图起诉主要的施害人。达成的妥协是处决一些第二级别的施害人而对最重要的施害人稍加责罚。那些参加了屠杀合谋的军官后来实际上好像得到了比那些想阻挡他们的人更好的职位。

这一遗憾的后果保住了在土耳其人当中展开合作的可能性,对族群之间的关系却是灾难。“不要相信土耳其政府”是绝大多数亚美尼亚人得到的教训,它严重损害了将来与青年土耳其党的谈判(同时参见艾哈迈德,1982:421—423,麦克菲,1998:第2章)。与亚美尼亚人日益加大的摩擦也让统进会温和派的日子更不好过。党与宫廷保守主义者及自由主义者的妥协强化了土耳其/伊斯兰作为政权中最低公分母的身份特性,削弱了它对民主的信念。所有这一切使得青年土耳其党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联盟关系变得紧张。

129

然后摇摇欲坠的联合政权遭受了地缘政治灾难。奥地利吞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公开宣布完全独立,克里特人进入希腊国家。这一系列的灾难强化了中央集权派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分子针对自由主义者和基督徒的高压手段——需要一个更强大、更忠诚的国家,更多人这样说。统进会的民主追求现在次要于国家防卫。但是他们的集中化政策——增加国家对征兵、税收和执行土耳其语言政策的权力——不是专门针对基督徒的。事实上,是阿尔巴尼亚人(其中一些是青年土耳其党)在1911年发起了第一次针对集中化的反叛活动,继之是也门的部落首领率领的起义。作为回应,统进会修改了它的集中化政策。

意大利利用这一阵奥斯曼帝国的虚弱入侵了它的北非省份。联合政府试图通过绥靖政策平息事态,但一些统进会军队人士不甘罢休。他们招集志愿兵,从阿拉伯酋长那里争取支持,把意大利军队赶回到一个狭窄的沿海长条地带。这对激进分子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表面上展示了一个土耳其/伊斯兰教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在对付基督教军队的游击战争中所能运用的军事权力。然而绝大多数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依然还是实用主义的政治家,他们被多种多样的土耳其、奥斯曼和泛伊斯兰主义观念吸引,他们将这些观念灵活地揉在一起,以对付反对派,使自己留在执政岗位上。另外,少数派问题不是他们的最急迫的问题。它们是两项主要任务的副产品:确保一个反对宫廷的立宪政权和确保一个抵御大国攻击的更强大的国家。失败与领土损失让国内冲突升级到了街头的暴乱和谋杀。失败往往会破

坏当时反对政权的所有组织的名声。宫廷保守主义者被一次由自由派军官发动的不完全政变推翻。团结主义者害怕自己丢命。但因为伊斯兰主义者受到削弱,世俗民族主义得到了加强。当自由派在1913年1月受大国所迫将埃迪尔内城送给保加利亚之后,他们被一次团结主义者的政变推翻了。

青年土耳其党政变扶植了三个年轻人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恩弗(年仅31岁)、塔拉特(39岁)和杰莫尔帕夏(41岁)。摩根索大使称他们是“盛气凌人的一伙”(1918:21),而他们现在实际上放弃了民主制度。在君士坦丁堡,杰莫尔在其镇压反对派过程中显得尤其无情。宫廷已被打败,而他们又与基督教权力下放派毫无共同之处,而且青年土耳其党拥有镇压他们的军事和警察力量。我们可以把1908年到1913年这段时间看作是青年土耳其党成长并懂得了生活的严酷现实的过程。因为他们的理想主义,政变、起义和战争等突发情况得以从战术上诱导他们进入传统的奥斯曼统治中的黑暗一面——通过军事及警察权力进行儆戒性镇压,通过国家令其合法。民族主义者变得强硬了。

所以,他们无情地使国家激进化了。几个日后成为种族灭绝关键组织者的团结主义分子现在接受了在治安机构内关键的任命和晋升(达德里安,1997b:259;凯泽,2000b)。军队清洗使1100名不同情他们的军官被清退;其他人被撇在一边——包括凯末尔——后来以土耳其之父的名义统治他们国家的军官,这没收了他大量参与种族灭绝活动的资格。团结主义者中的青春派现在接受了军队的军事训练(阿斯托里安,1995:26;达德里安,1995:195—198,214;泽克,1998:19—44;1998:90—115)。苏丹沦为了橡皮图章。内阁依然包含温和派和非土耳其人——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一个切尔克斯人,一个基督徒阿拉伯人和一个亚美尼亚人。但是他们占据着“更软”的职位——金融、公共工程、商业、农业、邮政电报(摩根索,1918:121)。国家的暴力机关已被民族主义者把持了。一些人思考着去采取极端措施实现他们期望的目标。这个国家正在变为一个激进的政党国家。

130

照本书第1章绘出的模式,到1913年奥斯曼帝国正在进入谋杀性种族清洗的危险区。两个种族/宗教群体中的政治领导人正在开始对同样的土地提出互相对立的国家主权要求(我的第3个论点)。一个拥有现存国家;另一个拥有对它自己国家的历史记忆/神话,支撑它的是邻国力量这一不太可靠的重新掌权的方法。青年土耳其党现在正在走进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正使国家的暴力机关变得激进化。经济怨恨从阶级转向了种族民族主义冲突(我的第2个论点)。两个群体或可能走在相互冲撞的方向上。

他们走向冲撞的过程缺乏规则,而且它依然是不对称的。在土耳其这边,激进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者现在控制着国家的核心。少数亚美尼亚人寻求着民族独立,有些人在采取恐怖主义手段。他们只用了几个人就轰炸、占领了银行,暗杀了土耳其人和保守主义的亚美尼亚人。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二世自己1905年也差点没躲过暗杀。因为这是非公开的恐怖主义,当局难以采取精确的选择性镇压办法。有些镇压性措施过于笼统地用于亚美尼亚人身上,却使更多的亚美尼亚人感到疏远。有一些土耳其人推测,就像他们曾做过的那样,镇压会起作用,但带来的不是爱,而是亚美尼亚人的顺从。其他面对现代民族主义异议分子的人没那么自信,但是相信这一切他们以前都见过。他们认为,还有更多亚美尼亚人,不久将会拥护革命民族主义——除非那些民族主义者现在就将其摧毁。但是措施必须要比过去更加系统。这样一个更加激进的B计划就开始形成了。一些土耳其人在考虑采用先发制人的强制性“土耳其化”方式。然而即使冲撞现在有可能发生,它一般也不大会比传统的儆戒性镇压加土耳其化的策略更加致命——捣毁极少数的亚美尼亚激进分子的温床以威吓其他人服从,然后再将他们土耳其化。不过事情确实变得更糟了,它又一次是出人意料的地缘政治压力的结果。

131

滑向谋杀性清洗

激进的团结主义分子现在正在讨论B计划即强制土耳其化的多

种形式。1910—1914年间最能暗示青年土耳其党有罪的言论要算实现土耳其化或“奥斯曼主义”的愿望——如果必要的话,将采取武力或军事手段。没有理由认为这是种族灭绝的意思;更可能的是激进分子正在思考某些将强制同化、选择性镇压和有限驱逐结合起来的措施。该政策稳定下来,然后通过由两次相隔时间很短的战争施加的军事力量的压力得到了青年土耳其党中更多人的支持。两年后,奥斯曼帝国将径直穿过危险区,越过边缘进入种族灭绝阶段。1914年2月,巴尔干战争以形成由大国强加的屈辱性和平条款而告终。土耳其部队,在恩弗帕夏的率领下,一直在色雷斯收复领土,但条约剥夺了他们的所得,同时还替亚美尼亚社区索要了更多的自治权。这将是第一次由大国任命的两位巡查官来进行监督。亚美尼亚改革派被指认为是与大国一起将民族屈辱强加于土耳其人的合作者。受到和平条约批准认可的失去的领土减少了帝国中种族/宗教的多样性。奥斯曼主义失败了,不过对这个残余国家来说并不太重要。随着苏丹降格为一位立宪君主,一种更为世俗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

更多的青年土耳其党成员开始拥护种族民族主义。因缺乏一种广泛的支持基础,他们的理论家就在土耳其的心脏地带创造出了这样一个基础——被忽视并且至今受到蔑视的安纳托利亚落后农民。如果国家要得救,这里就是它最忠实的群众。这牵涉到将由官僚阶层/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对农民阶级剥削的概念移换成一个由国外和买办资产阶级对土耳其官僚阶层/农民中的无产者的种族—宗教剥削的概念(基德,1987:61)。反抗运动的领导人将是官员,跟随者是安纳托利亚农民。从这个当中又派生出一个更大的帝国神话。理论家如格卡尔普、特基纳尔普(出生时取名摩西·科恩,一个来自塞尔地区的犹太人,靠近萨洛尼卡)和埃克卡拉(来自一个俄国鞑靼商人家庭,曾就读于战争学院,后到巴黎学习)一直在想他们的民族身份与其最终奥斯曼、伊斯兰甚至土耳其化,不如“图兰语化”或泛突厥语化。这个实体包括住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直到俄国高加索地区,穿过中亚,然后向北到西西伯利亚的讲突厥语的人口[参见巴格基安

的图兰地图(1987:19)和兰多(1995:3),尽管两个都是后来的日期]。格卡尔普的1911年诗作“图兰”在下面两句中到达高潮:

对土耳其人,祖国意味的不是土耳其,也不是土耳其斯坦,
祖国是一个广阔并永恒的国家——图兰!

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格卡尔普主张通过征服去实现它。

敌人的土地将被破坏
土耳其将被扩大成为图兰

难道因为图兰人不是伟大的征服者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尔的后裔吗?特基纳尔普将未来可能的图兰扩张描述为“成吉思汗主义”,无情的征服,继之以强制土耳其化。这是一种亚洲对当时的欧洲攻击性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的改造形式。很快在欧洲甚至也出现了一个对这一图兰衣钵提出继承权的对手——匈牙利法西斯主义(参见本人的相关著作《法西斯主义者》),图兰将通过重新使欧洲面向亚洲而拯救曾一半是欧洲的帝国。1908年政变之后,这些泛土耳其主义分子成为土耳其的教授,影响了年轻男人和妇女,他们的观点在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得到了响应。泛土耳其主义者、奥斯曼主义者以及泛伊斯兰分子还在团体内部激烈争辩。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意见都不一样:恩弗是图兰热衷分子;塔拉特更倾向于中央集权和机会主义,强调最能吸引观众的身份;杰莫尔持折衷态度,说他自己的身份认同主要是奥斯曼,但是土耳其人必须重现帝国复兴(阿雷,1992,第4章;兰多,1995:31—52)。不过,强调土耳其而非伊斯兰身份认同则树敌更少。它没有让英国或法国感到愤怒(后者担心泛伊斯兰主义会削弱他们的帝国),它只触怒了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的德国盟友也鼓励土耳其的进攻以俄国敌人为重点,这样可以安全地避免可能发生的与盟友奥地利和中立的希腊的争端。因此,战争使图兰情感在团结主义者中进一步上升。

这对于生活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的亚美尼亚社区是坏消息,后者自己的民族主义正在加剧。他们与土耳其及库尔德农民住在一起时,并不总是很和谐。东安纳托利亚毗邻俄国,这阻挡了他们与图兰民族其余部分之间的交通路线。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现在正依赖着俄国的外部保护,因为俄国人答应帮助建立一个新的亚美尼亚人独立小国。图兰人开始发现在突厥民族与一个基督教俄国—亚美尼亚联盟之间的宏广一地区冲突。一名最重要的激进派,纳齐姆博士(军医学校的毕业生)主张:“奥斯曼帝国必须仅仅是土耳其人的。外国人的存在只是欧洲干预的一个借口。他们应该被强行突厥化。”他,以及当时的格卡尔普,正式建议强制同化,不是驱逐或谋杀。但即使这样也需要进行相当多的镇压行动。

133

和平条款加剧了土耳其被作为牺牲品的意识。土耳其人说,乖谬的是,基督教国家还是把土耳其人看作是压迫者,谴责他们的穷兵黩武暴行,而对强加于他们的痛苦和屈辱视而不见。阿卡姆[1992: 43—50;参见阿卡姆(1997)和达巴格(1994:104—107)]说土耳其人陷入了灭绝恐慌症(psychosis of disappearance),担心这将最终导致土耳其国家的解体和所有追求独立国地位的热望的破灭;以及社会妄想狂(societal paranoia),相信外部列强和少数民族正欲毁灭他们。他们无可非议地怒斥西方带有歧视的标准。他们观察到在战争期间基督教少数派的忠心有点摇摆,有些人在帮助敌方。土耳其人自己不得不单独决定他们的道德标准以及实现它们的必要措施。这种愤怒是目前正在展开的激进化的道德基础。

这是一个我们将一再遇到的悖论——来自于一个声称它正在受到压迫的无安全感的帝国民族。其推理过程是这样的:“我们曾经是一个自豪的帝国国家,但现在我们是被剥削的受害者。既然你们还虚伪地谴责我们是压迫者,我们将拒绝你们所有的道德标准。我们将仅在由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设定的限度内重拾我们的骄傲与我们的权力,因此将采取任何我们认为必要的方式。”事实上,这里确实存在某种可怕的逻辑。我一刻也没有同意过一般的土耳其人的逻辑,即种族灭绝实际上是由受害人的角色所激起的。然而,在1915年之

前,双方都能够把自己想象成牺牲品。亚美尼亚人曾遭受到可怕的集体迫害,但土耳其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存本身现在受到了威胁,而一些亚美尼亚人,借与外部强权合谋串通,正在帮助试图毁灭土耳其的行动。1913年7月亚美尼亚社区领导人——不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在国内会见外国外交官,说服他们给奥斯曼政府施加压力以给予他们更多的社区自治权。他们无视来自塔拉特及其他人的保持克制的请求。正如达德里安(1997:254—257)指出的,他们与俄国政府的联系将被证明是特别有害的。现在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不仅害怕几个激进民族主义者而且还害怕令人尊敬的保守的亚美尼亚社区领导人与外敌的勾结。如果所有亚美尼亚人全是敌人,那怎么办?

最激进的团结主义者现在似乎找到了一种孤注一掷地解决问题的出路。我们有“二战”期间驻扎在土耳其的几位同盟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军官(包括资格最老的奥地利军官,波米亚科斯基少将)的证词,他们说有几个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决定,巴尔干战争之后,“下一次”他们将通过清除或毁灭不忠实的少数裔来纠正过去犯的错误——而亚美尼亚人被挑选出来作为遭最严厉处罚的对象(达德里安,1994)。虽然这些话或可能不必要的浮词虚饰,不含实际种族灭绝的意思,但它们确实暗示了谋杀性清洗、土耳其化和驱逐出境。而某个“下一次”仍然是需要的。否则,青年土耳其党还有两个可能的选择。他们可以安心于权力,同时与变化着的自由派及少数派民族主义者的联盟达成妥协,一个一个地来。这样的妥协将有助于加强对全国的有效统治。这还有可能涉及与大国对亚美尼亚的改革要求的妥协,还有种可能,他们可以转而采用奥斯曼传统的儆戒性镇压政策杀掉亚美尼亚民族主义激进主义分子以威吓其余人屈服。第一个选择在1914年中期被勉强地执行,因为两个由大国安排的巡查官,一个挪威人和一个荷兰人,正穿过土耳其准备监督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的改革。团结主义者们一直在阻止巡查官,但他们不愿意被所有大国一起疏远。和平时期他们也没有实现大屠杀的手段或幌子,即使这曾是他们的目标。

但是又有了下一次,而它很快就让两个巡查官还没巡查任何东西就回了家。它随着一次规模大得多的战争而来,后者即刻引起负责监督的大国之间的关系无情恶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1914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土耳其与德国在8月2日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承诺它不久将加入同盟国。如果土耳其确定加入进去,那它自然会加入到德国一方,因为德国是唯一未试图攫取其领土的大国。英国传统上支持奥斯曼帝国,但到19世纪80年代转向了一种与俄国友好,瓜分亚洲战利品的策略。统进会过高估计了德国的力量——他们自己珍视中央集权军国主义胜过自由主义,而意识形态的偏见似乎导致了这一错误。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土耳其党成员巴扎里亚认为这全是由一群热爱行动和斗争胜过谨慎与和平的激进领导人很冲动地决定的(卡帕特,1975:297)。但是,卡什(1999:第7章)认为,以恩弗为首的激进分子,有一个更加一贯的从战争中获得新生的视野和一个更加周密的得到他们想从德国那里得到的东西的战略。如果德国人将获胜,最好早点加入到它的联盟之中,因为胜利的战利品将会更大。在相邻的保加利亚也加入德国联盟之后,统进会没有了任何的疑虑。就德国来说,它想从土耳其获得一项关键的战略资产;如果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遭到封锁,英国与法国就无法为支持俄国而输送资源(杰莫尔帕夏,1922:113—115;麦克菲,1998:第5—6章)。这实际上是通过几条德国船只、大量的土耳其火炮以及土耳其步兵对英国在加里波里登陆的英勇抵拒等来实现的。

在秘密条约签订后的这一周,统进会最后一次尝试坚持采用A计划。他们寻求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达成明确交易,考验他们的忠诚程度。一位高层统进会代表让主要亚美尼亚党领导人帮助在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人组织一次暴动。如果它成功了,统进会说会同意他们建立土耳其统治下的一个自治的亚美尼亚省。亚美尼亚代表拒绝了这一提议,回答说一旦战争开始,边界两边的亚美尼亚人将保持忠实于他们各自的国家(贾法里安,1989:76)。这似乎是他们最理智的选择,因为违逆哪一个国家对一个缺乏军事资源的少数群体来说都绝对是冒险。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如果亚美尼亚人不

得不选择忠心于这其中的一个国家,那么更多的人将选择俄国而不是奥斯曼帝国——因为后者近来一直在对他们进行杀戮。亚美尼亚人对他们青年时期的回忆表明了这一点。有一个人在回忆他在席瓦斯(Sivas)的成年时期时,充满感情地谈起“基督教叔叔”,即俄国:“安纳托利亚人的亚美尼亚人获救的希望将在于俄国军队的到达”(贝多基安,1978:7;参见贾法里安,1989:41—44;卡赞吉安,1989:48)。

当然,一个体现了确定的权力分配并已经现代化的米勒特制度将能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亚美尼亚人对土耳其的感情。亚美尼亚激进分子想从中央集权统治下获得自由,但自1908年以来团结主义者就努力加强集中化程度。在他们看来,权力下放已经造成了一个一个省的相继丢失。到1914年为止,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地区性自治将很可能导致亚美尼亚进一步提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要求。这似乎是整个欧洲都在走的路。对激进分子而言,亚美尼亚人似乎是国家的政治敌人和图兰民族的种族敌人。他们将忠心测试标准设定得太高,亚美尼亚人达不到要求——团结主义者知道这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

奥斯曼帝国于1914年10月末正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宣言敦促“摧毁我们的莫斯科敌人”,“让我们的种族即图兰的全部分支都联合起来”。4名非土耳其裔的内阁成员辞职抗议;大维齐(一位埃及贵族,一名有些边缘化的青年土耳其党党员)犹豫,但还是留了下来。辞职行为增加了团结主义者对国家的控制。组织松散的土耳其部队奋力作战,也并非无法取得任何成就。一支英国远征军在美索不达米亚被击败。在加里波利,英军一次试图打通海峡人口的登陆行动被打退。这个国家是能够存在下去的。但是灾难在1915年1月的高加索到来,恩弗·帕夏的第三军在此遭遇彻底溃败。恩弗想入侵俄国的企图似显鲁莽,这符合他放纵的野心和他对一个图兰民族帝国概念的迷恋(斯特默提出,1917:76—77)。他的9万人军队中的不到四分之一回到了土耳其。只是极度寒冷的冬天气候阻止了俄国人的反向入侵。

136 超过 15 万名的俄国籍亚美尼亚人自愿报名参加了沙皇的军队，一些人是出于爱国主义，有些人将沙皇视为小恶，有些人想弄到武器——以后或可用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目的。一群人数少得多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包括一些有经验的士兵，跨越边境加入到俄国人这边。大多数亚美尼亚的资料显示他们只有 1000 至 2000 人，尽管最详细的叙述说是 5000 人。土耳其军队报告提出有 6000 至 15000 人（查拉比安，1988：218—229；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档案，1983：第二卷：13,45—46,63）。德罗基（1986：443）估计的 5000 到 8000 人似乎是最可信的折中数。不管该数字是多少，较之于征召进入土耳其部队的 20 万亚美尼亚人来说就相形见绌了，后者中极少有开小差走掉的。然而虽然亚美尼亚志愿者数量微不足道，可他们对俄国人是有价值的。他们熟悉地形、土耳其部队的部署以及当地人的同情立场。对土耳其来说，这在战争的前三年时间里是一个非常具有威胁的前线，直到 1917 年革命带来俄国军队的覆灭。一些亚美尼亚人加剧了这种威胁。

以前奥斯曼国家部分地区的激进化，加上一小部分的亚美尼亚人对打败土耳其人的参与，解释了下一次升级到只指向亚美尼亚人的谋杀性报复行为。亚美尼亚人似乎更加具有威胁性，然而也比希腊和犹太人更易遭到攻击。奥斯曼希腊人现在知道曾经赋予他们特权的米勒特制度已经死了。他们的忠心归于雅典。但是土耳其不想刺激中立的希腊。犹太人既不在地理上集中（除了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被相信与敌国有联系。许多犹太人是青年土耳其党，因为他们依然对基督教徒表示怀疑。德国盟友也试图保护希腊人和犹太人——但不包括亚美尼亚人（达德里安，1996：附录 C）。几个奥地利和德国的官员，驻在欧洲省份的亚美尼亚领事，加上拉斐尔·德·诺加莱斯，一位与土耳其部队作斗争的委内瑞拉雇佣兵，全都认为青年土耳其党的计划是以后才转向其他少数群体的。较少引人注意的基督教少数在战争中确实受了苦。在骑马途中，德·诺加莱斯经过见证了居民被屠杀的聂斯脱利派（Nestorian）基督教村庄。不像亚美尼亚人，他说，这些人对土耳其统治不构成威胁。布赖斯报

告详细描述了这些大屠杀,令人毛骨悚然。但是美国领事报告说极少有希腊人遭到屠杀。绝大多数人是被迫离开,他们的财产被偷走,一些年轻妇女遭到强奸(布赖斯报告,1972:99—192;达德里安,1994;拉斐尔·德·诺加莱斯,1926:136—137,206—208;美国档案,1994:65—70)。当在1922年希腊—土耳其战争期间希腊人既具有威胁又易于遭到攻击的时候,近3万希腊人在土耳其攻下土麦那城之后被屠杀。但就现在而言,主要的基督教威胁似乎是由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的亚美尼亚人社区构成的。

库尔德人的威胁要更小得多,尽管他们与亚美尼亚人一样易受攻击,但没有外国保护者。库尔德人是更近的土耳其(及其他)国家的牺牲品。但是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主要政策是强制同化加部分驱逐,不是大屠杀。库尔德是穆斯林。土耳其人视他们比亚美尼亚人更原始、更带有部落性。他们能够通过土耳其化对之进行贿赂和现代化改造,同时库尔德人发出的政治威胁较少。库尔德人又太穷,不值得抢劫。在1916年到1917年间整个库尔德部落联盟被从指定为土耳其化地区的东部边境省份驱逐出去。但是他们没有被谋杀。不出意外,他们之后被同化为他们新居住区的土耳其人口(阿达尼尔和凯泽,2000:14—15)。只有亚美尼亚人是报复和驱逐的受害人,这些报复和驱逐都是谋杀性的。最后一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使奥斯曼土耳其直接穿过危险区,越过边缘进入谋杀性种族清洗。

137

结 论

本章没有描述一个不可避免的或有预谋的产生谋杀性种族清洗的过程。这种产生是两个持续存在的和两个更为偶然的压力的结果。

1. 欧洲影响与基督教世界军事及地缘政治权力一直在鼓励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反叛行动。虽然基督教国家曾试图阻

止帝国的覆灭，但它们对统治帝国的土耳其人持负面的看法。这个帝国是“欧洲的病人”，被“可怕的土耳其人”、“狂热的穆斯林”和“野蛮的亚细亚人”统治着。他们确定帝国不应该生存下去，除非它能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文明。但是他们为这一文明过程安排的自由主义妙招，虽然常常是怀着良好的意图，却并不是非常适合这个国家或其生存。更重要的是，行动自始至终伴随着强占土地和经济榨取。在这一切之后，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要么是奥斯曼帝国崩溃，要么是某种奥斯曼的、穆斯林的或土耳其式的复兴尝试孕育出对基督徒的冷酷的印象。

2. 这种压力强化了帝国之内长久在土耳其人及穆斯林中普遍存在的对基督徒的经济愤恨。民粹派强调穆斯林主人已经成为奴隶。既然这不是全然的虚构，一个激进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团体就可能动员起广泛的穆斯林大众展开反对基督徒的行动。内陆的安纳托利亚滋生出第二种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针对买光他们的土地的亚美尼亚人的愤恨。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以由其对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控制而带来的暴力作为回应。在两种情况下，阶级愤恨都被转移到了族性上。但是这两个穆斯林平民团体崛起于不同的地区和阶级。它们是否会团结在一起还不清楚。这样的联盟更不大会处在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之下。战前大部分时期青年土耳其党都与亚美尼亚人结盟，他们不是那些煽动平民暴力的人。没有一方打算重族性而舍阶级。

3. 但是随着军事与政治压力让他们将现代化看作比他们原先认为的需要更多的集权，青年土耳其党开始激进化了。他们的多种族奥斯曼主义也开始让位于更广泛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但土耳其人仍然没有表现得很乐意接受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帝国的力量在于多族性，在它放弃多族性之前，你不知要让帝国打败你多少次。但是奥斯曼政治较少受大众运动而更多是受控制着重要权力资源的极小团体的左右。帝国的经济现代化大都被非土耳其人控制，而土耳其人控制着政治和军事现代化，而他们越来越被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改革所吸引。通过调动军

队和警察部门中的强制力量,以及凭借招集群众游行的能力,他们在1908年和1913年的两个阶段攫取了政治权力。之后的清洗使得国家和青年土耳其党本身走向激进化。但是这并不一定就遵循我第一个种族论点中表示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民主理想的褪色,平民与种(民)族的混合。但是青年土耳其党也让十分黑暗的奥斯曼做法激进和现代化了,这使得镇压和族群之间的分而治之走向了实际清洗。

4. 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加剧了军国主义和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局势,从而使得这种混合更加危险。从1914年末,唯有德国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保留了一点影响,而德国对亚美尼亚人没兴趣。他们的主要保护人,“俄国大叔”,在部分亚美尼亚人的支持下在与帝国作战。这引起人们对一种混合了我的论点4a和4b的局面的恐惧。虽然土耳其人在帝国中拥有相对于亚美尼亚人的绝对的力量优势,但两边能够通过外国支持达到平等,正是这一点在土耳其人中产生了真正的政治灭绝的恐惧。战争还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将不存在对解决帝国中种族—宗教紧张关系的激进方案的任何外部限制因素。这是一个偶然产生和外来的压力,因为奥斯曼人没有促成全面战争。他们加入已经被发动起来的战争的決定也是一种错误,这原本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的。

所以,与基督教经济特权相联系的地缘政治不稳定(论点5)使得某种激进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强烈反应成为可能。几次的地缘政治危机使激进分子得以在奥斯曼改革者内部激烈的论战中获胜。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曾是盟友——青年土耳其党的A计划。在接下来的6年里主要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压力,他们分开了。最终的激进化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政变提供了激进主义的潜在手段——一个能够连接两种不同的反对基督教特权的民粹主义不满情绪,体现一种现代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解决方案并采取激进的系列政策的国家核心。只有第二次政变,加上“二

战”的强化,危险才波及到全体亚美尼亚人。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人阻止了拯救帝国的图兰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者的计划,而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亚美尼亚领导人都在增加与俄国的接触。一些亚美尼亚人与一些土耳其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上升到了沸点。正如本书要表明的,这不是一个反常的结合了根深蒂固与偶然的因素而滑向谋杀性种族清洗的事件。像平常一样,政治权力——谁将控制国家——才是最终危险的决定性来源。

请注意,对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中央集权论)和暴力的致命拥护是多晚才出现的。青年土耳其党,而非宫廷和伊斯兰反动势力,才应该是造成亚美尼亚人毁灭的重要因素,这一事实将会使1912年甚至1913年的很多时间里的绝大多数亚美尼亚人大吃一惊。就在1914年8月,青年土耳其党还在尝试一种他们新型的A计划,与亚美尼亚人结盟。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他们的B计划——大规模但是战略上进行限制的驱逐行动——很快地诞生了,而又甚至更快地转变成了更加类型化和远更暴力的驱逐行动C计划。这不是如通常被论证的那种严密的、有组织的和有预谋的一种种族灭绝。它显然适用于我的第6个种族论点:谋杀性清洗极少是施害者一开始的意图。它也不是唯一曲折然而最终快速地走向歧途的有希望的政治运动的例子,我们在下文的章节中将会看到。

第6章

亚美尼亚 II：种族灭绝

140

种族灭绝需要数字和意向性等条件。我们不知道 1915 年之后几年被杀掉的亚美尼亚人的精确数字——甚或是住在土耳其的人的数字。^[1]1915—1916 年当中有 120 万至 140 万人被杀可能是一个合理的猜测。但零星的屠杀行动在英法占领军撤走之后恢复，又多了数千人死去。也许总共有三分之二的亚美尼亚人死了。许多人逃亡国外幸存下来，所以 1914 年居住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大约仅有 10% 的人 1922 年还在亚美尼亚——20 世纪最成功的谋杀性清洗。有比妇女和儿童多很多的男人被杀。1916 年，在代尔祖尔集中营的 18 万亚美尼亚人中，活下来的仅有 10% 的男人（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以及 30% 的妇女，60% 的儿童（克沃尔基安，1998：224）。但是因为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杀掉很多，又因为很多幸存的妇女和儿童都被强制同化为穆斯林身份，所以这是一种消灭亚美尼亚民族的尝试。种族灭绝这个词当时还不存在，但是数字与事情相称。

然而它是意向性的吗？它是政府预先计划好的吗？大多数作者说它是（比如，达德里安，1995；梅尔森，1992），也有少数持异议者（阿

[1] 土耳其官方资料估计有 2 万—30 万死亡，这个数字太低了。麦卡锡（1983：112, 130）估计的高一点，到 60 万，他说其中 40% 是亚美尼亚人。绝大多数其他人估计 150 万人被杀，占 210 万—240 万人口总数的 67%—75%（阿斯托里安，1995：50，脚注 17；霍瓦尼西安，1986, 1994；克沃尔基安，1998：14—16, 60—61；拉梅尔，1998：81—85；亚尔曼，1970：326—332）。

达尼尔,2001;苏尼,1998)。我站在后者这边:虽然最终还是有组织和有计划的,但这是从对出乎意料的危机的突发响应中阴差阳错地产生出来的。我们没有已被证明是可信的确凿证据,没有明明白白的来自上层的种族灭绝命令(本书讨论的其他事件中也没有)。^[2] 141 尽管如此,1914年间处在统治地位的统进会正趋向激进化,而这之后开始走向种族灭绝。有些人说战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除掉亚美尼亚人的机会,也提供了解决亚美尼亚问题的一劳永逸的方案。这些人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不清楚。统进会还不是一个多数团体,也没有获得政权中的两个强人恩弗和塔拉特的明确支持。恩弗在他从败在高加索战场的俄国人手里回到君士坦丁堡之后似乎转向了他们的观点。1915年1月22日,他赞扬了亚美尼亚集体和军队的忠心,但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却开始因为他自己的战略失误而责备他们。一些德国军事顾问力劝把亚美尼亚人从战略区域清除出去,以阻止他们与入侵的俄国人暗中合作(达德里安,1995:34—42)。塔拉特后来告诉亚美尼亚大使说,驱逐不是“匆忙决定的……它们是漫长和仔细考虑的结果”(摩根索,1918:333)。

在1915年年初“驱逐”就计划好了,但这是什么意思?一些土耳其人把这个词当作对某种更坏得多的事情的一种委婉表达,但很可能大多数人都不是。强制驱逐包括我们称之为B计划的,即A计划最终失败之后采取的计划那样的内容,也就是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达成妥协一起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起初B计划是用来将潜在的不忠心的亚美尼亚人从战场上清除掉以让他们不能干涉战争。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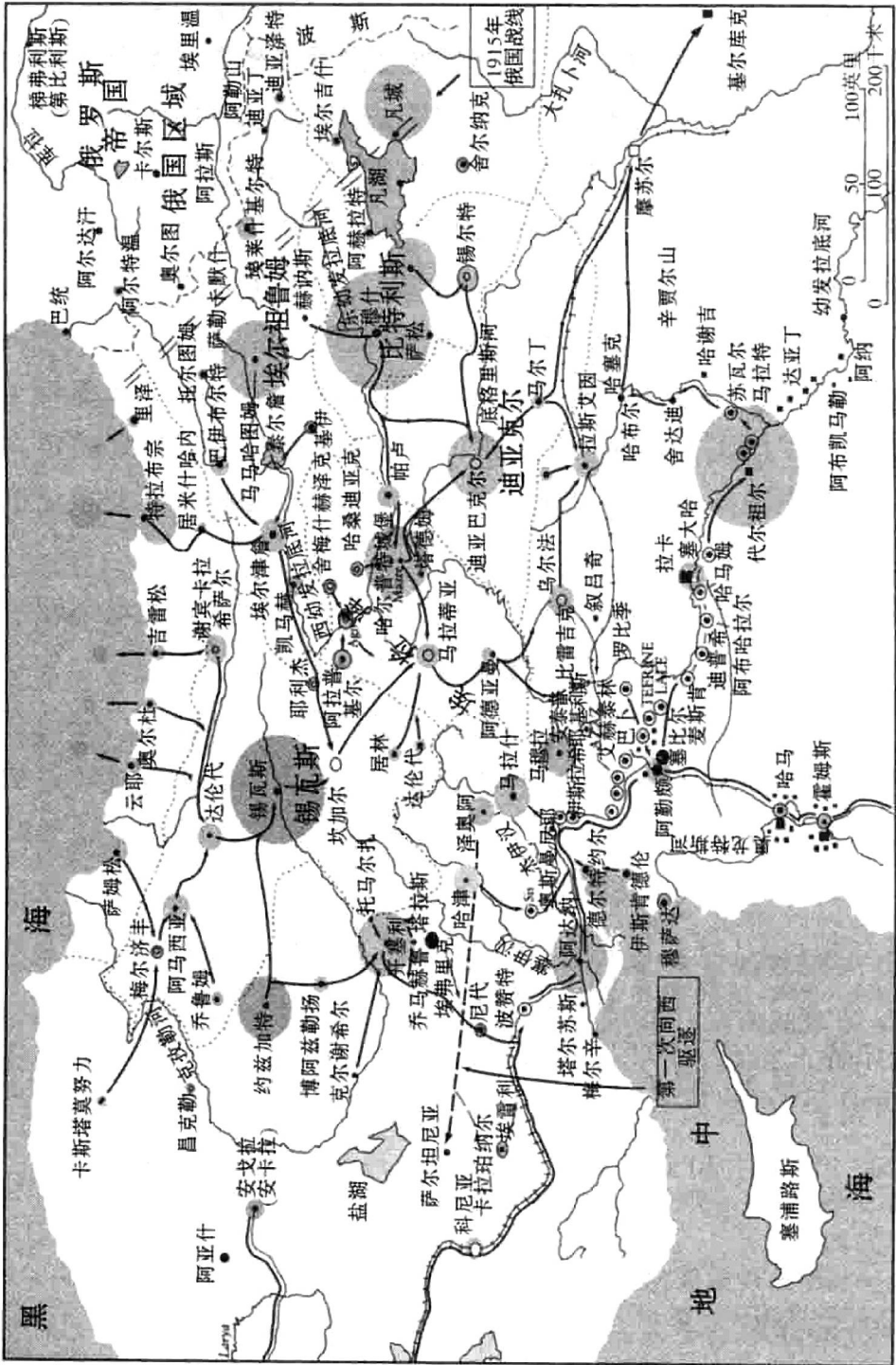
[2] 我不认为以下的是中央委员会或三人领导小组似乎下了种族灭绝命令的真实文件——2月18日和3月15日由中央委员会写给阿达纳当局的信件或1915年9月、11月和12月由塔拉特和恩弗发给在阿勒颇的手下的电报。这些是由安多尼安发表的(1920),在几次亚美尼亚人对种族灭绝的陈述中被引用,又得到了达德里安的支持(1986a)。土耳其学者提出文件是伪造件。泽克(1998:121)也表示了怀疑。凯泽(199b:108)说在它们被同意为是真实的之前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达德里安(1993)的一份据称提出存在一本种族灭绝的操作行动计划的文件的英文版也未注日期。不幸的是,伪造件确实在外流传。

这一行动含有我所称的战术诱导：作为一种军事战术，它能够诱导战术家走向更坏的选择。它能够轻易地升级到C计划：将所有在易遭攻击的交通线路和前线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可能牵涉整个安纳托利亚和几乎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都驱逐出去。他们将被赶入南方“较安全的”边缘沙漠地区。这种升级是由1915年初的军事惨败促成的。东线战场1月末在俄国压力下收缩，2月在苏伊士运河，4月在美索不达米亚被英国人击败。英国眼看就要从叙利亚海岸进行海上登陆。结果，在3月18日，一支友谊舰队将君士坦丁堡本身作为目标，试图强行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当这失败之后，他们的部队于4月25号在加里波利登陆——离首都仅几里路。这是一次试图将土耳其在战争中彻底击败的尝试。君士坦丁堡一阵惊慌，计划被定在最后一站的安纳托利亚，这里必须确保稳定，如果要想有任何存活机会的话。

要理解奥斯曼帝国如何越过边缘进入对亚美尼亚人的谋杀性清洗，看地图6.1。注意前线与驱逐亚美尼亚人的关系。在土耳其领导人中还普遍存在一种信念即亚美尼亚人会与敌人里应外合，以及有想在安纳托利亚实现“纯洁”土耳其心脏地带的愿望。大规模驱逐被广泛认为是解决短期危机的办法，而激进分子则将其看作是让奥斯曼土耳其走向长期安全的路径。

B计划过去（现在仍然是）被土耳其人普遍视为是当时环境下合理的政策，鉴于他们眼里看到的亚美尼亚人与俄国人合谋的景象（例如，伊泽特·帕萨，1992：200—209；亚尔曼，1970：326—332）。C计划更难辩护，尽管哈利尔·伯克泰（在土耳其最重要的报纸《国民报》2000年10月20日的版面上）用战时环境对其进行解释：

随着加里波利登陆，土耳其人被迫后退，并被逼到角落……伊斯坦布尔也会丢掉，将会向安纳托利亚撤退，并且除了安纳托利亚心脏地带已经没有地方留给土耳其人了。然后，就在这一时刻，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团体的活动与东线战场的俄国军队的进攻并列展开。结果出现的梦魇让安纳托利亚也不再安全。



地图6.1 1915年土耳其帝国发生的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
注：本图由亚美尼亚国立研究所提供。

C 计划还与奥斯曼强行驱散反叛民族的做法一致。1913 年色雷斯东部的基督教村庄被特殊组织部队(后文对此有更多讨论)摧毁, 以将当地所有基督教徒吓跑。1914 年年中沿爱琴海一带的一些希腊村庄和农场受到同样袭击。到了秋季在巴勒斯坦出现了由激进的雅法(Jaffa)市长发起的警察袭击犹太复国主义社区的行动(凯泽, 2000b, 2001a; 卡什, 1999: 166—167)。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在南斯拉夫见到的谋杀性种族清洗类型: 屠杀, 焚烧和强奸, 以便吓唬其余人离开——但不是种族灭绝。它是整个政策的政策还是统进会激进分子在危机期间控制压制性资源的一部分? 我们不知道, 尽管我倾向于后一种解释。很可能是 1915 年年初的军事灾难使得恩弗和塔拉特改变而采取了这种激进政策。

但在战时甚至连 C 计划也是不稳定的, 它打破了我的分类“治安性驱逐”的有序界线。这种战时的破落帝国正在挣扎着为它的士兵提供供养。一个远比其他重要大国占总经济剩余比重更高的部分用于了战事, 其中大量的是用武力勒索取得的。估计有 24 万土耳其人在战争期间死于疾病, 战死的有 32.5 万人(艾哈迈德, 1993; 麦卡锡, 1983)。这是一个可怕的苦难水平。^[3]但是鉴于国家的苦难状况, 没有人会想象过驱逐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而不引起大规模死亡。我们没听说过有什么对他们重新安置的计划。他们就是被扔进了荒凉的沙漠地区。亚美尼亚人不能让带上任何物品, 没有任何关于沙漠的生存技巧, 没有获得政府的支助。绝大多数人必死无疑。即使我们采用土耳其官方对事件的看法, 这也将包括混合了政治灭绝成分, 同时又充满了对受害人的极端残酷无情的暴力驱逐, 一切都在沿种族文化灭绝的方向下行。

144

[3] 这些数字经常被土耳其否定主义者作为例证, 声称与亚美尼亚一样多的土耳其人被杀死。尽管这里无意尽可能缩小这一时期土耳其人经受的苦难, 然而实际被亚美尼亚人杀害的(或导致他们死亡)的土耳其人肯定只占土耳其总死亡人数的一个很小部分——并且是只占被土耳其人杀死的亚美尼亚人的很小比重。

谁发起了这样的计划？不可信赖的休斯因·卡希特(约尔辛)的回忆录声称中央委员会在1915年2月中旬就批准了种族灭绝。他说当时十个成员中有三个(格尔卡普、卡拉·凯末尔和米德哈特·苏克鲁)反对这一决定,但他们同意不去发表他们的反对意见。他说委员会以激进分子占绝大多数,目前包括恩弗帕夏、塔拉特帕夏和三个准军事部队特别组织(Teskilat- I Mahsusa,这个准军事部队已经参与过巴尔干暴行,后来又执行了大多数的种族灭绝屠杀)的领导人:巴哈伊丁·萨柯博士、纳齐姆博士和阿提弗·雷扎(阿斯托里安,1995:33—41)。三人领导小组之一的杰莫尔帕夏不在其中,尽管在这些早期时候评论家认为他是一个强制土耳其化的拥护者(摩根索:172—174)。

约尔辛的叙述或许有点添油加醋,但它看上去似乎总体是准确的。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萨洛尼卡会计师苏克鲁是一名温和的知识分子,然而我们缺乏来自格尔卡普持不同意见的证据。恩弗和塔拉特的激进主义有1915年年初的文件为佐证。略微再早一点的日期,雷扎和两名医生的激进主义也有文件证明。纳齐姆博士宣称早期的奥斯曼政治家“远见不够,没有将他们统治的国家中的基督教因素清洗干净”(布赖斯,1972:8)。^[4]一位德国将军认为萨柯博士应对1915年4月在埃尔祖鲁(Erzurum)的屠杀负责,同时土耳其消息源援引了他承认驱逐“可能意味着违背国家与人道主义原则。我愿意也准备着用我自己的生命为这种‘责任’付出代价”的话。将来,他说,人们将会承认“我是为效忠国家而牺牲了自己”(转引自亚尔曼,1970)。然而他在土耳其人当中被当作一名人道主义者。1916年,他在君士坦丁堡组织了一系列由医生、社会政治家以及政治家开展的关于安纳托利亚,包括由梅毒、霍乱和其他疾病带来的破坏,以及安纳托利亚农民无望的贫困、受剥削和缺乏教育的公共演讲。他自

[4] 我怀疑统进会脱党成员迈弗兰·里法特的陈述不可信,他说在另外一个场合纳齐姆告诉委员会说这次根除必须是彻底性的。(以上的所谓发言引自查拉比安,1988:226)

己的演讲尽力给安纳托利亚官员施压,促使他们采取新的措施进行社会和卫生改革(斯特默,1917:172—173)。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统进会内部三种立场之间的争议。有个小的派别还想妥协——此为 A 计划。中间派倾向于对前线地区进行强行驱逐。然而随着英国人与俄国人的进攻,驱逐扩展到了整个安纳托利亚。B 计划和 C 计划,都是驱逐行动都不稳定。B 计划在阵线向内收缩时不稳定,C 计划不稳定是因为它必然导致大规模死亡——即使是非意向性的。第三同时也是最激进的这一派赞成 D 计划,即彻底的根除。最终他们赢得了争议。上一次巴尔干战争也引发了争议。世界大战使它转向驱逐。亚美尼亚官方拒绝煽动对俄国的叛乱,加上土耳其战败的刺激,导致激进派成功将驱逐扩大到 C 计划,然后再升级到 D 计划——种族灭绝。这最后两次升级得到了来自上层塔拉特内政部部长和恩弗战争部部长办公室的协调。该政策的某些结果没有被彻底全面地考虑过。把人往南赶离战区,甚至赶离安纳托利亚,镇压所有反抗——但是镇压应当严厉到什么程度,驱逐怎样能圆满完成,被驱逐者到达南面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极少数人可能彻底预想了一遍。也许只有最激进的一派想过,因为他们的 D 计划是最简单同时又最严密的计划。〔5〕这似乎是最可能的情形。它不像一个高度计划的种族灭绝,尽管它很快升级到这一步。是的,这是种族灭绝,但它来得非常突然,在缺乏组织中开始。

145

种族灭绝过程

所以,种族灭绝是一个发展过程。它的次序由凯泽讨论过

〔5〕 亚美尼亚人的叙述有时从种族灭绝发生事实“往后解读”到早期事件,然后它就被目的论地看成为一个严密的种族灭绝计划。例如,在网上传播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年表”(www.armenian-genocide.org./chronology)散布土耳其激进分子的言论,纳齐姆对亚美尼亚产品的抵制,反对亚美尼亚政治家的行为,以及特殊组织的形成,似乎一切都是计划的种族灭绝的第一阶段。事情恐怕不是这样;更可能的是不同的反亚美尼亚成分和战争准备快速汇聚到一起。

(2001a), 可以从地理上进行追溯。第一个事件发生在2月末的多特约(Dortyol), 一个离叙利亚海岸不远的亚美尼亚大村子。两个英籍亚美尼亚间谍登陆, 受到款待, 然后被捉。该地被认为是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一个据点。当局认为间谍正试图趁英国舰只登陆时组织一次牵制性的起义。英国人在试探他们能从亚美尼亚人得到多少支持, 同时他们想要土耳其人相信他们将侵略这里, 虽然他们以前不会。许多当地亚美尼亚人没有对征兵作出回应。政府自然很紧张。它有可能相信了关于一个广泛的地区性起义阴谋的谣言, 认为更稳妥的做法还是运用儆戒性镇压手段阻止任何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阿达纳州长派遣了一支大型的军事部队前往多特约村子, 大多数亚美尼亚男子被逮捕并被作为劳动队伍驱逐到其他地方。

146

这一事件随后被用来为恩弗2月27日裁去军队中20万以上亚美尼亚新征入伍者的命令作辩护。他们也被分配到强迫劳动队。这一政策也被运用到其他非穆斯林身上。阿伦索赫恩(1916)与其他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士兵分配到劳动队, 在此有些人被强迫在恶劣条件下劳动。但他没有表示出犹太人被驱逐或被杀死的意思。这明显是一次减少战略地区危险的亚美尼亚同谋者以及所有武装的亚美尼亚人的尝试。但这是因为他们真的被认为是一个威胁, 还只是因为这样就可以达到让他们不能抵抗已计划好的当中最坏的部分? 让我们看看哪一种情形最符合后面发生的事件。

在第二次事件来临之前出现了一阵暂时的宁静, 更使人认为是临时的而不是计划好的回应。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地方平民人口的驱逐发生在一个月之后的3月26日, 在西里西亚马拉什省的梓橄(Zeitun)镇。地图6.1表明这根本不靠近前线, 而是在一条重要的军队补给线上。它还以最坚固的亚美尼亚城镇而闻名, 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同时拥有很多配备武装的民族主义者。还有由军队逃兵扩充起来的亚美尼亚土匪团伙活动在附近的山丘之中。当这些人在3月中旬开始袭击军队供给车队时, 压力就到了地方亚美尼亚领导人身上, 他们要与军队合作一起围捕土匪。这起了作用, 绝大多数匪徒被打死、抓捕或驱散, 而当局也减轻了压力。当匪徒活动再次增多的时

候,当局判断(凭某些理由)当地人不再愿意合作。一位驻扎在那里的军官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当地亚美尼亚人憎恨暴戾无能的宪兵队司令。这导致一场战斗,其中十几个宪兵被打死。他评论说当地人处于两难境地。他们“就是不再信任政府了”,而假如他们供出暴徒,又怕遭报复。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现在的情况有多危险,他评论说,因为这对当局来说是一个太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个区域,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保护这里的安全(凯泽,2001b:13)。

所以政府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并消除所有来自这些独立的山地人的未来威胁。4月8日,一支大型军事部队进攻梓橄镇,开始杀死亚美尼亚男人,一连三天。有几个武装的亚美尼亚人逃进了山里,在那里他们继续战斗,不管社区领导人的反对,后者害怕更大的报复。但这似乎已经决定好了,因为驱逐马上就开始。大多数当地男人被遣往南方的叙利亚沙漠中的代尔祖尔镇。但是妇女、孩子和年长者都赶往另外一个方向,向西北到达了萨尔坦尼亚和科尼亚——这与后来所有的驱逐都不同。路上没有杀戮,两个群体都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又一次与后来驱逐不一样。活着的被驱逐者说当局不知道应当拿他们怎么办。把在多特约和梓橄镇的行动,两次之间相隔的时间以及包含的较之后来驱逐行为不同的待遇都加在一起看,这很可能是一次临时特别性的儆戒性镇压——这镇压如此可怕,以致它为所有其他亚美尼亚人立了榜样。裁掉亚美尼亚士兵揭示了当局另外的对更普通的亚美尼亚人不忠心的担心,但这些人还被安排在建筑任务中,到目前还没有出现大规模杀害行为。

现在又一次出现了暂时的宁静,不过时间只有10天,随后是两个完全不同然而却几乎同时进行的升级行为。一个是另一次偶发事件,但是发生在一个重要得多的城市当中。凡城是安纳托利亚东部靠近俄国与波斯边界的战略城市,是包含相当多亚美尼亚人口的最大城市。一位温和的市长塔辛帕夏,在1914年年末被一名激进的团结主义者杰夫德特贝伊——恩弗的姐夫——取代。在前线战败,怒气冲冲回来之后,杰夫德特贝伊将失败怪罪于亚美尼亚人。4月16日这天,他将五名地方亚美尼亚领导人骗来见他,随后将他们杀害。

147

受惊的亚美尼亚社区筑起路障。双方挖掩体隐蔽防守。零星的杀戮开始于针对住在湖周围的村子里的孤立的亚美尼亚人。20日,一次企图对一名亚美尼亚妇女实施强奸的行为骤然演变为大规模的开枪射击,一场对亚美尼亚住处的血腥围攻开始了。这又随着俄国人兵临城下——以亚美尼亚志愿小队打头——而融入战争之中。他们于6月19日攻占了城市,但是在8月它又被土耳其军队及库尔德游击队夺回。凡城是一场全面的种族内战的见证地,其间前线与后方结为一体。

凡城深深震惊了政府。政府的同情给予了当地土耳其人而不是亚美尼亚人,激进的地方长官一直在给政府发送煽燃性的报告。4月19日这天,当两边都在挖掩体时,政府通知德国使馆它不再信任亚美尼亚人。凡城一直被用来为通过大规模驱逐实现针对与敌人合谋的亚美尼亚的报复而辩护(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档案,1983)。在议会,一些代表批评当局的夸张行为。有些土耳其官员还声称第三集团军司令卡米尔将军挑起了事件,然后将其加以夸大以证明亚美尼亚人是战争努力的威胁,需要铲除掉(达德里安,1994b:93)。虽然温和的代表阿赫麦德·伊泽特·帕萨仍为土耳其的过度反应感到惊恐,但他说到他成为东线司令时,才意识到亚美尼亚人的暴行真的很过分(1992:200—209)。德·诺加莱斯,来自委内瑞拉的雇佣兵,负责指挥在凡城的一个土耳其人的炮台,令人信服地报告了两边的无情战争。任何一方都不给予宽容饶命机会,直接杀掉抓获的参战者和合作者。亚美尼亚人在6月城市被解围之后犯下暴行。当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在8月重新将其夺回之后,他们就升级到了地方种族灭绝(关于凡城的其他种种叙述参见布赖斯,1972:32—77;达德里安,1996:31—34;德·诺加莱斯,1926;麦卡锡,1995:188—192,223—230;摩根索,1918:296—300)。

148

在凡城战事爆发时,首都也受到了威胁。政府听说了即将要到来的协约国进攻,事实上加里波利登陆接近突破成功。首都出现了一阵忙碌的政治活动。4月20日,形成了一个将欧洲的穆斯林难民迁入梓橄居住的命令:亚美尼亚人不允许再回到这里。然而他们的

命运依然不清楚。4月22日或23日,统进会和军方领导人作了几项大的决定,开始为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的游击战争作准备,包括从君士坦丁堡及其他城镇清除掉200名亚美尼亚领导人,包括能找到的所有革命的民族主义者。4月25日,他们被送往内陆的战俘营。对亚美尼亚领导人的第二波驱逐发生在协约国登陆两天后。

24日,原初遣往西北科尼亚梓橄镇的被驱逐者改道向南遣往代尔祖尔。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变化。他们本有希望能在科尼亚活下去,但是现在他们可能会死在叙利亚沙漠之中。27日,塔拉特告诉德国大使馆所有宗教团体的政治自治都被废除了。在25日到30日期间,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据点或军队供给线)更多的村镇被清空,被驱逐者被迁往南部。随着4月末亚美尼亚东部高原上冰雪的融化,奥斯曼军队及特别组织部队在凡城、穆什及沿俄国阵地一线开始屠杀行动。不清楚的是对被驱逐的政治领导人的第一次杀害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很可能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因为告密而受刑,然后被杀害,但是大多数领导人可能直到5月末或6月才被杀害。同样不清楚的是亚美尼亚军队劳动队什么时候开始被杀,但5月底这已在进行之中。截至7月,20万亚美尼亚士兵几乎都被杀。虽然有少数几个亚美尼亚人一直在开小差,但是绝大多数亚美尼亚人似乎是服从的。协约国现在不得不面对少掉很多的奥斯曼士兵,同时将逃出来的亚美尼亚人吸收为士兵。法属亚美尼亚军团已有4500人。激进派感到陷入本书第1章提到的安全困境之中。虽然亚美尼亚士兵发生反叛的概率较低,然而任何这样的反叛的代价将是极其之高。先下手为强,他们可能这样想过。但是极少有亚美尼亚群体对土耳其战争努力构成很大威胁。政权没在打击某个实际有威胁的组织,但是预先防止了被视为未来是不可避免的威胁的出现。塔拉特或多或少承认这一点。

因此,在4月23—25日之前,很可能并没有严密的计划,而只是对一些最具威胁性的情况作出了一系列的做戒性镇压性的回应措施。A计划于是在这三天内形成,其重点是亚美尼亚领导人、士兵、据点、战略性村镇。它正在越过临时做戒性镇压和有限强制驱逐而

走向政治灭绝：一项企图消灭整个潜在的政治和军事领导阶层以阻止其与敌人合作的尝试。在亚美尼亚群体中警察在搜寻恐怖分子的武器。他们找到了一些。拥有武器是合法的，许多亚美尼亚人认定武器对自我保护是需要的。如果没找到枪，警察有时会故意放入所谓户主的武器再将其出售，然后就说“找到武器了”。再将那户主逮捕。当时有多少人被杀害不清楚。

杀戮与驱逐范围继续扩大。在5月份西里西亚的大量地方被清空，亚美尼亚人口被遣往南部，像后来的被驱逐者一样（布赖斯，1972：465—491，646—648）。屠杀与驱逐从凡城向西扩展。分散的抵抗激起了更大的屠杀，但绝大多数亚美尼亚社区受到突然袭击。此后在山区出现了大量分散的由小股民族主义分子和逃兵领导的抵抗。但是抵抗鲜有成功的，表明了亚美尼亚根本没有预先的组织安排（布赖斯，1972：84—95；美国档案：I，24—5，49—50；II，108；巴顿，1998：100—103，108—112；凯泽，2001b：20—28；克沃尔基安，1998：323；参较米勒，1993：74—75）。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亚美尼亚人确实站在同情敌人一边，因为土耳其人大败才是他们能生存下去的主要希望。不管计划曾是什么样的，实际中，整个5月，升级一直在向着D计划方向的行进之中：种族灭绝。

5月的最后一周出现了一阵混乱的官方活动。协约国国家在5月24日警告奥斯曼政府，那些与杀戮有牵连的人战争之后将要担负起法律责任。我们不妨将随后的行政命令理解为要么是将谋杀性驱逐体系化，要么是给予它们一种合法外衣和让人产生秩序井然的印象；要么是这些命令现在体现了系统性的种族灭绝；要么是政权正在试图避免一旦输掉战争带来的惩罚。命令未提到杀戮。5月26日，塔拉特命令驱逐靠近东线战场的亚美尼亚居民和那些住在阿达纳省和马拉什区的居民。第二天政府发布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驱逐命令”，授权采取阻止任何与敌人串通行为的措施，包括强迫清除和重新安置。没有提到地区或具体的种族或宗教团体。但是三天后内阁授权让穆斯林难民居住在任何被搬空的家里，同时所有的亚美尼亚人的财产都被没收和出售。6月9日到10日又对所有地方当局

下达了进一步开展驱逐和没收财产的命令(凯泽,2001a;亚美尼亚研究所的文本,1988:12—13)。

托词仍在继续,说这只不过是 B 计划,战争必然会带来的驱逐。而实际上它是种族灭绝。截至 9 月初已经没有亚美尼亚社区存在了,除了在君士坦丁堡、土麦那、阿勒颇这样的显眼的大城市。塔拉特在 1915 年 7 月 12 日发给迪亚巴克尔地方长官的电报中几乎承认了种族灭绝:

对亚美尼亚人和基督教徒不加区分的屠杀是在省内组织的……在马丁大约有来自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教徒居民中的七百人最近在晚上被带出城外,在正当授权的情况下,像羊一样被屠杀……到今天为止这些屠杀中杀掉的人数估计在两千左右……有人担心,如果不迅速而坚决地结束这种状况,那么邻省的穆斯林居民就会行动起来,展开一场对基督教徒的大范围屠杀。因为将用于亚美尼亚人的惩戒和管辖措施延用于其他基督教徒不合适……像这样不加区分地威胁基督徒生命的做法必须立即停止。(转引自伯克泰 2000 年 10 月 20 日在土耳其报纸《国民报》上的文章)

150

他在试图阻止对其他基督教徒但不是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

一位新教传教士伯莎·莫利的日记,使凯泽(1999a)得以对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梅尔济丰*中所发生的过程给予了详细的描述。她的描述可以由布赖斯报告中关于该地区的一章得到补充(1972:331—377)。它不是一个战略性的区域,第一次的事态发生的征象可追溯到 1915 年的 4 月 29 日,当时莫利记录了亚美尼亚各团体的 13 位领导人(全部是男的)被逮捕;5 月 10 日又有 21 人遭逮捕。5 月到 6 月初,她记录了警察对军队开小差者和隐藏的武器密窖的关注。一个在某葡萄园里找到的炸弹藏匿处被认为是亚美尼亚人的。在布

* Marsovan, 疑是 Merzifon 的变形,故沿用了后者的定译即梅尔济丰。

赖斯报告中(第332页),她学校的校长说它们看上去像是很陈旧的武器,但它们“惹起了土耳其人极大的愤怒”。莫利说那些被发现拥有武器的人被逮捕,然后遣送至到处是斑疹伤寒的地区。她没有去怀疑找到武器事情的真假,但她的日记中没有透露出亚美尼亚人有任何反抗的迹象。6月10日,地方长官说他不要“严厉”,“但大量来自外界的压力压到他的身上”。6月23日这天为展开更普遍的驱逐作好了准备。那些出生在异地他乡的人被命令回到他们的原出生地。所有的男人在6月26日都被集中起来,然后分组遣往乡村。

第一个关于许多梅尔济丰的男人在路上被杀的谣传是在7月1日听到的。7月3日,传教团的土耳其律师无意中透露被驱逐者“将在路上被杀掉”。莫利评论说:“看上去镇压或毁灭种族是他们的目的”。第二天,她说,全体亚美尼亚人被通知离开。她听到一位面包师叫一位亚美尼亚妇女买些面包以备上路,“你用不着买太多面包,然后他就笑起来”。这表明被驱逐者的命运在当地土耳其人中已被普遍地知晓。7月5日,亚美尼亚人不顾一切地试着出售他们的财产,但有些土耳其人说,“没必要买这些东西。很快它们就会自然属于我们了”。7月6日,他们得到“可靠信息”,几乎所有被驱逐的人都在路上被杀了。第二天就在梅尔济丰出现了面临一场屠杀的“真正的危险”。但是市长将成员召集到一起,他们确保了秩序。该镇未发生严重暴力。负责人说妇女在接下来的两周被驱逐,1.2万名亚美尼亚人中只剩下了几百名。到目前为止,人民“感觉到政府下了决心要根除亚美尼亚种族,而他们无力抵抗”(布赖斯,1972:334)。

151

莫利小姐没有向我们传达出土耳其人凶残的形象。杀戮发生在其他地方,在她的视野之外。充满敌意的当地人似乎主要是觊觎被驱逐者的财产和财富,而友好的土耳其人力劝亚美尼亚人改宗以求得生存。但是像这样的具有机会主义特征的改宗极少产生效果,因为当局不会被愚弄。莫利似乎感到愉悦,因为叛教变节似乎已经与杀戮同样程度地让这位灵魂的采集者感到担心焦虑!7月12日,她记述了有些土耳其人为暴行感到迷惑,说“他们及他们的宗教绝不会干出这样残酷的事情”,应当受到谴责的“一定是德国人和基督教”。

布赖斯(1972:348)提到两个土耳其人因为藏匿或主动示意要藏匿亚美尼亚朋友而被处死。7月14日,莫利确实记载了镇中的杀戮情形。一名有同情心的士兵试图隐藏亚美尼亚新教牧师。但是当他的战友威胁要将他也一起杀掉时,他逃跑了,让牧师等着接受自己的命运。士兵间开始争论。有些士兵还是不愿意杀死牧师并一次次求他接受伊斯兰教。他拒绝了,所以他们杀死了他以及一名同样拒绝改宗的年轻侍从。

市长在7月17日试图为发生的事件辩护,说它们“只能算是亚美尼亚人在其他地方对土耳其人干下的事情其中的一个零头……在凡城连一个摇篮中的土耳其孩子都没留下”。7月20日,莫利说亚美尼亚妇女感激护送的土耳其士兵击退了前来劫掠的切尔克斯人。当局残酷无情,但在施压时纪律严明。传教团在压力之下供出了更多的新教亚美尼亚人(他们,像天主教徒一样,经常在开始时获全国赦免)。7月18日,地方当局开始没收亚美尼亚群体的资产。8月15日,一位官员说他在旅行中看到了处决以及很多尸体一路躺在沿幼发拉底河的河畔。莫利继续写她悲惨的日记达一个月。此时梅尔济丰的亚美尼亚人社区已经消失了。

从各种类似这样的报道中出现了一种共同的事件顺序,表明了从1915年6月(或许还要早一点)开始的某个计划的协调执行情况。首先出现的是突然将政治及知识界的领导人以及被认为拥有武器的那些人集中起来。这些人中有的被囚禁;绝大多数被押解上路,通常再也没听到过他们的消息。然后,所有剩下的达到兵役年龄的亚美尼亚男子被集中起来,用绳子捆绑在一起,然后押送离开,一般认为是被重新安置在无灭绝危险的南方的沙漠地区。有些地方屠杀是在西里西亚村镇和俄国边疆地区实施的,但在其他地方进行的不是很多。在这些社区中或许在起初看上去像是驱逐——但为什么先是男人?实际上大多数男人仅被驱逐至最近的荒凉地区就被杀害。余下的亚美尼亚人缺乏武器、领导人,甚至男人都很少。若干星期之后,妇女、孩子以及年长者被集中起来再送往沙漠。因为他们不具威胁,他们不是马上即被处死而是要在路上行走好几天。许多人饿死或病

死,或在由部落男子或土匪对散落的队伍发起的一阵一阵的攻击中被残杀。欧洲的省份在这方面表现不一样。绝大多数欧洲被驱逐者被塞上火车,到达南边终点时相对来说没受到伤害——但时间不长。安纳托利亚和几乎所有其他的北方地区实际上完全已将亚美尼亚人清洗干净——谋杀性的。

美国领事戴维斯见证了在哈尔普特城堡(Kharput)以及被他形容为“屠宰场省”的埃拉泽省*发生的事件。他的领事身份的旅行经历使他能够看到(以及拍到)据他估计有1万具的亚美尼亚人尸体被抛在沙漠和山谷四周。其中大多数赤裸或半裸,这是最终侮辱的结果——由省内最贫穷的人扒光他们的身体(戴维斯,1989:特别是86—87;美国官方文件:1995,第3卷)。所有“被驱逐者”队列中的幸存者描述可怕的残酷场景时还提到其中也有一些慷慨之举。较年轻的妇女被重复强奸,有些被作为妓女或女仆带走,命运未卜。

土耳其官员的妻子经常干预驱逐行动,将一些看上去很健康的年轻妇女挑选出来作她们的仆人。贫困的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强霸年轻妇女作他们儿子的新娘,这可避免支付致人破产的彩礼费用。其中一些年轻妇女大概要在极其落魄的状况下生活,但她们活了下来。绝大多数人最终被同化,失去了她们作为亚美尼亚人的身份意识。因为血统按父系相传,她们的孩子就承接他们父亲的身份。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亚美尼亚妇女以这种方式存活下来。这或许需要向下修正我们对死亡率的总体估计。而且以上这些做法显示,对族性的种族主义观念并不是普遍存在。有用无害的亚美尼亚人能够通过强制手段被同化。它涉及可怕的性别及年龄歧视,因为在男人和年长者被杀的同时,年轻妇女活了下来。

从第一批事件到种族灭绝的升级发生在三个月之内,一个远比希特勒后来对犹太人的攻击快得多的升级速度。地图6.1表明屠杀与驱逐开始于西里西亚和东北边境亚美尼亚人口最集中地区,然后从这类边境地区向内陆扩展,西沿黑海后方地区,东南沿巴格达铁

* Mamuret-ul-Aziz,该名称疑是旧名,当为今日的埃拉泽省。

路。有约60万到80万的亚美尼亚人——大量是男性——在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的第一波中被杀害。一个单独的从欧洲省份往南面方向的铁路人流开始于1915年年末。那些没被迅速杀死的,其中大多是妇女、孩子和上了年纪的男子,被赶往南方,最终落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沙漠中。极少见到有反向的流动,除了从梓橄镇开始的真正第一次驱逐。

第二波重要的终极根除,又一个或达63万人被杀的行动,发生在地图6.1中已用符号⊙标出的叙利亚及美索不达米亚集中营。这里的绝大多数死亡来自于饥饿和疾病(克沃尔基安,1998)。从1916年4月到9月,杀戮又在这些集中营四周恢复,同时其他地方也出现扫荡行为。亚美尼亚社区到这时为止实际上已经清空。只有君士坦丁堡、土麦那和阿勒颇基本被放过,这很可能是由于它们太显眼了。1917年初,英国军队到达叙利亚拯救了大多数还活在南部地区的人的生命。但是杀戮继续以较小的规模进行,直到1923年,同时因受英法军队从本地区撤出以及一些有谋杀倾向的土耳其官员被从英国的监护下释放出来的刺激力度有所加大(马拉什利安,1999)。

153

我们有所有关于这一切的丰富的文件记录。早在1916年之前,布赖斯勋爵已经给英国外交大臣寄过一大卷目击者报告,是由亚美尼亚人和外国人为叙述或当事人——包括传教士、护士、旅行者、领事等其他人士。^[6]这依然是关于早期种族灭绝过程最好的资料来源,有亚美尼亚幸存者的回忆录(卡赞吉安,1989;克沃尔基安,1998;米勒,1993)以及不能被指责为偏袒某一方的人士为其佐证。中立的美国领事、商人和传教士的报告是揭露罪行的确证(见巴顿文集,1998;美国官方文件,1993—1995)。那些住在北部的人主要看到了集合和驱逐,加上一些杀戮行为。他们听到过可靠的大屠杀和死亡行军的

[6] 第二版的布赖斯报告增加了一个附录,指出了报告中描述的地名和人名。它的主要缺陷是倾向于将库尔德人整体看作施害人,没有觉察到特别部队的作用以及编者们对奥斯曼帝国的相当负面的看法,代表了当时的欧洲人的一般意见。

报道但没有看到它们发生。对那些位于南方沙漠——死亡行军的目的地——的人来说,比如领事戴维斯和杰克逊或伯诺先生,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在上一章一开始就引述过伯诺的话。

而更具杀伤力的是盟友,有机会接近政权的高级别的德国及奥地利士兵、外交官和铁路官员的报告。他们尽力地把他们的盟友往好处想,起初表示不相信,然后对他们所称的“毁灭”、“根除”、“灭迹”或对“亚美尼亚种族”的“系统性残杀”感到震惊和惊愕。绝大多数人同意这是“青年土耳其党的精心设计的政策”,或换种说法,是“大部分团结主义党的政策”。〔7〕巴格达铁路的德国雇员近距离目击到事件的发生过程。他们的火车要运送成千上万的被驱逐者;铁路线就是死亡行军的路线;车站成为集中地,有时就是死亡集中营。凯泽(1999b)引用了铁路员工可怕的描述。高级铁路官员也逐渐注意到塔拉特对根除的严密控制。虽然他偶尔通过公开谴责暴行来回应亚美尼亚人的抗议,但亚美尼亚人清楚,他随后就会秘密地撤回这类言辞,同时暗中敦促他的官员继续实施种族灭绝。

154 在攻打凡城期间,委内瑞拉富裕士兵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少校是土耳其宪兵部队参谋长。但是他请求解除他的职务:

我对难以计数和完全没有道理的屠杀基督教徒的行为彻底感到厌恶和灰心,这种行为即使不是直接受命于我们的远征军司令卡里尔贝伊,至少也是为了讨好他才付诸执行的。

当他骑马奔赴新的职位时,他的护送者催他加快速度,如果他不想错过观看行动的机会的话。当他靠近漂亮的白房子和奈尔特光塔时他已气喘吁吁:

〔7〕 奥地利人的报告来自亚美尼亚研究所(1988),在第173、209、243和265页提到“根除”;奥地利人及德国人报告由达备里安摘录(1994a),德国传教士日记由克沃尔基安重印(1998:263—325;参见特朗普纳,1968)。

鬼魅般斜坡顶端覆盖着数千具半裸和尚在流血的尸体，他们成堆地叠在一起，或交错互拥在死神的最终怀抱之中。父亲、兄弟、儿子和孙子躺在那里，他们倒在杀手的子弹和穆斯林弯刀（农具）之下。从不止一个被砍伤的喉管之中生命以一口口热血的形式向外喷涌。成群的兀鹫栖息在高地上，啄着死人和将死之人的眼睛……而食腐动物猎狗把尖利的牙齿伸进了仍有生命的颤动着的生物的内脏。（德·诺加莱斯，1926：122—124）

1919年一些土耳其人也承认了罪行。新一任的奥斯曼政府发起了对战争罪进行审判行动，内政部长直接写道：

四五年前在这块土地上犯下了一桩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罪行，一桩让全世界感到战栗的罪行。鉴于罪行的广泛程度，其责任人不是五个或十个而是好几十万……已经被证明的事实是这个悲剧是通过团结主义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和命令策划出来的。（安多尼安，1920：167—168；迈克尔·曼翻译）

不幸的是，这个政权不久就被一个更加带有民族主义特色的政权推翻了，审判被中断。自此之后，土耳其政府时而否认时而沉默，尽管有几位勇敢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的异议观点被发表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塔纳·阿卡姆在《新世纪》（*Yeni Binyil*，2000年10月8日）上陈述：“毋庸置疑，1915年的事件符合1948年联合国定义的种族灭绝的标准。”他接着说凯末尔本人也将它们称为屠杀——这已经等同于在说后来才发明的种族灭绝这个词。哈里尔·伯克泰在《激进报》（*Radikal*，2000年10月9日）上同样坦率陈词。他对有能力从事“地方暴力”和招致“一两千”穆斯林伤亡的“亚美尼亚匪帮”与政权，通过杀死“至少60万人”的谋杀性特别部队进行系统性驱逐的组织行为作了区分。

当时，土耳其领导人只承认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驱逐，不是种族灭绝甚至也不是精心考虑的屠杀。塔拉特用一小段发言回应美国美国

大使摩根索：

155 我们之反对亚美尼亚人基于三个明显的理由。首先，他们以牺牲土耳其人为代价换得他们自己的富有。第二，他们决意要骑在我们头上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三，他们公开鼓动我们的敌人。他们配合参与了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行动，而我们在那里的失败大都要归因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我们作出了不可挽回的决定，即我们要让他们在战争结束之前变得失去力量。

摩根索力劝他考虑大规模驱逐带来的灾难性经济后果。塔拉特的回答直截了当：

我们不在乎任何商业损失……我们不担心这个……我们不想在安纳托利亚任何地方看到有亚美尼亚人存在。他们除了沙漠没有其他地方可住。

显然，那些一无所有的妇女和孩子不能住在沙漠中。塔拉特对一个德国记者解释为什么政策必须涵盖所有亚美尼亚人：

我们被责备对无辜的亚美尼亚人和有罪之人不作区分，但鉴于如下事实，即那些今天无辜的人明天就有可能犯下罪行，区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的行为是听命于一种民族的和历史的可能性。确保土耳其存在的观念必须超过其他一切考虑。

他承认了驱逐行动是针对现在以及将来的某种威胁。这是一种以历史必要性作为理由的先发制人。我们后面将看到希姆莱运用了相同的推论。恩弗·帕夏同样放开地对摩根索说：

亚美尼亚人的大麻烦他们是分离主义者……是我们自己多次的革命经历使我们害怕亚美尼亚人，所以我们采取了分散

他们的计划以便他们不能对我们形成伤害……此时经济考虑根本不重要。唯一重要的事是要赢。那就是我们脑中唯一所做的事。如果我们赢了，一切都会好的；如果我们输了，一切就会都不对。我们面临着一种绝境，我承认，而我们现在正像孤注一掷的男人那样战斗着。

摩根索随后给了他一个将怪罪转到别人身上的机会。大使说他理解下属们的行动，他们比委员会原来所有打算的走得都要远得多。但是恩弗却为他的这一暗示感到不悦，回答说：

你大错特错了。这个国家处在我们的绝对控制之下。我不要把责备转移到下级身上，而且我完全愿意为所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内阁自己下了驱逐命令。（摩根索，1918：336—338，347—352；参见布赖斯，1972：633，636）

仅有驱逐这个词汇被留作掩护。为了保卫国家，最极端的措施是必要的。在国家得到保存之前，可以让道德与经济都见鬼去。对被塑造为受压迫受屈辱的牺牲品，面临着协约国入侵的土耳其人的角色来说，强制驱离战争地带似乎应是一个合理的反应。将亚美尼亚人重新安置到一个不能与外勾结以及不需要派土耳其军队监督的地方。驱逐是奥斯曼的一个传统，而强迫安置成为20世纪标准的战争政策。我们不能确定驱逐是否曾是一个真实的政策——或者说，如果是的话，它又在哪一个精确的时刻被变成了大屠杀。但是到1915年年中时，参与驱逐行动者知道它们是谋杀系统的一部分。许多人肯定已经知道这是一种种族灭绝的尝试。此一过程不像后来的纳粹种族灭绝那样紧凑，同时还有更多的地方变异形式。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温和派官员会延长这一过程并挽救愿意改宗伊斯兰教的亚美尼亚人。在许多领域，信仰新教或天主教（而不是属于亚美尼亚的使徒教会）被免于驱逐，尽管不是所有地方官员都这样做[巴顿（1998）和布赖斯（1972）详述了这类变化形式]。然而被驱逐者一致

的流动方向,阶段的按顺序排列性,以及分成两个从4月至9月的“季节”,表明有一个总体性的计划在一步步贯彻执行(克沃尔基安,1998)。

施害精英

我们可以指出四种主要并相互重叠的施害机构网络。我们大致了解他们是些什么人,尽管我们对他们的动机几乎毫无证据。

部级精英

这是一次明白无误的国家主义的种族灭绝,由政府最高层发起,通过几个文职国家机关实施。这一行动不包括整个国家行政部门,但确实包括了它的核心。这是一个运作在落后经济中的古老的帝国国家。它没有很多贯穿全国的文职政府机构——教育、卫生、交通等等,核心依然是内政部和国防部。内政部掌控着大批的武装警察和宪兵部队,而国防部现在指挥着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在国家几乎所有的边境地带进行着一场四条战线同时展开的战争。军队各部不断地在达达尼尔海峡、高加索地区、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叙利亚之间来回调动,因此能够产生间歇性的谋杀行为。两个部门还控制着国家通讯系统中的较先进部分,特别是电报和有限铁路网。

157

两部门控制着青年土耳其党政权,因为它们乃是政治支持的核心所在。三个联合执政部门是内政部、国防部和海军部(杰莫尔,海军部长,兼任在叙利亚的长官和军队司令)。内政部与国防部协调种族灭绝行动。由塔拉特和他的内政部助手颁发的命令比代表整个政府发布的规定与法律重要得多(凯泽,2000b)。虽然后面要描述的特别组织在杀戮过程中有一定自治权,但统筹其活动的电报是通过内政部发出去的。电报是非常有效的协调手段。所有卷入种族灭绝的市长和长官一直都接受君士坦丁堡的电报。他们很早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美国传教士斯特拉·洛克里奇在1915年4月至5月间与凯撒里亚的官员有过谈话。他们给她同样的警告:“一个亚美尼

亚人都不能留”在区里，“某些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在我们学校的女孩和男孩身上”，“亚美尼亚人没有希望”，以及他们都应该成为穆斯林以改变他们的命运（巴顿，1998：116；参较布赖斯，1972）。这暗示在早期阶段官方仅存在协同行为。

两个派生部门也参与进来。一个以阿勒颇为中心的驱逐部监督着被驱逐者向南流动的情况。它就设在内政部之内，但是它的署长（director general）是舒克鲁，他同时是统进会和特别部队的核心成员，所以驱逐部既拥有某种机构自治权，又具有某种激进的热情。内政部的“部落和移民安置理事会”是一个更加从属性的机构，其在前两年的再安置项目工程期间积累了专门技能。它编制清单，储备和出售亚美尼亚人财产，然后重新将穆斯林难民安置在亚美尼亚原住处。理事会能够鼓动群众的支持，因为难民和地方穆斯林正在以最低价格获得财产和企业。非穆斯林被排除在得到亚美尼亚财产的资格之外。由据称是不得罪人的“再安置”办公室提供的意识形态掩护也对过程的合法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青年土耳其党与这些机构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考验。1918年之后一开始的战争罪审判受到了对在行政部门，尤其是国防部、内政部以及警察部门中的被告的广泛同情的阻碍。许多文件被毁，证人受到恐吓，以使起诉不能继续。但是两者的关系因1913年的大清洗而大为加固，这构成了种族灭绝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尽管据推测这不是一种打算好的行动。国家成了一个政党国家，而军队受到许多政党成员的命令指挥。只有一群少数的官员或军官可能成为了团结主义者，因为在这个大国中这只是一个政党。然而几乎所有由见证人描述的最坏的施害人都被指认为是强硬的团结主义者。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对国家内部进行研究以找出这些激进化的官员和军官们。

158

官员之间的派别争斗

激进精英分子不需要所有文职官员的积极支持。统进会能够利用战时紧急权力，绕过无党派行政渠道并代替持不同政见者。驱逐令经全体内阁成员速决通过，议会被暂停，公共讨论终止。最高层存

在某些异议,尽管我们的信息源在谁是主要的异议者这一点上并不一致。特朗普纳(1968)说宫廷首相大维齐赛义德·哈利姆(以及他所在的派别)渐渐不高兴了。哈利姆太强大了,无法解雇,但在1915年10月他被从他兼任的外交部的位置上赶下台了。特朗普纳说,他的替代者是更值得信赖的司法部长哈里尔贝伊*,来自一个拥有土地的家庭,在巴黎受的教育,自1908年以来就是一名青年土耳其党成员。但是大使摩根索的说法完全相反——他在谈话中暗示哈利姆是激进分子,而哈里尔曾经对他说,“我同意政府在对亚美尼亚人的处理上犯了严重错误”(他又说他不准备公开这样说,以免带来混乱)。政府中的主要牧师,伊斯兰教教长卡伊里,1916年5月辞职,由著名的激进派穆萨·基娅齐姆担任虔诚基金会牧师(www.armenian-genocide.org/chronology/1916)。不过,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内阁都被越来越多地绕过,因为省地方官员从统进会接受指令,而不是从它这里。

到1916年5月,在最高层,从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杰莫尔帕夏那里,出现了独立的迹象。在其回忆录中他说他竭力主张将亚美尼亚人重新安置在安纳托利亚内陆,远离所有前线阵地。将他们驱逐至南方只会阻碍战争努力。他说他的意见遭到否决,驱逐被通过民间渠道贯彻执行,他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他又声称他拯救了15万名南方的被驱逐者,将他们带到了贝鲁特和阿勒颇(杰莫尔帕夏,1922:277—279)。其他人也说他拯救了富裕的亚美尼亚人(为了钱),允许亚美尼亚手工匠为战争努力奉献了他们的劳动,以及最终提出让在叙利亚的所有亚美尼亚人改宗伊斯兰教。切尔克斯军官哈桑·阿姆德亚的详尽证据证实了杰莫尔在1916年夏天的温和态度。克沃尔基安认为这与其说是出于人道,不如说是出于地缘政治动机。亚美尼亚人作为中间人对尝试实现与俄国修好有用处。杰莫尔在他作为地方长官和叙利亚及巴勒斯坦军队司令的权力范围内运用了相当的自决权。现在如果俄国人让他得到苏丹地位,他将与之达成和

* Bey,旧时对土耳其高位者的尊称,大人、老爷的意思。

平(哈滕尼安,1986:115,358—361;克沃尔基安,1998:53—59,228—237;麦克菲,1998:137—139;摩根索,1918:174;特朗普纳,1968:124—125,230—231,247)。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与杰莫尔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严厉以及他在处理巴勒斯坦犹太人时的凶残相违背。在受到来自德国及美国大使的压力之后,统进会解除了雅法的强硬派长官的职位,后者决心要驱逐所有非奥斯曼臣民的犹太人。然而杰莫尔颠覆了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命令,任命此人到自己的部门工作,以便让他继续执行他的政策。他告诉一位犹太复国主义官员:“我们,青年土耳其党,坚信犹太复国主义者该被绞死,但是我厌倦了绞刑。我们将把你们驱散到整个说土耳其语的国家,而不允许你们集中呆在任何一个地方。”因此他迫使雅法和特拉维夫的9000名犹太人向北迁移,许多人死在路上。在被伊斯坦布尔阻止之前(又一次是在德国的压力下),他试图对耶路撒冷也这样做。然后英国1917年的主动姿态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免遭更坏的处境(卡什,1999:166—170)。我们很难将杰莫尔看作一个温和派,尽管他确实表现出了相当的独立性。

159

统治集团再往下存在更多的异议。摩根索认为统进会在整个帝国中的权威“过分地薄弱”(1918:227)。亚尔曼(1972:326—332)说“大多数”的西部地区的官员抵制执行驱逐行动。他举了土麦那长官雷哈密贝伊的例子,此人阻止了将亚美尼亚人从他的省清除出去的行动,又说另一位地方长官让命令留在了“纸上”,消极地坐在办公室,不为执行命令做任何事情。伯克泰说“长官与司令”发出了对主要施害人“巴海廷·萨柯的逮捕令”(2000年10月9日《自由派日报》),外国领事和传教士经常与地方官员接触,一直在谈论他们是温和派还是强硬派。哈尔普特、布尔萨、乌尔法、马拉什、梓橄和安泰普的主要官员被描述为特别地无情,而特拉布宗、阿达纳和科尼亚存在严重的派系争斗(布赖斯,1972)。

但是持不同政见的行政官员很容易被免除。冲突的一般后果是内政部免除温和官员(偶尔还将其囚禁)并设法代之以一个强硬派。这并不总起作用,要么是因为政权错误判断了替代者的性格,要么是

因为新人被驱逐的实际状况吓坏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进行了第二次换人,这次似乎达到了效果(大概是因为第二次,政权选择新人非常小心仔细)。结果是种族灭绝被推迟,但不是被取消。在安戈拉(今日的安卡拉)、迪亚比克、凡城、埃弗勒克、特拉布宗、麦西那、科尼亚、塔尔苏斯、美斯肯、马拉特、塞布卡、代尔祖尔和拉斯艾因的长官或市长,包括安戈拉的警长都被替换了,而在阿勒颇和约兹加特换了两次才成功。在较少被记载的地方可能换的次数更多。

在绝大多数亚美尼亚人被杀的地区,改组大概涉及了三分之一的高级官员。在亚美尼亚人仅遭驱逐的地方,官员更容易执行命令,而对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结果视而不见。在约兹加特,杰莫尔贝伊成为第二个拒绝批准谋杀的长官。一位土耳其证人描述他曾以尖刻的讽刺宣布:“我将绝不允许宪兵队杀死被驱逐者,你们最好释放所有的囚犯,给他们四天时间去谋杀亚美尼亚人,然后允许我,和我的宪兵队,抓捕所有的囚犯,再用我的宪兵把他们杀死。”但是地方统进会,在一位来访的内政部副部长的帮助下,设法将其赶下了台,引进了一个新的人选。君士坦丁堡按他们的激进观点或亲戚及保护人关系选择人选。仅在马拉什和孤立的摩苏尔有过一个温和的长官,他似乎在整個这段时间内一直留在位置上没被换下。但即使是温和派的权力也更多的只是拖延一点时间,而不能阻止事态发生,因为这些城市也出现了对亚美尼亚人的谋杀性清洗。〔8〕

统进会还有第二股控制力量。领事、传教士和英国消息源揭示了无处不在的运用引入的统进会“代表”去控制地方官员的事实。沙基尔博士自己也被派往迪亚比克和埃尔祖鲁姆去打开局面,还有第二个局外人杰莫尔·埃芬迪,“一个属于最为邪恶一类的狂热分子”。

〔8〕 这些有名字的城市被记录在巴顿(1998:155—156)、布赖斯(1972:223,329,377,382—383,445—446,474)、哈滕尼安(1986:62,84)、卡赞吉安(1989:7,96,260)、克沃尔基安(1998:108—114,128—129,181,191,223—224)、美国档案(1993—1995, I:133,148; II:38,78,87,96),以及耶吉亚扬(1991:196—197,311,354)等文献之中。

在代尔祖尔,温和派长官阿里·苏亚德选择忽略了一个向阿勒颇驱逐行动办公室报告的命令和一个向君士坦丁堡报告的命令。在三个团结主义者代表亲自访问了该镇之后,他被调动到了巴格达——这里被驱逐过来的亚美尼亚人是他在代尔祖尔一直在保护的!苏亚德被萨尔·泽基取代,后者已经以埃弗勒克的长官的身份证明了他的凶残。晋升机会就是这样来的。在拉斯艾因,克里姆·雷斐,此人被描述为一个野蛮的来自欧洲的土耳其难民,正是实际上作为副长官利用许多土匪强盗特别是切尔克斯人来组织过大屠杀的那个人。在哈津,军事法庭法官阿莱贝伊上任主持工作。对外国人他谦恭有礼但立场坚定,宣称他将执行“土耳其政府对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分子的必要的行动”。他用两个星期让驱逐行动运转起来;然后他离开,将他的一套班子交给可信赖的地方官员(布赖斯,1972:236,492—494)。

虽然代表是意识形态主义者,但许多人也从抢劫掠夺和个人事业晋升中得到了物质好处。一位热情的团结主义者代表被派往安哥拉检查温和长官的工作活动。随后他接替了长官位置,然后通过命令地方政务会委员和伊玛目(神职人员)*在街角和清真寺朗读“清除我们当中所有的亚美尼亚寄生虫”而让他们也牵连进去。塔赫·杰夫德特,恩弗的姐夫,第一次在凡城迅速完成暴行。然后他被派去担任阿达纳地方行政长官,做与上述相同的事情。塔拉特自1913年以来的助理秘书和难以捉摸的“恐怖主义委员会”的成员,阿里·米尼夫贝伊,被委派在阿达纳和约兹加特执行实际驱逐任务。约兹加特一开始的两位长官不大想执行他们的命令,而一边还有德国人对阿达纳地区温和派的压力。在阿达纳,阿里·米尼夫贝伊通过扮成一位“有序驱逐”的倡导者,以图抑制更加狂野的地方统进会领导人伊斯梅尔·萨法的行为,从而抚慰德国人的心情(凯泽,2000a)。

161

阿勒颇市很有特点,其亚美尼亚居民寥寥无几,然而它却是被驱

* imams,伊斯兰教社会的首脑。

逐者的主要接待中心,同时国家的驱逐部也设在该市。它的主任舒克鲁贝伊以及代表努里贝伊,通过对管辖分界线的重新划分,使省内大量地方落在安全掌控之中,从而赢得了对两名温和派长官的权力争斗(布赖斯,1972:469)。第三位长官拜克尔·萨米贝伊,一个团结主义强硬派和一名塔拉特的亲属,受到双重信赖。据说他还亲自参与了很多暴行。拜克尔·萨米贝伊精力充沛地履行了他的职责,1916年1月16日以电报告知君士坦丁堡:

经调查,现已确定,不到10%的听从驱逐出境的亚美尼亚人已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其他人由于饥荒、生病和其他类似的自然原因死于路上。我希望严格对待幸存者,让他们获得同样结果。

这些人得到了埃塞德贝伊,一家遮遮掩掩的“公共安全理事会”的情报部门的一位主任助理的帮助。该情报部组织起了特别部队。本区派去杀死巴格达铁路亚美尼亚雇员的根除部队也是归在地方统进会的指挥之下(安多尼安,1920:116—117;凯泽,1999b:91,102;凯泽,2000a)。英国关于土耳其战犯的卷宗详细举了12个由地方统进会领导人组织的地方驱逐行动的例子。〔9〕

有些官员充满热情是因为家庭或其他保护人关系。这与第二个动机重叠——这是获得晋升的途径(布赖斯,1972:23)。其他人则都有一种出于个人野心的抛弃往日异议的热忱。希尔米·阿卜杜尔·卡迪尔是1914年的一名退役的陆军上校参谋。他的问题是早期曾站在苏丹和奥斯曼自由派一边反对统进会。1914年他被降格为偏僻的东南面的城市摩苏尔的公共事业工程师。但是,他来自卡

〔9〕 英国人曾求助于他们怀疑犯有战争罪的马耳他的118个土耳其人。耶吉亚扬(1991)列出了对他们当中的60个人的指控,以及少量的证据。但在英国的审判准备工作完成之前,一半的犯人将与土耳其掌握的英国战犯交换,然后所有的起诉被终止。

斯特莫努，一个团结主义者重镇。希尔米认识统进会教育部长舒克里贝伊，后者也是来自卡斯特莫努。“跟他很熟的”舒基（即舒克里）“将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推荐他作自己的统进会同事。“这样在已结成友好，并已表示了对统进会首领的忠心之后，他就充分具备了执行所有托付给他的可耻或残酷的各项任务的资格。”一位证人说。与摩苏尔统进会领导人一起，他绕过温和派的长官，领导本区匪帮并组织杀戮最后停在摩苏尔的数千名被驱逐者。在此过程中，他让自己变得更加富有，还强奸了亚美尼亚的男孩和女孩（布赖斯，1972：95；耶吉亚扬，1991：251—257）。他已准备好干任何事情——不是作为忠诚的团结主义者，而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一味追逐名利之人。在阿达帕扎勒有一个类似的人。该市市长与警长是温和派，但是他们让一个被称为“野兽”的局外人，很可能是统进会代表削弱了力量。他曾因政治犯罪——“借执行这项魔鬼般的工作而谋求自己的自由”——而入狱，又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他会奚落亚美尼亚人说：“你们的市长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们是好人，但他自己就是坏人……我的命令来自塔拉特贝伊。”（布赖斯，1972：105）政权并不需要很多狂热分子来取代不听话的长官和市长。一个激进分子的核心层，经保护与晋升关系而扩大，提供了人选。

外省长官是由法令任命的人选，不会轻易被吓唬。极少低级官员敢于公开反抗。他们更喜欢去妥协和应付机制。一个村子的村长的妻子“告诉我们的女士她是怎样为她所看到的可怕事情而哭泣，以及她怎样试图不让她的丈夫与它们有任何关系”。许多人不赞成那样做，但是说他们是屈服于上级权威。领事戴维斯说埃拉泽省（Mamouret ul-Aziz）的长官允许许多亚美尼亚人逃过俄国边界。但最终他执行了政府政策，说“他必须执行命令”（美国档案，1995：第3卷：45—46）。一位官员说：“我们生活在20世纪。现在权力是更重要的力量，而不是道德或原则。”（戴维森，1985：177）而作为最后一招，首都（君士坦丁堡）将通过发给激进分子的更加私人的命令来破坏官方的命令（布赖斯，1972：353，362，376，442）。

持不同政见者担任着一些重要职务。但是因为他们自1913年

大清洗之后就处在权力之外，他们没有能够用来改变来自塔拉特的总体政策的集体性组织。他们担心个人持有异议的后果，而检查制度又阻止了他们知道更多的关于别的地方其他异议分子的情况。一位美国传教士相信全土耳其有数百人因为持不同政见而正在监狱受折磨(巴顿,1998:191)。绝大多数官员，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一样，不是那么勇敢。

道义上的怯懦和一味追逐名利是顺从背后的一般动机。战时爱国主义也是这样。传教士哈丽雅特·费希尔报告一次与一位杰出的女性团结主义者哈利德·伊迪普的谈话,1917年5月两人同在一处参加难民救济工作：

她是一位忠诚的土耳其人。一次她说：“没有人比我更爱这个国家，同时也没有人比我更严厉地批判这个国家……什么也不能将大屠杀的污点从我的国家中抹去。”当我问她领导人是否想让这个国家以这样残忍的方式继续走下去时，她说“其中有些人是这样并且现在还是。它还没有结束……”但她接着说，“有些人不想，但是他们不够实际也没有执行权。况且当时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我们是在战争中，四面都是敌人。如果我们给人分裂的印象，一切都将失去。它是我们的国家，要不就属于亚美尼亚人。”(巴顿,1998:164)

政党国家将强制、野心和国家融合在一起的能力对其官员是决定性的——它将被证明是20世纪种族灭绝中的一种普遍的表现特征。不管有何种异议，国家中激进的团结主义者处于控制地位。命令通过由党控制的职位向下传达，而政权很快就能扩大这种控制范围。这不是一个联合发起种族灭绝的国家。但是它激进的核心层能够运用一种行政的和党的权力的混合体来执行它的意志。种族灭绝不需要一整个国家作为它的施害人。

士兵之间的派别争斗

1913年发生于土耳其军队中的大清洗至关重要,它给了激进分子更多的权力。现在激进军官正在代表国家合法的文职政府发号施令。战时时间提供了第二个合法条件。战争的“夜与雾”(掩护)——戒严、一道延伸穿过部分亚美尼亚居住区的火线以及杀死敌人的必要性——这些都使得激进化的那部分军队能够帮助实现大屠杀,而整个军队不会去阻止它。士兵是很多早期在西里西亚和近俄国阵地的亚美尼亚人据点的杀戮行动的参与者,他们参与的沿巴格达铁路一线的行动更加地没有规律。他们是最具杀伤力的力量,因为他们有最好的武装。但是他们不被作为主力运用。仅有少数一群军官或士兵可能接近了暴行的边缘,也只有几千人可能参与了谋杀。

德·诺加莱斯把谴责对象集中于更小的范围。他排除作为整体的军队以及特别是常规士兵的责任。他从总体上将职业土耳其军官——对之他怀有相当的尊重——与据他说被个人野心和政治关系加强了性格缺陷的军官两者作了比较对照。他是在比较对战争规则具有某种尊重的“职业士兵”(像他自己)和不带这种尊重的“政治战士”。他接着说运用这类政治士兵施加暴行的军队是非常规部队——特别是库尔德人和一些宪兵部队。这一施害人网络是由政治士兵形成的(正如纳粹后来会说的)。除了在高层之外,团结主义者极少,但也并不是需要很多。绝大多数士兵参加完战争,并没有遇到种族灭绝,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的土耳其国父,Attaturk)很可能就是这样。他似乎一直与统进会关系很冷淡。但像他的许多战友一样,他专心投入打仗,从未在公开场合谈论驱逐行动。像文职官员一样,与政治有更多接触的士兵经常有熟人或亲戚关系(有谋杀倾向的哈里尔将军是恩弗的叔叔)。其他人曾经有过参与这类暴力的经历,例如组织巴尔干地区的游击队和惩罚性袭击,指挥包含专门从监狱释放出的4000名罪犯的部队行动(达德里安如此说,1994b:97—98)。他们的经历是这里描述的特别部队的主要

内容。

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外国人习惯称赞普通士兵的勇敢和坚定的服从命令作风。我们没听说有任何部队集体拒绝接受任务。普通士兵中的服从通过残酷的纪律以及对异议的无情处理加以贯彻。假如士兵拒绝执行驱逐命令,他们就会被枪毙。幸存者偶尔会描述士兵们对他们的帮助,而这种帮助也是隐蔽的。军官一般不会被枪毙,但他们要考虑他们的前程。其中一些军官确实曾拒绝执行命令,包括东线战场两个最高军团司令。其中一个说他更愿意看到亚美尼亚人仅被驱散和重新安置。

陆军军官很难免职。有些放弃职位而有些被靠边站,但其他人继续阻止种族灭绝。有几个军官将谋杀者送上军事法庭,然后枪毙。一名陷入绝望的少校自杀,宣布他“为作为一个土耳其人活着感到可耻”。政府试图分派可信赖的军官执行关键任务,而统进会成员获得了快速晋升,被分派执行重大的驱逐任务。在种族灭绝的第二阶段,许多军官面临一个在政治根除主义和对亚美尼亚劳动力的职业保护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刻。亚美尼亚人作为制作制服和其他军需品的手工艺者,作为医院工作者,作为公路、铁路和隧道修建者,效率很高。从杰莫尔帕夏和加里布贝伊将军往下的军官保护了有用处的亚美尼亚人(布赖斯,1972:242;达德里安,1994b:95—96;克沃尔基安,1998:151,191,228—237;亚尔曼,1970:326—332;耶吉亚扬,1991:258,279)。整支军队没为阻止种族灭绝做过什么,但为了日常性的杀戮,政府感到——正如后来纳粹所做的那样——它不能一贯地依赖正规的军官和士兵,所以它转向了其他地方。

准军事部队杀手

主要的杀手,专事屠杀被缚的男人和一队队的妇女、儿童和年长者的人,是由特别组织(Teskilat-I Mahsusa)组织起来的2万至3万人的准军事部队。这些特别部队在本书描述的实施谋杀的准军事部队中居有特殊地位。它们不是像纳粹挺进队(别名冲锋队)或者卢旺达联攻派民兵(Interahamwe)那样的独立党民兵组织,也不是像纳粹党

卫军那样从上到下的一个严密的组织。它们是从政党国家内部组织起来的,然而特别而为的。它们起源于1907—1911年间的统进会阿拉伯突击队员,上一章提到过。起初它们是属于恩弗帕夏个人在军界中的组织,是用来执行秘密游击队任务的。它们被重新编制,1913年或1914年年初改名为特别组织,此时它们被归入公共安全理事会的指挥之下——内政部的一个隐秘的组织,但仅由统进会成员组成,有自己的预算。因此既不是内阁也没有其他任何立宪机构控制该组织。它看上去至少从1913年起就一直就是统进会激进派别的核心。

它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隐秘然而合法的战争形式,另一个是完全隐藏的和彻底不合法的。第一个目的是敌后游击战争。它开始于1907年的巴尔干地区并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断断续续地进行。1911年它们被非常有效地运用在抗击意大利人的北非战役当中。1914年,它起初的想法是运用同样的游击技术在阿拉伯和俄国的穆斯林中挑起叛乱。在阿拉伯它的任务与《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任务类似。劳伦斯与土耳其特别部队都寻求通过贿赂、赠送武器和虚假的自由允诺将阿拉伯部落招拢到自己这边来,而对他们的被庇护者采用的方法并不怎么要求。这是肮脏的战争,但它通常不是大屠杀或种族清洗。特别部队主要招收前军官以及一些民间冒险家。他们几乎全是土耳其人。担任高级军官的是团结主义者,但是该组织也招收许多被素朴的爱国主义或者追求冒险和迅速进入精英领导层的欲望诱惑的人——像其他国家的特别部队中的同行一样。到1914年土耳其人已能够倚重许多以前有过肮脏战争经历的人(斯托达特,1964)。

然而他们在俄国人身上没有得到同样的机会。恩弗军队的溃败阻止了土耳其部队越过边界到俄国滋事。相反地,他们开始在土耳其国内进行一场秘密的肮脏战争,以他们1913年和1914年对马其

* 英日影片,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的一名军官在阿拉伯半岛领导当地人屡获胜利。

顿和希腊基督教村庄的进攻为基础,清除被认为是不忠心的少数民族。1914年特别部队军官在与奥斯曼官员联手的情况下,运用谋杀和驱逐手段摧毁了巴勒斯坦的小型犹太复国主义社区(阿伦索赫恩,1917:47—56)。次年,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数量庞大得多的亚美尼亚人,后者被认为为俄国人提供了支持者和破坏分子。他们的德国联络官施坦格上校直截了当地说:“军事理由对驱逐亚美尼亚行动是次要的……来自外部的干预出乎意料……军事考虑和国家某些地方的造反倾向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借口。”他们的活动依然有点独立于委员会,因此政权可以否认,但其实他们是被故意放任不管。特别部队可能执行了大多数的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以“野兽般的残忍”,斯坦格说。随着作用的增大,他们注意招收坚定的团结主义者担任军官(达德里安,1993:68;1994b:110—111;1996:43—49)。

166

英国战后资料汇编揭示了地方指挥官的几种类型。哈里尔贝伊(以后的帕夏)在特别部队中度过了其全部职业生涯。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当上了巴尔干地区一个匪帮团伙的下士。到1915年他领导着在波斯境内的特别部队,组织大屠杀行动。约兹加特特别部队是一个家族企业,它的匪帮由四个兄弟率领。两个是小皮革和鞋类商人,另两个是具有暴力声誉的粗汉一类——一人因谋杀罪坐过牢。两位商人自1908年以来就是统进会的追随者,尽管地位太低,当不上里面的领导。他们显然嫉妒当地亚美尼亚商人——下一次就轮到的“民族资产阶级”——更大的财富。当来自统进会的压力使得前文被授引过的温和的约兹加特长官被赶下台时,四个兄弟被认定会有领导地方特别部队的积极性,大概是两个负责抢劫,两个指挥杀戮。在高层统进会官员的指导下,他们组织安排了对8000到10000名的亚美尼亚人的杀戮行动,同时他们自己也恣意捞取了大量财产。第三个动机是通过霍德贾·伊利亚斯显示出来的,他是马拉什的统进会代表,同时也是一个宗教学者,写过恶毒的针对基督徒的小册子。他因强奸基督徒姑娘而成为“穆斯林当中的耻辱”,然而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他的支持圣战宣言的宣传方法。在与地方统进会领导人取得联系后他率领库尔德首领对东南部发动了毁灭性袭击(耶吉亚扬,

1991:325—327,342—356,387—390)。

普通士兵情况则不同。有些是穿制服的宪兵,但因为绝大多数正规宪兵已被征召进入军队,宪兵队就被迫招募许多不适宜兵役的新兵。他们通过两类被所有人认作土匪的非常规部队得到补充。第一类是由罪犯组成。法令、审判记录、施坦格的报告以及幸存者都认定这些普通的新兵大多是从监狱里招募的罪犯,他们的罪行因执行这项暴行任务而被赦免。监狱全部人员都被赶到外面以便找到适合任务的男子。虽然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将面临的任务的全部内容,他们也不大可能不愿意去,因为它可以为他们带来人身自由,还有丰厚的物质上的收获。抢劫机会很多,但在某些地区,他们从官方获得从当地亚美尼亚人那里没收来的一半的财富。第二类的土匪部队是部落性的,由库尔德人、车臣人和切尔克斯族长为首领。流动特别部队的军官有时会给首领钱物,但通常的刺激还是战利品。库尔德部落是几个东部地区大屠杀的主力,南部地区以车臣为主,切尔克斯人两边参与。这些部落组织极少帮助策划驱逐出境行动,但他们重复性地一次次攻击和屠杀偏僻的亚美尼亚村落居民以及难民部队。在哈尔普特,领事戴维斯说,几乎所有的杀戮都是宪兵和囚犯干的,不是库尔德人。但在库尔德本土的情况刚好经常倒过来(戴维斯,1989:156;克沃尔基安,1998;美国档案,1994:143—152)。我应该加上所有杀手都是男性,但他们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年龄结构——没有在本书讨论中的许多其他准军事部队里发现的年轻男子占过高比例的情况。这是因为非常多的年轻男子在前线。妇女不在其中,因为这个社会中妇女从不携带武器。

极少数库尔德人和极少行伍出身的部队军官会是意识形态杀手——尽管罪犯和库尔德人很可能对相对拥有特权的亚美尼亚人没有爱,高加索部落对基督徒(后者曾将他们逐出俄国)、库尔德人对侵入他们土地的俄国部队也都没有。这些报复和复仇动机帮助消除了谋杀无助的人类的通常禁忌。物质主义杀戮很可能占主导地位,尽管族长们必须权衡物质诱惑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是与土耳其人结盟,或与协约国结盟,还是保持中立更符合部落利益?过一种犯罪

167

生活或部落战争的生活也能给人带来暴力的愉悦。幸存者经常饶有兴趣地描述他们自己在杀戮和强奸时的行为。这些人是对比较带有野蛮形式的部落暴力或暴力犯罪的熟练从事者,有些人还为他们的技术感到陶醉。这些是出于自愿的邪恶士兵。

普通土耳其人

普通土耳其人在何种程度上卷入或者支持种族灭绝,以及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这都不易确切回答,因为我们的主要信息源,亚美尼亚幸存者和活动在亚美尼亚社区中的传教士,极少私下参与当地土耳其人的讨论。他们的原初的主要印象是关于暴徒以及来自清真寺内部的威吓性的嘈杂声,后来是默默地看着他们的难民队伍的村民。我们无法与很多土耳其人关系密切。我拒绝达德里安的(1996: 121—127)用简单的民族主义理论对其进行解释。他说土耳其的尚武价值观与伊斯兰的不宽容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杀害基督徒的文化倾向。但是伊斯兰与军队都不是主要的导致死亡的因素。也不是说任何一个整个的民族或它的文化具有内在的谋杀性。

不过,一些基本的归纳性结论似乎是合理的。因为政府积极组织了整个种族灭绝过程,这些事件涉及的群众比早期奥斯曼的集体迫害要少。村民和镇民通常不需要做些什么事情。暴徒或是有用的,但在一个拥有大量人口的镇子中有一两百个人参与的暴乱就足够对亚美尼亚人带来压力。一位美国传教士写道:

在以往爆发的事件中——其间亚美尼亚人受到暴民袭击——官员总是声称要阻止暴乱,结果总是延误对受害人的救援时间,在死掉几个人之后才到达现场;但是现在,毁灭亚美尼亚人是一个政府自己担任发起人的计划,而计划的执行,以一切可怕的极端形式,被军事参谋部的无情效率压在愿意和不愿意的地方官员身上……我们这些终身生活在土耳其人当中和了解一点他们的处事方式的人那时一次又一次地说,“这不是土耳其人的暴乱”。它太冷静、太精细、太高效了。普通人不会喜欢。

(里格斯,1997:96)

里格斯牧师在此驳斥了一种关于施害人的民族主义陈见,即这是土耳其人干的,而库尔德人、车臣人以及其他他人提供了帮助。像其他人一样,里格斯说许多土耳其人一开始是帮助他们的亚美尼亚邻居的。传教士们经常举出土耳其人隐藏亚美尼亚人的例子(巴顿,1998:45)。然而一旦官员宣布他们的命令是要杀掉任何窝藏逃犯的人时,这样的人数立即急剧下降。当地土耳其人受到卡米尔将军的公开宣言的恐吓:

任何敢于窝藏一个亚美尼亚人的穆斯林将在他的房子面前被绞死,房子也要被烧掉。如果犯罪者是一位官员,他将被免职并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如果保护亚美尼亚的那些人是军事人员,他们将被剥夺军事职位,同时移交军事法庭。(达德里安,1995:235—238;1996:39;1997:43—44;默杰梅基安,1919:6—10)

我们不应低估这类威胁的力量。因为许多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怀有很复杂的感情,一点点害怕就会让他们不敢冒险。

以下一位妇女的叙述对梅尔齐丰的“普通土耳其人”作了更冷静的观察:

恐惧降临在5月的亚美尼亚人身上;人们感觉到政府将要对我们采取措施了。一场由广泛的土耳其民众针对我们举行的起义是不可能的;整个事情完全是因政府命令完成的。土耳其人从头至尾乐得保持无动于衷。接下来的驱逐和大屠杀是由政府仅通过它的官员来实施的,尽管当然是有很多土耳其男人自愿报名担任屠杀基督徒的官职。在农村,土耳其农民,男的和女的,积极参与大屠杀和严刑拷打,但总是在得到正式批准的情况下。整个大屠杀时期,土耳其百姓中从未出现过什么激动情

绪；一切都是根据官方授权或无论如何是经过正式同意后的冷血的屠杀。（耶吉亚扬，1991：94；参见“亚美尼亚政治审讯”，1985：6—10，88—89）

很明显，土耳其人表现不一。虽然幸存者将他们的警察和宪兵护卫队大多数描述得很可怕，他们还是挑出了几个好心的人（戴维森，1985：111—114，120；默杰梅基安，1919：7；萨拉芬，1994，99；卡赞吉安，1989：6—8，106，128—129，172，174—175，270，366）。有大肆叫嚷行动、抢劫或流血的暴徒的城镇并不常见，但更经常的是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出现，这里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长期为了土地在争斗着。在此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将暴力视为对过去不正义的报复。一位幸存者描述，一群人对着他们叫嚷“与基督徒断绝关系！民族万岁！”（戴维森，1985：76）。另一位幸存者描述了“为了让当地暴民开心”的射击场面，另一个暴民揶揄被驱逐者“因为受祝福的今天让先知感到荣耀”（哈滕尼安，1986：61，101）。暴民极少构成一个城镇人口中很大的比例，尽管我们的资料无法显示精确的数字。

一位横穿土耳其的幸存者的旅程传达了土耳其人当中各种不同的反应。比杜基安遇到一群村民恶毒地攻击被驱逐的妇女和孩子，试图杀死他们。另一群人“鄙视和嘲笑我们但没有做出任何直接的残忍行为……我想他们竭力试着去恨难民，但不是很成功”。第三，在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紧挨着住在一起的地方，土耳其人咂咂舌头表示同情说，“可怜啊”，然而他们“碰到我们很尴尬，可见亚美尼亚—土耳其人的紧张关系”。在同样的镇中，一位土耳其青年试图向比杜基安的漂亮妹妹求爱，将包裹在一块色彩鲜艳的手绢里的充满芳香的罂粟种子从花园墙扔给她。她的家庭没把这视为合适的一桩婚姻（他们已失去了他们所有的优越社会地位的意识）。他们把手绢扔了回来——手绢上面沾上了家居厕所中的脏物。这一鄙视性行为的结果如何？“我们再未被我们的邻居打扰过”——不是我们原本以为的现在相对易遭攻击的被驱逐者占着上风的土耳其人的反应。在幼发拉底河河岸，第五组当地人厚此薄彼地将重新安置在被驱逐的

亚美尼亚人的家里的“懒惰和可憎的”土耳其难民与勤奋的、有尊严的亚美尼亚难民作了比较(比杜基安,1978:21,27,30,59,73—74,93—94,126)。比杜基安体验了全部可能的土耳其人的反应。

布赖斯报告也报道了不同的陈述。一位外国医生注意到对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支持的增长:“普通人逐渐相信越来越多的过度夸张的故事和整篇的谎言,其实这些纯粹是为了激起普通人对计划的同情而炮制出来的。”(1972:412)政权的检查制度控制了信息的流通。其他地方的土耳其人怎么可能知道凡城发生的事呢?随着政权对官员掌控的加强,它封锁了其他的知情源。只有几个土耳其人杀了人,更多的人同意,但大多数人保持沉默。

施害人也不是库尔德人——尽管作为一个集体角色,它确实在某些陈述中显得很突出。库尔德部落群参与了许多大屠杀。然而库尔德村民出于对受苦受难的人类的同情帮助过亚美尼亚难民队伍(巴顿,1998:100—104;戴维斯,1989:108;贾法里安,1989:108;马拉什利安,1999:120)。在种族灭绝的第二阶段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车臣人与切尔克斯人在大屠杀中表现突出。在一些幸存者的记忆中他们所有人都很可怕,同时认为原因在于他们都是来自俄国的难民。他们要么是穷到极点和觊觎亚美尼亚人的财富,要么是在俄国遭受了基督徒的迫害。一个叙利亚阿拉伯村庄曾相信了由团结主义者煽动分子散布的谣言,即“亚美尼亚人”(Zetouni brigands)刚刚杀死了附近的村民,突然屠杀起亚美尼亚被驱逐者(克沃尔基安,1998:78—90,95,107)。绝大多数幸存者说阿拉伯人比土耳其人或车臣人更具同情心,库尔德人处于两者之间。族性确实影响态度。然而将行为和动机归于整个族群是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的语言,不是社会科学的语言。更小的有组织的流动团体起了作用。如果今天的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绝大多数人就不会对这次种族灭绝表现出如此防备,而我们就能更准确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两个群体就能开始走向和好。

因为亚美尼亚人一般较其邻居更加富裕,阶级怨恨和贪婪能激发许多人采取行动的欲望。它们驱使官员扣押和抽走珍贵物品,地

方名人以极低价格获取亚美尼亚人的企业,而贫困的警察和库尔德人以及其他民兵组织攫取任何剩余之物。他们的空房子被占用,经常是给政府再安置计划中的难民。巴格德基安(1987:75)估计,即使对被夺占的亚美尼亚人财产作部分的估算也将达到10亿美元。地方村民几乎全部参与了哈尔普特一带的抢劫,据亚美尼亚领事和传教士报告(戴维斯,1989:146—147,170,179;萨拉芬,1994:144,148)。有些人加入了杀戮,以刀斧作为砍杀工具,同时进行强奸,扒光衣服,划开身体以搜寻隐藏或吞下的金币或珍珠。如果亚美尼亚人实际上没有被杀死,他们可能只会被留下赤裸裸的身体,因为最贫困的当地人扒去了他们的衣服。这在逃亡期间的一位亚美尼亚天主教牧师身上发生过两次(默杰梅基安,1919:8,14)。如果政府让抢劫合法化,而受害人被当作一个外国兼阶级的剥削者,则谋杀就会出现——在除了土耳其的其他许多地方也是。

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声称这对造就一个他们缺少的民族资产阶级,一个会对统进会帮助其地位提升表示恰当感激的穆斯林经济精英是一条捷径(阿达纳与凯泽,2000:14;凯泽,2000b;基德,1987:66)。德·诺加莱斯说:“青年土耳其党,说句公道话,在战争开始以前是诚实的。但是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大量金银财宝让他们失却了判断力并变得堕落了。抢劫者以无产阶级的经济再分配理论从意识形态上为他们的占有找到理由。人类甚至能够为贪婪和抢掠提供辩护而显示自己的公正。”

171 这是非常普通的人类之恶。它与更加凶残然而同样是可以辨认出的人类之恶连在一起。如果政权宣称受害人是民族和伊斯兰的敌人,正在威胁土耳其国家本身,正在焚烧凡城的婴儿,然后谋杀就会在一种义愤的情怀中被施行。乔装打扮的亚美尼亚人希拉吉恩(1976:24)听到了不当班的匪帮在君士坦丁堡的咖啡屋中令人震惊地吹嘘割去和搜集亚美尼亚妇女的乳头以及从异教徒身上夺走财富的事: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表露出任何的一丝后悔、憎恶或犯罪感。

他们表现得似乎联合政府正在为国家作出了不起的贡献。他们的听众也可以说是一样。……其他土耳其人几乎嫉妒得都要哭了。他们不断说土匪很幸运,而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幸运的。

这样的事件在本书所有的个案研究中,以及在其他环境下都是常见的。卡茨(1988)在其对最近的亚美尼亚谋杀者(以及他们最亲密的亲属)的研究中指出,正义感与谋杀并不矛盾,它们通常是相互有联系的人类禀赋。

经济合理性也许在个人施害者层面上是重要的,但总体来说这不是一个经济合理的政策——如塔拉特帕夏早期承认的那样。德国的利曼·冯·桑德斯上将报告说,在1916年冬天到1917年这段时间,高加索前线的土耳其军队有6万人死于疾病和饥饿,这是因为驱逐亚美尼亚人导致地方农业被毁而造成的结果。这对很多土耳其人的影响是明显的。亚美尼亚在阿勒颇、麦西那、埃拉泽的领事都指出,当地土耳其人认为它将导致经济灾难。在埃拉泽,戴维斯说:“用的是杀鸡取卵的方法。”杰克逊说,在阿勒颇,内陆90%的商业是在亚美尼亚人手中,对他们的清除是个灾难。

虽然极少有青年土耳其党笃信宗教,但他们还是发现圣战这一概念(1914年由政府推出)是个有用的动员工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权鼓励推广泛伊斯兰主义,以挑动在俄国、英国和法国统治区的穆斯林起来反抗——尽管没有获得很大成功。他们倡议驱逐所有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希腊人、聂斯脱利派、雅各比派和马龙派。某些警察和村民用圣战的名义使杀戮合法化(主教巴拉吉安在亚美尼亚政治审判中的证词,1985:88—89;斯托达特,1963:51—75)。在地方大屠杀以与早期集体迫害类似的方式展开的地方,他们动员暴徒高喊伊斯兰口号。但是在拉斯艾因,一位观察者指出,是信教程度最低的车臣人第一个接过了圣战的口号。对他们来说,它是一种以前习得的仪式——也是一种物质抢劫的掩护或幌子(克沃尔基安,1998:197)。

实际上,有些穆斯林反对大屠杀是因为他们看见后者与《古兰

172

经》相冲突。莫利小姐提到的梅尔济丰土耳其人曾相信,基督徒,而非穆斯林,肯定就在这类可怕事件的幕后。布赖斯的报告给出了不同的穆斯林神职人员的陈述。埃尔津詹的一位有学问的教师(hodja)为地方大屠杀辩护:“亚美尼亚人在凡城犯下了暴行。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低劣。穆斯林本不应该学他们的样,而应该在施行大屠杀过程中带上更多的人性。”我很想知道一个人性化的大屠杀会是什么样!然而哈津的穆夫提拒绝批准统进会代表用来启动驱逐行动的行动计划——“他看不到那有什么好处”(城中或周围村庄许多当地人也没有)。这主要不是伊斯兰的,而是世俗的民族主义的种族灭绝,尽管基督教与穆斯林之间在欧洲的长期争斗已经对社区仇恨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在土耳其有很多人感到内疚。土耳其人不是被亚美尼亚人经常描述成的那种狂热分子。但种族灭绝也不需要一整个民族的支持:在沉默的数百万人中有3万名杀人犯配置其间已经足够。

施害人的背景

我对个人施害者的背景知之甚少。在那些最初受到英国人指控的人当中,中年男人占主要部分,没有妇女。这很可能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是高级别的施害人。在低级的统进会激进分子中,低级官员、教师和教授占大多数。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这是为激进的青年土耳其党招募增添新力量的核心区域。在更高级别的层次上,具有陆军军官背景的人,尤其是军队内科医生,支配着核心集团。中央委员会有几名医生,而在大约100名主要的施害人中至少有23位是医生。有几个医生明显是在拿亚美尼亚囚犯作恐怖骇人的试验(向他们注射带病的微生物),有报告说(尚未确证)曾发生过(使用毒气或烟熏的)谋杀。雷西德博士宣称:

虽然我是一名医生,但我不能无视我的民族身份。我作为一个土耳其人来到这个世界。我的民族身份认同高于其他一

切……亚美尼亚叛徒已经在祖国的怀抱中为他们自己找到了一个适当的位置；他们是危险的微生物。消灭这些微生物难道不是一名医生的职责吗？（达德里安，1986b：175）

来自土耳其丢失的土地上的难民占绝大部分比例，主要是在欧洲巴尔干国家，尽管也包括高加索人。驱逐令允许难民占据被驱逐者的房屋。斯特默将穆斯林难民看作是构成暴行的主要推手（1917：53，166—168）。戴维森（1985：77—78）说阿达纳的警长“是来自巴尔干国家的人，当他看见一个亚美尼亚人时他会表现得像条疯狗一样”。另一位幸存者说团结主义者的数量被“一群在巴尔干战争末尾才出现的官员大幅度地增加了”（默杰梅基安，1920：5）。土耳其作家塔纳·阿卡姆（1992：77）强调因巴尔干战争来到安纳托利亚的难民所追求的报复：“他们将超越暴行受害人的幸存者角色，成为对将要在安纳托利亚被集体消灭的其他少数群体——尤其是亚美尼亚人的自愿的处决者。”难民民族主义者将在本书中讨论的几乎所有族群和政治清洗团体中都占比过高。还有许多来自遭威胁的边境的土耳其人——这也将成为一个熟悉的模式。在战后土耳其政府开始的审判中，一个主要被告说他是在替他的岳父报仇，后者曾遭受了在亚美尼亚帮助下入侵的俄国人的伤害（贝德罗西安，1983：161；达德里安，1996：229；1997b；耶吉亚扬，1990，1991）。

这些是少量的证据。它们可以表明主要的施害人——除了特别部队的普通士兵——来自土耳其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的核心拥护层。但还需要作更多的研究。

外国人与德国姻亲的串通

协约国应承担一些间接责任。他们曾支持亚美尼亚争取自由的呼声，并在战争爆发时试图将其强加于土耳其。土耳其人的强烈反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针对亚美尼亚人与基督教协约国之间的联系的反应。从这之后，协约国无力干预。这是同盟国的第二战场，而俄

国与英国人的推进不够坚决,不能挽救许多亚美尼亚人的命运。亚美尼亚人饥渴地等待着战争的消息,希望协约国已取得突破,祈祷英国在加里波利的登陆能取得成功(因为那将可能使战争结束)。协约国曾鼓励过他们,但之后就和他们交给他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将看到这是大国在面对谋杀性清洗时的共同缺点。但相比于协约国对他们的战争努力,它只是相对次要的过错,更加关键的其他战场所起到的压倒性突出作用。

德国与奥地利有更多直接责任。德国,主要的盟友,是唯一能够被相信曾抑制了土耳其行动的外部国家。土耳其的德国人与奥地利人社区中绝大多数成员到1915年年末时都知道了驱逐出境意味着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传教士、军官和领事对它们表示强烈反对。德国大使馆提出了迟到的正式抗议,称驱逐只有在成为一种军事必要时才是可以接受的。土耳其政府当然回答它们是,而这回答在一开始让大使馆满意了。但是土耳其的德国人的抗议然后直接指向了柏林,它们大大惊动了威廉街的德国外交部。贝特曼·霍尔韦格首相亲自否决了外交部的一个谴责盟友的计划。他以缺乏人性然而又是无可辩驳的地缘政治逻辑的口吻说道:“在目前战争期间提出的对盟友的公开谴责将是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一个手段。我们唯一的目的是要让土耳其人站在我们这一边,直到战争结束,而不管亚美尼亚人是否因此消亡或遭毁灭。”(凯泽,1996:43—44)德国新闻记者斯特默形容德国人的态度的特点是“无限的怯懦”(1917:65;强调是引文作者加的)。然而绝大多数德国外交官和军官在驱逐出境的规模和勉强的军事理由一旦变得明显的时候就开始谴责大屠杀(达德里安,1994a;特朗普纳,1968)。有一些人继续保持对他们的盟友的忠心。在那些卷入巴格达铁路的人当中,没有出现观点总体一致的情况,凯泽断言(1999b)。这似乎符合整个德国官员群体的情形。

我们也能使因果关系反过来,而认为青年土耳其党应为纳粹种族灭绝负有部分责任吗?两处的种族灭绝具有类似性[阿斯托里安(1995)和梅尔森(1992)如是说]。被视为对民族具有威胁性的政治一种族敌人的亚美尼亚,他们的地缘政治在战时的易遭攻击性,以

174

及他们相对的财富全都与犹太人之于纳粹德国的关系相像。达德里安(1993:80)还注意到青年土耳其党中“政治军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治”的谋杀性融合——在党卫军和活动在东线战场的德国国防军中也很明显。梅尔森认为两种种族灭绝也有差异。土耳其人远远不像纳粹那样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他们也没有宣称他们希望消灭世界上所有的亚美尼亚人——不像纳粹那样宣称他们将消灭所有犹太人。梅尔森说他们只杀害被认为是阻碍了民族纯洁的亚美尼亚人,而不是较小规模的住在“不受威胁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说土耳其语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妇女和儿童比纳粹统治下的犹太妇女和儿童幸存下来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作为一个真正的决定性标志说明了这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施害人自信父权制的土耳其社会有能力吸收和同化亚美尼亚妇女和儿童。富有的大城市的亚美尼亚人的幸存率也很高,因为许多人能够通过贿赂而让自己摆脱困境。但尽管如此,某些种族主义内容也渗透到了青年土耳其党的意识形态当中,正如我们从医生的所为中看到的,而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后来也确实转向了其他亚美尼亚社区以及希腊人。相比在这些最终大屠杀中被杀的人,更多的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得以逃往国外,但结果是对国家的将近全部范围的清洗(格雷伯,1996:140—150;拉梅尔,1994:233—235)。但即使是青年土耳其党也可以被认为与纳粹党相似,而特别部队军官团与党卫军相仿,土耳其人中的意识形态类施害人也要少得多。只有少数普通士兵施害人与青年土耳其党有很多一样的思想意识,超越了对亚美尼亚人/外国剥削的种种无产阶级的怨恨意识。党卫军也会谴责土耳其采用的方法失之野蛮——不像他们自己的那样井然有序。

本例中种族灭绝的技术也不是很现代。确实,电报为发出驱逐命令和对之进行协调提供了手段,但是现代的小型武器与斧子、刀具和将人溺毙的工具放在一起还是非常扎眼。寥寥可数的铁路线得到使用,但实际上没有电动交通工具(农村几乎不通交通)。绝大多数的被驱逐者步行上路,同大多数护送的宪兵一样。土耳其政府正为了战争努力而保存它的现代资源,这与纳粹不同。在组织驱逐行动

过程中有如官僚主义同样多的贿赂现象。显然,纳粹会运用比以上这些更多的现代方法,因为他们的国家是一个更加先进的要将谋杀进行到一代以后的国家。然而土耳其的种族灭绝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是现代的——我将在后面证明这同时也是纳粹的真实现代性。青年土耳其党发起种族灭绝是因为他们信奉被推进到种族灭绝极致的无产阶级加帝国主义加修正主义的混合性形式的现代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作为一个现代政党国家将其贯彻到底。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对未遂的种族灭绝也不是独一无二。它们是更广泛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当集体角色之间存在的某些轻微关系被置入某种危险的宏观局势之中时,它们就可能导致谋杀性种族清洗,甚至是种族灭绝。

存在一种土耳其人对纳粹种族灭绝的因果影响吗?这似乎不大可能。1922年与苏联和好,1923年与希腊和好,接着是土耳其之父的稳定统治,缓和了本地区的紧张态势,导致土耳其人否认而不是完成种族灭绝。虽然欧洲曾影响了青年土耳其党,而现在影响着凯末尔,但几乎不存在反向的影响。就绝大多数欧洲人对亚美尼亚悲剧的意识而言,他们以“东方主义的”概念将其视为亚细亚的野蛮落后性,而不是作为政治现代性。德国曾有一次要到土耳其——它“一战”的盟友——执行一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确实包括了几个后来成为忠实纳粹的士兵——包括一个男士兵,日后的奥斯威辛指挥官鲁道夫·赫斯(这些人列在达德里安的名单中,1996:199—204;参见该书后面第8章的赫斯传记)。但是是否这一次滑向谋杀性纳粹主义的比重就会大于来自其他战场的比重,这是有疑问的。也没有证据表明对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仔细观察会对纳粹主义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听说过一种直接联系,它应当值得我们思考。在入侵波兰之前,希特勒在对他的指挥官的一次讲话中,用以下辞藻对杀害波兰平民(请注意:不是犹太人)进行辩护:

我已安排好敢死队——目前仅在东线——命令他们不带一

丝怜悯与同情地去杀死波兰裔和讲波兰语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我们需要的生存空间。毕竟,今天有谁还在说亚美尼亚人的毁灭?(马鲁斯,1987:20)

但对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亚美尼亚似乎在另一个完全相反的含义上显示了它的悲剧性——它未被视为对走上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的其他人的一个警告。正如一直被作为一种主流的对纳粹种族灭绝的解释,即认为德国人具有的某种独特的性格或特殊路径(Sonderweg)导致了他们进行种族灭绝,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也被解释成一种独特的土耳其性格的结果,使人想起具有东方人特征的可怕的土耳其人形象。实际不是这样。我已经用更一般的社会过程——对政治主权的对立的要求,大国的竞争,政治派别主义和激进化,社会中政治及军事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世俗的出于贪婪、飞黄腾达和恐惧的动机——以及仇恨来解释这种种族灭绝。

176

结论：种族灭绝的解释

这是民主的阴暗面吗?在殖民者民主中发现的那种直接形式中不是,甚至在我们将要在南斯拉夫事件中看到的被歪曲的民主化意义上也不是。事实上,伴随着民主走向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出现了一种对原来追求政府由人民统治的运动的曲解。还出现了一种社会有机论的和最终走向排他性的民族国家主义。但是这样的国家一直贯穿了整个“一战”时的奥斯曼帝国,而青年土耳其党也对其阴暗面的某些内容进行了激进化——如穆斯林和其他米勒特之间的分而治之,它对异议的儆戒性镇压,以及对惹麻烦的少数群体采取驱逐行动。青年土耳其党在“一战”初开始体现一种独特的将现代民族国家的阴暗面与古老的多种族帝国相结合的特点。直到种族灭绝以及“一战”之后,另一帮青年土耳其党才完全转向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之后凯末尔的统治可能是轻松和进步的,因为土耳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的少数裔族人。

我的其他种族论点更直接地适用于解释这类种族灭绝。这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共占主导地位的种族民族主义团体之间的不对称冲突,都对同样领土提出意识形态上合理和实际中可以获得的主权要求。奥斯曼土耳其人过去长期对亚美尼亚人居住的领土拥有合法主权,同时他们具有政治及军事垄断权来贯彻执行他们的主权权利。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开始要求他们自己的国家,断言其历史合理性根植于过去的亚美尼亚国家之中。虽然他们自己只拥有极少的政治及军事资源,但他们受到一个在其国内居住有数百万亚美尼亚人的大国的援助。俄国是一个准家乡国家,不断强化着弱者一方加入战斗的意志。虽然他们现在处于弱势,但他们相信政治民族主义最终会在现代世界上不可阻挡。土耳其人有理由害怕这最后两个手段。任何奥斯曼政府都害怕俄国援助亚美尼亚人,因为这将威胁到帝国的核心安纳托利亚领土。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还害怕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因为他们现在也相信民族—国家是一个不可阻挡的理想。

177

因此在两个族群的领导派别之间就有了针对同样领土提出主权要求的冲突,一种受到一个准家乡国家——大国邻居援助的冲突。它然后展开为我的第4个论点讲的混合局面,一种先发制人的种族灭绝,由一个仍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发起,这个组织相信历史潮流可能正逆它而动,是需要采取激进行动的时候了。这一原因层面或意味着导致走向种族灭绝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

但也有更加偶然的原因。政治及地缘政治制度失去稳定,改变了强大的社会角色的目标,正如我的第5个论点中所说的。这不是在两个界定明确的和有着深仇大恨的敌人之间的一贯的冲突。正如上一章所强调指出的,奥斯曼帝国的力量正在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和基督教大国面前日益衰落。随着不同派别的冲突而来的一系列的灾难导致接二连三的政治危机发生,他们的身份、权力和目标也因危机而发生改变。趋势,如在欧洲绝大多数地方一样,是走向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但它是一个不稳定的趋势。在1908年和1913年的两次政变中,青年土耳其党上台。在他们的队伍内,加强国家权力的中央集权论者的影响日益增大。作为他们坚持集中化的一个副产品,团

结主义者开始接受一种不容许权力分散多元化状态的更加有机体化的民族主义。这威胁到这些立宪统治倡议者过去与其他民族中心主义者达成的联盟,包括亚美尼亚人。两个最终危机从青年土耳其党的错误中产生——过度自信地加入“一战”和草率派遣恩弗帕夏的军队进入俄国。战败恶化了危机,使更多青年土耳其党激进化,给了激进分子对关键的政治及军事机构的控制权。

族性是奥斯曼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组成原则,它赋予冲突关系以结构,取代了阶级不满,而一般又通过宗教得到加强。然而族性胜过阶级仅仅发生在战争期间。战争使得一些亚美尼亚人变成叛徒。凡城和西里西亚暴力行动的爆发转变成了一场种族间的内战,消除了前线与后方之间的差异。现在亚美尼亚人中的阶级差异只在为了贿赂以求得生存时才显示作用。年龄与性别差异依然左右生存机会大小。但总的来说,奥斯曼臣民为常规的和族群的两种战争所逼迫而选择一种单独的身份,如像亚美尼亚人对土耳其人(以及库尔德人、切尔克斯人等)。族性超越了阶级和所有其他区分,如我的第二个论点所述。

正如本章和前面的一章已强调的,种族灭绝作为一个政策选择时机较晚并且是突然到来——如我的第6个论点提出的。青年土耳其党的A计划,20多年来一直占主导地位,在1914年8月初得到最后一次尝试,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联盟反对他们共同的对手。约在1914年8月到1915年2月间的某个时候,A计划被它前20年来的主要竞争者,即B计划——强制驱逐所代替。这个计划缺乏稳定性,首先是因为军事压力预示着需要撤退以及这里可能是他们在土耳其心脏地带的最后一站,这里也住着一个不忠的少数裔群体。这方面,1915年还发生了一场针对对双方群体都是最关键的特别领土的争夺。那些拥有压倒性军事力量的人相信,这种局势需要采取任何有效的种族清洗行动。他们运用他们的正式的和暗中的军事优势去实现这一目的,而它不难想象地产生了大规模死亡。从1915年4月23日到5月末之间的某个未知时间,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开始组织种族灭绝。这是由一个拥有绝对军事优势、近来主要因意料之外的地缘

178

政治危机而失去稳定、陷入派系化和激进化的国家去施行的。若没有这些偶然的压力,它不会发生,它不是蓄意已久的行为。

种族灭绝的完成过程更加模糊。但一旦开始之后,它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的。这仅是半个政党国家,与其说是一个来自底层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如说是一小群的民族主义精英的产物。它的核心拥护层在帝国的军事和政治中产阶级当中,尤其是作为难民和流亡者的那些人。这些激进化的民族主义者控制着足够的关键国家机构,能够将三分之一的对种族灭绝持异议的地方行政官免职,同时他们还拥有足够的来自他们这一阶层的合格官员来取代他们的位置。然后他们调用国家的镇压力量——警察、特别形成的准军事部队和部分军队。正如我的第7个种族论点所述,这些核心激进分子主要由最新激进化的意识形态杀手组成——尽管追求个人前程也闯入了他们的动机之中。特别部队的军官也经之前两年多的社会化具备了暴力施害人的动机。

这样武装起来之后,激进分子就能够好好利用更多普通土耳其人及其他人当中的世俗的工具性动机。被招人特别部队的罪犯受到自由和劫掠的诱惑。库尔德和切尔克斯人族长得到了更多的地方政治自治权和土地,而他们的跟随者获得了赃物或战利品。他们与数千名卷入其间的普通土耳其人似乎都是物质主义杀手。然而除了让他们成为更有纪律的杀手,服从给予他们命令的战时爱国主义之外,两者都有不经意的某种程度受嫉妒驱使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偏执。最终,普通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切尔克斯人以及其他他人参与了种族灭绝,正如我的第8个论点,但是怀着异常突出的物质主义的贪婪动机。

以上结合产生了一种混乱的非理性的后果。施害人不是“土耳其人”(正如民族主义理论会这样说的)。相反,某些土耳其人(及其他人)被卷入了一种确定无疑的自上而下的谋杀性清洗过程(如国家主义理论提出的)。然而国家主义是被一次次产生自不稳定的战争地缘政治的危机诱导而形成的派系主义和激进化的最终产物。它不是世仇的产物(像原始甚至经典理论会这样说的),然而包括了两个

族群年龄阶段。基督教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宗教—种族紧张关系相当古老(至少有一个世纪)。但是这些紧张关系被一种现代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加重并赋予了某种方向,产生了前两年才有的大规模种族仇恨。它是由力争合理达到他们的目的的行为人施行的(如理性选择理论),但是处在一种他们既不能控制也不能作出合理选择的局面下。他们是在其他选择似乎不起作用的时候才诉诸种族灭绝手段的。他们相信最终的决定是绝望中的孤注一掷。

他们错了,不仅是在道德上而且还在事实上。亚美尼亚人并没有构成这样一种威胁,而对他们的清除削弱了奥斯曼的战争努力。种族灭绝招致失败。然后领导人流亡他乡,在那儿,他们倒在亚美尼亚暗杀人员的子弹下。他们也许会声称种族灭绝是个长期的功业,因为亚美尼亚人的消失使得战后团结土耳其和让土耳其中央集权化更加容易。然而国家依然受到青年土耳其党两项遗产的困扰:军事威权主义和一种目前在压制库尔德人而非亚美尼亚人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青年土耳其党通过奉行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已致命地削弱了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继任者将在他们的阴影下挣扎前行。

第7章

纳粹 I：激进化

德国问题

180

我们开始探讨最臭名昭著和证据最充分的种族灭绝事件。我的著作《法西斯主义者》(*Fascists*)指出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奉行极端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运动,它声称要通过运用准军事部队和国家暴力“解决或说明问题”以超越社会冲突,尤其是阶级冲突。但是纳粹主义较之其他法西斯主义运动多了两个危险的特征:它的民族概念中种族主义成分大于文化成分,它倡导一种攻击性的帝国修正主义以恢复德国以前的实力。我将论证,当两方面都转向欧洲的东扩上时,纳粹种族灭绝就随之而来,尽管只是在领导人和激进分子的一系列激进化行为之后。本章讨论激进化问题,接下来的两章探讨种族灭绝。

为什么在德国会滋生出后来被纳粹利用到极致的种族主义情绪?这是德国问题。但也许有点不太恰当,因为不只是德国才这样。北欧也孕育了种族主义。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在国外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比北欧殖民主义者更愿意同化本地人以及同他们通婚。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滋养了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生物学、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带有种族基因特点的人类进步概念。许多人相信德国人或英国人在基因上不同于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一个种族会比另一个种族优越,以及像犯罪或精神

疾患等这样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优生、“种族净化”政策得到解决。纳粹谋杀精神障碍人员的政策只是将当时其他北欧人执行的强制净化往前推进了一步。第三个是19世纪末欧洲许多地方普遍出现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前面已讨论过。

但是在以上关于种族灭绝的三个基本的促进因素和它的施行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为什么有些德国人弥补了它?有些人主要在德国民族主义框架内寻求答案。将民族主义分出两个主要类型,种族的和平民的,将德国民族主义认定为确凿无疑的种族的因而属于更加危险的类型(例如,布鲁贝克,1992),是很常见的。任何长期的法国或意大利领土上的居民都被视为法国或意大利民族的成员。这是民间对公民权的定义,它容许各种不同族群之间的同化。但是在德国,唯有德国裔,无论他们住在哪,都被确定地视为日耳曼民族的正式成员。这被认为是德国问题的根源,理由是它比平民民族主义更加具有排他性。

181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然而,正如我在第1章中指出的,族性无法被客观地衡量。德国人还是不得不决定谁是种族上的德国人。德国国家运用了两个标准:将德语作为母语讲的能力以及血统关系。语言是可以习得的,但血统是通过遗传赋予的。因此,这两个标准的确切结合形式将会影响德国民族主义的排他性程度。在19世纪末期,住在帝国(Kaiserreich)中的犹太人与波兰人通过讲德语和从文化上德国化部分地被同化进入德国民族,尽管波兰人遭到歧视并经常被当作是二等公民。犹太人与斯拉夫人经过自愿同化和制度强制方式被清洗,但是在“一战”前德国的反犹主义并不比法国的反犹主义势头更盛。事实上,为了解释事情为何变得大为恶化,我们必须从德国民族主义本身之外的地方寻找原因。

然而德国究竟在哪里?它不只是早先世纪的“地理表述”而已。但是,在1914年之前,德国境内的两个大国还在,而许许多多的德国人不居住在它们的任何一个当中。德国是不完整的。因此任何对德国民族主义的分析必须包括地缘政治关系(国家之间)和穿过国家边界的跨国关系(在德国人当中,以及在德国人与他人之间)。这在德

国激进化过程的所有阶段都是真实存在的。德国人跨国界以及在地缘政治上卷入东方问题让德国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走向了激进化。

德国民族主义者的目的是将所有族性上被界定为德国的人联合起来。这一时机现在让人心痒地临近了,因为德国的许多国家曾被合并为两个大国——普鲁士德国和哈布斯堡奥地利。但是要把几乎所有德国人包含在一个单独的国家之中,需要向地区展开扩张,而在这些地区其他族群是占主要地位的。19世纪末期,德国民族主义的鲜明特征与其说是种族的还不如说它暗示了帝国主义——德国人征服和统治其他人。虽然帝国扩张在欧洲很寻常,但德国帝国主义晚到,所以要比早先的英法帝国主义更带有民族特色。现在受统治的应该不仅是上层阶级,而且是整个民族,所以帝国主义能够动员人民进入一个种族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战争会决定哪个民族最适宜生存。在德国,种族理论家说,丹麦和法国少数裔群体同是来自雅利安种族,但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不是,后者居住在两个德意志国家的东部交界地带。这类东部族群可以被视为德国种族之外的民族。

182

两个国家都由反对人民统治的各朝君主统治。然而两者有差异。普鲁士扩张主要是在德国人中间,所以这是一个德国人国家,一个小型德国(kleindeutsch)民族—国家,但是对非德裔人口来说,他们只有部分人民主权和潜在的二等公民/以及同化权利。相反,奥地利的扩张是在东部和南部,主要针对的是非德国人,一个大型德国(grossdeutsch)帝国地位而不是一个种族国家。它是一个由德国人王朝统治的多种种族组成的帝国。哈布斯堡人不可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得不结合同化(使其他人说德语和接受德国文化)与多文化联邦主义(允许其他种族精英参与统治)来进行统治。奥地利眼里的德国是大德国帝国主义,但它不是社会有机论者。正如第3章指出的,争取让整个哈布斯堡土地上的人民进行统治的斗争在从属的族性中散布了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而德国人与匈牙利人的反应是要求更多种族上而非文化上的统治。因此到1900年,奥地利德国人开始动员最大的德国有机民族主义团体,回应从属的民族主义者对他们发

动的攻击。

两个族群似乎特别有威胁。绝大多数的德国扩张是东向的,它意味着俄国被视为最具威胁的对立国家——庞大、古老及由斯拉夫人组成。德国人开始将异族的原始的斯拉夫邦看作是威胁“更高级”日耳曼文明的群体。第二个威胁由犹太人构成,他们被视为全欧洲的古老的宗教敌人和“社会弃儿的剥削者”。然而西欧社会现正处在世俗化过程中,而犹太人似乎在那里被同化——就像在普鲁士德国自己国内一样。这种情形在进一步往东面去的国家中较少。但是犹太人在哈布斯堡帝国中处于特殊地位。这个王朝不喜欢民族主义者——包括德国民族主义者——它鼓励宗教宽容和作为制衡力量的犹太人这样的世界性群体。国家在吸收犹太人,但德国民族主义者与犹太人在哈布斯堡王朝中比在普鲁士帝国中更处在一个冲突的道路上。犹太人为摆脱沙皇俄国集体迫害向东正教犹太人的哈布斯堡土地逃亡,这种行为加强了冲突。他们奇怪的语言、服装和卷发看上去陌生而原始。德国对东方斯拉夫和犹太人的恐惧在19世纪末增加了。

这些倾向加起来增加了德国民族主义中的攻击性成分,尽管在奥地利比在德国更多。但是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两个决定性的变化。奥地利与德国遭受了灾难性的失败。它终结了两个王朝的历史,粉碎了两个属于德国的帝国计划。哈布斯堡帝国随着奥地利蜕变为今日的小共和国因而不再存在。它的其他领地被赠予了有着单一的主导族性(主要是斯拉夫人)的国家,在此德国人作为二等公民现在遭受着歧视。普鲁士德国也成为了一个共和国,但依然是一个大国,只是领土和人口减少,并失去了帝国对民族主义的抑制。两个共和国政治上极化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左派和民族主义右派。德国右翼分子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现在变成了种族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重新划定边界以并入“失去的领土”,创建一个由德裔组成的帝国。随着奥地利的解体,只剩下普鲁士德国,现可简称德国,能够做这件事。哈布斯堡文化上的大德国理想破灭了,普鲁士的种族理想转变成了一种新的大德国扩张主义。但是,正如伯利

(2000)强调的,第三帝国的侵略性来源于一种强烈的受害人身份的意识。

战争的第二个后果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创造出了横贯欧洲的阶级革命和混乱的幽灵,这被视为具有典型的俄国特色和犹太风格,因为太多的杰出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在1918—1919年,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都不得不镇压共产党的起义在其中,犹太人占有杰出的地位。这似乎进一步使得两个东方的种族敌人——斯拉夫人与犹太人,缠绕在一起。犹太人也被视为资本家而与西方的敌国联系在一起,但苏联是德国扩张的主要敌人,而一个犹太—布尔什维克敌人可能会威胁到德国国内。种族和阶级的敌人被认为在共谋建立相对于德国人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当然,犹太人实际上没有在寻求他们自己的对立国家(至少没在欧洲),但是人们认为他们对那些在寻求建立自己国家的斯拉夫人和共产主义者起了激励作用。

大萧条加大了对经济的不满,而纳粹的迅速上台主要不是因为反犹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推出了一个以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为依托、通过超越阶级冲突以恢复经济增长的貌似合理的计划。1928—1932年间的选举首次见证了中间主义自由派和特别利益团体的衰落,他们把大多数的票都投给了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纳粹党起初只获得较少票数。之后保守主义者开始失去阵地,而纳粹党成为主要受益人。与保守派民族主义不同,纳粹这一派似乎不分阶级、群众化,所以真正是社会有机的。希特勒承诺以强有力的领导让所有阶级和利益团体团结在一起,统一民族,使德国再次强大起来。虽然纳粹在选举时期对反犹主义不过分重视,但极少有人怀疑他们会对犹太人施加压力,而许多人是同意纳粹这么去做的。尽管纳粹没有催促战争,因为这将会非常不得人心,但绝大多数德国人期待并想要他们重申德国权力并恢复失去的领土。因此纳粹在自由选举中崛起,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一的选票,只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分子还依然构成有实质意义的反对派。因为余下的保守主义党派也很激进,并与希特勒展开竞争,所以纳粹有效获得了议会大多数,后者被他们利用来谋划了一场或多或少合法的政变。纳粹通过一种转向社会有机论的民主制

取得了权力(见曼,2004:第4章)。他们随即终止了民主制。但是只有少数德国人预料到了这一步,他们中的大多数投了社会主义者或共产党的票。而即使他们也没有预料到会有一场世界大战或种族灭绝。

在某些方面,这些选举与1990—1991的塞尔维亚选举相似。人民投票给希特勒或米洛舍维奇的数量差不多,也同样是因为种种不同理由。两者似乎都有强大的经济政策,两者都表示了群众性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帝国修正主义和阶级情绪在失去稳定的地缘政治中的重新调整以及一场经济危机已经使得德国的民族主义彻底地社会有机化了。由多样化的人民进行自由和社会主义的统治的概念一开始就被按照社会有机论统治概念的民主手段击败了。然后赢家以武力摧毁了民主制,确保了种族民族主义会通过种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表现出来。德国与奥地利彻底使两种意义上的由人民统治——由平民与由种族——缠绕在一起。然后种族一方谋杀了平民一方。是一方的独裁施行了种族灭绝。

反斯拉夫和反犹情绪的增长对德国民族主义并非第一次,而是遭遇东方的地缘政治及跨国家的现实之后不期而来的副产品。在最后的解决方案中,犹太人不但因作为犹太人被根除,而且也是因为他们陷入到了德国对其他方面的斗争之中。只有在间接的意义上纳粹种族灭绝才体现了我的第3个论点:谋杀性清洗的威胁产生于两个对立的种族团体都对同样的领土要求国家权力而他们都相信其要求的合法性和实用性。这仅从纳粹他们自己的视角看才适用,因为犹太人实际中并没有图谋在德国土地上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纳粹认为犹太人是斯拉夫/共产主义扩张的幕后支持者。也因为这个理由,纳粹案例适合(又是间接的)我的第四个论点在种族混居下的变异形式。受一种由犹太人煽动的国家阴谋念头的威胁,纳粹发起了一场他们认为是针对弱势群体即犹太人的先发制人式的进攻,目的是阻止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在未来变得更加强大。

纳粹种族灭绝的规模

在其 12 年寿命的最后 4 年里,纳粹政权造成了对将近 2000 万非武装人员的屠杀。〔1〕虽然犹太人成了主要的受害者,但他们占总数不到三分之一,而他们的种族灭绝只是发生在杀戮顺序中的较后阶段。首先到来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街道上、警察和德国集中营的暴力的升级——杀了仅几千人,但重要的是让施害人和普通大众对此感到习惯和受到锻炼。第一个阶段的重点较少集中于犹太人而更多集中于德国政治反对派,特别是左翼人士。这在将温和派从政治中清除出去的过程中是最基本的——就像同样在其他谋杀性清洗事件中发生的一样。虽然这是以政治为目的的选择性镇压,但政治敌人还是以社会有机论、种族类的形容词被斥为“异族的”、“非德国的”等等。1938 年“水晶之夜”和奥地利的德奥合并曾在较短一段时间内将纳粹的怒火集中在犹太人身上,但次年这就被在所谓的代码为 T₄* 的安乐死项目中开始的第一次系统性的杀戮遮蔽了。

T₄ 杀死精神障碍和紊乱的德国人,以使他们不再有后代。总体上,估计有 25 万名这样特别无助的受害人被杀害,占了方圆内所有能找到的精神疾病患者的较大百分比(伯利,1994;德·米尔德特,1996;克里,1983)。这是联合国定义下的种族灭绝,尽管它不是族群性的种族灭绝。生物学一种族主义的推理方式也使得纳粹下令杀戮“关联者”(包括惯犯)、同性恋以及那些具有严重出生缺陷或异常身体的人,如侏儒等,他们被认为会将生物学缺陷带入雅利安血统。对他们的杀戮是不规则的,太多人活了下来,因此不构成种族灭绝性

〔1〕 没有人能给出精确的死亡数字,无论是总数还是任何受害群体的数字。拉梅尔(1992)考察了许多估计数后建议我们应该采用较为可信数字的中间点。按此计算的结果是 2100 万。

* 纳粹德国“国家医疗机构协调局”的代号,取自其在柏林总部的地址动物园街 4 号。

质,但是人数较少的非雅利安族少数裔群体,如德国的卡舒布人和索布人以及在克里米亚的克利姆察克人(Krimtchaks)确实遭受了种族灭绝。

吉卜赛人在一阵延搁之后也遭到谋杀。他们在一种意识形态困境中面对纳粹。1939年几个主要的纳粹视其为亚人类,就像他们对待犹太人和波兰人一样。他们的流浪和人们想象的小偷小摸习惯又使他们被另划为反社会者。不过,纳粹理论家承认吉卜赛人属于雅利安后裔。希姆莱建议通过将“更纯洁部落”隔离居住在保护区来保存“他们的人种”的“古老的纯洁性”——直到马丁·鲍曼(希特勒的代言人)制止了他。从1942年年末,在奥斯威辛的吉卜赛人被射杀、饿死、过度劳作被折磨致死,或死在约瑟夫·门格尔的恐怖实验之中。针对他们的系统性散放毒气行动始于1944年。在比利时、克罗地亚、爱沙尼亚、荷兰和立陶宛的吉卜赛人大多被消灭,同奥地利和德国的四分之三吉卜赛人一样。但是别处的吉卜赛人善于躲避。他们的死亡数字估计大致在20万—26万之间,约占欧洲吉卜赛人的四分之一,尽管界定谁是吉卜赛人是困难的(克罗,1996;汉考克,1996;赫斯等,1978:62—68;肯里克和富克森,1972:183—184;皮尔逊,1983:200)。关于这是怎样的种族灭绝有很多争议。意图明摆着,但它受挫于目标的难以捕捉,所以这是未遂的种族灭绝。假如纳粹赢得了战争,它可能已经实现了。

斯拉夫人当中有比其他所有民族更多的人被杀死(亨恰克,1990:122—124;库马尼夫,1990:140)。在1939年征服波兰的过程中,纳粹越过了欧洲历史上甚至是最惨无人道的战争的界限,这在本书第2章被讨论过。拉豪森少将在战后作证时说暴君曾下令对被占领的波兰实行双重的军事/民用控制,以实现“对民族的根除”和“政治战场的打扫”(纽伦堡法庭,1946,第8卷:588)。纳粹确实杀死了几乎所有他们能够发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波兰人。党卫军上将伯杰敦促道:“多杀两个波兰人比少杀两个波兰人要好。一个野蛮国家无法以一种文明方式治理。”差一点达到300万的非犹太裔波兰人被杀害,也许是20世纪中最彻底的政治灭绝、消灭敌国精英的事件。当

波兰人看着犹太人被根除时,许多人相信战后他们会是下一个种族灭绝对象(戈登,1984:101;古特曼,1990)。实际上,纳粹为他们准备了几种不同的命运——三分之一的人进行政治灭绝,再三分之一隔离,余下的野蛮驱逐至俄国。本来打算的结果不完全是种族灭绝。

随着1941年年中对苏联的侵入,杀戮开始以苏联平民和犹太人为主要对象,起初是通过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射击小队,然后是党卫军、宪兵和国防军以及集中营。纳粹杀死了600万至700万非犹太裔苏联平民(近400万乌克兰人、200万白俄罗斯人和在俄罗斯共和国的150万人),加上330万苏联战俘,占有所有苏联战俘的57%——同时英美死于德国俘虏营的战俘不到4%(他们被纳粹视为雅利安人)。这些苏联平民和战俘中约三分之一的人是被枪杀或用毒气毒死;其余的被抛于野外、折磨致死,干脆不让吃饱以便病死或饿死(斯特赖特,1978:10)。“只有”大约15%的乌克兰非犹太人死于这些方式,还有约10%的波兰人和约10%的白俄罗斯人——而波兰有90%的犹太人死亡。但绝对数字令人恐怖。这不是完全的种族灭绝,因为苏联斯拉夫人太多,你不至于认为可以将他们全部杀光。相反,纳粹的目的是要清除那些他们想象的可能会反对他们的人(政治灭绝),以野蛮驱逐将其余大量的人赶往中亚地区,然后将剩下的30%作为处于奴隶般隔离状态的农夫而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俄罗斯人被打算给予与波兰人同样的命运,但是他们具有更好的反抗条件。

随德国军队一同旅行的意大利作家马拉帕蒂提供了一份其亲眼所见的关于该政策的生动描述。在一个被毁坏的乌克兰村子里,118名被俘的俄罗斯士兵被要求高声朗读《真理报》* 中的内容。他们被告知说,那些读得最好的人,将被给予在战俘管理部门中的牧师岗位,一个比等着那些失败的人的采石工作更轻松的岗位。31个人通过了这种文化测试,然后站在一个小组里,“满足地为他们的运气笑了”。接着他们靠着离得最近的墙站成一排,被开枪打死。负责的

* *Pravda*, 苏联共产党官方报纸。

中士告诉马拉帕蒂:

必须要清除掉所有这些俄罗斯有学问的下等人。太能读太能写的农民与工人是危险的。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马拉帕蒂,1946:213—215)

政治受害人被以种族主义术语称作劣等人(Untermenschen),就像犹太人一样,有时根本就不被当作人来描述,还被贴上政治标签。海德里希说:“犹太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来源,因此必须要被消灭。”杀戮命令习惯性地将政治和种族目标缠绕在一起——“犹太人、吉卜赛人、低劣人种、不合群的人(asocials)和苏联政治委员”,“战俘中所有种族上和政治上值得反对的因素”或“第二等亚细亚人”。黑德兰(1992:54)列出了44个在党卫军特别行动队报告中被认定的重叠的“目标群体”,有的是种族性的,有的是政治性的,有些比较模糊(比如有敌意者、破坏生产者 and 煽动者)。臭名昭著的“行政委员令”称,所有苏联的政治委员都必须被杀死,因为曾“首倡了野蛮的亚细亚战争方法”。许多具有亚洲人“面部特征”的苏联公民也被杀死(戈登,1984:143;雅各布森,1968:530;克劳斯尼克,1993:62—63,532)。相较犹太人;精神病患者和吉卜赛人,斯拉夫妇女和儿童被杀的比例较小,这表明其意图不属严格意义上的种族灭绝。然而几乎所有的受害人都是不具有危险的平民,既没有武装,甚至也不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出现了惊人地不平衡的党卫军和国防军报告的统计数字:在一次标准的行动中,1500名被杀的游击队员后来被发现只有100支来复枪。对斯拉夫人,纳粹执行了带有种族灭绝倾向的政治—种族相混合的清洗方针。而对犹太人,同样的对抗则成为了种族灭绝。

从1939年到1941年,对斯拉夫人的杀戮要比对犹太人的杀戮来得重要。1941年9月,第一次齐克隆B(Zyklon B)毒气试验在奥斯威辛被运用于俄罗斯战俘身上。次月,40个俄罗斯人在萨克森豪森被用来测试第一个毒气闷罐车。他们赤裸着身子被赶上卡车,卡

187

车被开到当地的墓地,引擎继续开着。20分钟后,里面的撞击声和呻吟声停止了。车子打开,他们被推出来。让党卫军们满意的是,身体是粉红色的——这表明他们是中了毒,而不是窒息死亡(布朗宁,1985:62—65)。毒气闷罐车后来从波兰到塞尔维亚,遍及东欧,而新技术是在施用于犹太人的死亡集中营毒气室中达到了其杀戮的最高峰。

但是从1942年年初起,犹太人最后解决方案,也称大屠杀,成为纳粹种族灭绝的代表作。毒气大都是为犹太人准备的,而绝大多数斯拉夫人是被枪杀或饿死。斯拉夫人也没有像这样被如此无情地杀害过。犹太人居住区被消灭,五个死亡集中营被启用,犹太人在数千个其他集中营的损失率在加速上升,然后来自向前推进的苏联红军的压力将集中营疏散成了幸存者的死亡进军。经常说的共有600万犹太人被害这个总数可能是稍微高了一点。希尔伯格(1978)仔细计算的结果是510万,而马克苏多夫(1993)又加上30万俄国犹太人。或许550万是对被害的犹太人总数的最好估测。几乎四分之三的欧洲犹太人死去,绝大多数幸存者是在未被纳粹完全控制的国家。大多数受害人是在东方,然而对他们的根除却与在西方一样无情。这是显然的种族灭绝,纳粹尝试的唯一真正大规模的种族灭绝。

188

最后解决方案是世界迄今所见到的目标最单一的种族灭绝尝试。纳粹领导人以杀光所有欧洲犹太人为目标。当梦想着建立世界帝国时,他们想象的是杀光各个地方的所有犹太人——一心一意地追求根除目的而不管代价为何。从工具理性角度解释说不通。从经济或军事权力角度看也说不通。它从战争力量中转移出庞大的人力、交通和物资等资源,且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岁月。这不是工具理性而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为本案的独特之处。对有些纳粹来说,它曾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它就是战争努力,唯一的因此能让他们被记住的最伟大的成就。结果证明,它在与他们原来想要的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才是真的。因为对他们犯下的邪恶的记忆支配了我们对整个纳粹政权的看法,而对许多人来说,它还支配了他们对德国本身的印象。

一种欲与邪恶正面交锋的意识让幸存者回忆录和战争罪审判空前流行。因为有太多人强烈感到他们必须出来作证,我们能够读到这方面的内容,直读到大脑发晕、胃部痉挛。从其总体的范围、一贯的意图到它残忍无情的行为来看,对犹太人的根除代表了一种在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规模上展开的空前的人类邪恶——对不理解它的受害人也一样,邪恶依然是邪恶,尽管他们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因而还是比较温顺地走向了死亡。但是审判与回忆录也给了我们洞察人类邪恶之核心的证据。为何种族灭绝会发生?人们如何可能杀戮并那样残忍地持续杀戮?虽然无人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我能够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线索。通过以过程和施害人为重点,我追溯了种族灭绝形成的脉络以及施害人对他们在做的事情的思想认识。正如在其他案例中一样,我们将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升级顺序中的步骤,要么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要么是在一个有序进程中相互有关联。或者我们将它们视为无计划的、以较偶然的方式产生的升级行为。我又一次采用在每一个阶段正式分离出一个计划的方法,从而找出 A 计划、B 计划、C 计划等等。我指出策划人和施害人,试图去确定他们在过程中的每一阶段的意向是什么。

施害人动机

两个基本相互对立的初步结论似乎可作为代表。第一,屠戮施害人群体源于对一种凶残的意识形态的追捧:完成对日耳曼民族和帝国的清洗。这肯定已渗透在纳粹精英的思维当中。在《法西斯主义者》一书中我从一开始即强调指出,纳粹主义曾追求一种极端的民族—国家主义事业(极端的民族主义加极端的国家主义)。在本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项事业是如何在 1913 年到 1914 年间激进化为一种谋杀性清洗意识形态以“净化种族”的。

但这必然要涉及横跨许多机构中的施害人群体——安乐死医院、特别行动队、党卫军和国防军部队、数百个遭清洗的贫民区、五个

死亡集中营,加上 1000 个其他集中营和产业奴隶劳力工厂、最后的死亡进军,以及所有让他们发挥全部作用的必要的办事处和交通部门。尽管不是全部,但绝大多数的施害人,是德国人。他们的总数不得而知。戈德哈根(1996:168)作了大胆猜测,认为大约有 33 万人参与了杀戮,这样平均每个施害人杀害的人数约是 65 人。这是包括有数十万人参与的大规模重复性杀戮,他们在此前对纳粹主义的忠诚肯定是很少的。许多普通人肯定也参与了大屠杀,如我的第 8 个种族论点所述。

本书第 1 章列出了几个普通动机。偏执型杀人者带有通常的德国偏见。戈登哈根说(1996),普通德国人是谋杀性的反犹主义者,他们并不需要太多来自纳粹的敦促。普通乌克兰人也是这样,萨布里恩暗示(1991:242)。其他的是落入了前文描述过的强制型然而也是伙伴型组织的陷阱中的普通人。不服从有可能会招致上级惩罚或者同辈们与其断绝友谊。人们会在社会压力下从事谋杀,布朗宁(1993)说起特别行动队的支持部队后备警察营 101 时这样说。因为这个理由,伯恩(芬克尔斯坦与伯恩,1998:98—100)说太多的施害人是“完全正常的能辨别对错的人”——是具有“在任何国家都能找到的个性”的能够“犯下历史上最大罪行”的“普通男人与普通女人”。她最后说:“这是关于最后解决方案中的施害人的最惊人的真相。”这些人也许是恐惧型、遵守纪律型或伙伴型杀人者。其他人是现代官僚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在这里顺从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社会压力的结果,而是制度化的习惯的产物,而他们作为官僚机构型杀人者陷人在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中而难以自拔。最后,普通人也会在战时困难条件下追求一种前程或者仅仅一份安全的工作——追名逐利型杀人者——或者他们的物质主义可能更加粗俗,杀戮是为了抢掠受害人的物品和钱财——物质主义杀人者。因为这些人都是假设的类型,绝大多数施害人有着结合了以上几个方面的混合的动机,而它们还会随着时间进程而发生改变。

纳粹激进化

因此我们必须将施害人放在变化中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放在他们自己的生命轨迹中加以考察。我指出了纳粹主义的核心拥护者和他们可能会产生的不同的积极性。施害人受他们生活经历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时期、纳粹统治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纳粹党的敌人的观念有如政治的、种族的和犹太的等不同区分形式,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变化。莫姆森(1991,1997)、布罗斯扎特(1981)等其他人都确定了在1933年到1941年间纳粹组织逐渐累积性激进化的一个顺序。让我们看一看它如何影响了施害人。

190

记住,大屠杀只是纳粹作品中一个晚到的新增之物。杀戮行为的不断加剧贯穿了整个时期,从一个个到十人一批,到百人一批、千人一批。20世纪30年代绝大多数死亡要么是因为野蛮的街头暴力,要么是出自对死亡已经习惯的机构之手,这里死亡并不总是被看作完全不能容忍的,比如监狱或医院。1940年和1941年,绝大多数杀戮转移到了战场,武器与战争的合法性成了杀戮的工具和理由。只是从1942年起,绝大多数杀戮才在远离这些更合理的死亡场所的地方被制度化。后来的杀戮或许需要比早期采取更严厉手段,然而早期的杀戮有可能帮助施害人获得了适应,因为对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我们也不应该犯民主性错误,认为宏观后果是各种诱因或个人意识形态的产物。那是幼稚社会学。群众团体涉及权力机构,其中的一些人,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比其他人更重要。更加不经意地卷入他们的事业的领导人、激进分子以及基层的旁观者具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及不同的行动动机。

戈登哈根(1996)十分错误地认为许多德国人以前曾拥护谋杀性的反犹主义(见芬克尔斯坦与伯恩1998年和波尔1997年的批评)。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就没有出现过集体迫害,而“一战”前的德国反犹主义在19世纪末已达到高峰。甚至纳粹党也在选举时贬

低反犹主义,因为一个占人口0.7%的群体为国家的重大问题而受谴责是不太容易令人信服的。反犹的人民党(völkisch parties)在“一战”前仅取得了一点点成功,主要是在奥地利。德国人是盲目的反犹主义者,但这种意识形态没有成为他们生活或政治的中心。在盲目的反犹主义和大屠杀之间是一个巨大的差距。甚至是在掌权三年之后,纳粹主义也并没有显得特别危险。绝大多数人预计事情会很快平静下来。对纳粹主义最后的鞭挞阻挡了判断。温斯顿·丘吉尔写道:

我们无法知道希特勒是否会再一次对世界发动另一场战争的那个人,或者他是否会作为恢复伟大日耳曼民族的荣耀和宁静的人而进入历史。(丘吉尔,1937:165)

丘吉尔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希特勒或他的组织。斯大林也没有。这是因为纳粹主义那时还没有完成它的激进化过程。

191

激进化浪潮出现过几次。德国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突然出现在一些极右派的政治狂热分子当中,然后在整个30年代出现在更大数量的纳粹激进分子当中,之后从1939年起出现在更普通的纳粹和德国人当中,1941年开始再度激进化。我们如果不考虑它们出现在具有一个自己的权力结构和自己的支持拥护群的法西斯组织之内的情况,就无法理解这些浪潮。纳粹组织体现了两个主要的组织特点:统治集团和准军事部队的伙伴型关系。我将从纳粹领导层开始追溯他们的影响,然后转移到激进分子的群众组织,最后转向普通德国人的激进化。

统治集团激进化

尽管避免了书面命令,从未见证过一次谋杀,自己也从未从事什么暴力,希特勒仍然是种族灭绝的第一推动者。参与者描述根除命令为“元首命令”(戈登,1984:141)。希特勒有两个近乎绝对的观

念：反犹和信奉帝国种族修正主义，都以东方为指向。他说犹太人曾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布尔什维克革命。1919—1945年他倡议“将犹太人从我们的民族中清除出去”。他的修正主义越过了恢复1914年前的边界的要求而变为到东方寻找生存空间。但是一个犹太—布尔什维克政权挡着路。从1919年起，将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两者从一个扩大的德意志帝国中清除出去的呼吁，贯穿在希特勒的讲话、两卷本的《我的奋斗》以及他的被录下来的“餐桌闲谈”之中。

只有向东扩张的以及清除的方法还有待确定。希特勒与其他纳粹精英交替使用了几个术语——毁灭（Vernichtung）、清除（Entfernung）和放逐（Verbannung）。根除（Ausrottung）在1940年之前几乎没用过，但即使是它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杀戮。希特勒有时赞同迫使犹太人“自愿”逃离德国的侵犯行为（奈马克，2001：62—64）。但他将犹太人称为下等人或害虫，将布尔什维克称为不可调和的敌人以及将斯拉夫人称为劣等种族的倾向表明，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他都不会产生道德上的犹疑。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如果“人群中的这1.2万或1.5万的犹太人渣被控制在毒气之下”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数百万人的牺牲”就可以避免了。这一数字或暗示杀害那么多人是为了将其余犹太人吓跑（克肖，1998：151—152，249—250；2000：41—42，146，151）。

因而希特勒的犹太人A计划很可能是经由压力移民、然后升级到野蛮驱逐的B计划的完全的种族清洗。他关于斯拉夫人和布尔什维克人的态度较为模糊，即便为德国人创造“生存空间”的说法已经暗示了无情战争的可能。但是他对于种族清洗和帝国主义的信奉成为了纯粹的价值理性：政策要服从于它们，不论代价，不计手段。任何的希特勒战略的理性选择理论都不能满足他不断增强的为了这些观念冒一切风险的意愿——结果是德国遭毁，自己丧命。

因为希特勒成为了德国的宰相，他能够按照自己的观念着手一场重大战争，其核心目的是生存空间和对东方国家的种族清洗。出人意料的是，被认为是退化了的民主制度迫使他也在西方发动了一场战争。他用国际上的犹太人阴谋的理由来解释它，而他对这次目

标遭到挫败的愤怒导致他离他最后的激进化走得更近了。1939年1月他发出了一个可怕的威胁：

如果在欧洲内外的国际金融操控者犹太人成功地将众国家投入战争之中，结果将不是全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继而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人种族在欧洲的毁灭。（克肖，2000：127）

如果没有希特勒，纳粹鼓动的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和一定程度的无情战争可能会出现，但种族灭绝很可能不会出现。没有希特勒，残疾者也会遭到虐待和冷落，犹太人与吉卜赛人也将受到欺侮或粗暴对待，整个东方也会出现零星的集体迫害，左翼分子也将遭到攻击直到屈服，也许德国的边界将会回缩。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大多数有机民族国家主义者看来，使少数群体服从或被逐出，而不是让其死亡，对实现一个被清洗过的社会是必要的。因而种族灭绝首先属于希特勒，一个与其说是说明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如说是说明了由一个国家崇拜团体将其放在一个强大角色位置上的个人的作用的极好例子——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原则的最极端的形式。

然而种族灭绝不只属于希特勒一个人。极端的国家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与奥地利的极右积极分子中司空见惯。对希特勒和早期纳粹的核心影响主要来自巴伐利亚、奥地利、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某几个地区的前天主教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们提出一种新的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一个单独的向东倾斜的帝国中的所有德国人的联盟。他们认为犹太人特别危险，因为他们四海为家、漂泊无根的生活方式。他们将犹太人与1918—1919年在布达佩斯、维也纳、柏林和慕尼黑发生的布尔什维克起义联系在一起。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共同从东面威胁着西方和雅利安文明。弗里德兰德（1997：87）把这称为救赎性的反犹太主义。犹太人已渗透到日耳曼种族的血液之中。如果他们能被驱逐的话，救赎就会到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东南部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与德国及奥地利的军事老兵站在了一起，后者拒绝接受战争失败，时不时在德国

边界周围发起战争。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到末期,这一状况改变了领导层的构成,在国家更加广泛的地带产生了第一次选举热潮。反犹主义似乎已被淡化。只有几个主要的纳粹说他们加入组织是因为反犹主义。最好的纳粹激进分子的样本是那些为响应一次关于“为什么我成为一名纳粹”的征文竞赛写过自传的人(见曼,2004:144)。选择布尔什维克为主要敌人的人数是选择犹太人为主要敌人的人数的两倍。

直到纳粹接近权力之前,他们的侵犯都只是语言上的,极少人给予实际的清洗政策很多考虑。在攫取权力之后的两年,暴力主要指向布尔什维克。但是到 1935 年时,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者都被击败,而集中营此时处于停滞状态。这使得犹太人成为剩下的主要暴力目标。既然纳粹分子将犹太人看作是一个种族的,而不是宗教或文化上的敌人,犹太人(不像共产主义者)就不会简单地屈服和被同化。在 1933 年夺取权力时,国家与地方的反犹立法已经开始了。犹太人被逐出行政部门、武装部队、教育及文艺单位,然后是职业部门。1935 年出现了一股地方上禁止犹太人参与到公共大厅、运动场和游泳池的浪潮。纽伦堡法律界定了谁是犹太人,禁止犹太人与德国人相互通婚(弗里德兰德,1997:141—151)。

政权现已开始采取严厉的差别对待,直至采用隔离政策迫使犹太人在压力下离开国家。这一结合是领导层的 A 计划。然而更保守的纳粹分子,包括一些高级纳粹,认为政策只是发展到将犹太人作为二等臣民,而不是公民,进行部分隔离——正如新民法中表述的。因而一种被当时人描述为在合法或有序的手段与野蛮暴力之间的分裂在纳粹组织内部形成了。保守派纳粹(及几乎所有组织之外的德国人)更喜欢前者,极少数纳粹喜欢后者。8 年之后激进分子赢了,主要因为以下四点理由。

1. 在 1933 年至 1938 年间希特勒摧毁了非纳粹精英的权力。政党、行政部门、教会以及最后的最高领导班子都向他臣服。既然他们曾是西方导向,这就增加了本政权的东方倾向。它还改变了纳粹党中的力量对比。既然不再需要与保守精英的制度妥协,那么像沙赫

特这样的纳粹保守派的影响就减小了——它此前对达成这样的交易一直是有用的。赫尔曼·戈林,另一位保守主义者,改而采取了激进姿态以便留住他的权力。壮胆之后,激进分子在1938年引进了新法律。犹太人被排除了享受福利待遇的资格,犹太儿童被逐出德国学校,绝大多数犹太人商业活动被禁止,许多犹太企业遭没收。纳粹保守派有时还感到宽慰地欢迎这些法律,因为它们似乎限制了对犹太人的无序暴力。虽然眼下让犹太人在德国谋生较难,但绝大多数人仍在坚持。他们视自己为德国人,并不太相信纳粹不把他们当德国人。

194

2. 希特勒在1936年到1938年间对失去的领土的收复行为是激进的结果,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随着莱茵兰的收复,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东面,先是奥地利,然后是苏台德和波兰,他们据称征服了数百万德裔人口。这加强了生存空间论、跨国的德裔人口的影响以及所谓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威胁。1938年3月的奥德合并带来了更加恶毒的奥地利政治中的反犹主义特点,引发了名副其实的集体迫害,比一百多年来德国所见到的任何迫害都更加暴力。数千名犹太人逃往国外,其他人被丢弃到边境之外,还有一些被收取向外移民的赎金。野蛮驱逐的B计划已经到来。11月,领导层试图将其普及到德国。希特勒私下说,“应该有一次,让犹太人感觉到人民的愤怒”。更野蛮的冲锋队,而非秩序井然的党卫军,将领导这次行动(克肖,2000:138—139)。在水晶之夜*有100多名犹太人被杀死,8万人逃出国家。然而暴力走得太远,震惊了纳粹及非纳粹。一些地方长官拒绝传达迫害命令。迈克尔·马勒-克劳迪厄斯1947年写了一本书详细记录了1938年与41名标准的纳粹精英的谈话,其中28名(63%)表达了强烈的不同意,只有2名(5%)明确表示同意(引自戈登,1984:263—265)。戈林为潜在的对经济的损害而不安,甚至希特勒也为抢劫失去控制而担心。政权退缩了。

3. 激进分子得到了领导者原则传播的帮助。越来越多的纳粹和

* Kristallnacht,对1938年11月9日德国纳粹杀害并抢劫犹太人财产之后砸碎玻璃的讽称。

追名逐利者践行被克肖称为“面向元首工作”的方针,亦即根据对他的意图的预判而行动,他们正确地判断出其意图是激进的。极少有纳粹对大屠杀进行周密考虑,但是当被逼到边缘的时候,也极少有人反对它,因为这将是反对元首——前程肯定结束了。这对遵守纪律和追名逐利杀人者的鼓励要多于对意识形态杀人者的鼓励。能搞定事情的纳粹的事迹在纳粹网络中流传开来,给他们更加谨慎的同事和上级带来了压力。激进化是一种非科层化的扩散过程。它极少包含公开的异议,尽管有一些个人逐渐退出到外围。

4. 1939 年与波兰及西方国家的战争,以及随后在 1941 年年中与苏联的战争加强了激进分子一般的战时爱国主义。战争使得反对希特勒成为可能。截至 1942 年,据缪勒 - 克劳迪厄斯与 61 名纳粹精英的谈话记载,15 (26%) 名支持种族主义政策,42 名 (69%) 未明确或不关心,只有 3 名 (5%) 表示不同意 (戈登,1984:263—266)。当 1939 年战争开始时,特别是当它 1941 年扩散到俄罗斯时,(纳粹党) 全国领袖 (Reichsleiter)、地方长官、党卫军领袖、平民带头人和将军开始支持清除政策。

所有希特勒身边的圈内人物共同密谋实现了这一转变。希姆莱 1938 年告诉他的党卫军高层人物,下一个十年将会见证整个犹太人、共济会、马克思主义和全世界教会的意识形态斗争。这些力量——其中我推测犹太人是驱动力,所有负面因素的发源地——清楚地表明“如果德国和意大利不被毁灭,他们将被毁灭……我们将以空前的铁定决心将他们赶出去”(克肖,2000:130)。大屠杀开始之后,希姆莱向他的医生吐露了他与早期的北美殖民主义者一样的负担:“是上苍发出的命令让它必须踩过死人的尸体去创造新的生命。然而我们一定要创造新生命,我们必须清洁土壤,否则它就再也长不出作物。这是我必须要承受的一个很大的负担。”1941 年,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一起制定了最后解决方案。戈林宣称:“这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伟大的种族战争。”戈培尔的日记描述了“雅利安种族与犹太害虫之间的一场生死较量”。德国人必须“野兽般地”统治东方国家——尽管戈培尔的工具理性使他在后来建议,在战

195

争结束前,在克制可以恢复前,应采取更温和的处理方式(戈培尔,1948:126,148,185,225,246;戈登,1984:100;克斯滕,1956:120)。这些领导人意识到今天的人会怎样看待他们,然而又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历史必然并合乎道德的。未来,他们说,人们会感谢他们作为一届战胜传统道德的掌权人物的严厉手腕。这些是意识形态杀人者。

伙伴型准军国主义的激进化

为理解纳粹组织不断增加的暴力行为,我们必须下到组织底层来考察鼓励暴力激进的几种组织方式。我将这些看作是诱惑他们的狱友进入升级的暴力行为的“笼子”。它们是相互联结的,许多人随着他们的纳粹生涯和工作经历在它们之间来回移动。头两个笼子先于纳粹组织本身的壮大。

1. 战后准军事部队。非正规自愿战士在1918年突然涌现,他们拒绝接受失败。自由军团(Freikorps)攻越东部边境,企图将斯拉夫人从前德国土地上赶走。格斗联盟(Wehrverbände)训练士兵,储备武器,更加谨慎地与西部边境的法国和比利时占领军以及德国和奥地利的共产主义者发生一些小战斗。他们是从逃出丢失的领土上的德国人当中随便抽出来的。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犹太人,尽管他们身上渗透了德国民族特点的反犹主义。他们向10万以上的德国青年灌输了政治问题能够通过军事权力解决观念。伊莱亚斯(1996:182—197)将他们视为“德国文明败坏的关键”,因为他们混淆了合法与非法力量之间的道德界限,就像所有这些笼子的表现一样,同时它也是自愿准军事部队中的常态现象。绝大多数德国人与奥地利人想要把失去的土地收回来,而有很多人谴责共产主义者(赤色分子)是导致土地失去的所谓的暗箭。他们羡慕准军事部队的勇敢,有时把他们的杀戮视为正义的战争行为,而不是非法的谋杀。准军事部队也是地位相对平等且不分阶级的。军官以身作则,不靠上下级关系,牢固的伙伴关系把这些招自各社会阶级的年轻人关在一个笼子里。对他们而言,民族主义确实胜过了阶级。

准军事部队产生了许多纳粹(就像我在《法西斯主义者》第4章指出的)。坎贝尔(1998)说格斗联盟提供了很多冲锋队领袖,而“二战”期间的265个最高级别党卫军军官中几乎有30%的人具有在自由军团的经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准军事部队的老兵也程度不同地对种族灭绝作出了贡献。然而要产生这样的升级行为还需要随后的大量经历。同样在意大利参加“一战”的老兵迅速成为了法西斯主义暴力小组(squadristi)成员,杀死了一些社会主义者。但是在法西斯主义攫取政权之后,他们似乎已安下心来享受权力。美国的同等组织*已为自己杀了几个共产主义分子感到满足。是什么导致了德国的不断持续的激进化?我将目光转向随后的笼子。

2. 难民营/协会。数百万难民在战争末期拥进德国。他们的营地和协会孕育了充满怨愤的民族主义,这使他们与正常的社会分离。这些德裔人口大多数来自波兰、丹麦和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失落的领土,尽管有一些是来自苏联和巴尔干国家。也有来自德国被盟军占领的西部地区的半难民。他们是自我选择的德裔:那些对外国统治无动于衷的人已呆在家里。但是难民想要回他们的祖国,回到第三帝国(纳粹德国)境内。东方人也借鉴西方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敌人的观念,倾向于将犹太人视作苏联的合作者。然后在1934年,一批激进化的纳粹分子涌了进来,他们是4000名在政变失败后被陶尔斐斯**政权逐出的奥地利人。但是,经证实留在被占领领土上的德国人总体也对希特勒持十分欢迎的态度。后者进入莱茵兰时引来众人的阵阵欢呼。在1935年萨尔的公民投票中,91%的人投票赞成与希特勒的德国合并。许多难民成为冲锋队、党卫军、奥地利军团,或纳粹党中职业的激进主义分子,从事填满了同时封闭着他们的生活的非法暴力活动,阻止了他们过正常平民生活。这些“老战士”(1929年前的成员)或“老纳粹”(1933年前的成员)起步较早,然后一步步经过了暴力升级阶段。正如我们要在下一章中看到的,种族

* 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激进派。American Legion,1919年成立。

** 1892—1934,奥地利总理,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

灭绝机构中不同程度地拥有这些跨国的德裔。绝大多数是男人,也有一些妇女,他们来自各个阶级。

让我用种族灭绝施害人样本中的第一批简短的传记来描绘这些人。古斯塔夫·佐尔格家庭(迪克的匿名案例“S₂”,1972)在1919年
197 被强迫赶出他们的西里西亚家乡,当时他们拒绝接受波兰公民身份。但是8岁大的古斯塔夫由一位大妈陪着被留了下来,以便有一天能索回他们对他们的房屋和小农场的权利。因为波兰人“不让我们用德语学习”,古斯塔夫和他的朋友变得更加反对波兰。他敬重一位极端主义的前自由军团老兵,后者教他航海。1930年他被赶出波兰,和一个叔叔、一名纳粹激进分子一起住在德国的西里西亚。他1931年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所有我们这些小伙子都本能地加入了反对波兰和捷克的行动。”因没有工作,他成为了在纳粹与赤色分子之间进行巷战的突出人物,不久就成了一名专职的党卫军战士。他喜欢战斗。到现在他已经失去了与家人的联系,党卫军就是他的家。他是一名杰出的纳粹的保卫人员,参与了1934年的“用长刀的夜晚”*,这年希特勒派冲锋队进行了谋杀性清洗。然后他接受了担任一名营地卫兵的必要训练。作为后来的死亡集中营中的一名军士(NCO),他获得了一个“铁乔治”的称号,成了一名纳粹狂热分子和凶残的杀手。以上我们看到的是一名充满愤怒的德国难民如何在一个暴力的准军事组织中找到了他的家。

3. 冲锋队。这绝对是直到1930年年末之前最大的准军事组织,它在全德国招兵买马,不带明显的地区偏见。1930年之后的快速扩张,特别是对年轻的无业男子的招募,使它成为了工人阶级占绝大多数的组织。它专事粗暴的争吵喧闹行为,且与党卫军不一样,它对行动比对意识形态更有兴趣。它直接满足了年轻男子的需要,给了失业无工作者食物、住宿、刺激和伙伴关系。对他们来说,它是一个工

*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希特勒于1934年6月30日清洗了他的得力助手罗姆之后首次使用了这个词语,后用来指在清洗过程中原来是朋友的人突然发动野蛮袭击。

人阶级同辈群体,一个家,一个伙伴式的无产阶级准军事部队伙伴关系的笼子。对领袖恩斯特·罗姆以及军官团的其他一些人来说,它一开始也是同性恋活动的安全庇护所。有证据表明,希特勒曾认为同性恋是经训练可进行暴力活动的好工具。1933年以前冲锋队不安地与警察部门住在一起,后者怂恿它,容忍它或反对它,反复无常。1933年国家纳粹化,而冲锋队被当作一支专事野蛮暴力的后备警察部队,大多是针对左翼,尽管其他团体与犹太人也受到了影响。冲锋队来回在街头行走,恐吓殴打或将政治敌手囚禁至草草建起的冲锋队营地,在此至少有500人被杀死,还有更多人被拷打。这种国家特许的凶杀行为可能会吸引现代社会中的很多年轻人。然而军队开始将冲锋队视为一个潜在的对手,而希特勒想通过安抚将军们赢得时间。他筹划了“长刀之夜”,谋杀了罗姆和他的亲信。冲锋队的人力现已减少40%,权力受到了抑制。

冲锋队幸存下来,更加服从领导。但到现在它已经使许多纳粹习惯了集体、伙伴型暴力的常态,这些行动虽经常是未经预谋,但不时会发展至杀戮。可到了1935年,随着左派的被摧毁,一个以准军事凶杀为目标的组织开始缺少敌人了。我在其他地方写到(曼,1997)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运动)在一旦取得国家权力之后都面临着“不断革命的矛盾”:一方面,组织体现了一种激进转变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政权寻求通过与精英的妥协实现其统治的制度化 and 机构化——精英在本例中是德国资本主义者、军队和教会——其牢固的权力在另一种情况下会挫败它的企图。许多德国人与许多纳粹人士都觉察到这一矛盾,而绝大多数人喜欢妥协与秩序胜过野蛮行为。将革命的野蛮转移到对其没有好感的敌人身上可以避免矛盾,让激进化与妥协一同前行。解决办法是将野蛮行为移到一个不受欢迎的非己团体——犹太人身上(克肖,1984:275—276)。这也是把无产阶级怨恨往种族身上转移。

一名纳粹激进分子曾总是意味着街头打架。现在它涉及的是捣碎犹太人商店窗户和对犹太人进行恐吓。这就是普通的冲锋队和(在较小程度上)党卫军以及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从20世纪30年代中

期起实际在做的事情,以及他们确立成功事业的过程。年轻工人阶级男子占了大多数,他们陶醉于他们的“男子气概”和“粗鲁放纵”——像今天的街头团伙和足球流氓一样,只不过是国家特许的。水晶之夜让这一被批准的暴力行为升级了。它不能被界定为自卫,因为与共产主义分子不同,犹太人没有发起集体反抗。行动的目标是值得尊重的拥有财产的店主和职业人士——正是那类通常有法律予以妥善保护而免受工人阶级暴力伤害的人。随着争吵与反犹立法的一致步伐,合法性与道德的界限开始模糊——影响了一般舆论。1938年基层纳粹分子将暴力升级到公开进行谋杀。民族主义的信念,一味追逐名利以及准军事部队技巧在一个逐步关进笼子的过程中相互加强。水晶之夜之后,冲锋队又一次靠边站,但是它的许多骨干成员被转到了其他杀戮机构。冲锋队提供了初期主要的暴力、偏执和伙伴型杀人者队伍,而且还在暴力中找到了事业。

4. 党卫军。党卫军后来成为主要的杀戮机构。它开始时规模很小,如担任希特勒的个人警卫,但它的规模、功能和影响的增长一直贯穿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从1934年起,党卫军开办集中营。1936年始它控制了大多数的帝国秘密警察部队。1941年它对特别行动队发布命令。在绝大多数被占领国家,党卫军控制着后方的杀戮行动。如果冲锋队代表了早期的野蛮暴力,那么党卫军就代表了实际控制着大量的国家机器并实现了种族灭绝的有序的意识形态暴力。想要呆在党卫军中而不牵涉其中是不易之事。党卫军比冲锋队形成了多得多的清晰的思想体系,它的条理和看上去的成熟吸引了一群更具中产阶级特点和受教育水平更高的核心拥护者。党卫军还有一个地区性核心拥护群。大多数党卫军精英不是来自德国的新教普鲁士地区。希姆莱与海德里希是来自慕尼黑和哈雷的天主教徒。罗森堡是一名波罗的海的德裔,而伯杰是一名家在东欧的信仰天主教的士瓦本人(Swabian)。党卫军组织在东面和东南面实力最强,并明显有点东倾。

党卫军的意识形态建筑在生物种族主义、领导者原则和准军国主义之上。它的训练手册教导“条顿族雅利安人”拥有一种体现“理

想主义”和“德行”的“种族纯洁性”。次等的雅利安人,像英国人与法国人,已经通过堕落的民主实践退化了,但是可以在德国的监护下被纠正过来。非雅利安人形成了“伪种族”——生物学上低劣以及会带来污染的——“亚人类”、“寄生虫”和“虱子”,对他们我们必须进行一场生死搏斗。1940年,一个区分形成了。有国家的低劣种族能够被征服,它的敌意成分也能被清洗。在不能成立一个国家的地方,清洗必须要再进一步,直至清除。对党卫军而言,这里所指的大多是犹太人,然后是吉卜赛人,还包括黑人——这对许多在1940年被党卫军俘获的法国军队来说显然是死刑。党卫军领袖后来用道德术语为大屠杀辩护。希姆莱宣称:“我们拥有关于我们民族的道德权力去毁灭这个想毁灭我们的民族。”〔2〕绝大多数普通党卫军士兵对上层精英们的神秘种族主义不感兴趣。甚至艾希曼也嘲讽“条顿-日耳曼党大亨装得好像他们是戴着羊角穿着羊皮一样”。但是党卫军始终喊着同样的种族主义口号:斯拉夫人是亚人类,犹太人不算人类。党卫军上将巴赫-齐烈夫斯基后来试图在纽伦堡法庭上解释种族灭绝:“如果经过数年,经过数十年,一直有人告诉我们斯拉夫种族是一个低等种族,犹太人根本不算人类,那么不可避免的结果一定是这样的一次大爆发。”

第二,党卫军强化了领导者原则。希姆莱确定了两个党卫军座右铭:“一个是元首赠与我们的‘忠诚是我的荣耀’,另一个是来自古代德国法律的‘一切荣耀来自忠诚’。”党卫军成员被教导说希特勒是日耳曼民族的化身——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不服从是对民族的背叛。没有上帝存在于元首之上,也没有任何行动法则处在党卫军规条之上。领导者原则被传遍党卫军上下,但因为希特勒蔑视官僚制度,党卫军增长非常之快,任何元首以下的暴君的权威在希特勒崇拜

〔2〕 纳粹与党卫军有时更加具有机会主义特征。当德国与日本结盟时,日本的种族地位就被提升。但是在欧洲,他们却嘲讽机会主义。一种对乌克兰和俄罗斯人较少种族主义的看法将能够给予他们在反对共产主义方面有用的盟友。他们绝不信任或有效使用乌克兰及白俄罗斯军队。

者眼里都相形见绌(布克海姆等,1968:320,366)。不加思考的服从
是战后的一种利用了同盟国的观念的防御策略,即德国人已被洗脑。
极少施害人是被动消化这种意识形态的。相反,领导者原则给予了
他们一种无罪意识。责任从他们这里转移了,更多地转到了领袖身
上。将希特勒偶像化在心理上是有用的。

200

但是,第三,党卫军用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准军事伙伴关系填补
了自我与领袖之间的差距。它的“政治战士”是真正的“民族—社会
主义革命的担负者”。责任转移到了伙伴式的同辈关系。韦格纳说
拯救与纯洁帝国需要“一个全方面精锐的‘政治军队’,不受过时的
法律障碍干扰,并超越‘正常’国家机器的限制”(1990:126—127)。
党卫军的高人一等优越感封闭了它的伙伴,使他们不受传统道德和
合法性的影响。谋杀的罪感可以通过未去谋杀的羞耻感来抵消,因
为退缩意味着你的伙伴将会用常人(即非杰出人物)的怯懦和和软弱
来指责你。这些压力将会产生伙伴型特别是遵守纪律型的杀人者。

三个原则构成党卫军的招兵和训练的基础。30年代注意力较
少地被放在新兵的技术技巧上,而更多的是放在他们的种族纯洁性
上。他们不得不拿出回溯到1800年的家庭谱系,不得不具有良好的
体格,而且看上去“像雅利安人”。所有这些都鼓励了一种自视为杰
出人物并适合统治别人的观念。意识形态灌输占了训练时间的五分
之一,以便“每一个人都被训练为一个狂热的仇恨者”,一位党卫军上
将如此宣称。这种意识形态还在普通的如忠心、服从、伙伴友谊、责
任心、荣誉感以及爱国主义等德行当中引起了反响,它们在由前战
士、警察、公务员和受过教育的职业人士组成的党卫军核心拥护者的
补充人选中尤其突出。人们普遍认为党卫军还在奥地利人和巴伐利
亚人当中招收更多新人(韦格纳,1990:15,206—207)。到大约1937
年时,2万人之多的党卫军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全部为男性的自愿精
英团体。虽然战争使征召人数大幅增加,削弱了党卫军的凝聚力,但

此时党卫军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次级笼子*,明确地鼓励从暴力进入到谋杀。

5. 集中营。战前的集中营显示了对东部地区的偏重。1939年存在的七个德国集中营中有六个被安排在一个绕国家东部和南部的弧状区域里。达豪与弗洛森比格在巴伐利亚州,毛特豪森在奥地利林茨附近,萨克森豪森与拉文斯布吕克在柏林北面的普鲁士,而布痕瓦尔德在稍微靠中部一点的魏玛。例外的是那个小集中营,即新加默集中营,靠近汉堡。

没有一个是国家西部。因为这七个集中营中的六个是为德国人提供的(一开始不是犹太人),所以不清楚它们为什么在地理上倾向于东部与南部——除非这也是党卫军新兵招募的偏向。

这些起初不是被当作杀人集中营的,但它们充满暴力。当1933年第一个在达豪的党卫军集中营开始投入使用时,卫队长发表了动员讲话:

党卫军伙伴们!你们都知道元首要我们来做什么。我们不是来把里面的那些猪伺候得像人一样的……任何我们的队伍中见不得血的人都不属于这里,他应该退出。这些杂种我们杀得越多,我们要喂的就越少。(索夫斯基,1996:4)

当这导致了一阵野蛮的屠杀时,党卫军领导被震惊了,所以1934年任命了一个新的指挥官,以建立一个更有秩序的管理制度。西奥多·艾克是来自阿尔萨斯的难民,一个村铁路站站长的儿子。他曾是一位爱国的和无法安静下来的17岁“一战”志愿者。他在1919年20岁时离开阿尔萨斯时,在魏玛共和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为此他恨法国占领了自己的家乡。他参加了自由军团。作为一名老兵他可以在德国任何一个地方当上一个警察,但是他一次次因为他的民族主义的激进主义被警察部门解雇。1928年成为一名纳粹后,他与当

201

* subcages,比制度低一级的笼子,此处指下面的集中营和党卫队保安处。

地的纳粹地方长官发生暴力争执,后者几乎差点要把他关到精神病院里面去(我们在第9章会遇到海德——阻止这件事的精神科医生)。被宣判犯有私藏炸药罪之后,他逃往国外。1933年希姆莱邀请他回来帮助“长刀之夜”。他射杀了罗姆,被奖以达豪集中营的指挥权,在此他开创了可怕的纳粹集中营制度。他招募富有经验的党卫军,偏好自由军团的老兵。其后,随着集中营的扩大和有经验的纳粹的供应枯竭,他开始招募年轻的党员,他说他们更有可塑性。他拒绝招收前国防军军士,他们已经内化了柔性纪律准则。他认为这样挑选出来的人能够经训练适应一个与外界隔离的集中营世界,这就是他们的家。因此,集中营不但把囚犯关在笼子里,也把卫兵关在了笼中。他的事业顶峰是成为纳粹党卫队*的前线区统帅。1943年年初他在东线战场被杀。

艾克的管理制度成为所有战前德国集中营以及以后的死亡集中营的模式。达豪训练出了其他主要集中营的核心军官和军士,除了死亡集中营(我们将在第9章见到)。艾克教卫兵不要根据自己情绪任意殴打或虐待囚犯,而是要将其作为系统性的威吓所必要的日常工作去做。他告诫他的手下“囚犯是人类之外的国家的敌人”。赫斯(奥斯威辛指挥官)曾在此受训,记得囚犯总是痛苦地问,“为什么党卫军这么恨我们?我们毕竟也是像他们一样的人啊”。艾克管理制度不在规章之内。工作人员被告知去采用暴力手段使他们顺从,然后就自己独立去做了。他们变成了志趣相投的人,说着同样的营中行话,接受着一种集中营文化。他们知道该干什么而不需要对之多加思考(奥思,2000)。

弗朗兹·霍夫曼是标准的集中营卫兵,一名巴伐利亚半熟练工人,他在1932年26岁时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1933年成为一名达豪集中营卫兵之后,艾克让他变得冷酷,他证明了自己适合加入这一作风强硬的精英团队。首先,他打死了宵禁之后在厕所发现的一名年长的犹太人;然后,他加入了将囚犯赶往营地电网的游戏,之后“在

* Waffen-ss,又译武装党卫队或武装党卫军。

他们要逃跑时”朝他们射击。他接着在营地呆了12年,升为几个小集中营的指挥官。他表露出了对吉卜赛人的特别仇恨。战后他声称他是一个受犹太人和党卫军大亨压迫的“小人物”。1965年他因共谋2000多起谋杀和实际犯下至少30起谋杀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卫兵被给予绝对权力,他们可以重复地泛滥地去使用这种权力,以便将“施害人从所有禁忌中”释放出来。过度的暴力变成为惯例,产生了“习惯性的不需要为其行动提供理由的暴力施害人”,混淆了为了获得信息的严刑拷打和“纯粹的无目的的身体折磨”的严刑拷打之间的界限。恐怖成了有约束力的团体准则,将卫兵个人责任放大至整个营地的责任(颇像元首原则)。除非失去控制,否则绝不会有人受到处罚。随着营地的扩大、条件的恶化,养得胖胖的、穿着笔挺制服的施害人与形容枯槁、衣着污秽、手脚颤抖和浑身布满虱子的无力自卫的受害人之间的社会距离被夸大了。他们在卫兵眼里已没有了个人特点,没有人性了。然后谋杀在死亡集中营就成了必需的行为(索夫斯基,1997:16—24,223—240)。

但是还有将近1000个强迫劳动营,它们之间差异较大。在某些集中营甚至犹太人也能与卫兵与管理人员达成某种妥协——从而幸存下来(斯特拉德,1999)。但是所有的集中营一般都是职业共同体,与社会隔离,为不是很称职的人提供稳定的谋生机会,同时对他们施加社会控制。直到1941年,他们的实践都是带有恐怖性质的。之后只有死亡集中营才是种族灭绝性的。但是每一次从暴力经更普遍的个人杀戮到种族灭绝的递进变化都不需要来自卫兵的很大的道德努力。从1941年起,对普通的穿制服的德国人来说,集中营是一个安全、可靠和薪水较高的地方,胜过东线战场无数倍。因此在集中营体制下我们或会看到偏执型、伙伴型以及纪律型杀人者的混合形式——心理失常的暴力卫兵将有机会在核心集中营中大量出现。

6. 党卫军保安处(SD)。从1935年起,党卫军就获得了对刑事警察(Kripo)和盖世太保(政治警察)的控制。他们被纳入党卫军秘密警察分部。希姆莱宣称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斗争之一”时期的“民族对普遍性的布尔什维主义摧毁力量的内部防

御”。沃纳·贝斯特,盖世太保的头头,将其描述为捍卫“民族政治健康”的“战斗形式”。极少刑事警察或盖世太保官员在政变前曾是纳粹或党卫军成员(这经常是非法的),尽管20%—40%曾是纳粹职业组织成员。1933年,几个警察遭清洗,位置被老纳粹代替。但是绝大多数警察随着警察功能的纳粹化而见风使舵(布劳德,1996;格拉特利,1990:50)。在任何情况下,纳粹对破坏国家的敌人的关注都适合绝大多数警察,后者陶醉于他们获得的新的粉碎国家敌人的自由。希姆莱和他的副手海德里希(党卫军保安处头头)也希望他们的帝国独立于党魁之外,因而经常偏爱有效、严厉的警察胜过更加政治化和可能更野蛮的纳粹。

海因里希·缪勒是他们的理想人选。作为来自慕尼黑从、“一战”中获得过很多勋章的飞行员,他跟随父亲进入慕尼黑警察部队,获得了热忱的、愿意越过法律规范实现信念的反共产主义者的名声。虽然专事骚扰左翼,但他不属任何一个政治组织的成员,并声称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因为他觉得右翼观念提供了超越仅仅法律规范的客观正义。他还异常地直率。舍伦贝格,一位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的党卫队保安处军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缪勒用他那“粗鄙的巴伐利亚口音”向他吐露,“人们真的应该把所有知识分子赶到一个煤矿中,然后把煤矿炸掉”(1956:8)。缪勒是忠诚的,看到自己的才能得到党卫军的充分利用,心里感觉很愉快。他晋升成了盖世太保的头头,还升职成了党卫军少将。1945年他销声匿迹,很可能死了。关于他还活着的谣言很多——先是说在美国军事监护下,然后又到了南美,尽管其命运究竟如何依然无人知晓。现在他肯定已经死了。

威廉·哈斯特更加政治化,然而他还是反映了纳粹主义与具有宪兵队背景的人之间的共鸣。同样是来自慕尼黑附近的一位警察的儿子,他上高中时是模范学生,他在高中学校里参加了一个自由军团青年组织。他从大学毕业,取得法律学位,1929年加入警察队伍。他被描述为一个“勤勤恳恳的听话的文员”和一位威权主义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1932年他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并高兴地迎接政变的

到来:它将意味着“巷战、失业和凡尔赛的结束”。他即刻被转给盖世太保,参加了持续升级的暴力行动——在30年代的柏林和符腾堡,德奥合并期间和之后的奥地利,1939年的波兰,然后是被占领国比利时和荷兰,他在此监督驱逐出境行动——他后来被发现犯有合谋杀死82956人的罪行(包括安妮·弗兰克)。他并没有显示出个人凶残或是事实上有很大仇恨的证据。他声称他有犹太朋友,但坚信“应将犹太人与民族分开来”。

国家司法机器也受到了损害。高级警官与国家检察官紧密互动,他们都拥有大学法律学位的背景。他们一起形成了“理想主义的”、“合乎道德标准的”纳粹。一个是沃尔特·舍伦贝格,来自萨尔,他是一位因法国占领而破产的钢琴制造者的儿子。家里经过调整之后又变成了一个愉快的家。他和他的有教养、虔诚的母亲很亲近。他教育上很成功,法语流利,具有四海为家的超然气度和宏大野心。他1933年大学毕业,获得法律学位,据说一个法官建议他通过加入纳粹来促进他的事业(他可能比这里暗示的要更加纳粹)。他很快在23岁时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也受到了——他承认说——党卫军一身制服的魅力以及加入属于“更优秀一类人”的杰出人物阶层的前景的吸引。他为党卫军讲授意识形态,他强烈的反天主教观念吸引了海德里希的注意,后者让他进入了地方党卫军保安处,这让天主教反对派感到担心。他升任了保安处内部情报部负责人,在这里他以他的主流纳粹观点和打造更多职业和客观的国家情报报道的尝试而闻名。他多少有点既不与令人憎恨的警察工作相关,又与希姆莱的狡诈的种族主义保持距离的样子。他还在战后作证时声称他曾几次躲过了让他进入特别行动队的企图。虽然他带着某种热情拥护纳粹主义,但他似乎又不是一个谋杀性的纳粹。不过,他的幸运在于他在总部保安处的角色让他离开了杀人领域。绝大多数保安处官员没有这么幸运。

保安处随着法律抑制因素的减少而扩大了警察工作中粗暴的一面。到1939年时许多警察都有过用多种办法得到情报和“中立”国家敌人的经历,这些经历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违反了正当法律程序。

从1939年起敌人这个概念就获得了一个额外的战时强度。因此,当党卫军魁首逐渐组成谋杀性特别行动队时,保安处就成为了核心——一种职业精神可与意识形态、追名逐利和官僚机构化杀戮动机相融在一起的环境。

7. 安乐死项目——T₄。唯一的战前大规模杀戮发生于安乐死项目。既不反犹也不反斯拉夫,它依据的是受许多国家的基因学家、人类学家和临床医师支持的有名的生物学模式。精神病学家与医生相信有些病人是不可治愈的,所以赞同“存在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的观念。希特勒首倡 T₄,这进一步提高了它的地位,而且从事这项“艰苦”工作的人还会得到额外奖金。T₄ 很容易吸引行政官员、医生、护士、后勤管理人员、勤务兵和士兵把自己奉献于一个珍视他们专业技能和前程的德国。医院、地区性医疗机关以及大学都受到了影响,同时项目让很多女性医生、护士和全体办事人员参加进来。再一次,出现了一种地区性偏重,因为机构都位于德国东南边沿一带。T₄ 还向纳粹组织和德国公众介绍通过合理杀戮清洗德国民族的方法。它开创了行政保密技术,极少有书面命令、消毒记录和隔离制度,同时采取静静的照方法进行的科学杀戮,不用流很多血。它训练了死亡集中营人员,使他们对此感到适应。100名人员把他们的办法转让给波兰集中营,帮助提高他们对付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技术。

汉斯-博多·戈加斯,莱比锡铁路督察员的儿子,来自一个抑郁症患者家庭,尽管他从表面上看不出受到什么影响。1933年他24岁时到了冲锋队,是一名忠心的纳粹分子。

205

从1937年起他在安乐死先驱伯诺塔特领导下的国家医院里工作,1939年伯诺塔特推荐他到 T₄。这里的负责人布拉克不加掩饰地跟他说需要一个“特别受信任的医生”去杀死精神病人。他说他的疑虑被与项目有关的有威望的医生打消了。后来在布痕瓦尔德,他表现得“更像一个屠夫而不是一名医生”。

乔盖·雷诺博士是来自阿尔萨斯的移民,一名售货员的儿子。他曾是一名纳粹学生,1930年23岁时入党,1933年加入党卫军。他在党卫军乐队中吹长笛,但其他方面并不突出。在30年代期间病人

称他是一个“友好、有人情味的医生”。他吸引了纳粹医院负责人尼奇的注意,他选他到那里进行第一次试验。他在纳粹党卫队做医生的时间很短,然后在1940年正式加入了T₄。在受审讯时他说,“当时我将安乐死看作是病人的福音”,“国家能越过不合法的法律的概念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在某个放松防备的时刻他说,“打开煤气开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T₄包括许多底层的雇员。保罗·路透(伯利的保罗·R.)是农场佣工,然后做过黑森—拿骚的园丁。1930年他成为纳粹,这改善了他的就业前景,他说。他定期参加纽伦堡集会。1936年,失业之后,他的纳粹经历使他被训练成一名男护士。在波兰服役之后他被转到T₄医院。他加入了运输部,向病人保证“他们要去洗个澡”,然后执行了致死注射,接着挖掘坟墓。他说他被告知,“这是元首的命令,而我们必须执行元首的命令”。

保利娜·尼斯勒(伯利的保利娜·K.)1918年和家人一起逃离当时刚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敖德萨。他们在威斯特伐利亚获得了一个小农场,但大萧条迫使他们将其出售。她的父亲在铁路上找了份工作,而保利娜是个裁缝,之后做过护士。虽然她仅到1937年37岁时才加入了纳粹党,但她在1934年就已在纳粹福音会中工作,还在纳粹妇女组织中担任小领导角色。她逐渐相信宗教与“自然法则”相冲突。所有这些使得她被招入T₄。她不喜欢包含在安乐死当中的欺骗,声称持续不停的杀人让她心烦,但她杀死的病人比任何其他护士都要多。

本书接下来的几章将揭示所有这些相互联结的处在非法性边缘的暴力的笼子,它们都训练和磨砺了后来参与谋杀的纳粹。他们加在一起包括了德国社会所有的阶层。大部分是男性,而大多数笼子使得纳粹主义的社会地理倾向南面和东面。他们认为的敌人有不同种类,尽管布尔什维克在30年代中期之前占大多数,后来以犹太人为主。到他们被指令去进行日常的大屠杀活动时,很多人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暴力经历。并非他们中的所有都是真正的纳粹,但他们的工作环境往往易于产生偏执型、伙伴型、遵守纪律型和追名

206 逐利型杀人者。因为这些是暴力逐级上升的纳粹生涯和工作经历。

普通德国人的激进化

德国人之间差异显然很大。如果他们投纳粹的票,那么这既可能是因意识形态理由也可能是因为较琐碎的理由。在《法西斯主义者》一书中我确定了支持纳粹的核心拥护者。这里不存在严重的阶级或性别偏向。主要的拥护者集中在军事、警察和公共部门,重要的资本与劳力之间的阶级冲突区之外的经济部门(亦即不是来自大规模的城市制造业或采掘业部门),受过更高教育的中产阶级,失去的和德国(及奥地利)周围受威胁的领土上的人们,还有天主教徒之外的新教徒。来自这些背景的人往往觉得对德国问题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解决方法更加可信,这导致他们倾向于纳粹主义。1933年之前,没有人提出这可能会发展成大屠杀。但是也许这样的背景会将某些普通德国人推上这条道路。除了新教之外,事情确是这样。

德国的反对派至30年代中期被摧毁。30万德国共产党党员当中的一半在集中营中度过。既然没人能安全地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种族主义就是唯一的普通德国人能公开听到的意识形态。我们能得到的离我们最近的关于当时人的情绪的指南是盖世太保和不公开的社会党报告,作为补充的还有见证人的回忆录(见班基尔,1996;格拉特利,1990;戈登,1984;克肖,1984;柯克,1996)。克肖(1984)对它们作了总结:“通向奥斯威辛的道路是由仇恨筑成的,但铺在上面的是冷漠。”大多数德国人都是自己管自己或与受害人以及政权之类保持距离。他们把精力放在家庭、事业或教堂上,最多也就敢于在私下讲讲关于著名纳粹的笑话。赞成把犹太人从行政机关、高等教育以及商店和企业中清除出去的法律的人比不赞成的人要多——在整个欧洲——部分是出于贪婪,部分是因为德国人相信纽伦堡法律界定了什么是合法的,法律会制止野蛮的纳粹暴力。绝大多数德国人对

1941年的强令犹太人佩戴黄星布*的法令反应消极,同时他们经常公开对犹太人表示友善。像“水晶之夜”这样的野蛮暴力引起了愤怒。德国人想通过歧视性的法律来减少犹太人的影响。当时机到来时,他们不反对对犹太人进行身体清除,但是——像绝大多数纳粹一样——他们更愿意采取法律途径。

然而新的政权颇受欢迎,希特勒似乎已站稳脚跟。三分之一的人自愿地投了纳粹的票;另有五分之一的人支持独裁主义的民族主义党。希特勒在一阵盼望新秩序的潮流中迅速执掌权力。一位后来卷入对希特勒的暗杀计划的盖世太保军官回忆说:“极少有民族像我们这样,如此乐意地交出了所有的权力和自由在新千年充满希望和令人陶醉的最初岁月。”(吉塞维厄斯,1947:102)希特勒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带来了就业,创造了秩序并整治了街道。20世纪30年代末过热的经济使一些不满情绪蔓延,关于希特勒的恶意笑话开始流传,很多人对于他们的教堂遭到袭击表示愤慨。但盖世太保告密者让表示不同意见变得危险。从积极的一面看,希特勒在1936年到1941年间的外交冒险实际未费什么代价就获得了成功,恢复了德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大德意志种族民族主义的合法性。从1933年起由加入纳粹党或党卫军给出的理由显示了一种类化的民族自豪,合理的个人野心能够被纳入其中。“我想帮助建设新德国”——这一素朴的自我与国家的等同战胜了很多普通德国人对纳粹的所有疑虑。

1939年始政权擅自利用了战时动员和爱国主义。犹太人被宣布为通敌者,被集拢和囚禁起来。绝大多数德国人有着更为急迫的担心——轰炸、食物短缺和亲人在前线的命运。犹太人已被去个性化、被媒体抽象化,然后又让囚禁与驱逐行动弄得失踪了。班基尔(1996)说漠不关心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为犹太人担心将会增加不安,甚至负罪感——所以,强抑一切所知道的事。这,他认为,在根除行动一开始时就被强化了。大规模射击大多是由回来的士兵报告的,死亡集中营是通过BBC报道和同盟国撒下的传单知道的。德国

* Yellow star,由两个等边三角形重叠形成的六角星。

人知道,但是试图将其置于脑后。它偶尔会突然跳出来。当戈培尔公布了苏联在卡廷对波兰军官的大屠杀时,党卫军保安处报告了私下听到的一些怨言,如“德国人没有权利对这一行为感到激动……从德国这方面说,我们杀死的波兰人与犹太人的数字要远远大得多”。然而许多人同意东线战场是“一场针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殊死搏斗”,而“犹太资本主义”经常因为英国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而受到谴责。这不是种族上的内战,但是轰炸确实让前线与后方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是德国人,几乎不管属于什么阶级,你的命运就决定了。是犹太人,就是死路一条。族性超越了阶级和其他分层轴。

从1941年起,外籍工人的存在成为了德国很多地方的普遍现象。他们令人可怜的状况引起了不少同情的声音。1942年的第一次失败是个预兆。如果德国战败,同盟国的惩罚将是严厉的。空袭被认为是对集中营的直接报复。因此目前反斯拉夫和反犹的情绪很少有表示了:德国人把头低了下来,将自己的想法保留,采取了最低风险的沉默办法。沉默使得他们是否将犹太人看作是严重到必须要死的敌人变得难以确定。但既然政权不断强调他们的仇恨,既然战争给德国人带来了死亡和毁灭,既然犹太人现在是一个不在场的抽象概念,很多德国人就很可能真的这样想。

所有这些对于理解下面几章中将看到的普通德国人施害者都是必要的。1942年之前,德国变得越来越欢迎纳粹意识形态。继希特勒在国内取得成就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地缘政治利益的显著增加。战时爱国主义笼罩着他,而战时动员笼罩着德国人。虽然激进纳粹主义具有核心拥护者,但是,却没有起矫正作用的拥护者。阶级已被种族主义的种族民族主义——我的第2个总的种族论点版本所超越。战争末出现了更多的不同行为:施害人寻求讨好迎合囚犯或者消灭剩下的见证人,士兵仓皇撤退,平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在这终曲之前,许多普通德国人可能也已经激进化了。他们几乎都因世界大战的动员而变顺从了。

最后的激进化:进入种族灭绝

最后的向种族灭绝的急剧上升发生在纳粹组织内部。本阶段没有再广泛的群众压力了。尽管普通德国人后来参与了种族灭绝,他们并没有太多卷入开始阶段。因为纳粹组织的激进化是不间断进行的,我们无法给它安上一个精确的日期。历史学家花了大量精力寻找批准最后解决方案的决定,然而它依然难以确定。希特勒希望清除犹太人,但是直到1941年前,从压力移民升级为暴力驱逐一直是更好的方案。1939年和1940年艾希曼一直在研究将犹太人驱逐至巴勒斯坦和马达加斯加的计划。按照假定,绝大多数人不会在接收方的恶劣条件下活下来。但是英国遏制了这股势头,不允许任何这样的计划。艾希曼又开始重起炉灶。

然而关于犹太人的决定不是在真空中作出的。1939年,他们的命运与波兰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这不是一次常规的征服战争,因为被击败的波兰人没有被吸收进入帝国。希特勒宣称:

民族国家相反必须作出决定,要么封锁这些异族成分以便不让我们自己民族的血液受到污损,要么它必须将他们清除,把他们的土地转交到我们自己民族的伙伴手中。(克肖,2000:237)

戈培尔指出:“元首对波兰的判断是毁灭性的。比人类更多动物性……波兰人的肮脏是无法想象的。”希特勒说他不会犯前德国征服者的错误。通过同化波兰人,他们曾创造了一个“奴隶化”的德国杂交种族。“现在我们至少懂得种族的法则,因而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国家西面的三分之一将被合并到帝国当中——但这土地清除了波兰人和犹太人。中间的三分之一将是一个保护国,这里面包括波兰人,但只是作为居住在被隔离的奴隶居住区的季节性劳动力。这里的犹太人将被赶往犹太人居住区,帝国犹太人亦如此,直到犹太人问题的

最后解决方案形成。东边的三分之一被转让给苏联,因而暂时不是德国问题。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极端暴力驱逐行动加上发展至对波兰知识阶层执行 C 计划的政治灭绝的大屠杀等来实现的。给出的理由(与通常为这些暴行提供的理由一样)是报复,尽管上层人士知道这是伪称。德裔现在由党卫军组织成了民兵组织。他们的司令劝诫他们:“你们现在是这里的优等种族……不要心肠软,要毫不怜悯,清除掉一切非德国的事物。”陆军参谋长霍尔德,一名著名的纳粹,宣称:“毁灭与根除波兰民族是元首和戈林的旨意。”他又说:“其余的人甚至未在写作中被暗示过。”(以上皆转引自克肖,2000:237—252)

但这带来了后勤问题。超过 100 万的犹太人与数十万波兰人将要被东迁至波兰人受保护地。但是那里的纳粹领导层缺乏完成任务的设备。他们反对他们的世袭土地成为劣等人的集中地。它将破坏他们所有的对受保护地实行强制管理的尝试。激烈的政党之内关于犹太人及波兰人命运的争吵开始了。

入侵俄国一开始,犹太人的命运即与俄国人的命运缠绕在一起了。这是为根除战争而准备的。它包括清除犹太—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和所有被俘获的共产主义者。所有这些都公开地记述在巴巴罗萨行动,即入侵俄国的总体计划中。格拉克说军队打算靠被占领的白俄罗斯给养。这将引起大规模的地方饥荒,表明一种“种族灭绝性的企图”。因为白俄罗斯犹太人主要是在城市中,他们遭受的苦难程度不一。这一点,听说是“最终的、决定性的下决心彻底清除犹太人的刺激因素”(1999:44—81)。但是一场速胜本可以解决犹太人问题,用不着种族灭绝,因为该计划是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将所有犹太人与数百万波兰人向东驱赶至苏联领土。戈林或希姆莱,曾要求海德里希在 1914 年 1 月拿出一个“最后解决方案”,但这似乎仍然是一次领土驱逐,而不是种族灭绝。艾希曼在制订转移 580 万人的系列计划。然而,甚至在戈林 7 月 31 日写给海德里希的信上,关于手段问题也是小心翼翼、吞吞吐吐:

为与 1939 年 1 月 24 日交予你的任务相配合,该任务要求

拿出——通过进一步加快移民和驱逐——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办法……我谨命你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为了在欧洲的德国势力范围中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纽伦堡战争罪法庭,1946:特别行动队卷宗,第4部分,133)

没有规定采取什么手段。但是高级纳粹和党卫军官员称他们以为被驱逐者会挨饿、受冻或作为奴隶劳力被折磨致死。在任何正式的关于种族灭绝之决定出现之前,计划就在趋向种族灭绝性质。管理着波兰帝国的纳粹分子想将犹太人和可能会制造麻烦的斯拉夫人从他们的封地上驱逐出去,但是管理东波兰的那些人不想让他们留在他们那里。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是将他们进一步向东赶至俄国广袤的土地上。希姆莱曾在巴巴罗萨行动发起之后的两天,让他的计划制订者组织安排将几乎难以置信的3100万人,其中大多是斯拉夫人,向东驱逐。但是对犹太人和潜在的闹事者,许多计划制订者假定——但没有公开陈述——目标是“杀光他们全部,除了在欧洲之外的”。布拉克,T₄的头目战后说,当时“摧毁犹太人……在高级党政圈子中是公开的秘密”。

210

特别行动队军官在1941年初夏接收到了杀死布尔什维克和游击队的命令。根据党卫军1939年在波兰的经验,部分军队会反对杀害平民。而入侵计划过于乐观,3000人组成的特别行动队不可能杀光分派给他们的广阔领土上所有犹太人。但是军队采取了合作行为,原因是遭到清洗的军官团被游击队活动弄得惶恐不安,接受了纳粹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是敌人的观念。一些人带着热情去杀人(斯特赖特,1978)。很多地方上的通敌者也是如此。所以海德里希得到了比预想的更多的帮助。1941年7月他增加了特别行动队的人数,扩展了杀戮的范围。8月中旬,遇害的人数在向上猛增(有时增加10倍)。到1942年年末特别行动队增加了11倍,同时杀戮结果远远超出了甚至是最野蛮的驱逐行为。然而似乎仍然没有一个总体的计划。一些人去杀害年轻男子;其他人杀害那些没有能力做工干活的人。大量机构中的激进分子——党卫军、国防军及民政机构——都

有一定的地方自治权,但他们往往都有同样的反犹、纳粹和追名逐利观念,同时他们又都因苏联和游击队的抵抗,以及太多需要供养的人而感到灰心,不知所措。他们现在争先恐后地要为大屠杀提供技术支持——设计、毒气和挨饿(格拉克,1999;洛厄,2002;穆夏尔,1999;波尔,1996;桑库勒,1996)。

然而在1941年年末变顽强的苏联抵抗和变坚固的前线阵地意味着各种版本的A计划——从帝国驱逐出去——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变成不可能了。在向东驱逐和缺乏任何可安排驱逐人口的地方之间再次出现了矛盾。在这一背景下,D计划——种族灭绝,成为了唯一的能够实际将犹太人从德国的势力范围中清除出去同时又不放弃纳粹统治的激进势头的出路。它可能是在年末由纳粹党上层决定,而1942年1月在万塞会议(Wannsee Conference)上获得德国国家统治集团通过的。但是缺乏作为“确凿证据”的文件,同时很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命令。实际上,东部的大批德国犹太人已经被作为种族灭绝的对象,相信这也是元首想要的。〔3〕这与其说是一个有序的一系列决定过程,不如说是发生在一个观点一致并且其初始计划受挫的精英当中的总的升级过程。

结 论

在我所有的个案中,此案最不符合我的论点。它是最为国家主义和最有预谋的,同时有一个最为统一和最少产生不稳定的国家。它的未受挑战的独裁者经历了跨度最小的计划变动。早在1919年,希特勒就已经打算将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从大德意志帝国中清除出去。为实现这两个决不动摇的“绝对观念”,他时时刻刻准备着运用一切有必要的暴力行动。虽然他似乎从未有一个总体蓝图,他的一

〔3〕 决策过程依然充满争议。本人借用已被引用的那些人的证据,再加上布赖特曼(1991)、布朗宁(1985,1992)、弗里德兰德(1995)、戈登(1984)、梅耶(1990)和奈马克(2001:第2章)等人提供的一些材料。

系列连续的计划——压力移民、驱逐出境、政治灭绝、种族灭绝——在每遇到障碍时便轻松地与其他计划过渡。在 20 世纪 30 年代遭到反对时,除了战术上他从未考虑过退却。但是他似乎没有想过种族灭绝,直到战争开始之后。假如其他大国在 1936—1939 年间联合起来遏制德国扩张的话,那么种族灭绝就不会发生了,认识到这一点将会令我们瞬间清醒。之后的升级被戈培尔、希姆莱、海德里希等等辩称是出于自卫。德国历史学家最近强调年轻一代的受过大学训练的纳粹持完全同样的观念,同样承认极端时期需要极端手段。D 计划——种族灭绝,是他们在东线战场起初计划受挫之后的逻辑结果。作战与根除主义战略现在与反对犹太—布尔什维克敌人结合在一起。

因此,犹太人被根除不只是因为强烈的反犹主义。根除需要将犹太人与更大范围的德国的民族主义和政治敌人放在一起,就像纳粹激进分子看到的那样。但是,对绝大多数纳粹和德国人来说,跨越的距离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没有觉察到最初的 A 计划——绝大多数德国犹太人也没有。为了让纳粹和德国人开始形成所需要的施害人 大军,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它发生的阶段将通过接下来两章中对种族灭绝的实际进程的追踪而变得更加清晰。

第 8 章

纳粹 II：1500 名施害人

212

我们对于个人施害者的认知必然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战后审讯时的证词。但是这有某些困难。它偏重于前一章中区分出的三种动机：施害人说他们服从是因为他们害怕、守纪律或在官僚机构里身不由己。被控告犯有战争罪的人拼命地否认具有纳粹、种族主义、反犹或谋杀性企图，声称“我只是在接受命令”，“我害怕”，“我只是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我一直在机动车调度处/人事登记室/伙房”。没有人承认曾享受杀人；极少数人喜欢谈论他们的党卫军事业成就。几乎没人暗示或控告他人有罪，甚至不承认曾与同事谈论过接连不断发生在周围的种族灭绝。从他们的证词看，这似乎是一个与意识形态无涉的环境，普通人在此陷入强制性和官僚性的机构中。然而认可大屠杀凶手为服务于自己利益而作的证词将是不明智的。

当他们如此隐藏动机时，我们是否能够充分测试出杀人者是不是属于心理失衡的暴力类型，是令人怀疑的。法庭任命的心理学家确实仔细对几个被告作了评测，通常结论是他们是健全的。一位法庭心理学家报告说纽伦堡被告的性格“并非罕见或不健全……它们可以在今天国家的任何地方被找到”。绝大多数集中营幸存者报告说只有少数几个卫兵是在明显心理失常的个体的意义上是施虐狂。毋宁说是环境造成了一种集体的施虐欲，他们说——这需要一种社会学的解释。然而，我们又应当坦率地承认我们无法深入到绝大多数施害人的人格之中，因为我们缺乏值得信赖的心理证据。

例如，让我们看一看表面上更诚实的施害人之一，奥斯威辛指挥

官的情况。我们很容易会觉得我们了解少校鲁道夫·赫斯,因为他在 1945 年撰写了一本坦诚的《回忆录》(赫斯等,1978)。在已经被判处死刑再没有什么可失去之后,赫斯没有试图隐藏曾由他监督的杀人机器的滔天罪行。这份回忆录是由一个明显健全的高级管理者对死亡集中营的组织和人事的一种冷静慎重的叙述。有些人强调他的平凡特征。卡茨(1993:61—79)称他是“一位纳粹官僚”,“一个行政管理官员”,喜欢秩序、干净、整洁和服从权威——是“近代普通官僚”的缩影,他总结说。

然而这似乎是过度夸大了普通人的概念范围。看一看赫斯的经历。他起初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名少年志愿兵。战后,他 19 岁时,加入了自由军团,杀过拉脱维亚人、波兰人和德国共产党。他的部队在杀死了一个自己的成员——被怀疑的叛徒之后被解散。作为主要杀手,赫斯被告犯有谋杀罪。1928 年被释放之后,他直接进入了一个纳粹农业组织;他在 1934 年以前是一名专职的党内积极分子,1934 年,他成为了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卫兵之一。他在营中一直服役到 1945 年。赫斯可能是很有效率的管理者,但是他肯定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纳粹,他的成年生活完全封闭在原始纳粹和纳粹组织当中,充满了暴力,很难将他描绘成一个普通的管理人或现代制度的代表。我研究方法的依据是通过分析施害人的背景和工作经历的简单和客观的特征来将他解释明白。在他们可怕的行动之前有什么记载?他们可能会支持什么动机?

以前的研究不可能产生权威性的答案。没有哪项研究以整个施害人集团作为研究对象,从前的研究者都只研究个别的亚群体。而绝大多数研究都强调施害人生活中的三个较一般特征。他们在其恐怖的工作中保持十分正常的私人生活,和家人住在一起或给家里写问候信,庆祝生命仪式,谈情说爱。72% 的西德战争罪的被告在被审问时依然处于已婚状态(奥皮茨,1976:170)。第二,他们的普通还在于不具有超过一般的特殊才能。阿拉德(1987:198)把莱因哈德死亡集中营工作人员描述成没有特殊才能或特征的人,这代表了许多作家的意见。第三,他们此前的职业似乎带有典型的德国特色。希尔

伯格说：“用以毁灭的工具惊人地体现了典型的德国人口的特点。每一个职业、每一样技术和每一种社会地位都可作为代表。”（1978：649）拉西克（1994a：279）说前奥斯威辛职业反映了“一个与其社会非常相像的集中营工作人员的特点”（参见布朗宁，1993；戈德哈根，1996；冯·亨蒂格）。最近关于纳粹的研究总的来说也倾向于认为他们是来自所有的社会阶层（见我的《法西斯主义者》：第4—5章；费希尔，1995）。褪去他们的制服、妄自尊大和事业，战后审讯法庭上的老态龙钟、衣着素淡的被告看上去与外面街道上的德国男女惊人地相似。如果大屠杀杀人犯的邪恶能从他们的样子上看出来或许会使我们感到安慰：我们就可能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但是这不是事实。

214

然而我们对施害人的过去真的了解甚少。我们没有经济部门的准确数据。我们对他们的地区来源几乎一无所知。纳粹研究者一般都认为他们来自德国各个领域，然而这一陈述通常是基于十分表面的地区分类（北与南，东对西，普鲁士之于其他州，等等），没有任何理论假说的支撑。默克尔对阿贝尔原来研究的30年代纳粹样本的重新考察是个例外（1975：133—138）。他发现来自失去领土和受威胁领土的男子占比过大——原因是这些地区很可能盛产极端民族主义者。这些是我称之为纳粹核心拥护者的例子。也许它们同时还提供很多施害人。绝大多数学者同时还认为来自国外的奥地利人和日耳曼人占比过大。凯尔（1983）认为党卫军在招收奥地利人和苏台德人方面特别成功，尽管他没有给出实际数字。巴纳赫（1998：50）的秘密警察数字并没有表现出奥地利或苏台德人占比过高或者德国各州当中代表比例失衡——除了天主教成分较重的州（巴登和巴伐利亚州）比例有点偏低。他还发现天主教徒在秘密警察当中比例偏低（1998：142）。拉西克（1994a）令人好奇地发现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情况刚好相反，这与一般我们对纳粹的了解相悖，后者特别多的来自新教背景。然而拉西克不能在他的样本中将德国人与奥地利人区分开，他承认天主教奥地利可能会使他的研究结果产生偏离。

施害人已经有过从事纳粹主义和暴力活动的经历了吗？我们对

T₄ 人员了解最多。因为他们杀害非犹太德国人,他们是最有可能被带到德国的战后法庭进行审讯的群体。绝大多数学者强调他们之间是怎样的不同,有些是因为他们出了名的可信赖性而通过党或个人网络被高票选上的,而其他的则是普通的党员,完全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任务(例如,霍维茨,1990:64—68)。然而德·米尔德特(1996:311)认为追名逐利或个人野心通过这种种不同透露了出来:

他们不是因为信念,而是因为环境和机缘成为杀手。与符合偏执狂似的意识形态斗士形象相反……他们的背景远更接近于一个具有发育良好的私利计算本能的十分普通的公民的形象……跃入脑海中的关键词……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机会主义”。

巴纳赫(1998)、布劳德(1996)和格拉特利(1990)强调盖世太保及其他秘密警察队伍中的多样性。然而尽管他们倾向于指认更多的普通人而非意识形态上的纳粹,他们的工作倒是有助于我们打破我在一开始用于动机分析的两分法。因为他们强调指出当时的警察工作的普通价值观念和警察工作方法与总的纳粹主义气质具有一致性。虽然在1933年之前仅有一小部分是纳粹,但几乎他们所有人都感激纳粹给予他们的搜寻和审问嫌疑人的特别权力。布劳德认为由秘密警察工作带来的机构性身份与纳粹主义有某种选择性亲近关系。30年代,警察被进一步诱使通过对其职业的例行暴力的升级迈入了更加激进的纳粹主义。十分现实的公共秩序观念因此就与纳粹对国家主义的强调重视取得了协调——正如我的样本中的两个主要的然而开始时并不是纳粹的警察缪勒与内贝一样,他们半途发现自己成了重要施害人。

普罗克特(1988)对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医疗实践作了同样阐释。因为种族甚至在纳粹上台之前就是德国医疗学科的一个自然对象,在医学与纳粹对种族主义生物医学的拥护之间已经存在一种很深的科学亲缘关系。纳粹主义从专业上迎合了他们。艾伦(2002)同样指出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军营司令部(WVHA)党卫军某中营总部中的

管理者和工程师发现在他们对科学管理的奉献精神 and 纳粹表面上对一种有序的、理性的社会的追求之间有一种类似关系。因此职业机构和亚文化可能会将无辜的人引向纳粹主义——然后也许就引向了谋杀。社会学的意识形态观较少将其看作是一种抽象确定的学说，而更多地将其看作是从一个人自己的经验积累中得出的结论——这模糊了普通人与真正的纳粹之间的简单区分。我将以这类洞察作为基础。普通警察、医生和工程师，而非普通人，可能预先就有了激进纳粹主义的倾向。

在特别行动队，即流动杀人部队当中，对后备警察营 101 的两项研究都认为大多数警察根本不具有什么纳粹主义背景。布朗宁说他们是普通人，是因统治集团和伙伴关系的压力才犯下种族灭绝罪行。戈德哈根说他们是普通的德国人，杀人是因为（像所有德国人一样）他们胸中充满了“清除主义的反犹主义”，尽管他们对他们杀害俄国人时的动机缄口不言。两人都强调警察是作为新兵征来的，不是因个人因素被选上的，极少数人战前曾是纳粹，而他们以前的职业是汉堡市有代表性的职业，这里是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出发地。我将在下一章中对这些结论提出一些质疑。

显然，施害人具有差异较大的过去，就像布朗宁的研究表明的（1978, 1985, 1993）。但是有一些差异是可以料想得到的。级别越高，纳粹主义越深；在核心党卫军和党组织中比在后备警察部队中有更多忠心的纳粹（布朗宁，1993：45—48；詹森和韦克贝克尔，1992：79—81；利希滕斯坦，1990；波尔，1996：81—96；桑德库勒，1996）。高级的特别行动队军官是意识形态纳粹（和受过高等教育；黑德兰，1992：208）。因此核心机构中的高级军衔中充斥着长期的纳粹。伯恩发现了纳粹主义的辉煌历史，其通常由政治暴力组成，集中体现在 45 名最高级别的党卫军警察的职业生涯之中。这些党卫军警察是希姆莱亲自选的，而他“把他自己比作一个植物培育者——挑选、淘汰和培养”（1986, 1991：351）。西格夫（1987）披露 30 名集中营指挥官——只是挑选过程是随机的——身为长期纳粹的经历。萨福里安（1993）也在他的著作中揭示了艾希曼的员工的经历。

学者们也指出种族灭绝机构是怎样随着时间改变的。脑中确定了艰巨的任务之后,机构的创立者开始招募能胜任这类任务的人——老战士,或被认定值得信赖、冷酷无情、粗野或头脑清醒的其他人。后来的机构中最初的工作人员也是来自早期已经鼓励暴力措施的机构。德奥合并之后被挑选执行艰巨任务的奥地利人经常是那些在1934年纳粹起义失败后逃离奥地利,然后在德国接受奥地利军团职业革命者训练的那些人。第一批实际死亡集中营(索比堡,贝乌热茨,特雷布林卡)开办时有97个选自T₄的工作人员。奥斯威辛开始时人员都要在严厉的战前集中营管理制度下接受训练,这种制度是由艾克在达豪集中营创立的。对报名加入党卫军的申请人的甄选一直进行到30年代中期,但是随后大扩张就到来了,且在战时升级,其时集中营不得不与前线的需要展开争夺:选择有名的个人的奢侈要求下降了,新人以任意方式招收——包括招募年长的警察预备队军人和受伤的不能参加战斗的士兵。因此施害人随着其人数的扩大而变得越发普通平常。显然我们必须研究包含在这种扩张中的社会关系——军官与男人之间的关系,富于经验的杀人者和越来越多的新招入的新人之间的关系。索夫斯基(1997)认为这些关系帮助死亡集中营完成了种族灭绝。这里是否存在更一般性的内容?

施害人样本

为解决前面几章中揭示的差异性问题,我们需要对整个施害人群体进行样本抽取。否则,学者们就可能永远以亚群体为基础进行归纳,运用一些传记支持他们自己珍爱的理论。然而没有一个可抽取样本的已知的施害人数量。明显的策略是依赖被起诉的战犯,但是有些确定无疑的施害人已死于战争,其他人失踪,还有些人从未受到审判,而有些人则莫名其妙地被开释了——原因是他们已杀死了几乎所有可能的见证人或者因为法庭表示了非同寻常的宽容(就像开释T₄杀人医生那样,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错的”)。一些国家的法庭比其他国家的更加宽容,而一切都是在他们国家的特殊法

217

律下进行。因此西德法庭只有在他们能表示“卑劣动机”(反犹太主义)或者“残忍”(要求直接与受害人有接触)^[1]时才提出谋杀起诉。这样的特性意味着有些施害人比其他人更可能遭到审判和起诉。最危险的是那些被指曾出现在臭名昭著的杀戮地点的人,来自有见证人幸存下来的杀戮地点的人(特别是集中营医生,他们的囚犯助手经常幸存下来),以及那些行为残忍至被人记住的人。绝大多数基层的只顾低着头杀人的施害人依然不知姓名、逍遥法外。因此,在被起诉的战犯中,军官比普通士兵要多得多,而男人也就更多,因为女人不是军官。

两个有缺陷的抽样方法还在被研究者使用。我们可以通过运用有限的来自某个特殊的谋杀性背景中的全体人员档案中的数据来避免选择偏见,就像拉西克(1994a)对奥斯威辛或布朗宁(1993)对警察营 101 所做的那样。这是我研究中的较小部分。我有两个集体卷入种族灭绝活动但绝不是全部犯有战争罪的群体的有限生平数据。

1a. 1945 年集中营在册军官。这包括所有排在 1945 年党卫军军官花名册中的集中营军官。^[2]因为妇女不能成为党卫军军官,这产生了 357 位清一色男性军官。其中,有 80 位资料不全。这 80 个人几乎全部是在 1944 年进入集中营系统,仅升至中尉或上尉军衔,出生都在 1900 年前后。这些人很可能是中年时被招入国防军或纳粹党卫队前线编队的新兵,受伤退役后到党卫军参加后卫部队活动,像集中营里的那种。他们是集中营在册人员中流动较快的成员。虽然有些人也许有时间去犯下暴行,但绝大多数很可能只是种族灭绝中的相对次要的一帮帮凶。因此我将以剩下的 257 名男人为主要对象,我有他们的军衔、加入纳粹党的日期、现任军衔的获得日期、出生地和出生日期等方面的资料。我能在同时为我的主要样本的 39 个对象中检验数据的准确性。唯有他们的纳粹党成员地位的记录不可靠。在未被列入党员名单的 12 人中,有 6 人事实上是党员。所以我

[1] 该点我要感谢克里斯托弗·布朗宁。

[2] 我查阅了洛杉矶宽容博物馆中该花名册的缩微胶片。

没有采用这条信息。

这些在册军官在军衔和名声上从少将理查德·格卢克斯(负责督查所有集中营的头目)到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个人印记的默默无闻之辈,高低大小不等,大多数从未被交付审判。他们构成了绝大多数参与种族灭绝和在主集中营的骨干队伍里的军官,尽管他们个人可能并没有犯下严重罪行。

1b. 1945 年的党卫军保安处军官。从同样的党卫军信息源,我抽取了从规模大得多的国家秘密警察党卫军保安处找来的军官样本。我选择所有以 H 和 I 为姓氏的男人(这样选择是因为没有明显的地区的或宗教偏见)。这就产生了与样本 1a^[3]一样的 406 个人的生平细节。

这些人很可能在活动方面要比集中营在册军官差异更大。一些人可能会天天都在从事赶走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和其他敌人,以及审讯嫌疑犯的工作。一些人被指使参加杀人游戏、用刑、殴打等等。然而绝大多数对党卫军保安处的研究认为很多人是职业警察,经常不太情愿地和部分地采取了党卫军的暴力模式,保留了对更正确的秘密警察的行为模式的某些依恋。只有 15 个人同时在我的主要实际施害人样本之中。不幸的是,花名册名单上没有给出这些军官在哪里服役的信息。这肯定会产生重大差异。在德国本地服役的党卫军保安处人员比那些被派遣到波兰或南斯拉夫的人被拖入战争罪的可能性要小。

218

一个 1581 名战犯的新样本

我们能够从战争罪审讯中抽取一个样本,不管它们偏向如何,从中发现更丰富的提供给法庭的细节。然后我们能够添加关于在失踪、死亡和幸运死亡中的最有可能的罪犯的数据。这些人将是实际的或极可能的战犯,是我在此主要的讨论对象。我搜集了从公开发

[3] 我希望为搜集这些数据感谢加雷斯·曼。

表的法庭陈述、报纸剪报和对受害人的学术研究中获得的 1581 名假定的德国战犯的生平数据。〔4〕《纳粹战犯的审判系列丛书》(*Justiz und NS-Verbrechen*), 1947 年到 1965 年间的 22 卷西德的审讯摘要汇编(鲍尔, 1968—1981), 提供了我样本中的三分之一多内容。其余的来自大量的信息源, 几乎都是已发表的, 凡属于曼(2000)的文献, 其目录上面都标有一个星号(*)。我的分析绝大多数是建立于二次研究上, 是对施害人进行量化分析的第一次尝试。它能够也应该在未来通过对档案进行直接研究而进一步得到加强。我的研究包括了在战后各个国家进行的审判中被判定犯有谋杀罪或直接组织或协助实施谋杀的人(993 个人), 加上那些似乎很有可能犯下同样的罪行然而要么死于战争(101), 战争结束时自杀(62), 逃过了起诉(339 人), 要么后来命运我不了解的人(87)。在这最后四个类别中, 有很多方面要依靠我对可能有罪的可能性大小的判断。我本可以通过只研究那些法庭认定有罪的人来避免这种情况, 但这样是以降低有效性的代价来增加样本的可信赖性。

最高级别的纳粹也在其中: 党卫军最高指挥部长官, 党卫军及警察高级领导人, 纳粹党地方长官, 以及特别行动队高级军官。当我们顺着军衔从上往下去的时候, 施害人总数的代表性就更微弱。最著名的中层军官是像艾希曼和克劳斯·巴比这样的人。约瑟夫·门格尔领导着声名狼藉的医生公司。许多级别较低的医生往往不是以他们的真实姓名而是以可怕的绰号被人记住——第二个“死亡天使”(即除门格尔之后)、“贝尔森野兽”、“布痕瓦尔德娼妓”等等。他们来自所有杀戮领域, 包括命令或施行对犹太人、斯拉夫人、吉卜赛人、精神病患者及其他人一次次杀戮的男人和女人。该样本也并非没有偏向。当中领导人比被领导的人要多得多, 更多的是留下纸面痕迹的人, 更多的是让受害人群体记住的人。我不想号称我的样本可代

219

〔4〕 我要谢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员工、伦敦威纳图书馆和洛杉矶西蒙·威森塔尔中心把他们搜集的资料交给我处理。更完整的样本详细资料, 包括本资料取自其中的一个完整的信息源名单, 可以在曼(2000)那里找到。

表所有施害人,但是它确实代表了核心部分,可以被用来揭示他们与更大施害人群体的某些关系。它还是迄今为止已搜集到的关于大屠杀杀人者的最大样本。

我搜集了关于地名、出生日期、正常或被扰乱的家庭背景、本人及父亲此前的职业、以前加入纳粹组织的历史、此前参与的暴力、战时活动和战后命运等方面的数据。这类研究不好的地方是反复无定的数据——有些个人资料是全的,其他人则残缺不全。样本能够扩大,不全的数据可以在柏林党卫军及纳粹党档案、路德维希堡和维也纳的检察官档案以及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战后档案中的档案著作中找到。以上这些我一个都没去找,尽管显然应该有人去。

本研究中我寻求对四个主要的生平方面问题的答案:(1)施害人是从核心纳粹拥护者中拉过来的吗?1933年之前,纳粹分子大量地来自军事、警察和公共部门,位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主要阶级冲突区域之外的经济部门(亦即不是来自城市大规模的制造业和采矿业,这里阶级冲突盖过了民族主义),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沦陷的国土,以及在所有以上环境中,来自新教而不是来自天主教。这样的背景过去往往有利于极端民族主义或极端国家主义,因此产生了1933年前的纳粹。^[5]当然,1933年之前,极少有迹象显示这样的观念有可能导致大屠杀。但是这样的背景会更能代表施害人特点,表明他们参与大屠杀部分地是出自这样更加宽泛的意识形态信念吗?(2)他们是早期和/或青年时期卷入纳粹主义的吗?他们是专职和/或高度忠心的纳粹?(3)他们早期和/或青年时期参与到主要根除阶段之前的非法、暴力或谋杀性的活动了吗?这或可表明从事暴力和适应暴力的经历。(4)他们体验过社会边缘地位、向下流动、事业或家庭伤害吗?斯托布(1992:第3章)所称的艰难时代的心理学方面可能会把人推向攻击性或把别人当替罪羊。缺乏真实的心理学数据,这是我能得到的导致暴力动机的失衡个性的最新证据。注意(1)和(3)的结合也可能表示一个封闭在暴力纳粹主义环境中的职业过程,

[5] 我在我的《法西斯主义者》(2004)当中编撰并分析了所有这些数据。

以社会化和初始意识形态偏好的熏陶开始,走向真正的纳粹。反过来,在所有四个方面施害人也可能无甚不寻常之处,但大致上代表了普通德国人的特性。

220

研究发现

表 8.1 归纳了样本的特点,将样本分成了几个主要的种族灭绝机构。〔6〕我的样本中 95% 是男的。妇女只在 T₄(如护士与秘书)和集中营中超过 5%(如女性囚犯的看守)。这反映了女性参与种族灭绝的真实水平。妇女在死亡集中营工作人员中约占 10%,同她们在全部集中营工作人员中占比一样(施瓦茨,1994:35)。鉴于妇女在当时的从属地位和被排除在正式党卫军成员之外,其他的参与通常限于间接管理辅助。我的样本中的妇女受教育程度和中产阶级水平都要比男子低得多,只有六名女医生有相当于军官的军衔。极少数人有纳粹成绩记录。只有 16% 的人有过 1939 年前加入某个成年纳粹组织的记录。没听说有人参加过以前的暴力,而极少有人主动选择了她们的职位。绝大多数女性看守说她们是被招募到这个位置上,然后花了两到四个星期在主要集中营之一接受训练(施瓦茨,1994)。战后检察官通常未能向我们证明被控告的妇女是真正的纳粹。有些人家里有现役男性纳粹(我的样本包含一对已婚夫妇,声名狼藉的布痕瓦尔德科奇斯夫妇),幸存的囚犯说只有少数几个女人强烈赞同纳粹。不幸的是,我缺乏任何一个方面的系统性数据,因为法庭对此只有零星的记录。妇女问题最有力地说明了这类研究的方法论困难。缺乏资料就意味着实际没有吗?未必。有些人肯定有过强烈的纳粹观念,尽管以前将之付诸行动的是极少数,似乎封闭在纳粹主义或暴力当中的也是极少数。但是德国的父权制及它的性别偏见防止了妇女过多地参与种族灭绝,不管她们的倾向或意愿是怎样。

〔6〕 类别“其他”将文职官员、商人、传播者和国防军及纳粹党卫队人员的混杂结合编为一组。

表 8.1 纳粹施害人:战争罪部门样本特点

	T ₁	医生	集中营	特别行动队	秘密警察	纳粹党	其他	全体	总数
妇女占百分比	22	5	9	0	1	0	4	5	1581
军士或以下占百分比	67	0	71	28	16	3	18	36	1562
工人阶级占百分比	63	0	64	35	29	14	22	37	1216
大学毕业占百分比	25	99	5	34	43	54	49	41	912
国家雇员占百分比	24	6 + ^a	21	58	53	51	57	40	1152
父母不在身边占百分比	20	11	19	20	19	2	13	16	650
事业中断占百分比	21	11	47	16	30	9	13	24	765
正式/暴力纳粹占百分比	53	51	62	72	95	100	60	72	784
加入纳粹时平均年龄	27	29	28	27	28	29	33	28	1159
1939 年时平均年龄	34	35	32	33	35	41	41	35	1562
出生在农村占百分比	30	25	28	32	25	36	28	32	1471
出生地 80% 以上的人信天主教占百分比	46	37	32	31	30	40	30	33	1556
外籍德裔占百分比	33	23	31	28	28	31	16	28	1581
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 ^b 占百分比	28	46	35	35	44	41	32	37	1580
样本数量	141 ^c	109	458 ^d	291	305	121	200 ^e		1581

a 这个数字太低。医生以前是在公共还是私有部门工作,资料中极少明确。在不明确时,我算作私人部门。

b 这个数字含对可能死亡或逃脱了逮捕的人进行审判的估计数。

c 不包括医生和牙医,他们放在一个单独栏目中。

d 不包括医生和牙医,他们放在一个单独栏目中。

e 由 72 名文职官员、58 名军事人员(大都是纳粹党卫队队员)和 70 名不同身份平民(新闻记者、商人)组成。

表 8.1 的第二行显示样本的大多数是军官(或我推断具有相等级别的享有较高地位的平民)。虽然他们没在我的集中营分样本中占到大多数,他们相较于拉西克的(1994a:282)更完整的关于奥斯威辛员工的数字还是占比偏高。因为我对主要集中营的覆盖是充分的,所以偏差很可能出现在起诉过程,不是在于我的样本选择。这也解释了我的样本在职业阶层分布上的不平衡(相较于拉西克的)。除了集中营和 T₄,工人阶级在我的样本中极少出现,而精英职业者几乎是应有比例的 10 倍。样本中的近 41% 受过大学教育的。显然,这是一个由大量的有比较显赫地位的施害人组成的样本。

221

表 8.2 纳粹施害人:男人中的代际社会流动性:各类中全部男性占百分比

父亲的职业阶层	自己的职业阶层			占总数百分比
	精英	中下层	工人	
精英职业	19.6	12.0	1.2	32.9
中下层	5.7	20.7	12.0	38.4
工人	2.4	6.0	20.3	28.7
占总数百分比	27.7	38.7	33.6	100.0
占德国劳动力百分比	2.8	42.7	54.6	100.0
代表比	9.89	0.91	0.62	

注:

总数为 581 名两种职业都了解的男性施害人。

进入编码的职业是样本父亲和自己陈述的在纳粹时期的主要职业。职业和阶层的分类按 1933 年的德国普查。

精英职业:大量地主、企业家、高级管理者、高级文职官员、受过学术训练的专业人士。

中下层:独立工匠、非学术职业人士、白领工人、低级文职官员、小商人和农民。

工人:不熟练、半熟练和熟练工人。

生活创伤

表 8.1 和 8.2 包含相对有限的与生命创伤和假说 1b 相关的数据——这些人可能会是暴力杀手。只有 16% 的样本人数在还不到

19岁时遭受丧亲或父母残疾之不幸(通过死亡、严重受伤、离婚或被遗弃)。这个数字对一个平均预估寿命为50岁左右,还包括了“一战”在内的时期来说似乎是低了。在650个拥有完整家庭历史的人当中只有30个人(4.6%)失去了父亲或母亲,或看见了他(她)们在心理上被战争弄得心烦意乱的样子(22人选了父亲,5人选了母亲,3人两个都选)。盖世太保里的施刑者克劳斯·巴比精神失常的事迹广为人知(林克莱特等,1984)。他的父亲回到家时被自己在“一战”中的经历弄得心烦意乱。他大量饮酒,殴打他的家人。克劳斯是一个不快乐的男孩,而他在学校里对希特勒的崇拜可能替代了他对父亲的崇拜。然而这类创伤似乎极少见于我的样本,它恰巧符合了洛温伯格的理论(1983:259—280),即父亲角色的缺失导致威权主义和元首崇拜——如果假定这导致了按照元首命令而犯下战争罪的话。不管怎样,关于巴比生平事迹的决定性一点是当他还在学校的时候就为盖世太保通风报信,毕业时正式加入,随后再也没有离开它的怀抱。这是他的家,他的笼子。

中断就业影响了24%的人(表8.1,第七行)。又一次,这个数字显得低了。单1933年失业人数就超过30%。布劳德(1996)发现他的党卫军保安处军官中至少有32%的人曾经失业。我的指标包括的除了就业,还有企业破产和对他们在工作中挪用公款的控告。但是对这当中的三分之一来说,纳粹或冲锋队或党卫军成员地位排在第一位;对他们而言,中断事业可能是因为花了太多时间与组织呆在一起的结果(有些人这样说)。对一半的人来说,纳粹主义排在事业中断之后,因而可能是它的一种结果;对余下的六分之一来说,纳粹主义与事业中断似乎离得太近,以致分不清因果。因此,至多有16%的样本人数可能经历过事业中断,可以想象是因为艰难时代的人的心理状况导致出现了极端主义的反应。这些人通常不是失败的人。纳粹主义之前的事业大多出现在我样本中的工人之中。一些人说他们加入纳粹是希望从那儿得到工作。虽然这是在战争罪审判中为了自我利益服务的声明(比如像“我不是一名真正的纳粹,只是想加入进去找份工作的普通德国人”),但是对1933年之后加入的“见风使舵

223

的纳粹”来说,他们加入纳粹很可能经常真的是为了个人野心。

战前处于犯罪边缘的证据极少。只有 10 个人被起诉或甚至正式被控告犯有非政治性的战前罪。真实的数字被认为要更高,因为这是不随便公开的信息。但是假如我把囚犯工头(Kapos)放进我的样本中,这就不一样了。他们许多人的记录显示了他们漂泊不定、作奸犯科、家庭破裂和失去工作的一生——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在集中营就因为他们都是罪犯。他们没在战前当过纳粹。表 8.2 提供了一个比较粗略的对社会流动性的总体评估。大多数施害人(60.6%)与他们的父亲相比既不是向上也不是向下流动。向下流动(25.2%)的比向上流动(14.1%)的人多。然而在档案记录最全的个人当中表现出的差异至少有一半似乎是他们的政治追求的结果而非原因:激进纳粹极少刻意谋求他们的事业前程。不像战前纳粹领导人(特别是地方长官;罗戈夫斯基,1977),施害人以前没有经历过很多的向上流动。他们与杰明的(1984)战前冲锋队的样本相似:大多相对静止,然而少一点向下流动(这一点她往往过分夸大其重要性)。因此,似乎极少施害人有过那类可能会产生严重受挫、攻击或为个人不快寻找替罪羊的极度被扰乱的生活。这是本书中组织程度最高的例子,可能并不能代表其他案例。但它并不是来源于边缘的或犯罪的类型。

核心拥护者:受威胁的边境区和难民

就很多变量来说,我们想知道是否样本与总的德国人的情况有区别。因此我计算了代表性比率,即具有规定特点的施害人的百分比除以整个德国人口或劳动力中含有此类特点的人的百分比。一个超过 1.0 的比率意味着具有这类特点的施害人的代表性过强,低于 1.0 则意味着代表性不足。

施害人是从特别地区选来的吗?我按照 1933 年帝国普查中区分的省份与亚省份(参见 1935 年德意志帝国统计),加上包含有可能被招收进入种族灭绝机构的德裔人口的国外地区,对出生地作了编码:640 万奥地利人(680 万奥地利人中的 94% 德裔);“一战”后丢给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上的 150 万德国人,还有波兰其他地方的 60 万人;320 万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地方、匈牙利、南斯拉夫、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意大利等地加在一起的 200 万德国人;以及在西部丢失的领土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阿尔萨斯—洛林和比利时马尔梅迪地区的 35 万人。不可能获得精确的全部能找到的德裔人口数字,但我的 1400 万的估计数不可能相差太远。图 8.1 标出了出生地点,每一个地区都被给予了一个代表性比率。德意志帝国省份还有两个比率:施害人单在德意志帝国人口中的比率和在 1932 年 7 月国会选举中支持纳粹的投票比率。

我提出这样的假说,即某些区可能会孕育极端民族—国家主义者,偏好有能力袭击德意志民族敌人的攻击性国家。可能的候选人将是居住在国外、生活在据称是具有威胁性的非德国人中间的德国人,生活在失去领土上的德国人和居住在与受威胁边界相邻地区的德国人。德国已失去了其大多数边界周围的领土:西北部(石勒苏益格北部,人口 16.6 万);东北部(但泽、波兰走廊以及东普鲁士与立陶宛的边界,人口 300 万);中东部(西里西亚部分地区,人口将近 100 万);西南部(阿尔萨斯—洛林和交给比利时的小块地区,人口 190 万)。在中西部,萨尔被战胜国控制,而莱茵兰从 1923 年即被占领;沿整个中西和西南边界,同盟国声称对再往前 50 公里的长条地带具有军事干预权。地图 8.1 标出了这些领土。是像人们推测的那样,外国强权对德国的榨取刺激了那里诞生了更多的施害人吗?

图 8.1 最吸引人的发现是所有国外的德裔人口地区,除了苏台德地区,都代表性过高。最高的是西部人口,几乎都是来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丢给丹麦和比利时的地区。其后是来自波兰和其他东部国家的德裔人口。来自波兰的大多数和来自东欧的一小部分也是来自失去的领土。这些群体比起那些出生在德国本土任何地区的群体,代表性过高的程度都更突出。奥地利人也有点占比过高,尽管我的样本很可能对事实的陈述不够充分,因为奥地利的战后审判比德国的要少,更多的奥地利施害人很可能隐姓埋名,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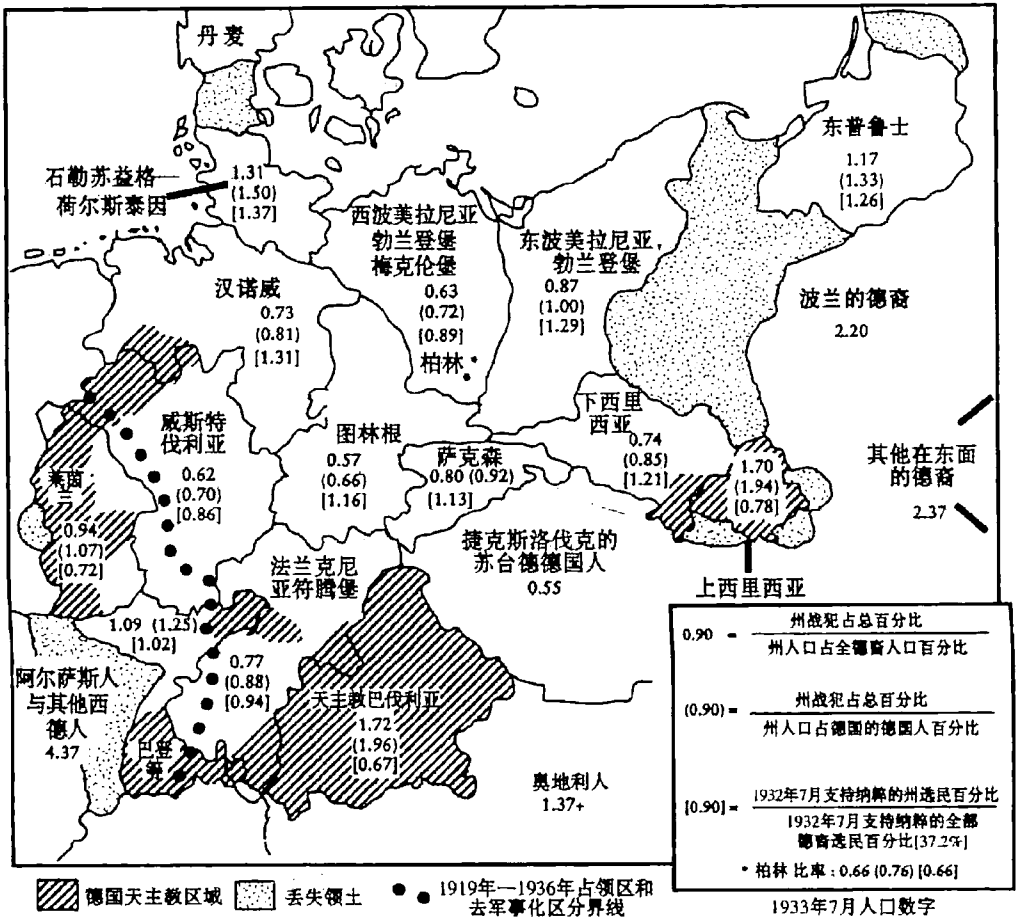


图 8.1 德裔战犯及支持纳粹选民的占比过高与占比过低的分地区比率

失了。

但是我们还必须区分他们的国家被德国军队“解放”之前或之后的德裔人口(1938年解放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以后再是其他地方)。早期的难民在压力下往外逃亡,经常是逃往难民营,而难民营的环境助长了民族主义。在上一章中我指出这是纳粹组织独特的暴力笼子之一。这些难民大多数到来较早,距“一战”结束没多少时间,但奥地利难民一般是在1934年政变失败之后逃离国家的纳粹。当时许多的奥地利人在德国纳粹党或党卫军中占据很高的位置。排除奥地利人后,样本中尚有100个人是难民,他们中大多数都在“二战”开始前很长时间内就表达了对纳粹主义的某种热爱。他们比样本平均年龄大,更可能是早期或年轻的纳粹,从事过以前的暴力,得到更

高的军衔,并受到战后更多的审判。〔7〕在奥地利人当中,45% 被判了死刑或无期徒刑;在难民当中,是 42%;而苏台德人和被解放的德裔人口中只有 31%。德意志帝国的人处在中间,是 36%。

图 8.1 表明这些难民原来是施害人当中占比最高的群体。在 1933 年普查中,那些出生在国外、把德语作为母语的人所占人口不到 1%。然而他们占了施害人的 6% 以上(而刚好低于 1933 年之后到来的那些人的 6%)。这个群体包含了几乎所有来自阿尔萨斯—洛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德裔人口、大多数的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德裔人口、来自波兰的一半和来自其他地方的极少数的德裔人口。这显然是一个自我选择程度极高的德裔人群,高度并较早地忠心于作为民族主义的激进形式的纳粹主义,早就准备不遗余力地给予其支持。在稍轻的程度上,这也似乎符合我样本中的大多数奥地利人的情况。所有人都像是真的和多少被封闭起来的纳粹。

这改变了余下的在国外等着解放的 108 名德裔样本(排除奥地利人和苏台德人)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他们的比率低得多,尽管还是很高,为 1.5。他们更年轻,具有较少的纳粹或暴力经历,绝大多数是拥有较低的战时军衔的工人。他们中有 70 人在集中营工作,几乎都是担任普通卫兵(有些到战争结束时成为中士)。对他们的判决低于样本中的平均数。他们被招入参加种族灭绝似乎是更偶然的。极少数人能有资格参加国防军,但他们可以到党卫军中服役,更可能被卷入谋杀行为。党卫军试图通过种族纯洁性(经常用德语流利程度衡量),通过技术以及通过政治可信赖性来对他们进行甄别筛选。然而极少数人是纳粹,因为大多数被解放的德裔社区是地方导向的,对他们属于哪个国家相对不太感兴趣。他们在解放时面对的主要的选择是被征招进入帝国劳动(不比强征劳动好多少),充当从斯拉夫人那里抢来的农庄上的殖民主义者(诱人但是危险),或者自愿加入党卫军——如果分派到纳粹党卫队第一线就是危险的,但如果分派到集

〔7〕 这些发现解决了我曾担心的一个潜在的样本偏差——德裔也许更容易受到战后起诉和严厉惩罚,较少受到战后德国社会支持网络的保护。

中营就舒服了。健康与体力通常决定这两个分派中的哪一个会发生；在前线受伤有可能导致被转移到集中营。这些选择过程似乎产生了这些地区一群相当有代表性的健康状况较差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可用于帮助实施种族灭绝（康加西和斯托克韦尔，1980；卢曼斯，1993）。

227 大多数人起初被分派到远离杀戮的底层工作，尽管有些人成了街区指挥官。这个组中产生了很多战犯。在较小的集中营中，德裔执行各种“肮脏”任务，包括谋杀。幸存的囚犯能回忆起德裔卫兵与德意志帝国军士之间的紧张关系，后者瞧不起他们粗俗的德语和粗鲁的农民生活方式。因而，在波兰的战争罪审判过程中，证人描述德裔的词语各不相同：有些人据说比较宽容，对囚犯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只在其上级在场的时候才辱骂他们。有一些人甚至还暗中帮助波兰人。其他人则表现非常残忍，但是他们的暴行似乎较少根植于以前的纳粹主义，而更多地源于党卫军给予他们的自由：让地方阶层等级制度倒转，然后杀气腾腾地转向波兰军官和犹太商人以及以前将他们差来遣去的职业人士。所有这些都产生了东欧德国人特有的积极性。

在德意志帝国人当中，种族主义也是很重要的。毗邻于失去领土的地区、1918年后被协约国占领或非军事化的地区出了最多的施害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东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和（部分的）巴登/萨尔/莱茵河—法尔茨等也是这种情况。通过将德裔排除，我们可以将他们比作其他的德意志帝国人。地图中的第二套比率表明是否每一个地区只在德意志帝国人中占比过高。这使得莱茵兰的比率被推升到1.0以上，东波美拉尼亚和东勃兰登堡刚好到1.0。注意对所有边境地区来说，更靠近德国内部的区有一个明显的低比率。德国内陆提供了更少的施害人：只有德国的两个中心城市占比过高：不来梅和奥斯纳布吕克。相反，东普鲁士人和上西里西亚人，实际为外国所包围，却占比很高。东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相等，而下西里西亚人和萨克逊人则占比不足（证实了苏台德边境地区似乎没有产生过一种威胁感）。

这张图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实际上所有失去领土和受威胁的边境出的施害人都比应有的比例高。西部德裔占比最高,难民比被解放的德国人占比高。地方上对“一战”后他们觉察到的德国人待遇的愤怒,而不是地方反犹主义的强烈程度,才是导致谋杀性纳粹主义的主要因素吗?研究结果支持上一章提出的意见:大屠杀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恶化的种族帝国主义,不管地方反犹主义感情可能又添加了什么具体的刺激。

但是另一个惊奇是苏台德地区。难道是因为战争期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对待它的德裔少数派很好吗?它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加民主,德国人比在其他地方被给予了更多的地方自治和集体权利。虽然三分之二的德裔选民支持1935年的民族主义苏台德德国党,但这仅仅使得他们随后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框架内寻求更多的权利。当希特勒来了之后,不到2%的苏台德人在纳粹党中(科姆贾西和斯托克韦尔,1980)。捷克在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rienstadt)的卫兵已被认为是集中营工作人员中最温和的。我的样本中极少数的苏台德人主要是征招进入党卫军担任集中营卫兵的工人。对他们的审判要低于样本平均数。也许更高层的苏台德人和苏台德纳粹还在适应统治他们的地区,所以不太容易被诱惑进入种族灭绝机构。

当我分析我的集中营在册军官和保安处类似样本的出生地的时候,我都没有得到这样惊人的发现。来自国外的德裔人口的比例大量减少。只有很小的西部难民群体(以那些来自阿尔萨斯—洛林的为主)依然超出占比。奥地利人和来自波兰的德裔以与他们大约相称的恰当比重出现在党卫军保安处里;其余的德裔严重代表不足(占比过低),就像那些在东普鲁士的最暴露的边境地带的德国人一样。在德意志帝国人当中,两类军官有点差异。集中营军官大量来自国家南部,特别是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州。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男人是唯一大量占比过高的北方人。在党卫军保安处中,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州和新教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大量占比过高,而国家中部(新教)带就没这么厉害——但是没有其他明显的差异。似乎集中营军官大部分是南方的,尤其是巴伐利亚州,而党卫

军保安处(尽管当中有些小的偏差)更能代表德意志帝国人。

要记住,这两个类似群体是由占压倒多数的从未被交付审判的人组成的。许多的保安处军官——甚至一些集中营在册军官——可能从未犯下过可被控告的罪行。虽然这些党卫军军官凭他们战时的职业几乎不能被当作是普通的德国人,但作为群体他们比我的样本远远更少地沉浸在谋杀行动当中。他们也许并非不能代表加入党卫军的德国人:忠诚的纳粹,但未必一定有谋杀意图。因此,党卫军整体上是带点南方及巴伐利亚州特征,但从其他方面看相当能代表德意志帝国。它很可能缺乏由失去领土和受威胁边界的经历带来的杀气腾腾的凶残。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转回解决由巴伐利亚州提出的特殊问题:宗教。

核心拥护者:叛教的天主教徒

巴伐利亚人在施害人和在全体党卫军当中占比过高——特别是来自上巴伐利亚的那些人(包括慕尼黑)。他们是不具威胁的瑞士人、苏台德人和奥地利人的邻居,而且肯定不会害怕他的邻居们。但这些地方是天主教占绝大多数的地区。是天主教产生了党卫军和施害人吗?图 8.1 还标出了德国天主教徒超过 80% 的区域。这些地方比邻近的新教地区提供的施害人更多,尽管这种情形变得与受威胁的边界施加的影响有点相混淆。因此,上西里西亚似乎要比下西里西亚更受威胁,但它还是十足的天主教,不像下西里西亚。南巴登和莱茵兰部分地区也可能把威胁与天主教混为一谈。

表 8.3 纳粹施害人:出身家庭宗教和出生地宗教普查区

	家庭宗教			出生地宗教			
	新教	天主教	数量	新教	混合	天主教	数量
在整个样本中占百分比	54	46	338	39	30	31	1519
在德裔样本中占百分比	37	63	95	38	10	52	394

(续表)

	家庭宗教			出生地宗教			
	新教	天主教	数量	新教	混合	天主教	数量
在德意志帝国人样本中 占百分比	61	39	243	39	37	24	1125
在德意志帝国总人口中 占百分比 ^a	66	34		51	29	21	
各个宗教在德意志帝国 人样本中与在德全人口 中的份额之比 ^b	0.95	1.21	243	0.78	1.29	1.15	1125

a 本行数字和城乡出生地来自 1933 年帝国普查 (Statistisches Reichsamt, 1935)。德国人中新教和天主教之外的信仰不在计算之内。

b 就是说,施害人中该宗教的百分比与该宗教在所有德意志帝国人中的百分比的比率 (1933 年普查)。几个高于 1.0 的比率表明这个宗教在施害人当中的占比过高。一个超过 1.0 的比率表示施害人在那个职业部门的占比过高;小于 1.0 表示占比不足。整个劳动力部门分配数据来自 1925 年德国普查。

表 8.3 把普查出生地分成 80% 以上新教、80% 以上天主教和混合宗教区。新教区占比过低,天主教和混合宗教区占比过高。然而结果可以略去地方和宗教的影响。在主要样本中大多数新教徒占主导地位的省占比偏低,而在所有样本中单是巴伐利亚州就占了天主教为主地区的三分之二。只有四个省份有很多天主教地区,又有混合宗教的或新教的地区。在三个地区中(巴伐利亚州、西里西亚和莱茵兰——但不包括威斯特伐利亚)新教区提供了合乎比例的较少的施害人,尽管数字有时较小(阻止了对我的两个类似样本的进一步分析)。无论如何,也许来自天主教地区的施害人实际上是从新教人口中抽取的,他们由于天主教的霸主地位而颇感怨愤。

230

表 8.4 纳粹施害人:城乡出生地

	城市: 100000 +	镇: 2000 - 100000	乡村:低于 2000	总数
在全部样本中占百分比	35	33	32	
在德裔样本中占百分比	31	31	39	100
在德意志帝国人样本中 占百分比	37	34	29	100
在德意志帝国全部人口 中占百分比	31	37	33	100
德意志帝国人样本与德 意志帝国全部人口之 比率	1.20	0.093	0.88	
样本 N	517	490	465	1472

因而表 8.3 中的第二个衡量指标就更直接,即施害人自身家庭的宗教。这个数据只有主要样本才有——实际上仅占它的 22%。但是,在这个群体中,天主教徒事实上占比过高。他们得到的严厉判决也更多:56% 的人被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而新教徒只有 52% (一半这样的差异是由于外籍德裔身份)。这些发现为拉西克基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结论提供了初步的支持。天主教徒——实际上,很可能是离经叛道的天主教徒——似乎更可能成为施害人,颠覆了在主要为新教徒的前政变纳粹中发现的模式。然而如果有更多的样本数据的话,这个结论就有更坚实的基础。进一步的直接研究或可克服这个问题。

这样的发现可能是插入变量的产物。所以,在表 8.4 中我考虑了城市化、种族—宗教少数派的存在和制度性的偶然因素。我们看到德国的天主教、巴伐利亚和受威胁的边境区并没有因为城市—乡村差异而提供更多的施害人。虽然施害人来自于大城市的比重要比全体德国人中大城市人口比重稍微高一点,但受威胁的和天主教的地区实际上提供了同样比例的大城市施害人,同时比不受威

胁地区提供了更多的乡村施害人(32%对25%)。集中营军官(样本1a)乡村的多一点,而又一次党卫军保安处军官(样本1b)更接近于整体的德国标准。这与布劳德的发现(1996:135—136)即战前党卫军保安处军官来源于大城市的特别多的结论不同。但是好像战时的保安处军官往往是由那些与大多数德国人无甚不同的人担任,而集中营(包含更坏的暴行)军官的选择则基本上出于在实际战犯中发现的背景偏好。

施害人来自于有更多犹太人的地区也解释不通。在1933年普查中,犹太人只占德国人口的0.7%,因此不可能有很多施害人与犹太人有很多接触。三分之一的德国犹太人住在柏林,在施害人中占比不足。其他人大多数以较小数目分散在全部大城市中。虽然许多犹太人住在西里西亚(占全部犹太人的7%),但绝大多数是在下西里西亚而不是上西里西亚——与施害人的分布情况相反。除了东部的德裔人口,我样本中的很多人在开始屠杀他们之前从未遇到过犹太人。斯拉夫人明显出现在东部德裔人口和东普鲁士德裔的生活中。但在帝国东北部的其他地方,施害人占比不足。我不了解吉卜赛人的分布情况,但这样一个小的群体不大可能影响了许多德国人对纳粹的支持态度。

这一模式难道只是一种地理位置的偶然吗?也许是因为行政上先安排了在天主教地区选择种族灭绝机构安放地点,然后才雇用地方劳力来充实它们?在前面一章我指出T₄医院位于南边的天主教地区。然而绝大多数杀戮机构将他们的员工运送到更远的地方。实施种族清除的主要集中营大多在德国境外的东北欧,远离巴伐利亚州和西南部。一些集中营里面部分员工是当地德裔。然而奥斯威辛是在波兰,这里当地德裔人口大都是新教徒,而员工主要是天主教徒。事实上,第二个地理位置的偶然将说明我的结论实际上少算了前天主教徒施害人的数字。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法庭不愿意起诉纳粹已臭名远扬,而新教城市如汉堡、法兰克福和多特蒙德是最热心的。假如审判是在德国和奥地利境内均匀安排进行的话,它们将会

产生一个包含更多前天主教徒的样本。〔8〕

整体看欧洲,天主教是与保守主义政治特别是与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天主教教会偶尔会对纳粹作出反抗,但正如批评家指出的,这通常是为了保护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受害人的生活。也许前天主教徒在一开始就被经过训练适应了天主教中某些反动的反犹主义内容,然后就拒绝将教会视为一种机构了。但这是推测。我更喜欢第7章开始的较少的直接解释。一个维也纳—慕尼黑轴线提供了纳粹主义大多数的早期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奥地利特色的反犹主义。这保留了旧哈布斯堡王朝大帝国民族主义理想的领土野心(一个单一帝国中向东倾斜的所有德国人的联盟),而同时把它从文化—政治联盟改变成一个民族—种族联盟。这些纳粹攻击哈布斯堡的多族性和犹太人的世界主义。

在20年代末后期和30年代早期,德国与奥地利纳粹主义开始分离。德国的右派观点,包括纳粹主义,变成以新教为主,他们追求领土范围更小的帝国,将精力用于对付魏玛德国的内部敌人,尤其是共产党。但是1936年,莱茵兰被再次占领,帝国的内部敌人被击败,一大批奥地利纳粹难民进入德国。希特勒此时试图利用苏台德问题,将它与东部的生存空间联系起来。纳粹政权还害怕冲锋队激进主义的破坏性影响——它现在缺乏一个明显的敌人来发泄它的暴力。因此,纳粹主义作了第二次转向,回头转向东南。它强调了大德意志和种族的理想。他们以日耳曼种族优越性的名义来为扩张行为辩护,其中反犹主义、反斯拉夫主义和反布尔什维主义起到了强大的作用。纳粹种族灭绝在更加具有大德意志东倾情绪的前天主教教徒中引起了反响。

因此,作为难民的德裔人口和来自受威胁边界、天主教和奥地利—巴伐利亚地区的那些人都越发可能成为施害人,因为种族灭绝是从他们的种族性的大德意志帝国主义中产生的。它是种族主义的,因为它是东向的、反斯拉夫的和反犹主义的。犹太人与斯拉夫人

〔8〕 这一点我应感谢克里斯托弗·布朗宁。

因为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理由被谋杀。他们据称是挡住了德意志民族争取团结和扩大权力的道路。这是从整个地区的纳粹意识形态的响应而非单从它的反犹主义成份来解释施害人的地区性偏向。

核心拥护者：下层社会冲突

表 8.5 包含的仅是经济部门中男人的数据。少数妇女大都在轻工业(通常纺织业)、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商店、旅馆或咖啡厅中工作。

这里的比率极其不平衡。那些以前在农业或工业部门工作的人严重占比过低。样本中仅有很少几个体力工人的事实无法解释这一点,因为工人占到那些从事建筑业、服务贸易(如交通、商店、旅馆和餐饮等)和军事/警察/监狱的人员的一半以上——在所有这些行业当中施害人都占比过高。在战争期间,重要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工人与管理者都被免于兵役,不过到这时大多数施害人都已经开始走上令他们恐怖的工作岗位。而尽管样本是过多的中产阶级,但商业(商人、银行、保险等)并未占比过高。这些结果支持我的更加一般的证据(见我的《法西斯主义者》,第 5 章),纳粹的魅力部分地在于以民族—国家主义超越阶级冲突的表述:纳粹得到了所有处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主要冲突区域之外的那些阶级的支持,他们赞同这样的观念,即一个强大的国家应该用武力使双方明白恢复民族不可分割的统一道理。

233

表 8.5 纳粹施害人:样本中职业部门的占比过高和占比不足

职业部门	比率:整个样本	比率:仅限男人	在整个样本中占百分比
农业、森林业	0.20	0.21	6.24
重工业	0.49	0.51	7.46
轻工业	0.46	0.43	7.89
建筑业	1.25	1.31	6.68

(续表)

职业部门	比率:整个样本	比率:仅限男人	在整个样本 中占百分比
交通、商店、旅馆、 咖啡厅	1.66	1.54	6.16
商业	0.96	0.98	7.20
教育	5.52	5.51	6.24
卫生	10.74	9.38	13.53
民间政治集团	5.54	5.74	12.92
军事、警察、监狱、	5.57	5.80	22.92
法律	9.94	10.50	3.38
总数或%	1153	1091	100.00

注:超过1.0的比率表示在那个职业部门中占比过高;低于1.0表示占比不足。整个劳动力部门分配数据来自1925年德国普查资料。

职业人士与公共部门占比特别高。那些在教育 and 媒体部门的人几乎都是教师。法律界的都是律师,在卫生部的包括许多医生。这些都是产生了许多纳粹的职业(贾劳施,1990;普罗克特,1988:66—67),他们与德国社会特殊阶层或政治集团紧紧缠绕在一起。大多数律师在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与警察有密切联系。反过来,62%的作为大学毕业生的纳粹秘密警察曾学过法律(巴纳奇,1978:79)。绝大多数医生曾在公共医院工作。这些机构充斥着纳粹,他们被委以种族灭绝中的关键角色。

政治集团中的平民和军事/警察在施害人当中都占比过高。也许我们会以为纳粹政治集团中会有雇员出现在施害人当中。然而公共部门中没有出现过重大清洗。一次都不需要,因为政治集团一直都是威权主义观点,以及纳粹主义的发源地。超过四分之一的阿贝尔的纳粹激进分子样本(默克尔,1975:50—61),超过三分之一的纳粹秘密警察(巴纳奇,1998:42)以及超过一半的党卫军高级军官(韦

格纳,1990:240—241)具有军事或文职部门背景。威权主义倾向的文职官员很容易(如果起初是暗中的话)支持纳粹主义(卡普兰,1988;莫姆森,1991)。纳粹主义似乎基本上证明了(它是这些民族自己的国家主义观念的十分合宜的延伸(正如布朗宁1978年就外交部所指出的)。职业及文职部门的重要性也解释了施害人为何受过如此程度的教育。

所有这些比例都表明施害人中的绝大多数是从核心纳粹拥护者中抽取出来的。极少数人来自农业和工业——有组织的阶级冲突和左右两翼正宗党派的主要发源地。远远更多的个人是选自建筑、服务部门和政治集团;远远更多的中产阶级人员来自现行国家部门的职业。是否这些部门中的某些部分战争服务义务较轻,更容易被招入党卫军?这是可能的。但是他们甚至在纳粹1933年上台之前都已经是核心纳粹拥护者了。这些人来自最有可能被纳粹极端民族—国家主义吸引的部门:倡导建立一个通过镇压阶级政治和种族冲突以提高民族有机团结的强大国家。这些是希望民族胜过阶级的核心拥护者。

种族灭绝因明显的理由吸引了某些行业的人。大多数保安处施害人是职业警察;许多的特别行动队和某些集中营人员也是。凭借他们在抓捕、审问和恐吓罪犯和极端分子方面所受的训练,警察相对更加坚强,拥有对种族灭绝计划有用的技术。如果我们把警察从“军事阶层”类别中排除出去,余下(大都是军事人员)所占的比率即下降到1.65。医生也被卷入T₄和集中营中的实验和筛选;公诉律师、警察和文职官员一起组成了绝大多数的特别行动队军官。但是,又一次,这些不是人工制造物,而是纳粹种族灭绝的真实特征。施害人在种族灭绝发动之前已经对有利于用身体、法律和生物手段解决社会弊病的制度性和职业性亚文化有了很深的印象。通过利用这样一个积极主动的核心拥护群,纳粹能够更加容易地完成种族灭绝。

纳粹暴力职业

235 我用五个指标衡量以前的纳粹主义或暴力水平。^[9]首先我将样本分成三个年龄组。那些出生在1901年之前的人可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指标1)和参加过自由军团民兵组织(指标2)。指标3根据年龄和他们加入纳粹党的年份将他们分为纳粹、冲锋队或党卫军。除了16个人以外,其他所有的德意志帝国、奥地利和难民中的男人都至少是其中之一的成员——表示至少对纳粹主义具有基本的支持。第二个年龄组,出生于1901年至1912年间的男人,几乎都是年纪太轻无法参加战争或战后自由军团民兵组织的,但他们可能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前加入了纳粹组织。1933年前就加入的被称为老纳粹。第三个年龄组出生于1912年之后。其中,那些在1933年之后加入的25岁以下的被称为年轻纳粹。1933年到1938年间加入的岁数更大的人(亦即纳粹已在台上之时),我称之为见风使舵的纳粹。从1939年起加入战时纳粹,也许是出于简单的爱国动机或者是不成熟(比如说,加入党卫军是因为他们的制服传达出的那种强大的感觉或加入纳粹党是因为某某的伙伴是当中的成员)。少数在战争期间加入的青年人被称为新纳粹(Raw Nazis)。我假定老纳粹与年轻纳粹比其他人更加接近真正的纳粹——尽管很明显,全部五种类型已包括了各种特点的纳粹。

衡量指标4指出了至少战前三年已在组织中正式工作的那些人——一个衡量纳粹封闭化的指标。指标5指出了犯有战前严重身体暴力或在战前有被当作特别狂人的纳粹分子记录的那些人。我的样本中只有一半的人有这方面的信息。在这784人当中,101名卷入了战前暴力,81名在资料中被特别作为意识形态狂热分子标出。暴力意味着(即在组织内部)某人在街头打架或战前集中营中表现突

[9] 因为被德国军队解放的妇女、苏台德人和德裔在这些指标上得分极低,我已将本部分的分析范围限于德意志帝国、奥地利和难民中的德裔男人。

出,被安排参与像罗姆清洗或“水晶之夜”这样的谋杀性暴力行动,或者在战前纳粹记录中被描述为凶狠或被某些其他人用委婉的词语描述为像赫尔曼·弗洛斯泰德(其酒后街头打架使他持续不断与警察发生冲突)或者海因茨-卡尔·范斯劳(其在勒姆清洗中至少杀死过一个人)。狂热分子要么被描述为要么被记载着发表过极端的言论,像拿集中营孩子做实验的医生库尔特·海斯迈耶,宣称“犹太人与实验品”没什么区别;或者像恩斯特·温曼,30年代被描述为一个“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这些指标提供了纳粹激进化的发展顺序和升级过程。不过,虽然组织成员地位几乎总是被记录下来,但关于任何暴力或狂热主义的证据只有一半的样本具备。如果他们是纳粹党或党卫军成员的话,也许施害人更可能被起诉并最终出现在我的样本中。纳粹成员地位和激进主义是战后审判的重要证据,而同盟国认为党卫军是一个犯罪组织。党卫军也更易在1945年被逮捕,因为他们带着暗示有罪的党卫军身体标记。然而我没有看见作为党卫军成员对裁决起决定意义的那些审判,尽管确实有时影响了判决的严厉程度。因此本样本的偏差可能并不严重。

表 8.6 按顺序给出了结果,表明拥有早期经历同时拥有后期经历的男人的百分比。更早的经历出现在表的左侧,后期经历出现在右侧。起始点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我的 1875—1900 年间出生在德意志帝国的男人样本中,89%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百分比与布劳德(1996:138)的党卫军军官样本中的百分比相同,但明显高于全国 81% 的平均数(温特,1988:27,30)。从它本身而言,它可能仅仅表示某种高涨的爱国主义。然而对一些人来说,军事价值观很快就变得激进化。在 1901 年前出生的德国人中,30% 的人是在战争之后才参加自由军团(30% 的奥地利人和 24% 的出生在 1901 年到 1904 年间的人也是如此,年纪太轻不能参战)。全部幸存下来的 1110 万德国老兵中只有约 3.5% 的人能够在自由军团中服役。因此,我样本中的许多年龄较大的施害人在成为纳粹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就已经从事过政治杀戮。

236

237

表 8.6 分年龄组纳粹主义和暴力职业(仅包括德意志帝国,奥地利帝国,及德裔男性难民)

	“一战”老兵?	参与自由 军团?	纳粹类型	专职纳粹?	战前暴力 或极端主义?	人数
1900年或以前出生	否 11% 是 39%	否 70% → 是 30% →	老纳粹? 否 43% → 是 52% ↘ 全是 57% → 是 68% ↗	否 45% → 是 34% ↘ 全是 55% → 是 71% ↗	是 43% ↘ 全是 40% → 是 37% ↗	282
1901—1912年出生	否 98% 是 2%	否 91% 是 9%	要么老纳粹 要么年轻纳粹? 否 29% → 是 69% 全是 71% → 是 81%	否 41% → 是 43% ↘ 全是 59% → 是 69% ↗	是 39% ↘ 全是 37% → 是 35% ↗	332
1913年以后出生	否 100% 是 0%	否 100% 是 0%	年轻纳粹? 否 36% → 是 64% →	否 51% → 是 4% ↘ 全是 49% → 是 74% ↗	是 25% ↘ 全是 29% → 是 31% ↗	78
全部样本			是 65%	是 55%	是 37%	692

注:箭头表示有一种经历的施害人群体向后面一种经历的运动。因而,“是50%”到“是20%”表示在适用于第一个指标的个体中有20%也属于第二类。“全部是”因此就是某个指标对其适用的人的总数。数量(N)表示每个队列中所有资料都有的个人的数目。

我的自由军团老兵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后来在1933年之前进入了纳粹组织。在三个年龄组中,57%、71%和64%——总体为65%——是老纳粹或年轻纳粹。这些人中的71%和整个群体中的55%后来进一步成为职业纳粹。因此大多数人对纳粹主义都表现了相当的信奉,而每一个阶段超比例的份额都是来自已经经历过早期暴力或纳粹活动的人。这些都是表示纳粹主义激进化职业生涯的符号。当我们到达暴力或狂热主义指标时,这个模式多少有些改变。只有37%的人在这里得分为正数,而在三个年龄组的两个当中,暴力狂热分子成为职业纳粹的可能性稍小。也许存在两条完全不同的通向种族灭绝的道路——专职投入和暴力介入或狂热主义。

所以用这些指标衡量,大约三分之二的帝国、奥地利和德国男性难民可能被大致地算作战前真正的纳粹,有刚刚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有战前暴力或明显的狂热主义记录。这些人战后受到了更重的判决。T₄人员和所有医生一般较少有纳粹记录,但他们开始较早,在种族灭绝机构中服役更长。因此,封闭的职业生涯是常见现象。

表8.7显示了一种清晰的意料之中的与军衔的关系。几乎所有那些享有最高军衔的人都是老纳粹。超过一半的士官和军士(NCO,非委任无军衔的)是在战争期间加入的。大多数军士是老纳粹或年轻纳粹,大多数士兵和军官是战时纳粹或新纳粹。等级制度再一次证明是重要的:那些发布命令的人是时间更久的纳粹。表8.8包含比表8.1多一倍的施害人的信息,显示了跨三个年龄组中少了6%—11%的老纳粹或年轻纳粹的情况。也许我那些资料最全的纳粹乃是最坏的纳粹。如果是这样,我对那些大致算是真正纳粹的估计数可能要稍微减掉一点,降到55%—60%之间,其中三分之一要加上以前的暴力或狂热主义。表8.8还表明老纳粹占了样本的44%。成熟的战时纳粹占29%,而新纳粹非常少(绝大多数是被解放出来的德裔和妇女)。我们还看到一个以真正纳粹为主的样本,大都恰恰封闭在逐步上升的暴力的生涯中。事实上,只有约10%的施害人有任何作为左翼自由主义或中间党派的成员或支持者的历史记录。毫无疑问,更多的人曾投这些党的票,而有些人暗示(尽管仍然很少)他们的

父辈家庭也持这样的支持态度。在主要的魏玛党派中,只有右翼的德意志国家人民党曾产生了许多施害人。这意味着整个德意志政治生活领域相对未受到战争罪的影响。法西斯主义者和他们的右翼支持者犯了严重的战争罪行。

表 8.7 分军衔纳粹类型(仅包括德意志帝国,奥地利帝国,及德裔男性难民)

纳粹类型	军衔或相等职务					人数
	军士及 以下	中尉、 上尉	少校到 陆军准将	陆军少 将以上	全部 军衔	
老纳粹:1933年前加入	21	43	54	70	44	584
年轻纳粹:1933—1937年 加入,年龄25岁以下	15	17	10	-1	12	161
见风使舵的纳粹:1933— 1937年加入,26岁以上	11	16	17	9	14	181
新纳粹:1938年以后加入, 25岁以下	4	1	0	0	2	20
战时纳粹:1938年以后加 入,26岁以上	49	23	16	21	29	387
总比	100	100	100	100	100	
人数	378	410	326	219	1333	1333

注:以日期与年龄衡量的纳粹加入了第一个成年纳粹组织(纳粹党、冲锋队、党卫军,或在另一个国家的纳粹前线组织)。

表 8.8 分年龄组纳粹类型(仅包括德意志帝国,奥地利帝国,及德裔男性难民)

	1900年 出生	1901—1912 年出生	1913年后 出生	所有年龄组	人数
老纳粹	48	47	18	44	589
年轻纳粹	0	14	40	12	164
见风使舵的纳粹	21	12	0	14	182
新纳粹	0	0	13	1	20
战时纳粹	31	27	30	29	386
总%	100	100	100	100	
人数	450	732		1341	1341

结论

这些发现指向同样的方向:这些核心施害人绝大部分是从核心拥护者中选取的。他们很少来自农业和工业部门——这是阶级冲突胜过民族主义,有正统的左翼和右翼党组织的主要部门。更多的工人来自建筑服务部门和政治集团;更多的中产阶级来自职业部门和政治集团。实际施害人——不是整体的集中营军官或秘密警察——大量的来自失去的领土或遭威胁的边界。施害人来自最有可能被激进化纳粹主义吸引的部门和地区。这表明大多数施害人很可能是意识形态杀手——尽管这样一种动机又被其他因素强化,这在下一章会有探讨。很多施害人在被要求实施种族灭绝之前已经处在倾向于用严厉的身体上、法律上和生物学上的方法解决社会弊病的制度性和职业性的亚文化之中。将近三分之二的样本已经有过在逐级上升的暴力和纳粹主义中的成熟经历。纳粹分子通过这样一群由意识形态的和暴力的野心家组成的核心,恐怕能够更容易地实现种族灭绝。我将在下一章更详细地考察他们参与暴力和纳粹主义的经历。

第9章

纳粹Ⅲ：种族灭绝事业

240

上一章将施害人作为从制度环境中抽象出来的个人统计学样本,然而为了理解纳粹种族灭绝的过程,我们必须研究约束其成员的机构和容许他们投身的事业。一些人认为纳粹种族灭绝是高度制度化,甚至是官僚主义或行政性的。鲍曼将现代性与大屠杀联系在一起,是以技术和应用的理由为根据的:

选择身体根除作为清除任务的合适手段是例行公事的行政程序的产物:手段—目的的计算、预算平衡、统一规定的运用。(1989:17)

范戈尔德详细阐释了这一论点:

最后解决方案标志着欧洲工业体系走上歧路的历史关头……奥斯威辛是现代工厂制度的世俗的延伸。它不生产物品,原材料是人类,而终端产品是死亡。每天有那么多生产单位仔细地标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烟囱,现代工厂制度的象征,排放着由燃烧的人肉发出的刺鼻烟味。天才般地铺设起来的现代欧洲铁路网将一种新型的原材料运往工厂。这与运送其他货物并无二致。在毒气室,受害人吸入由氢氰酸药丸产生的有毒气体,后者是由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生产出来的。工程师设计了焚化炉,管理者设计了一种让更落后民族羡慕的以热情与效率运转

的行政制度。即使是总体计划本身也反映了已走上岔路的现代科学精神。(1983:399—400)

这就是具有行政现代性——种族灭绝的平庸性——的大屠杀。实际上,备忘录、清单、交通运输时刻表等等都极少提及死亡——有时会有“最后解决”,更多的是“撤空或清除”、“特别待遇”、“特别行动”、“重新安置”或者“东部的劳动力”。备忘录记的是犹太人的移动方向,他们的财产、他们的衣服、他们的头发、他们的牙齿;但是刻板的语言似乎在表达一家将产品送往欧洲各地的大型运送公司——不需要提供意识形态理由。仓库工人与交通管理员需要意识形态吗?他们需要解释他们的行为吗?不——这是他们正常的工作流程。因此,备忘录似乎是由普通的行政办事员和管理人员写的,没有动机,不具意识形态。

241

但平庸只是幻觉,不是现实。书面文件被刻意排除了谋杀性语言以便隐藏大屠杀(事实)。绝大多数根除机构既不是行政官僚性的也不是客观公正性的。确实,德国是一个处于十分有效率的统治下的发达社会,有一支效率很高的军队。显然,它使用了铁路、书面作品和现代武器、IBM 何勒里斯机器和穿孔卡片、最新的办公室技术、可储存的野营生活录音。然而外国协作者——罗马尼亚与克罗地亚的法西斯主义者,几乎以毁灭性的效果运用原始技术,如克罗地亚乌斯塔沙用锤子和铁锹将成千上万人砸死;他们把数十万人沿山脊边沿推下去,用(现代)集束达纳炸药连续朝下面扭动着的身体扔过去以杀死他们。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土耳其早前曾用刀、斧和枪栓式来复枪来获得同样的效果。我们在第15章的卢旺达看到最快的种族灭绝——12个星期超过50多万人——主要是用大砍刀和锄头完成的。每一个施害人群众都运用了所能找到的最高水平的现代工具与技术。这是鲍曼和范戈尔德论点中的唯一的真理。

而且十分平庸的、刻板的方法甚至在德国人当中也不占主导地位。战前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在毆人致死方面比在射击技术方面受过更多训练。安乐死项目确实始于十分冷静、理性和科学的杀

戮安排,与现代主义梦魇一致。然而当它发展到对所有病人都无所顾忌地施行残忍杀害而不管任何真实的诊断实情时,所剩的行政特色便是持续不断地讲给外部世界的谎言——伪造的不可治愈的精神病诊断、伪造的死亡原因、胡乱弄来送给亲戚的一罐灰烬等等一整套名堂。随着病人对可怕的真相的发觉,尖叫着、挣扎着和不能自制的受害人搅扰了所有的平静。然后由特别行动队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射击开始了——由士兵对 100 多万毫无防备的受害人的近距离齐射、血腥四溅的屠杀。手枪、卡车、火车和收音机确实是现代的,但这不是公正、科学、平庸或行政的杀戮。

五个死亡集中营,尤其是它们的毒气室,组成了现代主义梦魇的核心。然而它们并不是非常高技术的。齐克隆 B(Zyklon B)气体是德国惯用于根除昆虫和鼠类的工具。内燃机是由熟练电动机械师在取得学位的化学师、合格的技术员——而非好高骛远的人——的帮助下制成的。确实,欧洲范围内的受害人归集和分配系统体现了一套惊人的行政办事效率。它的核心具有讽刺意味地处于福利国家的行政系统。德国、比利时、荷兰和其他国家的福利享受条件的记录提供了姓名、地址和宗教,从而使犹太人被确认或找到。

242

然而实际杀戮并不是依行政来办事的。在死亡集中营中,尖叫、光着身、染着血、下身还排着便的囚犯在令人作呕的一团烟雾中,被喝醉了的士兵用鞭子和来复枪枪托一路抽打着赶向毒气室。施害人并未与恐怖场面隔绝,从而免受影响,他们(及所有参加杀戮的人)只是喝下了大量烈酒。铁路员工亲眼目睹了殴打致死的场面,而清点财产的员 工则看到了血、头发和牙齿。司令部人员被隔开——所有历史上的大屠杀领导人的传统特权。大多数随意谋杀、残酷殴打、折磨致死、放置不管,以及现代特色的挨饿(尽管致命注射可送人性命)并非只发生在 1000 个非死亡集中营。战犯法庭的被告经常将他们的角色比作同盟国的战斗机驾驶员。空中轰炸确实是一种处于隔绝状态下的现代主义形式的大规模杀戮,通常看不见受害人,平常很容易完成。但是绝大多数纳粹杀戮不一样,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海德里希在 1941 年给国防军的杀掉被俘的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命令

中这样写道：“东部战役的特殊形势要求采取特殊措施，必须以一种不受行政管理制影响的精神以及一种承担任务的迫切性去贯彻执行。”（纽伦堡军事法庭上的战犯审判，1946，特别行动队卷宗，第4部分，127）所有对纳粹在东方杀戮的个案研究都突出强调了不受行政限制，能够发挥自己主动性的地方当局的角色（赫尔伯特综述，2000）。这根本不是行政做法。

甚至办公桌杀人者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认为他们这样做有正当理由。他们的动机是多样的——追名逐利、害怕权威、伙伴间保持一致、享受自裁权力、对犹太人或斯拉夫人的偏见观念、总体上的纳粹意识形态。这当中大量涉及意识形态而不是现代技术。鲍曼的理论建立在韦伯的工具或技术理性之上，这是错的。韦伯的价值理性行动——信奉绝对观念——更加恰当。纳粹认为他们是因为正当的意识形态理由而根除他们的敌人。现代性之恶比行政主义和不带感情更加具有意识形态性、更加充满血腥。行政主义国家不进行谋杀性清洗，激进化国家才这样做。

事业路线之一：精英办公桌杀人者

最高纳粹以及怂恿他们的非纳粹精英拥有特有的前程，享受着不用亲自去杀人的办公桌杀人者的特权。到严重的杀戮行动开始时，纳粹领袖与当初的非纳粹精英已掌权六年有余，他们的合谋已有了足够的时间趋向成熟。但是总的种族灭绝政策是由希特勒的核心集团决定、由几百个党内和党卫军的高级官员执行的。他们实际上全部是老纳粹，1933年前的党员。绝大多数成了意识形态型办公桌杀手，尽管他们不是因为想做大屠杀杀手而成为纳粹，他们是逐步做到的。

党卫军通过一个管理机构，即经济管理总局（WVHA），监督集中营机构，这个机构由奥斯瓦尔德·波尔领导，他直接向希姆莱报告。他来自被占领的鲁尔区，是蒂森钢铁公司下一家钢铁厂工头的儿子，为海军工作；他以一名现代化的管理者闻名，受挫于海军的保守作风，很早即为纳粹的渐进风格的民族主义所吸引。1922年他30岁时

入了党。虽然他是一名凶残的纳粹,但他的才能是在组织方面。他将有效的预算控制引进到党卫军中,筹办集中营产业,这使得它们在经济上可以独立而不需要国家支持。强迫劳动营创造出物品和利润。所以波尔喜欢胖胖的奴隶劳力,不喜欢尸体——尽管他从未对希姆莱的根除命令表示质疑。在海军时熏陶出来的忠诚和牢固的党卫军之间的情谊帮助他解决了他的困惑。虽然奴隶与尸体的争论会十分激烈,党卫军全体精英对最后作出的决定承担集体责任。

波尔之下有三个集中营监工。我在第7章描述了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缪勒。理查德·格吕克斯也是来自被占领区鲁尔。他在自由军团中服役,1926年成为一名纳粹,30年代为集中营管理处的艾克工作。他成为一名根除狂热分子,决定在每一个地方要杀的人数,但不想知道太多关于杀戮的事。杰哈德·毛勒是一名萨克森商人,1928年成为纳粹。作为强迫劳动营的总管,他喜欢劳力胜过尸体——尽管他从未将他的观点带到公开辩论中去。除了缪勒,这些领导人都是早期纳粹。他们的忠诚是意识形态型的,但显得抽象和过时。这些纳粹组织中的人正在从他们的办公桌上实践一种被清洗过的帝国的理想理念。因不用接触死亡的腐味,他们觉得意识形态上的要求不难遵守。

其他的党卫军种族灭绝的主要机构是它的治安机构,帝国中央保安局(RSHA)。恩斯特·卡滕布伦纳接替了海德里希担任主管。他被选上是由于他与希特勒的奥地利渊源,他为人严厉的名声,也是因为他不要政治欺骗手段,对上级不构成威胁。他的极端主义和反犹主义是从他父亲那里学的。因为个子较高,年轻的卡滕布伦纳从身体上欺侮赤色分子、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他似乎相当普通,是一个模范丈夫,他是以律师身份开始了他的充满希望的事业。他1929年26岁时加入奥地利法西斯分子保安团(Heimwehr),次年加入纳粹党。他宣称他希望做“百分之百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后,他在1931年加入了党卫军,并以“引人入胜、令人信服的”发言抛出了自己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目的的观点。在被逮捕了几次和被囚禁一次之后,他成为职业革命者。他在党卫军保安处的工作包括对

稳步增加的暴力进行监督,尽管不清楚他本人是否也参与了谋杀。他非常反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对他来说,纳粹主义是“一个涵盖了生活全部的人生观”。种族是“受到神启的人类的基础材料”。在被审讯时,他只承认纳粹主义被“偏差”玷污,以及希特勒犯了地缘政治错误。卡滕布伦纳把自己看作是理想的党卫军“政治战士”(布莱克,1984)。他从参与暴力一直到种族灭绝,始终都相信他的事业的正义性。

绝大多数帝国中央保安局成员不习惯于暴力。他们是同一代人,出生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太年轻而未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一帆风顺,受过高等教育,三分之二有大学学位,三分之一拥有博士学位。绝大多数在大学生时就曾是纳粹或激进右翼分子,1933年前加入纳粹。到30年代中期他们准备按照纳粹种族—国家学说重新改造世界。他们知道需要采取行动,当时机到来时他们极少有人退缩(赫尔伯特,2000:26—27;怀尔德特,2002)。

阿道夫·艾希曼是以善于解决问题而著称的人。他监督将纳粹、军队及平民管理机构与死亡集中营联系在一起的驱逐手段。他在耶路撒冷接受审讯时,精神病专家说他是模范丈夫——“在考查过他之后,我觉得他比我更正常”,有个人这样说。他出生在莱茵兰德,8岁时母亲去世,全家搬到了奥地利。他在初中读书期间以及之后一段时间里做销售员,表现都较一般。1932年他加入了奥地利纳粹党,当时26岁;1934年,在那段非法时期,他听从朋友卡滕布伦纳的建议加入了党卫军。他当时对加入党卫军给出的理由是不公正的《凡尔赛和约》和大规模失业,但是事业受挫其实也是原因。1934年他经训练成为达豪集中营的一名中士,次年进入党卫队保安处犹太部,在此他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专家。他把自己描述为“不感情用事和客观的”人。对阿伦特(1965)来说,他是“平庸之恶”的缩影(一个她后来开始后悔使用的词)。她觉得从道义上他“从未认识到他是在做什么”。这不是真的。艾希曼反犹非常坚决,他对犹太问题以及它的多种解决方案的专业业务知识已使得他做好了接受任何考验的准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赫斯(1978:105)回想起他们战时的

谈话：

即使是在我们俩独处，随意喝着什么，能充分放开情怀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出他老在思忖如何把每一个他能逮住的犹太人都灭掉。我们必须弃绝怜悯，不带任何感情，尽可能快地完成这种根除。任何妥协，哪怕是最微小的，也必定将在以后使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赫斯等，1987：105）

他一次次告诉朋友，犹太人除了做劳工别无任何价值——而其中仅20%—25%的人能从事艰苦工作。迪特尔·威斯里舍尼（见后）说：

245

他不是不道德，他是根本没有是非，一副彻底的冷漠无情的样子。1945年2月他对我说——其时我们正在谈论关于输了战争之后我们的命运：“当我跃入坟墓时我会哈哈大笑，就因为我杀掉了500万个犹太人时的那种感受。那能给我很大的满足和自得。”（战犯审判，1946：第8卷）

“冰冷”（ice-cold）意味着冷酷无情，不是置身事外。只有他在法庭上的技巧是平庸的，老是想开脱责任，不承认他发出过的命令。但他本人经常采取主动。他反对驱逐塞尔维亚犹太人，一位同事记在议事录上，“艾希曼提议开枪射击”。1942年艾希曼反对把犹太人从匈牙利驱逐出去。他说，最好，等到7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能够一次性全处理掉。他的建议两次都被采纳。这不是一种受规则支配的官僚政治：它是不固定的，允许官员往激进的方向进行创新。艾希曼的邪恶既不是不加思考，也不是平庸，而是革新性的、冷酷无情的和意识形态的（洛索威克持一致看法，2000）。

我跟踪了往单一国家方向驱逐的行动过程。与艾希曼紧密合作驱逐匈牙利犹太人的是两个有特殊背景的纳粹。外交部高级代表叫艾德蒙德·费森迈耶，一个来自下法兰柯尼亚（巴伐利亚州）的天主

教徒。他曾是经济学讲师和成功的商人。作为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1932年他投向纳粹党。从1933起,党卫军为他的外交生涯提供资助。他晋升为党卫军中的准将,在说服匈牙利政府支持大规模驱逐中起了关键作用。他写道:“犹太人是头号敌人;110万的犹太人,意义等同于数量有如布尔什维克先锋队员的阴谋家。”党卫军保安处头号人物是奥托·温克尔曼中将,出生于霍尔茨维格—霍尔斯坦,一名城市官员的儿子。在还是学生时,他就参加了1923年在鲁尔地区对法国人的战斗,结果被关押。作为一名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在1932年28岁时他转向纳粹党。迪特尔·威斯里舍尼在“犹太人对外移民”局匈牙利司工作。他出生于1911年,22岁加入纳粹党,23岁加入党卫军和党卫队保安处。

他们的员工——如士兵伯格、格雷尔、亨谢、克鲁迈、诺瓦克和斯伯林茨——是一直伴随自由军团或具有在德国或奥地利的巷战经历的老的或年轻纳粹(克鲁迈是个例外,仅到30年代中期才参加民族主义的继而纳粹的前线组织)。匈牙利驱逐行动被有意交付给可靠的人安排处理——因为他们全部在被占领国。这些是意识形态纳粹,有事业前程是他们的奖赏。就像对集中营中的上层精英一样,他们的目的与效率更容易从一种系统性的严格的意识形态中产生:追求“道德”清洗。这最终意味着不放过一个犹太人或布尔什维克。正如洛索威克(2000:8)所说,这是一个执行世界历史任务的精英群体,意识形态上的效率专家,不是平庸的官僚。他们完全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直至最后一滴血。

被占领领土的长官和警长监督着在实地进行的杀戮。他们是凶狠的纳粹,经常在政变发生前已富于巷战经验。与办公桌杀手不同,他们亲眼目睹和参与了杀人。他们慷慨激昂地宣扬一套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思想:“我们是优越民族,我们当中最低级的德国人也比当地人口在种族上和生物学上珍贵1000倍。”厄恩斯特·科克来自鲁尔,是一名铁路职员,因早期从事政治活动而被解雇。在20年代末期做了东普鲁士的地方长官之后,他成了乌克兰的帝国专员。“我对犹太人一无所求,除了让他们消失。”来自巴登的汉斯·弗兰克说。

他是一名自由军团老兵，一名纳粹党的律师，是当时帝国的司法部长和波兰的最高行政长官。约瑟夫·伯克尔态度较为犹豫。他来自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是一名手工业者的儿子，一名来自自由军团的老兵，做过老师，在 20 年代末期成为一名党内官员。他是一名保守的、热爱秩序的纳粹。1938 年他是维也纳的地方长官，在此他试图抑制针对犹太人的野蛮抢劫与暴力。但当被告知希特勒支持此项行动时，他改变了观念。他开始为元首工作。

东部警察指挥官中的老前辈是冯·丹姆·埃里克·巴赫-齐烈夫斯基，出生于波美拉尼亚的一个容克军事家庭。他参加了“一战”，然后服役于自由军团和魏玛军队。受希特勒影响，他辞去了委任，1930 年加入了纳粹党，时年 31 岁，次年加入党卫军。作为一名 12 年的纳粹帝国议会代表，罗姆清洗及党卫军和盖世太保部队的指挥官，他是希特勒的爱将，因“将共产党反动派彻底击垮”受到希特勒的赞扬。在一次特别行动队完成任务之后他吹嘘说：“爱沙尼亚没剩下一个犹太人。”后来他又清洗了华沙犹太人居住区。

但他也有疑虑。1941 年希姆莱去观看一次特别行动队清洗行动。因明显紧张，他往后退缩，在每颗子弹打出的时候避开希姆莱的注视。射击结束后，巴赫-齐烈夫斯基袒露了自己忐忑的心情，说：

元首，那些只是一百次（杀戮）……看看这个突击队中的士兵的眼睛，他们是怎样地在深深发抖！这些人的余生算是结束了。我们在这里训练什么样的跟随者？要么是神经病，要么是野蛮人！

由此希姆莱对手下作了一次煽动性的讲话。他承认士兵们具有一种令人反感的责任。如果德国人在高高兴兴地做这样的事，他是不会喜欢的。但是这不应该损害他们的良心。士兵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每一个命令。由他一人对上帝和希特勒负责。他们毫无疑问注意到了他恨这种血腥的行为，以及他已经在灵魂深处受到触动。但是他也是通过执行命令而在服从于一个更高的法律。看看自然界吧。

到处都有争斗对抗,不仅在人类中,而且也在动物和植物世界之中。任何人到了累得不能再战斗时都肯定陷入困境。臭虫与老鼠不也贪生吗?但是人类必须保卫自己不受害虫攻击(希尔伯格,1978:218—219)。

1942年巴赫-齐烈夫斯基患了包括射杀犹太人的幻觉的精神衰竭症。他向希姆莱建议让他们停下来。希姆莱现已安全远离了杀戮,他的反驳是严厉的:“这是元首的命令。犹太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播者……如果你不从对犹太事务的关注中抽身,你将看到这给你带来后果”(利夫顿,1986:15,159,437)。巴赫-齐烈夫斯基身体康复后又重新恢复杀戮。然而在纽伦堡他坦白供认并表示后悔。通常,粗暴终落得自我怜悯。一位军官宣称:“真正值得可怜的人是我们,清洗者,因为我们的人比那些必须被枪毙的人处在更紧张的状态之中。”(迪克斯,1972:61)

247

一个大不一样的警察指挥官是弗里德里克·卡茨曼,一个鲁尔区矿工的儿子,后来成了一名木匠。他在1921年21岁时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他的激进主义使他难以被雇佣。作为一群冲锋队坑道工兵的头头,他被提升到超出他能力的位置,因为他是一名狂热的政治战士,倾向于采用激进解决方案,并能够搞定问题。奥迪洛·格洛伯克尼克更带有中产阶级特点,生于的里雅斯特,是一名隐瞒了部分斯洛文尼亚血统的奥地利陆军上尉的儿子。他在贵族子弟军事培训学校受的教育,战争结束后搬到了奥地利,做了一名工程经理。他早在1922年18岁时就加入了奥地利纳粹党,1932年加入党卫军。1933年他的激进主义让他丢了工作,于是他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作为一名狂热的纳粹和反犹分子,他还陷入腐败,因货币投机被免去了维也纳地方长官职务。他的朋友希姆莱挽救了他,让他建立起了第一批莱因哈德行动死亡集中营。格洛伯克尼克很可能依然腐败。他公开鼓吹谋杀,反对用燃烧尸体来掩盖种族灭绝:

如果在我们之后竟出现怯懦不中用的一代,不理解我们的工作——这工作是如此有益和必要,那么,先生们,所有的国家

社会主义的努力都将化为泡影。相反,应该在墙上挂起这样的铜匾,上面写着,是我们,以无比的勇气,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战犯审讯法庭,纽伦堡,“医疗事件”第一卷,866—867)

然而甚至他也说有过良心的不安,说他每次看见他的小侄子,无不想起他曾经杀死的儿童(希尔伯格,1978:332,628;霍夫克斯,1986:92—94)。

极少有高级纳粹在经历杀戮时没有道德上的犹疑。大多数人试图将他们自己放在一个据称是更高的道德目的之下。伯恩(1986)将这归于严格的军国主义熏陶、战争经验、感情上往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向,以及对希特勒的极端服从。但是服从希特勒给了他们一种理想主义意识,个人的感情已服从于共同的事业。这类扭曲的理想主义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施害人当中很普遍。当其他动机都不起作用的时候,意识形态的力量帮助了施害人将任务坚持到底。

248 非纳粹机构也参加了合谋。没有文职部门,几乎什么事也完成不了。极少有文职官员有任何暴力或狂热主义历史。在外交部,布朗宁(1978)指出了两类参加合谋的官员。第一类是1933年之前以及加入外交部之前具有知识背景的纳粹成员。路德出生于柏林,一个高级文职官员的儿子。参加战争之后,他开了一家家具进出口公司。1932年3月37岁时他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但这时他已经认识了许多纳粹,还是里宾特洛甫的朋友。他很快成为了一名纳粹柏林城市市政会委员。布朗宁称他是“一个与道德无关的权力技师”,但这不是很恰当。他在成为职业外交官之前是职业纳粹,只是在1936年进入外交部,然后很快得到晋升。

布朗宁的第二类人员是单一的野心家或追名逐利之辈,在政变后加入纳粹党,属于见风使舵的纳粹。他们包括了像奥托·冯·诺伊拉特那样的贵族保守派外交官和像弗朗兹·拉德梅克那样向上流动的男人,后者是一名来自梅克伦堡的铁路工程师的儿子,到1933年才加入纳粹党,凭自己艰苦努力才进入犹太人事务部工作。布朗宁认为这些人比艾希曼更好地展现了平庸之恶。然而绝大多数是来

自军事和文职官员背景，而整个部门中渗透了反犹主义的保守的民族主义。拉德梅克坚信科学的种族主义——这是他能帮助起草马达加斯加计划和最后解决方案的主要资格。在我的样本中，几乎所有的文职官员——相较于很少的商人——都被吸收成为纳粹。但是他们的纳粹意识形态极少是用赤裸裸的言词表达的，更少采用暴力方式。相反，它在他们所在的比较威权主义的文职部门中的职业经验中获得了反响。

1942年在万塞召开的臭名昭著的副部长级会议奠定了在党卫军与文职部门之间执行最后解决方案所需要的合作基础。纳粹领袖原以为文职部门会有不同意见，然而一切进行顺利。这很可能是因为在除了克里青格（一个来自波兰的德裔）之外的所有参与者都是老纳粹。绝大部分讨论与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异族通婚的技术问题有关。一个半小时之后会议结束，继而是喝茶休息，然后是午饭时间。最后解决方案的消息通过各个部门向外扩散，没有引起很大骚动（希尔伯格，1978：264—265）。一味追名逐利的做法现在让大家共同行动起来。高级官员担心他们会失去影响，需要他们所在的部门设计杀戮方案，而中层官员可以通过去到处涌现的犹太人司工作来推进他们自己的事业。财政局制定被驱逐者财产清单，然后把它们交给税务局，劳动局收集工作手册，房产局处理空置房屋，而国家铁路部门修建通往集中营的铁路并运送囚徒。

实际上这些人中谁也没有杀人，也很少有过暴力历史。布朗宁（1978）说他们将“一种去个性化的行政操作模式”、“一个政府阶层的组织性成就”和“意识形态的灌输”结合在了一起。但是他们以前的右翼意识形态思想相对较容易地变成了一种国家主权论的纳粹主义，给予他们的追名逐利做法以一种原则性的色彩。官僚政治是远离了杀戮的文职部门领域进行种族灭绝的手段，而纳粹意识形态的响应给出了目的。继续向东，两者的结合显得更加地迫不及待。文职官员知道他们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的一味追逐名利也更加赤裸裸。被派往波兰和俄国工作的差使不受欢迎，并且人们经常是因为失业，甚至有犯罪活动才去的。穆夏尔（1999）认

为这些官员贪污腐败,公开地显露种族主义倾向,试图通过谋杀的热情来救赎他们自己,恢复他们的事业前程。

产业界的情况不一样。我在《法西斯主义者》中强调资本与劳动力都不属于纳粹核心拥护者,很少商人是意识形态纳粹,尽管许多人在1933年之后赶浪潮加入了纳粹。他们开办奴隶劳力工厂,但不是为了利润。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同谋,因为随着战争的进程,劳动短缺成为燃眉之急。有纳粹关系的产业主义者,如波西亚,通过游说将囚徒作为劳力——先是西欧人,然后是斯拉夫人,最后是犹太人。到1942年年末,三分之一的德国劳动力是奴隶。他们的待遇相差很大。一些犹太人受到很好对待,比其他工厂里的法国或荷兰劳力的待遇要好。然而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G Farben)的经理吩咐替换患了病的劳动者,同时心里知道他们之后会被杀掉,而管理者定期地进入集中营挑选劳动力,斯特雷德说(1999)。

甚至在为数不多的被控告犯有战争罪的产业主义者和管理者当中也极少有人在1933年之前加入纳粹党。古斯塔夫·克鲁普“榨干了”成千上万的俄国人和犹太奴隶劳动力,所以他被免除了继承税,但是他从未加入纳粹党。库尔特·施罗德和弗里德里克·弗利克从1932年起曾帮助资助了该党,然而弗利克给予其他右翼党更多,并只到1937年才加入纳粹党。施罗德1933年加入纳粹党。甚至是来自波兰的失去领土上的“无耻和残忍”的埃里克·迪特里希——他为他的企业从当地城市贫民窟招收工人,同时将孱弱者交给盖世太保枪决——也是在1935年左右才入党。产业主义者和金融家也采取赢利的政府的经济立场,经常与党卫军密切合作。银行经理汉斯·菲施博克是德奥合作后的奥地利内阁成员,然后去帮助管理荷兰经济。他是右派,尽管只到1940年才成为一名正式纳粹,此时他得到了党卫军上尉的名誉军衔。在德国资本家中我们距真正的平庸最近——大规模屠杀成为了现代社会中某种已被制度化和具有合理性的事物的副产品:从最小的成本中榨取最大的利润。因为自由劳力供应短缺,价格昂贵,资本家乐得使用奴隶。当然,资本家、管理者甚至工头不是一定要去杀人。他们把奴隶移交给党卫军,然后就试图

把他们全忘掉。他们主要是杀戮行为的物质主义同谋。

精英中也有某些温和派。他们嘲笑那些揭露 6000 名死去的游击队员只持有 480 条来复枪的报告；文职官员以便函形式写下“是的，但是”，向上级回复，以拖延可怕的命令（布克海姆等，1968：346，377—379）。将军、经济计划制订人员和产业主义者喜欢劳动力胜过喜欢尸体。许多人警告不要让臣民感到疏远；有些人想放过犹太退伍军人。但是一旦他们意识到激进路线是来自上层，很可能是来自希特勒本人，他们就放弃抵抗了。元首原则让追名逐利者的道德规避合法化。服从显然是神圣的，同时它也带来了前程和利益。有些人请求调动，但不辞职。少数领头的纳粹分子被靠边站。但艾希曼说对这项伟大任务的普遍接受震慑了个人偏离行为。对纳粹而言，组织一直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几乎不能想象在组织外面的生活。中年人有享有特权的家庭。我们都会产生的世俗动机又强化了我们的服从心态。

250

有勇气的反对通常要求另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负责华沙的医生威廉·哈根博士是个社会主义者，一直与党卫军管理部门进行斗争以改善犹太人居住区的生活条件（尽管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德国医生，他还是相信犹太人传播了斑疹伤寒）。少数旧军官不服从命令，比如中将莫泽。当他被派到波兰之后，他嗅到某处有一个死亡集中营存在，前去调查。在感到惊骇之余，他宣称，“每一个有尊严的德国人都不能否认他们的政府曾经下令执行过这样一种有组织的大屠杀”，然后跨过俄国战壕投降（博纳特 1981：211—212）。施陶芬贝格家庭，阴谋反对希特勒的策划者，也是老派的军国主义者。党卫军军官库尔特·格斯坦依然是个谜，尽管他很深的普鲁士家庭的福音派信仰明显使他存活了下来。他不顾一切地告诉教会领袖和一位瑞士外交官最后解决方案的细节。中校格罗斯科奇，一位职业军官，福音教牧师的儿子，试图阻止特别行动队向妇女和儿童射击——直到他的上级收回决定。天主教帮助了前牧师艾伯特·哈特尔，他在厌恶中辞去了他在党卫军中的职务。绝大多数合谋者是长时间的左翼、宗教激进分子或老派的军国主义者（霍夫曼，1988）。但是甚至绝大

多数有反对纳粹前科记录的人也三缄其口,因为他们不与他人保持一致的后果极为严重。

极少数的高级纳粹试图从内部阻止政策执行。卡尔-西格蒙德·利兹曼是一名将军的儿子,后来自己也成为一名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自由军团服役,当时称钢盔团。1929年他加入纳粹,成为一名冲锋队领导,但因政策分歧而不被重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爱沙尼亚特派员,他反对他认为是把德国潜在的朋友转化为敌人的政策。但他最终耸耸肩,任他的反对意见被抛在一边(克斯滕,1956:223—225)。威廉·库比,驻白俄罗斯总督,提出了更多坚定的反对意见。他的法西斯主义更多的是文化上而不是种族主义的,同时他反对根除“有教养的”西方犹太人:

我当然是严厉的,而我乐意帮助解决犹太人问题,但是,来自我们文化环境的民族与(来自东方的)原始的动物化游牧部落相比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请求你,为了我们的帝国和党的荣誉……注意必要的人道形式。

251

当党卫军上校斯特劳奇枪杀了70名“有教养”的犹太人之后,斯特劳奇说库比大发雷霆:

我和我的手下因为野蛮主义和施虐狂受到谴责,而我除了尽责什么也没做。库布断言(取下犹太人牙齿中的金质填料)此种事……不值得德国人和拥有康德及歌德的德国去做。德国的名誉正在全世界受损,这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同样真实的是,他说,我的手下在执行这些处决任务期间肆意满足他们的性欲。我强烈反对这种说法,还要强调,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除了必须执行这种讨厌的任务之外,我们自己还成了被攻击的目标。

库比在作了以上辩论之后不久死去,不过原本他也不会有什么

好下场。希姆莱说他的行为“近似叛国”。他当时已有把年纪了,还谴责年轻纳粹丧失了组织早期的理想。他出生于波兰的西里西亚,是一名步兵中士的儿子,拥有大学历史学学位,曾加入过战前民族主义组织。在“一战”结束后,他加入了保守主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1927年他加入了纳粹,尽管是在不寻常的40岁这样的“高龄”。也许他年龄过大了,已不能完全适应(布莱克,1984:175;希尔伯格,1978:233,253—254;霍夫克斯,1986:195—198)。但是这样的人不多。

纳粹主义总是宣扬对敌人的仇恨,运动及其领导原则是他们的生命,而他们在这种仇恨升级到大规模杀戮之前就已经深陷暴力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被分派到执行种族灭绝任务的位置上。他们的意识形态还具有一种系统化的性质,从中很容易产生高效率的种族灭绝组织。然后战争又使得真实的敌人与他们的意识形态敌人相互缠绕在一起。凯尔说不到2000名的党卫军军官直接卷入了根除行动;而200名少校以上的军官指挥安排行动。但是“这部分人已因它的训练,它的挑选以及无情的战争条件堕入地狱,成为活魔鬼……他们对经过这一系统的更多的数十万人的扭曲和束缚是决定性的”(1983:167,177—186)。但大多数精英从容自如。他们是办公桌杀人者。

事业路线之二:主集中营

集中营中的情况不是这样,在此受害人被只有低级军衔、拥有收入颇丰的稳定工作、出身中下层工人阶级的男人和妇女杀害。清晰叙述纳粹意识形态原则的人并不多。他们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叙述往往倾向于简单的偏见,但集中营也是职业共同体。有些人与他们的家人住在一起。宴会、饮酒作乐以及风流韵事等是高度社会化的一部分,这些活动产生出对集体规范的服从。因为莱因哈德行动死亡集中营有它们自己的招生办法,我将对它进行区分处理。有更牢固的贯穿的主线将战前德国集中营、奥斯威辛和马伊达内克死亡

集中营以及许多其他集中营连接在一起。

暴力首先在战前德国集中营升级到例行谋杀。我的男子样本中的8% (115名)在那里服过役。没有一个人经历过大规模屠杀,但他们受到过唆使。除了3个人之外都是前纳粹党、党卫军或冲锋队成员。在我的样本中,286名男子在奥斯威辛或马伊达内克综合集中营服过役。只有14%是新兵。这些都是普通士兵,而几乎所有人都是1942年后招入的被解放出来的德裔。其余都已经是纳粹党或党卫军成员。41人也曾在战前集中营服过役,35人在别的非死亡集中营,14人在特别行动队,12人在莱因哈德行动死亡集中营,1个在T₄。他们都经验丰富。

战争期间总共有295个人在非死亡集中营服役。只有5%是新兵,还大多是被解放的德裔。22%以前只在纳粹党卫军师部服役,在东线受伤之后大多被转到集中营。另有22%曾是纳粹党或党卫军成员。44%经历更丰富,曾在T₄(5人)、特别行动队(14人)、战前集中营(66人)或死亡集中营(40人)服过役——这当中除9人外也都是党员或党卫军成员。这与奥斯威辛模式类似,除了受伤的纳粹党卫军士兵。又一次,我们得以一窥利用经验与资格进行系统性选择和转让的过程。

我们看到艾克尔在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制度成了所有集中营的模式(榜样)。所以怀着晋升希望的人从达豪和其他集中营走到死亡集中营。至少有9个来自主要集中营的指挥官和8个副指挥官是从达豪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奥斯威辛高级军官的位置——种族灭绝的例行核心——的填补被给予了特别关照。3个指挥官赫斯(我们已经碰到过)、阿瑟·利本亨舍尔(一个来自波兰西西里的老纳粹,曾随父亲进入了文职部门的低级职位)和理查德·贝尔(一个来自巴伐利亚的糕点师,1930年20岁时加入纳粹,次年加入党卫军)成为了达豪集中营的军士。副指挥官汉斯·奥麦尔(曾经是巴伐利亚车床操作工、老纳粹和职业党卫军军人,后来成为一名集中营指挥官)、贝尔的助手卡尔·霍克(来自威斯特伐利亚,一位建筑承包商的儿子,曾任银行办事员,年轻纳粹,1933年22岁时加入纳粹党)、弗朗

兹·霍夫曼(已讨论过)负责实际杀戮地区,还有卡尔·弗里切,一名苏台德船工,1930年加入党内和党卫军,也一样成为军士。弗里切珍视党卫军之间浓烈的兄弟情谊,在达豪集中营服役七年,在奥斯威辛监督保护性羁押,最后成了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头,在此他“超越了他的权限”,也就是说,领导了野蛮的暴行。

约瑟夫·贾罗琳,阿尔萨斯人,在达豪集中营9年之后成为阿拉赫集中营的指挥官,1933年才加入纳粹党,当时他29岁,而阿拉赫囚犯将其描述为疯子。卡尔·科克,来自鲁尔区,一名20年代反共产主义的巷战士兵和老纳粹,后来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野蛮并腐败的指挥官,在战前的萨克森豪森学了门手艺(他可怕的老纳粹妻子伊尔丝也一样,她曾用刺了文身的囚犯身上的皮做灯罩)。赫米内·布朗斯坦纳,做过维也纳女佣、制造火药的工人,在1939年她自愿报名加入党卫军时只有20岁。她被分配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来成为负责监督马伊达内克死亡集中营的女看守。

253

有些人仅靠暴力资本吃饭。对一位低级文职官员的儿子、巴伐利亚的约瑟夫·克雷默来说,晋升来得更慢一点,他1931年加入纳粹,在达豪受过训练之后,1934年成为一名文书,尽管是去向杀戮地带。他成了毛特豪森*的副指挥官,奥斯威辛的一名军官,纳茨维勒集中营的指挥官,监督奥斯威辛一比克瑙的死亡集中营区域,最终成为了“贝尔森之兽”。他的妻子说:“组织给了他很大希望……纳粹主义是一种很深的情感体验。组织让他再一次相信他自己。他总是告诉我在将其拉向党卫军身边的因素中胜过一切的是与其他同龄年轻人呆在一起,同时在组织中找到亲密的朋友的愿望。”(西格夫,1987:50—51,218)

有少数人是从其他党卫军下属机构转到集中营的。阿蒙·歌德是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描绘的普拉绍夫集中营的指挥官(扮演演员矮得太多——现实中阿蒙有6英尺4英寸高)。他来自维也纳,一位军事书籍出版商唯一的儿子。中学里他是一名优秀学生,然而遭

* Mauthausen,原文 Matthausen 有误。

到纳粹主义胁迫。他很可能在 1925 年, 年仅 17 岁时就入了党, 而 1930 年肯定已是党卫军的一员。1933 年, 在警察将其与一次纳粹武器贮藏联系在一起后, 他不得不逃亡。他积极参加非法活动, 包括谋杀陶尔斐斯(1932—1934 年任奥地利总理), 之后他逃亡德国。他醉心于争吵打架, 纳粹党为此很器重他。他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他命令犹太人脱离德裔, 清洗犹太人区, 然后晋升到普拉绍夫指挥官的位置。因造成 8000 名囚犯死亡, 他被波兰人绞死, 他死得“从容, 是一位政治战士”, 他的遗孀说。

本质上说, 是暴力将集中营军官联系在一起, 并诱使他们自己组建一个独特的由久经沙场的士兵组成的精英机构。从奥思(2000)身上可以看出, 他们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 肯定不是失去阶级身份的人。平均来说, 他们是 1931 年 9 月以前加入纳粹的, 但是他们把自己看成是行动的人, 不是说话的人, 奥思强调说他们几乎不加思索地都喜欢暴力的滋味。

约瑟夫·克莱尔依然是一名军士。他来自上西里西亚, 是一位宗教改革学校教师的儿子, 学的是细木工, 然后就成了一名护理员, 1932 年起他在党卫军服役, 1938 年起成为集中营卫兵。他从布痕瓦尔德到达豪再转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 成为了一名中士。他可能保持着个人凶杀数量(475 人)的记录, 是一个拥有“巨大的潜在精神变态”的人。赫尔伯特·谢尔普, 来自上西里西亚, 学的是杀猪, 但却为他做鞍具的父亲工作, 然后当了警察和海关官员。在几番失业之后, 他于 1932 年加入了纳粹党, 当时 24 岁, 次年获得职业党卫军工作资格。1936 年他是一名集中营卫兵, 1939 年在达豪集中营工作。在东线受伤之后, 1943 年他自愿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工作。在那里他杀害了很多儿童, 直到有一天他喊出, “我不能再干了”, 才被转到一个集中营中担当谋杀性较轻的角色。伯恩哈德·沃尔特, 一名巴伐利亚粉刷工, 1933 年 22 岁时成为一名纳粹, 他从达豪开始, 然后在“谁愿死在奥斯威辛”的挑选过程中脱颖而出。这些是更加有限的一部分人, 他们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忠诚程度不清楚, 但他们通过完成逐步上升的暴力的要求得到了军士的军衔。

一些人非常年轻。约翰尼斯·斯塔克来自达姆施塔特，他的警察父亲是严格的纪律信奉者，其格言是“不能服从的人也不能发布命令”。17岁时他是布痕瓦尔德的一名卫兵，然后到达豪，再到谋杀性最严重的奥斯威辛。一位法庭精神病专家评论说，他唯一的训练就是当一名纳粹集中营士兵，在此他学会了“通过将同情称为软弱”而放逐了良心。下士佩里·布罗德写过一本在奥斯威辛的《回忆录》（赫斯等，1978）。他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然后是党卫军，被分派到奥斯威辛工作，21岁时他被要求执行严刑拷打和处决任务。奥斯威辛是他唯一的成年经历，也是他观念形成的地方。幸存者见证了他的残忍，尽管他更喜欢称他的同事为“嗜血的屠夫”、“残忍的虐待狂”和“狂热分子”。他说刽子手在开枪间歇会吹口哨，相互说些闲话，而在“打死那帮下等人”时装着无动于衷，“以炫耀他们有多狠”。“心狠手辣”表示的是社会地位。

约瑟夫·施万伯格是来自1918年移交给意大利的奥地利南蒂罗尔州的难民。他的父亲是邮局职员，而他是药店营业员，1931年失业。他成了一名现役纳粹——尽管他可能比这更早就已入了党。他是一名巷战士兵，1933年不得不逃往德国。他接受了党卫军的军事训练，但是健康问题迫使他转到了党卫军当书记员。但他被派往被占领国波兰的一个杀戮办公室，当他证实自己具有作为一名经过军事训练的老战士的能力后被晋升为中士。他被分派到一个小规模犹太人强迫劳动营。数月内全部人都死了。他继而进行对犹太人居住区的大扫除，包括由他的乌克兰人完成的疯狂射杀。一位幸存者说：“我不能称他为野兽，因为我不想让野兽感到委屈。他就是因为想杀人才杀人。”要把在这个人身上的纳粹主义、暴力和个人野心分解开来几乎不可能，因为他的技术就体现在纳粹暴力之中。

一些年轻人、被解放了的德裔以及妇女是边缘纳粹或者根本就不是纳粹——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因为对普通官兵的记录很少。冈瑟·欣茨20岁时在东线短暂服役过一段时间。他遭受头部重伤，21岁时加入纳粹党，22岁时被派到菲尔斯滕格鲁伯（Fürstengrube）分营当一名卫兵。在那里他专心致志于简单的报复，他问：“你知道为什

么犹太人受到惩罚？因为他们是战争的原因。”（雅各布，1995：144—145）埃米尔·亨特尔是苏台德一家工厂工人的儿子。他一直是织布工，之后失业迫使他成为农场工人，他并不是非常热衷政治的人，但他的民族主义色彩的体操俱乐部 1938 年被党卫军收编。1940 年他被招入纳粹党卫队，然后调到奥斯威辛当卫兵，然后成为一名护理人员。在奥斯威辛他协助参与了 350 次谋杀行动，尽管幸存者称他为“文明的卫生员之一……他看上去似乎是在很不情愿地履行他的职责”。在杀害了 120 名波兰儿童之后，他给人的印象是“处于完全瘫痪状态”，“彻底垮掉了，不停地诅咒战争”。

妇女们一般都是单身、年轻、或者职业动机为有纳粹同伴。艾尔玛·格雷塞的父亲是波美拉尼亚地区的一名农业工人，1942 年在她 19 岁时狠狠打了她一顿，她自愿报名加入了党卫军。她在拉文斯布吕克接受训练，然后调到奥斯威辛，再到伯根-贝尔森。她滔滔不绝地大谈纳粹信仰，极其残暴，对“拿囚犯取乐”供认不讳。希尔德加德·拉赫特，来自柏林，是一名金属加工工人的女儿。她加入了纳粹青年组织，然后在 1938 年 18 岁时加入一个妇女组织。她在不同工厂工作过，先与一名“二战”纳粹德国空军军官，之后又与一名党卫军军官同居于前线阵地。他们都被派往马伊达内克、奥斯威辛，然后是拉文斯布吕克。她的两个孩子由她的母亲抚养大。她获得的称号是“血腥的布莱吉达”。我们缺乏进一步探查这些妇女的动机的数据资料。

在主集中营，医生挑选出无期徒刑或死刑囚犯，对他们施行可怕的种族实验。医生是集中营里受过最好教育的男人和女人，并且似乎比一般军营军官有更复杂多样的背景。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伊诺·洛林来自莱茵兰，1931 年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他是一个疯狂的纳粹，被有些人认为是一个不合格的酒鬼。他从达豪集中营开始，但升到了集中营帝国经济管理总局医疗巡查的头头。弗里德里希·恩特里斯先是在战前的大罗森集中营（Gross-Rosen）服役。他是来自波兰的难民，1935 年 21 岁时加入纳粹，次年加入党卫军，是一个喜好杀戮的“意识形态感强烈”的人：因为斯拉夫人是下等人（德语，

Untermenschen),而犹太人根本就不是人。他似乎在心理上受到他自己的“半个波兰人的困扰”,装着不了解波兰囚犯,残忍地对待他们。这些是真正的纳粹医生。

其他人似乎更有野心。约翰·保罗·克雷默保留着一本惊人地平静的奥斯威辛日记。其中记述了饮食菜单和对事业前程的关注,对他的大学迟迟不提拔他的气愤,对他的姐夫缺乏爱国主义精神的愤怒。但我们一点也没看到关于死亡集中营方面的讲述。他来自莱茵兰,一个农民的儿子,也许还是奥斯威辛最年长的医生。作为右翼民族主义者,1927年他成了某大学解剖研究所的领导。因为纳粹生物种族学理论所吸引,1932年他加入纳粹党,1934年加入了党卫军。他在前线医疗部门工作,然后短暂地被派到奥斯威辛做实验,他给人的印象是遭遇挫折的野心家,不太重政治,但是将民族主义与生物医学种族主义糅合在一起。

256

弗里德里希·梅内克是威斯特伐利亚一位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砌砖工人的儿子。他好不容易从医疗学院毕业,1932年加入纳粹以推进他的事业。让他自己相当满意的是,他从T₄进入了“野蛮安乐死”(项目组),进而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写下的关于病人的潦草记录揭示了他与一般纳粹观念相关的反犹主义,但他骨子里是一位追名逐利的野心家。

有些人是充满理想的纳粹。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尔是巴伐利亚一家自营的机械制造商的儿子。他是一名优等生、民族主义者和忠心的种族生物医学迷恋者。他1937年26岁时加入纳粹党。是东线战场的一名医生,受过勋,负过伤。他被转到奥斯威辛对囚犯进行试验。在经过可怕的程序之后,他亲自杀害了他的许多医疗对象,证明了他“绝对的意识形态坚定性”。然而他被同事看作是“坦白、诚实、坚定”,缺乏残忍性格,爱集中营的孩子,罕见的 not 饮酒的人。如利夫顿所说,通过杀戮改善人性,门格尔“身上体现了纳粹生物学革命”。爱德华·沃思是一位成功(及和平主义)的石匠的儿子。他在学生时就充满民族理想,1933年25岁时成为一名满怀热情、充满理想的纳粹。次年他加入党卫军,确定了他对“党卫军制订的生物学

任务的热爱”。他是一个原则性的反犹主义者,宣称犹太人对德国的一个危险——一边继续接待犹太病人,即使在其属于非法之后。他在东线担任医生,然后从1942年起成为达豪集中营医生和奥斯威辛第一要塞的医生。医生们说他是“在所有集中营中的最好医师”(赫斯同意)。他体贴他的囚犯病人,试图改善集中营的卫生设施,曾有一次强悍地干预可怕的艾尔玛·格雷塞的行为,大声喊:“不要打我的女病人。”然而他从未违背杀人命令,还很重视亲自完成,拿囚犯作试验,参加选拔,责备过于拘谨的同事,等等。利夫顿(1986:第18章)认为他在他的纳粹身份和他的人性的医生的自我之间被撕成了两半,他身上体现了“纳粹德国的杀戮原则:一种困难然而必要的个人历练形式”。一位囚犯医生回忆他是一位“不喜欢毒气室杀人方法的纳粹意识形态分子……一个精神性的但并不残忍的纳粹”。他是纳粹主义的牺牲品,它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纳粹在具体的实践中放弃道德厌恶而执行“原则性的种族灭绝”。

事业路线之三:从 T₄ 到莱因哈德行动集中营

在 T₄^[1],医疗机构中特有的地位关系影响着种族灭绝的实践。主要场所是职业共同体——医院和偏远乡村地区的家庭,员工的生活与工作都在一起,这固定形成了两个独立的伙伴、医生/管理者和党卫军军士/普通官员的团体。绝大多数 T₄ 人员是仔细选出来的。我样本中的 118 人在此服役,其中 90% 以上是前纳粹或党卫军成员。9 个是另增的警察,13 个曾在集中营或特别行动队。41% 的人在到达时已有亲戚或朋友在那里工作,而另有 47% 的人是招募者知道可以信赖的。这些是有过前科的人,尽管鲜有参加过实际谋杀行动。在 T₄ 总部 17 个管理者当中,除了 1 个(贝克尔)之外,都是老纳粹。

[1] 我的 T₄ 施害人的主要来源是伯利(1994)、德·米尔德特(1996)、弗里德兰德(1995)、霍维茨(1990:第3章)、克里(1983)、利夫顿(1986)和缪勒-希尔(1988)。

对极少的10个人而言,家庭或朋友关系曾帮助他们得到录取。他们具有令人尊敬的管理经历,通常是在文职部门,但他们同时也是具有良好纳粹关系的纳粹。阿勒斯说,“绝大多数人是靠关系进来的,他们总是听说该工作”与元首大人有联系,听上去不错。然后这些工作当然包含额外的报酬;而且它意味着不必上前线。物质与理想方面的考虑总是相互缠绕的。

对 T_4 的掩护、权威和程序医疗科学是最关键的。大学的基因、精神病和人类学研究已经汇聚在一个对身体和精神特征的遗传性传播的信念之上(缪勒-希尔:1988)。在德国的大学里,遗传与种族之间不存在很大距离,而政权又给了研究者将这距离弥补的资金。他们的介入主要是出于职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他们相信种族科学。在这整个的科学群体中约有5个人据说拒绝服从。但一位教授的女儿说:“他能干什么呢?他会把自己出卖给魔鬼,以便为他的研究所和他的研究获得资金。”诱惑仍然还在那里。加州大学的同事获得了大量的研究战争核武器的研究资助。德国研究人员被4人顶级纳粹医生选中加入他们的职业行列以及支持纳粹主义和安乐死。在我的27名通过 T_4 (测试)的医生中,18名曾是老纳粹,4人在他们24岁生日前加入,还有2人(尼采和莫特)在1933年就已经是生物医学种族主义的支持者,只剩下3人可能是见风使舵的纳粹。至少5人曾在自由军团,尽管很可能没有其他人曾在进入 T_4 之前卷入暴力,但所有人都是党卫军。

为首的医生是卡尔·勃兰特,生于1904年,一个警察的儿子。1918年他离开阿尔萨斯,此时它已属于法国,后来他被法国人阻止与在法属非洲的阿尔伯特·史怀哲在一起。作为一个热心的民族主义者,1932年他成为一名纳粹。他把纳粹看作“复仇者,希望之党”,他心目中的两个英雄人物是史怀哲和希特勒!在他的情人,一位德国游泳冠军,将他介绍给希特勒之后,他成为希特勒扈从中的一个医疗顾问,然后被快速派到 T_4 中任职。他接受是因为野心;对希特勒的尊敬,和一种加入到德国“集体振兴当中的欲望”。他既无残忍也无强烈反犹太主义的名声,被认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有道德的纳

粹,在事业中抵消了纳粹粗俗一面的影响。沃纳·海德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名波兰西里西亚纺织制造商的儿子,16岁参加“一战”,然后在自由军团服役。他还参与了卡普暴动和其他暴力。在1933年应纳粹邀请对艾克尔作一个心理评测时;他得出的结论是正常,不是精神病患者。1930年他是一名党卫军上尉。他部分时间在集中营工作,获得了“非常好的研究材料”,是一名盖世太保的顾问,很可能是在关于用刑方法方面。他是T₄里杀人最多的医生。他的保安处档案还详细记述了他的性史。他15岁时被一位年长的异性亲戚诱奸,后来成为同性恋者,留下精神创伤。也许这种弱点促使他服从命令。然而主要还是对极端民族主义和生物医学的种族主义的忠诚才导致他去杀戮。

党卫军上尉和中尉运用中层权力监督T₄杀人中心。在12个人中,有10人曾是职业警察,10人是老纳粹或改宗支持者(我们并非总能知道警察加入的时间)。他们掌控着低级官兵的社会环境,后者大多住在营地。军士也是忠诚的纳粹。他们发放基本的饮料定额,组织频繁的宴会。当我们沿着等级制度往下时,信息变得不那么详细。低级的非医疗部门的男性员工(勤杂工、厨师、汽车司机、锅炉工、建筑承包商和办事员)是受教育最少的工人阶级。他们所有人都已经是纳粹党员而绝大多数是在党卫军中。三分之一(及一半以上的军士)以前有过暴力激进主义史。他们比任何其他的施害人群体体验过更多的失业状态,而有些人入党是为了找到工作。女性打字员和护士有纳粹记录的可能性最少,尽管她们经过了审查,通常是被当地纳粹头头从他们的网络中招募的。有些护士在杀戮开始之前已经在医院或家里工作了,后被他们的上级挑选留了下来。所以妇女对纳粹的支持可能要比内容不足的档案资料所显示的更多。

极少有人之前就知道T₄是干什么的。当得知之后,他们经常被威胁,不服从就意味着你会遇到麻烦,但是他们的顺从似乎已经因合法的权力而变得过于坚决了。这些是地位较低的男女,他们对纳粹主义感到亲切。这一部门的战争罪被告最可能用他们的合法性来为他们的行动辩护。这种解释有他们对医学权威的承认接受作为支

撑,特别是在护士和护理员之中。国家已经宣布这些临床行为合法,而有威信 的医生正在实践它们。这些是藏在背后的一般原则,减轻了心理压力。

我在后面讨论莱因哈德行动集中营时举了一些男人的例子,但是艾姆加德·休伯曾是一名奥地利家庭佣人,之后做了一名护士。她 1932 年到达哈达马尔医院,此时它离成为一个杀戮中心还早得很。她积极参加纳粹妇女组织,并长期与一位纳粹医生保持联系。她升到优秀护士,去往安乐死项目工作。她为不得不杀死德国人感到困扰,尽管不包括俄国人和波兰人。安娜·卡茨琴察来自一个威尼斯社会主义家庭,从未加入过纳粹组织。但是她与一位犹太男人离婚,与一个纳粹医生保持联系。她在战后的审判中说她胆子小,容易轻信。护士接受过的尊重医生的训练有助于他们的服从行为。T₄ 最像米尔格莱姆的实验(第 1 章提到)。医疗科学的意识形态权威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的个人权威诱使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前去谋杀。

259

这在当初并未被视作谋杀。T₄ 挑选“没有希望”的病人,对他们而言,“安乐死”可能是一种“解脱”。他们的家庭经常也同意了。然后施害人就形成了习惯——同时也取决于这项工作得到的红利。德·米尔德特(1996)强调他们的追名逐利。弗里德兰德(1995:187)总结说:他们是“迟钝和没有想象力的男女”,过着“平庸的生活”,尽管伯利(1994:125)指出那些“在第一线的人是因他们已被证实的残忍和对意识形态的全心奉献而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所有这些相互不同的结论都有价值。所有这些类型的个人都存在着,但他们被等级制度和同志伙伴关系缚在了一起。等级制度又与纳粹的医疗权威缠绕在一起,伙伴关系又与职业群体缠绕在一起,后者的团队精神和社会生活是以老纳粹为榜样的。

当 T₄ 蜕变为杀戮所有病人,不再以诊断为托词,科学的伪装就被揭掉了。医生、护士、护理员、驾驶员、锅炉工以及办事员现在都卷入了持续的杀戮和伪造医疗记录之中。年长的医生通常被描述为比仅在纳粹社会经受训练的人更加疑虑不安的。然而疑虑因为对例行工作的适应、对制度的忠诚、享有特权的事业和对政权的忠心等系列

因素的混合被克服了。许多人在接受审判时声称他们只不过是服从合法命令,即使命令令人不快以及有时是错误的:“我尽了作为一位德国官员的责任,上帝为我作证。”他们要想逃脱正在滑向的邪恶陷阱,需要某些反向的身份或意识形态社会来源。这是他们缺乏的:职业和社区都是纳粹界定的。

当 T₄ 在 1941 年正式解散时,一些人依然在对智障者、战俘和政治囚犯进行阴暗野蛮的毒气项目研究,一直到战争结束。但是 97 名 T₄ 人员到第一批莱因哈德行动死亡集中营——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任职。他们是凭其献身精神和技术而被选中;他们是老手,能够手把手地把新手领进他们的职业世界。死亡集中营被稳稳控制着。

260

在我的样本中,67 人在莱因哈德行动死亡集中营服役。三分之二的人在 T₄。31 人是曾在 T₄ 服役过的前纳粹,还有 11 个是既在 T₄ 又在集中营或特别行动队中服过役的前纳粹。只有 3 人是新招的。伯利(1994:232)直截了当地把被调动者称为“冷酷无情的精神变态者”。资深管理者是迪特里希·阿勒斯,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一位在战争中死去的检察官的儿子。他 1932 年 22 岁时加入纳粹,利用家庭关系进入 T₄,1945 年之后依然是一个死不悔改的纳粹。他说被调动的人员本可以从他们知道会发生的对犹太人的集体杀戮中退出来,“曾经问过他们。这里存在个人选择问题”。阿勒斯后来在一次访谈期间透露过一种盲目跟风的反犹主义:“出版、银行、企业界;柏林的一切都在犹太人掌控之中。这不对。应该有一些德国人。”(塞雷尼,1974:60—90;225—226)整个战争期间,他们一直是这样。在波兰死亡集中营服役过之后他们又被转派从事其他杀戮活动,战争结束时他们在为意大利和的里雅斯特集中营工作。

基督徒沃思,(绰号)“野蛮的基督徒”,对一个党卫军上校来说显得非同寻常地残忍和粗俗。他是安乐死项目和后来的莱因哈德行动死亡集中营的流动检查员。绝大多数同事见他都害怕。斯坦格尔,特雷布林卡的指挥官,讨厌沃思对他人关于安乐死的“伤感的过分动情的话”的轻蔑态度——它让他想吐,沃思会这样说。事实上,

它是在“杀掉没有用处的人”。有一次沃思过来调查为索比堡准备毒气室被耽搁的事情。他冲斯坦格尔及其他人大声叫嚷,说他们纪律松散。他们必须杀死所有工作不恰当的犹太人:“如果你们当中任何人不喜欢这样,你们可以走。但是从地下面,而不是地上面。”当被告知毒气室还不能工作,他说:“好,我们现在用25个犹太工人来试它一下;去把他们弄过来。”他们被推进去,然后被施放毒气。当门未关好时,沃思大发脾气。艾希曼对沃思的“毒死犹太人”的“粗俗的没有教养的凶狠言词”感到惊恐。囚犯说党卫军惧怕他。阿勒斯的妻子,也是T₄项目人员,把他描述成一个“一个粗俗的、令人恐怖的人”,“令手下厌烦的人”。但阿勒斯认为沃思只是一个符腾堡人,“一个属于使用粗鄙语言和姿势的粗人”,一个就因为其属于粗犷型而被选上的“好士兵”。他确实是——一个“一战”以来屡获功勋的军士,一个早期纳粹,一个曾在斯图加特州议会前因暴行而受到指责的盖世太保军官。但是,奇怪的是,当后来监督提供奴隶劳力的集中营时,他增加了粮食配给,改善了条件。他的行为,较之他的语言,比一本正经的艾希曼和小心谨慎的斯坦格尔是否更坏?沃思让很多人既恐惧又感兴趣(例如,阿拉德,1978:182—184;戈德哈根,1996:305—306;塞雷尼,1974:54,80,97,110;威斯特里奇,1982:341—342)。

艾姆弗里德·埃伯尔是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第一任指挥官。1931年20岁时加入纳粹党,他在奥地利非法时期是专职的革命者,有一个极度纳粹化的妻子,曾是T₄的医生。但是他离开了躺在特雷布林卡周围的死尸,被解雇了。弗朗兹·斯坦格尔曾从T₄调任索比堡指挥官,而现在代替了埃伯尔在特雷布林卡的位置。弗朗兹·赖克莱特纳,一名职业警官和老纳粹,取代了他在索比堡的位置。这三个人是被沃思从他个人了解的可信赖的纳粹名单中挑选出来的。斯坦格尔是一位精干的管理者。他的当士兵的父亲殴打孩子,但在斯坦格尔8岁时死了。他在一家当地工厂取得担任织布工领班的资格,然后加入了奥地利警察部队。“他们向我们灌输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对立面的感觉:所有男人都被败坏了。”他自愿领受特别政治任务,得到

了奖赏。1936年他很可能秘密加入了奥地利纳粹党,被分派在吸收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反对犹太人第一阶段过程中担任特别警卫任务。1939年他被吸收加入了盖世太保和党卫军部队,公开宣布放弃天主教。他的遗孀不能肯定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追名逐利的野心或者是意识形态(塞雷尼,1974:232—233)。斯坦格尔是太普通不过的一个人,成为不了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但对一个喜欢特别任务的警察而言,纳粹主义似乎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引起了共鸣。

在莱因哈德行动死亡集中营军士中有一个人名叫库特·弗朗兹,来自被占领区鲁尔,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继子。他是一名厨师,1932年18岁时加入纳粹党。他在布痕瓦尔德接受训练,然后在T₄、贝尔热茨和特雷布林卡,用自认为幽默的话“人啊,咬那狗”指挥他的巨型犬去咬下囚犯的生殖器。他的特雷布林卡相册上的说明文字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威利·门茨是来自波兰的德裔难民,他在他父亲任工头的锯木厂中做工人。1932年他28岁时入党,尽管在被分配到T₄做医院工人之前没有纳粹前科史。他没有杀人,但对杀人场面已司空见惯。1941年被转到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之后他成为了最坏的卫兵之一,被人称为“弗兰肯斯坦”^{*}、“一个禽兽和施虐狂”。古斯塔夫·芒兹伯杰,苏台德地区的木匠,曾加入后来被并入党卫军部队的德国民族主义阵线组织。在T₄他是一名副厨,处于杀戮边缘,但在特雷布林卡,他日复一日把囚犯赶入毒气室,这样长达一年多。另一名卫兵说:

他的工作之一是站在毒气室门口,把他们赶进去。当然他有条鞭子在手上。他就干这个,日复一日。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喝得醉醺醺的。他还能干什么呢?他可以不干吗?我不知道。我想最终他也不在乎了——他可以喝呀。

* 著名电影怪物角色,借以形容威利·门茨的恐怖。

芒兹伯杰的儿子说：“我父亲？——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会以在家里对待他的木匠活同样的仔细认真对待在特雷布林卡的工作；那是他作为手艺人的首要素质。”（塞雷尼，1974：221—225）

古斯塔夫·瓦格纳，维也纳人，1931年20岁时加入纳粹党。作为激进分子，他遭到逮捕，然而1934年逃往德国。他加入了党卫军，被派到T₄工作，然后又转到索比堡，在这里他因业务精通而获得铁十字勋章。他通常被叫作“披着人皮的禽兽”，心血来潮时甚至将婴儿也杀死。“对他而言，用刑拷打和恣意杀戮是一种快乐。当他杀人时，他面带微笑。”“如果哪天没有杀人，瓦格纳会不吃饭。斧头、铁锹甚至他的两只手是他杀人的工具。他非见到血不行。”他自己说：“我没什么感觉……它只是成为了我的又一项工作。到晚上我们从不讨论工作，而只是喝酒玩牌。”卡尔·弗伦泽尔，“最残忍的卫兵之一”，凭着一条“非常自由”的鞭子，他在1930年19岁时就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在受审时他宣称：“在普遍的战争条件下……我不幸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是合法的。遗憾，我当时相信了它的必要性。”

262

幸存者经常把少数“文明”的党卫军——他们在同事不在身边时就很宽松，少数“魔鬼”，以及杀人已没什么感觉的绝大多数人区分开来。有人说弗朗兹·萨科迈尔（一个来自T₄的苏台德人）“比较文明。这不意味着萨科迈尔不打我们，所有人都殴打我们”。他们具有一种从“他们难以置信的权力”和他们面对他们所行之恶的“内在的泄气”中产生出来的“深深的根本性的无动于衷”。有些人会有犹豫的时候。斯坦格尔的妻子说路德维希曾不慎对她说出：“犹太人正在被杀掉……用毒气……那么多人。”她回忆说：“他接着说起那有多可怕，然后他说——以他刚刚同样的伤感的方式，‘但是我们是为元首做的。为了他我们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做这件事——我们遵从他的命令……你能想象如果犹太人控制了我們，事情会怎么样？’”当斯坦格尔回到家时，他的妻子质问他。斯坦格尔以典型的军官的口吻为自己自圆其说：“我的工作纯粹是管理性的……哦，是的，我看见了（杀人）。但是我没对任何人做任何坏事。”（塞雷尼，1974：136，178—182）

在死亡集中营,杀戮进程充满了施虐欲——欲望上来时强奸,遭遇最轻微的不同意或者一时兴起就殴打,拔掉金子做的补牙填料,扒光囚犯身上的衣服,用枪托击打他们的头并将他们赶至杀戮区域,将哭闹的婴儿往墙上连砸带撞。党卫军官方对为“历史必要性”的杀戮和为“政治动机”以及“自私、虐待或性”的动机的杀戮作了区分。如果一个卫兵因为他实际想要杀死犹太人而杀死了他们,这在官方被认为是非正常的,不是雅利安人而是劣等种族的特征(布克海姆等,1968:349—363;希尔伯格,1978:214;利特曼,1983:44)。一些身在边缘的人装着看不见。毒气室涉及来自党卫军机动车调度中的一些例行方法。他们的备忘录中显示出在堕入种族灭绝过程中运用一套委婉语言维持技术镇定的企图:试图击倒后门的临死的人变成“货物”问题;排泄物、小便、呕吐物和经血变成“厚厚的污垢”和“稀疏的流体”,不幸导致了生锈以及清洗问题(布朗宁,1985:第3章)。但是在集中营,暴力无处不在。一名索比堡卫兵说:“我无法排除任何索比堡集中营员工参加根除行动的可能。我们是外国土地上的‘兄弟帮’。”(阿拉德,1987:198)

事业路线之四:特别行动队的执法

263 种族灭绝在1941年升级。约有6000人轮流作为特别行动队的核心部队,以1.5万人的警察后备营作为支持,2.5万纳粹党卫队军人为侧翼。总共加起来,他们杀死的犹太人在100万以上。并非所有的军队都参与了杀戮——无线电话务员、摩托车手、伏案军官或女性办事员未参加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绝大多数男人都轮流参加过行刑小队。在某些部队中,所有人都被要求出现在枪杀现场——由共同的血液粘缚在一起的伙伴(阿伦特,1965:105,141;希尔伯格,1978:189—196,214—218)。

实际中他们谁也没有自愿报名要求去杀死斯拉夫人或犹太人。他们都是突然被告知有任务要他们执行。赖特林格(1968)认为即使是希姆莱自己的参谋班子——像伯杰、沃尔夫、洛伦茨和舍伦贝格这

样的人——大都没有迎接种族灭绝的准备，“作为外行、杂乱无章的人，并非对他们的任务没有排斥感……少量的怪人加少量的不能胜任的人，野心勃勃，充满理想”。希尔伯格(1978:649)观察到军官是受民族主义和飞黄腾达两者的吸引而投身于党卫军。然后他们接到致使他们逐渐进入谋杀地带的任务。他说党卫军中的每个律师都被认定适合加入特别行动队，每个金融专家都被认定适合参加死亡集中营的管理。但是他们同时也是全心全意的纳粹。在我的311个特别行动队成员中，只有35人是新招入的(包括21个职业警察)，76人只是纳粹或党卫军成员，6人只在纳粹党卫队，144人曾是纳粹和警察，48人是纳粹并曾在某集中营或T₄工作。警察经历在所有军衔中都显得很重要，而作为政府检察官的经历在军官中也很常见。

高级军官是经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挑选出来的。几乎所有特别行动队的高级军官都是在他们可能的最早时间加入了纳粹党、冲锋队或党卫军，通常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大多数人就在专业部门工作，尤其是法律部门，或在内政部。他们被选定为要完成崇高事业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暴力以前大多是口头上的，但是他们不想置身边缘。他们想要纳粹人生，而这需要行动。他们在特别行动队证明了自己，然后晋升了。实际上所有400名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领导人在战争末期都在那里服过役(怀尔德特,2002)。

奥托·冯·奥伦道夫1907年出生于汉诺威附近的一个安定的资产阶级家庭。1925年他还在学校时就加入了冲锋队，次年加入党卫军。在获得了一个法律博士学位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学院社会学家，1936年成为党卫军保安处的经济顾问。他与希姆莱的芬兰医生的谈话(克斯滕,1956:206—217)表明他是一位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行动的人，喜欢处于戈林的“大商业观念”和利(Ley)的“布尔什维克集体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经济政策。他认为社会应该建立在作为天然社区的种族的基础之上，但是他谴责德国人对乌克兰人的兽行，同时炫耀自己与克里米亚鞑靼人交上了朋友。希姆莱嘲讽他

是自以为正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加拉哈”*。他在1941年之前没有暴力经验。像比伯坦(一位前新教牧师)一样,他让人感觉到需要增强体质。他拖延加入特别行动队命令的时间,但又被同辈责备他因怯懦才接受命令的话刺痛。他发出了杀死数千名犹太—布尔什维克命令,但是如果他的手下对行刑行动感到很享受的话,他就会反对。他在纽伦堡一次审判中忏悔,然而其效果又被他给妻子的一封信折抵,信中他问道:“当面对行动中的恶魔进行着一项反对我们的斗争之时,我们还能怎么办?”

温曼兄弟,即厄恩斯特和欧文,出生于天主教南方的蒂宾根**;他们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他们在学生时期就加入纳粹。厄恩斯特成为一名牙医,欧文做了一名医生。厄恩斯特终止业务,做了蒂宾根的纳粹市长。欧文关门歇业加入了党卫军秘密警察。两人后来都获得提拔,成为高级党卫军军官和高级警官。阿尔弗雷德·菲尔伯特博士(迪克斯,1972:204—227,“个案研究证据”)是一名纳粹,出生于被占领区鲁尔,一位后来变成邮政雇员的陆军军官的儿子。1932年当他还是一名法律专业学生之时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成为一名检察官,然后从1935年始担任保安处情报部军官。他很快晋升为陆军中校,出席了万塞会议。他通过领头开枪射杀树立榜样,以确保所有他的部下都参与杀戮,他威胁说任何表现出心慈手软的人,都会得到“难以忍受的后果”。他不允许他的手下使用与任何犹太人一样的餐具。一位他参谋班子中的军官后来哭诉:“我已让自己背上了一个刽子手的农奴的骂名”;另一位军官说:“假如有任何人现在告诉我他不是反犹主义者,他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杂种。”这些指挥官都必须每天向司令部报告情况。他们的报告中充满了对犹太人、斯拉夫人、“反社会者”和“下等人”的种族污蔑。

沃尔特·布卢姆是一个反差,他是一个软弱而又野蛮的指挥官,

* Galahad,亚瑟王传奇中的圣洁骑士,据说通过圣杯可见到上帝的显现。

** 蒂宾根,又译图宾根。

这引起了统治集团的关注。他是多特蒙德一中学教师的儿子,1933年加入纳粹,可能还更早。在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之后他被派往多特蒙德盖世太保组织,在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升任高级职位。但是他的表现证明他不善决策并对枪杀妇女和儿童感到恐惧。他的军官同事形容他“软弱又刻板”。他被召回柏林,然后送至雅典担任一个边缘职务——警长。他在那里以对希特勒的崇拜和他的缺乏想象力、机械的习惯而闻名,被称为“固执的猎犬”。当1944年失败的阴影开始显现,布卢姆变得更加野蛮,强烈要求推行一种焦土政策,即他的“大混乱论点”。然而外交部的纳粹和希腊通敌者对上层统治集团有更大影响,使得他被罢免了(梅佐沃,1993:231—234)。限制还是存在的。杀戮被认为是严格和系统性的,不是不加区分的自杀性的众神的末日(Gotterdammerung)。

低级军官、军士和普通军官当初是从战前党卫军志愿者当中挑出来的。大多数人似乎热心于他们的任务。中士赫尔穆特·劳卡是一名职业警察和老纳粹。他以他的风度和对秩序的尊敬来打动上级。他曾写信给他们说:“我的理想是在秘密警察中一个担当责任的位置上体现我的国家社会主义精神。”他在对犹太人居住区的清洗中表现得杀气腾腾,异常突出。在对他进行审讯时,证人称他“彻头彻尾地忠诚,一个希特勒信条的真正信奉者,坚定的优等种族论持有者中的一员”(利特曼,1983:15—16,161)。马克斯·克拉纳是莱茵兰人,在他父亲的锻造车间工作,是1937年起就加入盖世太保的老纳粹。他曾自愿参加特别行动队,在明斯克附近射杀50名俄国平民。他说:“我一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想要与共产主义作战。”奥地利军士长费利克斯·兰多有一个犹太裔的继父。他因纳粹煽动被驱逐出天主教学校,学习了细木工艺,但却成了一名职业士兵。作为一名老纳粹,他参与了1934年的奥地利纳粹政变,遭到囚禁。1937年被释放后他加入德国盖世太保,并以这种身份参加了1939年的波兰战役。他的特别行动队日记的主要内容是为他的女朋友未能写信给他感到痛苦。他用他们以前的罪行来为杀死犹太人辩护,尽管他确实说:“我根本不想枪杀手无寸铁的人——即使他们只是犹太人。我更

265

宁愿正大光明地公开较量。”但是他“完全未被感动,没有怜悯,一点点也没有”。他称一位试图保护犹太人的国防军军官是“最坏一类的国家敌人”。“谁会想到这样的事会发生?那绝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中尉卡尔·克雷奇默告诉他的孩子说犹太人引发了战争,他们是罪有应得——“不能忍受看见死人的现场是一种弱点;克服它的最好办法是更多地去看。然后它就成为一种习惯了……我们对元首的信念让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给我们去完成艰巨和无悔的任务的力量”。两个摩尔人兄弟,威廉和约翰,是来自波兰的德裔,1939年被征召进入波兰军队,与德国作战。他们从一个战俘营中被挑选出来去帮助德国人的事业,他们的波兰语及乌克兰语能力使他们被分配到了保安处工作。尽管他们表面上不是纳粹党成员,然而他们的勤奋让他们晋升为中士,负责训练和领导乌克兰援助军队。两个人都心甘情愿参与集体枪杀。一味追名逐利加上对德国种族优越性学说的接受似乎是驱使他们行动的动机。

但是随后的扩充就把中年的预备役和受伤的士兵从前线带了回来,他们仅接受了一个月时间的训练(包括对犹太布尔什维克党派意识形态的介绍)。一些人终于适应。中士马吉尔是一个骑兵,其马术技巧受到党卫军的赏识。他最终被分派到特别行动队。像其他受到这个未来期望的强力政权赏识的体育人物一样,他陷进去了,对受到重视表现出无尽感激,不再会反抗。中尉汉斯·里茨,东普鲁士人,是一位自由派中学教师的儿子。他在希特勒青年团中任过官职,1937年18岁时加入纳粹党。1939年他应召入伍但因疾病被退了回来。1943年他再次应征加入哈尔科夫保安处。刚一到达,他的上级就催他“表演给我们看看你能干什么”。“因不想造成一种坏印象,我从一位党卫军士兵手中拿过一把冲锋枪,打死了囚犯。”自此之后他奉命杀人。

其他人则犹豫不决。电传打字机工程师基巴赫不是纳粹,没有受过谋杀训练。他至多只能开五次枪,而且这样就会感到恶心。他站在一边,因软弱受到同伴的嘲笑。少校弗朗兹·莱希塞勒是一名职业警察,51岁,莱茵兰人,不是纳粹。他的晋升姗姗来迟,因为人

家认为他有左派倾向，还开反对希特勒的玩笑。当被命令杀掉明斯克犹太人时，他大声抗议。在被他的上级架空之后，他采取规避行动，将枪杀任务分配给立陶宛援军部队而自己远离现场。士官汉斯——乌尔里克·沃纳参加了杀戮，然而却说，几乎无法想象需要什么样的钢铁神经才能执行那里那样可怕的任务，太吓人了。毒气室操作者拒绝结束尚在喘气的受害人的性命，所以那位军官发誓，自己动手了。一个战争记者证实了不同的反应：我看见保安处人员在哭泣，原因是他们不能在精神上面对目前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又再一次碰到手里拿着一个成绩单的其他人，那上面记载着让他们送往鬼门关的人数……有些人已经自杀了……今天有谁能判断出哪些是在执行命令时哭泣的人，而有哪些是留着杀人成绩单的人？（克里，1991年：62,67,72,129,169—171）这些人比起在集中营的那些人来说，已是一个差异更多的凶杀犯群体。

普通杀人者？后备警察营 101

我们对后备警察营 101 知道得最多。在 1942 年 7 月到 1943 年 11 月期间的波兰，那里的 550 名士兵开枪打死了 3.8 万名犹太人，还要加上许多波兰人和俄国人。他们强行将另 5 万名犹太人驱逐至必死无疑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平均每个警察杀死 100 名受害人，整个过程大都是由 10 到 20 人一组的警察以连射方式完成。因为他们不是熟练射手，警察有时身处在满是血污和排泄物中的成堆的尸体之中，尸体一直堆至警察的膝盖那么高。这让他们胃部痉挛，拉稀腹泻，致使噩梦连连，神经几乎崩溃。他们“喝掉了惊人数量的烈酒”去麻痹感官（希尔伯格，1978：218,249；赫斯等，1978：95）。

警察营起初是为德国的地方职责而组建的。战前招的兵是志愿者，但是战时招入的新兵是应征入伍的兵，比陆军新兵年龄要大。他们训练极少，而且根本未受过大屠杀训练。警察营已由布朗宁（1993）和戈德哈根（1996）分析过了。他们说大多数的普通士兵是汉堡的新征入伍兵，平均年龄 36 岁。在 100 个婚姻状况公开的人当

中,99人已婚,72人有孩子。以前最普通的职业是警察,其他大多数是工人。布朗宁认为这些普通人参加谋杀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恐惧型和因循守旧的杀人者,戈德哈根认为这些普通德国人杀人是因为他们是反犹太主义的偏执狂。

这不是在战场上。他们安全地处于前线后方,只有1名警察被游击队打死。战场愤怒不是他们的驱动力。为什么他们继续照常杀戮?这个问题可以向30个警察营的1.5万名警察发问。这是大屠杀——大规模的受害人,大规模的施害人。当被命令开始第一次射击时,指挥官特拉普少校,出现明显的犹豫迹象,并出人意料地给予手下人去处决的机会。只有12名士兵上前一步,然后他们被分配到其他地方,没有受到处罚。在后来的暴行出现场合,在有更多的思考时间的情况下,布朗宁(1993)说警察营10%—20%的人会选择不在现场,有时是官方的意思,有时是非官方的。他们愿意落在后面,消失或故意射失。少数人暗示是出于道德考虑或把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支持作为理由,或者说他们对警察没有职业性追求。更多的人将之归于身体反感或虚弱和恶心。但极少有人申请调换到其他地方。人们有可能偶尔认识某个受害人,某个以前的邻居,工作同事或者参加“一战”的战友。他们不得不枪杀曾作为仆人与他们一起生活过几个星期的犹太人。所以他们会叫其他人去杀人,或者他们会在背后突然动手,以“不伤害”受害人。这确是低水平的怜悯。

在另一极端,戈德哈根(1996)举了警察兴味十足地参与谋杀的例子。“猎寻犹太人”的照片看上去像是无忧无虑的乡村野餐。他认为绝大多数施害人是受“清除主义者的反犹太主义”的驱使,尽管这看上去过度地简单了。布朗宁说绝大多数人只是接受了某种盲目的反犹太主义,它在战时渐成为一种“敌人的形象”。哈伯勒(2001)说到在白俄罗斯的德国警察,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是凶恶的反犹太主义者,恰与极少数拒绝命令、帮助犹太人或故意向旁边开枪的人相抵。绝大多数人在一开始的犹豫过后还是遵照上级命令执行(参见伯恩,1998:122—128)。布朗宁的警察需要避免战后迫害,所以声称“我只是服从命令”,把所有纳粹或反犹太分子的狂热推卸到几个军官和军士

(NCOs)身上,后者被形容为“残忍”、“无情”、百分之一百一十的纳粹,起的绰号有“被下了毒的小矮人”、“强击手”(slugger)。在被问及他们为什么杀戮时,绝大多数人难以回答。一些人说他们对此没有多想,其他人说他们自己的射击并不重要,因为犹太人“终归是要接受他们的命运的”。有些人承认他们曾表现出软弱或怯懦:他们应该站出来,拒绝执行命令。他们仅仅偶尔承认有种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思想。一人回忆说:“我们不承认犹太人是人。”然而真正的对犹太人(或波兰人)表达同情的方式也没有。

警察营 101 陷入第一次大屠杀之后的惊魂未定之中。不同寻常的是,它里面同时包括了男人、妇女和儿童。没有经过先仅杀掉年轻人——他们据称可能是游击队员——来逐渐适应的过程。它是令人痛苦而难忘的,没有人事后愿意谈起它。他们试图装着它好像未曾发生过,当晚大量饮酒。然而,像其他施害人一样,警察变得多少有点习惯性,学会了让他们的杀戮办法变得更加迅捷和干净,同时将更多的杀戮任务委托给外国援军。也有局限性。一位被描述成“狂热的纳粹”的军官把他怀孕的妻子带过来看士兵射杀犹太人。她似乎很享受,但士兵们吓坏了。他们为一个怀孕的妇女看着他们在做的可怕事情而感到愤怒。

我们也应同时将士兵放在制度环境下来看,放在他们孤立、严密和纪律严明的军事编队的背景下来看。他们能够拒绝执行谋杀命令吗?他们本来就是恐惧的杀人犯吗?战后西德战争罪起诉部门试图一次性确定回答这个问题。在对他们广泛大量的记录材料进行一番搜寻之后,他们说他们没有发现“其中拒绝执行命令会给接受命令的人的生命带来客观的危险”的案例。这本可以作为对战争罪指控的可以接受的合法辩护(鲁凯尔特,1979:80—81)。因而有些人说被命令去施行谋杀的人可以拒绝命令而不带来严重后果(布克海姆等,1968:390—395;戈德哈根,1996:278—279)。巴赫-齐烈夫斯基自己说拒绝有可能带来“某种纪律性处罚,但是对生命的危险则根本不包含在内”。

至少三个指挥官拒绝了。厄恩斯特-博杰·埃勒斯一开始就拒

绝,被调至某公职岗位。欧文·舒尔茨,来自柏林,是一位保守派纳粹,1931年在警察部门从事间谍活动,1933年公开宣称自己为纳粹。1935年他被分派到保安处,但却发表反对“水晶之夜”的言论。1938年他帮助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第一个神出鬼没的特别行动队。1941年他成为帝国中央保安总局训练处的头,批评学生从在俄国的射杀现场返回。他亲自张贴悬赏公告。他服从并监督1941年7月到8月之间的杀戮行动。然后他又不干了,被调回他在柏林警察学院的旧职位,在这里他一直待了下去(克里,1991:82,86;战犯审判,1946:特别行动队卷宗第4部分:“舒尔茨书面陈述”)。奥托·拉希,一个东普鲁士砌砖工人的儿子,是一名老纳粹,自1936年始就在盖世太保中服役。起初他是一位小心谨慎的特别行动队指挥官,但止于基辅大规模枪杀行动,并拒绝参与其中。三人谁也没有受到处罚,任何有名的军官都没有。绝大多数人很可能听说过德国军队准则第47段,允许他们抵制非法或不道德的命令。当然,拒绝会毁掉他们的前程。但不服从可能对普通官兵会更加严重。单单“伤害的可能性”不是一个能够被接受的合法辩护,但它仍然会震慑住我们大多数人。正如理性选择理论家提醒我们的,我们可能会为仅仅是极微小的被杀害的可能而受到惊吓。我们却是有值得相信的威胁的例子。克里斯琴·沃思对哈泰姆医院员工致欢迎词。他解释了工作的性质,然后总结说:“首先,这意味着对死刑痛苦保持沉默。无论谁,若不能保持沉默,将会去向某个集中营,要么被枪毙。”护士、护理员和文书说沃思不断地用“集中营,要么枪毙”这样的选择来威胁他们(霍维茨,1990:70—79)。特别行动队指挥官菲尔伯特和斯塔莱克也威胁他们的手下。党卫军中尉哈特尔拒绝指挥一个行刑队,他说:

大量的在当时威权主义体制和像斯塔莱克这样的严厉凶狠的指挥官统治下的下等士兵甚至从未有过要表达他们内在冲突的念头,私底下担心拒绝参加枪杀行动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依我看,在下等士兵中,与其说有一种服从命令的客观必要性,不如说是一种主观的必要性。(克里等,1991:84—86)

这当然是正确的。绝大多数军队中的普通士兵没有意识到或者怀疑他们的宪法权利。三心二意的普通军官极少要求调动；相反，他们请求能退下来。一个指挥官，马丁·桑德伯杰博士，自己也态度矛盾。他是一个铁杆老纳粹，然而又是有一定道德正义感的职业警察。他为保安处“充满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所吸引，但“水晶之夜”又使他对此感到后悔。然而他响应了特别行动队的号召，恪尽职守地完成充满血腥的任务。他对手下的允诺是双刃的：“如果有谁不在这里尽其责任，我将送他回家”；然而他接着说：“这不会恰好有助于我们未来的前程。”有个人说他服从是为了“我的晋升机会不被毁掉”。其他人作证说那些退下的人将会面临因“怯懦”、无力采取“严厉行动”或因不像一个党卫军应该表现的那样强硬而在其他所有人面前丢脸的危險。恐惧渐渐化作追名逐利、遵守纪律和伙伴型的动机。

下士勒德克(迪克斯讲到的副郡长,1972)就是例证,尽管是在集中营的背景之下。他出生于但泽,是一个细木工工匠的儿子、犹太人企业的销售员,1934年因为一般的爱国理由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但不久就参与到秘密的纳粹警察工作之中。在1939年但泽解放之后,他被分派到某集中营工作。他一次又一次申请被转到实际责任部门但遭到拒绝。他当时是一名从事致命注射和毒气“消毒”的勤杂工。在战后对他的审判中他变为遭到迫害的见证人,说他恨他这种可怕的工作。因为害怕报复,他不愿意公开拒绝命令。“我曾尝试做一名强硬和忠心的党卫军军人”,“当有他人在旁边的时候”变得凶恶。但是他的神经在一次枪杀行动期间崩溃,他垮掉了。结果并不坏。他被转到一个安静的幕后工作岗位,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他已经到了压力极限。他的缺乏道德勇气,让他消沉了一年;他害怕他的上级和他的同事叫他“胆小鬼”(sissy)。恐惧渐变为墨守成规。

我们回到警察营101。两人作证说:“你可以远离处决行动……如果你感到不能胜任任务。”但是过多地如此是有危险的。因为极少人真的选择退出,这样的人选可以静悄悄地在军官中产生,后者希望表现出的是精干的指挥官形象。假如反对者人数多到足以威

胁任务执行,党卫军统治集团肯定会开始报复,就像在其他军事哗变中表现出的那样。警察有理由害怕——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战友也会拒绝的话。这对他们是一个很难作出的决定——从而我们也就很难对他们作出决定。他们肯定缺乏道义勇气,但我们也有可能。

戈德哈根(1996)描述得好像普通警察的愿望符合一个警察营的行为。这是过于个人主义和“民主化的”一个假定。正如哈特尔强调的,这些部队是强制性军事编队,处在“来自元首本人”的党卫军命令的管束之下。布朗宁具有更多的社会学自觉,重视等级制度,特别是来自伙伴战友的压力。逃避者因软弱蒙受羞辱,而如果某人开枪未中目标,他的战友必须要射杀更多(1993:185)。布克海姆等(1968:343,386)持同样看法:“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使自己变得对他的社会环境‘不可接受’以及切断与它的联系。”党卫军战友关系缓和了严厉的纪律,带来了温暖和“最小程度的道德生活水平”。不去杀戮的耻辱抵消了杀人的罪感。军官们承认这一点。奥伦道夫不准他的特别行动队中出现个人射杀行动,“以便被安排去执行处决的人无需为作个人决定而犯难”(战犯审判,1946:第8卷,“奥伦道夫的书面陈述”)。

另外,警察营101不全是普通人组成的。38%的警察是纳粹党成员,是当时全部德国男人中成员人数的双倍。军衔越高,纳粹越多。尽管少校特拉普是一名职业警察,不是纳粹,但他的两个上尉是狂热的纳粹党党员和党卫军成员。7个中尉中至少有5个是党员,尽管一个也不属于党卫军。32名军士全是职业警察,其中22个是党员,而7个同时还列在党卫军中。主要军官、军士和更有经验的普通军官是职业警察:20%的人有着在警察工作日趋暴力、不受法律管束的某法西斯国家维持治安的几年经验(伯利,2000:158—186)。合谋参与种族灭绝越是严重,这些倾向越是普遍。来自警察营的实际犯有战争罪的13个人中有10人是纳粹成员(2个老纳粹、4个年轻纳粹和3个见风使舵的纳粹)。13个人中有7人是职业警察(只有1个服役时间在纳粹攫取权力之前),2人曾在1939年经征兵加入警察队伍,只有4人是1941年征召入伍的。有6人实际上来自汉堡地

区；3人来自萨克森，1人是奥地利人，而3个人来自受威胁的边境地区。这名奥地利人曾参加了1934年的纳粹起义，而至少有4人在1939年的波兰战役中服过役，此时德国警察营已经杀死了很多的平民。甚至这里——在此对种族灭绝的补充募兵多少有点随意——统治集团和有经验的核心层大都是纳粹或已熟悉暴力的内行，他们命令和训练生疏无知的新兵加入种族灭绝。

事实上，伯恩(1998:117—120)说，警察营101很可能比其他警察营包含较少纳粹，也较少沾染暴力。“300人级别”的警察营只是由职业警察和自愿者形成的，而有几个警察营整个部队都在1939年的波兰服过役。在警察营309，在14个被指控犯有战争罪的人当中，13人是职业警察，8人是纳粹成员。迪安(2000:64)说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德国警察中，大约有一半受过希姆莱的审查，而一半是更普通的年纪稍长的警察。还请注意，警察营包括了不到一半的特别行动队。核心层是特别挑选出来的部队，尽管最大的部分是来自纳粹党卫队，在 frontline 遭受并一直保持着极高的损失。偶尔这些士兵也对囚犯施行屠杀。那些在西线(1940年的英法殖民主义军队，1944年的加拿大和美国人军队)的人记录最全。还有在纳粹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和集中营之间进行的正常性转让，这使它们变得更加残忍(斯坦，1966:76—78, 258—264；西德诺，1977:106—117, 313—342)。这些军队中许多人都不是第一次实施暴力。

在1941年夏末，纳粹领导层突然需要更多的会打枪的施害人，要的太多，无法一个个地挑选。它通过集体挑选寻找可靠的士兵。它选择了纳粹党卫队部队和后备警察营，因为这两个都已经决意追随纳粹国家的意志，已经杀害过波兰的平民，并且可能包含大量的纳粹分子。这不是一伙一般的德国人。然后他们被来自统治集团和伙伴的压力给予一个更加单一的目的。盲目的反犹主义被转变成对某个战时敌人的仇恨和非人化对待，以帮助消除对杀戮手无寸铁的人的道德禁忌。虽然一些人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带着热情或无情地杀人，但极少有人杀人时没有身体或道义上的犹豫。然后酗酒就开始了。

这些混合的动机帮助 5 万德国人杀死了 100 万受害人。但是纳粹精英逐渐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完成任务。一位跟随特别行动队的精神病医生估计有 20% 的军人患有心理“分裂”，一半是因为他们的任务“令人不快”，一半是因为道义上的犹疑。一位军官作证说：

272

在第一波枪杀过后出现的情况是士兵们，尤其是军官，不能应付落到他们身上的压力。很多人开始酗酒，不少人患上了神经瘫痪和心理疾病；例如，我们当中出现了自杀，出现了一些人精神崩溃、向四周胡乱扫射、完全失控的情况。当此情形发生之际，希姆莱发布了一个命令，命令中说任何不再感到有能力承受心理压力的人应该向上级军官报告。这些士兵将从他们现在所担负的工作中撤下来，派遣回家做其他工作。我刚想起来希姆莱甚至为了这种情况而在柏林附近建起了一个疗养院……依我看这……是一个把戏……因为毕竟哪个军官或党卫军士兵会以这样一种方式露面呢？任何宣称他太软弱、干不了这样的事的军官将会被认为不适合当一名军官。（克里等，1991：81—82，111）

但是希姆莱确实留意了。他寻找到一种不会让德国军队士气低落的杀人方法。大规模射杀被放弃，转而倾向一种主要由非德裔操控的毒气和死亡集中营。这无比清楚地证明，戈德哈根夸大了他的普通德国特别行动队成员热情参与谋杀乃是因为他们是偏执狂这样的研究结果。他们谋杀是因为更多的不同动机以及社会压力，这最终导致他们心灵受到伤害。诚然，犹太人和匪徒也就一样死了。

事业路线之六：国防军

国防军很可能施行了最多的由普通德国人完成的对平民的屠杀——或许加起来有 100 万人。因为这些杀戮不是例行的，因此只有极少数的施害人被确定下来。德国学术界现在强调军队在种族灭

绝中的作用,重视武装部队和纳粹之间的一种可选择的亲密关系(格拉克,1999;希尔,1997)。正如我的著作《法西斯主义者》表明的,纳粹主义在那些具有军事官僚背景的人中有很大的反响。正如在很多现代战争中一样,士兵也很快就染上了敌人的种族主义偏见。1939年德国士兵的家信中关于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内容证明了这一点。二者都被描述为下等人或劣等人(Untermenschen)。“波兰狗”行事表现出一种“非欧洲”甚至“非人类”的方式。犹太人被称为“敌人”。这并不会导致例行谋杀,因为士兵们指望能按照他们的偏见行动而且军队也会惩罚暴行(罗西诺,1997)。这与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态度和行为类似(如道尔1986年所指出的)。许多军官,受了旧式的战争规则教育,对特别行动队在波兰战役中的活动感到不满,尽管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认为特别行动队在军事上多余,因为波兰军队已经处在崩溃瓦解之中。

到1941年时,希特勒将最高司令部清洗一遍,宣布军事管制法优先于军事法庭。纳粹现在掌控局面。在俄国战争早期日子里军队抵抗持续不退。一位反情报上校在1941年12月写道:“在所有与军官的延展性谈话中,他们不等我提起就问我关于枪杀犹太人的事。我的印象是,对犹太人、囚犯以及还包括政治委员的射杀受到军官团几乎全体一致的拒绝。”(霍夫曼,1988:132)然而绝大多数十分审慎的军官选择了一条摆脱困境的中间道路,把囚犯交给了党卫军而不是保护或自己杀掉他们。有少数人确实拒绝将他们交出去,但是进一步的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改善了”局势,确保了一种“更令人愉悦的关系”(阿拉德,1989:211—212,218—220)。纳粹上将赖歇瑙提醒军官,战争的目的是反对威胁德国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制度”。士兵必须明白“对犹太亚人类采取无情然而正义的对抗手段的必要性”。游击队“暴动总是由犹太人挑起的”。冯·曼斯坦因上将公开宣布犹太人是红军和游击队之间的联络人。当部分将军仍然拒绝执行杀掉俄国战俘的命令时,有关方面安排了一场辩论。赖内克将军认为这不是一场国家与军队之间的战争,而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殊死”斗争。苏联战俘不能指望与在西线

的战俘得到同样的待遇：“布尔什维克亚人类”应当被“毁灭”。上校拉豪森（不是纳粹）持异议，认为当着军队的面执行的处决损伤了他们的士气，使俄国人不肯投降，从而要牺牲更多的德国人。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曾警告他不要运用人道主义论点。拉豪森输掉了争论（战犯审判，1946：第8卷，“拉豪森书面陈述”）。

希特勒继续罢免持不同意见的将军，而德国士兵不久就达成一致：这是一场针对一个极其无情和可怕的敌人的毁灭性战争。巴托夫（1985，1991）说军官和士兵的纳粹化随着伤亡的增大和新兵年龄的下降而加剧，贯穿战争始终。1944年，29%的军官是纳粹党成员，而整个德国中产阶级的纳粹只占16%。纳粹军官也受过更多教育。种族主义渗透在日常命令之中：“在政治委员身上我们见到整个赤色制度的亚洲型堕落”或者“布尔什维克主义教导年轻人不是去贯彻某个观念，而是犯罪。它的战斗手段偏离了亚洲头脑”（希尔，1997：88）。巴托夫说（1991），只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背景才能为年轻人中的种族主义和元首崇拜提供解药。与1939年不同的是，人们有了杀死、强奸和抢劫斯拉夫和犹太平民而不受惩罚的自由，尽管其他所有的纪律违反将受到无情的处理。高死亡率还削弱了主要群体作为一个独立力量进行社会化的能力，对元首的信任直到最终也未见减少。1944年阴谋策划反对希特勒的军官知道，他们不能依赖来自一个单独的军队单位的支持。士兵写给家里人的信更加具有种族主义色彩。俄国人被称作是“自相残杀的一堆堆士兵”和“没有教养的多种族的人”。国防军正在为堵住“亚洲—布尔什维克”洪水、保卫人类不受恶魔般的敌人的攻击而奋斗着。当他们看见饥饿的俘虏相互残杀以便夺得扔向他们的不多的几片食物时，这似乎就证实了他们的“亚人类”性质。中士富克斯写信给家里的妻子说：“你几乎还没有看见过一个看上去理性和聪明的人的脸……他们眼中的那种野蛮、几近疯狂的样子让他们看上去像傻瓜一样。”（巴托夫，1994：128）

274

并非所有这些都是直接由于纳粹种族主义。我同意赫尔（即将发表）的论点，即近代德国军国主义已发展至信奉一种更加无情的“殊死”的“总体战争”。这是一种极端的冷酷无情的战争。国防军

最高指挥部越来越多地责令来自任何平民大众的任何迹象的异议，不管是不是来自雅利安人，都采取残酷无情的手段。以下是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给一位意大利将军讲如何对付希腊人的反抗的话：“发布紧急命令，以最残酷的手段镇压这种新出现的土匪行为。以德国经验，比如在挪威，从一开始就采取以上这种无情手段起到了作用。而假如要焚烧一个村庄但没有正当理由，那也不要紧——将要展开一波快速而凶猛的进攻这句话传出去，那也管用。”在纳粹眼里，挪威人是北欧的日耳曼同胞，而希腊人开创了欧洲文明，然而两者都应该给予残忍对待。凯特尔是一名纳粹，而他的行为也像整个历史上更无情和更冷酷的将军一样。1944年在希腊的国防军甚至在意大利离开战争之后对他们的前轴心国盟友变得最为残忍。在凯法利尼亚，将近5000名意大利人在投降之后被行刑队打死（梅佐沃，1993：146—147, 150）。

绝大多数巴尔干暴行是根据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施行的（布朗宁，1985：第2章；希尔伯格，1978：433—442；梅佐沃，1993：155—218；斯坦伯格，1990）。由于激烈的游击队抵抗出乎他们的意料，军队利用经常受到在东线的残忍训练的部队发起了针对平民的报复行动。陆军元帅威廉·利斯特不是一名纳粹，而是早期东线战场的温和派，现在变得凶残了。塞尔维亚人是“易怒和……残忍的”。“塞尔维亚的个人在正常状态下无疑地与所有别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一旦有了差异，由他们静脉中的热血引起、由数百年土耳其统治引起的残酷就爆发出来了。”他的奥地利下属弗朗兹·博姆将军说，这是“1914年德国人的血液因塞尔维亚人，包括男人和女人的背叛而在此流淌的国家。你们是这些死者的报复者。一个有威慑力的榜样必须在整个塞尔维亚树立起来”。大多数这些国防军团是奥地利人，他们被希特勒认为是最适合用来平定巴尔干地区的（布基，1992：221—222）。一位将军解释说他们已经继承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帝国中的“非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的轻蔑，这其中包括塞尔维亚人（斯坦伯格，1990：37）。是奥地利的军需官第一个建议，每被杀死一个德国士兵就要换取100个塞尔维亚人被枪毙，每受伤一个要换取50个塞尔维亚人的

275 性命。如果可能的话,遭受损失的部队应该担任枪杀任务,鼓励报复动机。像通常在游击战争中一样,他们极少能够辨认出实际的游击队员。博姆的参谋班子挑选了“所有共产主义者、所有被怀疑像这类的人、所有犹太人和一定数量的民族主义者和有民主倾向的居民”。吉卜赛人照例被算上,偶尔还有“罪犯之类”。党卫军上校特纳,试图让地方当局将他们驱逐出境,结果高兴的是军队倒把他们枪杀了。他报告说:“塞尔维亚是唯一犹太问题和吉卜赛人问题都解决了的国家。”少数军官警告说如果不该处决的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被处决,则更多的当地人会成为游击队员。但是关于克里特,斯图登特将军命令对抵抗德国入侵的当地人口实施“报复行动”。他命令“(1)射杀,(2)强迫征税,(3)焚烧村庄,(4)根绝整个地区的男性人口”。最高指挥部给予军队“根绝这一瘟疫”时的司法豁免权。动用“任何手段,甚至针对妇女和儿童,只要它们有利于成功”。超过 1000 个以上的希腊村子被摧毁(梅佐沃,1993:173,176,183)。

相对一般的军官则无奈地被卷入到此类兽行之中。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战后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和奥地利总统的杰出成就让我们对一位陆军中尉有了一种特殊的印象。他被曝光的过去没有显示出任何与这里描述的绝大多数党卫军暴行的相似之处。尽管这样(尽管他否认),瓦尔德海姆肯定曾出现在报复性殴打和 1942—1944 年间的谋杀行动现场。作为一个奥地利学校管理员的儿子,他是维也纳的一名学生,在那里他加入了纳粹学生联盟和冲锋队(在非法时期)。1936 年他 18 岁时自愿报名加入了国防军但直到 1939 年才被征召入伍,成为一名情报官。南斯拉夫政府 1947 年编撰的关于瓦尔德海姆的档案(在他成名前)引用了目击证人证明他帮助组织“谋杀”和“处决人质”的证词,尽管他没有亲自扣动扳机。军队记录中将他列在被分配了“特殊任务”的名单之中,他所在的师的报告对该任务的解释是对亚人类“不带同情与怜悯”地执行的“最后清算”,因为“只有一颗冷酷的心能掌控需要掌控的东西”。绝大多数受害人不是犹太人,而是塞尔维亚及希腊村民。他自己的报告提到清洗和对许多可能几乎没什么武器的游击队员的常见的杀戮(739 人死亡,63 件武器)。

他被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授予勋章(其他许多人也获得勋章)。1942年他短暂离开,去完成他的关于一位19世纪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博士论文。其中他写道:“由于目前帝国与非欧洲世界的严重冲突,在帝国领导下的欧洲所有民族的壮观的合作中,针对……来自东方的危险的方法已经准备妥当。(帝国)的实现是德国的理性召唤……欧洲已经因德国而陷落,但正是通过德国它才一定能够复兴。”(艾希曼与韦格曼,1988:第4章)瓦尔德海姆很可能是一个没有落入暴力陷阱前科的理想主义的纳粹。一种这样的纳粹主义和对傲戒性镇压的军队战术的适应性的结合肯定消除了他这一代的许多年轻军官的道德犹疑。

很多人闷闷不乐。在南斯拉夫,奥地利士兵在一场大规模杀戮之后的夜晚出现了“心理障碍”。在希腊,曾杀光了科密诺村庄所有村民的士兵在过后变得非常安静。“大多数战友情绪非常低落。几乎没有人赞成行动。”有些人过后抗议。一位军士对他的狂热纳粹军官喊:“赫尔·奥伯勒特南,请记住,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像这类的事情。这是一种与打仗毫无关系的耻辱行为。”一位中尉说他“觉得恶心……这样一种行动与一名德国士兵的身份不符”。但是当一位军官对他们咆哮,让他们服从命令,以如果他们不按照“必要的严厉”行动将遭遇报复相威胁时,他们便停止了抗议。科孚国防军指挥官埃米尔·耶格坚决准备停止对岛上犹太人的驱逐行动。但是当换由海军来执行驱逐行动时,他把任务让给了对手。士兵们还有一个选择,然而“最终我们缺乏勇气逃跑。没有一个人开小差跑掉”。极少有谁越出战壕走入旷野而受到处罚(梅佐沃,1993:195—200,211—215,253—254)。这是世界上受到最好训练的军队,保持团结一直到底。然而如此好的军事作风居然被颠覆成对平民的卓有成效的屠杀。

276

第8章和第9章的结论

大多数我样本中的骨干施害人是真正的纳粹。三分之一有严重的战前暴力经验,而绝大多数人经逐渐上升的暴力中的经历而进入

全面的种族灭绝行动。新兵占包含许多国外德裔的群体——被前进中的德国军队解放——的施害人的比例只有10%。我样本中处于中位的人在三个不同谋杀类型的种族灭绝机构服役了四年。虽然他们在这些机构中都几乎是以出乎意料地被要求去杀人这种方式开始的,但到约1942年前,他们已经走上了职业谋杀生涯。

他们绝大多数是男人,但来自各个社会阶层。他们大量来自民族国家纳粹的核心拥护者——从受威胁或失去的边境地区,从已经有利于纳粹的经济部门;从纳粹意识形态得到具有职业性亲纳粹倾向人群响应的特殊职业(医疗、教育、法律、军事以及警察部门)。但是通常的纳粹主义与新教主义之间的相关性已经被颠倒过来了。现在施害人大量的是天主教徒,它很可能是在纳粹主义当中一种更具防御性的小德意志转向一个更具种族扩张主义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结果。因此,大多数的纳粹种族灭绝,如我们样本所代表的那样,是由意识形态型的、富有经验的纳粹来完成的。

277 不断升级的暴力带来了适应性。纳粹意识形态将敌人妖魔化和非人化,盗用通常的战时爱国主义,促进了对军国主义和领导者原则的接受。它提供了对厌恶和负疚感的防御机制。施害人使她或她臣服于原则、民族、元首、科学和未来。这种态度帮助了办公桌杀人者设计一套有效的种族灭绝执行办法,抵御偶尔因他们与杀人的间接关系可能带来的良心的谴责。受过教育的杀人者用道德或理想主义术语阐释这种行为。对那些实际参加杀戮的人,厌恶感能够通过接受一种更高级更科学或上层社会的道德水平而得到缓解。受教育较少者则通过以更加个人化的词汇责备受害人的方式表达其意识形态:犹太人与斯拉夫人是敌人,应当为战争负责,我们是正当防卫。意识形态还使攻击性冲动合法化,特别是在年轻男子、难民,也许还有具有难得的体格的那些人当中。无论他们看上去有多么反常,许多人还是真诚地相信谋杀是有正当理由的。个人责任被摊入集体责任——摊入一个执行领导者原则的组织,摊入集中营“恐怖秩序”,摊入体现科学真理和地位的医疗职业,摊入执行命令的警察机构。这些是能带来等级制度和同辈之间两种压力的规范并通常职业化的

共同体。

当然,不管是以前的经验还是忠于意识形态都不可能说明作为整体的施害人的特点。我的样本不能代表所有施害人,尽管它的规模不大,但它肯定能很好地代表低于10%的施害人。它过分代表了远离前线的重复性谋杀,以及骨干而不是盲目的施害人。这些真正的纳粹在另外更多的普通人当中活动着。在国防军杀人者中,我们最多只能发现对身为平民的敌人群体作出的过分报复行为,这些行为对卷入某场野蛮战争的绝望和惊恐的军队来说是普遍现象。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从一个纳粹最高指挥部获得了杀戮的自由,提高了恐惧型和遵守纪律型杀人者两者的作用。在交通及其他为受害人流动创造条件的机构的低层管理者当中,我们毫无疑问地会发现有很多德国人实际上以前没有信奉纳粹主义或从事暴力活动的经历,这从而展示出了一般研究结果所认为的体现德国人总体特征的偏见、含糊其辞和道德逃避等一系列内容。德国人便利了受害人的运送、对受害人视若不见、考虑更加个人化的事务、对令人厌恶的犹太人或斯拉夫人毫不关心——这些都是出自后天习得的和全然正常的人类道德弱点。也许研究根本不能足够深入地渗透至纳粹种族灭绝的全程,从而得到对这些问题的决定性解决。但是很显然,作为个体看,施害人队伍中肯定包括了许多普通的德国人。

然而种族灭绝不是由原子化的个人施行的。真正的纳粹、普通的纳粹、普通的警察、普通的德国人等等从事着一个集体项目。在这个法西斯政权中,报酬优厚的职业包含了暴力。在等级制度中地位越高,纳粹分子越是热心忠诚。纳粹命令其下属谋杀,而命令不是能轻易拒绝的。战友关系增加了更有经验、适应性更强的人员的影响,他们是知道警察部队必须用强硬的手段对付敌人的士兵。他们将他们的经验教给对警察工作了解较少的新人。在职业共同体中,伙伴型压力从老兵流向新兵。杀戮机构中也有许多各种军衔的纳粹被挑选参加种族灭绝。一些被挑选的职业——特别是医疗、警察和军队——的主导性性格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纳粹意识形态得到响应的亚文化。还有物质动机。高层人员得到职业晋升,底层人员获得稳定

278

工作。奖金与相对安全也是物质诱惑。但是追名逐利经常通过原则性术语来表达的。纳粹律师和警察想通过为新德国作出贡献来获得晋升。宣传者有意无意地歪曲真相,然后因为吓人的审查被迫歪曲更多的真相,他们想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获得晋升。许多人变得对宣传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布罗德告诉我们说,他同事的奥斯威辛卫兵就是这样。绝大多数人难以做到在思想和身体上为杀戮行为找到辩护理由。当由意识形态、纪律、战友关系以及职业提供的心理保护崩溃之后,酒精被用来降低敏感度和诱导遗忘。这些确实是混合的动机。

但是平庸的官僚机构型杀人者极少。资本家追求利润是一贯的,杀人是偶尔和间接为之;许多底层办公桌杀人者也被认为是这样——尽管高层办公桌杀人者具有意识形态动机。然而绝大多数参与实际杀戮的那些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大多数人以为这件事有足够的理由。对现代性我观察得比较多。但是这种杀戮以及其他近代杀戮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因素,与其说是官僚制度不如说是近代大众运动。纪律、伙伴关系和飞黄腾达的要求已经被认为是帮助了许多历史上的屠杀行为。但是让它们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穿越阶级和各个社会部门,又被共同持有的意识形态强化,(这些)似乎只属于近代的被歪曲的民主化情感的组织或团体,在此单一的神圣的集体性(在本书中是一个民族)被一个独裁主义国家“有机地”代表了。

本人的立场更接近于重视真正的纳粹而不是普通德国人。但是我加上了社会学因素。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以一个过程出现,然后经过机构和亚文化体现出来。激进化的纳粹主义是通过能够对运用等级制度、伙伴关系和事业前程去完成种族灭绝的合适机构和人员的仔细挑选来实现的。当然,我还没有尝试回答这个被歪曲的人类活动领域的问题——假如我们被关进将要去施行种族灭绝的牢笼中,我们会怎么办?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对非德裔的种族灭绝施害人作一番考察。

第 10 章

德国的盟友与援军

279

并非只有德国人孤身陷入种族灭绝的泥潭中。还有很多外国的施害人。来自 15 个国家的 100 万人加入了纳粹党卫军并作为士兵战斗在前线。^[1]很可能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是战犯。我将不去讨论他们,而是讨论那些合谋参加对手无寸铁的人的残酷屠杀的人:通敌的政权、后备警察部队和集中营卫兵。我把自己限定在东欧与东南欧,比较直接受德国人统治的地区——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那些由他们的轴心国盟友统治的地方——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不幸的是,关于他们的证据要比关于德国人的证据少得多。在很少的比较研究中,海伦·费恩的《种族灭绝的解释》(*Accounting for Genocide*, 1979)比较突出。她用两个变量解释每个国家犹太人被杀害的比例:前反犹主义和党卫军直接统治的程度。她提出这两个变量经常逆相关。在荷兰和希腊,至少 75% 的犹太人被杀害,而在罗马尼亚只有大约一半被杀——尽管罗马尼亚的反犹主义要比荷兰和希腊人的反犹主义强烈得多。她说,这是由于在后者国家中党卫军的

[1] 12.5 万西欧人当中混杂了冒险家、游手好闲的人以及法西斯主义的真正信仰者。在 2.2 万荷兰自愿者当中大约有 30% 是来自极右党派;更多的是工人阶级中的冒险者(英特·维尔德,1976:第 2 卷,1513—1523)。更多的来自东欧——50 万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小国家,7 万哥萨克人,11 万土库曼人,3.5 万鞑靼人,2 万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见赖特林格(1968:155—160, 196—206)、斯坦(1996:137—196)和西德诺(1977)。

直接控制,而罗马尼亚则没有这样(的直接控制)。因为纳粹分子最想杀害犹太人,而党卫军是他们主要的杀人机器,故被占领国家比盟国发生了更多的大屠杀。

但是行政管理要比这更加复杂。党卫军、纳粹党、德国军事官员和国防军都管理着被占领国的大片土地,而他们的权力不一样。所有人都倾向于为元首工作,而元首一般总是想要人死。但是德国人有两个主要目标——根除敌人和赢得战争——而不同的占领当局具有实现目标的不同策略和手段。如果确定犹太人在帮助敌人,他们将会得到更多的军事支援去消灭犹太人。但是其他人可能会更谨慎或能采用的手段较有限。犹太—布尔什维克的幽灵会使两个目标联系在一起,但这在某些环境下比在另外的环境下更加可信。轴心国盟友也不得不在取悦德国人的欲望和他们自己的战略考虑之间权衡一番——根据他们自己的反犹主义和对地方敌人的恐惧进行调整。如果德国人帮助他们打击这些敌人,他们将会更愿意合作。然而德国某些当权者可能会担心逼迫当地人交出犹太人会损害联盟和战争努力。如果他们并不总是像他们可能会的那样仔细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纳粹种族主义始终顽固地不愿对自己的非雅利安盟友给予足够的尊重。所以我扩大了费恩的两个指标,在德国人和当地人中找出更多的施害人动机和更多的复杂权力关系。我按照他们从德国人那里享受到的自治程度的顺序对国家进行讨论,从自治程度最小的开始。

东部援军

波兰

在整个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只有波兰和希腊与德国不和,所以这

两个国家被征服了。〔2〕波兰是我讨论中说的自治程度最少的政体。其三分之一已并入了帝国,而其全部国土已受德国人统治。因此它拥有最高杀戮率:两三百万的非犹太人和 90% 的三百多万犹太人。然而似乎波兰人杀的人还不算很多。

这无关于波兰人一直以来的反犹太人倾向。犹太人占了人口的 10%,超过其他任何欧洲国家。他们在城市中占到人口的 30%,其中 60% 在商业部门。虽然绝大多数犹太人实际上十分贫穷,但是许多波兰人还是觉得受到了他们的剥削。波兰的民族主义是社会有机体论的,不容忍少数裔群体:波兰是波兰人的波兰。绝大多数政党说,乌克兰、德国和立陶宛少数裔能够被同化,但更“异族的”犹太人不。应该迫使他们向外迁移。谋杀性集体迫害在民族主义者煽动下在 1920 年和 1935 年爆发。天主教会也是反犹太人的。在 20 世纪 30 年代犹太人被剥夺了经济权利,而到了 1939 年,一些政府发言人开始倡导他们的治安性驱逐行动。左翼党派(选举中得到 30% 的选票)只赞成同化,而对相邻的德国的恐惧限制了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尽管如此,波兰的反犹主义似乎仍然与欧洲所有地方一样强烈(哈根,1996;门德尔松,1983:第 1 章)。事实上,纳粹的统治解除之后的最后一次欧洲集体迫害就发生在波兰。1946 年在离华沙 100 英里的凯尔采(Kielce),46 名犹太人遭谋杀,以报复子虚乌有的绑架事件——最后解决方案的犹太幸存者绑架一名儿童。

281

但 1939 年波兰与纳粹德国交战并失败,这样情况就完全变了。很少有波兰人被允许携带武器或占据权力岗位。右翼民族主义者没有变成与法西斯分子的合作者而是成了抵抗战士,他们与反犹主义大多不相干了。在他们自己患难的情况下,很少还有波兰人对犹太

〔2〕 希腊的犹太人也遭受了将近全部的清除,尽管该国的反犹主义处于较低水平。我将希腊和塞尔维亚排除出这一章,因为两者都在对德国人展开游击战争,使任何分析都变得复杂化。两者都没有产生许多通敌者,尽管塞尔维亚切特尼克民族主义者像这里讨论的其他民族主义组织一样被诱使加入了种族灭绝合谋行动。

人留下什么同情。波兰人清楚地看到大屠杀(Holocaust)的全景,一些人喜欢他们看到的内容。他们交出犹太人的时候比帮助犹太人的时候多,并从买卖犹太人物品的黑市牟利。但参加种族灭绝的波兰人并不多(卡雷,1996;彼得罗夫斯基,1998:82—127)。

1941年耶德瓦布内(Jedwabne)村庄的骇人事件(由格罗斯2001年公开出来)是例外之一。村民刚从苏联手下解放出来,有可能在德国人到达之前就已经杀死了当地的犹太人。他们肯定是自己完成了大部分杀戮。一半的当地成年男子带着某种狂热参与了行动,部分是为了寻找财物,但他们又把这些行为解释作消灭犹太—布尔什维克。波兰的国家记忆研究所之后进一步挖掘,发现了另一桩大规模屠杀和20个小规模的屠杀事件。它们都是发生在自1939年以来被苏联占领的波兰民族人口区域,而在这当中,右翼民族主义者,包括牧师,势力强大,而犹太人较少。抢劫有重要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犹太人与苏联占领军相互勾结。事实上,有些犹太人确实曾有通敌行为。犹太—布尔什维克幽灵支配了整个东欧的种族灭绝过程。但就波兰人而言,幸运的是,德国人极少允许他们携带武器或者拥有权力,以完成像发生在耶德瓦布内那样的事件。

波罗的海国家

三个新的1918年之后的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是由德国人从短暂的苏联占领中解放出来的,尔后又“恢复”为傀儡国家。这里提供了许多自愿的施害人。所有三个国家都经历了30年代由独裁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发动的政变。他们的A计划曾经是保护国家独立地位——从两个超级大国德国和苏联之间挤出来。其政权也多少带有反犹主义和社会有机体论色彩,对少数裔采取歧视政策。语言和宗教是国家身份的标记,而两者都将犹太人排除在外,他们讲的是意第绪语、波兰语或俄语。他们还希望将他们的经济国有化,摆脱“犹太人的控制”。然而几乎不存在暴力活动,很少犹太人感到受威胁(门德尔松,1983:第5—6章)。戈德哈根(1996:409)错误地将波罗的海国家加入最后解决方案的合谋归因于“深远的反犹文化”鼓

励了“对犹太人的强烈憎恨”。激进地走向 1941 年谋杀性清洗的主要原因是地缘政治性的。民族主义者为他们国家的弱小规模所迫，要么成为纳粹要么成为苏联的扈从。右翼政府被逼而采用了 B 计划，与德国结盟。声势较小的波罗的海左翼选择与苏联结盟作为他们的 B 计划。绝大多数犹太人更愿意选择苏联，两恶相权取其轻——终身监禁比一次性判处死刑要好，有人这样说道。人数寥寥的几个犹太政治活动家也是左翼分子。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声称犹太人是热情的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在共产党基层队伍中占比很高，尽管在领袖层并非如此。犹太人占全部立陶宛人口的 7%。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共青团成员中他们占了 15%—16%，但在党的领袖和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秘密警察中低于 5%（麦奎因，1998：33）。所以某种犹太—布尔什维克威胁似乎是最最不可信的，而这后来证明是决定性的。

1940 年红军占领了全部三个国家（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补充条款前提下）。苏联统治是高度压迫性的，因为这是斯大林主义的顶峰时期。财产被没收，政治自由被废除。穷人因为有利于无产者的积极政策而得到帮助，尽管经济衰退伤及了几乎每一个人。苏联人还实施了面向西伯利亚的大规模治安性驱逐行动。三国人口中有 1.5% 到 4% 的人——大量的是民族主义者和财产拥有者——被驱逐，很少有返回来的。但苏联统治时间很短。1941 年 6 月德国人入侵并占领此地，被绝大多数当地人当作解放者欢迎（坎格里斯，1998）。他们恢复了民族主义政权，屠杀那些他们认为是帮助了共产党政权的人，特别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到 1945 年，16 万立陶宛犹太人中只有 5% 幸存下来。在拉脱维亚，6.6 万名犹太人中的 9% 活了下来。爱沙尼亚犹太人几乎全部死去，尽管他们总共才有 4500 人。这些可怕事件的导演是德国人，他们支配着这些小型傀儡国家。但是他们发现了足够多的自愿的波罗的海附庸国，他们参与种族灭绝属于一种 C 类计划，一个他们当初选择以一种德国联盟形式反对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方案时没有预备的结果。

主要的通敌组织来自极右派。在爱沙尼亚，法西斯主义的救星

同盟组织(Vaps)领导了德国的傀儡政权。在拉脱维亚,核心通敌者是5000至6000名法西斯主义组织“雷十字”党(Thunder Cross)成员,是仿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罗马尼亚铁卫团建立起来的。它强烈呼吁“拉脱维亚归拉脱维亚人,面包和工作归拉脱维亚人”,因为“拉脱维亚的最高权力属于拉脱维亚人(Latvians)而不属于拉脱维亚人民(the people)”。它高度反犹,恶毒地指责犹太—布尔什维克。因为它同时又有些反德,纳粹分子不久就将其取缔,尽管它许多的成员(继续)以个人身份通敌,有些成为最凶恶的战犯。当初,立陶宛行动阵线领导了那里的通敌行动。它规模大得多,组织得也更好,开始时更加能融入纳粹战争机器当中。它的激进分子在1940年逃往德国,在那里被编入了后备警察部队以投入即将到来的人侵行动。阵线不属于法西斯主义性质。它支持立陶宛人争取自由民主行动但不支持其他人,同时它痛恨犹太—布尔什维克。当1941年德国人向东挺进时,该阵线宣布:

立陶宛的兄弟姐妹们,向犹太人作清算的最后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谨在此警告每一个犹太人即刻离开立陶宛,概无例外。

还有一个较小的属于法西斯主义的亲德国的铁狼(Iron Wolf)组织,入侵之后德国人允许它接管主要的领导人位置。

当德国人到达爱沙尼亚之后,主要的执行处决的重任就压在了一个通敌的自卫部队身上,它杀了同犹太人一样多数量的吉卜赛人。因为这两者人都不多,他们很快就被解决掉了(韦斯—文特,1998)。我没有发现实际施害人任何的详细资料。

在拉脱维亚,德国人起初未能让集体迫害运作起来。拉脱维亚民兵被匆匆组织起来去进攻撤退中的苏联部队,但是这些人没有转向反对犹太人。新的准军事部队从自愿者中形成。臭名昭著的由少校维克托·艾雷斯率领的300人部队杀害了8.5万拉脱维亚平民受害者当中的大约2.6万人,余下的是被德国特别行动队和党卫军保

安处部队所杀(其中在拉脱维亚出生的德裔表现突出)。在 2.6 万受害人当中,2.2 万被列为犹太人,2000 人被归为共产党,还有 2000 人被归为吉卜赛人或疯子。因而平均每个艾雷斯手下杀死了 87 人。拉脱维亚后备警察部队,1941 年有 3000 到 5000 人,1944 年年中上升到 1.2 万人,它帮助将犹太人赶出犹太人居住区,顺手夺取犹太人财产,少数人还参与了枪杀行动。估计有 150 名市长和其他官员以及宣传工作者协助参与了所有这一切。不到 1000 人实际参与杀戮,尽管有比该数字大得多的人从抢劫中获得了好处。施害人既有右翼又有军国主义背景。这里有拉脱维亚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前军队、警察和民防卫兵的右翼军官和军士。因为对他们政府 1940 年胆怯的投降感到愤懑,他们一心想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战。民族主义学生联谊会提供了精英支持关系网,渗入许多拉脱维亚机构,特别是文职部门。旧成员主导着党卫军保安处部队的领导层。被驱逐者的亲戚也参与了进来。逃脱了苏联人逮捕的民族主义者未曾预料到他们的家人会遭到驱逐。这可以理解地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反共产主义情绪。斯塔莱克,特别行动队 A 的头目,说他已经对新招入的寻求报复的人给予“特别注意”。援军中的普通士兵较少意识形态化,也更加年轻。因为大学被关闭,经济陷入瘫痪,绝大多数年轻人闲着没事。他们渴望工作、薪水和从事冒险活动的机会。他们不是边缘类型。他们中还包括许多运动员。像在其他国家一样,身体上的杰出能力能够转向暴力。年轻男子之间具有男性亲密关系,他们喜欢与其他男人在一起(无任何表示同性恋的意思)——士兵、运动员、学生小组成员——孕育了党卫军一类的冷酷,以及伙伴关系。

284

当后来被交付审判时,他们只承认出于爱国主义和反共主义,否认他们是反犹太主义的偏执狂、抢劫者或追名逐利的杀手。他们极少表达悔恨,很少人拒绝执行枪杀命令,尽管有一些人拒绝第二次再回去。一位军官说起一个人,“十匹马也不会使他再回头”。酒精在上一章描述的那些德国人中同样重要。施害人在杀戮开始之前、之中和之后可随便享受伏特加。叶泽尔盖利斯(1996)说它是“突击队员生活的润滑剂……它打破了对年轻人的禁忌,使他们能够第一次参

与杀戮,是酒精把他们带回了杀人坑。屠杀结束之后男人们将自己灌得人事不省”。艾雷斯表示了多少带有一些自怜意味的悔恨。他用以下这些话劝说朋友不要与德国人合作:

德国人是这样,如果他们抓住你的手指,那么你整个就完了,因为很快你就被迫做那些如果你能摆脱出来就绝不会干的事。

拉脱维亚“手指”,无偿供给德国人的 B 计划,是被反犹太主义的偏执煽动起来的反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已成为惯例并被更多的对工资和财物的物质动机变得粗俗。党卫军领导层将他们带至杀人坑的边缘。然后他们就因为恐惧而紧抓住种族灭绝的 C 计划,像艾雷斯提出的那样?德国党卫军司令斯塔莱克确实向柏林报告,相比于立陶宛,“在拉脱维亚发起清洗行动和集体迫害要更加困难得多”(详情来自维斯特尔马尼斯,1992;叶泽尔盖利斯,1996;引文出自 105,194,255—256)。

已经渗透到国家的警察部队之后,立陶宛阵线即从苏联部队手下夺得若干城市,在德国之前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我们通过德国特别行动队指挥官报告(见阿拉德等 1989 和克利等 1989,1991 节选;我经常在本章引用他们)可见,他们大多数人在立陶宛得到了友好、正面和倾向德国的接待。立陶宛阵线的几伙人已经发起了针对成年犹太男人的野蛮集体迫害。虽然德国人报告说起初在考纳斯(Kaunas)“要展开一场相当大规模的集体迫害出乎意料地困难”,但在其他地方他们写道:“立陶宛人自愿且不知疲倦地听任我们使用所有反对犹太人的措施;有时他们甚至自己决定执行这类措施。”有来自德国的士兵的陈述他亲眼目睹了(有的骇人听闻)由年轻的立陶宛男人犯下的凶杀罪行,他们当着一群群喝彩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面,用刀和斧子砍劈受害人。这些不只是“一小撮地方暴民”的事(如米修纳斯与塔格佩拉认为的,1993:62)。

在激进分子“铁狼”取得控制权之后,只有法西斯主义者、激进右

翼和反犹主义者依然还是军官(布德雷基斯,1968:121—122;麦奎因,1998:37—39)。他们采取措施完成种族灭绝。党卫军率领着立陶宛警察部队杀死所有他们遇见的犹太人,包括妇女和儿童。3 万人之多的后备警察营是从值得信赖的反犹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当地人中形成的。臭名昭著的第二警察营每天杀害 500 名犹太人。抢劫伴随着大多数杀戮行动。高级官员监督被清洗的犹太人居住区的财产再分配。超过一半的立陶宛犹太人死于同胞立陶宛人手中,在所有纳粹占领国中比例最高。第二警察营后来被转让给了白俄罗斯,这里的旷野使当地人感到疏远。4 万立陶宛人为德国人打仗,包括也许有 1 万的实际施害人。更多的人是分享战利品,但是绝大多数立陶宛人只是看着。有多达 1000 人可能还冒着生命危险藏匿本国犹太人。某个较小的地下组织感叹:“我们一定要做欧洲的主要刽子手吗?”另外,被驱逐者的亲戚占比过高(阿拉德,1989;布德雷基斯,1968;利特曼,1983;内沙米特,1977;彼得罗夫斯基,1998:163—176;波拉特,1994;索查特,1974)。

在 18 名立陶宛战犯中(数据来自德国审判以及哈钦森,1994 和麦肯齐,1995),17 名在 25 岁以下;一位年长的流亡者是个例外,他曾在 1918 年参加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6 名军官中 5 名是“阵线”或“铁狼”成员。安塔纳斯·格卡斯来自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农民家庭。作为一个认真但并不杰出的学生,他加入了空军,在另一名施害人手下接受训练。这之后他加入了“立陶宛阵线”。他的兄弟逃往德国与纳粹工作在一起。当德国人入侵时,格卡斯自愿报名加入后备警察,成为了一名军官。他参与了考纳斯和白俄罗斯的谋杀行动。莫蒂耶斯·米戈尼斯是第二/第十二营的年轻警察。他后来回忆他的成年期的头四年生活“完全是由处决平民所构成”。阿列克西纳斯是一名在德国人入侵时逃走的工会官员。但“因为我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他又返回并自愿当了警察,认为国家应该受到“惩罚”从而恢复“秩序”。这些似乎是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者和警察/军队价值观的核心代名词。他是后来退出的 18 个人之一。1942 年因厌恶了无休止的处决,他叛变投靠了苏联人。苏联人给了他一个较轻的判决:

流放西伯利亚 10 年。

286

在所有三个国家中,意识形态的和寻求报复的领导人以及激进分子从渴望抢得犹太人赃物的物质主义的机会主义者那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对他们所有人而言,共同的意识形态是把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从国家中清洗出去(戈登,1990;希尔伯格,1980:96—102;米修纳斯和塔格佩拉,1993)。但是之后在所有地方通敌行为开始衰减。到 1942 年 1 月,拉脱维亚党卫军警长报告说:“对犹太人的命运感到遗憾的意思不断被表达出来;只能听到很少的支持清除犹太人的声音。”现在有谣传说纳粹赞成严厉对待波罗的海人。方案是将他们三分之二的人向东驱逐,让德裔移民进住原地。余下的三分之一当中的一些人可以被合并到白种人当中,尽管绝大多数将成为奴隶。纳粹分子继续将当地财产转让给德国人。年轻男人不得不加入强迫劳动力大军到德国去或自愿参军或加入警察营。所以,超过 1 万的波罗的海人选择穿上德国制服。他们尽可能长地与苏联人作战,徒劳地希望西方盟友会成为解放他们的人,恢复他们国家的独立地位。但当红军临近之后,德国人试图撤离主要通敌者和他们的家人。这些人总计是 10 万爱沙尼亚人、18 万拉脱维亚人和也许 30 万的立陶宛人,这表明了通敌者达到的规模(坎格里斯,1998:141)。他们早期曾造成过致命损害,一些人怀着热情,更多的是被诱使;当时,为表示他们对社会机体的拥护,他们让自己臣服于纳粹。纳粹大为满意。犹太人已被消灭,前线不再受他们认为的潜伏在后方的敌人的威胁,到处都部署了少量的德国军队。

白俄罗斯

德国人在这里只能找到少数合作者,他们以反苏联的民族主义者为首,在 20 年代白俄罗斯落入苏联统治之下时逃往德国。他们的 A 计划和 B 计划与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的类似。到 1941 年时,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接近纳粹主义,尤其是在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上。他们与德国部队一起返回家乡。但是他们鲜有追随者。城市大多数人口是俄罗斯人、波兰人或犹太人。90% 的白俄罗斯人是

农民,其中很少人会对一个保证只让他们拥有较低地位的族性充满幻想。尽管反共产主义的东正教欢迎德国人,确保了许多农民也欢迎他们,但民族主义者还是缺乏足够的城市或农民支持的基础。

特别行动队说,尤其是在东方,“实际上不存在白俄罗斯民族意识……明确的反犹主义不存在”。“鉴于白俄罗斯人的消极和政治淡漠,筹划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几乎不可能。”如果民族主义较弱,党卫军推测,那么反犹主义也如此——包括整个东欧。党卫军以宣称只有那些帮助特别行动队的人才能加入新白俄罗斯政府机构作为应对。这带来了追名逐利的自愿者。民族主义者挑选了被称为反共和反犹主义者的那些人领导后备警察营,“乌鸦”(Ravens),人数在1万到4万之间,有一些是收编的苏联战俘。领导人不可能自己对这些人了解很多,然而一个“雪球样本”起到了帮助作用:每一组新进来的人给出进一步的应该是可信的人的名字。

287

如一贯的那样,职业警察是受宠的新人。西蒙·塞拉非诺维奇是一个聪明然而受教育较少,在波属白俄罗斯长大的男子。他成为一名士兵,后来当了警察。他在波兰统治下的前程是有限的。他被她爱上的波兰女孩的父母断然回绝,说他不是合适的婚姻对象。苏联占领改善了白俄罗斯人的地位,同时降低了波兰人的地位,所以西蒙之后能够与他心爱的姑娘的妹妹结婚(该波兰家庭的其余人都被苏联人赶往东部)。但是当德国人到来时他抓住了真正的机会,主动提供帮助。在升到中士以后,他做了小镇米尔的后备警察的头头,尽情享受着一套制服、一支手枪和一匹马——以及由他与所有参与征服的德国人的友谊所带来的权力。像其他地方白俄罗斯警察一样,西蒙杀死任何德国人命令他去杀的人。但在士兵军官满足于一份确保的收入和轻松的工作的同时,西蒙却表现出“一种过度的杀人热情”。他野心勃勃,希望得到德国人的提拔,并强烈反共(他们赶走了他的第一个恋人)。虽然他不是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但对待犹太人非常“冷淡”,把四海为家的犹太人看作是对“国家秩序”的一种威胁。他用无节制的狂饮来缓解他的可怕工作的紧张程度,这让他变得残暴。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因为住在他家里的他的德国翻译,这

是一个暗藏的犹太人,得以活下来讲了他的故事(特克,1990)。西蒙自己的故事1996年结束于英国。他在85岁时去世,这使英国仅有的纳粹战争罪审判刚开始即告终止。

援军部队的任务包括从日常警察工作到残杀苏联战俘和犹太人等很多方面。他们受酒精之助的暴行的野蛮性——往墙上猛撞婴儿,把儿童连同手榴弹一起扔在井里杀死,野蛮强奸之后再刺刀劈刺——据称也震惊了党卫军(他们习惯报告说野蛮暴行是非雅利安人所为)。许多人后来被招入了纳粹党卫队前线部门,但他们不如当士兵时那样突出,最终都渴望着向反共产主义的美国人投降。许多人在生命最后时期是美国公民,强调反共而不是他们过去经历中的反犹主义(洛夫特斯,1982;彼得罗夫斯基:148—157)。

白俄罗斯施害人几乎不足千把人,远不如游击队与受害人数众多。特别行动队报告对犹太人的杀害已导致“人口中一种不安全感甚至焦虑感”。甚至知识界“也不适应苏维埃政权期间的这样一种程序,而对这类措施的后果无法作出估计”。“大众情绪恶化现象”出现;“总体而言,可以说平民大众会站在该领域中握有权力的一边”。在受游击队困扰的领域,农民“将遵守他以前时代的统治者的命令”。绝大多数夹在当中的白俄罗斯人,形成了一种患战斗疲劳症似的冷漠超然态度(黑德兰总结,1992,118—119)。德国人不得不进行很多的杀戮。因为这依然是一个前线区域,他们乐意让德国部队承担此项任务。

乌克兰

乌克兰提供了更多的合作者。这里在俄国内战期间曾出现过谋杀性反犹主义。但是乌克兰人随后分裂成受苏联统治和受波兰统治的两部分,而两个地区存在差异。犹太人很好地融入了苏联部分。在30年代,他们占总人口的5%,却占了共产党以及乌克兰苏维埃代表的10%(阿特舒勒,1990:290—294)。因此他们的形象因为下一章讨论的斯大林在乌克兰的屠杀政策的罪责而受到了损害。虽然非常少的犹太人可能曾是共产党,但犹太—布尔什维克敌人的论点或

许又一次只有极低的可信性。

但因斯大林清除了苏维埃领域内大多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倒是生活在更温和的波兰统治之下的乌克兰人更好地被组织起来了。他们的 A 计划又一次是民族独立。在 20 年代，他们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影响，特别是它的准军国主义，这对实现民族解放是必要的。主要的民族主义组织(ONU)，确定了自由与民主的原则——为了乌克兰裔。“乌克兰是乌克兰人的乌克兰”，该组织一次又一次宣称。“民族是有机的人类群体的最高形式。”30 年代它转而支持纳粹种族主义，希望纳粹会将他们从波兰和苏联统治下解放出来：为实现一个“纯粹”、“有机”和“生物意义上”的乌克兰民族，波兰人、俄罗斯人和犹太人应该被“清除出去”。所以 B 计划是种族清洗，尽管不是通过谋杀。就像在东欧大部分地区一样，宗教也起着重要作用。乌克兰东正教强调乌克兰民族精神的纯洁性。如同在罗马尼亚一样，一种具有基督教特征和反犹太主义的民族主义诞生了(阿姆斯特朗，1963；科西克，1986：附录，卷宗 6,44,61,68,75；默蒂尔，1980：143；彼得罗夫斯基，1998：189—195；韦纳，2001：240—248)。

苏联人 1939 年根据《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占领了波属乌克兰，很多被认为是斯大林的主要敌人的波属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逃往德意志帝国。斯大林的统治立即显露出压迫性质，使得更多的乌克兰人转向支持纳粹。犹太人在新政权中占比略微偏高，但正如格罗斯指出的(2000：98)，当地人被“看见一个犹太人占据任何权力位置的不适宜、不和谐和令人不快的程度迷惑住了——如工程师、工头、会计、文职官员、教师或民兵等”——不是占比过高，而是高得惊人！

因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纳粹分子之间的爱恨情仇就开始了。他们的联盟在起初入侵阶段激进地进入到 C 计划，种族灭绝。两个民族主义组织派别被组织成两个由党卫军训练的乌克兰特别行动队大队，以将占领区的不良因素，亦即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清洗出去。不清楚的是他们被运用于入侵行动的程度。当苏联人撤退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察杀死了他们大多数的乌克兰政治囚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可以理解地寻求报复。很多犹太人——再次被迫在纳粹德国

和苏维埃俄国之间作出选择——与红军一起向东逃跑,尽管很少犹太人是共产党,而犹太人的组织和财产拥有人的企业也已被苏联人镇压或取缔。民族主义者是否相信特别行动队古怪的表述,即“犹太人毫不例外地为布尔什维主义服务”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受害人的墓中“不包含犹太人的尸体,就连一个墓中也没有”,这一点不太清楚。但是乌克兰的合作者没有犹豫就加入到了种族灭绝当中。它不只是反映了纳粹的圈套。2.4万犹太人即刻间被杀光,甚至未等到德国人到来。在有些镇中,新的民族主义组织管理部门和民兵组织发动了杀戮狂欢。在沃利尼亚地区(Volhynia),抢劫与谋杀广泛得多,尽管民族主义者辩解说这是在帮助一个现代乌克兰国家的正常发展,它的工商业刚从外国控制下解放出来。民族主义组织宣称:“乌克兰城市现在是一张干净的白纸。来吧,接手并开发它。”(斯佩克特,1990:64—79,238—239;兹比科斯奇,1993)

特别行动队报告说,撤退的苏联人在犹太人的帮助下,杀死了数百名乌克兰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然后当地乌克兰人对犹太人进行了正义的报复行动。在克列缅涅茨(Kremenets),10050名乌克兰人被红军杀害。当被报告有些尸体没有皮肤之后,到处有谣言说他们是被活剥的——这使人想起古老的基督教对犹太人活人祭仪的想象。复仇行动,经常是由死者的亲戚实施的,具体是用棍棒连续猛击130个犹太人致死。报复被发泄在可以找到的据信与施害人联系在一起的同族团体身上。波尔(1996:175—179)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谋杀行径让民族主义组织好斗分子激进化至种族灭绝,使反犹主义成为他们民族主义的核心。民族主义组织据点经历了最严重的集体迫害,而波兰人多和乌克兰人较少的地区经历的集体迫害最少。犹太人现在只有两个选择——逃跑或帮助红军。但是德国人报告说不同地方的反应有差异。有些乌克兰人“积极合作”,“明显对所采取的严厉措施感到宽慰,因为他们理解从而接受它”。其他报告强调他们“对总体的犹太人清洗表示冷漠”,特别指出“种族上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反犹主义在人群中不存在”。然而,德国人则将冷漠归于缺乏力量的民族主义。党卫军认为民族主义者会参加谋杀,而农民

不大愿意。虽然对犹太人与波兰人态度模棱两可,但他们(指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确实恨俄国人(韦纳,2001:248—256)。

3.5 万人的乌克兰后备警察营几乎都是苏联逃兵或战俘。党卫军报告说“政治上精心筛选过的可信赖者”是在当地市长和警长帮助下挑选出来的。大多数战俘并非自愿,尽管存在可脱离囚禁状态的诱惑。许多自愿者因为物质上的原因,故意随便杜撰一种他们需要的政治观点。但是后来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博赫丹·科西,作为一个 19 岁的裁缝的助手,当时已经是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一个明显合适的新兵。战地情报大都是由德裔提供的。警察协助了犹太人居住区清洗行动,1.5 万犹太人被杀死,而其大多发生在 1942 年。但是有一份报告顺便提及,“所有在公路上发现的亚细亚人也被杀戮”。德国人发布命令,提供协调安排,然而乌克兰援军人数超过德国党卫军保安处和治安警察大队,比例约为 10:1,在每天的行动中他们拥有自决权。大约一半的幸存者把普通杀手概说成是“乌克兰人”,但是另一半的人称他们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甚至“民族主义委员会”(阿拉德等,1989:128,140;迪安,1996,2000;科西克,1986:155;萨布里恩,1991;桑德库勒,1996:409,417)。幸存者在民族主义和种族灭绝之间和党卫军与种族灭绝之间划了等号。

像通常一样,施害人具有混合动机:贪婪、酒精、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报复性的反共主义、盲目的反犹主义偏执——再加上苏联占领后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阿拉德等,1989:210;阿姆斯特朗,1963:158—159;迪恩,2000;彼得罗夫斯基,1998:209—237;韦斯,1990a:414;1990b:110)。民族主义者承认种族灭绝是德国支持他们从未放弃的民族独立的条件,这令人不禁毛骨悚然。一些人希望最终利用他们从德国接受的训练和武器反对苏联人和德国人。党卫军加利西亚师塞满了超出需要的自愿者,而这是受到东正教的祝福的。到战争末,20 万乌克兰人身着德国制服,2 万逃往民族主义组织游击队分队,同时与两边作战,而在红军游击队中的人数也大致相同——红军后来说他们几乎未得到当地人口支持(韦纳,2001:156—157)。民族主义者继续在森林里与苏联部队作战,一直进入到 50 年代。

萨布里恩(1991:242)认为:“成千上万的民族主义者与德国纳粹是同谋犯,犯下了战争罪、反人类罪、通敌罪,导致……种族灭绝。”以色列战争罪研究办公室更为谨慎地估计,有1.1万名乌克兰人犯下了谋杀罪或参与了导致死亡的残忍驱逐行动。虽然这是一个比邻国更大的数字,但乌克兰人口也比邻国多。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更多的人参与了抢劫。甚至也许有大多数人默默地同意清除犹太人,只要他们不在方法上考虑得太认真。

291

乌克兰东正教会之很大部分都站在纳粹一边反对共产主义敌人。然而约有1000名牧师冒着他们的生命危险保护犹太人。浸礼会教友在这些勇敢的人中占比很高,尽管东正教自己的牧首(primate)是最杰出的保护人。维维茨基(1990:107)指出牧首组织一个550名男女修士的网络,才能为仅200名犹太人儿童提供庇护,然而一个乌克兰告密者轻易就能出卖200个犹太人。大多数人很可能站在中间立场——对德国人、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都一样痛恨(比林斯基,1990:381—382;希尔伯格,1993:94—96,289;斯佩克特,1990:172—187,243—256;维维茨基,1990;韦纳2001)。大多数乌克兰农民对任何一边或者犹太人都不要。他们主要关切的事是活着,这要求人们安分守己直到输赢的形势明朗。

“乌克兰人”

许多集中营卫兵被描述为“乌克兰人”,并经常被想当然地认为是乌克兰人(例见彼得罗夫斯基,1998:218—220)。然而纳粹和犹太人却倾向于将所有东欧集中营援军称为乌克兰人。真正的乌克兰人可能曾是最大的单一群体,然而这个术语是一个类概念。就像布尔什维克的走狗据称是犹太人,纳粹的走狗则被认为是乌克兰人——两个卑贱民族,他们杀戮的权力不相等。

东部大多数集中营卫兵是从红军战俘中招募的。3500名经过筛选的自愿者被送到特劳尼其(Trawniki)训练营3到6周,那里的员工都是德裔。然后他们以90至120人一队被送往集中营和犹太人居住区。莱因哈德死亡集中营的员工是100名德国人和500名

“乌克兰人”。然而比林斯基(1990:378—379)说,在死于特劳尼其训练期间的 12 人名单中只有 6 人是乌克兰名字,其他人很可能是俄国人或德国人。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一个乌克兰战俘说那里的“乌克兰党卫军部队”主要包括俄国人、白俄罗斯人和高加索人。他们都不被德国党卫军卫兵放在眼里。卡雷(1996)描述了一个可怕的波兰劳动营中的层级关系:顶层是德国人,然后是德裔,接着是波兰人、乌克兰人,然后是大部分由犹太人担任的监狱头头,再然后是有财力的犹太人,以及最后,在底层的,是没有财力的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显示自己的反犹主义是让德裔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被他们的德国上司喜欢的一种有用的策略。

这种分层的管理制度让所有卫兵都变得残忍和堕落,以至于他们常串通在一起参与殴打、强奸和谋杀行动。有些暴行是自发的;其他是例行政策——特别是在囚犯现在太虚弱以致无法工作的时候。乌克兰卫兵最常被分配到需要表现残忍的角色上。有一个说:“当我被递上一根棍子之后,就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囚犯回忆说有些人十分骇人,有的则比较人道。一人说:“当我看着他们,听见他们充满渴望地唱着杜姆卡*时,我很难相信这些欢快的小伙子就是在森林中执行可怕处决的同样一批人。”不过,像警察一样,卫兵也有世俗动机。他们没有挨饿的危险,不像他们的同胞。他们避免了在德国的艰苦劳役。这些主要是工人阶级的男人享有着特权,可从犹太人那里偷取和勒索他们需要的东西,包括性。酒精让人与世隔绝。他们喝得很凶。与德国人不同,一旦被诱逼当了卫兵,恐惧就逐渐增加。当一个德国党卫军中士未能在贝乌热茨死亡集中营发动第一个内燃机毒气排放引擎时,可怕的沃思转向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乌克兰”助手,沃思野蛮地在他脸上左右开弓扇了 11 或 12 下(战犯审判,纽伦堡,“医疗案件”,第 1 卷,866)。党卫军不是很珍视乌克兰人的生命。他们一般都被德国人称为土著士兵或土著警察(Askari),斯瓦希里语言中用以称服务于殖民地主人的非洲军队的词语,暗含种族上的

292

* 乌克兰民间叙事曲。

轻蔑。为白俄罗斯警察当德语翻译的犹太人说,警察除了扮演凶杀角色之外别无选择(特克,1990:102;参较马托斯,1996)。如果“乌克兰人”的松垮不严让战俘逃脱,卫兵即会被枪杀。奥斯威辛卫兵布罗德(赫斯等,1978:181—182)说,他们“认为他们有一天会遭清洗,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有一天20个人逃跑,与党卫军军队发生激烈遭遇战。他们杀死2名党卫军,自己这边死了7个。之后6人逃脱,6人自杀,还有一个被俘后遭处决。不服从的代价很高。

幸存者对他们的表现有各种描述:施虐狂、举止文明和表情严峻的冷漠。这里表现出不同国家的僵化观念。索比堡的一位波兰的铁路员工说:

大多是保卫铁路的立陶宛人比乌克兰人要坏得多;他们是真正的施虐狂;他们常常不加瞄准地向车厢窗户里的人盲目射击,在他们请求看医生、要水和被允许放松一下的时候。他们把它作为一项娱乐——他们一边射击一边笑着,同时还开着玩笑打着赌。

然而一名在特雷布林卡的士兵强调乌克兰卫兵酒后的兽性,而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说乌克兰人“比纳粹还坏。他们在那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阿什曼与韦格曼,1988:172;布朗宁,1992:52,83—85;塞雷尼,1974:157—159)。

反犹、反共产主义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经贪婪和个人野心强化,首先让这些年轻的东欧男子落入圈套。这里的反共主义比德国人当中的具有更多的个人仇怨特点,因为他们体验过斯大林的一套做法。犹太人也是这里一个较活跃的力量。经济怨恨更加直接地使暴力合法化。但是主要差异在圈套结束之后就出现了。正如艾雷斯知道的,一旦德国人抓牢他们,他们就堕入了一个集体地狱,成为魔鬼下面的醉醺醺、龇牙咧嘴却充满胆怯的门徒。有些人更意识形态化,他们慢慢接受一个社会有机论的民族—国家需要谋杀性清洗的观念。他们怀着一种历史必然性凌驾于正常道德规范之上的意识,

同意识形态纳粹一样欣然接受了种族灭绝手段。其他人,意识到他们已经远远超出了合乎道德的人类行为的界限,决定享受和滥用他们魔鬼般的权力。他们以惊人的热情迎接种族灭绝。

附属国: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

两个纳粹创造的附属国处在中间的位置。他们感激并依赖于纳粹给予他们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同时知道同盟国的胜利有可能把他们送回他们以前的捷克和塞尔维亚统治者的地位。两个国家都只有有限的自治权,但是两国都没有通过抵制纳粹施予的要求杀害犹太人的压力来测试这些限制的程度。他们可以牺牲犹太人以便向他们自己真正的当地敌人寻求复仇。斯洛伐克人被从捷克那里解放出来,后者现在坚定地听命于德国,因而斯洛伐克人不需要再进一步追随捷克了。相反,克罗地亚人还在与德国人一起共同与塞尔维亚人作战。所以克罗地亚人也杀气腾腾地反对塞尔维亚人——这是他们的主动权,而不是德国的。

斯洛伐克

两次战争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拥有三个主要族群。在捷克人中法西斯主义基本已失去作用(凯利,1995),就连他们的民族主义也相当温和。因此很少有捷克人喜欢纳粹,后者直接统治着捷克土地。捷克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卫兵被幸存者描述为是他们的党卫军军官的缺乏激情的同谋。苏台德德国人一开始对希特勒持怀疑态度,但是后来终于在1938年接受了他(斯梅尔泽,1975)。然而苏台德人在战犯中占比不足,我们在第8章已看到。

斯洛伐克人提供了最多的合作者。绝大多数人曾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直到1918年,然后他们在捷克统治之下变得不听话。落后的斯洛伐克经济现在不得不与更先进的捷克展开竞争,而其与匈牙利的天然贸易线路和来自那里的补贴已被切断(普赖尔,1973)。正如在大部分东欧地区一样,教育与识字率是两次战争之间

主要的成功范例。捷克经济剥削与斯洛伐克文学即语言身份的提高之间的断裂助燃了民族主义势头——像在别的国家一样。赫林卡的斯洛伐克人民党利用这一点获得了 1938 年地方选举中 40% 的选票，成为最大的斯洛伐克党。天主教牧师提供了最多的党的领导人，然后是中小学教师，而学生成为少年激进分子中的主体。教会对民主的态度模棱两可，又带点反犹倾向，然而它同时也对法西斯主义表示怀疑。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衰落，更多的赫林卡分子呼吁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少年激进分子占准军事部队的赫林卡卫兵的绝大部分，他们崇拜希特勒并引起了党的分裂。当希特勒的攻击性外交削弱了温和派势力之后，党的领袖宣称他们将“清洗掉斯洛伐克土地上的外国成分”。

294 1938 年的宣言宣称：“我们将坚持不懈地站在所有与犹太马克思主义、它的意识形态、革命和暴力作斗争的民族这一边。”当合并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希特勒赏予赫林卡为新斯洛伐克共和国设定一党制宪法的权力（埃尔·马拉克，1979；费勒克，1994；哈夫拉尼克，1971；杰利内克，1976；莱夫，1988；纳迪尼，1983；内德尔斯基，2001；施密特，1983；瓦戈，1987：294—295；扎切克，1971）。因为斯洛伐克人只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受过轻度的歧视，如果没有得到援助，他们不会走这么远。但现在他们是希特勒的扈从。

赫林卡分子参与最后解决方案直至 1942 年年中。虽然没有很大的意识形态热情，也缺乏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观念，他们还是在没有很大压力的情况下泄露了犹太人的秘密，此为他们的 A 计划，民族独立的必要副产品。物质动机是重要的。纳粹为每一名地方犹太人向他们征税，他们从再分配的犹太财产中得到减免。匈牙利边境警察注意到赫林卡卫兵竟接受贿赂以延迟驱逐富裕犹太人。他们还吉卜赛乐师网开一面。在没法轻易找到人替代具有熟练技术和商业界的犹太人时，赫林卡政权还经常保护他们。

不管怎样，斯洛伐克的合作然后就减少了。到 1942 年年中，一位德国外交官报告说“驱逐行动在很大部分人口中不受欢迎”。随着士兵对德国人对待俄国人和犹太人的做法逐渐感到厌恶，斯洛伐克

人逃离前线的情况增加。因为纳粹不想让德国军队对战场分心,他们日益依赖赫林卡卫兵,特别是在他们联手镇压了1944年10月的一次未遂的斯洛伐克起义之后。然而当德国战败的可能逐渐隐现,赫林卡的热情减弱了(希尔伯格,1978:458—473;杰利内克,1989;罗思柯琴,1989;施密特,1983:165)。施害人的中坚力量似乎是年轻、受过教育的激进分子和类似法西斯分子的赫林卡卫兵。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人曾生活在两次战争期间由亚历山大国王的右翼威权主义和塞尔维亚人占主导地位的政权统治的南斯拉夫境内。这儿只有一个小规模的塞尔维亚法西斯主义党,主要以学生、神学院学生和来自塞尔维亚东正教的牧师为首。他们赋予了它某种宗教色彩以及动员部分乡村穷人的能力,像在罗马尼亚一样。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Chetnik)组织更加重要。虽然不属于法西斯性质,但它结合了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和准军国主义的特点。随着克罗地亚不满的增长,亚历山大就更加依赖他们去帮助压制不满,而这又进一步激起了克罗地亚人的反对势头(阿瓦库莫维奇,1971:138;乔尔杰维奇,1971:130;库利克,1998:828;瓦戈,1987:294—295)。

最极端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是乌斯塔莎(Ustasha,“叛乱分子”)。起初是仿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成立的小规模组织,随着切特尼克镇压力度的增加,发展到超过3万人的成员。虽然形式上是法西斯,但它的核心是一个更加素朴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乌斯塔莎宣称克罗地亚人是“欧洲人与哥特人,不是东方人和斯拉夫人”,像塞尔维亚一样。外国人可以被同化吸收进入克罗地亚民族,如果他们能够改宗天主教。他们大多数是年轻人,由知识分子和学生领导,拥有来自更年轻的天主教牧师和未加入工会的部门中的年轻工人的支持。他们的准军事部队招收自与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接壤的边境地区,这里的住户家里藏有枪支,同时具有一种受塞尔维亚威胁的意识。法西斯主义依赖南斯拉夫境内地方上的民族对抗得以壮大,这里的人们眼中的敌人不是犹太人或共产主义者而是他们中的彼此。

295

在战争期间, 犹太人被杀死以取悦德国人, 但是犹太人也参加抵抗组织。

1941 年国防军占领克罗地亚, 受到友好欢迎。乌斯塔莎领导人从流亡中返回建立了附属国“克罗地亚独立国”, 得到民族主义天主教教会和足够构成议会多数的农民党代表的支持。这个法西斯政权维持着一个议会, 尽管是一个缺乏对乌斯塔莎准军事部队成员控制权的地位卑下的议会。在接下来的 4 年里。许多南斯拉夫人被谋杀。对立的统计数字仍然被作为本区民族主义斗争的武器而加以炫耀——比如最近由克罗地亚前总统图季曼 (Tudjman) 作的统计。米尔科维奇 (1993; 参较海登, 1996: 746—748) 给出估计死者人数为 48.7 万名塞尔维亚人 (占塞尔维亚人口 7%), 20.7 万克罗地亚人 (5%), 8.6 万名穆斯林 (7%), 6 万名犹太人 (78%) 和 2.7 万名吉卜赛人 (31%)。在一次令人憎恨的战争中, 许多暴行是由各方犯下的。部队的站队选择实际上是复杂的。有两个占领国, 德国与意大利, 每一个都有它各自的目标和敌人。两个主要的塞尔维亚领导的部队, 铁托的游击队和右翼的切特尼克, 不但与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乌斯塔莎作战, 还相互交战。切特尼克认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目标, 而共产党游击队吸引着所有群体中的非民族主义者。因此有些来自达尔马提亚 (地区) 的克罗地亚人就与游击队一起与德国人及意大利人作战, 而意大利人为一些切特尼克分队提供资助。波斯尼亚穆斯林夹在当中, 四面作战。但因为穆斯林害怕塞尔维亚人更甚于克罗地亚人, 许多人就与德国人勾结在一起。他们为党卫军桑扎克师提供给养。大约有 14 万南斯拉夫人在战争期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加入了德国这边的战斗, 他们都是从各主要族群 (除了犹太人之外) 中招来的 (沃尔克尔, 1998)。

我们需要正确估计这些复杂性, 不仅是为了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 而且是为了让我们远离战后那种对战争的民族主义的简单化认识, 它将在 90 年代的暴行中起到一个重要的制造神话的作用。但是, 尽管有这些复杂因素的存在, 战时大多数的可怕暴行是由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犯下的。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 在犹太人之后, 是

处在最大危险中的群体。他们确实完成了他们的复仇行动。至少三分之一的死去的克罗地亚人是在 1945 年投降时被屠杀的乌斯塔莎部队。

乌斯塔莎战略只是在针对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时是种族灭绝性的。塞尔维亚人遭到野蛮驱逐和强迫皈依方式进行的谋杀性清洗。有 20 万到 30 万的塞尔维亚人被驱赶至德国控制的领土内,很多人死在路上,同时有 24 万到 35 万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被强制皈依天主教。天主教牧师和方济各会对该地区进行了清理,给了农民“皈依或去集中营”的抉择。既然已经很清楚绝大多数去集中营的人都死掉了,这就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如在波兰由德国人进行的杀戮中一样,阶级区别是重要的,它表示着政治灭绝倾向。商业人士、东正教牧师和知识分子以及富裕农民最有可能被杀害。1941 年 4 月居住于克罗地亚境内的 577 位东正教牧师当中,38% 的人在年末被杀死,58% 的人被强行驱逐出境,而 4% 的人呆在监狱或藏匿起来(拉米特,1992:150—151)。在某些地区整个塞族人口都被杀害。这或许看上去像是对早期世纪宗教冲突的大倒退。然而乌斯塔莎用种族术语为之进行辩护。外国牧师解释道:“在克罗地亚我们能找到的真正塞尔维亚人很少。Pravoslavs(即塞尔维亚人)的大多数事实上是被外国侵略者逼迫接受异教信仰的克罗地亚人。如今将他们带回罗马天主教教会是我们的责任。”(希拉,1990:77)乌斯塔莎的目的,公开说,是三分之一驱逐,三分之一皈依,三分之一屠杀。目标实现了三分之二。在 1921 年普查中,独立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人口曾是 160 万。到 1944 年下降至 60 万——清洗掉了 63%。切特尼克分子也寻求一个“同质的塞尔维亚”,将境内的异族成分清洗掉。但是他们拥有较少的权力,因为铁托的游击队控制着大部分地区,很残酷但不追求种族目标。

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是雅瑟诺瓦(Jasenovac)。我们对它的最多了解来自 1999 年在克罗地亚进行的对它的指挥官之一丁科·萨维奇的迟到的审判[见 1999 年 3 月至 10 月的克罗地亚通讯社(HINA)的各种报道]。一位克罗地亚历史学家作证时说,在他估计的被谋杀

的 8.5 万名囚犯(一个低估的数字)人数中大约 60% 是塞族人,15% 是犹太人,14% 是克罗地亚人,12% 是吉卜赛人。实际中所有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都已经被杀光了,但是对塞族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杀害较不规则。克罗地亚受害者是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而塞尔维亚人大都被描述为“知识分子”。其他证人作证,被用斧头、锤子和刀致死的人比被用枪打死的人多,手段极其残忍。他们说他们最害怕少年乌斯达莎卫兵。少数卫兵和军官曾待之以同情,有些甚至试图阻止杀戮。但是,当上层闻知他们的行为之后,他们即遭处决,这阻止了批评,并使得卫兵更加卖力。

297

萨基奇 1944 年成为指挥官时 23 岁。他还在只有 11 岁时就曾是一名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他被学校开除,然后在 17 岁时被禁止到克罗地亚任何学校上学。1938 年他去往德国,加入在柏林的乌斯达莎组织。1942 年他第一次被派往雅瑟诺瓦担任一名卫兵。目击者指控他一个人亲手射杀了若干名囚犯。他被判处 20 年监禁。他的前任指挥官曾是一名被免去圣职的方济各会托钵修会教士。一位幸存者说他“喜欢一种神秘的杀戮方式”。在亲自射杀了囚犯之后,他会宣布“正义已得到伸张”,然后举行一次逼迫所有克罗地亚人参加的圣洁弥撒。“然后他常常布道说要爱自己的邻居,而到周一他会继续处决囚犯。”

招人乌斯达莎的新兵大量的是来自受塞族人威胁的波斯尼亚穷困多山的边境地区。来自巴纳特北部边境区的德裔也构成了新兵的来源。切特尼克党卫军团大量来自同样是波斯尼亚地区的塞族人村庄。米尔科维奇(1993)和帕里斯(1961)都描绘了常见的施害人的阶级肖像。帕里斯说绝大多数人不是农民而是小资产阶级——“手工匠、店员、低职位工作人员和军官”。米尔科维奇说杀人者通常是从“社会中失去社会阶级地位的部门,从社会中未受过教育或没有威信的贱民中招来的”。两个人都没有提供支持这些安慰性判断的证据——我们已经看到这方面并未得到有着更好档案记录的国家的支支持。他们对领导人的描述有更加确凿的证据。米尔科维奇给出了律师和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名单,并指出医生大量存在。帕里斯强调学

生、神学院学生和牧师,尤其是方济各会和耶稣会会士。萨格勒布大主教和方济各会是支持清除行动的,而几乎 21 个集中营中的一半是由神职人员管辖控制的。教会报纸公开宣扬希特勒是“上帝的十字军战士”,并宣称,“塞尔维亚人是克罗地亚最大的敌人,而犹太人与共济会会员是全欧洲的敌人”。犹太人被宣布为四海为家者和异族人,不能成为真正的克罗地亚人。教会强调犹太人对基督的永世的敌意,但是说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是可以被改变过来的。

一位乌斯达莎集中营指挥官描述他对每日杀戮 3000—4000 名新来者的适应性:“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毁灭就没有影响了。我对它习惯了。”这种低技术的种族灭绝使用的是刀、锤和斧子。受害人被推下沟壑,同时朝他们身上扔下手榴弹以结束他们的性命。乌斯达莎不隐藏他们的谋杀行为。司法部长宣称:

这个国家,我们的国家,只为克罗地亚存在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没有什么方法和途径不能被我们用来使我们的国家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使它能够清洗掉所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所有那些 300 年前来到我们国家的人必须消失。我们不想掩藏我们的意图。

一位牧师宣称:

在这个国家除了克罗地亚人无人能住在这儿。我们很清楚如何对付那些反对皈依的人。我个人已尽了我全部的本分,一个都不放过——小孩男人都一样。当一个小孩子挡住乌斯达莎的路时我杀了他,并无后悔。(亚历山大,1987;阿瓦库莫维奇,1971;139—140;希尔伯格,1978:453—458;劳里埃,1951;米尔科维奇,1993;帕里斯,1961;斯坦伯格,1994;托马西奇,1946)

298

虽然犹太人与吉卜赛人也被无情地清除,但这主要是与德国人之间的交易,是为能获得允许管理自己国家而被强索的代价。国防

军到场执行协议,如果必要的话。但是对塞尔维亚人的谋杀性清洗相当程度上是在纳粹之外自主完成的。

盟国施害人

轴心盟国是独立国家,不只是傀儡而且是具有真实然而程度不等的行动自由的——匈牙利最少,然后是罗马尼亚,再是保加利亚,最后是意大利,它最有自决权。

匈牙利

费恩运用匈牙利作为支持她的论点,即在两次大战期间反犹太主义更强烈的地方堆起的犹太人尸体也更高——比如在匈牙利,她说。但是匈牙利的反犹太主义实际上是非常不均衡的。它在1887年到1892年之间曾达到短暂高峰,然后再一次是在“一战”以后,当时的革命复活了短暂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幽灵。暴力和反犹太主义立法出现。但是1926年之后的十年世局相对安定。苏联似乎遁去,而犹太人更多的是作为资本家招人怨恨,而非共产主义者。但是30年代末希特勒的成功让匈牙利的政治右转,使政府派系化。一个反动的威权主义团体在海军上将、摄政王霍尔蒂周围形成;有一个更加激进的亲德国的社团主义派别,还有一个大型的法西斯组织箭十字党(Arrow Cross),侵蚀着政权之边缘。从1938年起匈牙利政府开始加强反犹太主义立法,而此时德国人的压力还没有形成。但随着国家走向激进化,所有三个派别都控制了不同的国家机关,使得任何整体的计划都成为不可能。在1944年之前,德国人并不想通过强加某个计划而伤害联盟关系。

摄政王霍尔蒂的A计划是常见的保护民族自决权。虽然地缘政治因素迫使他与德国结盟,他还是竭力确保匈牙利的自治权。他的欲望结果被纳粹的种族自负加强了,这对德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有毁

灭性影响。霍尔蒂屈服于德国的压倒力量*，同时想方设法不被盟国疏远(以防德国万一输掉战争)。然而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限制了他的灵活性——因为是苏联人在这场战争中起着关键作用。所以霍尔蒂调遣他的军队抵御俄国进攻，但对犹太人放缓了动作。他的派别作了两种区分。一是在他们自己的歧视性质的合法的反犹主义(限制犹太人受教育、工作、财产和居住权利)和由激进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德国人催迫的身体上的治安性或野蛮性驱逐之间的区分。他的总理卡拉伊说犹太问题不是种族的而是经济的。“社会正义”要求实行区别待遇。犹太经济权力必须被去除(唐,1989)。第二,霍尔蒂派别区分了“匈牙利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最近的只是居住在匈牙利的难民。他们还同时否认 1938—1941 年期间返还给匈牙利的领土上的犹太人的公民权。这些外国犹太人可以被牺牲。一位德国党卫军军官报告,“霍尔蒂认为被同化的布达佩斯犹太人是匈牙利人,但外省的较贫困的犹太人则只是群氓”。这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性的而不是种族的民族观。对文明人的同化,通过驱逐实现对其余部分的清洗是霍尔蒂的 B 计划。这一点加上他的地缘政治实用主义,使他远离了种族灭绝。

然而在整个欧洲轴心国中,德国的压力使得歧视性立法加速进入到居住隔离、集中聚居以及最后向死亡集中营的驱逐行动当中。德国人和他们在匈牙利的激进和法西斯分子支持者施加压力,这样在 1941 年 8 月霍尔蒂迫使 1.8 万非匈牙利犹太人离开北部地区,他们被匈牙利当局一直赶过与波兰的旧边界。他们被认为是与苏联人勾结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本次行动是由内政部、地区府县以及乡村的呼吁“一个摆脱了一切犹太人的领土”的激进分子、法西斯分子组成的宪兵队操办的。经济领域现在可以“消灭干净犹太寄生虫,同时边境地区的经济利益可以确保成为基督徒的了”(费杰斯,1997)。也许有三分之二的被驱逐者实际上是匈牙利公民(霍尔蒂可能没有获知这一点)。

* 法文 *force majeure*。

政权中大家并非想法一致。激进分子倾向最后解决方案,通过治安性或野蛮驱逐将所有犹太人清洗出去。他们的动机是几重的:未经考虑的对反犹的盲从,意识形态上将犹太人视为主要敌人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还有物质方面的贪婪。他们断定德国人会杀掉被他们赶出边境的犹太人,但是国防军不愿意,又将他们赶了回去。一项妥协达成了。匈牙利将 5000 名犹太人与左翼政治犯一起带进军队劳动营当中。随着战争失败的危险临近,这些参加劳动的犹太人的待遇恶化,绝大多数人死去了。然后 1.2 万留在边境一带的犹太人在乌克兰援军和部分匈牙利军队的帮助下被德国的特别行动队屠杀了。

300 军队也分裂了。它没有执行 1941 年的驱逐行动,尽管有些部队参加了,特别是德裔民族士瓦本人(Swabians,他们强烈支持纳粹)。其他部队试图拯救犹太人(兹比科斯基,1993:178)。在有争议的南斯拉夫边境一带情况不同,这里与国家利益有利害关系。1942 年 1 月,3300 位平民被匈牙利士兵和 1941 年被匈牙利合并的南斯拉夫某个区的宪兵杀害。77% 的受害者是塞尔维亚人;只有 21% 是犹太人(也有一些吉卜赛人)。与塞尔维亚少数派打交道的需要使得最高指挥部审判了若干施害人、激进右翼分子,其中士瓦本人又一次占比过高(布雷厄姆,1989a)。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军队变得越发地趋向亲德。许多中低级军官支持箭十字党,强烈呼吁匈牙利清洗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集团。一位军官后来作证:

犹太问题对武装部队具有灾难性影响。它带来一个可怕的败坏效应。每个价值观都经历了一次重估。残酷变成对祖国的爱,暴行成为英雄主义的行为,腐败堕落摇身一变成了德行……针对犹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允许的……(布雷厄姆,1981:317)

霍尔蒂坚持到 1944 年初。然后他又供出了十个另外的“异族”犹太人,他告诉他的一位心腹说:

德国人已经欺骗了我们。现在他们希望驱逐犹太人。我不介意,我恨加利西亚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把他们赶出去,赶出国家!不过……有一些犹太人是像我与你一样好的匈牙利人……我们这里就有可爱的乔林和维达(犹太产业主义者和参议院成员,乔林还是一位基督教皈依者)——他们不是好匈牙利人吗?我不能允许这些人被带走。但他们可以带走其他的。

但是霍尔蒂强烈的反犹主义使他没有像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那么早地改变立场。战争的命运在变化,希特勒迫不及待地需要匈牙利军队。霍尔蒂很可能是拖延了时间,对犹太人什么也没做。但是德国人在匈牙利激进分子身上做文章,协助他们获得职位,然后他们就从内部给霍尔蒂施加压力。内阁部长呼吁通过有形手段将犹太—布尔什维克清除出去。年轻的政府代表呼吁一个“强硬、积极、右翼的政策,以国内的塞格德(Szeged)观念(即法西斯主义)为基础,采取严厉措施反对颠覆性因素,同时再采取新的有效的针对犹太人的措施”(布雷厄姆,1989a:587;1989b:602)。

艾希曼在 1944 年索要余下的犹太人时料到会有困难。然而他从重要国家机构中的激进分子那里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所有合作。他说内务部负责犹太事务的法西斯秘书恩德雷“想把犹太人蘸辣椒粉一起吃下去”。他的副手、法西斯主义者巴基,为交通线提供了宪兵部队。德国人每天拨出两辆列车用于驱逐行动;匈牙利的策划者提出要六辆。他们最后达成协议四辆,因为一场战争还在进行。两个月后,将近 45 万名犹太人被驱逐,其中大多是踏上了死路。越过秋冬至少又有 6 万人死于射击和强迫行军之中。1941 年匈牙利有 82.5 万名犹太人。4 年过后,68% 的人消失了。布雷厄姆总结说:“德国人将会感到相当无助……若没有匈牙利当局诚心诚意并有效的合作的话。”这也是党卫军官员维森迈耶和温克尔曼对柏林报告的话。少数省长、市长、警察和文职官员行动迟缓,有几位辞去职务。大多数省长被激进的右翼分子取代,而有些人则被调至他们谁也不认识的地区,这样他们就不能组织反抗。但是大多数他们的副手和

市或镇政会主席留在原位,执行命令。教师和公务员在激进领导人当中占大多数。大多数匈牙利人似乎很高兴看到犹太人离开,而对他们的去向何方未想很多。有100万左右的人从犹太人财产的即刻再分配中获益。大约有1000名国家秘密警察,20000名宪兵中的3000—5000人以及3000—5000名法西斯箭十字党民兵施行了谋杀或严厉拷打。军队并未大量卷入——它在其他地方有任务,腾不出身来。党卫军军官又一次表示对地方性野蛮行为的反感。一些被驱逐者说他们害怕匈牙利人更甚于害怕德国人(阿伦特,1965:140;布雷厄姆,1981:374,403,841—842;布雷厄姆,1995;赫策尔,1993:186—188;赫斯,1978:135—136;勒韦,1948:335—421;莫尔纳,1997;纳吉-塔拉维拉,1997;萨格瓦里,1997;西内,1997;西塔,1990)。

1946年,克鲁日(今科洛斯堡)的匈牙利法庭发现185人在执行驱逐行动期间犯有战争罪。他们大都是组织者而不是普通人员,所以绝大多数人是中年人。他们的职业显示了权力机关的同谋或串通程度。在179个职业明确的人当中,143个在公共部门中工作。36个是省长、副省长或市长,17个是下层官员,22个是警长,18个是警察,38个是宪兵部队军官,6个是宪兵队军士或队员,5个是军队军官,1个是士兵。其余的分散在各阶层:6个企业家,6个职业人士,6个手工艺者/商人,3个白领工人,6个工人和9个妇女——包括3个专事残忍的阴道搜查的产婆。许多人是箭十字党激进主义分子,驱逐行动经常是从地方党的总部开始组织的。一位市长怪异地颠倒现实,使人想起苏联驱逐行为的影子:

血与泪,老人与孩子,男人与妇女,加上他们的尸体将成为这些新的向亚洲流亡旅程的标志。那会是谁,手执鞭子,殴打那些双脚带血蹒跚前行的人?犹太人……布尔什维主义和犹太总体都是一回事。一个想与其斗争的社会必须根除这个族类,因为犹太人不想,也做不到同化。(布雷厄姆,1983:84,201—214)

乡村的宪兵快速清洗了农村,它的指挥将领起草好了驱逐计划。绝大多数农民似乎无动于衷,极少卷入。而布达佩斯只在1944年的两次突击中被清洗。主要的街头施害人是受年轻的恶棍团伙唆使的箭十字党准军事部队。霍尔蒂、军队以及教会上层集团都支持1938年和1939年的反犹主义立法,然而对暴力感到不快。教会开始对德国人提出抗议并帮助一些犹太人,但是许多低级神职人员激进化了。一位残忍的箭十字党帮派头子是天主教牧师,所以宗教游行队伍经过箭十字党大楼时,会降低横幅以示对他的尊敬(赫策尔,1993)。报纸上也煽动着反犹主义感情。但是当外国抗议继之而来时,霍尔蒂的派别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保护布达佩斯犹太人,同时有当地警察和军队部门的帮助,后者阻止激进的宪兵部队进入该市(卡赛,1998:104—105)。7月,霍尔蒂与苏联人谈判,试图赶上改变立场的末班车——古怪地用沾满血腥的宪兵司令作为他的特使(厄雷兹,1989:624,639)。当德国人得知此事(通过政权内的激进分子),他们逮捕了霍尔蒂,同时用箭十字党领袖绍洛西取代了霍尔蒂的位置。绍洛西带回来的最坏的一批施害人掀起了新一轮谋杀性驱逐的风暴。幸运的是红军不久就冲进布达佩斯,拯救了首都大多数犹太人的生命。

再一次,施害人不可能超出几千人以上。再一次,他们的核心由法西斯分子和准宪兵部队组成。我的书《法西斯主义者》表明法西斯主义者选取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拥护者。纳粹带来一定压力。如果没有希特勒的战争和德国的权力,种族灭绝就不会在匈牙利得到尝试。但是几乎所有的施害人都是匈牙利人。政权总体上想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但对采取何种手段则有意见分歧。当国家让战争变得分歧加重,开始陷入分裂的时候,一些激进化的国家机构尝试采取种族灭绝行动。不幸的是,激进分子逐渐控制了那些拥有最适合种族灭绝的武器、训练和通讯技术的国家机构。核心施害人似乎是在意识形态上受到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的驱使。但是,一旦清洗采取了暴力驱逐的形式,它就创造了大量的赚钱机会。还有许多的匈牙利人是受到物质主义动机的诱惑,这些动机又被那些通常是针对这些动机的法律和秩序合法化了。

罗马尼亚

《法西斯主义者》第9章强调了暴力的反犹主义对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和国家最大的法西斯组织天使长米迦勒军团(Legion of the Archangel Michael)是多么关键。战时政府、罗马尼亚东正教、军界、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其他很多人都合谋参加了以后发生的事,只是程度不同。绝大多数罗马尼亚暴行是他们自己犯下的。约安妮德(2000:108—109)说反犹暴动于1930年间真正盛行,然后在罗马尼亚加入德国一边参战之后成为一项“政府事业”。希尔伯格说罗马尼亚是德国之外唯一的自己执行所有阶段的杀戮的政府——从确定犹太人的官僚定义,经过区别对待、集中居住和驱逐出境,到大屠杀(1978:485—509)。然而甚至所有这些都未将杀伤率提高到由德国人直接统治或通过德国人的傀儡国家统治的那种水平。

在1937—1938年,罗马尼亚政府曾收回过四分之一的犹太人的公民权——未受纳粹影响。一阵短时停顿一直延续到1940年8月,刚好在罗马尼亚参战之前,此时国家的首脑安东内斯库元帅,宣布国家中的犹太人没有国籍或公民权,除了少数的1914年以前拥有公民权的家庭。安东内斯库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矛盾人物,但罗马尼亚离苏联威胁较近,而像许多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也相信犹太—布尔什维克是敌人。他说犹太人是“最危险的国内敌人”,同时,甚至在希特勒崛起之前,他便倾向于将犹太人驱逐出境——这是他的A计划,治安性驱逐(安塞尔,1993:225)。“罗马尼亚化”政府办公室,原来寻求对少数群体采取文化压制和经济歧视政策,现变得更加着重于对犹太人采取更严厉的强制手段。为了给德国人留下好印象(以使他们停止支持他曾经镇压下去的法西斯军团),整个1941年他一次又一次呼吁采取清洗或净化措施: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最有利于整个民族解放的历史时刻,以实现民族的纯正以及使我们的民族去除一切在其灵魂之外的因素——它们像美洲寄生子属植物那样生长,并使民族的未来越

发暗淡。我们必须毫不宽容,不要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副总理 1941 年在部长会议上说:

罗马尼亚民族……必须利用这一时刻对人口进行清洗……关于民族人口,让我向你们保证不仅是犹太人而是所有的少数民族——我们将运用一种完整和暴力的清除外国人口的政策。(约安尼德,1990:214;1994:158—159)

教会领导人敦促罗马尼亚基督徒界要清除掉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和“撒旦的”血液。他们将希特勒和安东内斯库描述成上帝派到地球上与“撒旦的犹太教会堂”作斗争的在“胸前佩戴十字架符号”的“天使长”(安塞尔,1989)。第一批谋杀行动发生在 1939—1940 年,来自于名声不佳的准法西斯全国基督徒防御同盟和法西斯军团。然后在军团搞砸的 1941 年 1 月政变期间,120 名布达佩斯犹太人被杀,大约有 1400 人被殴打或遭抢。在一次可怕的事件中,犹太人被推进一个动物屠宰场的机器中。约安尼德(1991;参较 2000:57—60)将此称为“最后一次沙皇集体迫害”,但是这不只是一种政治偏离。它是一次涉及谋杀性清洗以将犹太人清除出罗马尼亚的民粹主义法西斯政变。瓦莱里安·特里芬是罗马尼亚基督教学生法西斯联盟、铁卫团的学生组织的头头。他是一名神专业的学生、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犹的宣传者。就在起义之前他用无线电广播行动号召:“犹太人,即使他们藏身蛇穴,我们也会把他们找出来,杀死他们。”在起义期间他领导对布达佩斯犹太区的进攻。当政变失败之后,他身着党卫军制服被偷带至德国。他最后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美国公民。

安东内斯库现在被与让霍尔蒂陷入的圈套类似的国内和德国的共同压力包围了。但是鉴于他自己对罗马尼亚反犹太主义的观念和他的暴力程度,他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希特勒喜欢这位元帅,早早让他进入最后解决方案的秘密谋划。安东内斯库急于证明自己。罗马尼亚军队将要入侵俄罗斯统治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省。安东内

斯库对随之而来的暴行有浓厚的兴趣(安塞尔,1993,1994;布特纳勒,1992:89—133;约安尼德 1990,1994,2000)。他的宪兵司令呼吁“清洗国土”。“梯队”精英部队模仿特别行动队的样子组建起来。罗马尼亚的方法既不严密也非有序,德国人说他们既太零碎又太过头,强奸、抢劫和野蛮谋杀太多。罗马尼亚人没有完全放弃集体迫害,但政权的目标是更有系统的谋杀性清洗。

1941年7月,第一次对3000至1.3万人的犹太人的屠杀发生在罗马尼亚边境的雅西镇(Jassy),而那时军队甚至还没有跨过边界。安东内斯库被这次屠杀搅乱了,因为它的不加节制、无法无天让这次行动本想掩盖的方面全都暴露了。法西斯军团士兵是煽动群众谋杀的那些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得到了按最高指挥部命令行动的梯队部队的武装配备。在战争阶段,匈牙利军队有时还阻止特别行动队的行动,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军队则不失时机地热切参与其中。意大利战时记者马拉帕蒂描述过这一场景:

一群群犹太人被士兵以及拿着刀和铁锹的发了疯的平民追赶着沿街逃跑;一批批的警察用他们的来复枪枪托捣碎房屋门窗……一队队的士兵把手榴弹扔进许多人徒劳寻求安全藏身的地下室;有些士兵……笑着朝同伴看。在屠杀最严重的地方,双脚能在血泊里打滑;房间里、街道上到处可闻见歇斯底里和狂暴的集体迫害的表钟鸣响,伴随着枪声、哭泣声、可怕的尖叫和令人痛苦的笑声。(1946:138)

屠杀随罗马尼亚军队的保护而遍及两个省。余下的犹太人被赶到邻近的乌克兰,在此党卫军会干掉他们。很多人死去,抢劫无处不在,少数富裕到足以交付赎金的犹太人被赦免——一种罗马尼亚式的而非德国式的做法,这表明贪婪可能超过意识形态。并非所有罗马尼亚人都是同谋犯:约安尼德(1990)说到了几个持异议的军官,并引用了士兵、铁路人员和当地农民表示同情的例子。然而它的规模是以大量的施害人存在为条件的——两省33万犹太人中的一半在9

月前死去。然后德国人埋怨他们应对无力。被驱逐者被赶了回来，这次进入了“德涅斯特河沿岸保留地”——由罗马尼亚军队占领的敖德萨周围的乌克兰部分，中途加入了从罗马尼亚核心领土老王国(Regat)驱逐出来的第一批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20万名被困在那里的犹太人遭受了轮番的杀戮、刻意的饥饿以及残酷的虐待。安东内斯库是否卷入了这些，或者他是否有一个严密的计划，我们并不清楚。但是甚至在官方调查委员会详细公布了暴行之后，他也什么都没干。政权正在走向大屠杀的激进化方向。这些犹太人中只有5万人幸存到1943年年末(约安尼德,2000:174;谢克特曼,1989)。

然后，对20万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n)犹太人、2万多吉卜赛人和像正教少数人教派亚当派*及乌克兰知识分子这样的小规模群体敌人的野蛮驱逐开始了。德国人吃惊地报告说：“罗马尼亚人有意根除乌克兰领导层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乌克兰在北布科维纳的问题。”德国人达成一笔交易：如果罗马尼亚人交出乌克兰人，德国人将交回罗马尼亚共产党。然而德国人的报告继续抱怨，杀害“绝对不受保护和绝对无助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有带来“持续动荡”的危险。安东内斯库宣称：“对我来说无所谓，在历史的眼里我们看上去像野蛮人……如果需要的话用机枪扫射。”最坏的暴行在对敖德萨的罗马尼亚军队司令部的轰炸之后发生(很可能凭借的是俄国人离去时埋下的延迟爆炸炸弹)。安东内斯库下令复仇，每死掉一位罗马尼亚军官要杀200个“共产主义者”(亦即平民)，每死一个士兵杀掉100人。这个定额被超出了，以至于三天后有6万犹太人被杀——整个最后解决方案中最大的屠杀行动，远超党卫军所为。它的范围和速度要求有像机枪和手榴弹这样的现代武器，但是杀戮不是来自行政命令。它包括十足的屠戮场面，其间一批批士兵争先恐后肆意杀戮，竭力超过别人的兽行。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再次成为托词(希尔伯格,1978:199—201;约安尼德,1990:199—234;2000:177—182;梅

* Innocentists, 也称裸体主义者, 主张回到人类始祖亚当无罪境地的伊甸园, 以乱交方式返璞归真。

耶,1990:261—263)。现在是属于种族灭绝了。犹太人多里安的日记揭示了以最古怪的方式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表示的仇恨。此处俄国战俘被当作犹太佬*——犹太人:

我被普遍存在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吓坏了,每个人都将他们视为叛徒、突击队员、共产主义者、毒如蛇蝎的人——一个无法控制的仇恨像传染病传播着:人们不知道该流行病是何时染上的——突然一下子侵入到了他们的血液里。任何关于犹太人的诽谤言论……不管多么愚蠢可笑,立刻就被相信。一个三等车厢,装满了俄国水手、战俘,被挂在我的火车后面……忽然间,市民们全部冲出站台,士兵离开他们的车厢,都赶过去看战俘。这种好奇可以理解——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大多数人大声喊着要用刀、斧子、凿子——任何东西,来挖掉“犹太佬”的眼睛和砍掉他们的鼻子。

施害人的数目庞大,但多少不为人所知。很少的罗马尼亚人帮助过犹太人;大多数人保持消极态度。法西斯军团士兵在杀戮中表现杰出。《法西斯主义者》第9章表明军团中占绝对多数的是无产者,尽管是由文职官员、职业人士、学生和牧师等领头,而军团对于边境县特别有吸引力,这里的罗马尼亚人生活在犹太人和其他受威胁的民族当中。不清楚的是是否根除政策具有同样的拥护者。领导人中包括了范围更广泛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包括政府成员,对他们来说,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受到布尔什维主义、马扎尔人(匈牙利人)或者最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威胁的边境地区的人,似乎本质上是反罗马尼亚的。

但是1942年,安东内斯库从种族灭绝中抽出身来。像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政权一样,他区分了犹太人的几种类型。来自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犹太人(在1918年到1940年这个时间段同时又是从

* 美国俚语,Kikes。

苏联人那里被重新征服过来的罗马尼亚人)通常被视为异族的犹太—布尔什维克。面对选择,绝大多数政治积极的比萨拉比亚犹太人可以理解地更情愿受苏联统治——尽管又一次,犹太人很少是实际上的共产党。在特兰西瓦尼亚(1918年以后才拥有),犹太人被控告与马扎尔人勾结。事实上,许多当地犹太人曾是罗马尼亚农民和马扎尔人上层阶级之间的经济中间人。假如他们1918年被给予一次公民投票机会的话,绝大多数特兰西瓦尼亚犹太人会选择匈牙利人,而不是罗马尼亚人的统治。但是匈牙利人是盟友,威胁要小得多,而这些犹太人更加西方化。所以他们只被当作是稍显陌生的。第三,安东内斯库将古老的罗马尼亚的核心土地老王国上的犹太人看作是文明人和罗马尼亚人;他们也是最富裕和最有用处的。

在作出这些文化选择时,安东内斯库将他自己与致力于对所有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的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分开。自由派、王室阶层以及梵蒂冈等不断缠着他要他后退,美国也试图让他改变立场。他准确地想到同盟国有可能把特兰西瓦尼亚还给罗马尼亚。随着战争命运的转向,安东内斯库也转变了。1942年9月末,德国在东线的第一次挫折使他决定不执行从布达佩斯开始驱逐的协议。德国在斯大林格勒(今称伏尔加格勒)投降的消息传到罗马尼亚的这一天,他公开宣布拒绝接受这个方案。他在收买同盟国的信任。“犹太人对安东内斯库来说成了一种可能的可兑换货币的形式。”(约安尼德说,2000年:238—258,271—283;参见安塞尔,1993,1994)他从德国人那里得到的自决权比霍尔蒂得到的更多,他更接近帝国,但他也更加灵活。没有斯大林格勒,安东内斯库会心甘情愿地走得更远;据报道说,他后来为他没有能力清除所有犹太人感到后悔。但是大多数来自老王国的犹太人幸存了下来,多亏了他的地缘政治意识。此后,在1944年8月,安东内斯库与俄国人结盟,力图救他自己,尽管太晚了。他们次年就处决了他。他曾领导过一次地方种族灭绝,试图通过谋杀手段清洗老王国外围的所有犹太人。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是仅有的大面积抵抗最后解决方案的轴心国。沙皇鲍里斯、主要政治家和教会统治集团经常被给予这种赞誉,然而绝大多数保加利亚犹太人的幸存是由于于远更广泛的缘由(希尔伯格,1978:47—84;奥伦,1989)。犹太人占不到人口的1%,并未主导着这个乡村经济占绝对比重的经济体中的任何分支部门,对政治几乎毫无影响。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的主要宿敌不是犹太人,而是土耳其人——如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甚至犹太人这些“开化的欧洲人”的敌人。像当地土耳其人口、保加利亚穆斯林(说斯拉夫语的穆斯林)、吉卜赛人和加告兹人(说突厥语的基督教徒)这样的“东方人”是更加边缘的非己团体。穆斯林占人口的14%,是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异族团体。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在1934年后兴起,目标指向的不是犹太人而是对穆斯林的强制性制度同化,主要是通过强制性学校教育措施。在其他战时环境下,土耳其人可能是更可能的敌人和施害人。早在30年前的巴尔干战争中他们便是敌人和施害人,1945年后他们又是如此。但土耳其现在中立了。

保加利亚也没有很强的反犹主义。与土耳其人的斗争联合了保加利亚和俄罗斯的力量,所以民族主义者经常是亲斯拉夫的——很少人希望被庞大的苏联邻居疏远。保加利亚向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英国人宣战,但很小心地选择不对苏联人宣战。希特勒明白,但他主要感兴趣的是与保加利亚的贸易以及他的军队经过巴尔干国家时的协助通道。那里根本没有犹太—布尔什维克敌人,甚至希特勒也这样看。绝大多数保加利亚人,不仅是精英,相对较少受到蔓延至东南欧很多地方的仇恨的影响,而德国人也没有对他们施加很大的压力。

希特勒确实要求实行区别对待和集中居住的反犹太人立法,而更多的要求是由地方民族主义者提出的,他们受到俄罗斯白人流亡者的影响,然后又受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影响(有些人曾经在

德国上学)。随着这些激进右翼分子逐渐渗透至在德国压力之下建立起来的犹太人事务部中,政权变得带有派系化特点。妥协达成了。希特勒用从希腊手里赢来的色雷斯和马其顿来酬赏保加利亚盟友。这些省的 1.1 万名犹太人是保加利亚民族中较边缘的成员,作为不幸的工具,被献给纳粹以保存保加利亚的自决权——以及保加利亚其他犹太人的自决权。当纳粹和地方右翼分子一再提出更多要求时,政府同意再驱逐 9000 名犹太人,但是受到大型游行示威支持的当地政治家终止了这一计划。德国人不想分派军队去镇压他们。余下的保加利亚犹太人遭受着歧视,但他们活着。同在波兰一样,参战战略挫败了所有针对犹太人的地方清洗民族主义。但是在此它也影响了德国人。因而保加利亚人得到了拯救,没有去犯下大量的恶行。

308

这三个东南欧轴心国家的统治者都对犹太人类型作了划分。然而他们也比原来他们打算的更深一步地被拖入了种族灭绝方案当中。为防止战争带给他们的地缘政治损失,他们在杀哪一类型犹太人问题上采取了妥协。但是他们的动机也是政治性的。不管种族上的和宗教方面的反犹主义达到什么水平,犹太人总是被认为构成了对有机论的民族—国家的可变的政治威胁。那些长期居住在核心领土上的人不被认为是完全异族的、反民族的或布尔什维克,这和受威胁领土上的那些人形成对照。除了在保加利亚,大多数政治家希望将犹太人从他们的民族中清洗出去。但是他们不允许杀光全部犹太人。我们已经见到一些迹象,通常民族—国家的核心拥护者,包括受威胁的边境民族主义者,是最可能跨过这条线的。但证据不足。

意大利

意大利是仅有的完全独立的轴心国盟友,能够抵抗德国所有的压力——当然只是到 1943 年 11 月为止,此时墨索里尼被罢免,然后又恢复原职,这次是作为德国的傀儡统治者。在此之前,任何暴行意大利都有主动权;在此之后他们可能就承受更多压力。正如《法西斯主义者》第 4 章显示的,早期意大利法西斯暴行大都不存在谋杀。种族主义或反犹主义表现也不突出。种族更多的是被视为文化上而不

是生物学的。意大利民族是由多团体自愿选择的联合行为形成的，墨索里尼说。他说，所有的民族，在生物学上都是多元的。犹太问题并没让他有很大兴趣。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伯爵在他的日记中吐露：“犹太人并没多少，而且除例外情况，他们对人没有伤害。”不存在犹太—布尔什维克幽灵。10%的犹太人应该是党员。然而从1934年起墨索里尼偶尔会趁机煽动反犹主义，而从1936年起，意—德联合干预西班牙内战带来了更多的纳粹影响（米凯利斯，1995）。

然而在非洲，法西斯分子以某种让我们回到第4章的殖民地主题的方式展现了谋杀性种族清洗。意大利获得北非殖民地的时间较晚，将近19世纪末，形成了常见的对于当地人的欧洲种族主义观念：只有白人才是殖民地公民。像科拉迪尼这样的法西斯作家对通过殖民地扩大意大利人口规模怀着一种优生学学者的想象。因为让大量意大利人移居非洲需要将当地人从土地上清除出去，墨索里尼的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冒险导致了大规模杀戮。在1928—1932年间为平定利比亚他们杀死了几乎22.5万名昔兰尼加人（Cyrenica）的四分之一。然而与埃塞俄比亚比起来，这也是小巫见大巫，显得微不足道。1936—1938年期间远远比意大利犹太人更多的埃塞俄比亚人被杀害，尽管种族主义使他们没能受到同等的学界关注。

德尔·博卡（1969）详述了发生在埃塞俄比亚的三类兽行，我将它转化为表1.1中的类型。首先是冷酷无情的战争：运用芥子气（mustard）和其他气体，它们是《日内瓦公约》禁止使用的，因为他们杀死或使飞机底下被喷射的所有生命变成残废。一位美国记者估计，有25万埃塞俄比亚人被杀死或受到严重感染。相关观察员说他们看见“数不清的男人和野兽的躯体”躺在平原上和河面上，“数千具尸体处于腐烂状态”。其影响效果是持久的。一位1941年在入侵的英国部队中服役的意大利的犹太医生告诉我说，他看见许多埃塞俄比亚人在走过被感染地区之后两只脚都变得只剩下了骨头。芥子气的效果不久就被“二战”中冷酷无情的战役所用的那些火焰炸弹和原子弹的效果超过了。然而这是针对一个落后的、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敌人的大规模的过分行。事实上，它具有第二个并且刻意的清

洗目的：为想象中的百万意大利殖民者创造空间。这不能与最后解决方案相比，但（在较小的规模上）相当于纳粹对波兰人的集体大屠杀。

第二，意大利占领当局在完成征服之后施行了升级到政治灭绝程度的儆戒性镇压。墨索里尼简明地打电报给格拉齐亚尼将军，“所有被俘的叛军都应被枪毙”。在利比亚以凶残闻名的格拉齐亚尼据说这样回答，“领袖* 将拥有埃塞俄比亚，连同埃塞俄比亚人或者不包括他们，随他愿意”。墨索里尼给他的将军格拉齐亚尼打电报说，“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总体毁灭任务”。投降的埃塞俄比亚士兵遭处决的有数千人。许多住在抵抗地区的平民被杀害。在亚的斯亚贝巴，成队的法西斯黑衫党（Blackshirts）上演一种“追赶摩尔人”式的横冲直撞，他们往街上泼上汽油，然后用手榴弹炸死那些逃跑的居民。人数不多的埃塞俄比亚知识阶层遭到清洗：估计有 3000 人在亚的斯亚贝巴被杀，之后在其他地方又大约有 1000 名科普特教会** 神职人员被杀。罗马发电报提醒要守口如瓶保持秘密。但是在这样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进行的政治灭绝，效果适得其反，因为恐惧的埃塞俄比亚人可以逃跑，因而抵抗行为加强了。到较温和的奥斯塔公爵接替格拉齐亚尼时，时间已经太晚了。意大利现在只能运用庞大的镇压机器进行统治。又一次，这与纳粹对波兰或其他被占领的东部民族的统治类似了。它不是种族灭绝。它缺乏足够清理出必要空间的大屠杀和扑灭所有可能的埃塞俄比亚抵抗形式的政治灭绝。它最终能走多远将取决于引入了多少殖民主义者。

第三，种族隔离成为镇压行动结束之后法西斯殖民主义政策的基础。种族混居被禁止。一位记者指出该政策是为了“保持白人种族在东非的纯洁性……种族主义可以被当作是法西斯殖民政策的皇冠”（德尔·博卡，1969）。然而一种矛盾出现在法西斯主义者和意大利人之间。官方政策经常受挫于普通意大利士兵和殖民者，他们

310

* The Duce, 称墨索里尼。

** Coptic, 埃及国内主要基督教会。

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说,意大利人,喜欢宴饮交际,喜欢慷慨施与,也喜欢与埃塞俄比亚女人发展你情我愿的性关系或向她们买春(但不包括强奸)。

所有这些没有一个是 在纳粹种族灭绝的规模上进行。在利比亚,墨索里尼甚至有一阵还装模作样地充当伊斯兰文明的保护人。这是通常的殖民主义。但是到 30 年代中期只有意大利和日本还在专心建立移民殖民地。最坏时日本的政策堪与意大利人冷酷无情的战争相比,尽管日本人在占领之后强行实施了最强制形式的同化和文化压制政策,但不是用大屠杀进行排除。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中只有南非的那些人朝着完全的种族隔离方向行进,而这具有前所未有的谋杀性质。意大利 20 世纪中期通过大屠杀实施的如此严重的殖民清洗似乎应归因于法西斯主义。

反过来,意大利的殖民主义也使它的法西斯主义更加带有种族性。加上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忠心到底,这就产生了 1938 年的反犹立法。这不是源于德国的压力(普雷蒂,1974)。墨索里尼越来越严厉地谴责犹太人,激励着法西斯学生和记者参加反犹运动。只有德国支持埃塞俄比亚冒险,它推动着墨索里尼更进一步地拥护纳粹意识形态。犹太人呼吁国际联盟制裁意大利的声音最响,因为他们害怕种族主义。墨索里尼早就认为“国际主义世界犹太人”反对他的政权,但是他更愿意不去刺激它。现在既然它公开攻击他,他宣布犹太人不属于意大利民族。所有这些线索都随着他对敌人的观念的激进化而相互缠绕在一起。他开始担心法西斯主义可能会停滞不前(在他攫取政权之后它曾经有过这样),所以他强烈要求组织“渐进的极权主义化”。这种激进化比第 7 章中讨论的纳粹激进化程度要小得多,但它走向同样的方向。

反犹法律不受欢迎,除了在的里雅斯特地区(绍洛德,1995)。那里有更多的犹太人(尽管还只占人口的 4%),反犹主义被(与通常一样)融入到更广泛的民族冲突之中,本例是发生在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之间。四海为家的的里雅斯特犹太人被视作外部敌人的盟友。其他地方的法西斯街头争斗只是偶尔针对犹太人。党卫

军报告说绝大多数意大利人和绝大多数官员反对驱逐行动。一些意大利人试图阻止发生在被占领的法国、克罗地亚和希腊的种族灭绝。

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游击队对意大利占领的激烈抵抗确实导致了人质被大量处决以及对村庄的恐怖轰炸(托马西克,1946:113)。但是,斯坦伯格说,意大利军队“与德国军队居住在不同的道德宇宙之中。它的法西斯分子是传统的君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没有与破坏了德国军队传统的党卫军相当的意大利法西斯部队。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在意大利人手下遭受的苦难肯定要少得多”(梅佐沃,1993:150—155;斯坦伯格,1990:206—227)。

然而,1943年11月,意大利北部最后残余的法西斯国家,萨罗或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被扶植起来。在新的革命法西斯党下组织起来的共和国把自己视为是左翼和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德国人反对这样的左倾主义,担心它会破坏战时的生产,因此这些法西斯分子的激进主义经过调整指向了反犹主义——很像30年代德国冲锋队的激进转向(见第7章的导论)。萨罗的准军事部队对被怀疑有支持游击队嫌疑的犹太人和当地人施加了伤害。大多数宪兵队(carabinieri)和新兵似乎缺乏热情。但是更激进的团伙,人数总共2000人多一点,减轻了党卫军最后驱逐的大多数负担。有些人是独立的海盗;其他的来自像非洲黑衫党或国家安全志愿军(MSVN),一个法西斯准宪兵部队。这些法西斯老兵受非洲战争和纳粹权力的影响已经转向了一个更加种族性的敌人观念。有些人谴责犹太—布尔什维克敌人。朱科蒂称他们为“狂热的法西斯分子……邪恶、忠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去的人……理想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虐待狂、前罪犯、冒险家和青少年”(1987:148—154;参较伯纳蒂尼,1989;法乔恩,1989;希尔伯格,1978:421—432;莱丁,1989)。这一堆身份并非全是令人信服的,而施害人依然模糊不清。很多人战后受到审判,所以更多的数据肯定是可以找到的。然而很清楚的是,在非洲和意大利两处,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比普通意大利人罪孽更重。

结论：盟友和援军的种族灭绝的社会结构

312 在两次战争期间，几乎全部东欧国家都向第3章描述的社会有机论民主观念迈进了一步。1918年之后建立的新政府是作为向着自由民主方向前进的代议制政府，但所有政府都赋予主要（并通常是名义上的）族群以特权。波兰本质上是为波兰人准备的，罗马尼亚是罗马尼亚人的，等等。大多数及少数派的政党都把自己标示为民族主义的，声称是为单一的整个民族代言。他们的领袖，加上将军与君主一道，声称是它的代言人，所以民主制就蜕化为了威权主义。他们的民族主义和他们针对其他族群的歧视性政策受到了欢迎。几个少数党放弃了多元文化主义（他们的第一道防线），同时给出了他们自己的社会机体论，声称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拥有主权。乌克兰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最终欣然接受了他们自己的威权主义。该地区的政权因而体现了我的种族论点1a和1c，他们自认为是在追求民主化但实际上是在走向种族清洗。当然，“二战”中发生在通敌政权下的最严重的清洗根本不是民主制的。但到那时，纳粹德国已经插手了。

我已讨论了由大约5万非德国人施行的谋杀性清洗。若将西欧人算在内，总数将在6万以上。这是大屠杀但显然根本不是大多数人合作参与的种族灭绝。几乎在所有地方，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者都引领着杀戮者，正如早期他们引领温和歧视和清洗一样。这些引领者被他们自己的反共主义和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引向意识形态杀戮。他们运用的是种族民族主义的，而非阶级的利益模式。然后他们被德国政治和军事权力的运用诱入了纳粹的怀抱。他们的服从变成双刃的：虽然绝大多数地方盟友和援军似乎很愿意参加杀戮，他们也受德国命令的束缚。盟友比傀儡、扈从以及援军有更多自决权，而虽然意大利和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利用机会谋杀他们自己的敌人，但更大的自决权几乎总是意味着较少的系统性杀戮。他们更加自主的杀戮通常也具有模棱两可的野蛮性质。虽然野蛮杀戮似乎更加可怕（包括对德国人），但他们的持久性不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得到保持。

野蛮杀戮在某种意义上是升级的集体迫害,因此也包括很多的物质主义抢掠。抢劫施害人经常来不及很快地杀人。这就是为什么甚至最暴力的反犹主义,比如在罗马尼亚,尽管比任何早先在德国发现的势头都强得多,也不能凭自己而一路走向种族灭绝。它需要纳粹的增援才能到达接近目标的位置。

这些施害人是分层的。德国纳粹构成种族灭绝中的“上层阶级”,其事业激进化(前几章描述)几乎在这些通敌者被邀请加入之时就已经完成了。数千的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者支配着当时安排到位的例行种族灭绝协作部门。他们是种族灭绝中的“中产阶级”,很可能选自与我在纳粹案例中指出的核心拥护者相同的一批人。然而极少数的人是受希特勒和他的内圈的准绝对价值理性的驱使。他们间接地介入谋杀性清洗,然后介入种族灭绝,因为较温和的争取民族独立和由大多数族性进行统治的计划被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危机所破坏。国家边界已被 1918 年后的和平条约大大改变。新的国家被创造出来,而旧国家孕育出修正了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组织正寻求他们自己的国家,带来对同样领土区域的竞争性要求(见我的第 3 个种族论点)。苏维埃俄国、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权力的增长带来进一步的对稳定的破坏。所有这些带来了明显的走向族性的阶级大调整(我的第 2 个种族论点)——所谓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剥削者,或塞尔维亚人或捷克人对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斯洛伐克人的剥削。地缘政治稳定状态的破坏之后爆发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民族主义者必须在其中选择站在哪一边。那些将成为中产阶级的施害人可以预料地选择了纳粹种族民族主义,而舍弃了苏联阶级革命。战争动员使他们坚定了自己的选择,确保数年之中种族胜过阶级冲突。

在这场危机当中,所有本章讨论的民族主义组织都随着它们国家的自决权的削弱或消失而走向激进化。因此它们的行为完全适合我的第 5 个一般论点:国家派系主义和地缘政治危机中的激进化。这些民族主义通敌者迅速采取行动,尽管经常是心情矛盾,获得了纳粹对达到他们两个目标的支持:实现或保护国家自决权和他们民族

的有机种族统一。沿此路径而下就是种族灭绝,尽管地方“中产阶级”原来只打算实施一次相对次要的罪恶。

更多的数以万计的普通人自愿做普通的、参与种族灭绝的工人阶级。通敌者来自所有阶级,来自意识形态暴力在其中获得响应的社会拥护者。他们大量的是具有军事或警察背景的年轻人、反共主义者和右翼分子。有时他们来自受威胁的边境地区。施害人中有极少数的妇女。许多妇女赞成杀戮(格罗斯于2001年说在波兰的耶德瓦布内村也是这样),但是她们极少被允许加入。对于受害人这一方不存在性别歧视。妇女(及儿童)通常与男人一起被杀掉,但经常是在被强奸之后。

开始加入这类种族灭绝的“阶级结构”是随自己意愿的,不像加入真正的阶级。施害人不是任意的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克罗地亚人等等,而是自我选择参加任务的自愿者,而这任务大多数人都知道包含某些杀戮行为。德国目标的全部内容肯定未被当初的他们所理解。但是民族主义领导人、警察后备部队和集中营卫兵肯定已经知道这项工作棘手而又吃力不讨好。有些人怀着热情执行任务;其他人则把凶狠想象为执行命令,他们中的右翼或警察对自己的军事背景很珍视。有些忠心的民族主义者坚定地认为目的——有机的民族—国家——证明了令人憎恨的手段的正当。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者起初的意识形态动机似乎混杂了反犹太人的偏执、报复性的反共主义、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和更一般的对所向披靡的德国人的崇拜。然而很多人是受到物质主义诱惑而越出边缘,然后又因为野心、对权力的享受(包括施虐的快感),以及服从与纪律的等级压力等使自己陷了进去。动机有多种,特别是在下层人中。有些人只是跟随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长辈或令人尊敬的地方精英;有些人远远地崇拜着德国人或希特勒,对他们采取的方法几乎一无所知;有些人只是想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口粮,或者只想抢劫犹太人及其他人的物品。援军和轴心国施害人似乎比他们的德国主人有着甚至更加混杂的动机。

这种阶级结构也包含了一种异常严厉的对退出者的惩罚。改变

人的思想是危险的。一旦战争命运发生转向,结盟的轴心国家便更容易改变思想。只有他们当中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才敢公然摒弃主动从已对地缘政治不利的谋杀行动退出的机会(因为同盟国不喜欢他们)。但对傀儡国领导人和对受德国军官领导的在具有巨大优势的德国部队当中行动作业的援军编队而言,退出是困难的。德国人拥有庞大的军事和政治权力来确保服从——这是实际上使得被占领区的解决方案成为最终形式的因素。艾雷斯是正确的。在自愿报名之后,他和数千名像他一样的人被牢牢纳入纳粹的掌控之中。强制(加上习惯和酒精)是一个重要的束缚。逃跑需要非凡的勇敢无畏。一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也只有少数人尝试。这里比在德国人当中有更高得多的比例的遵守纪律型杀人者。

在他们当初的服从背后存在着广泛的因素。有在遍布整个中欧和东欧的未经考虑的反犹主义的力量。这依凭的是一对古代的传统:对作为卑贱的剥削者的犹太人在宗教上和经济上的敌意。最后解决方案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古老的基础之上的,它包含了重要的传统的宗教和物质动机。许多施害人相信当时那些类似于他们父辈和祖先时代的关于犹太人的谣言——犹太布尔什维克与犹太教的偷取婴儿者在同样的神话传统之中。施害人将他们的贪婪掩盖在基督教合理性和关于终结剥削的辞令之中。在 20 世纪早期两种传统都已经被革新过了。基督教教会已把他们自己与地方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拴在一起,后者据称能够超越阶级和其他社会冲突。新教、天主教或东正教教会现在几乎强化了每个民族与国内国外的异族人的本质差异的意识。反犹的放纵无度被掩藏在更加现代的意识形态当中:一种受到外国资本家和布尔什维克剥削的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宗教与民粹主义共同加强了民族主义向社会有机论的右转和进而向法西斯主义转向。

这又加强了犹太人威胁着人们向往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样的说法的可信性。四海为家的犹太人几乎在到处被视为是本民族的异己。唯有保加利亚人有其他的更重要的敌人,这有效地让他们可有可无的反犹主义退场了。只有克罗地亚人拥有自决权,加上另一个

更重要的敌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因此让位给了对塞尔维亚人的谋杀性清洗。这在其他例子中也有出现——例如罗马尼亚对乌克兰人的谋杀——但是犹太人总体上通常是中欧和东欧国家中的国家性敌人。出乎意料的是,受意识形态驱使的犹太人的命运也注定了另一个更小的四海为家群体的命运:吉卜赛人。然而,正如我在这几章中强调的,反犹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现象。当犹太人被信以为真地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敌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得到的待遇更坏。费恩(1979:44—58,88)发现在欧洲(这里75%的人口享有共同语言和教会)的9个种族同质的国家中只有1个有成功的反犹组织,而10个混合种族国家中有6个。在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者感到除犹太人之外还有同样的其他威胁的地方,犹太人更有可能成为受害人。我已经在《法西斯主义者》第9章的罗马尼亚例子中提供了对这一环节的最可持续的分析。在犹太人和德国人或马扎尔人(匈牙利人)都大量地居住着的罗马尼亚郡县中,法西斯投票水平时常更高。与通常一样,犹太人在似乎与其他有机民族—国家中的敌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危险。

若没有纳粹上层阶级、其惊人的军事成就及对援军的支配地位,会发生什么呢?虽然“反事实历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是危险的,但我们已经看到一股攻击性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力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这一地区汹涌激荡。纳粹德国的兴起助燃了这股浪潮,但这并不是其出现的原因。早在1925年,绝大多数政府就在颠覆他们宪法中坚持多元文化的承诺。波兰实际就是波兰人的,爱沙尼亚就是爱沙尼亚人的,罗马尼亚归罗马人,等等。三个国家具有相对温和的民族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始于一个更加灵活和文化上的,而不是一个确定的和种族基础上的民族意识,尽管它止于非洲人。而虽然意大利对被征服的斯拉夫人的态度是较为温和的,但意大利不愿意给予他们完全公民权。对的里雅斯特地区的斯拉夫人(以及因而对犹太人)的敌意成为了它从一开始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见《法西斯主义者》第4章)。对保加利亚来说幸运的是,民族主义中(目标指向土耳其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有机品质没有被这一时期的

地缘政治形势加重。捷克斯洛伐克也许是最自由的社会,尽管连它的多元文化主义也有限制,而这些限制就刺激了一些苏台德人和斯洛伐克人走向了法西斯同路人的立场和谋杀性清洗。

民族主义在本地区大部分地方比国家主义更强烈——尽管这些组织大都是因为谋杀了大量犹太人之后用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来为之辩护,吸引了学者的注意。这也是战时行为,此时关于国家形式的宪法争端不如杀死敌人适当。但是他们转而反对自由民主,支持独裁主义组织,其模式是军国主义和准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比漂亮的言辞更真实。因此除非某些反趋势出现,否则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对少数民族和政治少数派的压力仍然可能加大——即使没有纳粹。

压力在吉卜赛人(以及其他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犹太人和其他较大的少数裔族人等三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呈现不同的水平。对吉卜赛人这样的未曾被预料到的党卫军意识形态的受害人而言,可能的反事实场景似乎是最清晰的:假如没有纳粹,他们会活下来,遭受着歧视(像他们今天一样),但是人活着并还将繁衍不衰。也许同样的话可以用于精神病患者、耶和华见证会*、亚当派、同性恋以及其他群体。对较大的外邦人少数裔,反事实场景可能是歧视、作为二等公民活着以及某种压力下的向外移民。在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关系中,更坏的可能已经存在,后来确实发生了。但假使没有纳粹德国的权力,其他大的少数群体——像波兰的德国人与乌克兰人——将会有两个选择:要么留下,面临经济和教育机会以及社区权利方面的歧视,要么向外移民。移民对德国人比对乌克兰人更有吸引力,因为德国人有他们自己的祖国。哪一种可能都会伴随暴力以及也许成百人的死亡。政治少数派还可能遭受到迫害、逮捕以及少数死亡。很难想象这个阶段的东欧和中欧国家会不倾向于种族清洗,尽管大多是采取非谋杀性的途径。事实上,这是整个 20 世纪欧洲的趋势。这半个欧洲的动向也是与政治宽容背道而驰的。自由主

316

* Jehova's Witnesses, 也称拉塞尔派,属强调启示的小教派。

义者和社会民主党都受到压制——这是双倍的不幸，因为他们提供了反对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主要堡垒。

但是什么样的反事实场景在等着犹太人呢？即使没有纳粹，也有一种将犹太人视作不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世俗趋势。犹太人报之以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寻求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绝对是社会有机体和压制性的国家。这不是一个稳定的趋势，因为经济或政治危机往往会突然使反犹主义情绪升级从而突然转向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者似乎对这样的迅猛势头显得毫无办法。如果纳粹没有征服德国，它们在整个大陆上会更加强大。保守主义者握有更多的权力去通过与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就经济和世俗歧视达成妥协而避免谋杀，这可以使犹太人避开悲惨的后果。

有一件事似乎是清楚的：没有希特勒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没有纳粹组织的权力结构以及德国的军事权力，就没有种族灭绝。很难想象本章中讨论的任何群体，甚至包括罗马尼亚军团士兵或者乌斯达莎，会仅凭一己之力追求实现种族灭绝。他们主要是对犹太幽灵的局限的可信性作出回应。暴力、恐怖乃至杀戮他们都打算过，但是主要目的是强迫向外移民，把犹太人和其他异族人赶出去。许多少数裔群体会在这样的压力下被压垮屈服和逃亡，就像俄罗斯帝国的犹太人和巴尔干地区的穆斯林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在做的那样。保守派可能会维持着国家犹太人和异族犹太人的区别。实用主义的政治家不想要随勤奋的犹太人大规模外迁而来大规模的经济混乱。令人不快的场景将会变得到处都是——更穷困的犹太人被赶出边境，再被驱赶回来，散发恶臭的难民营以及不适于航海的船只。这些，作为其他难民群体熟悉的场景，可能也是欧洲犹太人最典型的生活状况。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景象，但它离最后解决方案尚有很长距离。因此种族灭绝所到之处都与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通常是与一种非常明确的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两者的前沿都是纳粹法西斯主义。德国人和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及克罗地亚人，他们如此不受约束地相互杀害仅可能发生在 20 世

317

纪。犹太人的最终悲剧本质上也是现代的：成了这种起清洗作用的社会有机论民族国家主义的主要目标。这样，我已经间接地将最后解决方案纳入了我的第 1 个种族论点：它是民主化民族—国家的阴暗面。

第 11 章

阶级清洗：斯大林，波尔布特

导论：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318

关于 20 世纪大屠杀的完整叙述也涉及某些共产主义政权。有些人把他们做的事情称为种族灭绝,但是我不会。我讨论两个引起最可怕的人类损失的例子:斯大林的苏联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这些国家认为它们自己属于一个单独的社会主义家庭,它们全都以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发展理论为旨归。它们用类似的方式进行谋杀性清洗,尽管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后来的政权有意识地根据它们洞察到的早期政权的成功和失败来调整它们的实践。红色高棉以苏联(以及越南和朝鲜)作为参考社会。所有国家都提出了同样的基本问题——怎样将一个未来工业社会的革命蓝图运用于现在的农业社会。柬埔寨比中国更农业化。后者比苏联更农业化。时间和农业落后这两个因素,帮助解释了它们的许多差异。

上述这些例子与到目前为止讨论的那些不同。他们不主要针对族群,因此一直使用到现在的术语不是很适用。这不是种族灭绝,因为其意图几乎从未是清除整个民族,他们很少以民族作为目标。共产党从阶级角度看待他们的主要敌人。对他们来说,由人民统治的概念与由无产阶级统治或者说无产阶级先锋队统治的概念是相混合的,但与由某个族群统治的概念是分开的。然而革命仅在旧政权受到战争破坏时才取得了成功,所以共产主义者也通过抵御外部敌人

获得了民族主义者的身份证明。随着无产阶级的党成为国家的党，国内的敌人被视作民族的叛徒、靠剥削为生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傀儡。因此阶级运动体现和引导了种族民族主义，而不是后者引导了前者，像我的第二个论点所表示的那样。

这些革命政党调动了意识形态权力。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了他们（他们认为）关于历史辩证法的科学知识和整个社会变革的方针。它以经济和政治变革，一个真正为所有人带来富足的社会创造，以及比单一的自由民主制提供的民主更加名副其实的民主为中心。两者汇聚于一个概念，即工人自己将控制生产手段，从而使得真正的民主成为可能。这是非常具有未来导向的，因为它与目前状况几乎完全不符合：经济落后和农业化。而他们已推翻了一个专制政权，正在通过另一个政权实行统治。但是充满希望的无产阶级的临时专政——通过先锋队——是根据他们目前的现实状况对真正民主理想进行的有机调整。起初，社会有机论受到党内对民主制信念的抑制。但通过以及越过党，这很快就走样变成专制政权。

319

这样的价值观的驱动力创造出了（用韦伯的话）价值理性行动者，它致力于超越其他一切目标，愿意为了未来和实现未来的党而使工具理性居于第二位。这一愿景要求净化组织本身，以便把党的成员改造为社会主义新男人和新妇女，以及通过武力战胜阶级敌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曾假定在一阵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行动之后，反对阶级将会屈服而被吸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布尔什维克学会了别的方式。循着他们的经验，红色高棉共产党带着暗淡的前景开始了。他们还操纵日益增长的军事权力。在俄国，国家权力很快即被攫取，但一场血腥的内战随之而来。在柬埔寨，国家权力仅在与国际战争缠绕在一起的长期并且极其残酷的内战之后才被夺取。武装斗争把军国主义带入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国家现在是体现了一种高度意识形态的和军事化的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

在胜利和革命转变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先锋党面临一个顽固的社会和国内外的诸多敌人。资本家、地主、小资产阶级、寺院和教会被选出作为清除对象。但是他们在国外的帮助下起来抵抗。

有些革命者建议采用实用主义的妥协方针逐渐地实现社会变革，“安下心来”享受权力，同时让政党—国家官僚机构化。激进派拒绝这种不讲原则的妥协，决心不计代价地运用所有必要的手段来战胜抵抗。内战鼓励了这种决心，导致了一种受到从未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中暗示过的军事暴力支持的激进主义。但是那已成为完成或巩固革命的必要条件。

320

绝大多数在这些共产党政权下招致的死亡不是蓄意谋杀。它们源于通过动员、强制劳动实现革命转变的马克思主义方针。这有时造成了营养不良、疾病和死亡，就像第4章中讨论过的在18世纪的加利福尼亚方济各会传教团中所发生的那样。传教士寻求世界的根本改变，但是实际上他们带来了死亡。表1.1称此为错误的革命计划。然而有些共产党越过了这个级别。他们的改造政策失败以后，他们将失败怪罪于受害人，他们谴责后者的阴谋破坏了改造过程。他们不关心这些人的命运，我在表1.1中称之为冷酷无情的革命计划。苏联的富农就是这样的遭遇。但是如果刻意提高死亡率以作为对阴谋颠覆活动的正当报复，这就升级到了政治灭绝，即消灭掉所有能想到的可能的反对派。然而，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一个社会有机论的人民观念，不是由族性而是由阶级界定。人民是无产者，反对无产者的是人民的敌人。某些国家的共产党有可能会产生想要通过谋杀来清除阶级的想法。我称之为阶级灭绝〔1〕，所有政权都施行，尽管主要是在柬埔寨。

在激进派和实用主义派共产党之间也有不同意见。与法西斯主义者不同，后者具有领导者原则，很难处理不同意见。尽管在意识形态上都忠于党内民主，在内战期间处于军事纪律之下，但取得权力后，却没有常规的机构处理冲突。所以当他们的计划出错之后，派系主义就不能容易地得到解决。暴力随之而来，我称之为自相残杀（fratricide），在大清洗中它夺去了成千上万的苏联和柬埔寨同志的

〔1〕 马戈林(2000:177)最接近这个概念，曾提出用阶级种族灭绝来描述柬埔寨的例子。

生命。这些极大削弱了苏联的运动,毁掉了红色高棉。

政治灭绝、阶级灭绝和自相残杀因此是本章讨论的谋杀性清洗的主要形式,而错误的革命计划带来了大多数的死亡。甚至一次次爆发的表面上的种族清洗(在车臣和柬埔寨)主要也是产生于它们。左翼清洗是别具一格的,因为人民是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军力和阶级政治,而不是族群争斗来界定的。然而左翼的大屠杀在某一重要方面与右翼的民族主义者的清洗相似——体现和引导了种族民族主义(见我的第 2 个论点),他们也形成了某种社会有机论的民族—国家主义,只是与众不同的是基于阶级分析。这就是本章的主要论点。

像研究种族清洗的学者一样,大多数的左翼暴行观察家也坚持一种施害人的国家主义观念:大屠杀是一个独裁者或政治精英或极权主义政权的自上而下的行为(例见,康奎斯特,1990;库尔图瓦等,1999;洛卡德,1996:131;拉梅尔,1992)。他们强调杀戮的严密、预谋和计划性。事实上,这些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与民主一点也不沾边。他们已经放弃了他们原来持有的国家只有极小作用的观念,而接受了绝对是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社会变革观念,即受宪兵队镇压支持的专制性的自上而下的行动计划。绝大多数死亡来自自由国家的军事和警察机构施加的计划。然而导致最终结果的过程是复杂的,因为它们都是政党国家。一般党员也是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驱使,相信为了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必须首先充满社会主义热情。杀戮行为非常普遍,普通士兵渴望超过杀戮定额就像渴望完成生产定额一样。党在国家无处不在的作用还意味着权力结构未被充分制度化而是派系化了,甚至充满混乱,就像研究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中央集权控制和主要党派派系化都已卷入杀戮之中。

321

斯大林主义

布尔什维克攫取了权力后很快镇压了他们的敌人和持异议的盟友。到 1918 年 9 月,工人苏维埃、工会和法律的独立性都几乎不见

了,而契卡秘密警察也进行了它的第一次谋杀,集中营被修建起来,赤色恐怖开始了。大概有1万至1.5万人很快被杀死,有些是在武装冲突当中,而绝大多数是被处决的(哈丁,1984;派普斯,1991:第15—18章;沃思,1999a:71—80)。然后内战提高了国家的军事权力和党的准军事权力。战争恶性进行。两边都处决政治对手,红军有时将杀戮延至敌对阶级,而白军扩至犹太人。双方都杀死了远远超过10万以上的战俘或平民。军国主义开始影响党的言论。这是战时共产主义*。经济问题,托洛茨基宣称,必须要用“有高度纪律性的工人大军”进行猛攻。像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布尔什维克称赞纪律和伙伴关系。两个团体都给予老战士以特权;领导人穿上军用短上衣,用战争术语来比喻政治和经济——“冲锋队员”、“攻占堡垒”、“突击部队”、“轻骑兵”、“战役”、“大部队”等等。先锋党施行的暴力会鼓励“社会主义道德”和创造“苏维埃人”,布尔什维克领袖如此宣称,有点像认为“有德国人自觉”的精英能孕育“新人类”的纳粹信念。

但是布尔什维克没有种族敌人的概念。他们在内战中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哥萨克作战,使哥萨克人遭受治安性驱逐。但是他们通过阶级观察镜又将他们看作是俄国沙皇政府和旧统治阶级的军事盟友。他们自己的国家将不止体现为一个民族而是一个跨民族的无产阶级。因为苏联包含许多民族,他们把民族联盟写入了苏联宪法(见表1.1)。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共和国的联邦形式,每一个都享有共和国自治权。在官方就不存在种族清洗的空间。相反,革命的敌人被看作是清洗的目标。白军、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然后托洛茨基分子和左与右的反对派被视为敌对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富农——的前沿阵地。因为苏联受到一些协助这些敌人的敌对国家的包围,所以加上了准民族主义的谴责,谴责他们是异族人、叛徒、间谍和阴谋颠覆者。这些指控将政治的、阶级的和民族的仇恨混在一起。但是从1920年起,列宁使用

322

*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1918年到1920年内战时期采取的一种经济政策。

了“吸血鬼”、“蜘蛛精”、“蚂蟥”、“寄生虫”、“昆虫”、“臭虫”、“跳蚤”等词汇描述敌人。这类语言暗示毒害人民的具有威胁性和失去人性的敌人，需要清洗出去。

缓和出现在内战之后。许多前沙皇官员、白军和社会革命党人在 20 年代初期到中期被接受加入党内。一直到 1928 年，在新经济政策期间，经济控制权也随着独立的业主被允许为市场生产物品而放松了。国家中的少数裔群体得到更多自治权。但是从 1928 年始，斯大林与其他激进派要求施行更多的集中控制，运用更多的强制手段。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在此成为关键，因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无阶级社会的模式。未来是已知的，而它要求有巨大的工业发展。激进派坚持认为结构转变必须进行，不管有什么反对意见。政权本可以变得友好——后来确实如此。但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激进派获得胜利，然后试图采取有效的手段消除敌人。大清洗、驱逐出境、饥荒和杀戮通过四个阶段升级：文化革命和 1928—1932 年强迫集体化，1932—1933 年大饥荒，1935—1938 年大清洗，以及“二战”中的种族清洗。这些都发生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在 1953 年他去世的那一刻，尚有数百万人在古拉格强迫劳改营中受难。然后政权趋于温和，进入停滞状态。

第一次文化革命，发起了由更年轻、更多激进共产主义者的一代针对渗透进入政党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的阶级战争。这主要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党派运动。作为回应，斯大林曲折前行，发起某些行动，控制其他行动（菲茨帕特里克，1978）。但由于 1928 年的强制工业化五年计划，他们的 A 计划不久就被阻断了。计划不是打算要去杀人，但是它带来了对于敌对阶级来说极其冷酷无情的待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企业家被没收财产和宣布为“非劳动阶级”、“异族人”、“落魄者”、“昔日的人民”。少数人遭到处决，更多的人被赶往东部，但是绝大多数只是遭遇区别对待，被剥夺公民权。极端时这还包括对粮食配给和住所的剥夺，带来营养不良和挨饿的危险。但是更大的问题是在乡村，这里布尔什维克极少，稳定的国家机构较少。农业剩余不得不为强制工业化而付出代价——正如

在 20 世纪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计划中一样。农民不得不以低价交出他们的粮食以养活城市工人以及为制成品进口偿付代价。毫不意外的是,农民,人口中的主要部分,反抗了。起初,他们只是守住粮食,希望能让价格升高。

323

布尔什维克以他们对付农村人口时长期一贯的冷酷无情作为回应。他们通过宣布这是一场针对富农阶级——一个列宁用来描述中等富裕农民业主的词——的阶级斗争,来谴责受害人。这个词语在俄国农村根本未得到响应。极少农民符合这个定义。无论如何,绝大多数农民,不仅仅是富裕农民,现在是反政权的。因为党缺乏动员乡村的权力,它不能通过制度化的控制对反抗作出回应。在犹豫一阵之后,它诉诸从外部由秘密警察强加的武力,后者受到由党员和城市工人——布尔什维克的权力基础——组成的民兵组织的帮助。这强化了农民反抗的浪潮,导致数千次恐怖行动和对地方共产党官员的暗杀行为。农民男子成为恐怖活动的主体,而妇女则成为更加公开的有组织抗议的主力。因为抵抗只有地方组织,不敢采取公开的军事形式,因此除非政权妥协,否则它注定是要失败的(薇奥拉,1996)。

但是政权调度好了大为优越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所以它觉得不需要妥协。论点 4b 的阶级版形成了。在 30 年代早期,它激进化为 B 计划:农业集体化(菲茨帕特里克,1994:第 2 章)。如果农民愿意脱离他们自己的家庭经济,进入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kolkhozes)中,剩余产品就可以拿走。阶级分析被拓宽至应对反对势力。富裕的农民依然是真正的敌人,“贪婪、自大和堕落”,“最残忍、无情和野蛮的剥削者”。他们是吮吸着俄国人鲜血的“蚂蟥”和“吸血鬼”。处于中间的农民被称为“摇摆的”阶级,要坚决引导到正确阶级路线上来。甚至是贫穷的农民据说也“在富农控制之下”,表明布尔什维克将农民“婴儿化”到了何种地步(薇奥拉说,1996:29—36)。因此,所有农民都将被搬到集体农庄中去。私人土地所有制被废除,村庄制度被消灭。因乡村激进分子极少,甚至集体农庄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秘密警察和准军事“工人部队”前来执行命令。A 计划——强制工业化,已升级至 B 计划——选择性治安镇压,起初仅以限制富农权力为

目标。但是持续不断的抵抗导致斯大林在 1929 年 12 月宣布富农将作为一个阶级被清理或清除（消灭这个经济类型，不是杀掉富农本身）。B 计划被扩充为 C 计划——治安性驱逐出境。中农和贫农被搬到附近的集体农庄；富农被遣送至远方。最危险的，估计有 6 万的男性户主，将面临处决或被关进拘留营。他们的家人被驱赶到国家最边远的地方。还有 15 万个家庭构成中等水平的危险，不会被驱逐很远，而是进入到国家的荒芜地带。余下的 60 万个富农家庭将被没收财产，然后重新在他们自己所属的地区安置，尽管不一定在他们自己原来的处所。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有序的升级过程，源于自上而下的革命计划和来自下层的坚决抵抗之间的冲突。

324

但是从党的激进分子中出现了如此热情的响应，以致集体化的步骤与暴力升级到表 1.1 中的更加无序的类型——集体迫害和野蛮驱逐。这让领导层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受惊，他们有时感到正在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我把这种结合称为 D 计划，尽管它比通常意义上的计划要无序得多，反映了不同的党的层级和地区之间的复杂权力关系。斯大林在 1930 年 3 月试图让形势缓和下来，谴责党因为“被胜利冲昏头脑”而失却了理性。集体化放慢了下来，有些农民现在开始攻击当地共产党，反对斯大林同志。

但在这些政策波动之后，随着粮食征收的节奏，激进化正在导致第二阶段的暴行。布尔什维克依然坚持 A 计划，抽调农产品供养城市，支付制造业进口的费用。每年政权都要制定地区产出水平。当 1931 年的收成显得很差时，高定额给农民带来很大的苦难。工人部队用武力获得粮食，杀死那些反抗的人。农民忍饥挨饿；其他人则囤积他们的粮食，吃掉他们的动物，或者偷取集体的农产品。1932 年的收成甚至更糟，而征收又加剧了痛苦。每年的反抗都随着每月一次的农产品征收而升级成恐怖行动（薇奥拉，1996：102—110）。政权运用匆忙集中起来的、以其人数命名的工人民兵队伍“两万五千人大队”，加大强制力度。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享有盛誉的《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写信给斯大林抗议这种对待“令人尊敬的土地耕种者”的方式。斯大林还击道：

令人尊敬的土地耕种者……搞了一场蓄意破坏活动,他们对于离开工人阶级和没有面包的红军完全没有感到良心不安。……这破坏静悄悄地在进行和表面上看似无害(没有流血)的事实……未改变令人尊敬的土地耕种者本质上发动了一场针对苏维埃权力的“静悄悄”的战争这一事实。一场让我们挨饿从而迫使我们就范的战争,肖洛霍夫同志。(菲茨帕特里克,1994:75)

这是现在已在执行的 E 计划,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斯大林统治时期的主要杀人工具。大饥荒期间因营养不良、疾病和饥饿导致的农民死亡人数累计高达令人难以置信的 600 万至 800 万。这绝不是斯大林或其他激进派预先想要的,除了反对所谓的富农核心之外。它是革命改造计划非预期的后果,它被党的精英和基层百姓对受害人的冷酷无情、有时是仇恨恶化了。

325

在这一阶段中,敌人的身份范围失控地变宽了。阶级不像族性那样是自明的。因为没有人确定地知道谁是富农,官方的定义一直在变动(卢因,1985)。官员竭力拿出能确定富裕农民的定义,而不让大多数中等地位的农民感到疏远,还要吸引贫困的农村家庭,他们为红军战士以及产业工人提供所需物品。最不起眼的在街头销售香烟或马铃薯的商贩真的是小资产阶级敌人吗?如果地主或资本家被剥夺了财产,他们还是阶级敌人吗?阶级是一个人被硬性规定的、永久的特征而二次教育不能改变它吗?阶级是个人还是家庭的特征?配偶和孩子也是富农或小资产阶级吗?阶级是遗传的吗?孩子、表兄弟(或姐妹)以及孙子孙女永远是阶级敌人吗?如果阶级敌人用血统来界定,则更温和的清洗形式,如同化或文化压制等,就变得不可能了。作为群体的阶级敌人必须被以暴力手段从无产阶级队伍中清除出去。

地方官员和流动中的准军事部队必须填写叫作“集体农庄阶级异己和反集体农庄因素清洗”的表格。因为被要求做业余社会学家,他们工作得很吃力。富农成为了一个形容词,而非名词,用来指代任

何像富农一样反抗的人物——与旧政权中地主、牧师、教会长老、非东正教派别如浸礼会和福音派成员、富农、曾参加沙皇末期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另立”的农民、企业主、商人、商贩、沙皇时期军官，还有警察、哥萨克首领、庄园管理人和村社长辈，或任何曾支持内战时期的白军、社会革命党人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人有联系的人。中产阶级局外人，如外来的乡村教师、医生、兽医和农艺师，也受到攻击。地方官员有时以与阶级无关的不守规矩的人为攻击对象——比如触犯性规范的单身妇女——像早先世纪对行巫者的搜捕一样。中央和地区的党的官员抱怨地方人士把对地方的怨恨发在第二和第三代身上。党的精英形式上谴责这样的血统论，但对某个阶级敌人是否能被改造态度犹豫。有些人受到迫害，然后被恢复名誉，然后再受到迫害。这是“从上层释放出的政治战争和从底层释放出的传统的对立的复合体，来自于自身被包围在危机深渊之中的农村”（薇奥拉说，1993；1996：113）。

从 30 年代中期起，这一趋势开始走向第三阶段，清洗转向内部，转向党本身。强制工业化、集体化和饥荒都带来了重大的政策争端。但是 20 年代至 30 年代期间没有真正的选举发生。异议和派系被宽容，只要他们服从党的路线。但是并没有用清晰的规范或者制度来监管异议。党形成了通过大清洗（Chistka）审查明显不适合成员的程序，尽管现在通译为“清洗”（purge）。党采取例行清洗方式清除那些被认为是犯法、腐败、酗酒或只是追名逐利的人，尽管“意识形态偏离”和（与敌对阶级）有“异己”联系的各占了被清洗者的 10% 左右。在 1929—1930 年的大清洗中，大多数农村受害人被判定为不合格或者是机会主义者，而 20% 的人被划为与旧政权有联系的一类。这些早期的清洗占了除最高层之外的全部党员人数的 10%—25%。尽管有时受到诡计、腐败和裙带主义的影响，但极少有人因为涉及事实问题的集体决策受到处罚或开除。1933 年大清洗行动有轻微升级，因为有更多的人被囚禁，有少数人遭谋杀。1935 年的斯摩棱斯克数据显示，是年的增长使得这方面的人数占到了作为阶级或政治敌人被驱逐的人数的 30%（格蒂，1985：第 2 章和第 3 章）。但是监狱人数直

到 1937 年才开始增长。

在 1937—1938 年的“大恐怖”期间,自相残杀爆发。它从未经认真计划,然而以一系列的扩大袭击一次接一次发生。集体化或可能减少了集中控制,因为地方党的精英被告诉说可采取任何有效手段完成他们的份内任务。恐怖可能曾是一种通过运用党员对他们党首的怨恨来重建集中控制的方式。地缘政治恐惧助长了国内的恐惧。战争的阴影正在显现,而西班牙内战暴露出苏联的孤立。不管原因为何,“大恐怖”使得 150 万人被控告犯了反国家罪,其中 130 万人被给予刑事处罚,68 万人遭到处决(沃思,1999a:190;1990b:100),位置越高,处罚越重。赫鲁晓夫说当时几乎 70% 的中央委员会成员被杀。在工厂里工人最安全,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风险最大,囚犯的受教育水平猛升(霍夫曼,1993;瑟斯顿,1993;沃思,199a:191)。20 年代初始的前政治对手——他们后来入了党或加入了党内早期反对派,比老布尔什维克遭受的苦难更多(格蒂与蔡斯,1993:230)。但是针对目标极少是精确的,而控告范围则越来越大。许多人被古怪地控告(他们)为外国列强、国际资本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工作。

随着恐怖行动的加剧,许多与党关系不大或没有关系的人陷了进来。产业管理人、工程师和计划制订人如果不完成生产定额,就被告以蓄意破坏罪。逮捕定额被制订然后上抬。数百万人被囚禁在古拉格(劳改局),其劳改营现在正为强制工业化贡献着强迫劳动力。铁路、运河和公路被修建,煤炭被开采——苦役犯工作到身体极限。这些囚犯大多数来自社会等级的底层。合法性的崩塌意味着警察用同样的方式处理所有社会问题。罪犯、少年罪犯、那些没有身份证件的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临时工、醉鬼、妓女、可疑的社会群体或族群、地方反对者等等都可以集中起来,被宣告为破坏分子或人民的敌人,以最少的法律程序驱赶到内务部劳改局。

斯大林发起了恐怖行动,实际上他插手了每一个新的任务,在两个领导小组的协助下——一个包括政治/军事治安机构,另一个更加带有意识形态性——敦促党从底层进行彻底更新以便清除其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格蒂,1985:第 4—7 章)。没有可替代的领袖。

正如一位官员所说，“任何领导层变化都将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停下来或试图后退将意味着失去一切”（康奎斯特，1990：29，34—35，80—83）。放松农村镇压，强制工业化就不可能实现。无人能想出其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徘徊者和反对者可以在清洗运动中一个一个地弄掉，用刑诱使或者让他们为保护家庭或亲密同志说出真话、相互揭发，总是让他们认识到除了服从斯大林对党的控制权，别无选择。

然而斯大林得到基层的党内激进派的援助，后者怒叱地方党首为“小沙皇”，谴责他们“有坏朋友”、“处置不当”、任人唯亲以及腐败。来自农村的攻击则强烈要求实行“集体农庄民主制度”。当地居民往往超过了逮捕和处决的定额。到 1938 年，中央委员会试图让镇压停下来（菲茨帕特里克，1994：194—198；曼宁，1993：193）。卢弗（1996：110—123）说大清洗是最高层（斯大林和他的圈子）和底层（新人，通过党获得技术职称和晋升的前工人）联合反对党的中层精英、新贵（*nomenklatura*）的行动，后者在强制工业化过程中获得权力。许多第一次文化革命时期的激进派现在已经成了革命的官僚机构化的敌人，这是新激进派给出的定义。所以甚至这个第三阶段也没有体现出真正的极权主义。有一个强硬的自上而下的路线，它通过秘密警察被贯彻执行，在党的较低层被热情地放大。结果是在政党—国家内部出现了派系主义。

杀戮也包含了种族暗流。饥荒和驱逐不均匀地分布在各个区。能够与一个外部强权——尤其是波兰人和德国人——联系在一起的小群体成为被针对的目标，不管他们的阶级地位如何（韦纳，2001：140）。比之其他地方，饥荒和驱逐更多地发生在乌克兰。乌克兰在内战期间产生了最大的反苏联民族主义组织，而乌克兰民族主义正在针对波兰边界蓬勃上升（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到 1935 年斯大林安排处死了 80% 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一些人把他的目标视为将乌克兰城市“再俄罗斯化”和使乌克兰人“田园化”——简直可比 1939 年希特勒在波兰的政策。乌克兰的死亡率是 1932—1933 年全国水平的两倍以上，一家官方报纸 1930 年宣称该政策是为了“摧毁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个体农业”(参见梅斯,1984,1997)。然而更多方面的死亡数字使得此结论可疑。不仅是乌克兰人,而是所有“黑土地”产粮区(北高加索、摩尔多瓦以及伏尔加下游)具有最高的死亡率,而主要消费区死亡率最低(惠特克罗夫特,1993:282—284)。政党—国家很可能将有限的强制手段集中于可以攫取最大粮食剩余的区域——以及强迫集体化速度更快的地方。那里也有更多的抵抗、更好的农民组织,以及更多的来自国外支持者的帮助,而这导致了双倍的镇压(菲茨帕特里克,1994:71—74;薇奥拉,1996:158—160)。间接地,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可能起了作用,因为主要的消费区在俄罗斯,而主要生产区不在这里。一个(俄国)“中心”对一个“敌对的外围”的语言现在正在渗透到布尔什维克党和国家之内(塔克这样说,1990:109)。然而尽管有这些民族主义暗流,主要驱动力仍是阶级斗争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不过,更多的民族主义在大饥荒之后出现了。许多两次战争期间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为了取得和留住权力,他们需要一个比单单产业工人阶级更广泛的支持基础,所以他们把无产阶级队伍扩大成为一个更广的拥护群,并给予它以人民、“劳动人民”、“劳苦大众”或“工人和农民”等各种称呼。到30年代中期,主要阶级敌人被打败。现在斯大林开始运用旧词语 *narodny* (俄语:人民) 来表示农民以及工人。法西斯主义也成长为在欧洲的一个有威胁的、恶毒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存在,而苏联似乎孤立了。一些近边界的民族被界定为民族敌人——德国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朝鲜人。无产阶级与人民融合成一个单独的受到异族外团体包围的有机整体。然后“伟大的爱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强化了民族主义。那些在战争中被指责为胆怯或无能的人,和被纳粹俘虏的俄国人,被称作叛徒、间谍、阴谋家。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包括从可怕的德国人的虐待中幸存下来的战俘,在1945年返回家乡时被囚禁于劳改营。许多人死在那里。

还有种族受害人。少数来自战略性边境地区的种族驱逐在战争之前就开始了。在1937—1938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周围

的 18 万朝鲜人被驱逐至中亚，以防与日本发生战争。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有八个民族整个都被政权视为潜在的德国同谋。150 万德裔苏联公民中的 80% 在 1941 年至 1942 年间被强行向东驱逐。男人与家庭分开，他们被分散到苏联的边远地区，而实际上没有人为他们的生计提供条件。他们要在不同的、然而经常是可怕的条件生活长达 14 年——一个比美国对日裔美国人的安置营更冷酷无情的做法。其他七个民族是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和梅斯赫特人。一些人确实请求德国人支持他们的自治愿望。几百名车臣战士与德国人并肩战斗。这些都是邻近边界的民族，他们有可能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

但是对这 7 个民族的清洗只是到了 1943 年年末才开始强化，此时德国国防军被赶出苏联。因为通敌不再构成严重威胁，他们正好逮住机会解决较小的好战的边境民族问题，后者一直在抵抗俄罗斯帝国主义。正如利文(2000:314—316)指出的，斯大林的驱逐行动似乎更应当被解释为一种远更无情的对传统的土耳其和突厥民族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而非作为与德国的战争的一部分。从 1943 年起，这些民族中的 300 万到 500 万人被驱逐出境。护送者是 11.9 万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队——是从能与德国人作战的部队中抽调的很大一部分。被驱逐者一到达即被驱散，以便摧毁他们的集体力量，让他们经历被监督的无数劳改营和劳动大队的生活。杀戮是罕见的，因为这比早期的驱逐有更好的组织，故因无情的疏忽或劳累过度死亡的人较少，尽管许多人还是死了。人数较少的印古什民族很可能失去了最多的人口，然后是克里米亚鞑靼人。所有他们的民族家园都被重新安置了俄罗斯人，而文化遗产皆被清除。只是从 1956 年起苏联才承认这些重大罪行，开始让这些民族的群众返回他们的家乡(莱格特,1997;奈马克,2001:第 3 章;拉梅尔,1998;沃思,199a:216—225)。这种谋杀性种族清洗按联合国定义是种族灭绝，它包括了试图清除一个群体的集体文化特征的企图。然而它不是蓄意的大屠杀。

它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由斯大林通过最高苏维埃策划，经国家机

构贯彻实施,而实际的凶手是国家秘密警察。它是战时由一个偏执而富有战略思想的领导人发起的针对制造麻烦的群体的预防性安全措施,后者已因战争而变得易遭攻击。这类政策在俄国移民中受到欢迎,种族清洗不是对来自底层的民众的压力的回应,也不是因之而激进化。它更多的是一种帝国的政策,而不是共产党的政策,并且它未被重复。战争结束后,苏联重返跨国社会主义和国内民族联盟。有人说通过承认民族和给予甚至缺乏民族理想的族群以政治自决权,苏联政权可能已无意识地孕育了种族民族主义(布鲁贝克,1996:26—40),当代在车臣的种族清洗正是由民主选举的政权施行的。

斯大林主义的大多数受害人是农民。在去富农化期间总共有180万人被驱逐出境,因驱逐死亡的总人数可能会在60万人左右(菲茨帕特里克,1994:80—88;沃思,199a:155,207)。在大饥荒期间大概共有600万至800万人死亡。沃思估计在“大恐怖”期间有68.5万人遭到处决。在种族驱逐行动中大约有10万车臣人、5万以上鞑靼人以及5万其他族的人死去。最近对劳动营囚犯数字的估计是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这当中很多人死了(诺夫,1993;沃思,1999a:206;惠特克罗夫特,1993)。各阶段加起来总死亡人数不得而知。最谨慎的估计人数在800万到1000万,尽管有些人的估计要高得多(康奎斯特,1986:306;1990:484—490;梅斯,1984;拉梅尔,1994:83)。这当中,估计有不到100万的人被处决或被直接杀害。按占苏联总人口比重看,死亡人数仅占4%—6%,根本不能算种族灭绝。但它们仍属可怕的暴行。

他们不是简单的极权主义,因为他们既是自上而下,同时也是自下而上。格蒂(1985:36—37)认为斯大林主义十分混乱,因为党规模小,有分歧又不守纪律,毫无规划能力或记录材料。沃思(1999b:103—106)喜欢用可变几何(variable geometry)这个术语——即是说它是由几个阶段的不同节奏和诱因导致的。清洗由最高层发动,通过指挥链条得到贯彻,其中一些是分等级的(像军队和秘密警察),而其他的是松散的(如工人民兵)。沃思举了1930—1933年的驱逐行动的例子。决定是上面作出的,所以警察、工人民兵和党的激进派勿

匆打发了 50 万个家庭上路,以为他们将被重新安置在集体农庄或劳改营中,但是那些接收方的人没有办法安置他们。实际上,沃思说,政策变成了“驱逐—抛弃”,无意间造成了人群进入营地后因为没有食物或卫生条件落后而死亡。尽管如此,他也看见了不同机构中的一致因素。所有机构都相信敌人的存在,为统计和定额着迷,都在将农庄、工厂、驱逐和监狱融合成一个单一的令人恐怖的工业化过程(199a:266—267)。我想补充说,一致性是随着实用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被投身于革命改造的激进派打败之后到来的;在革命改造中清洗敌人被最终视为是道德的。在最坏的时候它发展至蓄意的阶级灭绝/政治灭绝。但是这可怕的结果不是原来打算好的。这是因转变性目标没有稳定的政治机构去平稳地实现而带来的非预期的后果。

柬埔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柬埔寨经历了一场在朗诺将军的军事政权和共产党游击队运动红色高棉之间的血腥内战。这与越南战争缠绕在一起,因为朗诺政权是美国的庇护对象,而红色高棉与越南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在这场复合战争中,50 万柬埔寨人死亡,占人口的 8%。美国将越共经由柬埔寨的供给路线作为轰炸目标,许多人被不分青红皂白地炸死。对一个中立国的平民区域的轰炸是美国的一项重大的战争罪行。

但是伤亡很快缩小。1975 年红色高棉在内战中一举获胜。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他们造成了 750 万柬埔寨人当中的 100 万至 300 万人的死亡。我采取斯利温斯基 180 万的估计,即占人口 24%,尽管更高的估计数目前还在被提出来。他结合当时阶段期间总体人口损失的人口学数据,再对直接的死亡估计作出调整。有 40 万到 60 万的人被处决或因种种虐待致死。将近有 30% 的谋杀是通过枪杀,其余的是更原始的手段,特别是连续猛击头盖骨——不是高技术谋杀。但是大多数死亡是源于饥荒——无情的革命改造政策没有料到的后果(数字参见钱德勒,1991:261;钱德勒,1992:168;艾奇逊,2000;霍

伊维莱恩, 2001; 基尔南, 1996: 456—460; 基尔南, 2003; 洛卡德, 1996)。解放仅在一支越南军队侵入并推翻红色高棉之后才到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最大的和最成功的后来被称为人道干预主义的事件是由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发起的, 它结束了最骇人听闻的共产党清洗事件——有四分之一人口死亡, 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蓄意造成的, 这是唯一的一次。

340

因为绝大多数死者同样是高棉人, 因此其核心并不是种族灭绝甚或是种族清洗, 尽管当中有尝试针对某些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的种族灭绝。政治灭绝是有的[哈夫与格尔(1988)和洛卡德(1966)对此赞同], 指向的是那些被认为是内战中敌人的支持者的那些人。但这个术语不体现杀戮的范围, 它远远超出了任何可能的对立的领导集体(见马戈林 2000 年评述)。有些人称其为自灭绝(*autogenocide*), 但因为大多数受害人被界定为阶级敌人, 这在本质上是阶级灭绝, 尽管红色高棉对阶级的观念非常宽泛, 将地区甚至族群的身份与阶级缠在一起。当杀戮转向内部可怕的党员清洗时, 我们还能看见自相残杀。

红色高棉是由与法国殖民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的高棉政权作斗争的左翼民族主义者组成的。他们中有少数人去法国接受大学教育, 受到法国共产党的热烈欢迎。相邻的越南提供了他们灵感, 他们的共产党先打败了法国人然后又打败了美国人。这一开始将他们引向了苏联共产主义。但是越南的地区性霸权遭到怨恨, 而红色高棉想退出他们的战争。20 世纪 60 年代, 波尔布特的一批受过法语教育的干部接管了党的工作, 杀掉了许多经河内训练出来的成员。他们转向了毛主义的路线, 强调对农业实行快速集体化, 从而超越通常的发展轨迹。虽然他们也与中国人绝交, 他们还是继续认为革命意志能够战胜物质障碍(洛卡德, 1996: 155; 2000a: 51—53)。

他们保留了他们原来的民族主义, 即将柬埔寨视为一个曾经的大帝国民族, 而现在则落入无产阶级的地位, 受着它的邻居和大国的剥削, 受到他们的战争的惊扰。令人惊叹的吴哥窟遗迹的恢复对受过教育的柬埔寨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红色高棉给了他们一个毛主

义的解释：国家伟大即能够通过大规模劳动力动员来战胜落后——不需要使其他共产党组织更加谨慎的过渡阶段。他们的意识形态结合了毛主义的对集体意志的强调和两个特别属于高棉人的贡献——农民反城市主义和无产阶级民族主义。与他们的俄国、中国或越南的同志不一样，他们与城市无产阶级没有联系。橡胶种植工人主要是越南裔。红色高棉经验来自在落后的东北部山区的长期的游击战争。领导人几乎都是与城市经济有着少量关系的前教师。普通士兵是来自这些边缘地区的贫困农民。党在城市或比较发达的乡村地区没有基础。他们属于敌人（瑟恩，1993：86—90）。1977 年的一份党的秘密文件解释说没有工人，只有农民：“所以我们没有照搬任何人。”正如波尔布特在 1975 年获胜演说中所说：“我们已经赢得了全面的、确凿的和纯粹的胜利，意味着我们获胜没有靠任何国外关系或者参与。”（基尔南，1997：56—57）

红色高棉随即表明了他们对城市中产阶级的轻蔑。1975 年 4 月 17 日，他们占领了首都金边。士兵们立刻开始将城市中的居民（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赶往农村。两天之后，城市荒废一片，并多半一直如此，直到越南人到来。这戏剧性的一幕可能是就在几天前预先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加上废除货币与市场，用合作社取代私人财产，免去佛教僧侣的僧职，驱逐越南裔人口，处决朗诺主要的手下人员（基尔南，1983：178），等等。所以他们的 A 计划是采用治安性驱逐结合对前敌人的选择性治安镇压手段的阶级清洗。然后他们切断与国外的邮件、电话、电讯和电报联系。他们只与他们选中的共产党国家有贸易往来。似乎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同意这些政策，但是他们服从党的纪律。不过，没有计划正式地传达到下面的干部或士兵，后者好像对驱逐行动感到惊异（钱德勒，1992：107；维克里，1983：108—109）。

驱逐行动不久也涉及位于边境一带的少数裔人口，尤其是越南边境一带。这作为一个军事诱饵很容易理解，使人想起斯大林在“二战”时期的驱逐或者沙皇及奥斯曼帝国的驱逐行为。越南是一个潜在的敌人，因此边境一带可能的通敌行为必须清除。然而城市驱逐

341

令人震惊。如果我们想到红色高棉是一个由对于他们所来自的城市经济不重要的知识分子领导的边缘区的农民运动,我们就能开始理解他们。一位红色高棉官员告诉囚犯亚塞(1987:67):“我们让城市空掉以摧毁任何抵抗,摧毁反动派和商业资本主义的摇篮。将城市人驱赶出去意味着清除反红色高棉抵抗力量的源头。”A计划因而随着将城市人口驱散至农村而成熟,在农村,城市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能够被控制并被迫使对农村发展作出贡献。在这过程中,忠于朗诺的人将会被杀害。

因此驱逐在起初大都是有序的,除了朗诺手下的军官和官员外,极少发生死亡。然而不久某些部队就表现出比其他部队更加具有谋杀性,很可能体现了来自上面的不同命令(维克里,1983:109)。在马德望省,这急剧上升为实际上的B计划:政治灭绝。有些地方的报仇行为升级至超过一些周边国家的水平。那里获胜的共产党只杀了少数投降的反对派,而将绝大多数送往了劳教所,从中他们最终伤痕累累地走出来,但是人还活着(洛卡德,1996:135;马戈林,1999:628)。瑟恩(1993:166)估计对被当作是朗诺的人员的杀害,包括亲戚,最终可达到10万至20万人。这个B计划,结合了强迫驱逐和政治灭绝,是骇人听闻的,但是作为一场血腥内战末尾的极度的最终报复又是可以解释的。敌人的定义之后再次扩大,因为阶级,然后族性和地区也成为了表示潜在的反对的标志。这是C计划,阶级灭绝。

根据斯利温斯基(1995)的研究,我们推断出男人的死亡率是妇女的两倍以上的结论(34%比16%)。截止1985年,64%的成年人口是女性——杀人的明显证据。以男人为目标是政治灭绝的特征,因为男人更可能组织起反抗。年轻的成年人遭受了最大的损失:20—30岁的男子和15—20岁的女性。年轻男子最有可能拿起武器,而杀了在最大生育能力年龄内的年轻妇女可确保不再有敌人。军队军官遭受了最高死亡率(83%),继而是警察(67%),同样表明政治灭绝的存在。但是那些处在中产阶级职业的人也有很高的死亡率,以医疗卫生职业(49%)和教师(47%)为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死了52%,中等教育38%,小学及以下仅29%。普通士兵在底层职

业中损失最严重(47%),产业工人损失基本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33%),农民最低(20%)。柬埔寨中产阶级不久就学会了隐藏他们的阶级出身,医生称自己是农民或者出租车驾驶员,奇观很快就消失了。这说明阶级灭绝是瞄准上中层阶级的。

但有些阶级敌人也是种族性的。帝国主义者可以意味着任何外国的人,因为无产阶级柬埔寨受到所有外国的剥削。少数裔或任何被认为与外部强权有联系的人都有可能被指认为帝国主义者。买办资本家经常是指中国少数派,他们经营着最多的大生意(贝克尔,1998:228)。斯利温斯基估计较小的天主教人口——潜在的与西方国家勾结者——死亡率在49%。占人穆斯林*,他们的宗教与族性有自己的特点,并且拥有自己的准军事编队,人数减少了41%。中国人和越南人(威胁性国家的代表)下降了至少40%——而基尔南(2001)认为所有越南人要么是被杀死,要么是被驱逐。但不是所有少数人群都被当作目标。山地民族的死亡率只有5%—8%,因为他们是内战中的盟友(洛卡德,200b:301)。所有宗教领导人都成为目标,不管族性:穆斯林和佛教领袖遭受的伤亡率超过了90%(基尔南,1996:第7章;马戈林,1999a:591—595)。

族性甚至具有了种族主义色彩。越南人被描述为高棉民族的“遗传性敌人”(基尔南,1997:59)。因为高棉人是本地区皮肤最黑的民族,黑被说成是美。幸存者回忆说任何具有浅色皮肤的人都容易遭到攻击。红色高棉还将阶级视作是遗传的。整个家庭,包括妻子和孩子,都被认定是敌人,许多年轻育龄妇女如果属于敌人阶级就遭到杀害。只有红色高棉将血统带进到大屠杀当中。与斯大林主义者和毛主义者不同,他们经常在种族和暴力两种背景下谈及血统。报纸与波尔布特呼吁报“国家与阶级恨以及血仇”和“燃烧的民族仇恨,阶级仇恨和炽烈的血债”。(他们用的)有些生物学比喻似乎很像纳粹。杀戮是“清除”、“荡涤”人身上“深藏的微生物”,深藏在党内的会腐化社会、腐化党和腐化军队的“细菌”、“蛀虫”(钱德勒,

343

* Muslim。Chams。Cham 是越南的民族,称占人。

1992:136—137;钱德勒,1999:44;基尔南,1996:336,388)。国歌在前5行的4行中在这两种意义上使用了血这个词。干部们被训练一起歌唱“以血还血,血债血偿!”(恩戈,1988:139—140,203)

基尔南(1996:26)说“红色高棉的种族观念使阶级观念无足轻重”。杀戮率中的种族差异肯定比得上阶级差异,波尔布特宣称:“背叛和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分子被认为不属于我们民族”(钱德勒,1999:118)——一个社会有机论的以无产者为民族的观念。种族与阶级在柬埔寨独一无二地相互缠绕在一起。

在1975年9月到11月之间,大多数被驱逐者被赶往早先在内战中征服的红色高棉“根据地”地区。他们的人口,被称为老区或根据地人民,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人,被交予控制不可靠的被驱逐者的任务,后者被称为新人,来自刚被征服的区域。根据地大都属于落后区域,包含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因此红色高棉酝酿通过劳改营谋求快速发展的计划,一个更加带有军事化性质的斯大林强迫集体化的做法。其最终形式在1976年的四年计划中给出。计划将对农业进行强化,逼使劳动力将国家耕作面积翻一倍,亩产扩大两倍。正如在其他的共产党发展计划中一样,这种农业剩余,基本是稻米,可以供出口以支付进口机械的花费,先为农业和轻工业,后再为重工业(钱德勒,1992:120—128)。

因为新人大都是来自前朗诺管制地区的中产阶级,地区也能表示政治和阶级敌人。他们的死亡率达到40%,而根据地或老区的死亡率只有10%左右。老区/根据地的人们依然呆在他们的村子里,他们的孩子被招入组织。一个男孩6岁时,红色高棉战士进入他的村庄:

我很幸运是来自村中。村民被认为是老区人。我们受到红色高棉的不同待遇,因为我们是农民。红色高棉憎恨并怀疑受过教育、诡计多端的城市人……因为他们(战士)有枪,我们听了他们的话,照顾他们。我们为他们提供吃穿住。土地成为公共的了。我们不再和家里人一起吃饭。相反,所有孩子必须要在

一起吃，而所有成年人在一起吃。

男孩被带到教他们红色高棉价值观念的学校。他们吃得很好，但必须在田里好好干活。下面这个小伙很自豪被选入领导人培训学校，但是

学校很严格……我们必须穿校服而且有很长的军训时间。士兵们教我们关于柬共以及资本主义弊病的知识。柬共很伟大。革命伟大。我们要准备去帮助柬共进行反对邪恶的斗争。（普兰，1997：123—125）

344

他说的“柬共”指的是红色高棉组织的“中心”。它依然遮遮掩掩，充满神秘。只是到 1977 年，波尔布特才表明自己是柬埔寨共产党的领袖。即使在这时，它的制度依然不清晰。

男孩提到的“邪恶”被人格化为“新人”、“保皇党”、“资本家”或“小资产阶级”，他们都将用作奴隶劳力。然而这一简单的区分后来被精心修改过了。在新人中，政治与阶级的“坏记载”可能会招致死亡或奴役。根据地的人又被分成“具有好政治表现”或“好”（或“干净”）记载的“充分权利的人”，具有“坏（或‘复杂’）的记载”的被称为“托管人”的人和—个中间类型的“候选成员”。只有最坏的地位被认为是确定的，甚至是遗传的。但是根据地的人能够根据他们的工作是“强有力、中等或偏弱”来提高或降低地位，即使是对一些具有“坏记载”的人也一样。波尔布特告诉他的部下，“生活经历必须健康并符合我们的要求”，暗示生平记录或个人档案能够被篡改。1975 年红色高棉享有广泛的根据地农民的支持，但是他们慢慢随着其统治严厉程度的提高而失去支持。他们此时的应对措施是镇压所有被认定的顽固分子，不管其正式地位如何（钱德勒，1999：90—91；基尔南，1996：第 5 章）。

处罚集体化的结果证明是灾难性的。庄稼产量不可能通过没有经验的城市人的强化劳动而提高。计划破坏了经济中最具生产力的

部分,将资源分流到了最边缘的土地上,它在有丰富雨水的土地上提出建造大规模水利工程的要求。然而党(像其他共产党一样)为这些巨大的工程——大规模劳动力动员中最显眼的作品——感到自豪。计划还包括让最能干者干得最多,经常干到累死。它执迷于水稻产量,牺牲了作物生产的多样性。但是领导人对农业或工业一无所知。总体产量直线下降(马戈林,199:598—602)。流放者一被赶进劳改营从事这些无效的工程,死亡人数就随之增加。因为生产和粮食产量下降时他们就被安排更多的工作。他们倒在病魔下或者饿死。比在其他共产党国家更突出的是,受害人要为失败而受谴责,以及因最少的一点不同意见或者偷懒松懈迹象就被处死。他们的社会阶级地位越高就更容易受到攻击。

而党的内部也有麻烦。很多人对放弃城市和货币感到惊异,同时他们以为杀戮会很快缓和下来。在东部地区,许多人与更温和的越南共产党具有较牢固的联系。难民们讲到了干部中很多的政策分歧。前战俘已为那些党内官员的仁慈程度、食物供应、劳动体制以及遭处决的人数等,提供了差异巨大的证词(基尔南,1983;维克里,1983)。中心政策随着分歧意见的存在而摇摆不定。政治杀戮在1975年年末缓和下来,而劳改营的杀戮在1977年7月也逐渐停止。金边出现神秘爆炸和小规模武装交火。其中一个事件有可能是一次暗杀波尔布特的企图。

但是波尔布特依然掌控着局势,党的刊物宣称:“在我们的士兵中,在司令部,以及远在村庄里面,到处都有敌人。”(钱德勒,1991:298)下降的收成,营养不良和越南边境的压力被内部的人称为阴谋。1976年5月对高级党员中持不同政见者的清洗开始了,特别是那些在越南而非法国或中国接受训练的人。农业部是激进派的堡垒。一伙“叛徒”被传为“民主活动家”;某位领导人据说赞成重新启用货币,或不喜欢一起集体用餐,或倡导机械而非劳动力。亚塞(1987:64)说,1975年8月他的劳改营首领公开宣布货币在年底将被恢复使用。亚塞看到了温和派和毛主义者之间的分裂。一位官员说他的地区司令认为“波尔布特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尽管他不经常这么

说”(基尔南,1983:179)。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宣称:“如果我们不拿出解决机械问题的方案,我们怎么能够(成功)?我们不能。这不是我的错,这是常委会的错。”清洗升级为谋杀性自相残杀,导致更大的混乱、不信任、低生产水平和谋杀——以及瘫痪。

与越南边境的紧张关系被红色高棉杀害当地越南裔人口,继而武装侵入越南的行为加剧了。这很愚蠢,因为越南拥有一支曾打败美国人的久经考验的军队。1978年年末,越南发起了全面入侵行动。中央被迫减少杀戮行为,同时宣布老区人和新人之间区分的终结。随着战争的惨烈进行,战争造成的“柬埔寨和越南双方的伤亡”被归咎于边疆区的党的领导人。这激起了东部地带的一场实际上的内战,其中大约有1万人死亡,致命地摧毁了战争力量。清洗行动留下了一个环带的党的书记,剩下的书记、他们的大多数接替者以及绝大多数工厂和医院的管理者,外加至少2万个党员都被清除掉了。由于控制了秘密警察,柬共开始对它的干部用刑,逼他们作伪证指控其他“同谋者”,后者之后被集中关禁。在“坦白”之后,他们被人用牛车的车轴猛击头盖骨而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杀掉。单在一个主监狱里就约有1.4万人,包括1200名儿童被杀死,包括一天内杀死的418个。波尔布特宣称,“党内出现了一种病症……我们在寻找党内的细菌”,以及“我们都带有我们旧阶级特征的痕迹,数代以来根深蒂固”。这被描述为“彻底扫除”。主监狱指挥官把敌人描述为“以象甲(weevils)在木头上钻孔的方式”侵袭到柬埔寨体内的“蛀虫”或“细菌”。受害人坦白说:“我是一个从内部打洞的白蚁。”清洗暴露了一个真正具有偏执狂倾向的党(钱德勒,1999:36—76)。组织在自相残杀的一团乱局中解体。3000名红色高棉持不同政见者逃到越南部队当中,为新的越南傀儡政权提供了公众形象。

346

1975年红色高棉战士数量已达6.8万人,其中1.4万名党员。因为很多士兵都是驻扎在极少发生过杀戮行为的地区,实际的杀人犯肯定从事过严密有序的系列性杀戮行动。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来自已为他们的子女办好了教育奖学金资格的中等家庭。波尔布特的家庭拥有一个小农场,但他姐姐和堂妹作为宫廷舞蹈家和情妇确保了

波尔布特6岁离开家,在皇家寄宿学校度过了他的成长岁月(钱德勒,1992:7—25;基尔南,1997:53—54)。在二十位基尔南(1996)给予详细介绍的国家和地方领导人当中,十二位曾是中学教师(还有四位是他们的亲戚)。一个商人、一个农民、一个铁路工人和一个电子机械师是仅有的具有生产性经济经验的人。妇女有三位。钱德勒(1999:18—36,61—62,69)分析过可怕的代号为S-21的主要监狱吐斯廉*的员工的自传。主监狱的最高级官员是长期的党员。绝大多数是前中学教师(特别是数学和生物教师),像那里的大多数党的重犯一样。基尔南认为中学毕业生慢慢变成持不同政见者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一个对学生持不同政见的物质方面的解释。然而这不符合高级领导人的情况,他们在学生时期就已经是持不同政见者。S-21官员或囚犯也未在自传中提到失业。这些教师很可能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了,因为这些是当时流传在学校和大学里流行的国家的现代化理想。

166个S-21工作人员的记录保存了下来。这些人员是从临近省份的1975年前红色高棉战士中抽选出来的。他们几乎都是未婚。其中65%为18—22岁,12%比这还小。绝大多数曾在少年时加入过组织,有些人当时才10岁。这些沾沾自喜的少年的照片装饰着监狱集中营(现成为博物馆)的墙面。钱德勒说,柬共,“已替代了他们的父亲和母亲”(1999:33)。至少有两个员工和7%的党的受害人是妇女。很多党员的妻子也被杀死在这里。军队中也有妇女营,战士们很年轻,并且在老兵被每年的战争与清洗杀死后,一年比一年年轻。据莱亨回忆,1978年最后一次征兵是以13—18岁的男孩和女孩为对象(亨与德梅尤尔,1994:189—190)。集中营幸存者估计,当地战士年龄在12—14岁之间,有些就9岁那么小。他们最害怕年龄最小的,因为他们容易服从纪律,所以最为冷酷无情。对他们来说,杀一个人就像拍死一个苍蝇。9—13岁的孩子医生几乎还不认得字然而

347

* Tuol Sleng, 原为中学所在地,当时的集中营,现已变成供人参观的赤柬杀人博物馆或波布屠杀博物馆。

手里就拿着注射器注射(皮克,1989:114;亚塞,1987:116)。依靠童子军表明了有意对易受影响的年轻人进行准父母社会化训练,以使其适应将来更具谋杀性的任务的企图。

几乎所有红色高棉普通士兵都是来自根据地地区的文盲农民家庭。几乎所有 166 名 S-21 人员都是贫下中农。钱德勒说这些人是“一穷二白”,最少受到资本主义或其教育的腐蚀。他们因土地分配的承诺、反城市思维以及对美国轰炸的愤怒而被吸引到红色高棉。红色高棉说美国人是帝国主义恶魔,而轰炸确实看上去像是恣意作恶,如魔鬼所为——柬埔寨人农民做过什么伤害了美国人的事?红色高棉说朗诺政权是那些恶魔的走狗,而这也部分是正确的。红色高棉对农民的境遇提供他们最可信的解释。维克里(1984:66)将这称为“胜利的农民革命”有些过分,因为大批农民被杀害,获胜的农民受到先锋队知识分子的支配和影响,后者用简单而可信的毛主义/民族主义信条号召他们。

与他们的苏联同行不同,极少的红色高棉基层人员具有任何超出农民农场和农村自给自足状况之外的世界的体验。领袖缺乏工业与农业经验。所以组织对劳动分工及市场没有判断力。然而他们把自己看成是超现代化主义者,认为他们能够仅在几年之内让社会主义完成西方社会为之奋斗了一个多世纪的事情(贝克尔,1998:184,188)。当然,由一个群众党管理监督的劳改营概念是一个 20 世纪的概念。像莫斯科、北京和河内的领导人一样,他们有一个现代化工业的理想(详细表现在四年计划之中)。但那是将来的事。目前它甚至连胚胎形式也不具备。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理想是一个美化的过去——上午做猎人,下午做渔夫,晚上当批评家。这种乡村自由的形象被红色高棉彻底颠倒,变成苦役犯服役的劳改营。

幸存者将卫兵和官员描述为“村民、农夫和未受过教育者……最暴力和最无知的人”,“凶残的野兽,文盲和被洗过脑”。恩戈(1988:158)说他们从不说“共产主义”。他自己称他们为“复仇一族”:他们全部知道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城市人过去常常对他们发号施令,而

现在是他们讨回来的时候了。这就是他们：上层是共产党……底层是(复仇一族)。一个卫兵宣称：

我们终于摆脱了……巨头和封建主义。我们拥有自由与正义,自由与正义!所有人都平等了。没人会富,没人会穷。我们摧毁了一个虚构的信仰。那是胡说,如什么上帝!上帝!

348

他们对他们的受过教育的受害人宣泄阶级仇恨：

你们资产阶级现在感觉如何?当我们在受苦受难,居住在丛林里,与美国人和傀儡政权作战时,你们在哪?你们在家和老婆一起躺在舒舒服服的床上,拿我们这些努力使我们国家从法国、日本和美帝国主义统治剥削下解放出来的人开着玩笑。我们那时不需要而现在当然更不需要你们了。留着你们无益,废了你们无损。(普兰,1997:13,59,130—131)

最后一句成为一个组织口号——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误用。只有农民生产价值;所有专门化职业都是非生产性的,因此可以被清除。医生被当作寄生虫一样屠戮,只有农民民间传统医药是需要的:

我们不需要资本家的技术。我们一点点也不需要。在我们新的制度下,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年轻人送到学校里去。我们的学校是农场。土地是我们的纸。犁是我们的笔……懂得怎样种地和怎样挖沟——那就是我们的证书……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资本主义的职业!

卫兵模仿柬共的口号说它已回到重建柬埔寨的“起点”。“三座大山”的原则是“独立主权、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恩戈,1988:139,161)。

集体化将免受个人主义、分工和外国势力玷污而保持本色。“红色高棉战士教我们不要爱父母或者依靠他们。”一个训练有素的有机组织主导着红色高棉的理想。每个人都穿的一样，吃的一样，喊着同样的口号，想大家所想。“没人能质疑柬共，”一位干部说，“如果你有勇气质疑柬共，你将被带到再教育学习机构。”就是说，拉去处决（普兰，1997：156，30；参较马戈林，1999：603—605）。它的游击队历史影响了一套永久斗争的辞令。恩戈（1988：197）说，“‘斗争’是军事用语，像‘前线’一样”——用于表述像建造灌溉系统这样的重大农业工程。“在前线我们不只是工作，我们还‘斗争’或‘发起攻势’”，如“发起一场种植战略性作物的攻势”以便取得“对自然环境的控制权”或“胜利”。这里明显存在有毛主义的影响。

S-21 监狱上层精英以意识形态杀人者为主，他们相信他们接收到的命令的正确性，并行之有效地将其付诸执行，大都不带施虐狂性质。卫兵、审讯者和刽子手似乎内化了政权对囚犯是不可救赎的敌人的界定，而任何在同事面前表示出的迟疑也被视为是危险的。他们经常变成为恐惧型杀人者。钱德勒承认他不能读懂他们的动机。他想知道是否柬埔寨人具有异乎寻常的喜欢服从命令的倾向，但是他最后总结说，大多数被置于这种压力之下的普通人也可能已经做了顺从的施害人（1999：141）。大多数杀戮环境不像 S-21 这样官僚机构化。战士们以远更不规则、漫不经心和残忍的方式完成了几乎所有的杀戮。他们已在半像游击队的党的军队——轻武器，权力有点分散，习惯于恐怖战术——中服役数年。他们很可能是在逐渐的军事战术的诱导下，慢慢变成了偏执型和暴力型杀人者。

学者们对这些杀戮包含有多大程度的国家主义这一点上意见不一。巴尼特（1983）观察到“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因为它所有主要的激进政策都是通过上层授意的恐怖手段在几乎全国各地得到贯彻执行的。基尔南（1996：27）说：“柬共中心聚集的权力是史无前例的。”相反，西恩（1983：91）说：

任何时候中央权力部门也没有接近对国民经济、国家权力

系统、军队、党以及很可能甚至连国家安全局、S-21 的完全控制。所有这些都充斥着政治派系、军事帮伙、地区权力、个人网络,以及对对立力量的清洗,都在争夺势力。国家从未独立自主。

地区及权力水平之间存在明显不同。贝克尔(1998:173—177, 209)说,只有中央发布正式政策,并且它控制着一半的军区。但是她说,中心只能通过六七个地区性党的书记处来统治。这些地方都有自己的军区,是有效自治的军阀,但是它们对劳改营没什么权力,后者是通过来自地方党的三人领导小组来统治的(参较维克里,1983:104)。他们也是地方独裁者,不靠例行的书面指令操控一方(亚塞,1987:168)。贝克尔(1998)说对区书记处的清洗是一次孤注一掷的逼使他们服从的失败尝试。这个国家没有有效地被权力集中化。

维克里(1983)强调了地区性差异。东南部是波尔布特一派的人,东部是以追随更加越南化路线的温和派为主。在西南部,新人因为不起眼的违反规则行为就被无情地杀害,但不存在一开始准备的政治灭绝,劳工极少劳累至死,同时食物通常是充足的——结果是一个很低的死亡率。假如柬埔寨是处在波尔布特控制下的极权主义制度(或甚至像巴尼特认为的中央集权制),则柬埔寨的死亡人数可能会更少。东部区起初杀戮行为极少,甚至还出现一些改善生活水平的尝试。但是最终秘密警察部队被派往东部清洗,来自西南部的波尔布特分子取代了他们。曾是柬埔寨最安全的地区突然变成了最危险的(基尔南,1983:138)。但是这里是两个管理效率最高的地区,同时,最高的死亡率来自其他地方。有着更多新人的区域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此前没有经过权力的制度化过程,一个没有农业经验的人口,土壤贫瘠。在因领导无能和工人不称职以及荒芜的环境导致的饥饿和疾病的惊人死亡数字中,极少能达到定额目标。有些地方政权采取的对策是使用更多暴力,试图不顾一切地完成很高的定额目标。其他地方因为太温和或者腐败而受到中央的清洗。最坏的状况

出现在他们被来自西南部的波尔布特分子代替之后。他们的激进主义升级为大规模处决、过度劳作以及新人的(有时也包括老人)的营养不足。所以最多的杀戮发生在具有较少牢固的中央集权主义和最多的激进化现象的地方。

中央集权的威权主义、外省的军阀主义和游击队准军国主义是红色高棉内部相互竞争的组织原则。中央集权和派系化,以及打算好的和出乎意料的结合,使得杀戮行动逐步扩大到超出了任何其他共产党施加的规模。因此我以前的对 C 计划和 D 计划的认同并非最终都是有用的。阶级灭绝从未认真计划过;清洗是计划过的,但出乎意料地蜕化为自相残杀和失败。然而滑向深渊有某种必然性。柬共想到了非常简单的控制技巧。它人力资源有限,但它将三分之一的人口流放到劳改营和配上警戒的村庄,然后垄断了食品供应。无论人民生产出什么都交给官员。他们再把其中一些退回给当地人,零零星地交付公共使用,所以极少人能够在柬共之外活下去(皮克,1989:114;亚塞,1987:149;参较西恩,1993:93)。政权任务很简单:强制在田野里劳动,清除另外的组织行动的据点,以及除掉异议分子。在绝大多数柬埔寨人不能在柬共之外生存这一点上,它是极权主义的。然而它包括一套很窄的目标,而当它未能实现这些目标时,杀戮行为增加,导致政权崩溃。政权作为一个完整的实体延续几乎没超过两年时间。然而它的简单化性质使得这短短的时间内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杀戮行径和社会倒退。

结 论

尽管存在差异,激进派的种族民族主义和革命共产主义孕育了社会有机论的我们—人民的观念,人民作为一个单一族群的民族或一个单独的无产阶级,如我的第 1 个论点 a 所说。他们将国家视为一项道德工程的承担者,有义务清洗民族/无产阶级的敌人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他们是一个据称代表了人民的国家的阴暗面,这里人民被看成一个单一的有机整体,而不是分成许多层面的多元利益集

体,如在自由民主社会中那样。这使他们离开了真正的民主。斯大林主义或红色高棉暴行是现代有机主义的社会主义版,它歪曲了民主的社会主义和阶级理论,正如以种族为目的的暴行歪曲了民主的民族主义理论。出于地缘政治角度,受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概念也赋予了阶级理论以民族主义和(对红色高棉而言)种族民族主义色彩。就共产主义的情况说,民族没有超越阶级,但是阶级也没有简单地超越民族。民族与族性被引向了一个阶级版的社会有机论的人民——我第2个论点的反题。

虽然我的第3和第4个论点已表明是种族清洗的特有形式,但是与国际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内战确实强化了阶级仇恨,增加了共产主义组织中的穷兵黩武成分。这些政权更可能试图通过军事力量达到他们的意识形态目标。这把某些共产主义组织带进了危险区域,在此,后革命状况中通常存在的治安性镇压可能会逐步升级为政治灭绝和阶级灭绝。这种升级开始是(可类比于我的第5个论点)作为地缘政治和内战不稳定的结果。但是在胜利之后发生的第一阵暴行区别于种族暴行。他们巩固了政党国家的地位,把来自底层的精英、激进分子和阶级怨恨汇聚到一起,以便解决他们的敌人。但是,派系主义又冒了出来。它表明将党的统治制度化是困难的。在底层被唤起的激情与仇恨——经常首先在上层成熟——不断急剧上升直到失去控制,使得实用的选择性镇压难以维持。然后派系主义又在党内出现,造就了一批决意通过任何必要手段实现乌托邦目标的激进分子。此时死亡率逐步上升,不是因为极权主义带来的压力,而是派系化和激进化加剧出现的结果——正如我们在种族清洗中看到的。这些国家建设和国家派系化的循环是阶级清洗所特有的。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的另一时期出现的派系主义彻底地自上而下地摧毁了苏联。到目前为止,中国已通过鼓励党内施行多元主义,以及更近的通过将党排除在经济规划之外而避免了那种命运。

这也有利于这些政权孕育的计划,这些计划与我的第6个论点想象的不同。共产党更有秩序,但是只有杀了极少人的计划是完全打算好的,同时它发生在过程的早期阶段。没有出现过相当于最后

解决方案的那种手段,即在所有计划失败之后尝试通过大屠杀孤注一掷地实现目标。共产党带来的最大死亡率不是计划好的而是源于巨大的政策错误,派系主义加剧了这种错误,受害人的冷酷无情或报复性想法也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它。但是——红色高棉作为一种不确定的情况——没有哪个共产党政权盘算过种族灭绝。这是共产党和种族杀人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共产党主要是通过灾难性的政策错误而造成大规模死亡,种族民族主义者的杀人带有更多的蓄意性质。

20 世纪苏联等的大饥荒主要源于灾难性的中央集权论。但是相反的情况发生在 19 世纪末期,当时由市场导致的灾难性的饥荒,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大屠杀,致使远超过 3000 万人的死亡。“自然界的”厄尔尼诺现象确实带来了严重的灾害。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出现意味着以备不时之需的粮食储存停止了,价格随着供给缩减而上升,而粮食实际上被从遭饥荒地区向外出口以寻求更高利润。政府也因其意识形态信念——市场是最好的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而拒绝干预(戴维斯,2001)。也许在 21 世纪,随着国家主义的衰落,我们将会又一次因为意识形态上过分执着于市场而不是国家,犯下巨大的政策错误。

352

第 12 章

南斯拉夫 I：进入危险区域

欧洲背景

纳粹德国战败并未结束欧洲的种族清洗。它重新瞄准了遭遇败北的优等民族(或德国白种人)。1945 年约有 1800 万德裔人口居住在东方的国外。在苏联的德国人大都保持原状,但剩下的大多数正在被强行向西驱赶。将近有 1200 万人到达德国,但是超过 200 万人成为当地人谋杀性报复的目标,死在途中。他们中只有可能几千人当过纳粹施害人。奥斯卡·辛德勒,被以色列和好莱坞称为“正直的人”,是 300 万被驱逐的德国苏台德人当中的一个,他失去了财产,但活了下来。所有最重要的波兰和捷克的政治家都支持驱逐行动,同盟国也一样。1944 年丘吉尔告诉英国下议院,驱逐行动将提供“最令人满意和最持久的”对种族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会再有混杂的人口引起像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一样的没完没了的麻烦。将要出现一次彻底的打扫。”捷克总统贝奈斯说苏台德德国人是一个“不能生存的民族”,而一位捷克将军宣称:“一个好德国人是一个死掉的人。”一位叫斯马西纳的中尉通过杀死未发起挑衅的 25 个男人和 2 名妇女的方式“打扫了”一个德国人村子。另一位军官从一辆火车上赶下 265 名德国人,包括男人、妇女和孩子,然后全部射杀。德国人说红军对待他们要比普通捷克人或波兰人要好——强奸除外,因为红军强奸了数不清的德国妇女(海顿,1996:727—728;奈马克,2001:

第 4 章;塞弗特,1994:54,67)。德国人突然成了受害人,而新的施害人将其视为正义的报复。现在仍留在东方的德国人不到 300 万——85% 已遭清洗(按本章开头原有 1800 万),这是通向经过种族清洗的欧洲的路途中的一个重要小站。

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国人被捷克和斯洛伐克移民代替。在波兰,边界以及人都被移动。随着一项与苏联之间的把波兰边界向西移动大约 150 英里的协议的签订,4300 万波兰人与 52 万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被重新安置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苏联)。波兰从原本国人口占 67% 变化为本国人口占 90% 以上。在南斯拉夫,报复行为同样发泄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塞尔维亚通敌者身上。将近 10 万人,主要是克罗地亚人,在其投降时被以塞族人为主的游击队杀死。德国人被从塞尔维亚的伏伊伏定那清洗了出去,代之以塞尔维亚移民。

354

人口转让被认为是两恶之中较轻者而得到辩护:宁可被治安性驱逐和交换,而不要种族民族主义的伤害。谢克特曼(1962:369ff)指出更多的经过商议的人口转让是避免种族战争的最好办法。即便这是事后之见,我们也必然同样尊重社会学家托马西教授的由联合国将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少数群体转到各自的故乡共和国的计划。他认为这将产生两个稳定的联邦,一个是塞尔维亚、马其顿和黑山的东正教联盟,另一个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天主教联盟——尽管,像当时大多数专家一样,他没有考虑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穆斯林更有资格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最古老的欧洲清洗传统因强行将 15 万土耳其人从保加利亚驱逐出去的行为而获得了更新。1955 年暴动之后,土耳其的 50 万人希腊社区下降到 10 万。70 年代塞浦路斯遭到清洗,20 万希腊人与土耳其人逃往他们自己在岛上的两个小国家。岛上少数群体现在总共不足 1000 人。1993 年最后一批 1.5 万希腊人中的五分之四被从黑海北岸的俄罗斯阿布哈兹共和国赶出来。希腊人与土耳其人曾是住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的四海为家的民族。现在他们居住在自己的民族—国家之内。土耳其共和国和周边国家仍然歧视库尔德少数派,

尽管在目前的伊拉克这一状况似乎已经暂时结束了。

共产党苏联和南斯拉夫政权成功抑制种族冲突长达 40 年,这很可能是共产主义国家获得的最大成就,让后来的民主制国家无可比拟。确实,苏联赋予俄国人特权,而在两个政权中个体共和国心照不宣地“属于”特别的国籍,尽管共产党一般是在超国家的阶级团结中寻求民族互让。晚期共产党阶段出现某些动摇迹象。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数百万俄罗斯人在感知到压力的情况下,离开中亚共和国,奔赴他们自己民族的家乡。这时期只有较小的波罗的海国家还在吸引着俄罗斯人(贝尔-菲阿尔科夫,1996:178—179)。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权对土耳其人施加压力,1989 年 35 万人随后离开。剩下的土耳其人(加上吉卜赛人及其他人)被迫取保加利亚人的名字——一种文化压制形式。共产党式的由人民进行统治,尽管从其他方面看存在缺陷,却是超国家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阶级胜过族性。

当苏联帝国在 1985 年到 1991 年间解体时,第一次分离并未带来什么冲突。大多数继承国依然是半威权主义和保守主义,害怕社会动员和冲突。

355

未来被认为要取决于多元主义民主和社会市场资本主义。大多数东欧政治领导人内化了西方的观念,即认为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是一种倒退。同时它还是与欧盟达成交易的障碍。民族主义党一般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前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之后的第三角色。在国家继承了明确分界线的地方,民族主义者没有调动起修正主义情感去对它们作出改变。罗马尼亚依然保持谨慎,不去刺激它的马扎尔少数裔。2500 万俄罗斯人现在居住在由其他族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轻易就成为留在大欧洲内的最大的少数民族,承载着前帝国压迫者的耻辱。除了在车臣,他们还不是大量暴力的目标。只要这些俄罗斯人不提出什么重大的政治要求,歧视或差别待遇而不是清洗,就是他们的命运。他们不大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缺乏提出这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可信的资格。我的第 3 个种族论点能够解释他们的温顺听话。绝大多数西方评论家似乎很乐观(布鲁贝克,1996;莱廷,1999)。

单从车臣看,暴力往往让非俄罗斯族群相互争斗,而不是与俄罗斯人相抗,特别是在那里新国家的边界穿过族群混居人口的高加索和中亚的那些地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和奥塞梯人、格鲁吉亚人和阿布哈兹人之间的边界争端,以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更复杂的种族和宗教战争,形成了后苏联时期的几乎所有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两个相互竞争的群体都对同样领土提出了看似合理和能够实现的主权要求。贝辛格(2002)说新出现的种族暴力成为了一阵“浪潮”,其间共和国边界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纷纷陷入争端。苏联内含的民族联邦主义的宪法对苏联解体没有起重要作用(尽管邦斯这样认为,1999)。但它确实决定了分裂的形式和随后的暴力事件。共产党的政治家发现他们自己事实上是种族民族主义的领导人,警察与治安部队经常与他们站在一边,而饱经苦难的难民构成了种族民族主义者中的中坚力量。他们所有人一起,加上罪犯,能够从运转不灵的苏联军械库中抢得武器,从而使暴力水平升级。有些国家遭到重创,其他国家正在复兴,但所有国家较之过去都远更加单一民族化。

东欧继承国大量的是单一民族的和安定的。差不多另有 100 万德国人平静地从东部回到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只有两个多种族的国家例外。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在 1992—1993 年平稳地分裂成两个单一民族国家。布拉格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捷克—德国—斯洛伐克—犹太人城市走上了新世纪的征途,结束了它作为捷克斯洛伐克象征的历史。但是另一个多种族国家的陷落将证明充满了多得多的暴力。

南斯拉夫:问题

南斯拉夫的种族战争将种族清洗这个词印刻在了全球的意识当中。^[1]总伤亡人数可能达到 30 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或战俘,

356

[1] 我要感谢阿莱克桑德勒·米利塞维奇就南斯拉夫这两章语言和知识两方面的帮助。

无数人遭强奸,超过 400 多万人成为难民。受暴力影响的区域范围很小,人口只有约 1000 万(总的南斯拉夫人口是 2300 万)。这里超过三分之一的当地人口已遭受了谋杀性清洗,绝大多数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三方参加的争斗所造成的伤亡,尽管 1999 年,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的冲突逐步升级,在科索沃产生了前南斯拉夫遭清洗最彻底的省份。2003 年,尽管塞尔维亚的局势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被推翻之后有所改善。但紧张关系继续在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克罗地亚联邦,在面积很小的斯雷普斯卡共和国,在科索沃以及在马其顿保持着一触即发的态势,除了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国家和独立小国 70% 以上是单一种族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被分裂成六个不同的地方小国/政治飞地,在此占支配地位的单一族性包括了 82%—99% 之间的总人口。这种大规模的清洗是我们必须要解释的。

所有族性的人都已经施行过谋杀性清洗。塞尔维亚人很可能进行了最多次的谋杀,但人数最多的难民也是塞尔维亚人。在 1999 年早期甚至有更多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大约 80 万人)被赶出家门,但是随后他们突然比他们的塞尔维亚压迫者更强大,迫使 20 万(其中三分之二)人离开。甚至在我们对西方报道中的反塞尔维亚偏见做了纠正之后,大多数最坏的暴行仍然是由塞族人干下的(赫尔辛基观察,1992,1993;联合国安理会,1994)。这种凶残更多是源于更大的发动“第一次攻击”的机会和激励措施,而不是任何性格或民族主义方面的原因。我不想把罪责在族性之间平摊,因为并不是全部族性都施加了种族清洗。

暴行有四种类型。最坏的是大屠杀,一般是保留给男人的。在超过 20 处地方,当地达到战斗年龄的人被集中起来屠杀。超过 3000 名克罗地亚男人在 1991 年 11 月武科瓦尔镇被塞尔维亚部队占领之后被俘,然后据称被杀死。1995 年 7 月,7000 至 8000 名波斯尼亚穆斯林,基本全是男性,在塞尔维亚部队占领斯雷布雷尼察之后被杀——一些人被一批一批地处死,其他的被追到绕城的树林子中杀死。这些是高度有组织的暴行,涉及军队、运输的协调和尸体处理

(霍尼格与博思,1996:175—179;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克斯蒂斯奇案,判决,2.8.01)。1994年在阿哈米奇的克罗地亚人杀死了119名波斯尼亚人(见下一章),这是迄今被揭露出来的最大的非塞尔维亚人的单独暴行,尽管在数周后的1995年约有600名塞族人在试图从克拉伊纳地区逃跑时被杀害。这样的事件发展至以种族为目的的政治灭绝,意图是杀害每一个有可能在将来进行报复的当地男子。第二,更经常的是,人们被集中起来,赶走、殴打,有时在做戒性镇压中被杀害,整个族群社区吓得逃跑;有的在压力移民或野蛮驱逐过程中被杀。在斯洛文尼亚西部地区,巴兰尼亚和克拉伊纳克罗地亚人就是这样把塞尔维亚人吓跑的。它也是塞族人在科索沃的主要战术,这里约有3000到6000名阿尔巴尼亚人被杀(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2000多具尸体)。然后恐怖行动又改了方向,约有1000名塞族人在阿尔巴尼亚人控制了该省之后成为受害人(所有这些估计都是高度临时性的,它们依然是两边之间的政治足球)。第三,文化清洗试图抹去这些领土中的非己团体的文化。清真寺、图书馆和其他穆斯林纪念碑在塞族占领区被一一推倒在地,而少数的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堂也被摧毁。

第四,发生很多强奸行为。〔2〕最有名的强奸事件是由塞族男人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妇女实施的强奸。女性主义者已经使得这些强奸行为成为战争史中记录最全的部分。有些人提出,强奸表达的与其说是一种根本的男性寻求性满足的欲望,不如说是一种对女性实施暴力的欲望。然而在我所有的研究个案中,绝大多数的男性暴力都是指向其他男人的。这也是一种根本的对男人实施暴力的欲望吗?这样的心理解释似乎显得老套了。虽然男性动机的证据难以发现,但社会方面的原因似乎很突出。绝大多数是团伙强奸,由几组的男人实施,其间,潜在的不愿加入的男子会感到集体性的男性的压力,同时受到男性意识形态的约束,即不想加入说明缺乏男子气概。也

〔2〕 这些由艾伦(1996)、古特曼(1993:64—73,144—149,157—167)、斯蒂格尔迈耶(1994)和武利亚米(1994:195—201)记录并作了分析。

有战时本身的原因。暴力因为征服者想要羞辱被征服者而增加,因为这样可以显示他们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妇女。它还攻击被征服者整个的最隐秘和最富再生能力领域的文化。

但是种族战争增加了更多吗?有些人说民族主义特别地具有家长制和性别歧视特征。种族清洗战争确实增加了集体性的恐吓妇女的意图,以让她们逃离她们的家乡。在南斯拉夫发生的强奸事件的当事人女性幸存者所作的叙述中,兽性的冒犯、残酷和羞辱形象似乎成为性欲望中的支配因素,尽管依然可能的是施害人以荒谬的对双方同意的性关系的幻想开始,后来才不得不代之以(采用)暴力。很多妇女随后被杀害或失踪。有些幸存者怀了孕后被囚禁,直到时间太长无法再做流产。她们的俘获者经常嘲笑她们要生养切特尼克的孩子了。这似乎像是一个被古怪地误解的种族清洗,因为被释放后,波斯尼亚妇女逃回到她们的社区,婴儿在此被作为穆斯林抚养(尽管不总是由受辱的母亲来抚养)。也许可以认为,以上推理是“建立在否定它的受害人的所有文化特征,将受害人降为塞尔维亚男人的纯粹性容器”(艾伦提出,1996:100)。但是许多施害人确实认为妇女的羞耻感、社区的耻辱堆在她身上,而实际的身体伤害将阻止她结婚或再生孩子。如果我们获得常规和种族战争下两方面的关于强奸的量化证据,那么所有这些假说将是可验证的。但是我们没有,所以它们仍只能是猜测性的。

一些人把这些暴行的结合视为种族灭绝。西方领导人,比如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将其类比为大屠杀。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CTY)公诉人已经对个人提出了几项种族灭绝控告,而一项已经生效。克尔斯蒂奇将军被指控在斯雷布雷尼察一案中犯有协助和唆使种族灭绝罪。这次屠杀看上去确实像是一次种族灭绝大爆发,尽管是放在一个更广泛的谋杀性清洗的总背景下——大屠杀和强奸是打算用来将族群中的大多数人吓得逃跑。我不想将南斯拉夫清洗总体称为种族灭绝。他们也是野蛮的——施害人有时失去控制(在斯雷布雷尼察没有),而在实践中,地方表现差异很大。它不像纳粹最后解决方案。它也不像卢旺达清洗,后者尽管野蛮但也形成了有效

的种族灭绝。南斯拉夫不规则的野蛮性需要特定的解释。

这些恐怖是出乎意料的。为什么？不知所措的幸存者问。为什么他们这么恨我们？为什么上帝和人类这样遗弃我们？这些是 90 年代习惯于将暴行视为属于遥远的过去或原始民族的欧洲人提出的令人惊恐的问题。简单的解释最受欢迎。民族主义理论将施害人视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阿尔巴尼亚人。这些群体被视为具有集体性的清洗历史。一些塞尔维亚人用克罗地亚人（乌斯达莎）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为今天塞族对克罗地亚人的报复提供了部分的辩护。一些克罗地亚人以同样手段回敬：塞尔维亚人是切特尼克的化身。父辈和祖辈的罪愆被怪到今天的子孙的头上。然而族群不是集体角色；暴行不是塞族人或克族人或波斯尼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犯下的，而是一些塞尔维亚人、一些克罗地亚人、一些波斯尼亚人、一些阿尔巴尼亚人等等犯下的——他们具有特殊的社会特征、动机和动力，而我试图将它们指出来。

还有很多人强调古代仇恨的意识形态力量。他们告诉我们 1389 年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战役中令人痛苦而难忘的失败，跟我们讲中世纪在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分歧。他们强调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分歧，后者的军事边疆造成了一个人盾，将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沿着后来被证明是 20 世纪 90 年代冲突的主要断层线分开。他们着重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暴行（第 10 章），以及不时打断 20 世纪科索沃历史的暴力。他们认为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在今天具有意识形态力量，因为塞族人和克族人在他们喝着母乳的同时就已经吸收这种民族主义。这基本上是由新闻记者格伦尼（1992）和武利亚米（1994）给出的叙述。

359

确实，巴尔干冲突的政治和宗教方面是早已存在并且偶然几次已牵动过整个社区的力量。第 2 章证明宗教冲突最暴力、最普遍，且在欧洲的边疆区域带有种族特征。乌多维基（1997:35）夸大地宣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没有发生过由种族驱使的宗教冲突。”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宗教冲突逐渐变得更具种族特征，特别是在科索沃，该地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经历了间歇性的谋杀性种族冲突

(朱达,2000:第1章)。塞族在两次大战间歇期间在南斯拉夫的霸主地位也受到广泛的怨恨。这些紧张关系致使一些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穆斯林和阿尔巴尼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选择不同立场。在纳粹的压力下,他们后来犯下了以种族为目标的暴行(正如我们在第10章见到的)。然而这些方面来得出乎意料,在科索沃少之又少,在当时却是最大的引火点。它还需要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发生意识形态的转变。在那时之前,绝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波族人和大多数克族人已获得了另一种文化的外表,“真的”属于塞尔维亚人,那么一个大塞尔维亚可以通过强迫同化实现了。只有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被认为太异族化而有必要驱逐。在“二战”的压力之下,一些塞族切特尼克游击队员变得激进化,倡导通过野蛮驱逐和纳粹管制下的包括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人口交换(格梅克等,1993)。但是1945年共产党的胜利压下了这些群体之间的种族冲突。之后,科索沃,而非波斯尼亚或克罗地亚(可能发生动乱的地区),依然是热点。然而科索沃直到90年代末期才爆发,远在其他省份之后。所以南斯拉夫种族冲突是旧有的,但既非古老也非持续不断;同时尽管它在20世纪严重程度加剧,但在时间上表现得并不均匀。

因此大多数观察家也拒绝建立在古老仇恨基础之上的解释。一位波斯尼亚历史学家说:“用15年旅游了大量地方,去过穆斯林、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村庄之后,我无法相信……国家永远在因种族仇恨而处于骚动不安之中。”(马尔科姆,1994:252)很多南斯拉夫人在国际刑事法庭上作证说,这些群体曾长期和睦相处。一位克罗地亚天主教牧师,在他种族混杂的教区中见证了暴行,感到困惑不解:“以前没有出现过紧张关系或者冲突。甚至东正教的人在街上也和我打招呼;有些东正教孩子还参加礼拜日学校……(然而)当战争开始在本地区激烈展开之后,当地塞尔维亚人就成了主要杀人者。”(博蒂卡等,1992:253;参较沙夫,1997:150)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社会学家也持同样意见。莱蒂卡(1996:99—100)和库兹马诺维奇(1995:242—247;参较戈迪,1999:4—5)说80年代的调查显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以及其他入当中的偏见和敌意水平实际上要小于在美国的种

族态度研究中发现的典型性特征。这些人在事端爆发实际开始之前似乎不是互相憎恨的——一个从表面上看来的悖论。

相反,大多数相互排斥的意识形态上的古老仇恨要归罪于精英的政治权力。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美国在南斯拉夫的首席和平谈判人,说南斯拉夫的悲剧不是注定的。它是坏的、甚至是犯有刑事罪的政治领导人为了个人、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而鼓励种族冲突的结果(1998:23—24)。西加说到塞尔维亚:“种族灭绝……是一个国家政策,是塞族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当权派作出的有意识决策的计划中的直接后果。”(1995:4—6;参较西尔伯与利特尔,1995)米勒(2000)对“极少数的坏家伙”论点提出了一个准军事的看法,“在南斯拉夫爆发的暴力主要是源于近来被许可而未受监管的恶棍的行为”,然后他又对其中主要角色为小股准军事恶棍的种族战争作了一番详细叙述。

这些叙述无一令人信服。假如少数坏家伙是主要责任人,他们是如何获得这样魔术般的强制和操纵的权力的?而且他们的计划是否做得如此严密,以至于能控制事件进程?毕竟,暴行是由数千人犯下的,还有更多的数以千计的人站在一边,要么怂恿他们继续干,要么也没有采取任何动作去阻止他们。他们的坏家伙中的许多人是试图赢得选举、讨好百姓的政治家。本区的首席美国外交官对社会或政治运转方式了解得这么少吗?更可能的倒是霍尔布鲁克的判断,即谴责少数坏家伙在政治上更加方便合宜。

严肃的分析必定承认精英、激进分子和普通人都参与其中。科恩(1995)提供给我们一个两阶段理论,将联邦的解体怪罪于共和国“吵闹的领导人”,解体又引发了更多的来自下面的普遍的民族主义仇恨。布鲁贝克说普遍的种族身份变得“国有化”和表面上的“精简化”了,但这产生于一个“偶然、多变”的过程:尽管精英愤世嫉俗和具有机会主义特征的错误叙述促进了这次升级,但单凭这个也无法解释地方种族民族主义的响应(1996:20—21,71—72)。虽然米洛舍维奇和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确实恶化了后果,但它还涉及更基本的过程。在古老与偶然或操纵之间存在着群体内部和不同群体之间的

361 宏观力量和微观的权力关系。很多宏观方面是源自于 20 世纪中不断增长的民族—国家理想的力量(此处建立在更古老的断层的顶端之上),而微观方面涉及实际情况下的特殊的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权力关系。所有方面都参与了从一个多国家的南斯拉夫联邦滑入到由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者实施的谋杀性种族清洗的过程。这包含五个主要步骤:

1. 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
2. 它被具有社会有机论倾向的民族—国家代替;
3. 这些国家与它们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爆发;
4. 这类事件升级至以种族为基础的国家 and 独立小国之间的战争;
5. 战争升级到谋杀性种族清洗。

在这一过程中,步骤 2 与步骤 3 重合,而步骤 4 与步骤 5 几乎同时发生。每一个步骤都运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将不同的角色推入到突出位置,使他们激进化以克服对他们所期望的目标的反对,把一个社会有机体的民族—国家中的非己团体清洗出去——最终,如果必要的话,采取谋杀手段。本章讨论升级过程中的步骤 1 和步骤 2,下一章论述步骤 3—5。

这一连串过程既非不可避免也不是预先计划好的。南斯拉夫可能已发现了一个平稳的解决方案:要么通过采取一个邦联/联合宪法的单一共和国,要么通过各个共和国之间达成妥协。即使没有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冲突也会保持在一个无关紧要而不是灾难性的水平上。至多会从平静的人口交换中产生被清洗过的民族—国家。为何每一个这样的解决方案都被拒绝,它们又被谁拒绝呢?幸运的是,激进化和升级过程比我其他个案中的那些得到了更好的记录。它们发生在近期令全球目光注视的欧洲,之后是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其间很多地方人士、联合国士兵和官员、社会科学家和新闻记者描述了他们所见到的一切。

走向危险区域

古代只在从意识形态上被重新诠释成民族—国家的现代理想时才显重要。历史著名的三种宗教存在于这个欧洲的边疆地区,而东正教、天主教和穆斯林的身份也通过出生婚嫁死亡和一年四季的秘密仪式而得到强有力的传播。这样的身份在 20 世纪前只是不固定地与政治相关。尽管早期的战役和口号还能在今日的宗教/种族社区中找到生动的回忆,但它们被记错了。战争实际上动员的是地区和朝廷的,而不是种族的军队。在 1389 年的科索沃战役中,被土耳其人击败的巴尔干军队是由塞尔维亚王子拉扎尔率领的,但它包括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弗拉其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他。时代的记载没有显示一种塞尔维亚种族政治身份。经过接下来的数百年,科索沃的神话变得更具宗教性,它以基督教殉难国王为了信仰奉献生命的故事为中心。在有些版本中,拉扎尔王子选择殉难和永生,而舍弃了世俗的胜利和国家生存。这些“回忆”是一套丰富神话的一部分,有些是宗教方面,有些是种族方面,有些是更加地方性的。但是 19 世纪末期的民族主义者对塞尔维亚人壮烈地败在土耳其人手下给出了一种种族民族主义的解释,而在 20 世纪的学校系统中这被教给所有的孩子。现在它对大多数塞尔维亚人成了真的。法国人与英国人学习了同样的被修改的关于他们早期时代斗争的历史——关于圣女贞德、关于克雷西和阿让库尔战役的故事。它鼓励民族对抗,但通常不是谋杀。

362

但是 20 世纪中期的南斯拉夫可以再添加乌斯达莎、切特尼克和穆斯林桑扎克党卫军团的暴行。一些克罗地亚人、一些塞尔维亚人和一些穆斯林确实对那些参加 90 年代事件的父母和祖辈做出了可怕的事情。有些主要角色在小孩子时就经历了这些暴行。如果,在讲述中,一些人的行为进而被归于所有克罗地亚人、所有塞尔维亚人

* Vlach, 罗马尼亚和摩尔达维亚的民族。

和所有穆斯林,则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就增添一个观念即整个民族都共享种族性格标志。这种集体记忆,以真实的最近的历史核心为基础,然后被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放大,激起了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但只是在严重政治紧张已经出现之后。

南斯拉夫确实存在问题。这些族群居住得多少有点相互隔离,以至于民族—国家能够通过领土的中断来实现,其中一个单独的族性占到人口的70%。这在20世纪曾短暂发生过,而南斯拉夫的联邦宪法赋予他们再次发生的权利。这是在形式上实际是民族联盟(narodi),而不是共和国,他们有权退出从而组成他们自己的大多数人民主制度(海登,1996:786—787)。这可能使他们走进我的第3个论点指出的危险区。塞尔维亚民族此前一直享有特权,但塞族人现在认为这种地位已经在受威胁了。如果他们以帝国修正主义(imperial revisionism)回应,事情可能会变得严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都有可能形成帝国主义,寻求合并波斯尼亚穆斯林居住的领土,该领土是被他们视为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的。最后,大片的混居人口处在他们之间的边界上,包含少数群体,以当地人为主,有可能与他们居住其间的共和国关系不睦。这些方面或可合理地让人产生与他们隔壁的家乡共和国合并的愿望。在这种背景下,对立的种族民族主义者可能会对同样的领土声明主权,较弱的一方受到相邻的家乡国家的援助——像我的种族论点4a所说的那样。不过,说这些还太早了。我们需要知道升级是如何开始的,是谁怀着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他们如何变得这样强有力或有说服力。

南斯拉夫共和国中的族性和政治

战后的南斯拉夫人口普查允许人们界定他们自己的种族身份。90%的人只选择当中一种。族性足够真实,不只是从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的偶然事件中构筑出来的或者是由民族主义领导人发明出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由六个共和国组成。其中一个

塞尔维亚,还包括伏伊伏定那和科索沃,两个享有较少自治的地区。1991 年普查(就在清洗刚开始之前进行的)显示六个共和国中的五个基本上是单一民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是例外。在斯洛文尼亚,88%的成年人把自己看作是斯洛文尼亚人,在克罗地亚 78%的人把自己视为克罗地亚人,在塞尔维亚 66%的人认为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在马其顿 65%的人把自己看作马其顿人,而黑山有 62%的人认为自己是黑山人(博戈萨维利维奇,1995;伍德沃德,1995:表 2.2)。因为大多数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抵制 1991 年普查,我们不得不估测他们的人口,大概占地区的 85%左右。在塞尔维亚境内,伏伊伏定那混居状态更甚,塞族人占 44%,匈牙利人占 25%。那里几乎没发生过什么事情,匈牙利人和其他少数裔除了留属塞尔维亚没有其他选择。这样除了波斯尼亚之外的所有共和国,加上科索沃省,能够具有自己的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占绝大多数,正如我们已看见的,(其)已成为 20 世纪的欧洲理想。但是要让这发生,两个涉及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

塞尔维亚人是地方的帝国民族,组成过第一个独立国家并领导包括两次战争间歇期间和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像其他比如德国和俄国那样的帝国民族一样,他们昔日的统治地位确保了许多塞尔维亚人现在居住在塞尔维亚境外。那些居住在其他共和国的人,总共有 210 万人,占南斯拉夫全部塞尔维亚人的 25%。绝大多数就居住在塞尔维亚边境附近。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他们分别只占人口的 12%和 32%,但是他们在一些边境地区占人口多数。他们还经营着科索沃省,虽然只占其人口的 10%。他们的帝国历史还意味着塞尔维亚人在政治和军事上是组织最好的族群,在警察部门、内务部和武装部门中代表人数都超出比例。在 1981 年的南斯拉夫军队中,60%的军事领导人和军官团是塞尔维亚人,超出比例 1.51 倍(贝布勒,1993:117;高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上的证言,尼古利奇案;戈梅克等,1993:240;武贾西奇,1995:116—117)。

但是塞尔维亚的统治两次受到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和一些波斯尼亚穆斯林曾与希特勒结盟,而塞

364 尔维亚游击队领导了抵抗运动。几乎一半的塞尔维亚青年在战争中死亡,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由于他们的战时牺牲而提出的道德诉求,甚至也能够理解他们一见到任何的乌斯塔莎复活迹象的歇斯底里(因为我们理解犹太人对犹太教堂被涂上纳粹标志符号的愤怒)。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还发现一个更近的“人口学上的威胁”。在1961年和1991年普查期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从占人口的43%下降到31%,而穆斯林从26%上升到44%。在科索沃,塞尔维亚人在1961年到1981年间从24%下降到13%,到1991年,很可能在10%以下。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到1991年已上升至85%。穆斯林出生率更高,而阿尔巴尼亚人在铁托1974年允诺某些地区自治之后已开始对塞尔维亚人施加压力。30年过后,塞族人已失去了在波斯尼亚的最大单一群体的地位,而在科索沃他们现在人数如此之少,以致他们需要通过镇压手段进行统治。任何的南斯拉夫的分裂显然都会威胁这些帝国残余。

在这个被全球衰退和苏联解体破坏的失败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存在着经济冲突。出口下降,外债加大。失业率很高,但是北部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因较为发达和更接近欧盟市场而受影响最少。在塞尔维亚,伏伊伏定那和贝尔格莱德过得不错,但大多数塞尔维亚人处在农村,较为贫困,要依赖公共部门度日,而衰退又缩小了税基。绝大多数工业和商业属于公有,而私有化将对那些具有政治关系的人有利。谁控制了国家,包括在共和国和地方两个层面上,就控制了经济资源。不管南斯拉夫经济冲突是在阶级、部门、共和国还是族性之间,它都将在被政治化的同时表现为零和游戏性质:一个群体得益,另一个就会有损失,因为经济是在收缩状态。经济困境加剧了紧张关系,特别是因为很多塞尔维亚人感觉受到一个更加分散的利益分配的威胁。

最著名的对塞尔维亚焦虑的表达是塞尔维亚科学和艺术研究院《1986年备忘录》(英文版,1999)。在塞尔维亚以外这份材料受到很多攻击。汤普森(1994:54)称其为“自怜、病态和报复心理”。我不这样看。它是由16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持有温和和隐秘的反

共产主义观念的历史学家和文学人物起草的。《1986年备忘录》还是在草稿形式时即已泄露出去,所以内容不一致,暴露出某种对经济学理解的模糊。它在一开始指出,毋庸置疑的是,南斯拉夫经济现在是一个完全瘫痪的空架子。市场改革已经让仅属于共和国层面的经济决策的权力下放。它说,因而每个共和国的经济,是相当独立的,由一个“行政管理人员过多的(共产党的)官僚制度管理经营着,后者的成本构成了不可容忍的经济负担”。经济上的任人唯亲使以前属于社会拥有的财产被侵占了,人们中饱私囊。《1986年备忘录》宣称,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道德危机”。然后它为铁托1974年的宪法改革感到遗憾。塞尔维亚的两个省科索沃和伏伊伏定那已经被给予了自治权,以及在联邦和塞尔维亚共和国两个层面上的独立代表权力。宪法改革现在要求在共和国/外省代表中取得一致同意,这使得中央决策缓慢而艰难,宪法改革几乎变成不可能。

两省的非塞尔维亚代表能够与他人联合在联邦一级通过投票击败塞尔维亚人,并且他们甚至能够阻拦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作出的改变。这些塞尔维亚人的抱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正如沃克·康纳所述,铁托以“操纵”宪法“作为削弱国家最大族群”塞尔维亚人的手段(1994:333;参见乌多维奇与托罗夫,1997:80—84;武贾西奇,1995:108—112)。只有塞尔维亚在争取民族—国家征途中受阻,《1986年备忘录》说:“无法想象在和平时期能有比这更糟的历史性失败。”(117,125—126)它忘记提到塞尔维亚的优势——对军事、安全机构和首都城市的控制以及在所有共和国的党和安全机构中海外塞尔维亚人的偏高代表比例。它在抱怨其他共和国与省份将塞尔维亚人描述成“压迫者”、“中央集权主义者”和“警察”时拐弯抹角地提及这一点(119—122)。它还把塞尔维亚经济的落后怪罪于缺乏联邦投资和与其他共和国的不公正贸易条款。实际上经济增长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塞尔维亚人处在农村及南方,远离欧洲市场。

《1986年备忘录》提出,后果,是海外塞尔维亚人正在被迫向外移民。然后就出现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句子,被所有批评家引用:科索

沃正在经历一场针对塞尔维亚民族的“身体、政治、法律以及文化上的种族灭绝”。种族灭绝这个词被重复3次。塞尔维亚人正在因遭到歧视和恐吓而离开科索沃(武贾西奇,1995:218—225)。这是种族清洗,但远远谈不上种族灭绝。《1986年备忘录》最后温和地结尾,倡议对指向“一个民主、统一的联邦制度”目标的宪法改革进行对话(105)。这必须保证所有族性、地区以及阶级的权利,必须加强包括联邦制度和人民主权制度在内的建设(一种对共产党的含蓄攻击)。它呼吁所有群体平等,同时结束塞尔维亚的“有缺陷的民族地位”状态。它没有要求更多的“塞尔维亚人的权力”或一个扩大的塞尔维亚。尽管它遭到很多批评,它不过就是塞尔维亚人对联邦的缺陷的一种看法,尽管到处存在偏见(参较戈梅克等,1993:235)。它是一个早期的对“强联邦”方案的看法:联邦应该保留,但其中心需要加强。

然而有一些塞尔维亚人要求得更多。塞尔维亚统治应当被延及所有有塞尔维亚少数派居住的地区,科索沃、克罗地亚及波斯尼亚的边境地区;这方面可怖的版本是塞尔维亚人应当在任何只要有塞尔维亚人墓地的地方进行统治。这是“大塞尔维亚”方案。虽然不是大规模扩张(一点点也不能与纳粹的生存空间计划相比),但它会侵犯那里的其他族群的权利。这种理想在农村的塞尔维亚人(遭受衰退和权力下放之害)、有特权然而易遭攻击的公共部门工人、受威胁的海外塞尔维亚社区以及回归的塞族难民当中拥有核心拥护者。科索沃塞尔维亚人感到最受威胁,因而是最极端的。因此,若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想要拥有自己的国家,他们就必须要小心对待塞尔维亚少数问题;否则的话,他们的命运就要交予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了。解决塞尔维亚问题并非易事。

第二个问题与唯一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共和国有关。在1991年普查中,44%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口视自己为穆斯林,32%视自己为塞尔维亚人,17%认为自己是克罗地亚人,5%认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16%的人口也是异族通婚的孩子,比其他共和国多得多。相互通婚主要是近代和城市现象,农村居民经常认为它有危险。波斯尼亚种族版图也是一个拼盘,包括每一个主要族群的

小块人口。即使几个独立小国诞生之后,每一个竟然还包含着基本的少数群体。一个独立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家将需要在各社区之间联合共享权力。解决波斯尼亚种族矛盾不会容易。

截至 1990 年,前南斯拉夫联邦还不得人心。大多数南斯拉夫人想从共产主义转向民主制,然而他们将联邦与共产主义和塞尔维亚统治联系在一起。在塞尔维亚以外几乎所有人都想要分权改革,但是大多数塞尔维亚人讨厌已经在发生的权力下放过程。当政治体制濒临破产,国际资本主义运用新自由主义的拙劣工具,仅在减少国家计划和预算的情况下同意贷款。GDP 开始从 1986 年水平往下降。官方失业率 1988 年达到 17%,但是 25 岁以下的(失业率)人口则超过了 30%。农村地区受打击更大。工作岗位与消费品越来越依赖于家庭、受保护地位和公共领域与从公共资源中创造出来的市场领域中的物物交换网络。正如《1986 年备忘录》中指出的,市场是由个体共和国安排的,它提高了族性对维持生存的重要性。更多的南斯拉夫人将其个人与家庭的利益与他们的族群联系在一起。民族正在取得相对于阶级的优势,而这对联邦制度来说是不祥之兆。

南斯拉夫是在“一战”的协议中形成的,当时因地缘政治原因得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领导人的同意。他们被迫在战争中相互作战——斯洛文尼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在哈布斯堡帝国,与塞尔维亚作战——现在他们通过统一寻求巴尔干和平。联合起来之后,他们还形成了一个能够保护其领土不受任何地区对手侵犯的第二级权力。两次大战间歇期间的南斯拉夫被民族主义对抗行为扰乱,但是地缘政治的考虑又使之团结起来,而同样的地缘政治逻辑 1945 年后又再次出现。铁托 1948 年与斯大林决裂之后,南斯拉夫便得以好好利用它在超级大国之间的中立地位。因此南斯拉夫过去一直是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它还拥有欧洲最大的军队之一。但是苏联的解体使得地缘政治逻辑变得多余了。1990 年南斯拉夫人不再需要联邦来保护他们,并且他们也不喜欢他们实际拥有的联邦形式——共产主义、军国主义和塞尔维亚人的某种主导地位。

拒绝南斯拉夫联邦制度:1990年选举

367

民主制度送走了南斯拉夫联邦制度(斯奈德,2000)。南斯拉夫人想要由我们一人民来掌握的统治,但是1990年4月到12月期间在六个共和国中进行的相当自由的选举,却带来了信奉多数主义种族民主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者的统治。遵照宪法,选举是由每个共和国分别举行的,而几乎所有的党都是。这次选举是一次种族普查。在更大的党中,只有前共产党吸引了跨种族界限的许多选票,而甚至它们也都只是对少数民族具有吸引力,除了在塞尔维亚。其他成功的党在领导层和支持者方面是单一种族的。民族主义党表现最好,它利用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痛苦,占领了象征性和情感性世界。像图季曼和克罗地亚准法西斯分子帕拉加、波斯尼亚的伊泽特贝戈维奇和塞尔维亚的舍舍利与德拉斯科维奇这样的领导人曾在共产主义统治下遭受过囚禁和殴打,因而获得了道德权威。像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中许多人也被认为会带来繁荣的市场改革。但是只有民族主义者界定了物质利益整体属于族群,而这带来了南斯拉夫经济中越来越多的似是而非的性质(科恩,1995;克诺布尼亚,1994,第2部分),特别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利益观念不受欢迎。族性还没有胜过阶级,但是大多数南斯拉夫正在转向它。

结果是各共和国表现各异。在克罗地亚,一个以图季曼的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HDZ)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联合政府赢得了绝对多数席位(虽然不是指选票)。图季曼担任克罗地亚总统,直到其1999年去世。前共产党和一个中间党派联盟分别选举,其中有些人鼓吹多族性。他们在少数群体中表现最为成功。男性和女性投票者之间没有重要差异。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党投票人与其说是被什么实际党派计划吸引,不如说是因为感受到来自其他族群的威胁。西伯尔(1993:197)说在克罗地亚“一个非种族投票人或一个非民族主义党的类型不存在”。但是获胜者想让克罗地亚人民统治。

因为斯洛文尼亚有许多党,没有人赢得绝对多数。尽管标榜自

己为社会主义者、基督民主党、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等等,但他们绝大多数人主要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已准备悬置他们的论点直到他们在联邦内外共同建立起民族自治。斯洛文尼亚在文化上感到与欧洲和南斯拉夫其他地方一样接近,同时它在欧洲拥有部分的对其独立的支持。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都出现了在原则性的追求民族—国家的欲望和追求和平与连续性的实用欲望之间的矛盾冲突。一个平稳的分离是两个共和国内大多数主要政治角色的愿望。但他们会很谨慎地去推进它。

两个最小的共和国纷争较少。黑山人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族性意识。多数派说黑山人基本上是塞尔维亚人;少数派说他们在种族上是不同的。多数派支持塞尔维亚强大联邦的观念,仅稍有保留意见。黑山人依然留在塞尔维亚残余联邦之中。米洛舍维奇的失败增加了黑山人的保留意见。2003年,一个松散的联盟在两国之间建立,两国达成协议,2006年,在各自的共和国中举行一次关于完全独立的全民公决。在马其顿,温和的民族主义者赢得了选举,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处于第二位。新政府支持联邦,但这主要是地缘政治原因,因为它感觉受到它的希腊和保加利亚邻居的威胁。它赞成某种“非对称联邦”的折中方案,其中不同的共和国将根据其不同的需要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当这失败之后,马其顿宣布独立,而塞尔维亚人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其他地方。马其顿对 25%—30% 的阿尔巴尼亚人的歧视最终导致了 2001 年的武装冲突,尽管现在这方面已经减轻了。这种种族冲突似乎能够通过妥协来解决。

另一个一开始的妥协者是波斯尼亚。因为波斯尼亚不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这就抑制了它的民族主义者。然而即使在这里,三个获胜的党也都以种族为根据地,每个主要社区一个。加起来他们总共获得将近 90% 的选票,没有重大的阶级或性别差异。最大的未受过共产主义影响的社会组织是种族组织,而这些组织又转而变成了最有效的政党。甚至在这个多种族的共和国中,也必须在种族党之间达成妥协。开始时他们同意保存联邦,但这仅是地缘政治上的实用主义。波斯尼亚的塞族和克族领导人期望他们在联邦体制内的家乡

共和国的影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穆斯林领袖(后来的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于1989年指出:

我们不是走在通向民族—国家的路上……有些人可能想要它……但是那不是合乎现实的愿望。即使穆斯林是共和国中人数最多的民族,他们的人数还是不够……他们必须要能占到大约人口的70%。(西伯尔与利特尔,1995:230)

他显然同意70%是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必需的水平。

369 在三个主要社区当中,每个社区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前都拥有对政策的有效否决权,这曾使得他们不得不一直地磋商。但是随着共产主义的解体,波斯尼亚政治开始顺着种族的界线分裂。虽然穆斯林党起初赞成联邦,但有些是被多数主义民主吸引,后者会赞成他们(最大的群体)的选择。波斯尼亚的集体身份晚于南斯拉夫的其他种族身份的确立,这进一步让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坚持认为穆斯林真的属于他们。但是由1974年宪法和市场改革带来的自治已经传播了(首先在萨拉热窝)一种共同的波斯尼亚人(Bosniak)身份。有些人将当地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包括在它的类目之内;有些人将其仅限于穆斯林。后一种用法开始在1990年选举期间占主导地位(布林加,1995:第1章)。这几章中我将在这种意义上运用波斯尼亚穆斯林这个称呼。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还受到过与穆斯林结盟对付塞尔维亚人的诱惑。所以最大的波斯尼亚塞族党,米洛舍维奇的民主党(SDS),原来赞成联邦,现在开始倾向于与就在边境对面的它自己家乡的民族—国家结成牢固联系,也许可最终形成一个大塞尔维亚。三国相等地位开始在这些策略当中动摇。

因此,所有这些塞尔维亚之外的获胜党领导人都开始把民族—国家作为他们的理想,甚至是在波斯尼亚。实用主义者或许会满足于自己退一步,但从理想来说他们更喜欢拥有他们自己民族的主权。他们提出的新的共和国宪法,除了波斯尼亚,明确地保证了多数民族通过自我决定形成它自己的国家(后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独立小

国也在其他共和国当中这样形成)。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提出的宪法宣布建立一个多元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民族的主权国家——包括穆斯林、塞族和克族,以及其他居住在这里的民族和国籍的成员”。它规定自决权属于每个共和国和它的多数民族(海登,1996:790—792;伍德沃德,1995:108)。

这是多数主义民主,它贬损了少数派的权利。在各族群相互处在一起的情况下,这可能会诱使一种不断往复、趋向恶化的边界争端。人们问:“当你可以是我的国家中的少数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做你的国家中的少数呢?”尽管这样,实用主义的妥协还是会流行。我现在把目光转向最大和最重要的共和国。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崛起

南斯拉夫的大多数的罪恶已经被归于一个身材矮胖、头发灰白的男人。米洛舍维奇只是机会主义型的民族主义者。他开始是一位倾向改革的共产党官员,有着年轻共产党党员当中共同的反官僚主义情绪。他野心勃勃,希望这能将他推向权力舞台。他几乎是完全偶然地在 1987 年 4 月的科索沃战役的小镇上临靠著名战场的地方,捡到了民族主义这张牌。铁托 1974 年对科索沃自治的允诺使得阿尔巴尼亚人接管了该省的管辖和治安权。在这种压力下,许多塞尔维亚人离开了。其他人移入科索沃境内,尤其集中于科索沃战役遗址周围,后者已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温床(武贾西奇,1995:220—221)。1987 年米洛舍维奇作为塞尔维亚共产党的领导助理被派往那里去帮助安抚当地人,期间用到了通常的关于兄弟情谊的公开演讲和暗箱交易手段。他们的公开会议和随后的事件被拍摄下来,然后被通过 BBC 纪录片《一个民族之死》(1998)向全世界播放。

影片中显示米洛舍维奇坐在会议厅,期待着一个资深共产党员应得的尊敬。相反他被外面街上要求进来的一群愤怒的塞尔维亚人的声音淹没,他们喊着他们曾遭到阿尔巴尼亚警察的殴打。如在南斯拉夫其他地方一样,警察的权力经常被野蛮运用。但是这次游行

的组织者随后承认他们发起了挑衅,朝阿尔巴尼亚警察扔了两卡车的石头,希望得到警察的报复。米洛舍维奇然后走到外面,显然是希望让人群安静下来。但他失败了。在明显受到震动之后,他脱口说出,“你们再也不会被打”,“塞尔维亚人再也不会被打”。然后他回到里面的会议室,花整整一个晚上耐心倾听塞尔维亚人的抱怨控诉,到天亮时承诺他们“快速高效”地解决他们所有的不满。他看上去富有同情心。“斯洛博丹站在我们这边”,科索沃塞尔维亚人开始说(朱达,2000:53,乌多维奇与托罗夫,1997:87—88,怀疑米洛舍维奇预先安排了这当中的很多场面)。

后来在1987年的一次党的中央委员会电视会议上,米洛舍维奇谴责了党的领导人未能保护科索沃塞族人的利益。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把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作为“反官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接管了塞尔维亚党的领导权,剥夺了科索沃和伏伊伏定那的省自治权,清洗了他们两地的共产党的领导层,同时又在马其顿的党中获得了重要影响,然后将党改建为表面上像是社会民主党的样子的社会主义党(SPS)。他已处在获得南斯拉夫最高机构联邦会议大多数票的边缘——一个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政治精英非常担心的前景。高潮出现在1989年,当时他对数十万聚集在伟大战役现场纪念战争600周年的塞尔维亚人发表讲话。他最后的话后来出了名:“6个世纪之后我们再一次聚集在战场,并面临战争。它们不是武装战争,尽管不能排除那样的可能性。”(武贾西奇的译文,1995:394)

米洛舍维奇直接面对观众的讲话比他的共产党前任要多得多。他给人的是一个言辞朴素同时又老练的政治家的印象,能够先倾听,然后再履行诺言。他极少滔滔不绝地发表煽动性民族主义言论,尽管他的支持者是这样做的。此刻他倾向于一种将更多权力放在中心的“紧密联邦”,这是他的A计划。他调动起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核心拥护者——塞尔维亚难民、受威胁的边境的塞尔维亚人(特别是在科索沃)和一些期待在一个更牢固的联邦出现更大经济发展的农村的塞尔维亚人。他们能够聚起8万人的游行示威队伍,声称是代表人民,强烈要求罢免在塞尔维亚、科索沃以及伏伊伏定那的党的领

领导人当中那些“不管事的官僚”。米洛舍维奇鼓励他们说，“地球上没有力量能阻挡塞尔维亚人民”，一边又声称他无力控制他们普遍的愤怒。

他想要一场以他自己为党的领导人的反官僚革命。虽然他受到许多军官的支持，但最高指挥部意见有分歧，还不能被集体动员起来。更有用处的是警察和模糊不清的塞尔维亚国家保安部门*。自 1972 年 19 名被认为是乌斯塔莎恐怖分子的人渗透到南斯拉夫以来，保安部门就运用黑道去谋杀和恐吓国内外持不同政见者。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阿尔坎”怎样第一次从暴力犯罪转变为政治暴力的。靠在民族主义领袖德拉斯科维奇身旁的“贝利”和“吉斯卡”也一样。正如吉斯卡自己指出的，“在全世界的解放和抵抗组织中，爱国主义的‘罪犯’都身在前线，作出了在这种环境下只有他们能够作出的贡献。”（尼泽维奇，1995）

然而在 1990 年，选举成为最关键因素。米洛舍维奇的社会主义党（SPS），代表了温和的改良的民族主义，通过一个紧密联邦保护塞尔维亚人。只有当联邦解体，米洛舍维奇才会寻求修改共和国边界以保护塞尔维亚少数。这将是他的 B 计划。社会主义党享有不公平的选举人优势，因为它已继承了共产党国家机构，特别是广播电视，再加上警察和秘密警察。反对党对匆匆宣布举行的选举也准备不足。不像在其他共和国举行的选举，塞尔维亚选举只是半民主的。

但是最大的反对党甚至比米洛舍维奇更加具有民族主义精神。这是将塞尔维亚侵略怪到米洛舍维奇身上的最大障碍（像西加 1996 年和加尼翁 1997 年所表达的那样，尽管斯奈德意见不同，2000）。主要反对党领导人德拉斯科维奇呼吁“所有塞尔维亚领土的统一”，对其他共和国提出了领土要求。他宣称，“所有那些喜欢土耳其（即穆斯林）的人都应当到土耳其去”，并说他会亲自砍去任何举着绿旗的人（即穆斯林）的手臂。民族主义党诞生于像圣·萨瓦（取名于一塞尔维亚殉难者）这样的东正教的文化教育团体，后者呼吁消灭无神论

* SDB，后文基本称秘密警察。

的共产主义,恢复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声称穆斯林是真正的塞尔维亚人,正如图季曼声称他们是真正的克罗地亚人一样——使每一个人都有权对半个波斯尼亚提出主权要求。自由民主党,与社会主义党和民族主义者不一样,开始时没有现成的群众组织。他们是从能够在贝尔格莱德、其他城市中产阶级地区和少数民族中(但在其他地方少得多)具有一定号召力的知识分子和职业人士协会中形成的。他们谴责米洛舍维奇是一个操纵权力的独裁者,而支持少数群体的联盟和自治。然而甚至他们也同意如果联邦一旦解体,现存边界应该被扩大,以为塞尔维亚人提供更多保护(戈蒂,1995:76)。几乎所有塞尔维亚党都持有种族民族主义。他们同意 A 计划,要求一个经过改良的、不对称的联邦,从而能更好地保护塞尔维亚人的利益——同塞尔维亚学院阐述的一样。如果这个计划失败,则有一个共同的 B 计划准备着——一个大塞尔维亚。这不是精英的阴谋。他们是在表达普遍存在于塞尔维亚人当中的焦虑,并且像通常的民主政治家一样,他们想重新选举。

372

但是塞尔维亚投票者没有被种族民族主义迷住。选举前调查显示最突出的负面问题是清除共产党遗产,而最突出的正面问题是经济和生活水平,次之是在保卫国家不受侵犯的同时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攻击性的民族主义不会有什么结果。战争贩子鲜有赢得选举的。德拉斯科维奇依靠他的反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言论以及他个人的魅力获得成功,但他的经济政策似乎显得天真,而且他似乎对种族问题的态度不能一致。米洛舍维奇不得不对自己的共产主义过往轻描淡写,但是他在坚定的、同时被认为温和的对民族的保护以及他的经济能力方面成绩良好(《时代》,1992年1月6日)。选民按各种标准评估各党,像在大多数选举中一样。

米洛舍维奇的选票大量的来自年龄较长的塞尔维亚人,受教育较少的人,工人与农民(尽管失业者投各党的票都有),较大的公共部门,农村地区,特别是落后的塞尔维亚南部。米洛舍维奇对国家电视的控制在农村地区和较少接触到其他媒体的受教育较少的群体中特别重要。他们是最担心生活水平和安全的人。在态度调查中,社

会主义党的支持者更多的是国家主义者和更可能接受威权主义统治的人。自由民主派是这方面的一面镜子，他们大量的来自少数民族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者、北方人以及贝尔格莱德及其他城市的居民。社会主义党嘲笑他们是“不能从贝尔格莱德中心看见塞尔维亚的世界主义者”。反过来，后者讥笑社会主义党是“贝尔格莱德山地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党和自由民主派都一视同仁地吸收男人和妇女。民族主义党的选民中男人略多一点，但均匀分布在各阶级以及包括城镇和农村两地之间。最高的民族主义选票来自住在其他共和国的塞尔维亚人和难民，特别是那些在科索沃的和来自那里的难民。另外，民族主义党选民比社会主义党选民具有更多的民族主义观念。

米洛舍维奇似乎像是中间派，行走在新老政治以及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之间。社会主义党称它自己是“那些想生活在和平而不是民族仇恨和民族冲突之中；想要他们的孩子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而不是不确定和自相残杀的战争；想完全依靠他们的劳动果实生活；想在不影响他人自由的情况下找到实现自己自由的条件等等的人们的正确选择”。米洛舍维奇的党得到了那些害怕变革和无秩序，依赖国家保护维持经济生存的人的最大支持，把他们引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党的口号“和我们在一起，没什么不能确定”特别受欢迎。^[3]在这一阶段，米洛舍维奇是一个半威权主义者而不是极端威权主义者。但是他的政策和他的核心拥护者倾向于一种国家主义和将民族拔高到阶级之上并将他们引向暴力的民族主义的联合。大多数的这些核心拥护者的支持经受住了考验。1992年《时代》报道的民意调查显示社会主义党受欢迎程度大幅下滑，特别是在城市、在北方以及在受过教育的人中间。只有 15% 的贝尔格莱德人支持社会主义党，而该党在塞尔维亚南部的支持率是 51%。米洛舍维奇开始越来越多依赖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核心拥护者了。

373

[3] 选举数据取自科恩(1995:152)、戈迪(1999:34 和第 2 章)、米哈伊洛维奇等(1991)、武贾西奇(1995:421—438)、武科马诺维奇(1995:82—88)，以及当时塞尔维亚反对派刊物《时代》。

一个票数最多者当选的选举制度加上阿尔巴尼亚人的一次选举抵制意味着投给社会主义党的 46% 的选票收获了 77% 的议会席位。米洛舍维奇现在除了拥有行政权,还拥有议会给予的权力。然而 90% 以上参加投票的塞尔维亚人曾支持倾向类似 A 计划的党:一个与几乎所有其他共和国主要党派追求不相协调的紧密联邦。他们继续倡导 B 计划,如果联邦不起作用就重划有利于塞尔维亚的边界。在 1991 年整个共和国之间激烈的谈判中,所有塞尔维亚大党都支持米洛舍维奇的立场。他们不仅是拒绝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一个较弱邦联的论点,而且还拒绝了波斯尼亚人和马其顿人提出的适合各共和国特性的非对称联邦的折中建议(戈蒂,1995:76)。当谈判失败之后,反对党不能够轻易地反对米洛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的 B 计划,因为这曾经也是他们的计划。绝大多数塞尔维亚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前景抱悲观态度。一次调查中只有 11% 的人认为不同的民族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而大多数人认为最好是每个国家都是单一民族(《时代》,1992 年 11 月 30 日)。

灾难性的种族战争将降低米洛舍维奇的受欢迎程度。面对公众的反对,1991 年和 1993 年他动用强制手段。他的令人生畏的警察权力最终将游行示威者赶离街头,并且借捏造的罪名关闭了独立媒体。战争还提升了他的权力。持不同政见的伏伊伏定那社会民主党的主席被安上“克罗地亚法西斯匪徒的盟友”的称号,然后遭逮捕和编入军队。米洛舍维奇还操纵隐秘的经济权力。大约有一半的塞尔维亚工业还是国有的,同时他还秘密资助社会主义党和它的一些准军事盟友。拒绝参加战争的工人有可能被解雇(《时代》,1991 年 11 月 11 日,12 月 9 日和 12 月 12 日)。米洛舍维奇还受益于反对派被分成一个较小的自由反战阵营和一个更大的民族主义亲战阵营——而德拉斯科维奇现在徘徊在两者之间。因需要更多的支持,米洛舍维奇与舍舍利的民族主义者组成联合政府。到 1992 年年中,20 万南斯拉夫人已经移居国外,包括一大批文科的大学毕业生(《时代》,1992 年 4 月 6 日)。一个米洛舍维奇/民族主义者联合政府现在统治着塞尔维亚——这缩小了他操控权力的自由度。

戈迪(1999; 参见斯奈德, 2000) 过分夸张了米洛舍维奇在被他称为“政治替代工具的毁灭”中的作用。虽然米洛舍维奇确实运用了警察和媒体权力, 并受到战时爱国主义的支撑, 但根本的问题是源自于一开始的对更好地保护塞尔维亚的国家共识。当反对势力加强之后, 当中出现了分歧, 其中一些想法比米洛舍维奇本人的还要更加极端。不幸的是, 塞尔维亚政治家与选民仅在清洗开始之后才开始舍弃那些倾向于否定其他族群的观点。对德拉斯科维奇而言, 1991 年 11 月对武科瓦尔的可怕洗劫带来了个人的道德危机(戈梅克等, 1993: 316—317)。他还没有认识到他自己张扬的口号“将塞尔维亚人的统治延伸到任何有着塞尔维亚人墓地的地方”会产生甚至更大的墓地。在此之前, 大多数塞尔维亚人支持一种坚定的反对外来威胁的民族立场。到目前为止, 这既没有带来个人代价, 也没有导致诉诸暴力。

在上述共和国中没有一个共和国有多数人支持谋杀性清洗。然而两股激进化的政治势力已经在塞尔维亚运作起来。米洛舍维奇正开始亲自捕获猎物。他不得不以一个紧密联邦的形式或者重划边界的手段来履行“更多地保卫”塞尔维亚人的承诺。如果他退却了, 他有可能被普遍的民族主义势力压倒, 除非他与自由党结盟, 而后者反对他的威权主义倾向。他自己的支持者横跨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拥护者之间, 容易为进一步的民族主义诱惑所俘获。他一方面是控制者, 同时也是他的核心拥护者以及他与民族主义者一起打造的联盟的囚徒。第二, 一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骨干队伍正开始运用准军事暴力对付对手, 并有着塞尔维亚秘密警察的支持。从 70 年代起, 秘密警察一直在利用罪犯来暗杀在国外的对手。现在它的代理人开始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侨民社区武装和组织准军事部队, 并帮助正在由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党组织的准军事部队(尼泽维奇与塔夫格齐克, 1995; 米利舍维奇, 即将出版)。更多的与国家的可疑地区有关联的激进与暴力的民粹主义正在破坏政治的稳定性。

针对一个改良邦联的谈判毫无进展, 斯洛文尼亚与米洛舍维奇转向其他选择。斯洛文尼亚观察到一个无人反对的退出计划; 米洛

舍维奇拥有一支贯彻他的要求的军队。紧张加剧。当他们都派出代表去贝尔格莱德联邦议会对新宪法进行讨价还价之时,他们未能形成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代表秘密预备会议——例如,像他们在跨国的欧洲议会中的国家同行一样。相反,他们作为民族主义者参加秘密预备会议——如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等。族性胜过了阶级(我的第2个论点)。来自波斯尼亚的塞族和克族代表依然态度模棱两可,他们以两种方式参加核心会议,一是与整个波斯尼亚代表团一起,另一个是与他们在其他地方的种族的伙伴一起。当只有塞尔维亚和黑山作出他们共和国的捐献时,联邦预算破产了。经济危机和外债负担导致贸易及货币战争,因为每个共和国都试图将其负担转卸到别人身上。1990年末,米洛舍维奇通过掠夺国家银行支付塞尔维亚债务使这一过程升级。其他共和国也作出相同回应。

现在联邦正在解体。步骤1的发生或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鉴于民族主义势力已经在共和国中出现。他们反对一个起初为共产主义的联邦,今日它既缺乏地缘政治理由也未取得经济成就,主要受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联邦主义现在在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当中是偏常的。个体共和国现已中央集权化,统一议会制度被赢家通吃而未被比例代表制选举所加强,而民族主义者又赢得了它们。我们无法知道南斯拉夫人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只知道当他们在一个规定的选举过程中面对给定的几个党派时在投票箱前会选择什么。但是我们能假定他们中极少有人会想要他们不久就要得到的——谋杀性清洗。

防御性种族民族主义正在增长。克罗地亚调查数据表明民族主义党对感觉种族上受到伤害的人特别具有吸引力,他们怨恨非己团体的特权(西伯尔,1993:152—153)。整个南斯拉夫1990年选举中的最持续的民族主义标语是“家”的优先地位和捍卫它的需要。民主以选举胜利的方式来奖赏由政治家领衔的道德民族主义,后者凭无畏的精神证明了他们的原则。两个预先存在的社会组织曾最好地动员起来。最大的是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工会和专业及文化协会。但

因为绝大多数人想与共产主义决裂,这些多种族组织开始淡出了。所以最具有号召性的组织是种族性的。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他们远离政治,但他们举办音乐、舞蹈、足球、庆祝游行以及野餐等活动——令人生畏的日常动员。在80年代末全共和国范围的文化组织加入到了他们当中。这些人成为了民族主义党的市民社会动员者。一个与他们无关的第三支队伍是得到城市中的受过教育的职业阶层支持的多元文化群体。他们撰写信息最全面的小册子,作最不落俗套的发言。他们谈论女权主义和人权。但是他们缺乏大规模动员。就他们所有关于市民社会的言论来说,这正是被民族主义组织和身份调动起来的结果;又一次,市民社会变得邪恶多于文明。

自由民主及它的社会科学经常有一个十分自动化的关于个人观点和选举选择的模式。通过民意测验和社会调查,它一贯地问人们在想什么,所以(像克罗地亚牧师霍尔布鲁克以及测度社会距离的社会学家一样)当结果似乎与个人偏好的总体差异很大的时候,这种模式就会陷入困境。然而因为大多数人具有复杂和经常是相互矛盾的政治思想,是组织把这些思想中的一些,而非其他部分,带到了投票站。操纵行为帮助把米洛舍维奇而非其他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送上了权力宝座——而这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1990年的大多数精英操纵行为是更精明的民主政治家对决更天真的民主政治家的过程——民主通常的内容。民主化将南斯拉夫带进了危险区。因为大多数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者被选上权力舞台,加强了他们相互的恐惧,造成了安全困境。

376

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的诞生

社会有机论的民族—国家在接下来的九个月后出现。在1991年6月末,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都宣布脱离南斯拉夫独立。这两个政权,加上塞尔维亚,拒绝这一阶段的所有折中方案。在塞尔维亚紧密联邦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弱化邦联之间似乎不存在妥协余地。所有三个政权都准备去冒进一步升级的风险而放弃妥协。斯洛

文尼亚政府有一个相对轻松的选择。斯洛文尼亚是最为富裕和最有欧洲倾向的共和国,与塞尔维亚联系最少,同时对联邦毫无兴趣。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也风险最低。它具有不受争议的边疆,与塞尔维亚没有边界,并且实际上没有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政治家认为如果他们行动坚决、团结一致,塞尔维亚将不会对独立宣言提出质疑。

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国内未出现异议。在斯洛文尼亚警察部队表示他们将抵抗来自南人民解放军(JNA)——塞尔维亚领导的南斯拉夫军队——的一种象征性进攻之后,米洛舍维奇对斯洛文尼亚松手了。军队士气低落,最高指挥部意见出现新分歧。可耻的失败确实让一些将军激进化,他们惊骇联邦就这样被放弃而不伴随一场战斗。但是正如国务会议主席乔瓦奇(米洛舍维奇的一个亲密的塞尔维亚盟友)后来在摄像机前所说,“它是一个种族纯粹的国家。没有塞尔维亚人。我们不在乎斯洛文尼亚是否离开南斯拉夫”(BBC, 1998)。斯洛文尼亚,由于少数民族极少,所以能免遭种族战争。我将不再讨论它。然而斯洛文尼亚人在帮助摧毁南斯拉夫联邦制度方面已尽了本分。有时有人强调说通过迅速承认斯洛文尼亚为一独立国家,欧洲国家也尽了他们的本分。但是能责怪局外人的因素不多。也许所有人都对民族—国家理想占据主导地位负有集体责任。但是是南斯拉夫人自己拆散了自己的国家。

然后克罗地亚独立宣言终结了南斯拉夫联邦,并冒了严重得多的风险。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有一个很长的边界,同时有人数很多的塞尔维亚少数裔。与斯洛文尼亚不同,塞尔维亚在那里有巨大的利益,所以退出的风险要高得多。谈判现在在半主权共和国之间进行,而冲突有变成战争的可能。塞尔维亚控制了大多数的南斯拉夫军队——在这样一种偶然性下一种巨大的资源。因此,塞尔维亚政权觉得它拥有迫使克罗地亚人留在联邦中的军事权力。克罗地亚会冒很大风险尝试分裂出去吗?其结果将很可能决定其他共和国是否走向独立。克罗地亚的政治家和政党是第二阶段关键的初始角色。

图季曼,目前在台上执掌权力,起初因为实用理由不赞成克罗地

亚独立:作为前军队将军,他害怕南斯拉夫人民军入侵。因此尚在商谈阶段时,他就在暗中秘密寻求国外武器和军事顾问(因为波斯尼亚的伊泽特贝戈维奇没有)。拖延的时间越长,他能武装的人就越多。克罗地亚国外移民对从美国、加拿大以及其他地方传送回资金起到很大作用。在移民社区,在不仅是克罗地亚本国的更多地方,乌斯塔莎意识形态尚在——特别是捍卫克罗地亚独立需要武装斗争的信念。很多移民回到克罗地亚,作为控制持有枪支权利的强硬派,成为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HDZ)中的杰出人物。这个新国家的“更柔软”领域中的大量管理是从联邦共和国那里继承下来的。但就它的“强硬”功能而言,它缺乏一支军队,而且在塞尔维亚人口居住区的警察部队大多是塞尔维亚人。军队在秘密组建,由强硬派把持着;警察部队正在分裂。克罗地亚具有一个典型的失去稳定的国家的形式,我的论点5指出这对越过边缘进入种族战争是重要因素。

图季曼的真正愿望是让克罗地亚建成一个民族—国家,并且他已经准备好了去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他已经成为差不多称得上历史学家的人。他的一部著作对在可怕的乌斯塔莎死亡集中营雅瑟诺瓦奇的伤亡人数作了最低估计。在《民族主义与当代欧洲》中,他说一个单独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将使得“克罗地亚的经济地位和地理位置在经济意义上显得极其不自然,因而在最广泛的政治意义上非常不利于生活和发展”。波斯尼亚穆斯林是真正的克罗地亚人,所以他把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按同类放在一起来计算种族人口,为一个面积覆盖到大部分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国家提供辩护(英文版,1981:112—115)。将这一愿景付诸实现对居住在那里的穆斯林和塞尔维亚都将是爆炸性的。

在竞选期间图季曼的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一次次重复要求“克罗地亚主权”和“一个克罗地亚人的国家”,而不提少数群体。甚至反堕胎主义者也来插一杠子,他们的竞选海报称:“即使一个胎儿也是小克罗地亚人。”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受到国外移民大量资助(普西奇,1997:98)。图季曼一再宣称:“就我们即可决定我们克罗地亚的命运。”这个国家最终要实现“一千年未有中断的主权国

家地位的梦想”。图季曼有时为乌斯塔莎辩护：

378

我们的对手只在我们的计划之中看到恢复独立的克罗地亚乌斯塔莎国家的诉求。这些人未能看到国家不是法西斯罪犯的创造；它也代表了克罗地亚人民追求独立国家的历史梦想。他们知道希特勒打算建立一种新的欧洲秩序。（西尔伯与利特尔，1995:91）

与米洛舍维奇不同，图季曼不拐弯抹角。他公开感谢上帝，他的妻子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塞尔维亚人。他宣称克罗地亚人是东欧人，“塞尔维亚人属于东方。他们是东方民族，像土耳其人……尽管语言存在相似，可我们无法呆在一起”（科恩，1995:211）。因为图季曼的党有时将反塞尔维亚和反犹的强烈情绪联系在一起，塞尔维亚人产生乌斯塔莎有可能正在回来的想法倒也情有可原。

新国家的宪法草案试图让他们放心，体现比原来可以从竞选言论中期望得到的更多的多元主义。它公开宣布：

克罗地亚共和国是由克罗地亚人民和所有身为克罗地亚公民的少数群体组成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包括塞尔维亚人、穆斯林、斯洛伐克人、捷克人、犹太人（等等）……对他们来说，享有与那些拥有克罗地亚国籍的公民一样的平等地位是受到保证的。〔4〕

这确保了非克族人的平等权利，但是对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来说，它似乎减少了他们的政治权利。他们已被界定为南斯拉夫境内的一个“平等的民族”，同时联邦制度也保证了他们集

〔4〕 其他共和国有类似的好像给予少数群体第二等权利的条款。马其顿宪法宣布马其顿是“一个马其顿人民的民族国家”，加上说其他民族群体应当具有“完全平等的公民地位”。阿尔巴尼亚人目前正鼓动对其进行修改。

体的国家权利。现在他们被承诺了像少数群体捷克人或犹太人那样的低一等地地位,后者在南斯拉夫法律下只享有个人公民权。个人权利是不够的;集体邦联或联合权利是必要的,许多塞尔维亚人认为。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在他们处于少数的时候也同样这样指出。波斯尼亚克族领导人梅特·博班告诉某新闻记者他不能接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宪法,“因为虽然它保卫了个人权利,但没有保卫民族的权利”(布拉什基奇审判证词,1998年4月24日)。不幸的是,重要大国,特别是美国,具有自由主义宪法,所以认为对个人权利的保证足以保护少数派的权利。这是不正确的。塞尔维亚人强调非克族多数群体地区应当拥有政治自治权(联邦制度),或者少数民族应当在中央国家之内拥有确定的权利(联合主义)。但是大国没有理解用集体权利而非个人权利的措辞表达中的论据。他们没有对克罗地亚施加外部压力——对斯洛文尼亚也没有。这是一个错误。

379

图季曼的策略减少了妥协的机会。克罗地亚的绝大多数塞族人没有投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票,而是投了前共产党或中间派的票。图季曼把这些党看作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想与他们进行谈判。因为他是一个以多数票(42%的得票已经转换成68%的议会席位)经民主程序被选出的领导人,他用不着这么做。图季曼说他通过合法的议会多数表达真正的克罗地亚人的看法。领导塞尔维亚谈判的任务留给了小规模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党——克拉伊纳地区(字面意思是“边境”)的最佳代表。它起初没有一个清晰的立场,因为领导层正受着一个激进派别的挑战。但是它倾向于从联邦保护的角度去思考——为边境区争取自治权。克罗地亚人担心这一要求之后另藏有目的。如果边境塞尔维亚人被给予某种自治权,他们可能会利用它达到与塞尔维亚连为一体的目的。图季曼自己的策略正在强化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使冲突转向了可以用领土表达的性质——转移到了萨格勒布和克拉伊纳地区之间。冲突,正如布鲁贝克(1996)所述,不再只是两个族群国家之间的性质。它是三向的,涉及他所称的国有化国家(克罗地亚)和国家少数(塞尔维亚人);受到家乡国家(塞尔维亚)的援助。第二和第三有可能会结合成一个单一的大塞尔

维亚。

许多塞尔维亚人也担心 1991 年关于克罗地亚公民权的法律。后者说一个公民必须“遵守克罗地亚共和国通行的法律和习惯制度以及必须接受克罗地亚文化”。最后一个短语可能会使全部塞尔维亚人被排除在外。国家的语言和符号也会让他们感到疏远。虽然两个族群讲着基本同样的语言,但他们使用不同的书体。绝大多数塞尔维亚人能够使用拉丁书体;很少克罗地亚人使用或阅读西里尔(Cyrillic)书体。尽管在大多数群体塞尔维亚人地区的当地政府和学校也能运用西里尔书体,但官方国家书体是拉丁。这是一个让步,尽管不是一种双语政策。语言与符号也起着更加情感性的作用。到处展示着的新的国旗和纹章盾徽,源于古代,但它们仅作为乌斯塔莎符号而为大多数南斯拉夫人知道,特别是遭人痛恨的棋盘图案的符号,似乎让人想起法西斯主义(和我第一次看见克罗地亚足球支持者挥舞它的时候感觉一样)。拉丁书体和棋盘图案是当着你的面向你展示典型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这是我们的国家。”政权试图禁止最恶劣的过分行为,比如像畅销的乌斯塔莎照片和地图的复制品。

所有这些争端都是能够解决的,但是克罗地亚激进派不想妥协。最小的法西斯党,克罗地亚权利党,和在图季曼自己的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中的极端分子,在人口混居的地区挥舞着克罗地亚象征符号作为一种蓄意的挑衅,以便得到激进塞尔维亚人的暴力反应,而它反过来又会加强他们自己的论点在克罗地亚人中的可信程度。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激进派一贯被他们的塞尔维亚对等角色称为法西斯主义者,一个在受威胁的塞尔维亚社区当中激起非常大的共鸣的称呼。舍舍利,一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领导人,在电视上公开宣称:“我们塞尔维亚人处在危险之中。克罗地亚法西斯一伙正打算对塞尔维亚人实施种族灭绝。”一位在克拉伊纳地区克宁镇的塞尔维亚人告诉格伦尼:“克宁的大多数克罗地亚人是好人……他们不像在斯普利特的那些可怕的乌斯塔莎分子。”(1993:19)汤普森提供了对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激进派的生动一瞥。他在第一批克罗地亚警察刚被杀害之后到达扎达尔镇。在公共汽车站,他遇到一伙手拿着

380

桌子腿和铁棍的少年男孩，他们砸坏和抢劫塞尔维亚商店，克罗地亚警察在一旁纵容地看着。一个年轻人问他关于摇滚乐的问题，把他带到克罗地亚设的路障，然后到地方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党的总部，这里有拿着枪和刀的“愠怒、粗野”的男子守卫着。这些人在激进塞尔维亚分子的鼓励下向当地塞尔维亚社区周围送出警报。第二天，一个当地的塞尔维亚人告诉汤普森：“昨晚在扎达尔发生的是彻底的种族灭绝。”（1992：261—264，276）两边都声称在对先前由另一个群体成员施加的行为进行报复。

图季曼的一些顾问敦促和解。他们知道如果南人民军发起进攻，他们无法留住他们的所有领土。图季曼应该早就与乌斯塔莎政权脱离关系，尽管这会破坏他自己竞选中发表的“千年”言论。假如图季曼或米洛舍维奇是真正的政治家，能够高瞻远瞩、宽宏大量，那么也许——在所有社区的温和派的援助下——他能够避免灾难的发生。但是这样的政治家在任何地方都凤毛麟角，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够运用民族主义言论赢取选举的话。图季曼，不像米洛舍维奇，他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而且他已经为此在选举中得到酬报。问题还不在于作为一个半威权主义操纵者的图季曼（这一点他很快就是了），而是在作为一个民主政治家的图季曼，他为那些投票支持他的人服务，重复他选举时发挥作用的口号，而对那些不大可能投他票的人不去注意关心。塞尔维亚争端要求一个较少种族性的公民定义，但是图季曼的大多数概念范围很大；他不需要他们的支持。他拒绝了。

克罗地亚境内原来的社会民主党（SDP）领导人是乔瓦·拉斯科维奇。他在竞选运动中抛出大塞尔维亚言论，但是他注意到当地塞尔维亚人的弱势地位后想要采取妥协。然而图季曼的不让步使得塞尔维亚民主党迫使拉斯科维奇拒绝议会的副主席位置。他开始更多地说有利于米洛舍维奇的话，而他的副手也离开了议会。党变得激进化了。拉斯科维奇的问题——以及其他像这样的政治家的问题——是他竟然不能宣布或表示妥协，因为另一方认为自己具有拒绝他的政治权力。随着紧张关系的加剧，对图季曼的支持上升。他

未遇挑战,直到战争结束之后。他的核心支持来自于男人要多于女人;来自于保守派,特别是宗教保守派;来自于农村地区;来自于那些最受战争负面影响的人(即边境区的克罗地亚人);来自于(像任何一般党派一样)从他的经济改革中受益更多的那些人。但是战争甚至让大多数的不满足者沉默,因为他们不想显得不爱国。威权主义控制——已快让战争变得合理化了,彻底压倒了对反对意见。这已变成了一个政党—国家,尽管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政党—国家(普西奇,1997;塞库里奇与斯波勒,1997)。它无意妥协。

对立的公投1991年5月在克罗地亚举行。93%的克罗地亚选民赞成建立一个有主权的独立国家,给予少数群体个人权利。克拉伊纳塞族人抵制这次公投,因为早在一周以前他们已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公投,压倒性的多数人投票支持将他们的区与塞尔维亚连为一体。人们被要求对民族投赞成或反对票,因此谁敢站出来组织一次“反对”投票?但是结果是授予了民族主义者以合理性。它现在是他们的国家。

图季曼与米洛舍维奇秘密会见以图避开灾难。他们以牺牲穆斯林为代价讨论由他们双方对波斯尼亚进行分割的问题,但没有达成协议。米洛舍维奇、约维奇、塞尔维亚警察、秘密警察和社会主义党控制了一个国家与军队,自信他们能够让反对派回心转意。如果它进入战争,几个礼拜就会结束。大塞尔维亚很快就能够实现,不费多少代价。但是图季曼和波黑克罗地亚共同体很多力量已经作为劣势一方为反对他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塞尔维亚专制统治努力奋斗了很长时间。他们把未来的与塞尔维亚的战斗视为一种长期的跋涉,但他们对此已经习惯了。这给了塞尔维亚一个快速发动进攻的动力——趁在克罗地亚人能够使军力变得更加强大之前。任何一方的战争所得都将远远被战争造成的破坏超过——一种发动战争的国家统治集团经常会犯的错误。滑入危险区的过程已受民主过程控制。但是投票人现在已被武装人员取代。

南斯拉夫 II：含谋杀意图的清洗

上一章讨论了随着民主进程在南斯拉夫蜕化而出现的滑向谋杀性清洗的危险区域的情形。但是要解释越过边缘进入暴力的过程，我们必须转向首先在克罗地亚境内克拉伊纳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混居地区施行暴力的武装人员。然后是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混居地区的那些人，而 1998 年的科索沃人和 2001 年的马其顿人还远远落在后面。所有这些冲突都适用于我的第 2 个论点：危险临近是因为两个对抗的族群的代表对同一片领土提出主权要求，他们的要求既在道德上是可信的又是可以实现的。一个构成现有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口；另一个构成个别边境区的当地多数，弱势的一方受到相邻的家乡国家的支持。但进一步的下滑牵涉的不是民主的而是威权主义的过程。

主权诉求不是轻易可以解决的。它们看上去像是零和游戏：“要么你要么我对这块地拥有主权”。冲突能够通过少数派在多数派的国家内享有联邦自治地位或者通过在中心联合的权力共享设计而得到缓和。然而主权也随即涉及具体的军事和经济权力问题：谁应当拥有枪支和工作岗位？起初的爆发点是在克拉伊纳的塞尔维亚人占多数的地区，这里的塞尔维亚人以前曾提供了最多的警察并拥有大多数的枪支。当克罗地亚声明主权以后，它尝试引入自己的警察。在某些地方塞族激进派回敬以公开宣布地方自治，匆匆设置路障，和组织专门的前警察民兵队伍（科恩，1995：132—133）。牵涉的还有工作问题。新克罗地亚政府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解雇此时还拥有特权

的塞族人。绝大多数产业还是国有的。国籍证明(Domovnica),即一份证明克罗地亚人公民身份的文件,也被投入使用。要开办私人企业或获得加入医疗保险机会、退休金、护照或者驾照,这份文件必须要上交审查。塞尔维亚人发现它充满侮辱性,并且更难以获得,因为申请者必须要懂得“克罗地亚语言和拉丁文”以及表示“接受克罗地亚文化”(乌多维基与托罗夫,1997:95;《时代》1993年3月8日)。阶级利益观念正在被转移到族性身上。办公室与工厂见证了针对工作的冲突。克罗地亚边境地区正分裂成为对立的管理部门,缺乏例行的解决争端的程序。它们失去了稳定,陷入派系化和激进化——如我的第5个论点所述。

在5、6月特别是对立警察部队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大多数的第一次杀戮都是在小型争斗中完成的,而不是有预谋的。然而殴打与枪杀随着民族主义者将目标瞄准他们自己社区和其他社区中的温和派而变得更带有蓄意性质。所有的暴力都被说成是出于自己或者报复理由,是其他人引起的。它极少将目标指向之前的暴力的实际施害人。因此暴力就随着无辜的受害人对无辜的受害人进行报复而扩大蔓延。攻击使温和派不敢出声,让在明处的社区感到不安全。他们逃往他们的族群那里避难,那里有信任,还可以提供防御。相互的惊慌产生了更多的单一种族的村庄和城镇,每一个都有新形成的警察部队。阶级特权在这样的暴力中几乎不起一点作用,除了富人或许可以寻求贿赂他们的攻击者来取消行动。一个人的命运由他的族性决定——族性是胜过阶级的最有说服力的方式。

隔离也加大了意识形态权力的障碍。从塞尔维亚通往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电话线被切断。激进派占领了地方广播和电视台。获悉各种政治机会变得更难了。难民也把自己放在武装的激进分子的保护之下。这本来在一开始只可能在一个当地村子发生,但是它产生的示范效应和共同的恐惧或可能导致邻近村子经历同样的过程。当地人被诱使去对被废弃的房屋进行抢劫或者让来自其他地方的他们的难民亲戚搬进去。这使得更多普通的和已经成为受害者的人被牵连到激进派的清洗政策之中。两边的激进分子小群体,扮演着相

互挑衅的双重角色,使地方种族清洗运转起来。虽然他们中包括一些流氓恶棍,但绝大多数是真正的觉得处于威胁之下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受到了由卡茨发现(1988)的情感次序的影响:威胁、屈辱和充满正义的愤怒。

某些地方条件也有利于行为升级。这类农村地区青年失业率超过 30%。年轻人闲荡在广场和酒吧,时间充裕但收入寥寥或前程渺茫。种族民族主义者介绍给他们非己团体的差事,他们有些人则追求不需要依赖教育或职业水平的刺激或地位。不加区分的解雇行为让愤怒的失业人员走到一起,获得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同情。阶级利益被重新引向族性。这些地区也拥有枪支,属于父权制家庭文化的一部分。男人珍视它们(指枪支)并在当地酒吧争论它们的优劣。年轻男子吵嚷着显示他们进入成人社会的资格。这里就是准军事民族主义的潜在原料。这些地区种族之间通婚率还较低。人们对种族身份比较清楚,能够认同他们自己族群进行的正当防卫。这些地区经历过更多的“二战”暴行。而更多的双亲或祖父母曾遭受过暴行之害,而“乌斯达莎”和“切特尼克”的称号还在回响。那时与现在之间的联系被写入了古老仇恨的神话之中。克拉伊纳塞尔维亚人说他们是“一个被屠戮的民族的残余”。1945 年尝试报复的游击队占领这片地区,在即将到来的塞尔维亚移民的支持下成为了地方统治集团。这些殖民主义者带来的不安全因素——不是被视为窃取土地就是被看作是从法西斯分子手中取得——加剧了紧张局势(格伦尼,1993:107—108,西尔伯与利特尔,1995:98—112)。

其他方面有利于妥协。这里已有 40 年未出现严重族群冲突了,目击者在海牙法庭作证,1990 年前社区群众和平共处,他们知道他们之间有文化差异但是认为它们没有政治意义。虽然 1990 年选举使种族身份更加凸显,但极少有人倡议通过暴力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大多数人知道暴力手段会使他们失去很多东西——正如 90 年代的事件将证明的。要想绕过这种社会稳定运行的准则即暴力是非理性和非道德的并不容易,而南斯拉夫长期以来就一直是这样“一个社会。民族主义党派也是从文化交往中产生,受着思想理论家而不是暴力

分子的领导——小说家、诗人、科学家、牙医、精神病专家等，他们的暴力大都是口头上的。巴比奇牙医或拉斯科维奇或卡拉季奇精神病专家或普拉夫西奇生物学教授不想杀人。相反，他们希望他们的言论能够将他们的社区聚集到一起，同时迫使另一方作出让步。

整个 1991 年上半年这些相互矛盾的压力强化了每个族群社区内部的派系主义。这在克罗地亚发生很快，波斯尼亚较慢，而在科索沃按照一个不同的节奏发生。克拉伊纳发生了由更温和的拉斯科维奇领导的和由巴比奇、马蒂奇领导的塞尔维亚派系之间的冲突。在波斯尼亚中部的克罗地亚人中，温和的克卢基奇反对激进的博班。只有在波斯尼亚中东部的塞尔维亚人地区，激进化的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似乎才能够控制他的党，尽管他的副手是更模棱两可的科里亚维奇，而卡拉季奇也还没有走上不归路。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和派有两个初始的优势——他们掌权，且他们代表着秩序。然而权力正在分裂。

奥西耶克是斯洛文尼亚东部一个被塞族村庄围着的以克罗地亚人为主的城镇。一场地方上的内战有可能爆发，两边都有一些人敦促武装巩固领土。所以在冲突的一开始，我们可看见温和派克罗地亚警长赖克尔-柯不带武装地在该区巡逻，在对抗的特别路障之间安排停火，缓和紧张局势。他得到双边的支持，因为大多数当地居民都为内战的幽灵感感到害怕。居住着失去家园的塞尔维亚人的村庄产生麻烦的可能性是其他地方的 10 倍，赖克尔-柯说，要花特别的力气去安抚他们（斯蒂特科瓦奇，1997：160, 170）。奥西耶克的克罗地亚领导人不想惹麻烦。塞族民主党领导武切维奇也不想。但是他们都面临激进派的反对。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三种不同的局面会出现。第一，现有的法律和秩序以及温和派的政治家的力量可以通过新兴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国家从上层得到加强，镇压地方激进派。这是全世界种族冲突通常的结果。正如我们在第 16 章中看到的，如果警察干预所有武装的当地居民，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种族暴乱就会终止。对这些暴乱或军事行动的镇压实际上总是只在有限的恢复公共秩序

的意义上是有效的,至少在下一场暴力发生之前是这样。不幸的是,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因为克罗地亚或塞尔维亚似乎都不能公正地行动或者只带一点点偏见。他们自豪地宣称他们代表他们自己的族群。那就是他们刚刚赢得选举的途径。

第二,当地政治家与警察可以自己处理他们的争端。在当地人确实依靠自己管理自己的短暂时期,我们可以观察一个关键因素。极端主义者能够抵消温和派看似像代表秩序的一方的优势,如果他们能够令人信服地取得对军事或警察力量的绝对垄断的话。然后,任何暴力都有可能是短暂的,而胜利可以通过低风险的第一次打击选择而获得(正如我的第 4 个论点),这种情况一次次发生在早期冲突的日子里。在某一族性拥有军事优势的城镇和村庄更可能发生地方上的激进的政变。这些具有累积效应。胜利者将他们的防御诀窍带到其他地方,带到较少发生事端的社区,对他们或许在此拥有军事优势。来自克拉伊纳塞尔维亚人克宁据点的激进派组织起了一支被称为马蒂切维奇的准军事部队,拿下了城镇。然后他们攻打并夺取了格利纳的警察分局——多种族的克罗地亚民主党在这个小镇拥有大量塞尔维亚人的支持。格利纳塞尔维亚人被强迫解放(斯蒂特科瓦奇,1997:161)。这样的政变产生了难民,他们逃往一个更安全的种族飞地,出于怨愤,他们强烈要求采取行动将他们的家园夺回来,或决意要占据一个他们现在已经夺取的家园。这在战术上诱使他们对他们的这个新居住区域中的小规模少数群体采取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战略。每一个社区的易遭攻击者都被轻易地拔除了。

然而恰与以上相反的情况成为那些种族更加平衡的镇和村子中的普遍现象。这里激进派的论点似乎很危险,因为首次进攻可能会失败,从而导致不断上升的暴力行为。种族平衡的区域如奥西耶克、维泰兹(克罗地亚人/穆斯林)、萨拉热窝和布拉图纳克(穆斯林占多数但组织更好的塞尔维亚人)建立了联合应变权力机构。种族平衡的村子,比如维希妮加,建立了联合巡逻队以维持秩序,后文详述。地方特殊性有可能会加重或减轻事态。莫斯塔尔的庞大山脊隔开了

386 两个大多数人社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克罗地亚迅速占领了一边，而穆斯林拿下另一侧。两山腰成为在山脊两侧开凿出的武装军营。几声枪响变成了炮击，在此过程中克罗地亚军事人员摧毁了世界著名的大桥。这类似于常规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村庄默主歌耶（Medjugorje）曾经是一个乌斯达莎据点。这里的克罗地亚人记得的不是乌斯达莎暴行，而是塞尔维亚人的战后报复，在此期间，“这片高原中几乎连一个家庭也没能从暴行中毫发无损地幸存下来。焚烧，拷打，强奸：这只是游击队统治下诸多恐怖行径中的一小部分”（巴克斯，1995：74）。乌斯达莎团伙逃进了山里，坚持抵抗12年，直到最后残余逃至国外——把他们的枪交给当地克罗地亚人。铁托迫使当地克罗地亚人建立一块巨大的战争纪念碑，献给“法西斯主义压迫的受害人”。它依然是塞尔维亚统治的潜在象征。但是当地人对之有自己的理解。

80年代期间，在当地妇女和儿童报告见到圣母玛利亚之后，村子就成了天主教朝圣的主要场所。村中的一个氏族，奥斯托季奇（Ostojici），原为塞族人，经大量的相互通婚之后变成混居状态，凭借其政治影响捞取了朝圣贸易带来的利润。在崛起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影响下，不满情绪逐渐累积。场地由方济各会经营，后者令人生疑的战时活动我已第11章中详述过了。当地的方济各会（尽管不是整个的修道会）现在又一次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发生牵连。他们的纪念品商店将乌斯达莎和纳粹挂件与天主教挂件一起出售，而默主歌耶圣母被加进了新的民族主义图像当中。克罗地亚的独立日被定在圣母在村子里出现的纪念日那天。图季曼的扈从中最重要的强硬派，苏萨克，出生于该村，因而在此地留有影响。当1991年9月危机在本区爆发时，奥斯托季奇被谴责与塞尔维亚“切特尼克”有联系。作为警告，他们的坟墓被炸开——1991年间整个南斯拉夫冲突区域的普遍行为，一种否认本群体与本地历史渊源有关联的姿态。奥斯托季奇在来自其他被清洗村庄的难民的帮助下保卫自己。最后解决方案出现于1992年5月，当时村民们获得了一个路过的克罗地亚国

防委员会军队 (HVO, 波黑境内克罗地亚部队, 以下简称克族军队) 小分队的帮助。奥斯托季奇的将近 100 个人, 其中大都是男人, 被抓作俘虏带进一个沟壑, 然后杀死 (巴克斯, 1995; 塞尔斯, 1996; 第 5 章)。

然而整个科索沃省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即遏制暴力。这是南斯拉夫唯一的在整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爆发过严重冲突的地区。科索沃在 1989 年遭米洛舍维奇镇压之后曾是警察国家。正如朱达 (2000; 84) 指出的, 这是“一场两个民族之间为争夺对同样一块土地的控制权而进行的基本斗争”, 正如我的第 3 个种族论点。然而它在 90 年代末之前一直十分安静。因为该省有 85% 的阿尔巴尼亚人, 所以阿尔巴尼亚人无法被塞尔维亚当局控制。相邻的阿尔巴尼亚家乡国家也不能干预。阿尔巴尼亚强硬的共产党政权曾经让大多数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反感, 但它的后共产主义继任者正在解体。科索沃政治家可以随便决定他们自己的抵抗战术。易卜拉欣·鲁戈瓦的非暴力战略最终胜出。他的科索沃民族联盟抵制了塞尔维亚人负责的选举、学校、医院并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取代它们 (马利奎, 1995)。塞尔维亚权力机关准备让一切顺其自然。他们对科索沃的控制地位被国际承认, 而且他们也不想忙于其他地方的时候惹出事端。但是 1995 年的《代顿协议》让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控制合法化了。这削弱了鲁戈瓦的非暴力策略, 因为许多阿尔巴尼亚人转向了由科索沃解放军 (KLA) 倡议的武装斗争。当相邻的阿尔巴尼亚于 1997 年解体之后, 科索沃变成军火泛滥之地。最后一幕上演于 1998 年 2 月, 塞尔维亚警察和士兵企图消灭科索沃解放军。

鉴于这样的地方差异, 要回答历史性的反事实问题是不容易的——比如, 让当地人自己处理他们的差异会怎么样? 但是他们没有被赋予这样的权力。第三种局面占主导地位。平衡被来自外面的种族主义武装干预打破。在伏伊伏丁那塞尔维亚人中, 民主党领导人拉斯科维奇, 依赖于他在城市区域的核心拥护群, 这里有很多塞尔维亚人赞成与克罗地亚政府谈判。他有意识地代表在那里既是多数又是少数的塞尔维亚人, 并意识到克拉伊纳易受攻击的位置。他说

他不想在克罗地亚建立一个塞尔维亚国家或在克罗地亚建立一个自治省,只是分享地方权力。但是他的权力受到激进派民主党成员的挑战,他们主要来自利卡和达尔马提亚的农村地区,克宁镇是他们的据点。在克宁,他们组成了一个由牙医市长巴比奇和警督马蒂奇领导的“塞尔维亚民族议事会”。1990年8月他们的“关于塞尔维亚人民主权和自治的宣言”声称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凭借他们的地理、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是一个具有所有构成人民主权的权利的主权民族”。假如克罗地亚退出南斯拉夫联盟,他们宣称将寻求主权地位。他们就这样做了,并成立了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RSK)。

他们与米洛舍维奇、南斯拉夫人民军和塞尔维亚保安部门秘密警察联系之后胆子更大了,后者提供给他们武装与志愿者。这种联系在审讯米洛舍维奇时得到巴比奇本人(证人C-061)和两个情报官员的承认。在克宁,他们说,米洛舍维奇被称为“老板”,他亲自为被认为是独立的克拉伊纳共和国安排资金和武器。他们知道他们能够在地方武力炫耀中取胜。当克罗地亚内务部长过来协调时,他们聚集了一群怀有敌意的武装好的塞尔维亚人将他轰了出去。克宁副市长马库拉,一位英语教师和一个地方台的主任,正在展示一幅地方公决那天的地图。地图上大片的克罗地亚领土划在塞尔维亚管辖之下。马库拉夸口说:“我不希望会有战争,因为克罗地亚人不会有赢的机会……你必须使用杀戮去建造一个国家。”(转引自朱达,1997:181)除非克罗地亚屈服投降,否则这些陶醉于他们的小据点的激进的塞尔维亚人以后就会发现要留住克拉伊纳共和国是困难的,但是他们被其地方统治地位和米洛舍维奇的承诺麻痹了。

拉斯科维奇感到他被他所称的图季曼“过时的对国家和种族主权的要求”绊住了。图季曼宣称:“塞尔维亚人的领土自治完全不可能。我们不会允许它发生。”但是在10月,一系列在他的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和一个由温和的塞尔维亚医生武科切维奇率领的民主党代表团之间的严肃谈判开始了。据传克罗地亚代表正在作出让步。克罗地亚是“克罗地亚人的民族的国家”的词语将要从宪法中拿

掉,而经济上的怨忿将要给予解决。但当谈判尚在进行时,拉斯科维奇和武科切维奇被从内部受到破坏。克宁激进派泄漏了与图季曼的谈话录音,其中可以听到拉斯科维奇将他的塞尔维亚同胞称为“疯狂的人”——一个明显的讨价还价计策(“你必须对我作些让步以便我能操纵我的疯狂的极端分子”)。然而它使得巴比奇和马蒂奇罢免了他民主党领导人的位置。因为没有例行的党的争论和投票程序,强制就起了很大作用。已加入对立的塞尔维亚复兴党的温和的塞尔维亚人也被吓得不敢出声(朱达,1997:168—169;《时代》,1991年10月28日)。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让步的承诺从未受到测试,因为他们现在面临没有人愿意谈判的境地。克罗地亚秘密地为战争准备,以防万一,国外移民和强硬派的影响在增长。

奥西耶克很快感到更加致命的压力。赖克尔-柯的协调尝试在1991年7月1日由苏萨克派出的佩带武器的克罗地亚人从达尔马提亚到达这里的时候终止了。一个当地激进派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警察格拉瓦斯,向他们介绍了基本情况。前者害怕赖克尔-柯写下有关自己挑衅行为的档案材料,这些克罗地亚人向赖克尔-柯的汽车打了22发子弹,打死了他和他的塞尔维亚及克罗地亚帮手(其中一个奥西耶克市政当局的副主席)。对克罗地亚警察的控制权传到了格拉瓦斯和他的准军事部队手中(斯蒂特科瓦奇,1997:160)。作为回应,武科切维奇,民主党的温和派,被塞尔维亚民族议事会成员搁在了一边。克罗地亚人被迫向外移民,先从远离中心的村庄中开始,而南斯拉夫人民军队和准军事部队开始在德里纳河河边集结。9月3日迫击炮决战开始了。奥西耶克塞族人“发现他们受到南军队和克罗地亚人的两面夹攻”(《时代》评论,1991年12月2日)。不过,塞尔维亚的军事压力现在转向了武科瓦尔,而奥西耶克暂时保持了一阵子平静。

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动摇了。选举前他曾宣称:“我们的穆斯林比许多基督教欧洲民族离我们更近得多。”竞选运动涉及三个各自都能领导其社区的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卡拉季奇和他的副手比亚纳·普拉夫西奇,当时支持最大社区的领导人伊

泽特贝戈维奇担任波斯尼亚总统。但是,受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的影响,他们开始转变了。普拉夫西奇宣称:“600万塞尔维亚人能够去赴死,只要余下的600万能够活在自由之中。”凭着一个生物学教授的权威,她宣称种族情况是一种“自然现象”。卡拉季奇说:“这里的塞尔维亚人已为战争准备好了。如果任何人迫使他们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而活着,他们就准备战争。这个民族对种族灭绝记忆犹新(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91年7月,他无意中说出“我听说人们在武装起来,但是……塞尔维亚人不需要武装。如果他们受到进攻,它将意味着南斯拉夫受到进攻,所有塞尔维亚人将自愿加入南斯拉夫人民军去保卫国家”。因认为南人民军就在他身后,他威胁穆斯林代表:“如果你们决定战争,你们将会被从地球表面清理出去。”一旦敌对开始,他一遍遍重复说塞尔维亚人与穆斯林就不能生活在一起,因为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已经在“种族灭绝性的屠杀”的威胁下生活了70年(萨迪蒂奇,1998:84;《时代》,1993年5月3日)。与塞尔维亚在距离上的邻近让他胆子更大并变得激进化。他认为通过南人民军能够实现大塞尔维亚。他印证了我的第4个论点(46):压倒性的军事权力能够以极少代价实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目标。

米洛舍维奇的塞族社会主义党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党一直在本区举行会议、组织游行,数个月后,克罗地亚宣布独立。这些局外人没有特别权力。本地人还能够与外团体邻居讨论方案。他们收到视角各不相同的报纸电台和电视的消息。大规模的和平聚会在萨拉热窝、莫斯塔尔和巴尼亚卢卡举行。但是现在激进派在分发武器。当地塞尔维亚人因各种理由接受了它们:民族主义;拥有一件现代武器的愉悦;它带来的权力感;对如果拒绝就不算一个好塞尔维亚人或者真正的男人的恐惧。这使得许多像下面这个萨拉热窝男人一样的普通塞尔维亚人落入了陷阱:

我基本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知道将会有一场战争但是我不想承认。从一个咖啡吧回到家,我被我认识的民主党的人挡住……他们说“我们都必须拿起武器,否则我们全部要从这里

消失,这里可是有 80% 的穆斯林啊”……1 月 6 日是东正教圣诞节。很多地方出现开枪杀人的行为——试验——一个表示我们有多强大的信号。在所有宗教节日里人们都在开枪射击。这是件重要的事。我们比他们要害怕得多。(转引自朱达,1997:195)

第三阶段已到来:一种武装僵持激化为种族民族主义激进分子之间的暴力行动。但是克罗地亚政府包含温和派,它害怕南人民军。大多数社区态度犹豫。假如对本区没有进一步的外来的压力,以及假如两个群体实力基本相同,则共同的利益和威慑因素有可能会平息暴力并说服两边妥协。不幸的是,两个条件都未能满足——而这些才是发展到内战和谋杀性清洗的决定性升级行为。

塞尔维亚发起内战和谋杀性清洗

图季曼希望米洛舍维奇会退出,但他自己不会这么做,他准备承担一旦战争爆发所带来的后果。他走私武器,准备必要的话,迎接长期苦战。但是米洛舍维奇赌的是拥有足以轻松先发制胜的军事权力。这使得地方暴力变成了种族内战和谋杀性清洗。一旦事情开了头,在很少的克罗地亚人占得上风的地方,它们也升级了。但有一阵子,塞尔维亚政府是主要施害人。

1991 年 3 月米洛舍维奇已放弃了紧密联邦制度(A 计划),转而试图扩大塞尔维亚人控制的领土(B 计划)。他一再呼吁“所有塞尔维亚人在一个国家”。B 计划的代号是“军事路线”,这意味着暗中武装塞尔维亚本国外同胞社区。1991 年 5 月塞尔维亚保安部门最高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亲密伙伴,把他在克罗地亚的特工人员改编成一支被称为红色贝雷帽的准军事部队,以武装激进的国外的塞尔维亚人——以及后来用于杀害温和的塞尔维亚人(米利切维奇,即将出版)。这样被武装和给予帮助之后,本国外的塞尔维亚人就可以控制他们的小块领土,然后向他讨要一份战利品。他还乐意发出南人民

军行将入侵的威胁来为他们作策应：这将迫使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按他的条件进行谈判。很可能在夏末他真的草拟了一份南人民军入侵计划以防万一。这是他的 C 计划。代号为“RAM”，意思是“框”或“架”（朱达，1997：170）。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将很快重新划定塞尔维亚的边界，迫使许多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逃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新的塞尔维亚土地安全。米洛舍维奇料想这将仅需要运用威慑性镇压加上强迫向外移民手段，因为他等着之后与图季曼达成一个在他们之间分割波斯尼亚的协议。在海牙法庭，巴比奇引用米利塞维奇的话说，克罗地亚能够在“他们与我们确立新的边界之后”再离开联邦。

米洛舍维奇肯定想到过会有一些杀戮，尽管很可能完全不是在之后发生的暴行的规模上。C 计划包括了诸多误判。第一，他高估了塞族人的支持。1991 年 8 月的一次调查显示 78% 的塞尔维亚人倾向于不计一切代价地维持和平，然而有 55% 的人宣称：“我不想去打仗，但如果一定要你去，那你就必须去。”（《时代》1991 年 11 月 18 日）但是几乎没有人想到会有战争，而政府也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战时爱国主义需要时间和危机来培养。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的独立宣言来之突然。米洛舍维奇立刻命令后备役军人动员起来，然而很显然大多数塞尔维亚人几天内都没有响应。有关方面估计响应水平 50%，也许仅仅高出 30%。贝尔格莱德和伏伊伏丁那据说只有 15%—20% 的人响应。在城市，母亲们游行抗议她们儿子的被征入伍（戈迪，1999：126；《时代》，1991 年 9 月 30 日；扎布卡，1994：41）。不管塞尔维亚人会感到什么样的威胁，超过一半的人不想冒他们生命危险去对付它。

391 因为无法依赖整体的塞尔维亚人，米洛舍维奇不得不转而依靠他的两个核心拥护者。第一个是政党—国家。这方面有两个党（详述见威廉斯和西加，1996）。较大的党是米洛舍维奇的社会主义党，它的从战略上安置在国家机构和国有化工业当中的 5 万成员参与了战争努力。它与唯一一个允许其他官员加入的党结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SK—PJ）——据称是共产党（组织），以他妻子米里亚娜·

马科维奇为首领。这对南人民军军官团和将钱调拨到风险企业的国有化工企业老总很重要。十年之后,米洛舍维奇实际上承认了这 D 计划中的内容。在否定对他挪用政府资金为他个人所用的指控的过程中,他说,这资金实际上是用来资助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塞族军队的。他的律师接着说:“一直到今天,斯普斯卡共和国的军队的军饷还在由那笔钱支付。”(《洛杉矶时报》,2001 年 4 月 3 日)米洛舍维奇在这些经济行动中的直接作用在审判时得到了专家证人托基尔德森的确证。

他不让事情泄露,认为大多数塞尔维亚人和有些国家官员会不同意。大多数联邦官员没让参加行动。关键机构是塞尔维亚内务部,负责调遣红色贝雷帽,但是精选的南人民军将军也被邀请入席共商行动大计。战争然后使米洛舍维奇得以扩大他对国家的控制范围。对立的联邦内务部官员中的三分之二被强迫提早退休。1992 年 10 月武装的塞尔维亚秘密警察占领了它的大楼。两个部现在合并,然后功能扩大,这样内务部就统辖三个分部,大约有 3.5 万名秘密警察,一支实际上的私人军队(《时代》,1992 年 10 月 26 日)。这支部队将是清洗中的关键角色,特别是在科索沃。

但是米洛舍维奇没有担任一个极权主义甚至是一个非常官僚主义国家的首领。议会依然争吵不休,反对党媒体难以通融,文职部门和军队陷入派系化。《时代》(Vreme)对宗派活动,尤其是在军队的最高指挥部中的派系分裂倾向作了详尽报道,但多种辞职、退休和重新分派工作又逐渐提升了军队的凝聚力。米洛舍维奇的议会的根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众党的联盟。1992 年选举仅让他得到 29% 的选票和 40% 的席位。为了得到大多数的支持,他现在不得不与舍舍利极端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激进党(SRS)联手。在 1993 年选举中,在美国的压力下,米洛舍维奇支持万斯—欧文计划,舍弃波斯尼亚塞族人。他失去了舍舍利的支持,但由于重要的两派对手的离开,他扮演了和平缔造者的角色。他的得票率升至 37%,这给了他在议会中的 49% 的席位。他运用国家保护地位,通过贿赂少数反对党代表,使其站到了支持他的阵营一边(戈迪,1999:43—51)。通过利用他的对手

当中的分歧和模棱两可，他熬过了所有灾难而留在台上，直到2000年。

392

他还能依赖第二个核心拥护者，民族主义党和准军事部队。虽然大多数塞尔维亚人躲过了兵役，但相当的少数派人群还是自愿加入战争。其中一些志愿者直接到前线加入了南人民军部队，其他人去了地方卫戍部队，但很多人加入了具有像“切特尼克”、“塞尔维亚骑士”、“塞尔维亚卫兵”、“杜桑大帝”^{*}、“白鹰”和“塞尔维亚卫兵”（更多时被称为“阿尔坎猛虎”）等名称的准军事部队。据说大多数志愿者是来自农村的塞尔维亚人，经常是侨民。有人说罪犯在他们的队伍中，把他们释放出来就为了让他们去杀人（瓦西奇，1996）。有些人强调他们的贫穷（米勒，2000）。西卡维卡说军官是小资产阶级，“前酒吧老板，自雇的卡车司机和仓库管理员”，而普通士兵来自“下层社会”（1997：140）。我对此都表示怀疑，但我们缺乏有关他们背景的真实数据。普通的男性兵役和积极的预备役制度意味着一支大规模富有经验的准军事部队只能从少数的预备役军人当中集合起来。军事权力不依凭多数。它仅需要几千个塞尔维亚人提供一支具有不同动机——被点燃的爱国主义，追求冒险刺激，就业生存或者抢劫财物——的受欢迎的军队。

与米洛舍维奇不同，准军事部队领导人公开呼吁清洗。白鹰首领米尔科·约维奇说，“我们不仅对塞尔维亚感兴趣，而且还对一个不带寺庙或没有无宗教信仰者的基督教、东正教、塞尔维亚感兴趣”；“我全力支持‘清洗行动’。我看到他们当中（虽然他们是克罗地亚人）有漂亮的小伙在笑着。他们从未经历过种族灭绝，所以应该给予他们机会看看它是什么样的。我强烈支持对克罗地亚人的种族灭绝！为此他们应该被给予武器，越多越好，他们的抵抗将会延续更长时间，而恰因这样，我们就有机会一劳永逸地彻底除掉他们”。切特尼克头头舍舍利，即塞尔维亚激进党领袖，宣称“我们必须割断克

* 塞尔维亚中世纪的一位君主 Dusan the Mighty，这里应指 Stephen Dusan，1331—1355。

地亚人的喉咙,不是用刀,而是用生了锈的汤匙”。在议会,他威胁非塞尔维亚代表:“你们可以确信,当塞尔维亚政府发生政变时,我们将驱逐你们所有的人……我们不会杀你们,我们只是将你们装在卡车上。”“克罗地亚人应当搬到这个国家的边疆之外的地方。”社会主义党代表大声表示赞同:“他们就应该这样!”另一个人宣称:“我的目标不仅是保护塞尔维亚人不受侵犯而且还要清洗领土,获得一个种族干净的国家。”(格梅克,1993:302—309;《时代》,1991年12月9日,4月6日,1992;威廉斯与西加,1996:17)

这两个核心拥护者共享着一种文化,它孕育于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然后是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的环境。它们在物质上也相互关联。阿尔坎猛虎是由塞尔维亚内务部武装和培训的,舍舍利的切特尼克是由南人民军武装和培训的。阿尔坎的秘书(证人 B-129)在米洛舍维奇受审时说,当她需要政府帮助时,她就拎起电话说一声“蜘蛛”(pauk)。这个秘密代号将她直接连接到红色贝雷帽的指挥官那里。她说她给阿尔坎交待任务,然后寄出她已装好数百万德国马克的大邮包。舍舍利不隐瞒米洛舍维奇给予的帮助,告诉 BBC:“米洛舍维奇安排好一切。我们寻找志愿者,而他给我们专门的装备……所有我们的制服、武器、军事技术和军车。所有我们的部队总是在卡拉伊纳,或斯普斯卡共和国,或南斯拉夫军队的指挥之下。”(BBC,1998;西尔伯与利特尔,1995:230)罗恩(2000)将准军事部队看成是“国家分包商”,按米洛舍维奇要求做事,但允许他不对其行为担当责任。罗恩还揭示在塞尔维亚的独立小国家,平行网络将地方准军事部队和地方政治家联结在一起。米利切维奇(即出)也强调保安部门(秘密警察)对准军事部队分遣队的控制。惹人讨厌的领导人神秘被杀——就像 1991 年的前罪犯贝利和吉斯卡一样。一支由非合作性分遣队组成的准军事团体被解散了。

尽管如此,控制依然是不完善的。上阵后,大多数准解散部队被正式纳入了南人民军指挥体系,但现实中它们仍按自己意愿行动,而米洛舍维奇一半担任发起者,一半又要为这些极端分子尽义务。难民们与日俱增地积累着他们强烈的愤怒。到 1992 年年末塞尔维亚

有超过 55 万的难民,他们从其他地方被清洗出来,是反映该政权可耻失败的显著标志。米洛舍维奇迫不及待地想驱散他们。1995 年,他们的数字猛增,此时克罗地亚已重新夺取了克拉伊纳。这可能最终促成了米洛舍维奇清洗科索沃的计划,因为这是为他解决难民问题的出路。但是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抵抗迫使他采取了比他原来打算的更加激进的计划。

巴比奇说有两路指挥系统,他们都向米洛舍维奇汇报。一个涉及南人民军,另一个是治安部队和准军事部队。但是他们也不得不保持紧密联系,若没有南人民军,民族主义准军事部队不会获得弹药或坦克支持,僵持局面就会出现。在 1991 年 7 月窃听到的电话会议中,卡拉季奇向米洛舍维奇要求更多的帮助。

米洛舍维奇:跟乌泽拉茨讲(参谋部长,萨拉热窝军团),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与我联系。

卡拉季奇:我在库普里斯(在波斯尼亚中部)遇到一些问题。那里有相当一部分塞尔维亚人不听话。

米洛舍维奇:别担心,我们会解决的。你就跟乌泽拉茨打电话吧……别担心,你会有一切。我们有实力。

卡拉季奇:是的,是的。

米洛舍维奇:别担心。只要军队在那里,没人敢碰我们。

卡拉季奇:好的。但对……轰炸,怎么办?

米洛舍维奇:今天空军行动不太方便,因为欧共体正在举行一个会议……(转引自《时代》,1991 年 9 月 30 日)

米洛舍维奇在此似乎对南人民军控制“相当部分”反对战争的“不听话”的塞尔维亚人的实力很自信。在 1991 年 11 月南人民军正式从克罗地亚撤军之后,新的塞尔维亚独立小国军队从南人民军部队中组成。但是军队的表现,不管它的取名多么正式,都因士气低落而令人失望。早至 1991 年 12 月时已有数千名士兵逃离前线(《时代》,1991 年 12 月 9 日,1992 年 4 月 6 日)。尽管有人数和装

备优势，它也不能长期维持对小规模然而意志坚决的抵抗力量的攻击性步兵战争。南人民军远不是纳粹党卫队，或甚至不如国防军。

但是，不幸的是，这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南人民军士气太低，以至于不能运用快速的步兵推进方式攻占村庄和镇子。所以它运用其大规模炮火优势不加区分地向村镇发射雨点般的炮弹，炸死了许多平民。军队驻扎在武科瓦尔正前方，保持不间断地破坏该市长达四个月。这样无情的战争在现代战争中是常见的，像美国对越南和对中立的柬埔寨的轰炸表明的那样。北约 1999 年对塞尔维亚的高空轰炸是另一个运用优势资源而以极小代价取胜的南斯拉夫例子。从 1991 年到 1994 年只有塞尔维亚领导人能够貌似合理地认为他们拥有这样一种低风险的超量杀戮战略的手段。我们不需要对谋杀性塞尔维亚人的种族成见，这里本身存在着走向暴行的战术诱惑。当抵抗最终在轰炸面前崩溃，准军事部队就被派过去杀掉他们——带着杀戮、强奸或抢劫的特许权。在被问及为什么南人民军没有丢弃这些恶棍时，一位将军回答说：“因为他们是唯一准备要价的人。”（《时代》，3 月 8 日，1993）截至 1993 年，7 万人的准军事部队活动在德里纳河西岸（塞尔维亚的分界线），是南人民军本身的一半规模（扎布卡，1994：59—60）。米洛舍维奇的 C 计划已经蜕变为更野蛮的 D 计划。

南人民军军官团内存在分歧。一些军官抗议暴行。中校厄里米贾报告司令部“来自塞尔维亚的准军事编队”的主要目标“不是与敌人战斗，而是抢劫公共财产和骚扰无辜的克罗地亚人”。他描述了拷打和杀戮平民的细节，并埋怨这方面“反面影响了师部队的士气”。他的报告引起一阵骚动但非行动。在米洛舍维奇受审时，瓦西列维奇将军，南人民军保安部门的负责人，说和其他将军一再埋怨准军事部队和红色贝雷帽的暴行，但没引起任何反应。另一位军官说：“军队不可能逮捕那些（准军事部队）……它会看上去像是逮捕了自己的盟友。”（《时代》，1991 年 12 月 9 日，1992 年 3 月 9 日）在准军事部队和正规军之间出现了武装冲突，在将军之间出现了大声嚷嚷的

395 争吵。强硬派为首的将军是阿季奇,他说他有 50 名亲戚在“二战”中被乌斯塔莎杀死了。在还是一个小男孩时,他曾藏在树上,眼见着自己的父亲在下面被杀。据说他曾告诉温和派的克罗地亚政治家梅西奇,“你们已经杀过我们一次了,而我不会允许你们再做第二次”(《时代》,1992 年 5 月 11 日)。米洛舍维奇 1992 年 5 月设法确立了对军队的更多控制权,清洗了 38 名将军,终止了军队的联邦自决权。战争的“夜雾”(掩护)允许他这样做,正如允许其他人谋杀一样。

1991 年 11 月,克罗地亚四分之一的国土被占领,包括大多数含有塞族人口的地区。大塞尔维亚中的克罗地亚部分已经实现了。

塞尔维亚人然后发起对波斯尼亚的入侵。到 1991 年 2 月,伊泽特贝戈维奇已意识到他的危险并激进化了,宣称:“我将为一个主权地位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牺牲和平,然而为了波斯尼亚的和平,我不会牺牲主权。”(西尔伯与利特尔,1995 年:233)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 1991 年 12 月投票反对波斯尼亚从南斯拉夫联邦退出,而穆斯林与克罗地亚人则抵制选举。卡拉季奇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斯普斯卡共和国。1992 年 5 月,波斯尼亚穆斯林与克罗地亚代表以压倒性投票赞成自身取得独立地位。这些公投实际上是在让人民投票赞成或反对自己的民族,所以极少有人敢反对。

塞尔维亚部队重复他们在波斯尼亚的战术。南人民军部队 1992 年 4 月开始与波斯尼亚部队作战。到 5 月份,他们中 80% 是由波斯尼亚塞族人组成的,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与威胁斗争。南人民军 6 月撤退,其装备留给了斯普斯卡共和国军队和地方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军队轰炸再次到来,继而是可怕的肃清残敌。起初,塞尔维亚领导人又一次过分自信于快速获胜。他们嘲笑穆斯林软弱,让他们去责怪“艾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挑起一场将导致他们彻底毁灭的战争。他们攻打萨拉热窝时后者还包括 5 万名塞族人,他们随后经历了塞尔维亚同胞发动的长达一年的轰炸。卡拉季奇认为他能够在六天之内攻下城市,结束战争。据说当他和他的扈从逃离萨拉热窝往山上去时,他们只准备了三四天的干净内衣。事实上,在 9 个月之后,塞尔维亚部队才攻下了 70% 的波斯尼亚。其意图通常不是种

族灭绝,而是通过谋杀性清洗把穆斯林和克族人吓跑。

随着战争的进行,它变得更加可怕和更加地具有组织性。斯雷布雷尼察是一个穆斯林占多数并对波斯尼亚塞族人具有很大战略价值的城市。如果波斯尼亚人占据它,这就能阻止塞族人形成一个与毗邻的塞尔维亚连成一片的地方集团。因此,波斯尼亚塞族总统卡拉季奇 1995 年 3 月对他的部队发布了无情的“第七号命令”：“根据周密思考的作战方案,给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居民制造出一种无法忍受的并且没有进一步生存或活着的希望的彻底不安全的氛围。”上校奥格涅诺维奇,攻城的第一指挥官,1994 年 7 月给他的军官及士兵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要让敌人生不如死,让他们在飞地的临时停留变得不可能,这样他们就会意识到无法在飞地生存,并尽快全部离开这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卷宗 IT-98-33/1)。在经过长时间的攻城之后,1995 年 7 月 11 日,塞尔维亚部队突然踏上了飞地。那里的穆斯林妇女、儿童和年长者已逃往附近的联合国在波托卡里的营地,而大多数男人(其中 1 万到 1.5 万人,包括 3000—5000 名士兵,根本没有武器)企图逃向波斯尼亚阵地。有 7000 到 8000 个男人被捉住,而将他们全部杀光的决定,可能就在 7 月 13 日这天作出,其时塞尔维亚人大量地丢弃了被俘者的身份文件,使得辨认成为不可能。他们在接下来的 3 天被德里纳军团、治安部队与宪兵部队以及准军事部队的协调行动以大规模的特别行动队风格的处决方式杀死。死者包括男孩和年长男子,而不只是那些在战斗年龄的男人。通过公开的电话线路,军官们谈起“打包分配”,意思是杀人和他们的尸体处理。上校比拉在一次与他的上级克尔斯蒂奇将军通话中显得焦躁不安,一次次请求他帮助:

比拉: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真的。还有 3500 个包裹我必须分出去,而我没有办法。

克尔斯蒂奇:妈的,我来想想办法。

斯雷布雷尼察袭击当然是种族灭绝事件,而克尔斯蒂奇后来也

在海牙被控以协助与唆使种族灭绝罪,因为自7月13日起,是他主持德里纳军团,并出席了作出杀戮决定的会议,同时他允许他自己的士兵参与杀戮。他被判处入狱46年,上诉后减为35年。虽然某些军官表示了对任务的厌恶,但似乎无人拒绝过谋杀命令。卡拉季奇曾发起所有这些杀戮行动,现又直接与另一桩事件牵连。在海牙,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官员德隆尼奇承认于1992年5月发动了一次针对穆斯林村庄格洛古瓦的袭击,其中60个男人被残酷处决,数十所房屋被烧毁,而妇女和儿童遭到驱逐。他说他将所干的事报告给了3位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领导人,包括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他们的回应是一阵鼓掌(卷宗IT-02-61)。

到科索沃屈服于清洗时,计划更带有预谋性。在审判米洛舍维奇时,证人塔尼奇声称到1997年年中时米洛舍维奇正从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谈判转向谋杀性清洗。塔尼奇说,计划是杀掉少数人,烧毁多家房屋,以及将足够的阿尔巴尼亚人赶往国外以便使他们在科索沃的人数从接近150万下降到远低于100万,将塞尔维亚人迁入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间。当陆军参谋长珀西奇反对准备动作时——包括为警察部队提供武器——米洛舍维奇免去了他的职务,创造一个特别的由他个人控制的指挥系统。几位证人,包括英国维和人员和英国政治家帕迪·阿什当,作证说村庄1998年受到清洗(德鲁威恩基威茨,恰尔格林基与阿什当,IT-02-54,2002年3—4月)。这激起了一次科索沃解放军的起义。米洛舍维奇好像又增加了连续不停的儆戒性镇压手段来消灭科索沃解放军。他随后退出了在朗布依埃举行的和平谈判,尽管他没有得到任何可以妥协的激励因素。他已被告知北约现在要轰炸塞尔维亚,但是认为(并非没有理由)一旦引起平民伤亡,北约国家将不会支持轰炸行动。但是,当他利用轰炸给予的表面机会而在1999年3—4月间执行政治灭绝政策时,他是误判了形势。

397

有十几名证人在米洛舍维奇接受审判时作证证实了进攻村庄的相同模式。第一,村庄被包围,短暂的进攻开始。然后陆军、警察以及准军事部队的混合部队进入村庄,朝一些男人射击,趁他们的房屋

在燃烧之时,将所有人集中一起赶到大路上。它是高度有组织的。大约有 1 万阿尔巴尼亚人被杀,其中绝大多数是男人,而有 50 万到 80 万的阿尔巴尼亚人逃入了邻近国家。实际上所有难民都说他们是在逃离塞尔维亚人的进攻,而不是北约的轰炸。系统性的统计分析也支持大多数的难民逃亡和大多数的杀戮是由塞尔维亚进攻而不是北约轰炸引起的判断(鲍尔等,2002:鲍尔在米洛舍维奇受审时的证词,IT02—54,2002 年 3 月 13 日;人权医师组织,1999:40—42)。但这具有加强北约决心的效果。北约公共舆论对米洛舍维奇的谋杀性清洗的惊骇程度较之对北约轰炸要高得多。他被迫祈求屈辱的和平。两年之后,这导致了他的倒台。

普通塞尔维亚人

要说有多少普通塞尔维亚人支持了这些清洗行动是不可能的。一位当地人估计,有 30% 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断然不同意,而有 60% 的人“同意或者糊里糊涂地随大流。他们由 10% 的持枪的人和 控制电视塔的人带领着。这就是他们需要的一切”。他的采访记者引用埃德蒙·伯克的话说:“邪恶取胜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好人什么事也不干。”(马斯,1996:106—108)米勒(2000)认为小股的武装匪徒能够占领社区,恐吓他们一起合伙行动。在维舍格勒,米兰·卢奇克团伙(见后面)只有 15—20 个人。他们在杀死了当时帮助穆斯林逃跑的当地民主党副主席之后没有受到挑战。在弗拉塞尼察,伊玛目说塞尔维亚牧师曾经帮助过穆斯林,但当他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心时,他停下来了。帮助穆斯林朋友的塞尔维亚人照例是受到殴打,偶尔还被杀害。奥马尔斯卡集中营也包含一些塞尔维亚政治犯,至少其中一个被杀害了。一位斯雷布雷尼察的塞尔维亚妇女说极端分子“晚上一直给我们打电话。他们不停地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搬出去,穆斯林就会杀掉我们。但是我不怕穆斯林,我害怕这些塞尔维亚人”。一位穆斯林囚犯说,作为“好人、诚实的塞尔维亚人”的卫兵时间呆不长;他们被送到前线——各方的一个共同做法。军队

中的军官获授权处决那些拒绝执行谋杀性命令的士兵。所以异议只能在私下。一个塞尔维亚卫兵悄悄告诉穆斯林囚犯说：“我想放你走，但是我不敢这么做。我从未想要这场战争。我有穆斯林邻居。我告诉他们我不想打仗，后来我被打了一顿。”（朱达，1997：237；沙夫，1997：129；西卡维卡，1997：142；乌多维基与斯蒂特科瓦奇，1997：188,209；《时代》，1992年8月20日；以及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尼科里奇和厄尔德蒙维奇审判记录）

398

记者彼得·马斯开始理解这种恐惧了。“我也许不是一个人默默支持这场肮脏战争的塞尔维亚人感到义愤。如果换了我，我会大声说出来。在我没有处在他们的位置时我是这么想。”他正在和另两个记者一起寻找一个听说的监狱营。塞尔维亚士兵命令他们离开那个区域。他们不理睬命令，试图走另一条路线，但是他们的汽车被一个高度武装的塞尔维亚巡逻队挡住了。因担心发生最坏结果，他们被护送到一个破败的咖啡厅。巡逻队头头，被别人称为“沃贾·切特尼克”，开始对一个瘦瘦的喝着咖啡的中年穆斯林男人大叫。“滚开，你这脏货！”他怒吼着，然后开始殴打他，先用一个酒瓶，再用他的拳头。他用他的来复枪猛击波斯尼亚人胸膛，然后打开保险栓。突然那男人的妻子出现了，她跑过来，一下用身体挡在丈夫和沃贾之间。这似乎打断了沃贾腾升的愤怒。他又踢了那男人几下，然后，似乎厌倦了，便转身走了。那男人爬起来坐稳。但这完全不是马斯和他的两个同伴的功劳，他们一个手指也没帮一下。正如看着邻居被开枪打死的塞尔维亚人一样，马斯冷嘲地总结（1996：20—21）。

但是军事权力还有更加微妙的影响。面临威胁，当地人把自己武装起来。军火商带着抢来的南人民军重武器出现在他们面前。庞大数量的南人民军武器流失了——1.5万支来复枪、600发炮弹、500挺机枪、3万枚手榴弹等等（《时代》，1992年6月1日）。爱国商人只出售给他们自己这边的人；纯粹的中间商出售给所有人。商人会出现在塞尔维亚人占多数的村庄，然后“私下里”告知塞尔维亚人附近的穆斯林人准备攻打他们。许多塞尔维亚人会买他的武器，以备万

一。然后他会跑到穆斯林那里再故伎重演(乌多维基与斯蒂特科瓦奇,1997:180)。有枪的男人更可能使用它们。解放一个城镇的塞尔维亚人有时会无偿地将武器分发给当地塞尔维亚人,甚至是妇女和儿童,以让他们也共同参与进来。新兵被命令用杀人(也许是去杀一个邻居)去证明他们的忠诚。甚至穆斯林有时也加入塞尔维亚征兵,以为这是唯一能让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呆在家里的办法。一旦加入了,这些人就落入陷阱,而有些人变得适应了。然后想要抗命不从就困难了。

清洗有时受到欢迎。少数群众大声疾呼着要血债血还。一位记者见到一群塞尔维亚暴民跟随着一支护送被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虐待的穆斯林男人、妇女和孩子的车队“疾驰经过一片浅草地,口中喊着‘杀死他们,杀死他们’”(沙夫,1997:137)。愤怒从报复对自己的朋友或家人施加的暴行的欲望中产生。以下是萨迪蒂奇对一位来自克拉维卡的塞尔维亚人的审问,关于在附近布拉图纳克足球场发生的残杀穆斯林行为(我将在后面描述该事件)。萨迪蒂奇问:

“在(穆斯林)发动的圣诞进攻之后——当时来自克拉维卡的人是难民……男人们非常痛苦,是不是?”

“他们很愤怒。”

“区里每个人都很愤怒吗?”

“每一个人。”

“他们说些什么?”

“复仇。”

“他们跟你讲什么?”

“他们说,‘……迟早我们的五分钟会到来’。”

“在他们夺回克拉维卡,发现墓地中所有尸体和被打开的坟墓之后?”

“或早或晚。”

“而机会终于来了。”

“是的”

“复仇。”

“是的，血仇。”

“是他们来找你的吗？”

“他们说，‘带上你的枪到足球场去。’”……

“从克拉维卡来的人也去了？”

“他们想尽量多杀掉一点他们的人。”

“所以他们再也不能回来报复？他们没有足够的到达军事年龄的人再杀过来？”

“再也没有。”

这个人的父亲然后承认他去了球场。萨迪蒂奇问他：

“将他们全部杀死是件很荣耀的事吗？”

“当然。这是一场公平的较量。绝对。”（萨迪蒂奇，1998：350—352）

一场“公平的较量”似乎是对集体处决没有武装的平民的一种歪曲的描述，但是这位老人真正说的是，报复对以前的剥夺和羞辱来说是公平的。他在描述一种从群体的恐惧和屈辱感中产生出来的集体愤怒，相当于卡茨（1988）描述的代表许多美国杀人行为特点的那种逐步升级的个人情感。两边的凶手都不是预先就知道他们将要去杀人。他们认为他们是突然被激怒的。

汤普森（1992：276）说克拉伊纳是“一个激怒实验室”。一位加拿大的联合国维和人员说，起初“我相信我们是在面临一场种族冲突，天主教徒憎恶穆斯林或反之”。但当一位年长的克罗地亚人对施加在他的穆斯林朋友身上的恐怖行为感到绝望而自杀身亡时，他改变了看法：

从那一刻起，我明白它不是一种宗教战争……而是……某种人为的东西；一个挑起事端和暴力的企图，希望最终那些事件会激起仇恨、报复，从而，在对他们的家庭成员或朋友施加了暴

行之后,达到对那些相互仇恨的人的控制……似乎存在着一股来自上层的力量让他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布拉什基奇审判,1998年4月20日)

激进派还控制了意识形态权力机构。一旦夺取一个社区,他们就切断媒体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出版社、电视和广播必须要接受爱国主义检查并进行自我检查。在一场战争期间我们听到的是敌人的暴行,不是我们自己的。南斯拉夫媒体将暴行放在以“二战”为中心的叙述框架之内。媒体描述是扭曲的,有些是伪造的。塞尔维亚人割下克罗地亚人喉管的录像带被作为乌斯塔莎暴行在塞尔维亚电视上播放。意识形态主义者将“切特尼克”、“乌斯塔莎”、“土耳其人”和“原教旨主义者”等称号化为对敌人的常态描述(博蒂卡等,1992:197;汤普森,1994)。激进派不具备通过灌输让人改变的魔力,但这是战争。甚至超越民族地域偏见的世界主义专业人士也发现难以做到不偏不倚。一位塞尔维亚建筑师试图引起他的同事对克罗地亚的历史古镇及纪念碑被毁的谴责。他失败了。有人反驳道:“它们的每一处痕迹都应该清除。他们想什么呢?他们在屠杀我们孩子的时候,竟要我们保护爱惜他们的纪念碑?”“中间”立场来自某位建筑师,他反对谋杀和毁灭,而发出一个装满机枪的教堂还是不是一个教堂的疑问(《时代》,1992年5月18日)。

激进派还掌握着地方经济权力。武装好的激进派从南人民军、他们的受害人、援助机构和联合国士兵那里盗取资源,抽走一部分为己所用,其余的分派给他们自己的社区。他们控制了企业、住房和就业。生存对没有机会得到这些资源的难民变得艰难。签约受雇于某种准军事行动为许多男人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了生计。

这些权力带来了各种不一样的地方情感。巴比奇,克宁的塞尔维亚领导人,派遣武装人员始终不间断地去敲击拒不服从的人家的门,问他们为何不自愿行动。格伦尼(1993:20)说这是“一幅很有说服力的普遍恐惧的景象,巴比奇为保证秩序而制造了这样一种景象”。然而恐惧与羞耻感缠绕在一起(“你是一个懦夫还是一个真正

的塞尔维亚人?”),因为巴比奇在镇子中颇受欢迎。在以塞尔维亚人为主的特斯里奇直到1992年5月才出现暴力行为,尽管塞族和穆斯林/克罗地亚社区已经隔离。然后一个由23人组成的塞尔维亚准军事团体“米卡斯”,在塞尔维亚权力机关发现他们过于野蛮而把他们从巴尼亚卢卡逐出之后,来到这里。米卡斯对特斯里奇运用恐吓伎俩,抢劫、强奸和谋杀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然后他们又被忠于克拉伊纳共和国的塞族部队赶了出去。事态平息下来,直到镇中塞族难民的不增加引起更多的对非塞族人的攻击。然而许多塞族人在保护自己的邻居,有些人是通过与他们结婚的方式。在不到一个月之内出现了100对混族通婚的情况,这激怒了各方的激进分子。

生活对那些拥有混合族性特点的人很难。一位萨拉热窝大学教授有一个黑山族的父亲和一个克罗地亚族的母亲。她接到过一个同事骂她“乌斯达莎母亲”的电话。一群“愤怒和强壮的”塞尔维亚人,包括一个童年时的朋友,谴责她与“乌斯达莎”有关系。一个人想杀了她,但她还是被投进了监狱。她受到“与栏杆那一边我的穆斯林狱友一样的待遇,被一班卫兵殴打,再由另一班卫兵喂饭”。一个穆斯林罪犯说当他看见在监狱中“我们塞尔维亚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相处得是多么好,我猜想我们在狱中的人要比外面的人活得更好。我甚至想到把我的妻子和孩子带在我身边,一起去监狱”(《时代》,1992年4月13日,6月29日,8月10日)。

达斯科·塔迪奇,一个小角色,是第一个遭起诉的战犯。他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1955年出生在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科扎拉克镇。他的父亲、祖父和两个叔叔都跟随铁托游击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贝尔格莱德接受中等技术教育,到各地做建筑工,然后回到科扎拉克,在此他教授空手道并经营一家咖啡酒吧。他长得结实有力,以对一个空手道学生及他的妻子使用暴力而出了名。1989年他声称他的16岁侄女遭穆斯林男孩强奸。塔迪奇凌晨3点进入他们的房间,控住女孩,痛殴男孩,然后把他们扔到楼下。那女孩后来说她的叔叔逼迫她编造了强奸故事。他因看见他的侄女和穆斯林一起跳舞喝酒而失去自制。但是警察认为他在伪造当地穆斯林对塞

族人构成威胁的证据。他的酒吧也让他背上了对穆斯林债主的债务。因在日益加剧的政治紧张关系中进退两难,1990年他加入了当地塞族的社会主义党。很快该党就在他家里开会。他禁止穆斯林进入他的酒吧——鉴于他的经济状况,这并不是非常工具理性。1992年5月塞尔维亚部队进攻科扎拉克。塔迪奇可能帮助指挥了他们的炮击。当塞尔维亚人占领了该镇之后,他将领头的波斯尼亚人挑出来处决,成为了科扎拉克社会主义党的头,尔后他在塞尔维亚警察部门中工作。他承认谴责过与穆斯林结婚的塞尔维亚人,同时他还参与过在可怕的奥马尔斯卡监狱集中营的暴行。他杀死了5名波斯尼亚平民,伴随着“难以置信的暴力”(即严刑拷打)。他被判处20年监禁。塔迪奇不是什么特殊人物,只是一个想让自己过得更好的工人阶级,但也是一个具有暴力倾向和暴力手段的种族偏执分子(国际法庭案卷-94-1;沙夫,1997)。

德拉曾·厄尔德蒙维奇是第一个坦白并忏悔罪行的人。他是一名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1972年生于一个天主教工人阶级家庭。他既无民族主义背景也没有犯罪记录。他学了锁匠技艺但未被雇佣,所以在1990年加入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军队。然后他转到了克族军队,波斯尼亚克族军队,之后又转入到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军队以便与他的塞尔维亚女朋友结婚并和她一起住到塞尔维亚控制的领土上。因为他是一名有经验的士兵,军队是他最好的就业机会,而薪水和塞尔维亚人一起涨。作为塞尔维亚编队中的克罗地亚人,他感到很容易受到来自上级的压力。他被擢升至中士,但一个月后就因为与他的军官意见不合而遭降级。同样还是这个军官,让厄尔德蒙维奇的部队到布拉图纳克足球场,然后杀死用整车装载来的没有武器的穆斯林男子。厄尔德蒙维奇以前没杀过人,所以拒绝了,说:“你是不是不正常?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他的军官回答:“如果你不想干,那就和他们站在一起这样……我们能够把你也杀掉或者给他们武器,好让他们干掉你。”他说如果他不是已结婚并有一个孩子,他将会逃走。但是那天他服从了命令并杀死了70个人。临近末尾,军官将卡拉什尼科夫枪(属苏联步枪)递给惊恐的汽车驾驶

员,说“你们必须每人干掉一个”,这样“以后就没有人会忍不住说出去”。厄尔德蒙维奇之后拒绝再杀另一批穆斯林,得到了另外三个人的支持。有四人在十名来自受到穆斯林进攻的村庄的塞尔维亚部队士兵援助下,同意了射击。军官有了足够的自愿者,所以他让厄尔德蒙维奇一个人呆着,没参与。他似乎与塔迪奇不同——被可信的威胁吓倒,又表示出某种不情愿。他被判了 25 年(霍尼格与博思,1996:62—63;国际法庭 -1996 -22;罗德,1997)。

戈兰·杰利西奇负责指挥卢卡战俘集中营。他出生在附近某地,很早就离开了学校,做过农场机械工。1991 年他因诈骗被判处 3 年监禁。1992 年 5 月他穿着一身警服回来。目击者说他是“一个肩负清洗穆斯林,为塞尔维亚人民创造一块干净领土的使命的人”。他说那些“偶然生存下来的穆斯林……只能做奴隶”。他对穆斯林囚犯宣称:“你们的命在我手中,只有 5%—10% 的人能离开这里。”“他像是疯了一样不断东奔西跑,他吓人地大声叫嚷着,显得好像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的一样。为了向我们显示他的权力,他命令把一名被拘留者带过来,然后当我们的面殴打他。”他曾杀死了带着武器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成员和波斯尼亚人,并任意发动暴力行动恐吓其余的人;“他对我们像待动物、野兽……他想要恐吓我们”。他开枪将一名帮助囚犯的塞尔维亚卫兵打死。杰利西奇喜欢称自己是“塞尔维亚的阿道夫”,并且不明智地对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也这么说。他被判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但不是种族灭绝罪,所以处以 40 年的监禁。精神病专家说他没有精神病,但是具有“很深的人格障碍,具有反社会和自恋倾向”(国际刑事法庭 -95 -10 -A,夏季判决,1999 年 12 月 14 日)。他似乎是一个因激进的战时民族主义合法化而走向犯罪的施虐狂。

米兰·卢基奇来自靠近维舍格勒、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交界处的一个以波斯尼亚人为主的村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的家庭曾是当时的切特尼克,为报复乌斯达莎对他祖父的谋杀,杀死了当地穆斯林。他 1967 年出生于米兰,在学校时身体健壮,相貌英俊,且人缘很好。他未能从中学毕业就去了贝尔格莱德。亲戚为他在塞尔维亚

警察机关谋了一份差事,但是他后来在欧洲闲荡,有可能还抢了一家瑞士珠宝店。他很可能是塞尔维亚保安部门打击克罗地亚流亡者运动中的一个次要角色。他参与了战斗,尽管他曾经有一次从塞尔维亚人的刀口下救下了一位穆斯林朋友。1992 年 4 月他作为一名塞尔维亚准军事自愿者回到维舍格勒。他的警察关系和他自己的强势使他成为一个准军事团伙——白鹰——最暴力的组织的领导人。它的成员射杀和溺死穆斯林男人,强奸妇女,还抢劫和烧毁房屋。在他的帮助下,维舍格勒从有三分之二的穆斯林变成塞尔维亚人占到 96%。卢基奇得到了一辆德国汽车和一个比萨饼小店。当地塞尔维亚人对他意见不一。“许多人感到羞耻,但其他人则说穆斯林是罪有应得。”一个人说。卢基奇后来告诉一个医生他为杀死了这么多穆斯林感到自豪,并且说他还想再去杀他们。他已受到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但仍然在逃。2003 年他被贝尔格莱德一法院缺席判处 20 年监禁,法院“无可辩驳地认定”他与他的团伙劫持过 12 名穆斯林,“在那里拷打他们、虐待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到德里纳河河岸后将他们杀死”(大赦国际,新闻服务公司,10 月 1 日,2003;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卷宗 IT-98-32 号,卢基奇和瓦西列维奇;萨迪蒂奇,1998:66,120—121,355—356)。这是工人阶级其中的一个年轻人,身体强壮,通过运用暴力才获得了地位和物质利益。

米兰·科瓦切维奇,体重 225 英镑,身材像一个肌肉松垂的重量级拳手。他现在举止还是像一个拳击手,马斯说(1996:36—39)。幼时他曾住在雅瑟诺瓦,“二战”时主要的乌斯达莎杀戮营。可怕的讽刺是,1992 年他在管理奥马尔斯卡集中营,同时宣称:“他们犯过战争罪,现在是反过来了。”他受过良好教育,并成为一名麻醉学家。他 1990 年加入塞尔维亚民主党,并且升得很快。第二年他成为普里耶多尔民主党危机处理参谋部副部长,主管秘密警察和地方军队。1992 年 4 月他策划了普里耶多尔的塞尔维亚政变。武利亚米描述了 1992 年和 1996 年战争后的两次与他的会见。1992 年的科瓦切维奇,穿着一件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 T 恤,在说到他所描述的“塞尔维

亚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时“双眼闪烁着激情”。1996年,他是镇医院的院长,还是一个想把这里变成没有穆斯林而全部是塞尔维亚人的土地的“骄傲的民族主义者”。你采用的手段是必要的还是一时的疯狂?武利亚米问道。他回答:“都是。必要的战斗和一时的疯狂。房屋一开始被烧,此时人们失去了控制。人们不是在正常行动。”由于他在整个会见过程一直喝着白兰地,他话开始多了起来:

我们做的与奥斯威辛或达豪集中营做的是一样的,但这是一个错误。它本来是被作为一个兵营,而不是集中营……我无法解释这种失控。你可以称之为一种集体疯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死在那里。上帝知道,它是一个风洞(wind tunnel),现世的一部分,飓风来回吹刮……如果你站在纽约的角度看它,一切都设计得很好。但是在这里,当一切都被点燃、人们的大脑似要开裂的时候——这就是精神病专家要研究的事了……如果某人为我开释,说我不是这集体疯狂的一部分,那么我将坦白说这不是真的……如果医院里出了差错,那么我是有罪的。如果你不得不通过杀人来做事,那——这是我个人的秘密。现在我的头发白了。我睡觉睡不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审判,7月13—15日,1998;武利亚米,1996)

404

这似乎快接近诚实了。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自身经历中遭遇过创伤,试图为维护塞尔维亚人的权利而奋斗。在实际情况下,这种奋斗转变成了很可能他当初并没有打算过的大屠杀。他一直承认他做了现在还一直困扰着他的恶事。1998年8月,他因压力引起的严重心力衰竭而死在关押他的小牢房中——对一个承认自己邪恶的人的合理归宿。

热利科·拉日纳托维奇因为别名“阿尔坎”的关系,声名狼藉。他1950年出生于靠近科索沃边境的黑山,他父亲是一位“二战”中经常醉酒和满口脏话的空军上校。阿尔坎9岁时从家里逃走,先后在欧洲陷入过70年代和80年代的少年越轨和少年犯罪。当他1973

年在南斯拉夫被捕时,他的家庭关系帮他摆脱了控告,并安排他进入了秘密警察机关。他被分派了骚扰和杀害在欧洲的南斯拉夫政治流亡犯的任务。在 80 年代末,他返回国内,当了南斯拉夫最著名的足球队贝尔格莱德红星球迷俱乐部的负责人。他因为有能力管理足球流氓而被推举,据说他将他们组织成了一支种族民族主义的亲米洛舍维奇的民兵组织。他们当中出了“阿尔坎猛虎”的核心成员——由保安部门配以装备的最臭名昭著的准军事部队。阿尔坎 1992 年被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选进议会,然而他次年丢了席位。没有证据表明他直接参与了他手下人的暴行。战争结束后,阿尔坎猛虎队的一些成员被职业杀手所杀,也许是清除暴行见证人的秘密警察所为。阿尔坎活了更长时间,同时是一位穿着阿玛尼套装的塞尔维亚名人,一个战争及制裁的受益人,拥有六家公司,包括一个足球俱乐部,还与一位著名歌手结了婚。他向世界展示了他招人喜欢的风仪,一边又向他的敌人发出了吓人的威胁。北约将 1999 年 5 月轰炸贝尔格莱德司令部的荣誉授予了他。但是一位前警察和“阿尔坎猛虎”队成员(很可能为秘密警察买通)于 1999 年 12 月在贝尔格莱德将其击毙。

拉特科·姆拉迪奇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1943 年生于萨拉热窝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他的父亲是被乌斯达莎杀害的;他还谈及与一位婴儿时期被乌斯达莎毁伤四肢的女人的友谊。他朋友说这些早期经历使他埋下了对克罗地亚人的刻骨仇恨。他从军事学院毕业,是一名杰出的军官,1991 年升为中校。他开始是一名共产党员,然后转向了激发他热诚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他紧靠在米洛舍维奇身边,后者给予了他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的指挥权。由于胸部特别发达(尽管快有脂肪了),能像农民一样说话、骂人和喝酒,又一心想做能发战争财的投机商那样的人,他在士兵中很受欢迎,他们称他“猎鹰”,一个塞尔维亚战争英雄的象征符号。他是一个非常干练的指挥官,为一个统一的波斯尼亚塞族共和国开辟了疆土。他的动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在完成一番惨烈的攻城行动之后,他刚一踏入斯雷布雷尼察,便在塞尔维亚电视上宣布:“我们将这座城市作为礼物献给塞尔维亚人民。最后,在土耳其禁卫军军官(Dahijas)起义

之后,向本区土耳其人复仇雪耻的时间已经到来。”他提到的“起义”是指1804年塞尔维亚人对奥斯曼土耳其发动的起义!当1994年接受德国《明镜》采访时,姆拉迪奇宣称:“我对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是否会创建一个爱斯基摩国家……或者甚至飞向宇宙等完全不在乎……边界总是用血划定的……我们的目的现在是或依然是所有塞尔维亚人国家的统一。”据称他还说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只能通过种族灭绝的办法达到目标。两个在海牙审判中承认犯有参与斯雷布雷尼察屠杀罪行的塞尔维亚军官也使姆拉迪奇被牵连进来。奥布雷诺维奇将军说他参加是在得知姆拉迪奇亲自命令杀戮行动之后。他说在那一刻反对命令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上尉尼科里奇描述了作出决定的会议经过。会议在大队总部进行,参加的包括姆拉迪奇和克尔斯蒂奇,还有其他军官。他说他后来问姆拉迪奇,一群他刚刚作出过安全保证的穆斯林囚犯最后实际上会得到什么样的命运。姆拉迪奇把手摊平,做了个削的动作,“像割草一样”,表示站在他后面的250名囚犯将被杀掉(卷宗IT-98-33/1和IT-01-43;格伦尼,1993:23—26,科瓦切维奇与达基奇,1995:216;罗德,1997:167)。姆拉迪奇依然自由着。

克罗地亚暴行:拉什瓦谷

克罗地亚与穆斯林激进派从一开始就对少数易受攻击的塞尔维亚村子实施了报复。但因为他们是在撤退之中,他们起初犯战争罪的机会较少。这种情况在他们获得了武器并进入反攻之后发生了改变。米洛舍维奇意识到他无法保护所有这些领土,因而同意国际停火,等待谈判。他开始撤出对过分扩张的海外塞族人的支持。克罗地亚等待着国际维和行动期限的结束,然后攻打并重新夺回了斯洛文尼亚西部。在1995年5月到8月间克罗地亚部队重新夺取了整个克拉伊纳地区。所有克罗地亚党欢庆这伟大的胜利(普西奇,1997)。克罗地亚议会发言人和最高法院院长宣称不可能会有克罗地亚战犯,因为只是打一场防御战争。发言人表示他本人对清洗感

到满意,但是希望少数塞尔维亚人留下来。如果他们占总人口比例不到 8%，“那他们就没必要获得克罗地亚宪法规定的特殊地位”(科瓦切维奇与达基奇,1997:67,89,175,218;斯蒂特科瓦奇,1997:168)。联合国报告说在曾居住在克宁地区的 13.5 万塞尔维亚人当中只有 3000 人还住在那里,清洗率达 98%!然而这时世界还没有太在意受压迫的塞尔维亚人。但是它还在关注波斯尼亚穆斯林,而现在克罗地亚人与波斯尼亚穆斯林之间的联盟已经分解成两者之间的战争。1992 年的万斯—欧文计划将波斯尼亚分成十个“小行政区”。在一个族群已设法体现其行政区大部分特点的地方,该计划承认它的政治主导地位,所以激进派试图加强对行政区的控制,将他们的族群难民再安置到那里。这涉及克罗地亚人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清洗,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清洗。

406

关于任何南斯拉夫暴行——事实上,关于任何地方任何清洗过程——最详尽的证据,都与克罗地亚人针对波斯尼亚中部——离萨拉热窝西北部 30 公里的拉什瓦谷的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暴行有关。两边都试图对他们控制的区域进行清洗。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到目前为止已经审理了五起针对当地克罗地亚人的案件。有三人是资深地方官员:谷中的军事总指挥蒂霍姆·布拉什基奇上校,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党首科迪奇,以及地方军事指挥官切尔科斯。六个低级别士兵被控告在阿哈米奇村进行大屠杀(在对库普雷斯基奇等人的审判上),一人被控告在维泰兹镇强奸(在对弗朗齐亚的审判上),还有一个军营指挥官兹拉特科·阿列克索夫斯基因执行罪犯营管理制度而被控告。他们的受害人是穆斯林。我自己的叙述主要来自于这些审判中提供的证据。

证人们普遍认为直到 1990 年年末竞选活动开始之前在地方种族社区之间没有出现明显的紧张关系。这些大都是族群混居的镇子和村庄,其间孩子去种族混合学校读书,然后男孩在种族混居的兵营参加军训,而绝大多数成年人工作生活在一起。社区群体有时甚至

参加相互的复活节、圣诞节或拜兰节*，孩子们出声地嚼着甜饼干，少年们调情逗乐——也许这些对他们而言是要放在宗教或民族身份前面的考虑事项。

我们对维什尼察(Visnjica)，一个由挪威人类学家托恩·布林加(Tone Bringa)1988年研究过的克/穆混居的村子，知道的最多。她的著作《做波斯尼亚式的穆斯林》(1995)，增加了对村中后来事件的评论。这些内容通过与在1993年1月、2月和4月间为村子摄制影片的电视组的合作而显得更加逼真(格拉纳达电视台,1993)。这发展至一种独特的对单一村庄的前后对比的快镜头纪实。布林加的研究是关于村庄中的穆斯林妇女，尽管她也认识一些克罗地亚妇女。

407 她发现不存在种族身份模糊不清的问题。妇女对她们自己的种族/和宗教身份具有强烈的意识，她们将其放入了“相互承认相互接受的两个村庄社区之间的差异之中”。大多数社会化过程发生在每个社区之内，但是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克妇女在一起聊天，有时在对方的屋子中喝咖啡，甚至偶尔还加入对方的宗教性的家庭仪式。克罗地亚与穆斯林法庭证人对他们自己的村镇作了同样的叙述。克罗地亚人有时将“穆斯林性质”等同于“缺乏文化”与“落后”，但是他们将大部分波斯尼亚穆斯林视为更加“现代”以及不是“很像穆斯林”。因为村庄缺乏不同种族之间通婚，亲属网络处于隔离状态，而冲突的第一阶段又提高了隔离程度。但是布林加，一位在村庄住了18个月的人类学家，没有意识到种族紧张关系。对差异的承认而非敌意，才是拉什瓦谷大多数种族关系的特征。

在1990年选举期间，种族身份获得了一种竞争力，人们“根据他们的种族起源来行动和说话”(杰迪奇和穆耶齐诺瓦奇，布拉什基奇法庭作证)。在1991年间被推选出的市政议会由两个主要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克党，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和波黑穆斯林民主行动党为主导。为应付塞尔维亚压力，他们建立了共同应急委员会、警察部队、巡逻队和路障。然而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武器及

* Bairam, 伊斯兰教节日。

极端主义在蔓延。公诉与辩护方大都同意冲突是从地方开始的,几无外界卷入。丹麦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少校巴奇森说暴力始于 1992 年的 4 月到 5 月,双方的喝醉士兵互射,少数平民被狙击手和抢劫者打死(布拉什基奇审判,1997 年 8 月 22 日)。继而是两边的个人和小团体的重复性挑衅。克罗地亚人组成了准军事部队,而波黑军队中下了班的波斯尼亚克士兵增加了集体活动。首先的爆发点再一次与主权象征、枪支及工作有关。武装挑衅者和激进的政治家在克罗地亚社区中地位越来越突出,他们人数更多,组织及武装更好。他们带来的压力,加上从别处塞尔维亚人占据区域流入的难民的助推,开始分裂联合权力机构。

外部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随后使紧张关系恶化。布拉什基奇起诉人试图将此追溯至萨格勒布和图季曼总统。当时的英国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帕迪·阿什当,惊人地叙述了 1995 年 5 月他与图季曼在伦敦举行的欧洲胜利日纪念宴会上的谈话(证据在 1998 年 3 月 19 日给出)。阿什当问他 10 年以后南斯拉夫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图季曼在他的菜单卡上画了个地图(阿什当将它呈给法庭)作为回答。地图显示波斯尼亚大批地被克罗地亚吃掉了。当阿什当问及穆斯林,图季曼回答说,“不会有什么穆斯林地区”,除了作为克罗地亚国家中的一个小的构成成分。然后他说伊泽特贝戈维奇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和阿尔及利亚人”,而米洛舍维奇是“我们中的一个”。穆斯林其实就是不能勇敢面对土耳其人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图季曼后来承认他画了这张地图,他说它符合南斯拉夫“西与东”的划分(科瓦切维奇与达基奇,1997;180)专家证人比安基也出示了表明新波斯尼亚克族军队(HVO)自萨格勒布起由克罗地亚军队(HO)控制的文献。两者“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个政治和军事观点看,它们代表了一支单独的军队”(阿列克索夫斯基审判,1998 年 5 月 4 日—9 日)。尽管没有发现直接来自萨格勒布的种族清洗的命令,但克罗地亚当局正在寻求控制有克罗地亚人居住的波斯尼亚地区。

波斯尼亚的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内部有分歧。它的主席克柳西奇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认为克罗地亚人可以在波黑境内实现

他们的目标。但是在1991年10月,他的副主席梅特·博班,一个超市经理,趁克柳西奇不在时公开宣布了一个对立的“克罗地亚黑塞—波斯纳共同体”,据称它只是一个文化组织,但在12月份于萨格勒布举行的与图季曼的碰头会上,它竟能压倒克柳西奇的反对而得到了批准(科迪奇与切尔科斯审判,判决,第472段)。梅特·博班与萨格勒布有更佳的联系途径,特别是通过主要的萨格勒布强硬派苏萨克,以及与输送武器给他的海外克罗地亚人的关系。1992年2月,克柳西奇在两次波斯尼亚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封闭会议之后被迫辞职。控制权转到博班和他的副手科迪奇手上。在7月,博班宣布成立一个以格鲁代为中心的独立的黑塞—波斯纳共和国。博班向记者武利亚米吐露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历史上就是克罗地亚人的生存空间”。虽然波黑宪法保证了个人权利,但它没有保证作为整体的克罗地亚人民/种族的权利。博班预料将会在波斯尼亚全境出现克罗地亚扩张。武利亚米评论说:“梅特·博班预测的一切(后来)都被高效地付诸现实;它是严密的,一切都依据计划。只有一个指挥系统,而它是有效的。”(布拉什基奇审判,1998年9月24日)两个国家对同样一片领土声明主权(如我的论点3),其中之一现在认为它拥有以相对不值一提的代价实现其目标的军事和准军事优势(论点4b)。

拉什瓦谷最大的镇是维泰兹。1992年3月镇子中的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领导人勒令民主行动党与双种族危机委员会服从他的领导。他威胁说,反抗是无效的,因为维泰兹的波斯尼亚克族人武装到90%,而波斯尼亚穆斯林武装程度在10%。威胁还由地方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政治家瓦伦塔和科迪奇通过地方电视台发出。他们声称这些都是针对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克侵略的防御行为。现在“穆斯林将从波斯尼亚消失”,因为这是“历史的克罗地亚土地”,以及“克罗地亚人准备纠正历史错误,他们在这受过剥削、屈辱,而现在他们有权力和实力为克罗地亚人民赢得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历史性权利,同时维护那些权利”(布拉什基奇审判,穆耶齐诺维奇的证言,1998年8月20日;科迪奇/切尔科斯审判,判决,第472,478—479,522,525段)。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威胁、羞辱和据称是防卫性的愤

怒的情绪顺序。

当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将他们的部队撤回到更关键的部门之后,塞尔维亚人大体上是离开了。一个留下来的塞尔维亚人说起那些走掉的人:“他们对那些将他们居住在其中的环境不单单称之为环境的人更加信任。”他们还害怕因为进入镇子的克罗地亚难民说其他塞尔维亚人对待他们的那一套而遭到克罗地亚人的报复(1998年1月22日)。但是克罗地亚和穆斯林社区继续不和。富于攻击性的克罗地亚巡逻队大摇大摆走在街上。在路障处,波斯尼亚穆斯林人遭殴打和抢劫。克罗地亚货币被宣布为唯一的法定货币。使用其他货币的商店与市场摊位被撤除。抢劫与炸毁穆斯林商店与货摊的行为不断加剧,直到1993年3月,实际上一个也不剩。汽车被盗,富裕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人遭到抢劫与殴打。波斯尼亚穆斯林人被告之:“我们应该去伊拉克,我们应该去土耳其,这里是克罗地亚共和国,我们不是一个民族,我们都应该被杀掉。”(布拉什基奇审判,弗鲁斯蒂奇的证言,1997年9月26日)然后开始逮捕男人,后者被迫扮成人盾或在非人的条件下挖壕沟,而妇女与儿童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间歇有凶杀发生。

409

克罗地亚人不是唯一的侵略者(挑衅者)。1993年1月25日,穆斯林部队杀掉了14个被俘的克罗地亚士兵和杜西纳村的几个平民,该村后来遭他们清洗。泽尼察和拉什瓦镇的克罗地亚人面临压力。杜西纳村被称为是“触发一切的第一次犯罪”。继而出现的是,他们承认由失去控制的准军事部队和士兵以不断上升的暴力形式进行的一系列克罗地亚人的报复行动。他们不进攻穆斯林占优势地区的穆斯林,那里通常是穆斯林暴行开始的地方。相反,他们对那些最不可能进攻克罗地亚人的人进行报复——那些住在易受攻击的穆斯林邻里的人。阿哈米奇大屠杀案件中的克族证人阿利洛维奇揭露克族和波斯尼亚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也许持有同样的清洗理念。波斯尼亚穆斯林做这样的事,他说,是在他们获得地方南人民军的武器和1992年秋末穆斯林难民从受塞尔维亚人清洗的亚伊采镇潮水般拥入之后。现在波斯尼亚穆斯林“觉得他们比我们强大,他们在人数上已超过我们,所以他们产生他们可以自己占取这块领土的想法是顺

理成章的”。双方如果处在优越地位就都能看到清洗中的逻辑。

博班的黑塞—波斯纳独立小国让事态恶化。10月,几个村庄遭清洗。荷兰驻联合国上校莫尔斯尼克说,他曾试图阻止克族领导人在地方电视电台上散布关于由穆斯林施行的暗杀和焚烧行为的谎言,但没有效果。他说他们是有意鼓励少数派克族群体逃跑的:“克族军队和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的目的是将克罗地亚人集中在他们自己的控制区域之内”(布拉什基奇审判,1998年6月1日)。克族民兵组织然后归在克族军队指挥之下。准军事部队“小丑”和“维泰兹”被吸收加入克族军队宪兵队,加上一个非地方性的“囚犯旅”。由帕拉加(Paraga)准法西斯党组成的民兵组织(HOS)也被吸收加入了克族军队(戴蒙,1998年3月25日;武利亚米,1998年4月24日;上尉麦克劳德,1998年1月26日;上校莫尔斯尼克,1998年6月29日;上校鲍尔巴思,1998年6月29日;上尉惠特沃斯,1998年7月13日等人的证词——全部见于布拉什基奇审判;证人“R”4.10.99——科迪奇/切尔科斯审判)。这些部队威吓性地炫耀他们的武力,威胁当地人,陶醉于他们的权力。一些人说让这些部队按他们的方式行事是一种有组织的克罗地亚战术:“克族军队不惧怕这些部队,但是之所以让他们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为了让穆斯林明白……他们应该害怕,以及是他们想制造惊慌”(卡瓦泽维奇,1997年8月27日;参见泽科,1997年9月26日,两者都出席布拉什基奇审判)。武利亚米评论道:“这是一场针对平民的战争……难民是战争的基本成分,他们是它全部的意义;清除人口就是战争的一切。”

布索瓦察镇包含三个南人民军营房和军械库。1992年4月末,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和民主行动党同意平分军械库,但是在1993年5月,克族军队突然占领了其中之一,以及地方邮局和市政议会。当地穆斯林领导人被痛殴一顿。克罗地亚旗帜到处飘扬,克罗地亚语言被宣布为唯一官方用语,而波斯尼亚穆斯林被从大多数官职和公司理事会中清洗出去(科迪奇与切尔科斯审判,判决,第494—498段)。当塞尔维亚军官将镇中的营房在4月末交到克族军队的手里时,基谢亚克的命运就决定了。6月19日在维泰兹,帕拉加

民兵部队攻占了该镇,挂起了方格旗。新的警长宣布:“维泰兹的克罗地亚人民没有耐心等待问题被解决,他们开始将事情控制在自己手里。”在11月,公共官员和公司经理不得不签下一份效忠黑塞哥维那—波斯纳和克罗地亚防卫委员会的誓言。即使他们签了,许多人还是被解雇了。殴打、抢劫、射杀和集体驱逐继而在所有这些镇中发生——一个被法官称作“系统性的”、“无情的”和“野蛮的”模式(布拉什基奇审判,穆耶齐诺维奇,1998年8月20日;科迪奇与切尔科斯判决,第506—507,520,852段)。

1993年4月15日,万斯—欧文计划的出现一下子促成最后的升级行动的开始(沃特斯的证言,1998年8月18日)。黑塞哥维那—波斯纳独立小国让波斯尼亚穆斯林政府从三个克族为大多数的行政小区中撤出所有部队,否则克族军队将立刻“执行它的管辖”。次日,克族居民被悄悄地通知离开。然后是炮击,继而是未遇任何抵抗的步兵进攻,导致穆斯林被驱逐或被杀害,以及其房屋被烧毁(布拉什基奇审判,证人“AA”、“B”和“CC”,1998年2月16—21日)。布拉什基奇本人写信给一个大部队指挥官,说地面必须“清洗”,尽管在其他地方他只要求“防御”:阻止“极端主义分子的穆斯林部队公开对领土进行清洗以及对克罗地亚人民施行种族灭绝”(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布拉什基奇证词,1999年2月25日,以及裁定,2000年6月3日)。全谷中一个清真寺光塔幸存了下来。进攻包括两次针对抵抗最多的人口——又一次的对一种威胁的过度反应,而不是冷血的杀戮。一次暴行是在维泰兹的老镇,一个修有防御工事的穆斯林贫民区中大范围的卡车爆炸,在此期间有数不清的平民死亡。另一次是阿哈米奇大屠杀,后文将要描述。三周之后,布拉什基奇向克族军队司令部报告:“指挥系统运转充分协调和可控。”(法庭快讯,86,1998年6月20—24日)

这次升级不得不克服克罗地亚人中的反对意见。一位一直与对等的穆斯林人物谈话的温和的克罗地亚司令被以“最极端的”反穆斯林军官为首的秘密警察部队控制了起来(布拉什基奇审判,1998年5月12日)。上校菲利波维奇是一个寻求和解的“文明人”,他公开谴

责他所称的博班和布拉什基奇的侵略政策(武利亚米的证言,1998年5月11日)。福伊尼卡的克族军队司令拒绝执行布拉什基奇的清除一个由穆斯林控制的村庄的命令——“因为我们仍希望与波斯尼亚克人达成协议”。他告诉布拉什基奇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但是他不能执行会导致杀戮和战争的命令”。布拉什基奇解除了他的职务,他在军事监狱呆了10个月(图卡的证言,1999年11月22—27日,科迪奇/切尔科斯审判)。富伦基亚审判中的证人“D”,准军事部队“小丑”的成员之一,曾帮助一位遭“小丑”逮捕的波斯尼亚克妇女的家人,所以被殴打并被逼看着她被他的部队强奸。他的指挥官,富伦基亚,被海牙国际法庭判决犯有轮奸罪,被判处10年徒刑。暴行的发生是因为极端主义的士兵胜过了温和派。他们这样做得到了来自上层的帮助,同时也因为他们对暴力更加投入。

无论是科迪奇或切尔科斯或布拉什基奇都没有极端政治或种族偏见的前科记录(判决,第523段)。但是他们认为种族清洗是必要的防御。一位穆斯林医生,穆耶兹诺维奇博士,其行医权被克罗地亚权力机关保留,对维泰兹的政策提供了证词(布拉什基奇审判,1998年8月20日;科迪奇/切尔科斯审判,1999年5月10日)。他指认安托·瓦伦塔,一位地方中学教师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小册子的作者,是克罗地亚意识形态的最高代表,并指认达科·克拉列维奇,准军事部队维泰兹的指挥官,十分残忍,具有一副“浑身上下都令人不安的样子”。伊万·桑蒂奇是一名技校毕业生和一个犹豫不定的政治家,对极端分子和“失控的武装人员”感到无能为力。西里卡,一位“在镇中有个好名声的”克族领导人,提出和解建议,遭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拒绝。至少有3名公开批评激进派的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党成员遭殴打之后保持沉默:“谁不赞成就是反对,他将得到他应得的东西。”证人“T”(布拉什基奇审判,1998年1月20日)说杰出的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异议分子遭到痛打。维泰兹的兽医泽科博士(布拉什基奇审判,1997年9月26日)说平民警长和市长都试图帮助他。但是在受到威胁时警长放弃了,尽管市长继续提出不同意见并因此被送往前线——一个很重的惩罚。温和的克罗地亚政治家拿下维泰

兹的旗子,把若干枪和工作岗位交还给波斯尼亚克人以度过夏天。激进派在此只在10月末到11月初这段时间获得胜利。在布索瓦加激进派取胜更早,此时温和的波黑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副主席遭痛殴(科迪奇与切尔科斯判决,第482段)。证人“JJ”(布拉什基奇审判,1998年3月19日)说在基塞杰克的克族军队内部出现过战斗。温和派保护穆斯林直到他们的两个领导人被激进派准军事部队所杀害。不幸的是,激进派,而非温和派,才专事暴力研究。

穆耶兹诺维奇说他的克族邻居或同事中极少有人制造麻烦。他们警告他“远离今天的街道”,否则不要为即将到来的强烈爆炸感到吃惊(即一卡车炸弹)或者建议他的孩子“不要呼喊支持波黑军队的口号”。有个人一边啜泣着一边说:“你得救了,请安静……你保持安静,你已经得救了。”他看见一个克罗地亚医生阻止克族军队士兵移走一个他们打算杀掉的受伤病人,看见克罗地亚护士在阿哈米奇照顾过伤员之后在那里啜泣。兽医泽科说,“有相当多数量”的克罗地亚人帮助穆斯林,而有少数人还因此而被杀害。所以大多数人不敢帮忙。证人“X”(布拉什基奇审判,1998年1月27日)有一个克罗地亚朋友,他第一个拒绝穿克族军队制服,从而失去了从事其他工作的机会。为了吃饭,他签约,从而获得雇用。监狱卫兵是邻居和母校校友,他们称看见卡瓦泽维奇在那里很意外。他干了什么?他们认为只有穆斯林极端分子才被囚禁。两个卫兵对他遭受到的待遇表示抱歉,其中一个递给他支烟,说“现在情况就是这样,我很遗憾;这既不是你也非我的错”(布拉什基奇审判,1997年8月26—27日)。在阿哈米奇,一位年轻人两次拒绝一项杀人命令,于是他的军官自己去干了。年轻人没有试图去制止他(证人阿米奇,1998年8月18日)。一位更加勇敢的男人偷偷地打电话给联合国部队,救下了七名即将被激进的克拉列维奇、“小丑”的指挥官处决的男人(证人“R”,1999年11月4日)。极少人冒这么大风险。

但是许多克罗地亚人激进化了。许多人在物质上受益于清洗;有些人据称很欣赏它。武装的克罗地亚人会在露天地里大摇大摆地唱歌开枪。在路障处他们享受着恣意勒索“过路费”的权力,借慷慨

大方的手势凸显其霸道行径。抢劫穆斯林财产的行为无处不在,经常是由蒙面男人所为(据推测是当地人,证人“JJ”说)。其他人则为所谓的穆斯林暴行感到义愤。由激进派控制的媒体把这一点放大了。证人“E”(布拉什基奇审判,1997年9月26日)说她在电视上看到关于穆斯林毁灭某克罗地亚村庄的叙述并相信了它,但是一个月后,她去了那里,发现村庄完全未受损害。主权符号得到广泛支持。克罗地亚小学教师在克罗地亚语被宣布为唯一教学语言和克罗地亚旗帜以及图季曼的画像在学校出现之后非常高兴。证人“LL”,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穆斯林妇女,指出是“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士”先开始说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不能再居住在一起,基谢亚克(kiseljak)历史上就是克罗地亚领土,它应该是种族纯粹的,以及穆斯林应当到他们是占多数的镇子中去(布拉什基奇审判,1998年5月12)。但是难民是境遇最糟的人。他们需要住房、工作和物品,并把其他地方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对他们所做的一套发泄到其他人身上。因失去家园从其他地方来的克罗地亚人会敲响波斯尼亚克人的门,提出用一间房屋或一套公寓交换他们遭遗弃的房屋。波斯尼亚克人将此作为一个迅速逃离的信号。卡伊莫维奇教授(布拉什基奇审判,1997年8月27日)提到一位以前的学生出现在他面前说:“你知道,主任,我感到非常尴尬,但现在我谨通知你,你必须马上离开你的公寓。”他走了。

413

蒂霍米尔·布拉什基奇1960年出生在拉什瓦谷。他的父亲是一位矿工,然后成为一名司机,当时家庭没钱供他们的儿子读书。所以他去了军事学校(这里提供免费食宿),成为了一名职业士兵。他显示出才干,在1990年晋升为一等上尉。他自称当他在科索沃服役的时候他对要求他执行的任务感到不满并且不喜欢那里对塞尔维亚人表现出的偏爱。他注册攻读非全日制商业博士学位,打算取得资格时离开军队。在他几乎就要取得学位时,麻烦开始了。他去往澳大利亚,因为他已娶了一个澳大利亚姑娘,但是感到有一种“道德义务”,必须回到他受到威胁的祖国并为之贡献他的军事专业知识。他于1992年回到家乡。他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因此被委以上尉军衔

指挥拉什瓦谷克族军队,并保有指挥权直到清洗行动结束。后来他成为一名将军。证据显示他是一个具备极少军事才能的普通的克罗地亚人,运用它们是出于表面上看起来的爱国主义动机。他没有极端民族主义或种族偏见的前科记录,他也没在他指挥的那段时间内将其表现出来。然而他有效地组织了拉什瓦谷的清洗。虽然他自己未杀死过一个人,但他知道接着他的命令发出之后会发生什么,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决定,判处他 45 年有期徒刑。他们将同样的推理运用于科迪奇,他被判了 25 年;以及切尔科斯,他被判 15 年。他们都认为保护克罗地亚群体需要种族团结,同时将种族清洗看作是必要的手段。一位英国军官作证说阿哈米奇不具备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村民在 1992 年 10 月通过设立路障阻止克罗地亚军队移动进行反抗。五个月之后,阿哈米奇被选取为从此“向谷中其他地方发送他们不再受欢迎和将要离开的信息的理想之地”(布拉什基奇审判,沃特斯的证词,1998 年 8 月 18 日和布拉什基奇,1999 年 2 月 17)。

在阿哈米奇大屠杀中,116 名穆斯林平民被杀害,其中包括 30 名妇女和 20 名儿童。所有 180 家穆斯林房屋和村中两个清真寺——其中没有克罗地亚建筑——被焚毁。前南国际法庭在对库普雷斯基奇的审判中审讯了实施这次暴行的六名克罗地亚人。它的最后结论说这是一次

精心策划、组织严密的对一个族群的平民进行的杀戮行动……屠杀的主要目的是以杀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烧毁他们的房屋,宰杀他们的牲口以及非法拘禁幸存者和将他们驱逐到另一个地区的方式,将穆斯林从村中赶走。这些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在人群中散布恐怖以便将那个个别族群的成员吓得再也不敢回到他们的家中。

414

这,法庭说,“距种族灭绝仅一步之遥”。法庭起初判处六名被告中的五名有罪,尽管强调他们只是无足轻重的人物。被放在最高位

置的是弗拉蒂米尔·桑蒂奇，一位在维泰兹的克族军队宪兵队中“小丑”部队的指挥官。其他五名被告是阿哈米奇村民，生于1958年到1967年间，全部已婚，大都有孩子，具有工人阶级职业（工厂工人和工头、森林护林员和地方警官）。他们都在克族军队或“小丑”部队当中。只有一个人被证明曾经有过种族民族主义记录，他来自一个“乌斯达莎家庭”。其他四个人据说以前曾是“文明人”，仅在冲突开始出现之后才被“改造”成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一人一直是多种族民俗协会的成员，直到1993年后才离开。一人在冲突爆发期间已“完全蜕变”为一个“狂热分子”。1991年他称赞希特勒，支持“毁灭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法西斯主义方式”，同时以为“将它运用于克罗地亚人当中是必要的”。次年，他穿着各种各样的制服，神气活现地到处逛来逛去并用武器恐吓人们（布拉什基奇审判，阿哈米奇的证词，1998年8月18日）。被告承认曾作为“软弱的”、“处于压力下的”或“边缘的角色”而“服从命令”。但是他们已经在参与针对地方穆斯林的恐吓和暴力行动。价值观以及行为都已经激进化了。但是，在上诉时，只有两项指控得到确认。主要的原告是一个孩子和一个沿着地面缓慢爬行的男人，他抓着他的小孩子，试图逃离死亡。他们的证词未获信任，因为他们当时有可能注意力太分散，没能够看清楚施害人。清洗能够非常彻底，从而不留下值得信赖的见证人。

考尔尼克是一个靠近布索瓦加的集中营，这里穆斯林囚犯被杀害、拷打和被带出去作为克罗地亚行军中的人盾。兹拉特科·阿列克索夫斯基是集中营的年轻指挥官，生于1960年，是马其顿裔，同时又是克罗地亚公民。他是一名社会学毕业生，专事犯罪和越轨行为研究，后来在波黑的监狱部门工作。他声称他这里的被拘留者很幸运地拥有一个职业的刑罚学家作为他们的管理人。他把对暴行的罪责转移到在战争中失去家庭的卫兵和克族军队士兵的报复行为上。营中证人确认喝醉的克族军队士兵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营中殴打囚犯，以报复所谓在其他地方犯下的暴行（前南法庭案号 IT-95-14，特别是上尉麦克劳德，1998年1月6日）。阿列克索夫斯基仅被判了7年牢狱。

我再回到由托恩·布林加研究过的村庄,其状况同时也在 1993 年 2 月被格拉纳达电视摄制组拍摄过。一位村民满怀希望地对着镜头说:“即使现在邻里之间的关系也不错。没有哪个健全人会犯下暴行。我们必须住在一起。”然而布林加注意到,在以前,天主教徒和穆斯林运用宗教形式的问候语——“跟着安拉走”或“赞美耶稣”——只是在他们自己族群内部私下的时候。在公开场合与人打招呼时,每个人都使用像“白天好,你们好或再见”这样的世俗的表达方式。但是现在的克罗地亚人都在公开地使用宗教的招呼语,似乎在表明村庄的公共空间是属于他们的(布林加,1995:56)。电影制作人德布拉·克里斯蒂注意到某种水平的紧张,但是穆斯林和克族人还在相互的房间中走进走出,“他们喝着茶,那边喝着咖啡。这种情形在我们到达那里的三个礼拜之后改变了”。克—穆村庄巡逻队被“每五或十分钟”经过村庄的克罗地亚克族军队巡逻队取代。一些武装很差的穆斯林试图在夜间巡逻但被赶跑。克族军队开始清理街道和一次性关闭穆斯林商店一小时左右,以显示这儿是“他们的”村庄。肆意毁坏穆斯林商店的行为开始了。克族的枪炮阵地被建起来,监视村庄动静。难民来到这里,其中一些是他们的亲戚,告诉他们其他地方发生的暴行:“我的兄弟被他的隔壁邻居杀死了。”一位穆斯林对着镜头说:“是的,我们的克罗地亚人。他们一心想除掉我们。邻居……这就是他们做邻居的样子。父亲去商店,那些过去常与他打招呼的人把头转开,看向另外一边。这就是他们。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我们不能理解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两个 40 年的朋友,穆斯林妇女纳斯拉特和克族人斯拉夫卡,现在互相避着对方。纳斯拉特说:“我歇在家里。出去串门不开心。不是说你一定不能。只是说现在变难了。她可能会以为我是去刺探她的消息,可那不是我的意图。如果她们邀请我,我会去的。”

电影摄制人员走了,然后又在 4 月 23 日这天与联合国士兵一起返回,呆了短暂一段时间。他们看到了一个遭清洗、半毁坏和怀有敌意的村子。斯拉夫卡告诉他们,在 4 月 18 号这天穆斯林受到克罗地亚士兵、“外国人”和“局外人”的袭击。“我们没有做这件事。”她说。

但然后又说有五六个克族村民帮助过他们。穆斯林村民,现在的难民,说克族村民预先发出过炮击警告,但穆斯林没作准备。大约有12人被杀,而几乎所有人都逃光了。他们的房屋遭洗劫和焚毁(克里斯蒂的证言,布拉什基奇审判,1998年4月27日)。在她的书中,布林加说她经常被问起她以前的现场调查研究是否能够解释地震式巨变。她回答:

我的回答是不。我的材料或这本书都不能也并不是为了解释战争,这仅出于简单的理由,即战争不是由本书叙述中心的那些村民所制造出来的。战争已经在与我住在在一起的人们之外,以及他们的声音无人听见的地方,精心安排好了。最终,在抵抗了将近一年时间之后,这些村民也成为了战争的一部分,而他们当初卷入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家和家人。(1995:5)

416 村里的改变是由“上面和外界”带来的,主要是通过“民族主义宣传”的形式向村中渗透。然而她接着说:“战争对人的改变是深远的。它改变他们对他们自身和他们是誰的观念,它改变他们对他人以及他们是誰的观念。”(1995:5)而在库普雷斯基审讯中,她作证时又说:“当南斯拉夫解体,以及民族意识形态占取主导地位之后,不同信仰的邻居之间的理解就呈现逐渐的变化。”她还引用一位村中妇女的话说:“当冲突在村中出现,以及我们认识的某某死了之后,我们变了。”布林加评述道:“改变意味着退回到自己的民族群体的安全氛围当中,因为在此一个人不必去证明他属于哪一个群体。”种族战争的动员将这个村庄拖向了深渊。

布林加或许夸大了她的自上而下的解释。对于分析种族清洗过程她的研究不是非常理想且适合。作为一个与穆斯林家庭生活在一起的单身女人,她大部分时间把自己限定在了与穆斯林妇女的交流圈子中。她几乎没讲述关于穆斯林男人的情况,丝毫没有讲述关于克罗地亚男人的情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帮助了对村子的清洗。因此她可能夸大了村庄和外面世界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之间的鸿沟。她

告诉我们地方经济使两性分隔开来,将妇女限禁在家庭和农场之内,而男人则在其他更加城市化的环境之下工作和服兵役。有时男人离开家很长时间。妇女与南斯拉夫政治的隔绝远甚于男人,尤其是穆斯林妇女。她引述一位年轻穆斯林神职人员对她选择本村作为研究对象的批评,因为本地人太褊狭了。他们“不读书,因而不知道任何事情”(1995:51—52,61,93,224)。布林加以文献证明农村穆斯林妇女毫无准备地经历了清洗。但她不能证明男人是外界权力的消极工具。当然,诚如我们已看到的,在格鲁德、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存在着来自军事/政党上层集团的激进派的压力,但它们与地方党的激进化平行发生——而激进派拥有更多的武器。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

当地部分穆斯林暴行

波斯尼亚穆斯林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是卷入这些冲突中的最弱的族群,所以他们占了受害人中的绝大多数。波斯尼亚当局,原来是多元文化最明显也最有希望得到西方干预的国家,试图对他们的武装人员施加更多的控制。这种抑制条件现在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权力机关中非常明显,同时他们的许多武装人员现在正在对留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施行报复——后者大概是科索沃塞尔维亚人当中最不可能让自己犯下早期暴行的人。

一个在塞利比西村中的前南人民军军事场所,被克族和穆斯林部队用作囚禁 1992 年 5 月从波斯尼亚中部的科尼茨地区清洗出来的塞尔维亚人。塞利比西卫兵,大都是穆斯林,殴打、折磨、性袭和杀害他们的塞尔维亚囚犯。集中营指挥官,波斯尼亚克族人兹拉夫科·穆西奇,犯下 9 次谋杀及其他非人行为的罪责,却在 1998 年仅被判了 7 年。法庭认为,作为一个指挥穆斯林的克罗地亚人,他曾感到过不安全,他不能够对他们执行纪律。穆斯林卫兵哈齐姆·德里克是一个当地锁匠,之后成为克族军队宪兵队中的一员。他有过一些因谋杀而被判罪的记录。他结过婚,有两个年龄还小的孩子。前

417

南国际法庭就他两次谋杀、多次酷刑和强奸等罪行判了他 20 年,并指出,“他从施予他人痛苦中得到一种施虐的快乐”,以及“会以大笑回应阵阵求饶”。“你必须得死”是他最喜欢说的话。在一次强奸中他宣称,“切特尼克对现在进行的一切负有责任。”他开始诅咒“我的切特尼克母亲”。穆斯林卫兵埃萨德·兰佐因“极度的凶残和具有想象力的残酷行为”而犯下的三次谋杀和严刑拷打罪行被判了 15 年。他的较轻判决源于他的“极度年轻”(他 19 岁),“可鄙的家庭背景”,规范训练的缺乏,以及他的敏感性和欠成熟。他想为在塞尔维亚炮击中失去的亲人报仇。第四个被告,穆斯林齐伊尼尔·德拉西奇,被无罪释放。他是战争中难以说清的“爱国主义商人”之一,他积极为波斯尼亚克人的国家和军营采办物资,也许还将物资出售给塞尔维亚人。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动机或许会抑制种族民族主义倾向(塞利比西,案号 IT-96-21-T)。

围绕科尼茨一带的战争是惨烈的,因为它在战略上很重要,同时还包含几个南人民军军事机构。塞尔维亚人人数最少,但装备最佳。波斯尼亚克和克罗地亚人被关在镇子中,来自从周边村庄清洗出来的难民又充实了这里的力量。塞尔维亚人开始炮击镇子,但是克一穆联盟进行还击,占领了一些塞族人村子,抓获了俘虏。胜利者一方彻底被激怒,开始寻求报复。塞尔维亚人甚至在到达集中营之前就遭到殴打。然后“对被拘留者的痛殴、拷打和羞辱”就成为塞利比西集中营的常规。“好像没人在乎被拘留者是否活了下来。”参观的士兵加入了集中营工作人员的这些活动。这是报复中正直的愤怒和不付代价的残忍行为,专注于羞辱塞尔维亚人,像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克群体早前遭到的羞辱一样。

纳泽·奥里克 1967 年生于波斯尼亚农村,靠近斯雷布雷尼察。他的祖父是一名乌斯达莎战士。他从中学毕业,拿到金属加工证书,但没找到工作。作为身材魁梧的举重运动员和空手道武士,他搬到了贝尔格莱德,成为一名夜总会保安。他被招入到秘密警察部队,成为米洛舍维奇的保镖,但是战争开始后,他感受到种族忠诚对他的牵引。他回到波斯尼亚成了萨拉热窝警察。波斯尼亚克当局认可了他

的才能,派他回他的家乡村庄组建一支民兵队伍。在此他一跃而升为斯雷布雷尼察准军事抵抗运动的最有效率的组织者,成为一名穆斯林英雄。然而他被控告犯有在报复性袭击过程中焚烧和抢劫 50 个塞尔维亚村庄以及处决俘虏的罪行。他还强力镇压反对他的权威的穆斯林。他和他的副职官员“在荷兰维和士兵眼里显得似乎与歹徒流氓没什么两样,后者恐吓难民,从战争中捞得大量好处”。他还试图挑动塞尔维亚人通过在荷兰驻扎地近距离向荷兰人开枪来与荷兰维和士兵交火。2003 年他被俘获,正式因战争罪在海牙受到起诉(哈卡诺维茨,1996:77;霍尼格与博思,1997:132—133;前南国际法庭案号 IT-03-68-I;萨迪蒂奇,1998:150—151)。那些擅长暴力的人在种族战争爆发之后在所有社区中都升至最高地位。

穆桑·托帕洛维奇,通常叫作“卡科”,生于 1960 年左右。他成为了一名萨拉热窝夜总会歌手和黑道人物。1990 年,一种种族忠诚意识导致他与穆斯林政治家和警察建立了关系。当 1991 年战争的威胁到来时,他帮助组建起了秘密的穆斯林准军事爱国联盟和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s)特种部队。约有 20 名具有犯罪记录的男人率领着穆斯林准军事部队。经过 1992 年春天里的头几周战斗,他取得了对波黑军队第十山地旅的指挥权。萨拉热窝居民承认如果没有卡科和他的悍虎队就不会有今天穆斯林居住的城市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同时也惧怕他。他对邻里运用无限权力,强征新兵入伍,经营黑市贩卖,绑架和勒索富人,组织强奸,分配空房,还处决塞尔维亚战士和平民(很可能超过 400 人)。一位前悍虎队成员说:“我毫不怀疑卡科会出现在海牙最高通缉战犯名单之中,假如他活下来的话。”但是在 1993 年 10 月,波斯尼亚政府受联合国敦促和卡科抢劫殡仪馆的刺激,最终对他发起袭击。特别警察和陆军部队直捣他的司令部。卡科被杀,或是死于交火或是死于后来的拷打之下。1996 年他被波斯尼亚退伍军人协会重新埋葬。超过 5000 人参加了仪式(多莫维纳·妮特,1999 年 6 月 10 日)。

普通南斯拉夫施害人

关于总体的施害人的数据很少,并且经常是由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给予解释。不过,下列特征似乎是存在的。

1. 他们大量是来自族性混合的边境地区。大多数遭前南法庭起诉的人是在他们自己的家乡地区犯下暴行。一些观察家对大屠杀中的“亲密关系”表示惊叹,“酷刑逼供者认识他们的受害人”,沙夫说(1997:216)。123名前克罗地亚囚犯中的四分之一说他们认出了曾在克宁监狱恶毒殴打他们的塞尔维亚人,而这大致相当于在克罗地亚政府幸存者名单中发现的比例(博蒂加等,1992)。奥伯沙尔(1998)给出了一个较低的估计数字。他说波斯尼亚穆斯林在塞族对普里耶多尔地区村庄的16次袭击行动中仅有两次识别出面孔和声音。特别活跃的是来自这些地区的难民。在科索沃,证人说难民与当地塞尔维亚人在施害人中显得异常突出,他们要么是秘密警察要么是准军事部队成员。有些人报告说是被警察或塞尔维亚的士兵从他们当中救出来的(朱达,2000;241—248:《洛杉矶时报》,1999年12月22日)。当地居民通常是因相互挑衅报复和退至公共路障之后而变得最为激进化。边境地区也更多处在农村。而不大现实的是农村内部会更有可能产生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尽管有些研究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作者是这样认为的。更可能的是,这里的相关性是由于被边境地区觉察到的威胁,加上边境地区它们的相对贫困状态,这些因素使它们更加在经济上依赖一个强大的国家和米洛舍维奇。

2. 像以前的陆军军官和警察及安全部队中的特工这样的暴力从事者占比过高。施害人更多来自准军事的和秘密的以及其他方面的警察部队而非正规军。幸存者认出了他们经过伪装的多色工作服,强奸受害人记得像骷髅一样的标记或滴着血的动物,以及到处都是的刀刃——全是准军事部队的装备。他们具有一种学自好莱坞电影的派头和神气,特别是像《兰博》和《终结者》电影里那些蓄意的暴力行为。卡拉季奇的女儿穿着人时并佩着惹人注目的贝雷塔手枪(“对

我像我的妆容一样重要”),她说:“我们从关于《疯狂的麦克斯》和《终结者》《兰博》和《青年枪手》的电影中得到了我们的战争伦理。”(罗杰尔,1998:132)武利亚米(1994:19,45—49)将他所看见的南人民军部队描述为“惊恐的和不安定的”,以与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形成对照,后者按武利亚米说是“最好时常醉,最坏时施虐”,充满对克族的仇恨和对穆斯林的轻蔑。在科索沃,秘密警察似乎最为忙碌,他们对镇压阿尔巴尼亚人已驾轻就熟。然而幸存者说准军事部队更加野蛮:“正常的警察是镇定的,但准军事部队却在尖叫。”“我们处在狼群之中”,一位证人说(丹尼斯泽维斯基,1999:S2—3)。一位新闻记者指出,在一个克罗地亚部队中“每个人看上去都似乎已被某个电影导演塑造成了一个恶棍”——除了一个看似温和的 24 岁青年,他说:“我不是真的恨穆斯林……但因形势所迫,我想把他们全部杀光。”(布洛克,1993:10)

这也许只是新闻工作者追求轰动效应的手法。米利塞维奇(即出)正在编撰一本准军事部队样本,它看上去比以上描述的要更加多样化一些。我不妨接着说,对自愿的准军事部队的陈见已出现在其他环境下,并且已被研究证明是错误的。哈特(1998:第 7—8 章)已表明,与流行看法相反,在爱尔兰共和国与英国人作战的爱尔兰共和军(IRA)准军事部队既不是来自最高也不是来自最低社会阶层。他们大都是熟练工人、商贩或白领工人。他们大都是城市的,而如果来自农村,也是来自平均水平以上的务农家庭。当然,他们是年轻的未婚男子,并且往往与母亲的关系要比与父亲的关系更近。南斯拉夫准军事部队也是自愿者,他们冒着南人民军士兵不愿意冒的风险,不是在遵守纪律的秘密状态中行动(不像爱尔兰共和军),只是半守纪律。仅此即可带来更多的野蛮行为。

3. 有一个明显的年龄和性别结构。大多数施害人是年轻人,年龄不超过 30 岁。少数女性领导人鼓励清洗,如米尔亚娜·马科维奇和比尔亚娜·普拉夫西奇,但是极少妇女施加暴行。但也极少有人会为她们的男同胞的行为感到震惊。一个人警告他亲戚中的一位穆斯林:“他不行……不要相信他说的任何话。不要让任何人去找他帮

忙。他现在总是醉醺醺的。他们全都是醉醺醺的……别让他知道，无论你干什么，别一个人瞎逛。也不要让你媳妇一个人乱跑。”（萨迪蒂奇，1998：111；参较胡卡诺维茨，1996：41）然而在1995年11月，一家克罗地亚人指控一对塞尔维亚夫妇杜桑和贾戈达·博列维奇犯有谋杀18个平民的罪行（科瓦塞维奇与达基奇，1995：238）。在某些嘲笑人的群体中，妇女占绝大多数。男人完成了大多数杀戮行为，只是因为只有男人才投身兵役并能接触到武器。

但是准军事部队也透露出一种男性的家长制文化。因为他们往往是民族主义者，政治上受到自由主义者的反对，我们会以为他们通常具有更加保守的价值观，包括对性别问题。一种男性崇拜是可以料想到的。暴力游戏和占领的能手可能也已经占比过高，而人们通常认为他们大量的是来自南斯拉夫落后的农村地区。经济和处于边境的怨恨在他们的动机中可能比农村的性别偏见本身更加重要。然而雷米特（1992：第6章）指出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家长制文化给予年轻妇女较低地位而给予年长母亲更高地位。她推测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男人一直在反抗母系权威而拥护自夸的男性暴力，包括虐待妇女。显然这些士兵习惯于威胁性地挥舞武器和保持一种妇女被排除在外的饮酒文化。当他们正在饮酒时，他们会没完没了地胡吹，特别是对新闻记者。那个故事是对一位前领导人兼健美运动员泽尔科的重复。在一次被地雷炸伤之后，泽尔科用一颗手榴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没有作为一个跛腿再活下去（布洛克，1993：10）。

还有对走向男性凶杀的军事诱惑。因为准军事部队缺乏通过一个高度遵守纪律的炫耀武力手段进行恫吓的那种训练（像党卫军那样），他们就只好诉诸小规模团伙恐吓。《巴西奥尼报告》说大多数的塞尔维亚人强奸是由几群男人当着他们伙伴的面在一种团伙的气氛中实施的。在集中营和所谓的强奸旅馆，集体性的和重复性的攻击占绝大多数（联合国，1994：57—60）。在这些战争中的强奸行为的普遍曝光受到欢迎的同时，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比发生在大多数战争或大多数内战中的强奸行为数量更高一重。但在男人不仅占施害人而且在受害人中也占绝大多数的意义上，这也是性别灭绝。强

奸很可能不是男性准军事部队文化的核心。大多数暴力型男子更在意在他们的团伙面前通过杀掉其他男人来显示他们的威猛。

受到起诉的施害人大多是领导人,因此他们并不是特别地年轻。两代人占比过高。在高级领导人中,“二战”时出生的占多数。尽管在 90 年代,45 岁到 50 岁的男人会被大家认为领导着大多数社会运动,然而大多数他们的家庭也曾经是乌斯达莎或切特尼克、游击队的积极分子或受害人。生于 1946 年到 1957 年间的男人极少。然后低级领导人大都出生在 1958 年到 1960 年间,战争期间他们 30 岁出头。处在一片惨烈的谋杀性战争中的童年经历和在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 80 年代期间刚跨入成年的经历,似乎影响或促进了他们性格的形成。

4. 一些人说施害人往往较为贫困和处于失业状态,尽管精确的数据阙如;如果是这样,这有可能是由于农村的背景。确实存在对被视作富裕和拥有特权的受害人的阶级怨恨转为族性怨恨的情况。但是,准军事部队也包含中产阶级“周末切特尼克”,包括白领工人和中学或大学毕业生。另外,陆军军官协调配合了清洗行动,而部里的办公桌杀人者更加具有中产阶级特征。大多数社会阶层大概都卷入了,尽管是在不同的行动阶段加入进去的。再一次地,脏活腥活可能都留给了工人。

5. 罪犯在准军事部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靠的是他们对暴力运用的娴熟技术。我已经举了阿尔坎、贝利、吉斯卡和卡科的例子。塞尔维亚保安部门招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作为红色贝雷帽成员,如阿尔坎所做的那样。据说有大约 20 名波斯尼亚克军阀式匪徒首领。在克罗地亚人当中的有马蒂诺维奇,绰号“斯特拉”,1992 年时仅 24 岁;还有纳莱蒂里奇,通常称为“图塔”,46 岁。斯特拉后来被克罗地亚法院判处 8 年徒刑。两人后来都被移交到前南国际法庭,法庭判定他们犯有与非法对待俘虏有关的罪行。斯特拉一开始是新法西斯准军事部队帕拉加民兵组织的指挥官。图塔搞过俱乐部、开过卡西诺赌场和干过勒索保护费的营生,1992 年组建了一个“死囚营”——尽管他们其中一些是前政治犯(布洛克,1993:0;前南法庭,案号 IT -

98 - 34 - T)。瓦西奇(1996)荒谬可笑地声称 80% 的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是普通罪犯。米勒(2000)、朱达(2000:245—248)和人权观察委员会(1999)全都夸大了罪犯恶棍的作用。

然而这种狂暴汹涌、无视法律的种族战争也制造了许多流氓恶棍。克罗地亚内务部长伊万·韦基奇嘲讽地说,“牧师与修女当中没有足够的自愿者,所以我们不得不接受每一位愿意提供帮助的人”。战争为他们带来走私勒索和抢劫的机会,并把他们界定为爱国者。他们用自己的这类特长来保卫社区。更加政治化的准军事领导人讨厌他们。萨维奇(亦称“莫塞”),一位领导黑豹准军事部队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对他们发起了一场长时间的战斗。他树敌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无法说出 2000 年是谁把他给杀了。战争还因官员迅速变得富裕起来而败坏了国家和独立小国。联合国官员科温发现波斯尼亚政权与其他政权一样腐败与暴力,所以批评它是有危险的。他本人被政府部长穆拉托维奇,后来的总理,以及一般认为的战争投机商以“事故”相威胁,因为战争和经济禁运已经将走私和黑市交易提高到高度爱国主义水平。团伙匪徒已经成为为民族主义服务的准军事编队。它是一直贯穿前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科温,1999:ix—xii, 168;哈卡诺维茨,1996:68;朱达,1997:254;佩里克-齐莫尼奇,1998;《时代》,1991年11月18日)。

除了塞尔维亚之外,国家行政部门都处在形成过程之中。对新的国家功能进行私有化的动作迅速并且成本低廉。战争(物资)采购权转移到了被政府特许免于监督提供物品和服务的“商人”手中。在保护车队和商店过程中,团匪体现了有利于战争物资采购的技巧。他们成为爱国者,尽管一名萨拉热窝电视编辑嘲讽地评论说:“一群挥着党旗的傻瓜在通过转售武器、食物、油、面粉而捞钱。所有一切都是以穆斯林、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名义……干得漂亮,伙计!”(《时代》,1992年5月11日)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在南斯拉夫各国家和独立小国炫耀他们的财富。经济阶层——因政治、军事和犯罪产生的——再次在国家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民族没有超过阶级太久!

6. 很多暴行是由喝醉的士兵犯下的。酒精在谋杀性清洗中起到了它通常的作用。它激发热情,降低施害时的恐惧感受,麻痹了良心并钝化了事后的记忆。准军事部队在酒吧集中。准军事部队和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如伯比克或马拉蒂奇,吹嘘他们的酒量。关于米洛舍维奇酗酒的谣言到处都是,尽管这不是公开展示的男子气概——更多是起到一种安眠药片的作用,我猜测。普通施害人的酬劳有时就是酒精和烟草。这是一种男子饮酒文化——男人经常在喝醉时杀人、强奸的。

7. 最后,物质动机引诱了许多普通男人(并间接地引诱了他们的整个家庭)。塞尔维亚克拉伊纳的主席抱怨说:“盗贼横行。一辆坦克碾过街道将其解放,而步兵随后,因为步兵要抢劫,然后自愿者跟随卡车而来,‘清洗本区’。”预备军官花了一个月以上时间从前线“带回来一辆装满里面能装的一切的豪华汽车”(威廉斯与西加,1996:5)。一位塞尔维亚新闻记者说,第一波“解放者”入镇是捞“金子和现钞”,第二波是拿“家用电器和其他设备”,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准备拆走镶木地板,拆除窗户、马桶以及实际上一切能够用车子运走的东西的“拾荒者”。塞尔维亚人可以抢劫更多东西,因为他们解放了更多的镇子。但是其他人在得到机会时也未有一点落后(《时代》,1993年3月8日)。来自科索沃的难民在他们每一个逃亡阶段都要交付赎金。当波斯尼亚部队开始重新夺回领土时,后面就跟过来一群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穆斯林难民,他们用老式的刀枪及其他粗陋武器杀死受伤的塞尔维亚人,将他们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塞进袋子里。绝望激发了这些“拿着袋子的人”的怒火(萨迪蒂奇,1998:157)。抢劫行为导致了塞尔维亚独立小国的品行低下。领导人舒舒服服地抢得数百万,普通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抢得耐用消费品,难民拿回了部分财产,而那些保持温和的人一无所获。

423

结论:南斯拉夫清洗的结构与过程

在宏观层面上,南斯拉夫的危险是由在一系列双种族环境下的

民族—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创造出来的(我的论点 1c)。民族—国家较之于声誉扫地的联邦共产党政权看上去更有吸引力,而共和国也进行了经济收买。民族主义者又比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领先一步,把阶级冲突引向族性冲突(论点 2)。然后联邦的解散引起了针对边境地区的双种族冲突,其中少数派认为他们受到他们邻近的家乡国家的支持。相互对立的民族主义者能够从道义上和现实中盼望在同样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论点 3 和 4a)。许多塞尔维亚人认为他们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边境对面的塞尔维亚人,几乎毫无风险,后来马斯—欧文计划使每个小行政区中的种族多数更加大胆地抢夺领土所有权,像在拉什瓦谷一样。这些是论点 4b 的例证。遭遇到塞尔维亚第一次攻击后,民族主义克罗地亚领导人采取了抵抗。塞尔维亚然后攻击更容易的目标波斯尼亚(又是论点 4b),后者以出人意料的勇气进行抵抗。种族内战随后开始。

卷入的国家仅勉强地适合我的派系化和激进化国家的种族论点 5。联邦国家机构的解体开始降临,但是塞尔维亚国家的军事和安全机构牢固地存在,既没有失却稳定也没有陷入过多派系化。尽管南人民军军队中存在不同意见,但它还是处在十分牢固的控制之下。克罗地亚的“硬”国家机构处在形成过程之中,大多还在激进派统治之下。这也成为一开始诞生的波斯尼亚克国家和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独立小国家的现实。所有这些国家都被导致战争的地缘政治不稳定打乱了平衡,因此这是一幅杂糅在一起的图景。此时,激进化、受到地缘政治危机困扰又处于合并中的国家,是主要的问题。

这些可怕事件的两个常见的解释令人想起古老的种族仇恨和“恶劣的甚至是犯罪性质的领导层”(用霍尔布鲁克大使的话说)。如果放入一个更复杂的解释之中,这两个论据都不算愚蠢。旧的(虽然不是古老)种族仇恨在每个社区中被相当广泛地挑起来。但是施害人不是整个民族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或者阿尔巴尼亚人。激进化的民族主义在对立的群体中散布得非常广泛,但是它是由精英阶层、武装的激进分子和激进民族主义的核心拥护者

等挑起、操纵和强加的——尤其是受威胁的边境居民、国外移民(流亡者)和难民,以及暴力职业中的男人,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然后战争使得种族身份成为强制特征,超过所有其他身份符号。人们被迫做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不管阶级宗教和性别差异。

只有规模很小的少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或穆斯林实际参与了杀戮或强奸行为。甚至全南斯拉夫的 10 万平民和囚犯的被杀(一个高估计),也许只需要有 1 万施害人。这听上去像是不少了,但它只占南斯拉夫人中非常小的比例,另有更多的人闲荡在周围,嘲笑、大声叫嚷,充满了义愤。但是我们已在每个群体中看见过大量的行为态度差异悬殊的证据(如在其他例子中一样)。大量的不同政见者迫于激进化的压力无法公开表达意见或者逃亡,甚至被谋杀;表达悲观失望的人也被迫采取沉默形式。次要形式的参与源于一般的人类弱点。恐惧、愤怒、贪婪、伙伴关系、追名逐利、无知、伪善、道义上的怯懦以及诸如此类让更多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走上了邪恶的道路。这是集体行为,但是以不同水平的同谋性质爆发在复杂的权力互动行为之后。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比任何其他人对谋杀性清洗的贡献都更多。他开始不是这样。像许多政治家一样,米洛舍维奇只是想要权力——领导一个非共产主义然而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政权。我再回到我论点 6 中指出的几个计划风格化语言。米洛舍维奇的 A 计划是一个严密的倾向塞尔维亚人的南斯拉夫联邦。经过在一个已衰落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适应性训练,他觉得运用强制手段和暗中的犯罪行为去实现他的计划是正常的。克罗地亚的图季曼是更为真诚的民族主义者,深受他自己的被迫害经历和他对 20 世纪历史的民族主义看法的影响。他的 A 计划更加稳定:一个克罗地亚民族国家。他并未比米洛舍维奇更多地打算领导大屠杀。无论男人,还是大多数他们周围的次要的男人或女人,在当事情很明显,即继续执行他们的政策将会涉及谋杀性种族清洗时,都没有丝毫退缩。甚至当他彻底清洗了克拉伊拉的塞尔维亚人之后,图季曼一直声称是自卫。米洛舍

维奇受到一次次失败的压力,先是从军事上帮助跨边境的塞尔维亚人实现一个大塞尔维亚的计划 B,然后是一次迅速和压倒性的军队入侵的计划 C。最终,当军队不能实现这一目标时,他孤注一掷,采取计划 D,将军队炮火轰炸和带来最具谋杀性清洗的野蛮的准军事部队/秘密警察的袭击结合在一起。在波斯尼亚,他动作较小,从刚刚提到的计划 C 开始,他预计会迅速成功。然而失败让他很快升级到计划 D。在科索沃,他以计划 D 开始,而北约出人意料的反对、继而发生的轰炸使他比他原来打算的走得更远。他似乎一直在学习如何在清洗中变得更具谋杀性。但是他从未曾想过,将他自己与希特勒作比较会被人认为是恰当的。

我们再一次看到,甚至恶意的领导人也不是一开始就是那样的。他们当初保卫他们自己社区的计划遭遇了抵抗失败了。然后他们才升级行动。不管后来证明米洛舍维奇是如何情况——在 2004 年 5 月,似乎更有可能的是他将被控告犯有共同参与种族灭绝罪行,而不是具有施行种族灭绝的个人意图——前南国际法庭发现布拉什基奇、科迪奇和切尔科斯更为理性,是他们的防御观念导致了可怕的罪行。他们似乎展现了卡茨在被判犯有杀人罪的美国人中发现的某种特点的精英版:在遭遇抵抗时心生的一种挫折和羞辱感让他们除了采取骤然升级的办法外便别无选择(他们是这样感觉的)。因为他们没有必要亲自去杀人,在升级时,他们作出表面上冷静、镇定的决策,而不是表现出愤怒。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参与大屠杀的凶手。

但是谋杀性清洗不单单是他们的责任。精英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的核心拥护者都激进化了。极少有人打算或预见到他们行动的全部结果。极少有南斯拉夫人会想象到他们会成为凶杀犯。而当他们真的去谋杀时,他们还是将此认为是必要的防御或复仇行为。如果这达到了一种使他们的种族社区变得安全的清洗目的,普通人不会把他们看成是战犯,而会把他们看成爱国者。假使科迪奇在冲突初期没有不带武装地站在塞尔维亚行驶着装弹药卡车的路上,情况会怎么样?证人在对他的审讯庭上问道。对许多塞尔维亚人来说,米洛舍维奇看上去似乎还在向全世界的力量发出挑战,而塞尔维亚的

民意调查也表现出人们对这个恶棍的普遍钦佩。

他们不是以凶恶的民族主义者姿态开始的,即奉行马克斯·韦伯所称的价值理性——一种不管采取的手段如何而坚守价值观的精神。正如在其他案例中一样,他们感到为它所吸引,一直到最后孤注一掷地保卫民族的生存,在此,残忍的手段似乎既是令人痛苦的迫不得已,又是摆脱威胁和羞辱的途径。为保卫国家抛洒热血是必须的,姆拉迪奇和马库拉说。必须要启用罪犯,因为找不到牧师和修女,韦基奇说。准军事部队是唯一会提出要钱的人,塞尔维亚将军说。不是所有民族主义者都被吸引。有些人退出了。德拉斯科维奇在塞尔维亚退出,而普拉夫西奇也许在斯普斯卡共和国退出。但是大多数各个层级的领导人开始信奉一种“价值伦理”,无视韦伯所说的政治领导人的更高级任务:“责任伦理”——代表选民实现实用目标的能力。这使得他们低估了他们的敌人,后者被他们妖魔化为乌斯达莎、切特尼克和原教旨主义者。领导人和激进分子未去考虑到敌人会怎样对他们的行为作出反应。米洛舍维奇惊人地低估了他的敌人。他保卫塞尔维亚人的结果是毁掉了大多数的塞尔维亚侨民社区,制造了 50 万的陷入赤贫的难民,毁掉了塞尔维亚的经济。图季曼的政策造成大范围的克罗地亚人的死亡和面积毁灭;各个独立小国和民族主义党的领导人也给他们自己的选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而无数的南斯拉夫人也给他们自己造成很大伤害。例如他们更加地具有工具主义倾向,他们或可以看到他们本来是能够通过妥协手段实现他们更多的目的的。人类乐于认为他们是理性的,但是他们的行为总是且经常是非理性的——且有时是邪恶的。

426

霍尔布鲁克的论点暗示,改变了领导人一切就会变好。这成了美国在战后形势下的政策的基础:一旦民主选举举行,一切就会变好。因此,波斯尼亚塞族人和波斯尼亚克罗地亚独立小国将会被允许保持他们自己的军队。但是选举,就如 1990 年至 1991 年间的,为种族民族主义者带来了胜利,后者领导了战争。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这些经民主程序选举的政府奉行巩固种族清洗的政策。最后,美国和其他方面改弦易辙,推出了卡曾斯(2002)礼貌地称为委托人制度

战略的政策。事实上,这是以帕迪·阿什当为现行独裁者的威权主义统治。他比种族民主制度做得好得多。

这不只是领导的错,因为同样的过程同时影响着三个层次的角色。领导人是部分的操纵者,但也部分地是武装分子和核心拥护群的人质。米洛舍维奇已经发誓如果其他共和国阻止一个修正过的联邦,他就把所有塞尔维亚人变成一个国家。如果他催迫建立一个塞塞尔维亚就有失去权力的危险。但是许多其他塞尔维亚人受到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目标和足以实现目标的表面的军事权力的诱惑。图季曼和他的激进分子及拥护群的战略之不同在于它更具报复性而非发动性。但是图季曼的政权也是以一个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方案取得权力的,而当其受到塞族人的威胁时就很难再回头采取这一方法。然后,少数边境激进派采取挑动、说服和强制其他人延伸扩大防御性报复性暴力的范围。本阶段升级的后果是由一种准军事或军事权力决定的。一旦民间有公开辩论和选举由种族民族主义者赢取,激进派就更好地武装自己。在已分析的大多数的冲突中,来自上层和外界的暴力决定着后果,这暴力有时是由国家组织的,有时是家乡国家,有时是武装激进团伙。来自萨格勒布的武装克罗地亚人杀死了奥西耶克的温和派警长。一个路过的克族军队小分队灭掉了在梅杰戈基耶的奥斯托西基家族。在拉什瓦谷,激进派克罗地亚人受到格鲁德和萨格勒布的支持,他们从流亡者那里取得军事资源,然后通过克族军队传送。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在米洛舍维奇和南人民军的武装下,越过广阔多重战线发起侵略。每一次激进派的胜利都在非己团体受到进攻前让温和派说不出话。种族内战调动起两个社区,说服每一个国家和独立小国把更多的资源投入暴力。

越过边缘涉及我的论点7中的三个主要角色:政党—国家精英、武装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核心拥护者。他们从未构成种族清洗的大多数,但他们确实动员了选民中的大多数支持种族防御。两个相互冲突的武装防御就产生出了种族战争。意识形态对媒体的控制和占优势的政治与军事权力然后就能够在敌人(处于同样压力下)报复的

时候得到更普遍的服从。但引人注目的是其间涉及的权力关系是多么的复杂。早期,政治的民主化使得领导人和大众选民反对妥协。然后,边境地区的少数激进派和武装激进分子对结束一段时间的僵持局面起到了太大的作用。米洛舍维奇的政党国家使侵略行为升级。然后,其手段之出人意料的低效和抵抗之出人意料的力度带来大规模的升级。总体过程没有合理化,尽管行动者试图以一种工具理性的方式计算手段一目的的关系。他们失败了,而谋杀性清洗则在随后开始。

杀人者远比纳粹少经组织和训练。他们的暴力更野蛮——因此效率较差。在纳粹时代的杀人者中,他们最像乌斯达莎——对塞尔维亚杀人者的最高讽刺。动机典型属于混合型,就像科索沃舍舍利的准军事部队中的一名士兵坦白:“我是一名塞尔维亚爱国者。我为塞尔维亚事业战斗。当然也为了钱,钱是主要的东西……当时,报复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是当我们杀了科索沃解放军之后。都是那时的事了。现在我睡不着觉,我吃不下饭。它没有一直保持下来。”(朱达,2000:246)施害人骨干是相对普通的流氓恶棍。如果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年轻人都被发给枪支,去消灭人民的敌人,同时被赋予自捞一票和喝醉的权利,则有些人有可能会去伤害别人并乐此不疲。将欧洲足球流氓、美国枪支爱好者,以及该半球的秘密警察等的特征结合起来组建一支单独的准军事部队并准许他们施行种族清洗——特别是针对比他们更有特权的人——那么野蛮谋杀和强奸会在许多国家出现。政权还希望让恶棍来做这件事,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够推卸责任。又一次,世俗社会结构、过程和文化——在客观上处于危险的种族/国家格局下,通过主要是未打算或非预期的升级行为走向了谋杀性清洗。

第 14 章

卢旺达 I：进入危险区域

428

与欧洲不同的是，非洲大陆不存在一个长期的走向种族清洗的趋势。这并不是因为种族暴力缺乏。正如霍罗威茨(1985)表明的，非洲政治的基础几乎都是带有种族特点的。政党及军官的派系，代表了种族群众或实质上是种族性质的地区性团体。大多数非洲国家国力较弱，国土中几乎没有贯通的基础结构，倾向于派系主义，有些还接近于解体。它们的虚弱经常导致涉及残酷杀害对手的镇压和政变。内战带来了大规模杀戮，当不同地区出现支持不同参战方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时，这样的杀戮经常带有种族色彩。这已经发生在比夫拉湾，安哥拉、刚果、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国家之间的战争过去一般少见，但最近几年有增加。特别具有毁灭性的带有种族色彩的战争最近在中非出现，它是由本章描述的事件所引起的。

但是一个重要抑制因素是非洲国家彻底的多族性。坦桑尼亚据称有 120 个能够识别的族群。虽然它的党派和派系经常是按族群界线形成的，但任何希望取得权力的人都必须加入到与其他党的多种族联盟之中。然后精心的讨价还价就使政治家慢慢产生一种对族性的工具性观念，这典型地导致了对无份享受赐职制或分肥制 (patronage system) 的族群的歧视，它在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但是它没有鼓励对社会有机论种族民族主义的价值信奉。正如斯卡里特(1993)所说，大多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政治与低意识形态密度的多种族联盟有关。族群极少提出“领土问题”，因为国家边界极少发生争端。与流行的信念相反，殖民主义列强相当切合实际地确定了大多

数国家边界。一些分裂运动在寻求恢复殖民边界(如在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极少有族群寻求民族独立,而甚至更少有族群鼓励国家举战,以帮助边境那边的同族兄弟。“危险中的少数派”项目数据表明(至少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非洲种族冲突不如其他大陆的冲突严重,同时族性的严重歧视是很少见到的(格尔,1993)。

在大种族联盟获得新增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地方,事情会变得更坏。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权能够将互不相干的小群体粘合成一个单独的大种族身份,这导致了来自非己团体的集体敌意。在津巴布韦,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古国的绍纳(Shona)语言传播得很广,这使许多说这种语言的小族群获得了一种大族群身份。操绍纳语的人大约占津巴布韦人的 80%,有时与讲恩德贝勒(Ndebele)语言的少数群体发生冲突。两个群体组成了相互对立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反殖民主义解放组织的核心。尽管如此,这些族群比之欧洲仍是凝聚力较低的族群,它们往往容易分裂成小族性群体。在赢得对包括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以及白人殖民者的武装斗争之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领导人穆加贝在他自己的一党国家中的大族性和小族性之间玩平衡把戏(舒尔茨,1990)。他的统治,像近年来乌干达的穆塞韦尼的一样,也常与铁托长时间在南斯拉夫施行的族性之间威权主义的平衡行为相似。不幸的是,他后来放弃了这一政策,转而寻求更加残忍的方法。

在其他地方,宗教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宏观黏合剂,特别是沿着穿过北非的基督教—穆斯林“断层线”。在那里族群多样性部分地凝结成基督教和穆斯林大族性身份,后者又被阿拉伯语言加强。宗教产生了非洲最大范围的种族冲突。其他的尼日利亚种族冲突近来被穆斯林北方和基督教南方之间的极化效应冲淡,后者对国家基本的世俗宪法产生了争议(易卜拉欣,1999)。最血腥的例子无疑出现在苏丹,这里有 50 多个小族群和 114 种语言。拥有 70% 人口的北部的多样化族性,已经部分地融合成一个共同的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大族性身份。不顾来自温和穆斯林派党和兄弟会的反对,北方政府间歇

性地试图在整个国家中创建一个穆斯林国家,南方和西部的基督徒和泛灵论者将在其中扮演从属的角色。反抗遭到治安性镇压,然后遭遇无情战争和政治灭绝。30年来,这些谋杀性和导致饥荒的冲突已经耗去了200万人的生命,造成了400万的难民。大多数受害人是基督徒和泛灵论者。暴行,包括对南部儿童的奴役,还在继续,尽管越来越频繁地穿插一些时断时续的和平谈判(邓,1990;人权观察委员会,2003;第2卷,1990)。然后,2003年,冲突在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爆发。它起源于一场对处于非洲农民和阿拉伯养牛人之间的土地和水井的争夺,然后苏丹政府加入进来,开始组建和武装阿拉伯牧民民兵组织。他们的进攻将100万非洲人驱离了家园,涉及数以千计的杀戮和强奸行为——大规模的谋杀性种族清洗。它不是以宗教为基础的,因为双方都是穆斯林(人权观察委员会,2004)。苏丹依然是非洲大陆两个最严重的种族冲突案例之一。它们再一次揭示出种族冲突升级到种族清洗的危险区时的状况:两个大族性群体提出一种看似合理并且能够实现的将同一片领土归于自己的国家主权的要
430 求。但是唯一的充分展开的种族灭绝案例和最严重的政治灭绝案例都是发生在另一个重要案件中——在中非大湖区的两个国家非同寻常的双种族环境之下。

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政治灭绝和种族灭绝

在本章中,我试图解释发生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轮番展开的谋杀性种族清洗行为。在布隆迪,大多数对被杀人数的估计是:在1965年间低于5000,1972—1973年接近20万(最高占总人口的5%),1988年时是1.5—2万,1991年是1000—3000,而1993年接近10万。从那以后杀戮行为继续以不规则的势头出现。估计在20世纪的最后六年里又有10万人死去。1993年之后约有37.5万布隆迪人逃往国外,同时约有40万人逃往布隆迪其他地方。受害人绝大多数是胡图人,而政府依然为图西人所控制。两个族群然后就退避到两个相互隔离和军事化的世界当中(莱利,1997:695—697)。到2003

年还有大约 30 万人住在坦桑尼亚的难民营,另有 30 万失去家园的人住在布隆迪境内。但是一个与胡图人主要叛乱集团的联合性的权力分享协议终于经谈判在该年达成,尽管第二个叛乱集团拒绝在上面签字。如果政府执意坚持,那么数十万的难民就要返回家乡,然而当发现已经有其他人居住,那怎么办?

卢旺达死去的人远远更多,他们绝大多数是图西人。政府由胡图人把持,直到 1994 年夏天。估计 1959 年有 1000 名图西人被屠杀,60 年代中期有 2 万,1990—1993 年有 2000—10000 人。杀戮顶峰出现在全面展开种族灭绝的 1994 年。从 4 月 7 日开始,仅仅 11 周之后,差不多有 50 万人被杀,每小时杀 300 人的速率。这次行动清除掉了当时居住在卢旺达的所有图西人的 75%——世界上所见过的最快和最彻底的种族灭绝。先于种族灭绝发生并随其开展的是政治灭绝,针对的是被当作新政权的政治对手的图西人和胡图人。这些受害人可能总共有 1 万人。种族灭绝在一支入侵的图西人流亡者军队——卢旺达爱国阵线(RPF)——推翻了施害的胡图人政府之后,才告结束。爱国阵线以它自己的屠杀行为进行报复,杀死了大约从 2.5 万到 10 万胡图人的平民或战俘(数字来自布雷克曼,1994:312;德福奇,1999:15—16;戴维斯和皮奇,1995—8;勒马钱德,1997a;非洲统一组织,2000:第 22 章;普鲁尼尔,1995:199,261—265;蒂本,1995:58,76)。

在所有这些突发事件中,大批的受害人也迫于压力向外移民逃离,大多数是逃进了边境对面简陋的难民营。这些人通过组织游击队返越边境进行偷袭而滋生出更多事端。1996 年有 200 万来自卢旺达的难民和大约 30 万的布隆迪难民待在那里。他们的许多营地被以前从事过谋杀性清洗的官员和准军事部队控制,他们返越乌干达边境发动袭击并将他们的谋杀技巧运用于扎伊尔—刚果内战。他们在过去的七年里已经杀死了大约 100 万至 200 万人。他们仍在肆虐。迈克尔·瓦格纳(1998:25)留下了在扎伊尔某条路上遇到一个年轻士兵的生动记忆:

穿着军队劳动服,那是一张小男孩的坚决的脸——他是兄

弟同胞中唯一的幸存者——他现在是一名童子军(kadogo)。他的AK-47冲锋枪束在背上,用全心全意的忠诚和一个受过创伤、将指挥官视为父亲的孤儿的毫不受限的邪恶,服侍着他的军官——他在世上剩下的唯一的“家人”。

事情还不算完。现行的卢旺达图西人政府制定了一条处于和解与报复之间的令人不安的路线。在2003年夏天它赢得了一次压倒性的选举胜利,但是部分地是因为它已经取缔了大多数胡图人团体。图西人控制着政府、城镇和货币经济;胡图人大多已被迫退回到温饱型农业当中。对图西人来说,箴言是“我们处于绝境。除非我们保持绝对控制,否则他们下次就会压倒我们”;而胡图人说:“我们只需要等待,人数上对我们有利。”(普鲁尼尔,1997:9—10)在布隆迪只有有限的联合性的权力分享。图西人政府正在将某些侵占的权力转交给合作的胡图人党派。不过,两个主要的胡图武装叛乱团体之一拒绝支持协议或加入权力分享。两国的局势依然紧张(《人权观察委员会》,2003)。

卢旺达和布隆迪只有两个重要的族群(侏儒特瓦人只占卢旺达的不到1%)*,而每一个都能组成自己的国家。在以上冲突开始之前,胡图人占两个国家人口的85%,图西人约占15%。虽然有25%的卢旺达人在他们的八代祖宗中既有胡图人也有图西人,但几乎所有人都情愿将自己视为要么胡图人要么图西人。两国人口较少,居住稠密,这在非洲也不一般,它们拥有良好的交通,可以进行高强度的国家调动。两个族群在两国都组建了可以生存的国家,胡图人依靠人数,图西人靠占优势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双方都形成了在其他谋杀性环境下看到的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胡图人把自己视为受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强烈要求实行多数主义民主,并保护它不受一切威胁。图西人,作为以前的帝国民族,现在受到民主的挑战,感到受到威胁同时应当捍卫一个更文明社会的水准。两者都对同一片领土提

* 特瓦人,Twa,非洲俾格米群体之一,平均身高1.5米。

出对立的看似合理和可以实现的国家主权的要求。

因为图西人是这样一个小规模少数裔群体,他们不可能以种族灭绝作为目标。他们更喜欢让胡图人保持下等阶层的地位。最激进的图西人的目标只是政治灭绝,即根绝所有潜在的胡图人领导精英阶层中的成员。因此布隆迪事件不能严格地被称为种族灭绝[尽管勒马钱德(1995b)和纽伯里(1998)这样说]。对大多数裔群体胡图人来说则不一样,他们的最激进的激进分子试图扫除图西人,而在卢旺达他们几乎实现了目标。两个群体在两个国家中也都是相挨着住在一起。这将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鼓励宽容甚至是多元文化的因素。然而如果敌意确实在两个群体之间产生,那么运用地区性的权力分散和邦联形式作为解决方案就不现实了。联合主义或可做得更好,在此每个群体的权利都在宪法、议会、行政部门和武装部队中得到了保证。但这是一个在民族—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中的不寻常的政治理想。

独立前的卢旺达—布隆迪

如在其他案例中一样,这样的恐怖不是古代或原始对抗的重新出现。胡图人和图西人自古以来就没有相互争斗。虽然少数新闻记者随意地将种族灭绝写成传统或最早的宗族主义的复活,但没有专业学者这样写过。尽管如此,这些都是古老的族群。事实上,甚至这与生物学也有关系,因为存在影响着血型、镰状红细胞和乳糖消化的一般基因型和表现型差异。如今大约有一半的卢旺达人能够在见面时被认出是胡图人或图西人,胡图人体型相对较矮而更宽(平均有12厘米的身高差异)。胡图人通常被划入个矮体宽的班图民族的一部分,而图西人被与其他个高体瘦的民族分在一起,对这些人的常用称谓“含米特人(Hamitic)”或“含族人”是有疑问的,因为这两个词起源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旧约圣经而后被欧洲的种族主义理论采纳。但是图西人家庭更主要的是养牛的,而大多数胡图人是种庄稼的。胡图人很可能是本区更古老的农业居民的后裔,而图西人来自于养

牛的移民,他们在15世纪时已成立了让大多数本土居民臣服的王国。图西人身份可能本已确定,但它不久就开始表示“统治者”。但是胡图,意指“被统治”,很可能是后来图西人国家的一个创造,脱胎于许多土著民族(马姆丹尼,2001:第2章,对这些事情作了最好的叙述)。

但是后来的历史变得更加复杂。图西人国家仅统治着卢旺达现领土的中部核心,并且是与更小的独立的胡图人国家一起。但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建立在一个氏族模式之上,而胡图人被承认是与图西人属于一样的氏族。两个群体在400年的文化同化中互相影响,形成了共同的习惯和单一的卢旺达语言。但是不同家族种族通婚的影响因为异族婚姻的子女归入父亲一边的族性的社会规范而减损(博尼姆帕,1999)。到20世纪,胡图人与图西人知道了他们是谁,而图西人被明明白白地排在胡图人之上,这引起了混杂着阶级与种族不满的间歇性冲突。但两个族性都包括富人与穷人,强大的和受压迫的。有些胡图人向上流动,结果被归入图西人。所以种族身份是牢固确定的,然而受到阶级的限制并且仅具有有限的政治意义——正如第2章指出的,它是历史社会中的准则。

德国人的统治(1908—1924)和比利时的殖民主义统治(1924—1962)使得族群意识更加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像其他殖民主义政权一样,他们认为自己与跟他们对峙的族群在种族上是完全分开而独立的。对比利时人来说,图西人已经具有欧洲人的一些秉性,然而他们是黑人——所以他们肯定是来自北方(埃塞俄比亚或甚至中东)的古代含米特人征服者的后裔,后者曾把一种更加先进的“封建制度”强加给“原始的”土著胡图人。种族增添了更多的关于优越/低劣的永久性归因。比利时人借图西人权贵阶层之手实行统治,而两个群体之间权力资源的平均差异扩大了。比利时人减少了能够享有政治职务的氏族的数目,降低了胡图人领导的氏族的作用地位。95%的行政部门人员,即全部45名酋长中除去2位以及全部559个副酋长中除去10位,现在都是图西人(德福奇,1999:37)。许多图西人和胡图人将这一种族模式内化了,而胡图人不得不试图让他们自己摆脱

433

那种意识,即图西人可能比他们更加优秀(马尔基,1995:82—86)。比利时人也固化了种族政治法律和教育特权,降低了种族流动性。从1933年起,每个人都携带一张说明他是图西人、胡图人还是特瓦人的身份证。60年后这成为种族灭绝的致命帮凶。

因为比利时人将欧洲—非洲的种族区分看得比非洲人当中的任何区分都重要得多,胡图人与图西人就彻底地处于被征服状态。所以当比利时人的统治削弱之后,他们共同携手要求自由。他们的氏族和地区性归类成为通常由图西人领导但能动员两个族性的政治党派。比利时人比法国或英国人影响过渡期的非洲政治制度的手段少,同时他们在那里也没有珍贵的矿产需要保护。当受到压力之后,他们只是离开,几乎没考虑过后殖民主义制度。这是悲剧性的,因为比利时本国具有联合主义精神:弗兰芒和瓦隆人法语社区权利牢牢确立在宪法中并体现在中央国家中。这种形式的宪法本可以在两个殖民地中发挥作用,在很可能(如果民主的话)由胡图人主导的政治过程中确立图西人少数裔的集体权利。

第二次殖民主义升级来自比利时政策的一个转变。到50年代末比利时面临要在其殖民地转而施行多数主义民主制度的压力。“一人,一票”,“多数人统治”是当时大陆和整个世界的解放组织的口号。联合国和两个殖民地中的天主教及新教教会开始对由人数较少的比利时和图西人少数裔对胡图人大多数裔群体的统治不满。两年一次的联合国对殖民地的检查给胡图人壮了胆,而进步的社会天主教徒(Social Catholics)则通过学校和工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当殖民地接近独立之后,卢旺达的比利时人——比在布隆迪的少得多——开始把赞助方向转移到大多数裔胡图人身上。开放教育与公共就业造就了对比利时的地方历史观持反殖民主义看法的年轻胡图人。他们将图西人看作是早期的封建殖民主义者。在胡图人难民营中,马尔基听到一个旧的反殖民主义故事的新编版:异族的图西人以“诡计”和暴力从“合法的土著人”或“人类”手里“偷去”了土地,这些人被图西人重新起名为“胡图人”——图西语中一个表示“奴隶”或“仆人”的词汇(1995:58—71)。胡图人精英阶层曾谈及自己为

“土著”和“无产阶级”民族。他们说大多数人民现在必须统治实际上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一关键表述,普鲁尼尔说(1997a:403—404),开始具有编码意义,即“一个人必须是胡图人才能被允许进行统治,以及以大多数人民名义进行统治符合民主的自体论意义”。这是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的翻版,此处潜在地产生了这样的要求,即图西人,居民但并非真的土著,应该被免除享有公民资格。胡图人在设计一个看似合理和有可能实现的属于自己国家的主权声明,以替代昔日的比利时—图西国家。

后殖民主义政权

1959年,比利时统治开始动摇了。卢旺达人对经济的不满导致了一次胡图人的暴动。博尼姆帕(1999)称之为农民起义,像那些伴随法国或俄国革命出现的情形一样。图西人统治阶层回应以镇压,它使得上述人们不满的经济性质减少,更多地带有了种族和政治的形式。由一个图西人青年团体的成员对一位胡图人领袖采取的谋杀行动带来了一次大爆炸,数百名图西人被炸死。纽伯里(1988:第9—10章;1998:13)说暴力是针对受过教育及政治上强大的图西人氏族,而不是图西人整体。图西人中的自由派也以两个族性中的弱势群体代表身份进行鼓吹煽动。然而大屠杀强化了种族极化效应,胡图人称它是“巨大的解放,而这在图西人记忆中却是灾难”(博尼姆帕,1999)。他们使1万图西人惶恐不安,从而被迫选择向外移民。1961年胡图民族主义者夺取了卢旺达国家的非洲部分,很可能是得到了比利时人的同意。比利时人次年撤出,留下胡图人控制国家而图西人抵抗政治游戏的新规则。

这引发了两国间往来关系的逐渐升级。卢旺达政变给布隆迪的图西人权贵留下了创伤。他们决定当独立到来时不放弃权力。1962年的暴乱与谋杀使得一个图西人准军事青年团体(JNR)与胡图人天主教工会成员发生互斗。1965年大屠杀在胡图士兵的一次起义失败之后发生。图西统治集团对胡图人的军队和行政部门谋杀性的清

洗,激起了胡图人的报复性谋杀,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来自图西统治集团的军队镇压行动。但是一些图西人自称是现代文化多元主义者,否认少数人统治涉及种族歧视。他们坚称(足够合理)一个政治多数,而不是种族多数,是拥有健康的民主制度的关键,而他们刻意培养能够给予他们多数支持的胡图扈从,这导致了倡导节制和倡导镇压的对立图西人派别之间的,以及心怀不满的胡图民族主义者和想通过现存教育与职业结构获得成功的不关心政治的胡图人之间的政治冲突(勒马钱德,1995a:76—105)。

图西人当中的分裂鼓励了胡图民族主义者的抵抗。在第二次升级的国家间关系往来中,来自卢旺达(及扎伊尔)的胡图难民提供了许多武装激进分子。他们的行为使得图西人中的权力被转移到了喜欢镇压的派系当中。因为图西人垄断了国家暴力,镇压能够在短时间内发生作用,而调解就比较不确定。从此事态开始急剧向下发展,直到1972年爆发可怕的布隆迪大屠杀。在复杂的派系主义中,背后也有一个种族极化的逻辑,它根植于两路激进派的相互挑衅,每一方都引起来自另一方的激进的反应,加强了相互在自己群体中的动员力量。图西人垄断了军事权利(并还能将陆军武器调给准军事部队);胡图人有主导任何民主形式所需要的人数权重,因此两路激进派都有看似合理的不妥协战略。

布隆迪也影响着卢旺达。布隆迪图西人实施的镇压让卢旺达的胡图人激进化。虽然1962年新的卢旺达国家被胡图人控制,但它的多党制度让许多胡图人感觉到国家被分裂了。1973年的一次军事政变导致由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把持的一党制独裁统治。他21年的政权将“多数主义民主”和“胡图力量”口号奉至神圣地位。所以在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两国互相陷入了严重的种族歧视状态之中,而做戒性镇压和不时地强迫移民行为成为它们的支持手段。因为两国一模一样,它们相互施加“强大的示范效应”,加大了两个族群之间相互的不信任感(欣特珍,1999:279;勒马钱德,1995b:407;非洲统一组织,2000:3.23—3.29)。边境地区经常对挑起事端起到重要作用。他们的居民觉得受到威胁,愤怒的难民中产生了更多的种族暴力施

害人。正如我们在地图 14.1 中看到的,布隆迪激进派大多来自与卢旺达交界的北方边境地区(从相互的冲突中交换胡图和图西人难民),在较少程度上来自与扎伊尔边界相邻的地区。1988 年和 1991 年的布隆迪大屠杀,以及 1993 年主要的胡图人选举胜利发生在那里(勒马钱德,1995a:120—122,153—155;雷恩特珍,1994:55—61,232—245)。我们会在后面的卢旺达种族灭绝中看到同样的模式。

两国小心谨慎地不去招引对方怨恨。相反,欣特珍指出(1999),出现了一个“先发制人、报复内化的恶性循环”。与去帮助他们的受迫害的同族同胞相反,每个政府都在它自己国内进行报复,直到 1994 年,此时图西人控制了两边的政权。非统(2000)说,这两个国家是否从未愿意相互举战,这依然像谜一样。但是,这种现象表明族性并非如此凸显,以致它要凭借行动者不计代价、不管手段地忠于他们的族群,创生出价值理性(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或者一个超越性的种族意识形态。去削弱种族团结的思想意识是对政治权力的工具理性运用的表现形式。胡图人多数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或图西人的文明只是以控制自己的国家为目标。国外的同族同胞的困境让人哀叹,但这不成其为发动战争的理由。战争将因很好的工具理性而被避免。只要国家依然保持稳定,他们的精英就很可能这样思考。

但是在像以上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力也带来了相当大的经济收益。非洲学者已经注意到“世袭的”或“受俸的”国家,由一个一举在大陆取胜的“社会特殊阶层”统治着(例如,易卜拉欣,1999)。位于中部湖区扎伊尔/刚果的蒙博托和卡比拉政权以其特殊阶层的腐败而最为臭名昭著。但是卢旺达和布隆迪也受到了影响。受益于越来越多的外援,两个非常贫困的国家经济都取得了进步。在卢旺达,外国援助在哈比亚利马纳攫取权力时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1991 年它已上升到 22%,占国家资本预算的 75%(非统,2000:段落 4.20)。如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援助与投资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国家和准国家机构输送的。“在卢旺达,像在非洲其他地方一样,国家

是新权贵阶层虽非唯一但却主要的快速积累财富的渠道。”(尤文, 1998:21—23,40)这些权贵很不寻常地竟是单一种族——在布隆迪绝大多数为图西人,在卢旺达是胡图人。哈比亚利马纳自己的权力据点甚至面积更小,仅仅根植于卢旺达 11 个省份中的一个,即基塞尼省的受保护人网络中,尽管也在向周边的西北省份鲁亨盖里扩散。

这里涉及一个权力在胡图人中的地区性转移问题。以前的胡图人政权(卡伊班达的政权)的权力根基在中南部的吉塔拉马省和布塔雷省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一个来自西北的赐职/腐败制度将国家和发展援助资源分配给了一个受宠的胡图少数,赶上并大大超过了图西人权贵阶层以商业为基础的财富。因为政治权力是通向财富的道路,所以卢旺达胡图人不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民族。但因为只有少数胡图人能够在萧条时期贪婪地狂吃滥饮——主要是城市受过教育的西北部人,普通的胡图人依然比一般的图西人穷,所以胡图人有接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可能。而在所有的卢旺达千丘酒店*中,普通警察、学校工友、国有化公司工人及其他人是很少能来大吃大喝的人,他们的工作与政治阶层有关。虽然贫穷,但他们比那些从不大吃大喝的人生活要好。受保护网络能够动员数万人。种族不平等在布隆迪更加显著,这里图西人权贵阶层还垄断着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经济权力关系将被证明是种族灭绝行动积累过程和付诸实施过程中的关键。重要的是不要过分夸大种族意识形态在以上两个清洗案例中的意义。还有一个种族经济。但这不是族性超过阶级;它是两者的混合,这样阶级的利益就隐藏在种族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背后。

437

438

1959 年的凶杀引发了难民的流动;歧视与暴力使之继续。这些流亡者包括许多构成图西帝国主义核心的前士兵,他们计划入侵卢旺达。他们在 1963 年和 1967 年的前两次进攻的失败导致了针对卢旺达图西人的报复性暴力浪潮。有多达 2 万名图西人在那些年被当作所谓的人侵者同谋杀害。1973 年,随着哈比亚利马纳的政权将图

* mille collines, 法语, 千山之意, 寓卢旺达国家特点, 后该词被用指酒店。

西人清洗出公共部门,另一次暴力行动爆发了。截至70年代末,有将近50万图西人逃离了国家。但是公共部门已将图西人大都清洗了出去,1979年到1990年间几乎没有发生杀戮行为。如果两个群体都接受了大家默认的权力分割方案——胡图权贵控制国家和发展基金,图西人保留对大量非国家的私人经济的控制权——然后有可能进入标志着后殖民主义时代的非洲的大片地区白人与黑人之间权力分割特点的可疑的共存状态。现在两个群体都分裂了。胡图激进派坚持认为非土著图西人应当被彻底取消公民资格。但是哈比亚利马纳政权掌握权力,它允许余下的图西人拥有公民权。它甚至发起种族修好,只要胡图人控制着公共领域,以及不让图西流亡者回来。在图西人这边,那些呆在卢旺达的人接受这种优势。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没有理由担心种族灭绝的发生。

升级的种族冲突,1985—1993

然后卢旺达感到了三股外来的连接在一起破坏稳定的压力——来自布隆迪、来自图西人入侵和国际社会。在布隆迪,图西人政权通过致命的镇压手段紧抓住权力不放,同时允许一些胡图人进入他们的政治保护主义网络。极少人被允许进入军队,后者的枪杆依然是图西人权力的坚强保障。两个族群中的种族意识都提高了,先在城镇开始,然后向农村传播。与卢旺达不同,杀戮行为具有一种对等的逻辑:血腥的胡图人起义甚至遭到更加血腥的镇压,而图西上层的目的在于根除受过教育的胡图人,直到使他们保持在中等教育水平,以便终止政治反对派的存在。这是以种族为目的的政治灭绝,以军队和主要图西人党的青年团体为领导,而来自卢旺达的图西难民、学生以及甚至在校学生则被卷入其间。图西上层的目的不是将国土中的胡图人清洗出去。他们需要一个下层阶级。胡图极端主义者试图夺得国家控制权,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然而在某些地区,杀戮确实使得种族暴乱急剧上升为地方种族灭绝事件。很多胡图人逃进了卢旺达。一些人组建游击队打回布隆迪;其他人被并入了卢旺

达政治中的下层,接受了胡图激进主义(勒马钱德,1995a,1995b;雷恩特诊,1994)。

1990年的图西人入侵是对种族和解的最大打击。它来自乌干达,一个不会遭遇反击并且想除掉滋生事端的图西人的国家。图西流亡者曾构成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乌干达内战中穆塞韦尼的获胜军队的关键部分。他们可能在乌干达定居下来,与其他说卢旺达语的民族住在一起。但是大多数乌干达人怨恨他们,并阻断他们在公共部门的晋升并拒绝他们提出的擅占地者之土地权利的要求。图西人面临被迫返回卢旺达的压力。穆塞韦尼总统非常想摆脱这些不受欢迎的武装士兵,所以提出帮助他们组建一支军队,即卢旺达爱国阵线,去重新征服卢旺达(马姆丹尼,2001:第6章;奥图努,1999)。军队于1990年10月从东北侵入乌干达(见地图14.1)。这次进攻组织草草,很快就被击败,但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在整个1991年沿乌干达边境重新部署,1992年和1993年以更大的成功进入卢旺达。这阶段仅有法国对胡图人政权的军事援助将卢旺达爱国阵线阻退回来。

这场战争使得胡图人力量意识形态更加受欢迎且更加带有种族主义性质。图西人再一次表现得像是外来的针对卢旺达的土著胡图民族的入侵者。战争对胡图政权提供了“夜雾”(might and fog)机会*,特别是对在西北的胡图力量激进分子而言,他们受到的人侵威胁最大。在战时检查制度和戒严令的掩护下,基于战时爱国主义的合法行为,他们将图西人集中起来,并经常把他们以及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其他同谋杀掉。许多年轻的图西人逃往北边加入到侵略者当中。在1990年到1992年,有20万胡图人逃往南边,还有100万在1993年到来之前逃离。有高达七分之一的人口现在无家可归、痛苦不堪。双族性依然是以图西人被陷在胡图人的后方的形式存在(马姆丹尼,2001:186—192;梅尔维恩,2000:57;非统,2000:段落6.20)。然而战争是发生在两个秩序适度的政权之间。卢旺达爱国阵线形式

* 这里所谓的夜雾,可能借用1941年希特勒的夜雾指令的含义,即趁夜雾逮捕相关人员。

上是多元文化,而哈比亚利马纳依然愿意统治图西人。国际压力——运用发展资金的激励手段——将它们带到 1992 年坦桑尼亚阿鲁沙的谈判桌上,1993 年双方签署了临时的权力分享协议。

但是还有破坏性的国际压力,首先是经济的,然后是政治的。随着 1985 年之后世界商品价格暴跌,1989—1990 年咖啡价格下跌了 50%,而锡和茶叶的价格下降较缓。经济陷入瘫痪,1990 年哈比亚利马纳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严格的结构调整方案,以便获得贷款资格。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急剧地使形势恶化,使得几乎每个家庭都遭受了重大的收入损失(非统,2000:第 5 章;尤文,1998:第 4 章)。对政权的不满加大了。农村的失业和负债迫使年轻人拥向城镇,闲在街上不顾一切地等待着任何经济机会。全国民主革命运动政权试图让自己忙于公共工程项目。经济困境增加了不满,但没有必要的理由非要将这责怪到图西人的头上。然而存在更多的间接联系。经济不满削弱和破坏了政权的稳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对处于这类环境下的种族关系是危险的。

440

政治压力来自“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崩溃,它增加了对追求西方式的民主的压力。布隆迪和卢旺达政权——在无论如何都存在的国内压力下——都作了让步,允许其他党参加选举。正如我已经强调的,如果政党是通过族性组建的,则民主会鼓励种族关系紧张和暴力。在布隆迪,国家压力使图西人政权有在 1993 年输掉总统选举的危险。一个以图西人为主的党,以总统为首,面对着一个胡图人为主的党。图西上层大多数似乎自信“他们的胡图人”会抵抗“极端主义者”,然而投票充分地沿着种族界限进行,从而确保了胡图人候选人的轻松获胜。虽然图西总统接受失败退出,但图西军队不接受。因为军队的大多数是由害怕他们的工作岗位被胡图人占取的穷困图西人组成的,他们谋杀了新总统,组建了他们自己的政权,并有系统地杀害了支持新政权的胡图人和图西人。这种政治灭绝再一次助长了胡图人向卢旺达的被迫移民,在卢旺达他们又一次提供了下层社会的胡图力量激进分子。

卢旺达在 1991 年已经通过采取多党制宪法对国际压力和国内经济不满作出了回应。卢旺达拥有一个高度发达、有社团生活、能够提出不同政治方案的市民社会。协会、集会、期刊和小册子到处蓬勃发展(恩森吉马纳,1995)。哈比亚利马纳使他自己的党——全国民主革命运动(MRND)在选举中显得更加友好。激进的胡图力量党派也出现了,即著名的保卫共和国联盟。这些对全国民主革命运动带来了压力,引起它的一些派别走向激进化。温和党派强调阶级甚于强调种族不平等,试图不但征召胡图人也征召图西人新兵,以便阻止战争。阶级吸引力是将图西人与胡图人的不满与特殊阶层的剥削联系在一起显然的办法。但是这涉及身处与敌人卢旺达爱国阵线谈判的危险游戏中的温和派。然而当社会主义对阶级的吸引力数十年前已为非洲接受的同时,现在的社会主义则是处在国际性的衰退之中。随着政党更少地以阶级为基础而远更多地变成保护主义,被保护者动员种族—地区联盟,冀图能在竞选胜利后捞得一官半职,非洲社会主义已趋于衰落。

441

非洲激烈的党派竞争经常引发由党内青年团体领导的街头暴力。占统治地位的全民主革命运动党将一个街头儿童的足球俱乐部组织与一个青年公共工程项目合并,产生了一个举行示威游行、扰乱集会的青年团体。这些活动提供了接受低水平暴力训练的机会,它之后逐步升级到对被谴责为侵略者同谋的反对派的身体攻击(雷恩特珍,1995:57—58;瓦格纳,1996:30—33)。坦比亚(1996)和布拉斯(1997)已经洞察到在激烈争执中的选举和发生在印度、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种族暴力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关关系,后者有雇来的暴力的年轻人群体参加。卢旺达现在呈现出一个多少是极化的社会,一种侵略性,一个失去一党控制权的政府以及暴力的增长。选票至上主义变得令人难以忍受,青年团体之间的争斗在一些省份造成了公共秩序被破坏。成千上万的人现在认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哈比亚利马纳的威权主义政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和平安定,但是民主化正使得事情恶化,就像我的论点 1c 中讲的那样。

在这些压力下,哈比亚利马纳政权开始分裂,如我的论点 5 中所

述。1992 年反对党领导人获准进入联合内阁,而不同的部长奉行不同的政策。总统认为军事威胁已近在眼前,所以他在坦桑尼亚阿鲁沙举行的国际和平谈判中作出了让步。但是他的代表团的表达语无伦次。他的“小房子”成员(见后文)知道任何经谈判与敌人达成的权力分享都会终止他们作为特殊阶层的统治;他的反对党成员想要和平;总统处在他们之间犹豫不决。他们的不相一致导致了 1993 年 7 月联合政府的倒台。一个临时的残余政府,没有经过清楚的选举任命,还是签署了阿鲁沙协议——但仅幸存了一天,就进入了种族灭绝时期。卢旺达爱国阵线,自认为它正在赢得战争,坚持苛刻要求毫不退让。哈比亚利马纳由于害怕失败,最终接受了要求。

然而阿鲁沙协议超出了许多胡图人能够忍受的限度。他们不让激进的胡图力量党参与权力分享。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尽管事后聪明是容易的),因为如果协议生效的话,他们将失去一切。全国民主革命运动也将失去它对内阁的控制权。最严重的打击是军队将变成 60% 的胡图人,40% 的爱国阵线,但是军官团各占一半。这将意味着使军中 2 万胡图人复员,进入失业状态,他们中大多数是年纪轻的没有继承权的子女。不仅是胡图强硬派拒绝接受它。在不止一个场合,哈比亚利马纳通过拒绝和平接受他自己的外交官刚刚同意的协议而倾向激进派(琼斯,1999)。现在,这不是一场固定的两边的斗争,而是一场不固定的发生在分裂的政权、同样陷入派系化的胡图反对派和图西流亡军队之间三方的斗争(加萨纳,1995;非统,2000:第 8 章;普鲁尼尔,1995:99)。执行协议建立的基础是,每一方须是一个能够让它自己的人(民)能够行动一致的协调角色。卢旺达爱国阵线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是一支军队。但是无论卢旺达政府或反对党都不能,因为他们现在都受到了内部激进派分裂派系的困扰,因而对协议的意见存在分歧。协议是建立在一个温和的政治中心已在卢旺达构建起来的前提之上,但这个前提在种族动员和军事化的压力之下正在解体(卡迪奥加拉,2002:492)。联合国安理会也不愿意用军事力量来支撑协议。再一次,危险不是由一个稳定团结或极权主义的国家,而是由实力在削弱以及在本案中受到派系主义和激进化

困扰的部分民主化的国家表现出来的。

种族灭绝如何预谋？小房子和事先计划

大多数观察家把1994年4月开始的种族灭绝看成是经胡图激进派权贵高度组织和预谋的行为。欣特珍(1999)着重强调这一行动的缜密规划,并不断地将它比作纳粹的大屠杀总体计划。德福奇(1999:95—128)认为严密的总体计划是在1990—1994年间形成,1990年入侵之后不久开始孕育的。雷恩特珍(1996)说1991—1992年的“杀手小队”的形成是对种族灭绝的一次“彩排”。普鲁尼尔认为到1992年中“种族灭绝方案是先由骨干阴谋家拟好大纲的”。朗曼(1999:352)发现了一个总体计划,但认定的时间较为靠后,约在1994年1月左右。类似观念主导了设在阿鲁沙的联合国战争罪法庭上的起诉案件。因为我们知道最终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很容易会将以前的升级行为看作是一个单一的计划好的过程中的阶段。但这是误导。更加可能发生的是,随着政权失去凝聚力,继而失去它的总统制国家元首,以及它遭受一次政变并被重建后,它经历了一种几乎无人预料到的激进化过程,但它同时也是与普通胡图人中的情绪激进化过程平行发生的。然后种族灭绝(方案)由出于机会和威胁的激进派精英和激进分子临时搬出来。它不是像计划A一样经长期酝酿而形成。不独我一人持这一看法(马姆丹尼,2001;博尼姆帕,1999;非统,2000:第7章)。但是在对这类争议进行裁定之前,我们必须重构种族灭绝的发生过程。

大多数研究者将种族灭绝看成是由在占统治地位的全国民主革命运动政党内部的领导小集团,习惯称之为“小房子”,预先谋划的,后来得到了其他胡图力量派系的帮助。〔1〕1998年的联合国战争罪

〔1〕我接受了这一通常看法,但带着些许不安。“小房子”是一个严密的网络,其许多成员是胡图力量激进派。但是我没有看到直接证据证明它实际上组织了种族灭绝。我的不安得到马姆丹尼的支持(2001)。

法庭的一项指控指向一个涉及总统自己的全国民主革命运动党的18位高级官员的阴谋。据称,从1990年年末一直到1994年7月,“他们阴谋制订了一个以根绝图西平民从而清除反对派成员为目的的计划以便能够继续当权”(《独立新闻通讯》,第46期,1998年9月18日)。图西人入侵导致激进派催迫采取更多的极端措施。少数人转而敦促消灭所有图西人——入侵者的同谋:15年内图西人三次入侵,使得必须采取某些比仅仅强制向外移民更严厉的手段,因为流亡者回来了,武装起来了。只有大屠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承认他们正在打破道德禁忌,但是又感到杀戮是自卫——保卫土生土长的无产阶级民族的多数主义民主制度。

作为一个特殊阶层,谋划者也具有经济动机。“小房子”起初是作为哈比亚马纳的妻子的家族资助网络而出现的。屈从的历史学教授通过将其家谱追溯到前殖民主义时期的胡图人的亲属关系(欣特珍,1999:259)而赋予其合理性。“小房子”以基塞尼省为中心,单单后者一个地方就提供了国家三分之一的高级政府官员、大多数的军队和保安部门的高级军官以及大量的大学教授和毕业生。相邻的鲁亨盖里省在这些精英职位中也占比过高(德福奇,1999:47,71)。然而“小房子”权力受到内战中隐约出现的失败危险的威胁,受到阿鲁沙权力分享方案的威胁,还受到将同时给予对手赞助的多党制度的威胁。

意识形态权力

部分是出于意识形态信念,部分是为了保护他们作为特殊阶层的地位,一些“小房子”成员正在将1990年图西人入侵之后的四种权力来源激进化。最严重的激进化发生在1993年8月的阿鲁沙协议之后。甚至在骨干谋划者当中,胡图人激进化也是对真实的图西人威胁的一种回应。在意识形态权力领域内,“小房子”成员以激进化作为对1990年10月入侵的回应方式。他们开始谴责所有做为敌人同谋的图西人,以及反对总统的胡图人。三个宣言引人注目。1990年入侵发生后不久,由哈比亚利马纳私人秘书和陆军参谋长拥有的

444

时事通讯《康古拉》*，发表了致胡图人的“十诫”。其中有三条劝戒胡图人应当停止与其他种族的成员发生性关系，取得对“每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权力的控制权，以及“停止对巴图西人（即图西人）的仁慈怜悯”。1992年9月，接任的参谋长，同样来自基塞尼省，在特奥内斯特·巴戈索拉上校的帮助下（更多关于此人的内容见后文），发表了一份备忘录，以帮助军队认出它的敌人。备忘录将卢旺达爱国阵线与总体的图西人等同起来，后者正试图将“公共舆论从种族问题引向富人与穷人间的社会经济问题”。敌人被列举为图西难民、乌干达军队、国家内部的图西人、有图西人为妻的外国人、“本区讲尼罗—含米特语的民族”、“胡图不满现状者”、失业者和逃亡的罪犯。备忘录没有规定军队应当怎样对待被逮捕的敌人。大多数胡图力量的言论还是比较空泛和模糊的。但1992年11月，穆古泽拉——基塞尼全国民主革命运动副主席，发表了一份公开的极端主义言论。他谴责卢旺达图西人和反对党是“与其他蟑螂交谈的蟑螂”。他敦促：“根除这些人渣！”“我们还在等什么来执行这些判决？……我们还在等什么来大量消灭这些家庭？”“摧毁他们。无论你怎么做，别让他们逃掉。”“1959年我们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让他们逃走了……他们属于埃塞俄比亚，而我们将为他们找到一条到达那里的捷径：将他们扔进尼亚巴隆戈河……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把他们全部消灭光。”他的言论通过录音磁带在全卢旺达传播。但是穆古泽拉走得太远了。他受到司法部长对他进行起诉的威胁，逃往国外。他留在加拿大，与驱逐作着斗争。虽然激进言论在政党国家内部日渐增长，但它并未支配国家。而且这一点也没有引起图西人内部的惊慌（布莱克曼，1994：153；克雷蒂安，1997：93；德福奇，1999：62—63，84—85；卡克温齐里与卡姆卡玛，1999：74—77；梅尔文，2000：第6章；非统，2000：段落9.9）。

然而激进派正在取得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权（克雷蒂安等，1995）。66%的卢旺达人识字；29%的家庭有收音机，而更多的人在

* Kangura，意为“觉醒”。

公共场所听广播。1991 年找到的 41 份刊物中有 11 份来自“小房子”(包括《康古拉》)。1993 年 6 月,结合了流行音乐、幽默和激进言论,高效又受欢迎的电台——“千丘电台”(KTLM),开始广播。它的支持者中的三分之二是全国民主革命运动(党)中的西北人,尽管胡图力量激进派保卫共和国联盟(CDR)也在其内。政府办的媒体也在摆脱某些温和的新闻记者。激进媒体将胡图人描述为“民主分子”、“大多数人”或“很大的大多数”,受到了得到卢旺达国内图西人“同谋”和胡图“叛徒”帮助的图西人卢旺达爱国阵线“蟑螂”(偶尔是“蛇”或“鼠”)的攻击——他们都试图将“封建主义”和“奴隶制”强加于胡图人。那些具有混合族性的人有时被描述为“杂种”或“双头怪物”。图西人是伸入非洲的“含族人地块”的一部分,所以胡图人必须领导整个“班图民族”反对它。从 1993 年年末,激进派敦促,“不要重犯 1959 年的错误”;“这一次让我们把事情干完”。把他们逼出去不行,因为他们不断地跟着军队回来。“工作”、“清扫”或“清洗”是谋杀的委婉用语。每一次爱国阵线的进攻都让爱国的诬陷不实之词落在胡图温和派和卢旺达图西人的头上。

在缺乏详细社会学研究的情况下,衡量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绝非易事。许多学者具有夸大这种宣传力量的倾向。人民不是文化笨蛋:他们能够对极端意识形态的可信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因为这一意识形态不符合大多数人的经验,所以它没有支配国家。但是战争似乎在使它更加可信。

政治和经济权力

多党制度意味着 1992 年之后全国民主革命运动失去了一些对国家赞助的控制权,特别是在国家的南方和中心。但因为所有党派都是赞助网络,它们就包含了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在 1992—1994 年间几乎所有的党都分裂成了温和派和胡图力量派系。许多反对党行动主义分子想要在全国民主革命运动控制的地盘上大吃大喝,而全国民主革命运动意识到它需要南方更多的支持(北方很多在敌人手里)并能够通过提供国家赞助来获得这种支持。但是图西人

正向北逃往卢旺达爱国阵线,经常还带着有用的情报——原来确实有同谋。最后,所有胡图政治家不得不考虑假如爱国阵线赢得战争的话,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人朝隔壁的布隆迪看,看到了图西人对所有胡图政治家的镇压。胡图力量意识形态正在席卷胡图社会。“小房子”和千丘自由广播电视台通过动员一个来自几个党的松散的胡图力量激进分子伞式团体(代表并保护各成员的团体)去促使他们的对手内部产生分裂,让出某些权力给其他激进派。该战略的效应是分裂所有的党,包括全国民主革命运动。政党国家正在激进化 and 派系化。那些第一次尝到经济和政治权力甜头的人正在变得依赖一个激进的而非协调性的解决方案。

军事权力

军事权力涉及军队和准军事部队。战争突然把军队从 5000 人扩充为 3 万人,这削弱了它的凝聚力。在 1992 年年中,很可能是在巴戈索拉的领导下,激进派组建了叫作阿马萨苏派(Amasasu)的秘密的胡图力量军事协会,既是一个要求采取更激进军事政策的压力集团,也是一个杀手小队。而尽管激进趋势使得一些温和派军官遭清洗,军队依然陷入分裂。在 1993 年 8 月的一次事件中,“小房子”上校(包括巴戈索拉)试图劫持温和派总理,但被新任参谋长挫败了。在任何情况下,军队大多数都在前线,更关注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动向而非后方的敌人。

主要的军事激进化发生在党的青年团体中(里德,1996:496)。这些团体的组建原是为保护党的会议的,尽管最大的团体——全国民主革命运动青年团——也从事农村自救工作,把传统上从胡图人口(而非图西人)中征得的无偿强迫劳动力转向受外国捐助者称赞的用途。在 1991 年的某个时刻,先是在基塞尼,全国民主革命运动青年团成为了准军事化的组织即联攻派民兵(Interahamwe),其字面意思是“那些站(或工作)在一起的人”。工作被看成“胡图民族”的规定性质。胡图人是“坚韧的”、“结实有力的”。与其相反是寄生的图西人,他们“纤弱的体质”不适合劳动。“他们干不了费力的杂活”,

或者,用更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说,“他们在吞噬我们的血汗”(马尔基,1995:78—80)。一个更小的从保卫共和国联盟胡图力量党中脱胎的青年派民兵组织,唯一目标派(Impuzamugambi),即“那些只有一个目标的人”,同时也将他们自己称为“坚定纯粹的胡图人”。从1991年起,他们接受来自同情他们的陆军军官的基本军事训练——有时是法国军事顾问。1993年春天,联攻派处于一个新的平民自卫部队的保护之下,巴戈索拉和其他人2月份就在催促后者了。部队组织起来是为了与他们自己家乡地区的入侵者作斗争——在一个受侵略的国家中合理的任务,这在1963年第一次遭入侵时就设想出来了。但是这个部队配备了激进的全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政治家和陆军军官。内战产生了对平民人口最紧张频繁的地方动员;种族内战在种族基础上进行动员。现在对任何胡图人,事实上对任何在卢旺达爱国阵线占领区的图西人来说,保留一个温和甚至不问政治的立场,是非常困难的。民族最后胜过了阶级,至少在年轻人当中是这样。

富裕的全国民主革命运动支持者慷慨解囊为准军事部队提供薪水和武器。1993年他们开始到国外大量购买小型武器、大砍刀和其他锋利的农业工具。大多数基金被从外国援助基金中分流了出去。1993年年末他们从中国进口了超过50万把的大砍刀,每三个胡图成年男人就有一把。这既不是传统的卢旺达工具,也不是能用于抗击装备良好的侵略军队的有用的战争武器。它绝对是恶意的,显然是为杀戮非武装的敌人而准备的——梅尔文(2000:第6章)干脆说为了“种族灭绝”。政权已从其他的非洲经验中取得借鉴,宁愿给民兵大砍刀也不能给他们(普鲁尼尔,1995:243)。如此武装的士兵在种族灭绝完成之后对公共秩序的威胁较小。

准军事部队中的许多人可以被认为是恶棍,但是他们的暴力是指向能够用原则性词语表达的目标。以下是他们唱的歌曲之一:

我们是全国民主革命运动联攻派。

我们热爱和平、统一和发展。

我们不进攻,我们是来救人。

我们不害怕,我们让别人怕。
 我们不让自己被踩在脚底,
 相反我们要将别人来踩踏。
 我们不让自己做错事者胡乱说话。
 他(哈比亚利马纳)已带来和平,我们睡得安稳。
 我们独立并让民主原则贯穿着我们的行为方法。

(《独立新闻通讯》,1998年第38期)

这些和平与民主的热爱者要吓唬、践踏做错事情的人,并让他们噤声!

447

有组织的针对图西人和温和政治家的暴力在1990年10月入侵后不久升级。在1990年10月至1993年2月间的17次地方事件中,有远不止2000图西人死去。其中14起发生在基塞尼和鲁亨盖里的“小房子”根据地省份。大多数是对爱国阵线的进军的回应。有些只是地方事务,但其中的至少5起是由上层组织的。1991年一个图西人小团体巴各维人在基塞尼遭到屠杀。这起事件始于由基加利官员、同时也是基塞尼全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名人致辞的公共会议。他们告诉当地居民图西人正在帮助爱国阵线,应该被作为共犯杀掉。全国革命民主运动准军事部队然后让本地人去做这件事。当地居民顺从了,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热情。这不是系统性的消灭人口。然而,显然这些方法杀人效率很高(德福奇,1999:87—91;普鲁尼尔,1995:136—144;《独立新闻通讯》1998年第38期)。

陆军杀手小队组建于1992年年中。“零网络”很可能是由阿马萨苏派组建,以为不当班的士兵和联攻派民兵输送枪支。在1992年到1993年间,大约有200名政治对手,包括图西人和胡图人,被以这种方式杀害。准军事和军事胡图力量激进派现在是政党国家内部的一个重要的压力集团,同时他们的暴力受到惩罚(德福奇,1999:56—59;加沙纳,1995)。但是当布莱克曼(1994)说他们正在精心调试一台油量充足的“杀人机器”时,这意味着他们正在为某种坏得多的事情作着准备——对此我们没有证据。但到了1993年年末,少数消息

灵通人士肯定在往更坏的方面想。卡克温齐里和卡姆卡玛(1999: 79)举了讨论如何清除所有图西人和所有胡图人对手的三次会议的例子——其中一次,他们说,是由哈比亚利马纳本人主持的。但是他们没有给出这些会议的来源。计划当然不久之后就制订好了。1994年1月,一个心怀不满然而值得信赖的全国民主革命运动—联攻派民兵领导人告诉联合国一个用分散在基加利全部40个小组的1700名武装人员根除首都所有图西人的计划。数百名待清除的对手名单被展示给外国外交官和记者看。整整几个月,关于拟议中的大屠杀的谣言在全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的不团结迹象中呈现逐渐放大效应。一方面,消息提供者正在分道扬镳以警醒局外人;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在催促实行根除行动。上校巴戈索拉,表面上是“小房子”的关键密谋者,4月4日直截了当地告诉联合国官员“卢旺达问题的唯一出路将是清除图西人”(OAU, 2000: 段落 9.13; 雷恩特珍, 1995: 662—667)。三天以后他就在领导它了。

我们没在1994年4月7日前听说有任何严密的计划或阴谋。没有能提供作为“确凿证据”的文件。1993年年末,激进派很可能在准备,此时离种族灭绝开始有6到8个月。但是“小房子”,他们的密谋以及他们与准军事部队和党派的关系都依然不清楚。任何实际的方案都将会是秘密的,仅限少数人知道。一个更大的激进派集团正在信口雌黄,而小规模准军事部队和杀手小队正在获得杀戮的特许。许多普通的胡图人被卷入激进派的保护人关系网络。但是种族灭绝正在计划吗? 或者这些只是联系松散的升级行为,它从一场不确定目标的战争和一个日益派系化的国家内部的复杂互动关系中产生?

在基布耶省,巴基利施玛市长采取了许多被大多数评论者认为是为种族灭绝做准备的步骤。他发起了联攻派的军事训练,转呈了被怀疑帮助爱国阵线人员的名单,设立了地方关卡。但是他认为这些是在爱国战争中必要和爱国的步骤,同时他还附带规劝胡图人和图西人呆在一起,不要让极端主义分子分开他们(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95-1A-I; 他被排除所有指控,而且他的故事被法庭相信)。少数胡图人可能会将这些看作是种族灭绝的准备,但是不大可能会有

很多人这样想。它们既没有变得人人知晓,也没有引起普遍的恐惧。无论图西人还是温和的胡图人好像都没有组织抵抗或者逃亡。受害人与德国的犹太人一样震惊。事实上,在本案中,真真实实是一个天大的意外,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449

第 15 章

卢旺达 II：种族灭绝

在 1994 年种族灭绝中我们能够找出六个主要层面的施害人：

1. 1994 年 4 月 7 日攫取权力的胡图全国民主革命运动“小房子”家族；
2. 其他进入后政变政权的胡图力量政治派系；
3. 合作的胡图官员和陆军军官及警官；
4. 合作的胡图地方社会精英；
5. 胡图准军事部队；
6. 一大批的普通胡图人。

这当中的前五个组成了一个政党—国家的各个不同层面，炫示着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通过公职、国有化工业以及援助和发展基金来施予经济资助。他们的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使得他们能够动员种族灭绝过程中的六组人员。本章将追溯这种动员过程。

一定程度的间接罪责还可怪之于大国身上，特别是作为胡图政权盟友的法国，以及美国，后者阻止了任何的联合国的干预。指挥已在卢旺达境内的小规模联合国部队的罗密欧·达莱尔将军，在杀戮行动一开始时就请求增援，坚持认为 5500 人的军队能够阻止种族灭绝。五角大楼顾问后来同意他的估测，然而联合国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拒绝提供军队或货币，没有给予回应。所有这一切都被非洲统一组织国际知名人士小组 (IPEP) 报道，而更激烈的批评来自梅尔文 (2000: 第 14 章)；梅尔文认为大国知道在发生什么但还是拒绝干预。非洲统一组织更加温和，它觉察到了对非洲的冷

漠,但是说在联合国令人舒适的道德主义的氛围中,种族灭绝“确实是不可想象的”——“它之可能发生完全不可理解”(OAU,2000;段落7.13及9.1)。但是错误、幼稚甚至冷漠不构成犯罪。实际施害人是胡图人。

450

关于种族灭绝的主要资料来源,首先是三家发表的详细报告,即非洲人权(1994)、人权观察委员会(德福奇编,1999)和非统组织(OAU,2000);然后是斯科特·斯特劳斯(2004)访问210位胡图施害人的独家记述,加上透彻的地区地方分析的辅助;最后是设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的联合国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记录以及其网站上的内容。完全记录不能公开获得(不像南斯拉夫的情况——欧洲比非洲有更多的条件)。尽管这样,它最后的判决很长并非常详细,同时可以得到刊登在《独立新闻通讯》(*Ubutabera*)、《法庭快讯》(*Tribunal Updates*)和《时尚通讯社》(*Hirondelle*)(全为在线)刊物上的定期的案件概要的补充。几乎没有信息从卢旺达政府主持的审讯中流出来,尽管它的刊物《判决》(*Le Verdict*)登出了一些细节。目前全国有8万人被作为种族灭绝嫌犯拘留(斯特劳斯从已认罪的被拘留者中搜集他的样本),尽管政府到目前为止只具备审讯他们中的7000人的条件。政府正计划一场对大规模人群的审讯,即按所谓民间传统司法(*gacaca*,字面意思是“草地上的正义”),准备于2003年始在全国范围展开,但一再延后。

“小房子”阴谋孕育一场政变

1994年4月6日夜晩,两枚SAM-16地对空导弹摧毁了从阿鲁沙起飞、搭载着卢旺达和布隆迪总统、准备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降落的飞机。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暗杀者至今不明。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卢旺达胡图军队中不满和平协议的极端分子。然而有反对这一理论的论据。卢旺达军队没有SAM-16,而乌干达军队倒有。飞机上的几个重要的胡图力量激进派也死了,而地面上的几个其他激进分子一听到袭击的消息,立即逃进法国大使馆避难,认为这将引起一场

图西人政变。2000 年,根据图西人卢旺达爱国阵线军官供述的报告,是他们击落了飞机。2004 年 3 月 9 日,法国报纸《世界报》(*Le Monde*)报道法国政府对飞机被击落的一份司法调查的结论是,命令是由爱国阵线的领袖保罗·卡加梅,以及现在的卢旺达总统所下的。这个结论据称是基于爱国阵线的背叛者的证词,没有得到来自法国政府对此事件的正式确认。当然,卡加梅和卢旺达政府对此作了否认。

从 4 月 6 日一直到 12 日的时间顺序,与其说是指向一个由胡图激进派预先安排好的种族灭绝计划,不如说抓住了由其他某个人完成的暗杀所创造出的一个出人意料的机会。发生飞机袭击的消息在 4 月 6 日晚 9 点播出。首都出现混乱,10 小时后第一批对胡图人温和派和最重要的图西人的谋杀开始。这种时间延误并未暗示一场预先安排的政变和种族灭绝。有人偷听到谋划者之一恩塔巴库则少校说:“他们已经杀了他(哈比利亚马纳),但是许多人将在他之前被埋葬,以便像先垫上一床稻草一样伺候着。”(www.hirondelle.org, 2003 年 2 月 18 日)全国范围展开的泛化(*generalized*)杀戮直到 4 月 12 日才开始。但是即使激进派没有策划暗杀行动,他们也感觉到他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这个派系化的政权现在群龙无首,失去了那个曾经想方设法对一个日益分裂的党的激进和温和两个派别保持仅有的最小控制权的人。宪法的接续可交给可能会反对激进派的温和的总理和国民大会领导人。首都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451

这个真空被特奥内斯特·巴戈索拉上校填补了,他 1941 生于基塞尼省,靠近总统的出生地,是一个有着良好关系的富裕教师的儿子。特奥内斯特是一个能干的职业兵,他的关系网把他带到了权力中心。和他的银行家兄弟一样,他也处在“小房子”的中心,离总统的妻子和她的兄弟很近。作为阿鲁沙代表团中的一个不忠的成员,据称他离开阿鲁沙时宣称他要回到卢旺达“为大动乱作准备”。他曾公开陈述如果阿鲁沙协议被执行的话,结果将是图西人的被根绝。据称 1993 年他撰写了一个运用平民自卫部队对图西人进行大规模杀

戮的计划。1993年2月,他秘密将武器分配给基塞尼的全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支持者。他的极端的胡图力量观念引起了最高指挥部内部的不信任,同时他未能得到他渴望的位置——总参谋长。他现在是国防部的参谋长。在阿鲁沙对他的审讯正在进行中(审讯案号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96-7),尽管进展十分缓慢,无数次延期、休会。

在2003年1月20日联合国法庭的证词中,罗密欧·达莱尔将军,曾在种族灭绝时期担任在卢旺达联合国部队的指挥官的加拿大人,说“是巴戈索拉掌握着真正的权力。他甚至使更高级别的官员相形见绌”。他把巴戈索拉描述为一个极端主义者,坚决反对阿鲁沙协议,一心想对图西人的权力来最后的毁灭性一击。在整个乱局中,他说,巴戈索拉保持镇定未受打扰。“好像看上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或换个角度说,“好像他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但是,达莱尔接着说,“计划的目标是根除反对派”,也就是说仅是政治反对派——政治灭绝,用我在本书的用语说。鉴于杀戮的程度,达莱尔说,很难想象会是某人先策划了它们。“执行这样一场大屠杀的 plan 的可能性是不曾存在的。”达莱尔将其归咎于添加在曾经“从政治层面”计划的内容之上的“溢出之物”(www.hirondelle.org)。

但是,即使如此,巴戈索拉似乎亦被暗杀行动震惊了。他确实派了士兵去围住总理的官邸,以免她与电台接触,但是他晚上和次日早晨都在首都接见高级陆军军官,试图劝说他们发动政变。他们拒绝了,在上午将尽时,总统卫队由巴戈索拉控制,和反对的军事及警察部队之间发生了一些小范围战斗。巴戈索拉得到七名高级军官的支持,其中之一现在是基加利的地方行政长官。他们是“小房子”中的人,指挥着1500名总统卫队(抽调自哈比利亚马纳自己所在的基塞尼行政区),三支各有1000人的精锐陆军营和2000人的全国民主革命运动准军事部队,再加上地方警察和交通。这些力量都处在一般的军队指挥系统之外,而加在一起,它们在火力上就超过了城中的其他力量。类似的军事权力集中情况只存在于前线。总参谋长和国家警长呼吁联合国部队干预,无果。次日晚,听到政变消息之后,爱国阵线撕毁阿鲁沙停火协议重新恢复攻势,切断地面与在胡图温和派

影响下的人的联系。

但是在 7 日下午,巴戈索拉已战胜了基加利温和派军官。联合国将军达莱尔报告说:“这些人从未能合并在一起,因为每一个在他们指挥之下的部队思想上都彻底被外力渗透……他们不愿冒自己的和家人的生命危险。因此他们在开头的寥寥几天里从未合并以建立适当能力去打垮极端主义者。”(OAU,2000;段落 14.13)在对巴戈索拉审讯时,一个名叫贾伯的少校提供了证言,当时他拒绝杀死图西人。巴戈索拉朝他脸上啐了一口唾沫,然后把他转到前线等候死亡(www.hirondelle.org,2004 年 4 月 20 日)。准军事部队挖出他们藏好的武器,在路障处配备人员截住和杀死可疑人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首府胡图人亲戚在路障处被那些看着他们像图西人的准军事部队人员杀害。截至 7 日下午结束,总理与其他温和派胡图政治家、文职人员以及与反对派有关系的人都死了。异议者被吓至不敢出声或躲藏起来,但是他们逐渐地被集中看管起来。到 5 月中,33 位温和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的 26 位死去——随他们而去的是他们对卢旺达问题的阶级分析。政治灭绝先于种族灭绝。

4 月 8 日,巴戈索拉放弃了他的军事政权计划,而在接下来的三天,密谋者组建了一个文职政府。他们的内阁由 12 名全国民主革命运动激进派组成,包括“小房子”密谋者中的 3 位,加上 8 名来自其他党派的激进分子,大都是南方人,这是一次将政权根据地扩大至反对派控制地区的尝试。弗罗道尔德·卡拉米拉,民主共和运动的头,是胡图力量盟友中的核心人物。4 月 8 日,他通过电台呼吁所有党派的激进派都来支持新政权;4 月 12 日,他敦促他们根除所有图西人(1999 年他因种族灭绝被新一任卢旺达政府处死)。内阁内部的驱动力是卡雷梅拉,一个多年的牧师和“小房子”内部的人,90 年代全国民主革命运动—联攻派民兵环节中的关键人物。作为内政部长,他现在主管行政部门工作,因此能够任命和免除地方长官——一个重要的政治权力资源。在身为全国民主革命运动副主席之外,他还是联攻派民兵的三个最高领导人之一,后者事后被证明是主要杀戮者。

军队的抵制问题费了更长时间才得以解决。高级军事官员在4月16日和新内阁会晤,敦促他们停止杀戮,他们说杀戮正在损害军队士气,使得失败更具可能。但是次日,陆军参谋长被免职,同时其他反对的陆军军官和警官受到威胁逮捕,或被转往前线,其位置被更值得信赖的军官取代。普通士兵一般按命令去做,有些还带着热情(非洲人权,1994:132—149;德福奇,1999:104—109,187—195;268—269,434—446,462,500;梅尔文,2000:第12章;《独立新闻通讯》,1998年9月28日)。

许多人强调卢旺达国家中犯罪活动的一致性(例如,布莱克曼,1994;克雷蒂安等,1995:379;雷恩特珍,1995)。毕竟,这曾经是“非洲的瑞士”,整洁干净,秩序井然,具有一个对非洲而言效率不凡的公共行政系统,从内阁向下延展,经11个地区行政长官、副行政长官,及145个市镇市长,一直到每个丘陵省的政务会委员和警察部队。在一个面积较小、居住稠密并具有良好的主要公路的国家,这通常提供了相对紧密的控制网络,它与密集的市民社会机构——教堂、农村合作组织、联合养老信贷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结合在一起。但目前这个国家已被从上至下分裂成各种各样的党派,以致种族灭绝已不是那种常见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的。党和国家职位互相缠绕,而占据这些职位将使人成为地方社会中的重要人物。在这个一直具有凝聚力而现在陷入分裂的国家中,国家没有清晰地与社会分离开来。

激进派开始取代反对的官员。11名地方长官中的3名被免除职务,而这当中有2名被杀害。数十名副行政长官和市长也被免职(德福奇,1999:264—265)。其他持有怀疑态度的名人受到正在散发的所谓共犯的名单的惊吓。他们自己的名字在名单上吗?出现了相当的混乱局面,杀戮行动有时似乎带有相当的任意武断的性质。在持不同政见的新闻记者托马斯·卡米林迪马上要被枪毙的时候,一个路过的胡图少校喊道:“托马斯?”托马斯回喊:“他们要杀死我。”少校(托马斯实际上并不认识他)阻止了他们。托马斯继续凭更多的好运气幸存了下来(古雷维奇,1998:122)。大多数不太情愿的官员和

警察不久就因为恐惧和对保住他们的前程和委任职位的焦虑,而被迫合作。这种情况一直发展到地方警察教师和看门人等这一级别。

斯特劳斯(2004)揭示杀戮行动始于4月7日,以不同速度扩大至大规模杀戮,但在三周时间内席卷整个国家。第一批陷入的省份是哈比利亚马纳的核心拥护群所在地基塞尼和鲁亨盖里,加上首都基加利,然后再到它的外围地区,南方落在后面。斯特劳斯的生态学数据表明地方的全国民主革命运动和保卫共和联盟力量很容易成为地方种族灭绝速度的最好预测工具。因此,国家更富裕的地区往往更快地被卷入,因为政党国家已经将它的赏金分期拨付给了它在地方上的支持者。但是其他社会经济和人口变量(包括两个族群在每一个区域的相对比例)与种族灭绝的速度没有关联。

每个区域的决定性时刻在激进派炫耀占优势的物质力量之时到来。甚至几把枪或几颗手榴弹,加上50名左右手执大砍刀或锋利农具的暴徒,通常就足够了。在由激进的全国民主革命运动—保卫共和联盟党派控制的地区,一些地方官员与社会精英一起调动这些力量,开始系统性地杀害图西人,他们几乎未遇反对。在分裂更严重的地区,大多数地方官员往往一开始是消极的,他们等着看谁会赢得在少数激进主义官员/或精英之间进行的争斗。在这个时期有些图西人被杀害,有些得到了保护。这里决定性时刻通常在激进派下决心要以武力夺取权力之后到来,此时经常是他们已得到自其他地方前来的少数武装激进分子的援助的时候。在反对党控制的地区,消极状态持续时间更长,极少有图西人被杀,直到武装的外来者将他们的力量充实到少数重要的当地居民当中,从而战胜反对派,并引起他们勉强的合作。最常见的是,准军事部队提供决定性力量;有时士兵提供。地方警察和宪兵起初一般是犹豫不决或反对种族灭绝的。让我们看一些其如何展开的例子。

454

在由全国民主革命运动控制的基塞尼省,激进派立刻开始撒欢。省长和地方军队司令是“小房子”成员,生于当地,而联攻派准军事部队已经经历过90年代早期的杀戮行动。在此,杀掉所有图西人和所有剩下的胡图反对派的命令直接并公开地从全国民主革命运动上层

人物发给忠心的地方扈从。基塞尼联攻派的首领是奥马尔·塞拉沙戈,1957年生于当地。他的父亲是哈比利亚马纳的一个朋友,因而他能够打电话给已故总统的姐夫,让其帮他到路障处识别敌人。他在阿鲁沙作证说在4月7日上午收到来自全国民主革命运动领导人开始杀掉所有图西人的直接命令。这是表示种族灭绝在“小房子”一攫取权力之后就开始的重要证据。塞拉沙戈与原告及律师合作,并且在阿鲁沙表现出悔恨之意,因而仅被判了15年(德福奇,1999:199;卢旺达国际刑庭-98-39;《独立新闻通讯》,1998年10月12日,1999年2月16日)。

基布耶省省长是克莱门特·卡伊希玛,1954年出生在该省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母亲不识字;他的父亲后来升任当地中学教师。他从中学毕业后成为地方法院的书记员,然后赢得了一份到国立大学学习医学的奖学金。他成了一名医生,然后主管地方医院。作为地方名人,他积极参与原属温和派的中间派民主党(PDC)在基布耶的活动。当他的胡图力量派别的权力增长的时候,1992年,他被任命为省长。敌方的证人称他为狂热分子、屠夫,然而他说他是随着1992年至1993年间党派争吵和分裂以及街头争斗,然后再是对图西人的谋杀加剧,受到了基布耶的政治暴力的恐吓。爱国阵线对该省的一次进攻导致对图西人的大屠杀。他说该省陷入瘫痪,缺乏像石油等这类资源,官员的薪俸也被冻结了。入侵也使他相信激进措施不可避免,因为假如爱国阵线分享权力,他在基布耶的前程就完了。4月11日,他与其他五省的省长一起,被召回到基加利听取新政权的指示。他们被要求采取更多的行动,尽管他声称他试图抑制地方杀戮行为,一直到他受到威胁、他的一些宪兵被杀。“我们完全不知所措。局势远远超出了我们控制能力之外。”但是目击证人说在12日那天他在鼓动准军事部队,宣称“图西人除了是一堆污物,什么也不是,我们需要进行打扫工作”。他告诉一个加拿大修女说,被屠杀的受害人是“通敌者”。15日,持不同政见的地方宪兵和他们的司令被转送到前线,免得碍事。图西人撤退到附近比塞塞罗山丘上,在此他们中至少有1万人被杀死在轮番的攻击之中。卡伊希玛领导了其中

几次进攻,还在 4 月 18 日组织了对被赶到基布耶足球场的图西人的屠杀行动。在被判有种族灭绝罪行之后,1999 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卡伊希玛似乎主要是因为追名逐利而走向种族灭绝的。压力来自上层,而他将它们转移给了他的下级(国际刑事法庭 - 95 - 1 - T;《独立新闻通讯社》,1998 年 9 月 14 日和 9 月 28 日,11 月 25 日)。

他管理的市镇之一是梅班泽(Mabanza)。它的市长伊格纳茨·巴基利施玛,被免除所有犯罪指控(国际刑事法庭 - 95 - 1A)。到 1994 年,该市镇已经充满争端。巴基利施玛在这拥有很多图西人的市镇中(占人口的 30%)是一个相对温和、长期在位的全国民主革命运动市长。但是爱国阵线的人侵增加了对胡图力量民主共和运动派别(MDR)的支持。它的地方党领导人,劳伦特·西门扎,成为副市长。从 1992 年起西门扎就图谋取代巴基利施玛,到 1994 年一位证人说他比市长更受欢迎。巴基利施玛采取战争时期的日常民间防御措施,把据称是拥有武器或正在帮助爱国阵线的当地居民(大都是图西人)的名单寄给卡伊希玛。在 1994 年初他安排地方联攻派民兵的军事训练,并重新恢复原来在战争初期设立,之后在阿鲁沙谈判期间中断的路障。但是他继续试图缓和地方种族的紧张关系,他利用他的八个宪兵镇压暴力事件。总统遭暗杀造成胡图人的一次愤怒大爆发,一些杀戮行为始于 4 月 9 日。巴基利施玛呼吁镇定,同时采取胡图人—图西人联合巡逻方式维持秩序,但是他的八个宪兵不足以对付受到联攻派援助的西门扎的派系。图西人逃往市镇大院寻求保护,而巴基利施玛采取谨慎步骤为他们提供庇护(一些证人对此表示怀疑),并颁发假身份证明以帮助他认识的图西人逃跑。但是 4 月 13 日,突然涌入一批称为山人族(Abakiga)的人,他们或是来自前线地区的难民,或是来自胡图力量中心地带的激进分子,都是装备原始的贫困的青年陌生人(少数拥有大砍刀,大多数是矛或棍,他们的“制服”是香蕉树叶子)。这支大约有 100 到 1000 人的队伍,特来向图西人索要性命和财物。得知他们到来的消息之后,巴基利施玛催促图西人去往基布耶省,他说那里有更多的宪兵会保护他们。大部分图

西人离开后 1 小时,山人族到达,恐吓巴基利施玛和他的宪兵。在西门扎的指引下,他们杀死了剩下的图西人,劫走他们的财物。在 4 月末,山人族向新的杀戮场地出发。巴基利施玛依然是市长,直到 6 月他逃往国外。他不是特别勇敢,但是法庭认定他试图维持种族安定。来自底层和外部的压力压垮了他。

种族灭绝在南方出现最晚,这里大多数官员是温和派。布塔雷省有唯一的图西人省长。他通过组织胡图人—图西人联合巡逻遏制住杀戮行为,一直到 4 月 18 日。然后他被谋杀,位置被西尔万·纳斯比马纳,一个来自此前的温和派社会民主党的胡图人农学家取代;他是经他的党说服才接受了这一岗位,目的是保留党在地方的权力位置。他似乎陷入茫然,然后受诱惑参与了几次杀戮。在 5 月末他开始动摇并保护一些胡图人,士兵和准军事部队的偶尔野蛮暴力让他感到惊骇。他向总理让·阿方斯·坎班达呼吁请求保护,但没有结果。还有一个激进的“监督人员”盯着他——恩特泽亚约,布塔雷省宪兵队的总指挥,仅次于内务部的陆军上校,与全国民主革命运动政治家有密切联系。他与一个调动过来的联攻派部队一起吃住在一家布塔雷旅馆,犯下了无数的谋杀和强奸行为。6 月 16 日,他设法取代了动摇的恩萨比马纳省长的位置。

但是激进派在布塔雷的王牌是两个名义上的政府首脑,都来自布塔雷省。总统德奥多尔·辛迪古布瓦博是一名儿科医生和教授、前卫生部部长和全国民主革命运动副主任,在种族灭绝之后躲进了刚果。总理坎班达是一名商业工程师,前国家银行官员和布塔雷的民主共和运动胡图力量派的领袖。在阿鲁沙,坎班达(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 97 - 23)承认犯有种族灭绝罪行,于是被判处终身监禁。他说内阁没有预先谋划种族灭绝,但在它一旦开始之后,他们会定期讨论它的进展。他们组织武器分配、路障和访问,以便强化后进省份的决心。坎班达访问了至少五个人,而其中两人在布塔雷特别活跃。4 月 20 日,他们在一次布塔雷市长会议上发言。总统隐晦地说:

“只是观看的角色”、“那些感到不关他们的事的人”都应该被揭发出来。让他们为我们让路……那些负责清除这样一种人的人，让他们动作快点。其他优秀的“愿为他们的国家工作的人”时刻准备着。

“工作”即指杀戮。如果他们不杀戮，他们将被取而代之。

布塔雷的尼亚齐鲁市镇曾由一个温和的全国民主革命运动派别统治。但是从 1992 年起，它就与由拉第思拉斯·纳塔甘兹瓦领导的坎班达的民主共和运动胡图力量派发生冲突。他 1962 年出生在那里，是一家地方卫生中心的医疗助手兼运动员，特别为他的空手道技术感到自豪。纳塔甘兹瓦领导他的党的青年派，发动了一场针对地方当局的暴力运动，以至于让市镇官员，包括警长，因为害怕他豢养的流氓恶棍而不敢去上班。当地居民认识到了现实，1993 年 3 月，选举了纳塔甘兹瓦担任市长。1994 年 3 月，他主管武器运送。在总统被暗杀之后不久，他召集了一次地方会议，敦促在场的人杀死所有当地的图西人，同时将武器分发给当地平民和警察。他自己积极参与杀戮。他只用他认识的人并信任他们作为杀人者，同时将表示反对的地方官员解除职务。5 月 18 日，他的跟随者谴责 14 名地方政务委员中的 8 名隐藏同谋挑动胡图人反对胡图人。他们被民主共和运动—胡图力量支持者取代，两人被杀死。当纳塔甘兹瓦攻击对立的胡图力量名人时，他做得过了头。他们向他的上级提意见，这样他失去了权力。但是此时数千名图西人已被他的支持者杀死（非洲人权，1994：232—238；德福奇，1999：370—431；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瓦格纳，1998）。

大多数的布塔雷市长不是激进派。他们是因为恐惧或追名逐利而服从，特别是如果保镖或下属似乎不用他们说而准备好了进行种族灭绝的话。约瑟夫·坎亚巴希担任市长 20 年。1937 年生于布塔雷的他易遭攻击，因为他的妻子是图西人，并且他与卢旺达爱国阵线有来往。但是他是一个灵活的机会主义者，赶紧采取合作态度。大多数布塔雷市长都拖了一到三周后才加入（德福奇，1999：458—469；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 96 - 15, 96 - 8, 97 - 29; 斯特劳斯, 2004: 第4章)。

吉塔拉马省在布塔雷的北面, 受反对派控制。因为政权缺乏地方支持者, 它不得不从相邻的全国民主革命运动省份引进准军事部队。省长乌韦泽耶回应以组织胡图人—图西人联合抵抗, 杀死了若干准军事部队人员。但在4月12日这天, 卢旺达爱国阵线的一次进攻迫使政府从基加利逃往吉塔拉马, 一起的还有总统卫队和准军事部队。一位市长就他们的威胁程度作证:

如果我继续保护人民, 我将被杀掉……他们确实朝我开枪, 但我没被子弹打中。他们不让我在社区中把车子开来开去, 如果我开了, 他们会在路卡处堵住我。(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 94 - 4 - T)

省长于4月18日召集举行市长会议。但是坎班达及其他部长也到场。省长要求政府停止分发武器和关闭千丘(RTML)电台。部长们回应以对所有那些未能支持爱国民兵保卫卢旺达、打击敌人的人的谴责。一人警告说:“有些吉塔拉马省的市镇领导人是蟑螂共犯……如果这些人继续这样做……他们将会得到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是很可能的, 吉塔拉马省的市长一个个相继屈服, 抛弃了他们的省长。

458

让·保尔·阿克叶苏, 塔巴的市长, 是其中之一。1953年生于当地的他是一名前教师和学校督察员。在其受审时他描述了90年代早期在全国民主革命运动(MRND)和反对党之间恶化的冲突。他帮助成立了民主共和运动, 成为它的主席。民主共和运动取得对塔巴的控制地位之后, 1993年4月, 他做了市长。在总统被暗杀后的日子里, 阿克叶苏在地方国民议会代表和陆军上校的帮助下, 抗拒了激进的监督人员库巴曼达, 后者以联攻派部队指挥官身份拿着政府的钱回到了市镇。村民们起初支持阿克叶苏。但是他的9名市镇警察总共才带了7支枪, 而人数更多的准军事部队杀掉了1个并伤了另

外一个。阿克叶苏还感受到千丘电台的意识形态权力，它谴责他是在根除忠实的民兵组织。电台播出了一篇对他的形象描述，使他听上去像一名图西人。在附近的吉库吉罗(Kicukiro)区，市长已被一名联攻派首领取代。他不想得到同样的命运。

在 4 月 18 日的部长会议之后，阿克叶苏说：“局势正变得极其的危险。而我已抵抗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也有一个家庭，现在我想放弃一切离开。”所以在第二天的市镇会议上他念了一串要作为共犯进行搜捕的名单。其中三人是当地警官，他从前的盟友。在其受审时被问道：“你是在签署他们的死刑执行令，是吗？”“当然。”他脱口而出。塔巴的大屠杀于次日开始。到 6 月末，超过 2000 的图西人死亡。一些证人说他曾试图在 5 月初与库巴曼达争辩，而当联攻派开始屠杀和强奸行动后，他一般就只站在一边。但是其他人说他曾命令杀死“知识分子”（即地方名人）和难民，狠狠地殴打一名老妇人，并告诉一群参与强奸的民兵说，“不要再问我图西女人是什么味道”，他接着说：“明天她们就要被消灭了。”——结果真的是这样。他不是一名极端的意识形态杀人者，他是因政治权力以及它的经济效益而走上了这条道。准确保持市长、联攻派头头、地方代表以及陆军上校的力量均势很重要。他曾改变立场，主要是为了保住他的公职肥缺。否则，面临一个地方对手，加上缺乏来自上层的支持，他就完了。他被控告犯有种族灭绝和强奸罪，被判处终身监禁（德福奇，1999：270—8；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 94 - 4 - T；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 96 - 4；《独立新闻通讯》，1996 年 10 月 27 日，1997 年 2 月 15 日和 3 月 16 日）。

另一名是吉塔拉马省的市长尼亚德微，他行动迟缓，在 4 月 11 日之后与即将到来的联攻派发生矛盾。他在一次与斯科特·斯特劳斯的会见中说（2004；他的故事得到其他四位被访问的当地人的确认）：

百姓杀了一名联攻派民兵，这对我来说太过分了。某人直接在千丘电台说我正在杀害联攻派并帮助图西人。他一人将这

话说了许多次,那天是14日。百姓开始害怕,他们把市长称作敌人……形势对我很严峻。百姓帮了我,但是警察开始害怕……我们继续这样下去,直到20日。

那天他获知士兵已经到来,正在四处寻找他。他逃走了,职位被一名忠诚于全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人取代。还有一名吉塔拉马省的市长纳吉吉马纳,拒绝服从。联攻派4月20日杀了他。省长乌韦泽耶,一个与显贵人物有关系的人,不断攻击种族灭绝达一个月,但他的六个副行政长官中的五个反对他。他毫无办法,5月20日,他逃了。一位市长继续在暗中给予图西人帮助。但与当时进行中的地方杀戮的规模相比,他能做的也是杯水车薪。

地方实业家也大量地卷入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政治也很重要。管理者在国有公司担任职位;实业家持有通过受赞助地位获得的特许和垄断地位。卢旺达有两种经济。第一种是生存农业,涉及半个国家。它能够维持生活但几乎不形成剩余(产品)。第二种经济包括政府就业、国外开发基金,以及咖啡、茶叶和锡的出口。政府部门和国有或持有特许权的公司主导着经济,这种经济利润要高得多。在茶叶部门有八家国有公司和一家私人公司。几乎任何想要超出单单基本生存条件的人——例如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为孩子获得一份医保和教育条件的人——都必须要通过亲戚关系或地方居住权等与行政性或半国有集团赞助网络发生联系。他们的核心层是哈比亚利马纳的人,而他们想一直占据清闲的高薪职位(OAU,2000:段落14.50—14.51)。

吉索夫是卢旺达国有茶叶公司所在地。该公司老总阿尔弗雷德·穆塞马1949年出生于比温巴省,是在家乡地区之外指导种族灭绝行动的极少几个人之一。他在“小房子”内部成就了一桩非常好的婚姻。他的岳父曾是一名早期胡图力量党的领导人,1962年被图西人杀害而成为烈士,所以他在农业部获得了一份肥差,对国际援助基金的控制权。他加入了基加利全国民主革命运动,是一名“与有影响人士关系非常多的年轻的高级官员”。当他的姐夫被牵连进一桩

1980 年推翻哈比亚利马纳的阴谋时，他的名声跌落。虽然被免了职，他说服了工业部长任命他担任吉索夫茶叶公司的老板。在那里，当地人——甚至是基布耶省长——也依赖着他控制的资源。他是省长的参事，他的名字出现在各种开发委员会中。1992 年当卢旺达爱国阵线占领他的家乡省时他激进化了，领导起要求政府采取更多措施帮助难民的游行示威活动。1992 年在基布耶发生的对图西人的大屠杀——其中他很可能未起作用——破坏了假如爱国阵线取得权力他保留职位的机会，所以他帮助建立了千丘电台。他的 50 名雇员组成了一支“民防”准军事部队，由宪兵队进行训练，地方市长和陆军准将提供武装。他的卡车和司机提供通向比塞塞罗山丘屠杀现场的交通，而他积极地领导着他们。联合国法庭判处他终身监禁。虽然不是一名早期的图西人仇恨者，但他因对其被入侵的家乡省份的关注，在胡图力量党圈子中的行动主义者，以及追名逐利的个人野心而走向激进化（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 96 - 13；《独立新闻通讯》，1998 年 11 月 25 日，2 月 16 日，1999 年 3 月 15 日和 5 月 10 日）。

460

奥贝德·鲁津达纳 1962 年生于基布耶。他在基布耶和首都逐步打造出了一个成功的出售消费品的进出口公司。作为基布耶保卫共和国联盟的一名领导人，他还同时帮助为准军事部队提供资金。在基加利增加生意往来关系户十年之后，他于 1994 年退回到基布耶。他为比塞塞罗山丘的屠杀行动提供卡车并帮助指导行动。人们偷听到他跟联攻派说，“给我弄一个（图西人）的身份证，我会付你钱的”。他被控告犯有种族灭绝罪，1999 年 5 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当像鲁津达纳和穆塞马这样的地方名人加入到鼓励杀戮的主要官员和党首的队列当中，他们蔚为壮观的集体存在本身就足够激励当地村民去从事杀戮。整个的地方社会精英阶层似乎负责指挥了比塞塞罗山丘的杀戮行动（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 96 - 10，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 96 - 1，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 96 - 14 - T；《独立新闻通讯》，1998 年 10 月 26 日）。

国家第一次因发生在中心并受到对文职政府、军队和准军事部队支持者支持的一场政变而激进化。地方官员与精英出于意识形

态、个人前程及恐惧等的复合动机而服从命令。压力来自上层的上级,来自监督人员和巡查的官员和一旁的准军事部队,以及底层的下级。如果整个国家变成同谋,它就不是通过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度了。正如瓦格纳(1998:30)所说:

这不是远古时期“部落纷争”的灰白的面孔;它是一张现代的脸——把自己打扮成不识字农民当中的“知识分子”,并竭力成为将自己的乡村中心与基加利连接起来的政治中的地方“保护人”的一个乡下官员自信的脸。

军事权力:士兵与准军事部队

虽然总统卫兵与其他某些军队被牵连进杀戮行为,但大部分军队在 frontline,在撤退之中。突然扩张之后,鉴于只有基本的训练,军队的纪律性很差,有些激进军官把武器交给准军事部队。来自前线的受伤的士兵在屠杀中表现也很突出,他们在借机报复图西人。

受非洲人权委员会(1994)访问过的幸存者往往讲述同样的故事。首先,地方政治家和警察说会保护他们。然后士兵,或者更多时候,民兵到来,吓唬想要当保护者的人,以使后者抛弃他们。任何战斗现在都是一边倒。几乎不带随身物品逃跑的图西人通常手里只有棍子和石块。胡图暴民可能会手持镐、矛,或弓箭,但是准军事部队通常持有大砍刀或钉了钉子的大头棒,少数人有枪。卢旺达政府已估计出大砍刀杀死了总受害人中的大约 38%,大头棒杀死 17%,火器杀死 15%(斯特劳斯,2004:第 5 章)。虽然参与谋杀的士兵极少,但他们的枪、手榴弹、车辆,以及步话机在对付没有武装的敌人的种族灭绝中起了很大作用。图西人经常设法击退当地人和当地准军事部队起初的袭扰。但是之后士兵与更有组织的准军事部队被召集起来,他们的枪膛和手榴弹击垮了图西人的抵抗。士兵们然后将近距离杀戮的任务留给了其他人去完成。

准军事部队很可能执行了大多数杀戮,尽管幸存者往往都将所

有武装的暴民称为联攻派民兵。在政变后的第一周,准军事部队提供了大约 4000—5000 个杀人者,其中 2000 人在基加利,但他们不久就大幅扩张至 2 万到 3 万人(有些估计数字高达 5 万)。扩张带来了之前没有受过训练和几乎没有武器的暴民。一些幸存者对职业准军事部队——已经有过党派间争斗经验、组织严密,并有武装——和以抓住意外机会进行抢劫和夺取权力的乌合之众扩充的团伙作了区分(非洲人权委员会,1994:229)。这些人对政权是有用的,他们想让图西人和温和派消失,但是为打消国际震惊,他们宣称“不存在种族灭绝情况”,“人民因对敌人产生的充满正义而难以控制的愤怒而揭竿而起”。事实上,准军事部队数千人——显然不是整个人民——是在谋杀性情绪中起而反抗。他们的“职业”核心是军事或宪兵预备役部队,富于街头打斗和使用火器的经验。在军官当中,医生、农学家,以及特别是教师,占比过高(非洲人权委员会说,1994:121—122)。大多数是年纪尚轻的成年男子,尽管幸存者指认至少有五位妇女领导着联攻派民兵一伙。

乔治·拉塔甘达 1958 年出生在吉塔拉马省的一个严格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与显贵人物有关系的当地市长,后来升任省长和担任驻西德大使。哈比亚利马纳的政变让他的父亲又被边缘化,退回到市长位置,1993 年因民主共和运动在当地地位的提高他又被从这一职务撤下。所有这些都加强了拉塔甘地加入到赢家一面的决心。大学毕业后他到政府开发项目中工作,私下开展业务活动。1991 年,他的父亲为他在基加利买了一间汽车库,它后来成为一家进出口企业(大多进口外国啤酒)的仓库。他是从所有意义上说的那种大人物:实力强大的运动员,前橄榄球支柱前锋以及成功足球队的理财家。1991 年,几个政党试图吸纳他。作为首都的代表,他选择了全国民主革命运动,后者拥有大部分经济权力。1993 年,他被选进它的全国委员会,成为温和的千丘电台支持者,并且还因为财富、酒量和体育才能使他在年轻人中受到欢迎而被选为联攻派的副主席。他似乎更多是被追求建立更多关系的欲望——又被竞技运动型的、好酒的男性文化所加强,而非被政治意识

形态引诱而参与到种族灭绝当中。他在他的汽车间外面设了一个路障,他因种族灭绝、根绝以及反人类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96-3;国际记者培训机构,1999年12月13日;《独立新闻通讯》,1998年6月8日,1999年4月12日和26日)。

沙洛姆·恩塔霍巴里1970年出生于国外。他的母亲是一位胡图力量内阁部长,而他的父亲是布塔雷大学的校长。作为一名辍学学生,沙洛姆腰跨手榴弹绕着布塔雷大摇大摆行走,同时炫耀着他手中的枪支。他管理着几支地方准军事部队和家门口的一个路障,施行了数不清的谋杀行动,有时是为了赚钱。他的母亲,内阁部长保利娜·恩塔霍巴里,1946年出生在布塔雷,也是这个谋杀性路障的一贯到场人(没有哪个主要的纳粹曾经干过像这样的事)。她认出图西人,然后他们就被扒光衣服,塞进运输车,被民兵杀掉和/或强奸。她是第一个被战争罪法庭控告犯有命令和协助强奸罪行的妇女(德福奇,1999:508—509;同在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97-21中审判)。学生是中间民兵层的主体。知识分子和依赖国家的职业在种族灭绝中占突出地位。大多数人已经内化了某些胡图力量意识形态,但野心和抢劫增加了重要的物质动机——信念和关系杀人者。

扩大的民兵组织是本书讨论的准军事部队中纪律最松的,是一个特别邪恶的“非洲疾病”类型——到处游荡的武装青年团伙。他们的“制服”是印有他们团体特有的色彩或香蕉茶叶或咖啡树叶的破布。凭借原始的武器,他们残忍地将人殴打和砍杀至死并强奸许多妇女。随着种族灭绝的展开,他们夺得了更多的枪支,并作为权力与男性符号被精心地展示,让人羡慕。如在其他准军事部队中一样,赞颂暴力和谋杀的歌曲与合唱,借酒精的助力,使得某种男性友谊加强了他们拥有的少得可怜的纪律。

在南方,来自布隆迪的胡图难民一心渴望着报复,据说在联攻派民兵中占比过高。抢劫在这些非常穷困的人当中无处不在。一位幸存者曾在一个人堆之下装死:“几乎所有人都死了,但联攻派民兵爬到人堆顶上说‘任何还活着的并且有钱的人应该现身,我们会接过他们的钱,然后放他们走’,但最后现身的人还是被杀了”(麦格雷尔,

1999b)。普通士兵绝大多数是底层阶级的年纪尚轻的男子。一位幸存者说她所在的这组被一伙 11—14 岁的民兵强奸：“一个年轻人过来把我带走。他皮带上插着一把长刀，手持一把小斧。当我们到达小学时，这个孩子将斧头和长刀放下，靠近我。看着一个年幼的孩子强奸我，正如你可以理解的，这是非常让人难堪的事情。”（《独立新闻通讯》，1997 年 10 月 27 日）大多数人被招入，和一群没有土地的失业的人处在一起（卡比里吉，1994：10；威拉米，1995：127）。他们为他们的不幸谴责图西人而非胡图特殊阶层，国家真正的掠夺者——他们的雇主。有保证的食物、饮料和住宿，可获得赃物和武器，以及对未来就业的憧憬，特殊阶层地位引诱着他们前行。

准军事部队被道路桥梁部的官员（其部长是一名全国民主革命运动激进派）和其他国有企业的高级职员用卡车运送到农村，因为谋杀命令是由地区和地方官员发出，并且他们被告知要将当地人卷入到杀戮行动之中。他们带着要杀掉的图西人和胡图人的名单，他们是大多数集体杀戮的核心，他们也是无处不在的路障的工作人员。他们检查面孔，检查身份证（每一路障有一人应当是识字的），强奸妇女，并将任何他们认定是一个图西人或者是胡图人对手的人砍死（基恩，1995）。如果嫌疑人没有证明文件，那些看上去像图西人的人就被杀死——这对占 20% 左右的胡图人当中的一些长得似乎不具胡图族类特征的人是坏消息。但是经常被重复的人权医生组织（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估计的那个数字，即每个准军事部队杀死了 200—300 人的说法不可能是真的（比如，勒马钱德，1997b：414）。那将总共只包括 2500—4000 人的施害人，一个被大幅低估的数字。因为极少的准军事部队拥有枪支，所以需要比这更多的杀人者。

普通胡图人

最后，非常普通的胡图人被卷入杀戮行动中。德福奇（1999：395, 770）说沙欣达的一次大屠杀可能涉及本区多达一半的男人，即有数千人。马姆丹尼（2001：5）说在另一个大城市，“每一个人都参

与了,至少所有男人。不仅是男人,妇女也加入:为他们的男人喝彩,参与辅助角色”。实际上,1998年,4500名14—18岁之间的孩子和1200名妇女因参与种族灭绝被囚禁在卢旺达(人权观察委员会,1999;OAU,2000;段落:16.35及16.69)。斯特劳斯(2004:第5章)问及他的抽样对象(只从监狱抽取了男性)关于他们卷入的杀戮小组的规模情况。只有一个人是自己发起攻击,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参与了10人之多的小组,但是小组平均规模要大得多,由84人组成。这是由很大然而流动的小组实施的集体行为。斯特劳斯对施害人的总数作了最细心的估计:17.5万至21万。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目,几乎是胡图人人口总数的7%以及胡图在业成年男子的15%。

斯特劳斯(2004)提供了最佳的关于施害人特征的证据。他的样本是随机抽选自己已经认罪的狱友,当然,尽管我们不知道何种偏重已包括在羁押和定罪过程之中。他的样本不是特别年轻,大都是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的成年人,很像全国的成年人口,同时他们的数量大致相当于他们这个年龄的正常的孩子数量。他们的职业也代表了全国劳动力的特征(绝大多数是农业,尽管经常是与其他临时工作结合在一起),除了一些职业人士和管理干部的占比过高情况,后者也意味着他们比全国人口受到的教育要略高出一。来自各个阶层的胡图人被包括其中。甚至牧师与修女也将躲在其教堂中避难的图西人供了出来(如在阿鲁沙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教堂的恩塔基拉特玛纳牧师和在比利时对两位修女的审讯)。只有小型穆斯林社区似乎完全站在一边袖手旁观。教师与学生写出上死亡榜的图西学生的名单。一位小学教师承认:“我自己杀死了一些孩子……第一年我们有80个小孩。现在还剩25个。所有其他的孩子,要么是被我们杀了,要么是逃走了。”(布莱克曼,1994:229;古雷维奇,1998:252;普鲁尼尔,1995:255)斯特劳斯(2004)说受过更好教育和年长的人更可能成为种族灭绝的领导人,但是他们较少可能实际参与杀人(59%的人说他们没有直接杀害任何人)。那些承认杀人行为的人大都是受过较低教育和处于低级职业的年纪轻的成年人,其中许多受过火器训练。再一次,我们看到施害人不是处在社会的边缘。他们来自各个

阶层,而且他们本身还有层次之分。那些处在更高地位的人给出命令;地位最低的和那些富于暴力经验的人执行完成大多数杀戮任务。这在谋杀性种族清洗行为中再正常不过了。

少数胡图人帮助了图西人。幸存者用像“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坏人。他是一个胡图人,但他是无害的胡图人。不是每个人都杀人”,以及“不是所有胡图人都具有狂暴的心灵。有时我向他们要食物,他们就把食物给我……胡图人与暗杀者有区别”这样的话承认了胡图人的帮助(《独立新闻通讯》,1999年5月10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宣传者招募组建了一个至少包括30个当地胡图人的网络,他们藏匿图西人并打探联攻派民兵行踪以便能够总是比他们领先一步,如此救下了104名图西人(麦格雷尔,1999b)。一些幸存者证实了他们邻居的凶残,其他人则证实了他们的不太情愿。恩迪姆巴蒂,基布耶省吉索夫的市长,未能动员当地人帮助他杀人,因此他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去招募杀手(《独立新闻通讯》,1999年5月10日)。家庭经常意见分歧。芒亚尼扎和图里金基科说他们的双亲和妻子反对他们的杀戮行为。“为什么我要反对图西人?”芒亚尼扎的父亲问,“他们就像我一样。我们住在同样的山丘上。我们拥有同样的房屋……为什么我应该反对他们?他们肯定会为我儿子所做的事而报复我。他(指儿子)给我们带来了羞辱。”(麦格雷尔,1999a:11)正如所有谋杀性案件一样,大多数胡图人既未帮助也未反对施害人。他们站在一边,眼看别处。“我们把门关上,不想听见声音”,某人说(德福奇,1999:262);其他人则推诿责任。一个图西人说:“我们后来认识到他们不想保护我们。他们身负杀掉我们的压力,而他们不想亲自杀死我们。所以他们把我们打发到另外一个村庄,让我们被杀死。”(非洲人权,1994:344)

人们总是以对战时敌人的同谋、入侵者和杀害总统的凶手的打击为理由来为杀戮行为辩护。这是反抗,或至多是报复或复仇。斯特劳斯(2004)的调查对象最多次地将此作为他们积极参与杀戮行动的依据(即排除消极的说法,说他们是受到了强制)。哈比利亚马纳的支持者最为愤怒,而最暴力的施害人也是最受战争和暗杀激怒的

人。因此到达战斗年龄的图西男子最有可能死去。人口学家估算男性死亡率较女性死亡率高出 50%。当然,在妇女中,强奸替代了屠杀(OAU,2000:段落 16.7—16.32)。大多数观察家说逃离北方战事和来自布隆迪的难民大量地卷入了种族灭绝,而马姆丹尼说(2001:203—206)暴行在难民进入某一个地区之后达到顶峰。几乎失去了一切之后,他们有可能被诱导加入正义的复仇行动——以及正义的抢劫。斯特劳斯没有发现难民占比过高,尽管作为杀人地区的陌生人,他们有可能后来未被认出、未受谴责也未遭拘留。

截至 4 月末,杀戮正在被整个政府电台以及大多数地方社会精英作为内战时的爱国主义责任推着前进。暴民正在杀掉所有他们能发现的图西人,口中唱着,“让我们将他们全部根除”。从比塞塞罗山上传来歌声:

杀掉图西人是罪吗?不是,让我们根除他们,根除他们,杀掉他们并埋葬在林中,让我们把他们逐出森林埋进洞穴,让我们把他们赶出洞穴再屠杀掉他们。停下来以便让我们杀掉你,不要惹麻烦,因为你们的神已摔倒在鲁亨盖里,而他正在去市场买甜土豆的路上。不要放过婴儿,不要放过年长男人,也不要饶了年长妇女,卡加梅(爱国阵线司令)就算是个婴儿也不能放过。(《独立新闻通讯》,1998 年 3 月 2 日)

一位处在“引起幻觉的”的四散逃跑的图西人和手摇鞭子的胡图人景象之间进退两难的帮工说:

老是同样的事情,一人试图逃跑,其他人就追上去揍他,一人坐在地上,甚至不想保护自己,已被打得不能动弹,放弃了,而其他人则连续用大头棒和大砍刀、矛和弓箭戳捣他的皮肉。

袭击者有时通过砍断受害人的脚筋让他们无法动弹,让他们毫无办法地躺在地上,直到后来被杀掉。帮工继续说:

不是每个人都配备有武器,但是每个人都装着仇恨,随时准备将路过的某个图西人绊倒,顺便对上气不接下气、力气已耗尽的跑过来的可怜人扇耳光,后者筋疲力尽地直挺挺地倒在碎石路上。

466

在他刚要倒下之前力量加倍的拳落在他身上。孩子们……将其当作玩耍,跟着他们的兄长后面追赶图西人,朝他们扔石块,嘲笑每一个被捉住的图西人。(德福奇,1999:464—465)

然而斯特劳斯的调查对象说他们预先并没有仇恨图西人。97%的人拥有图西人邻居,三分之二的人有图西人亲戚。五分之四的人说与图西人邻居的关系一直很好,只是最近才有改变。但是,最坏的杀人者对图西人预先拥有最负面的看法,而调查样本也确实对两个群体有一种强烈的族群独特性意识,是战争与暗杀将其改变成了仇恨。图里金基科说:

这些年我一直和这些人住在一起。我不害怕他们。他们对我不是一个威胁。但是我们被告诉说他们是敌人,而我相信了。几乎村子里的所有图西人都是我的朋友。对我来说,这不重要。他们是那些杀害哈比利亚马纳的人的亲戚,所以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我们关上心灵和思想埋头工作……当我在杀害年轻人和妇女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不一定就支持爱国阵线。但这是一种阻止爱国阵线参加战斗的方式,因为即使他们赢了,他们也不再具有可以统治的人了。我没有犹豫。我发现杀人很容易,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做是为了拯救胡图民族。

他接着说他不考虑他的女眷对杀戮行动的意见:“她是女人,所以我不一定要听她的。”芒亚尼扎也显示了同样的男性倾向:

它像梦一样。我看见杀人的人被当作英雄,所以我开始冒

险。我相信我正在杀死敌人,因为电台一直在说。有时好像我认为那些不管什么样年龄的人都不能被信任,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全得死。(麦格雷尔,1999a:10)

谣言向四处传播。附近据称存在成群的武装的图西人。坦比亚(1996)和基什沃(1998a:29)提示了同样的谣言:令人害怕的敌军聚集在附近,准备参加斯里兰卡和印度种族暴乱。但是它们都是虚构的,而爱国阵线是真的并通常就在附近。坦比亚(1996)说人们有一种被受害人惊吓的心理需要。我更喜欢卡茨(1998)的威胁—屈辱—义愤的逻辑顺序。有一个真实的来自爱国阵线的图西人威胁,而关于它的同谋的故事非常像是真的。胡图人,尤其是男人,正深深感受到由胡图人军队的崩溃和被一个少数群体征服带来的屈辱。这样产生的愤怒是真实的和正当的。到5月中旬它开始消退,此时大家知道在前线外围不存在图西人威胁。胡图人暴力势头衰减,杀人者零零落落回到家中。只有部分精疲力竭的扩增的准军事部队留下,还在凶杀、谋财害命中寻找就业、食物、啤酒以及藏身的机会。

还有一个间接的无产者的因素。准军事部队的普通士兵陶醉于权力的颠反——羞辱、抢劫、强奸和杀害富人(普鲁尼尔,1997a: 231—232)。大多数幸存下来的图西人和温和的胡图人讲述了他们通过贿赂而摆脱困境的经历。其他人送了贿赂,但仍然被杀。阿鲁沙法庭观看了一位摄影师拍下的一位妇女死在马路上的录像。然后镜头接近她那变肿的脸,脸上满是凝结的血块。通过她张开的嘴唇,她在轻声说着什么,但没有人能够听见她说什么。她是被一个过路人抛入水中的,后者解释对她的谋杀是因为:她是某老板的女人(《独立新闻通讯》,1998年6月8日)。种族灭绝之前数年,卡罗琳·纽伯里(1988:209)强调指出,胡图农民认为图西人的压迫已使他们失去了一切希望:“受压迫状态的内聚作用”是胡图力量之根。种族灭绝被合法化为重新分配图西人财产。只有30%的斯特劳斯的调查对象承认在种族灭绝期间曾占取财产,而通常也只是食物、砖瓦或其他一些被丢弃的小物件。但是,当然,他们亦可能是在撒谎,好让他们

的家族继续欣赏他们抢劫的成果。他们还似乎放弃接受贿赂和更多由公共方面组织的再分配——“收音机、长沙发、山羊,以及强奸某个年轻姑娘的机会”,古雷维奇说(1998:115)。一些激进派担心当地人会只参与抢劫,然后就回家,所以他们命令:“先杀人后抢劫。”一位官员评论说:“那些杀人的人说受害人的财产属于他们。”芒亚尼扎说他的村子中的官员组织了一次摸彩袋活动。受害人的财产被列在纸片上然后放进帽子里。每位胡图人都必须抽一张,这样就让每一个人都被参与进去。他赢得了一个香蕉种植园(麦格雷尔,199a:10)。公共委员会花了大量时间讨论财产分配问题(德福奇,1999:236—237,299—300)。这意味着任何看上去有钱的人都可能是嫌疑犯,将被作为图西人或一个同谋受到谴责。在受害人被界定为压迫者(比如犹太人或中国企业家)的种族暴力中通常存在的经济动机,也会出现在战争中那些一心从事大屠杀的人的身上。

胡图政权(像布隆迪的图西人政权)将税收与国际开发基金份额留给它自己的庇护人或扈从。不平等差距扩大,群众生活水平停滞,营养不良和疾病威胁增长。但是如同在那些政治是沿种族和地区分界形成的其他国家一样,阶级依然是一个相当抽象的剥削概念。宣扬阶级政治的胡图反对派从未得到大量的群众支持,而他们在种族灭绝的早期日子里即被消灭,留下政权继续推进它的种族剥削概念。随着法治的毁坏,胡图人发现向他们的可及范围内的图西人和其他特权人物发起进攻很容易(加萨纳,1995;雷恩特珍,1994:220—224)。族性胜过阶级并使阶级仇恨转向(如我的第2个论点)。

但是相当的社会强制也出现在胡图人的社区当中。这一点被超过70%的斯特劳斯的调查对象特别指出过。大多数人说他们害怕不参与的后果,尽管他们指的是较次要的保持一致或直接服从官员的社会压力。一些人被告知如果他们不参加,他们“就不再被当作是胡图人”。较之那些援引战争或暗杀作为理由的人,那些援引这类压力作为理由的人往往是较不暴力的施害人。

村民讲到被集中在广场,听由一位使人敬畏的来自首都的地方名流讲演并念出取自身份证记录的受害人名单的经历。在较小的村

庄,名单是不必要的。地方政务会委员和学校教师知道谁是谁。民兵或士兵有时告诉他们:“要么你杀了他们,要么你就会被杀。”一人回忆说:“最终,甚至那些迟疑不决的人也必须去杀人。他们带着较低的热情杀人,但他们杀人了。”(非洲人权,1994:573;马姆丹尼,2001:219—220)人们看见士兵“向儿童扔石块以挑起他们加入杀戮行动。其中一些人不想杀人,但是军队迫使他们参加。每一个人手上都必须沾上血。这样就没有人会受到责备”(基恩,1995:134—135)。只有敌人的同谋会不服从,他们说。一些反对的人被杀掉。但是通常威胁已经足够了。瓦格纳(1998:30)在一张“高级官员的脸”后面看到一张“农民的脸,内向,眼睛往下看——因为向外看有危险”。一位杀人者说:

我后悔我做的事……我感到羞愧,但是如果你们处在我的位置,你们会怎么做?要么你参加大屠杀,否则你就自己被杀了。所以我拿起武器,并且我还保卫我自己的部族成员不受图西人攻击。(普鲁尼尔,1995:247)

一位幸存者复述了他那里的村民怎样第一次坚决抵制杀人行为:

几天以后,事情变得很明显,人们开始变坏,不愿意保卫教区。人们说他们为(附近)伦达(Runda)的市长在卢旺达电台中的言论感到灰心丧气,后者曾组织了伦达的杀戮行动。他谴责受害人是爱国阵线的成员。当我们的人民听到政府官员在电台中说这样的事情时,他们断定了杀戮是由最上层组织安排的。这对他们具有非常坏的影响。(非洲人权,1994:621)

一位大屠杀幸存者解释胡图人是如何不情愿受准军事部队的压力:

那么,好,他离开了,他与其他人走了,但他没有杀人。他们说:“嗨,他以后可能会谴责我们。他必须杀人。每个人必须帮助杀掉至少一个人。”所以这个不是杀手的人是被强迫干了这件事。而第二天,这对他就成了一个游戏。不需要你催他。(古雷维奇,1998:24)

有人说卢旺达文化诱导一种“服从崇拜”(德福奇在阿克叶苏受审时的证词;古雷维奇,1998:23;普鲁尼尔,1995:57,245)。但是,与其他人一样(马姆丹尼,2001:198—202;斯特劳斯,2004;OAU,2000),我持怀疑态度。阿鲁沙律师受到这一观点影响。一人问阿克叶苏:“难道农民不是觉得服从‘来自上层’的命令很自然吗?这不是传统吗?”但阿克叶苏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难以回答。他迟疑一阵,然后被催迫——“但是更自然的是服从还是抗拒?”——所以(像任何国家的人都会的一样)他选择服从(《独立新闻通讯》,1998年3月16日)。农民——像任何地方的大多数人一样——会觉得服从政府官员比抗拒政府官员更容易。但这不意味着农民没有注意到摆在他们面前的几种选择,以及作出错误选择的后果。因为官员具有威吓人的执行权和吸引人的庇护权,而民兵则能够动用强制以保持一致和伙伴关系的手段。这不是一群被动地因服从崇拜而聚在一起的人。他们可以运用特殊的权力结构确保服从的实现。

这是一个国土面积较小、紧凑型的、有良好交通的国家。主要种族灭绝罪犯四处巡游,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把当地人组织起来。电台是一个强有力的通讯手段,因为保密不是目的。卢旺达电台要求当地人封锁边境,阻止逃跑的图西人。千丘电台力劝:“这是同时从后方与前线攻击顽固士兵(爱国阵线)的时刻……我们的兄弟会在后方攻击他们和根除他们。顽固士兵的死亡钟声已经响起。”“不要怜悯敌人。”“墓穴才半满。”“让10万年轻人被招入队伍以便他们起而反抗,而我们必将杀死顽固士兵,我们将更加轻松地根除他们,因为……根据是他们是一个单独的族性。所以看一个人的身高、长相,看一下他的可爱的小鼻子,然后就敲碎他。”“可爱的小鼻子”被认为

是图西人的种族特征。但是,千丘电台坚持认为,根除行动是自卫,因为“图西人正在想方设法根除胡图人”。“看看布隆迪”并“想想对胡图人国家元首的暗杀”以及“被蟑螂暗杀”的其他人。“它是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战争。”大屠杀“不可避免”,它是“正义的民众的愤怒”的产物。多党制民主是在制造民族分裂;只有胡图人才是真正的卢旺达人。图西人是外来的“含族入侵者”。胡图力量的目标——是单一、整体和有机的。在4月7日这天,千秋电台宣称:“墓穴还未完全装满。谁愿做做善事帮我们将其彻底填满?”(克雷蒂安等,1995:191—195)

但是斯特劳斯(2004:第6章)对意识形态权力持怀疑态度。他的样本中只有10%—30%的人好像知道并赞同胡图力量意识形态的各种成分。尽管如此,一些杀人者已经说过他们是受电台劝说参与了特殊进攻,一位外国修女报告说她曾被阻拦的12个路障处全都有新的收音机(德福奇,1999:67)。古雷维奇(1998:96)说路障处的准军事部队复述了来自穆古泽拉1992年的可怕言论,它在前一章被引用过。基恩听到准军事部队说“图西人……想要我们像过去一样再次做他们的奴隶”,并评论说:

路障处士兵的话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对政府部门的话的复述。这些人真的相信他们将会退回到图西人独裁统治的黑暗年代……这些话是过时和了无新意的,由一个种族灭绝设计师写出,然后无止尽地被全部重复,直至成为最为贫穷也不识字的农民口中的剧本。(基恩,1995:165,174)

五年后该剧本仍被重复。在1999年被联攻派民兵在乌干达边境杀死的一位英国旅游者身上,用大头针别着一张手写便条(用法语),上面写的是:

这是对一个出卖我们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惩罚。你保护少数派而压迫我们多数派。(这张照片出现在1999年3月15

日的《时代》杂志上)

但是一种对该意识形态素朴的诠释得到了强烈响应,因为曾经有过一次来自国外的人侵,激起了一场内战,其中敌人曾是可被识别的一概的图西人。敌方爱国阵线曾经施行过对于他们的大屠杀,几乎所有胡图人和一些图西人都与他们勾结。卢旺达的每个角落都在接受拥有所有这类可以相信的故事的难民。确实,爱国阵线不想强加封建主义甚至君主专制,并且他们说他们想要多党制民主。然而胡图人有理由怀疑如果爱国阵线获胜的话,一种布隆迪风格的图西人政权就会到来——而事实上,它正在卢旺达发生。一个激进化的政权和激进分子,在被激怒了的同时,也能够贪婪的群众协助下,使得对图西人的种族灭绝和对其同谋的政治灭绝,看上去像是一个对折磨着他们国家的灾难性冲突的合理的最终解决方案,这并不那么令人意外。战争让所有层面的胡图施害人激进化——“小房子”、胡图力量党、军队、行政部门、名人、准军事部队以及许许多多的人民。甚至许多没有杀人的人也霸占图西人的房屋、牛群,以致也成为同谋。极少有在爱国阵线胜利后回到家乡的图西人能够把杀人者和小偷区分开来。实际上,回来的图西人占有了逃走的胡图人的房子和牛群。在暴力当中,住房和牲畜的重要性被大大缩减了。如果有一个对危机的折中解决方案能同时让两个族群都能返回(家乡),谁将拥有所剩无几的房屋和牛群?它很难不因谋杀、剥夺而变得凋谢枯萎,遁入一种深远的倡导报复性种族清洗的种族意识,以及对遭受的深深屈辱的补偿之中——正如目前的图西政权的发展方向。

结论:卢旺达种族灭绝的结构与过程

四个结论凸显出来。第一,深远的两种族对抗的现实是此处种族灭绝的基础;它不是一个持续不变的古老的种族仇恨,而是争夺国家控制权的一系列现代升级行为。两个族群身份甚至在前殖民地时期就足够真实,而他们之间的冲突自殖民主义时期末以来就一直在

上升。谋杀性种族清洗的危险很可能在 1960 年年初就已经临近。当时声称代表两个族性的强大的派系都对同样的领土提出意识形态上似乎可信同时实际中可以实现的对立的主权国家要求（如我的第 3 个论点）。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对抗采取了论点 4b 的形式：两个群体的匹配相当公正，胡图人有人数优势，图西人有优越的军事和政治组织。种族身份和冲突不单单是在 90 年代初构筑起来的。那时它们已经十分具体化了。一个人除了族性之外还可以有其他身份，但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或她是一个胡图人或图西人，以及一场深远的冲突正在两个社区之间展开。

显然，这本身并未暗含大屠杀行动，但是随后的地区及国际性压力就来了——经济衰退，乌干达想清除它的武装图西人的欲望，1990 年图西人的入侵，以及国际上要求民主化的压力。4 年内战使“小房子”激进派进入部分计划好的政治灭绝和种族灭绝的极端。战争及暗杀总统行径给予防御性平民动员计划以合法理由，后者后来被用于种族灭绝并激发胡图人采取正义的复仇行动。

大多数胡图人一开始不接受激进派所谓被外来图西人剥削的现状构成了他们的社会存在本质的主张。马尔基（1995：3，163—170）研究了在坦桑尼亚的胡图人难民。他说那些住在多种族的世界性城市中的人具有“不明确的身份”。他们“变戏法似的使用称号”，比如“移民”、“坦桑尼亚人”、“布隆迪人”以及“卢旺达人”等——很少时候用“胡图”。相反，那些隔离居住在难民营中的人主要把自己称为胡图人，甚至还大谈胡图力量意识形态。在卢旺达，胡图身份开始时是很松的。除了胡图之外他们会把自己看成农民、邻居、天主教徒以及来自吉塔拉马省的人等等。但是随后胡图身份和胡图力量的特色增加了。当然，即使是在种族灭绝当中，胡图人仍然具有其他身份选择。但是图西人几乎什么也没有。随着杀戮的开始，图西人发现在他们身份证上写明的种族符号原来事关重大。这可能决定了他们将要去死，也可能引导他们采取孤注一掷的策略从而带来活下去的机会。图西人现在不能成为主要的养牛人、天主教徒或者野心家，他们只能是图西人。这就是为什么让任何一个现在由他们掌控的国家，

布隆迪或卢旺达,让他们在捍卫图西人权利问题上后退一英寸也如此困难。

第二,种族灭绝产生于由数百名领导人,数千名激进分子以及最终加入的 20 万人运用的特殊的权力形式。种族灭绝不是源自自发采取一致行动的人民大众,而是源自复杂的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关系。卢旺达特殊阶层和它的庇护人掌握着相当大的经济以及政治和军事权力,后者起到了将阶级剥削意识转移到种族剥削意识上来的作用。政党国家的精英和准军事部队一起强索并分配战利品——现在它对一个陷入赤贫的人口很重要。意识形态权力帮助了种族灭绝在“道义上”的实现——一种充满正义同时受到更世俗的战时爱国主义、对亲属的忠诚以及男子气概等因素支撑的报复性愤怒。通过受剥削情绪的转移,族性胜过了阶级(如我的论点 2)。今天在整个非洲大湖区还是这种情况。

472

第三,种族灭绝又一次不是由一个有凝聚力的或极权主义的国家实施的,而是由一个新近派系化和激进化的政党国家实施的(如我的第 5 个论点)。这个国家只是在党杀戮开始时被激进派把持,而他们开始杀戮其在国家内部对手,然后再转向杀害其他人。更多的来自胡图温和派或联合国的决心可能使它中止,正如 OAU 报告(2000)和梅尔文(2000)清楚表明的。政党国家的中心性和它在国家的经济庇护——依附网络意味着,比其他个案更突出的是,此处是邻居当中的屠杀。在这个面积不大、居住稠密的国家,国家名流很快返回家乡,让他们的庇护——依附网络活动起来去执行可怕的任务。内阁部长亲自鼓动他们的落后的家乡省。在一个两极化的双种族内战环境中,其中每个族群拥有一个看似合理而又能够实现的建立国家的权利,一个纵贯社会的特殊阶层将种族灭绝作为了它正当地捍卫它对权力掌控的手段。整个南方世界有许多处于统治地位的特殊阶层,偶尔处在对立分化的双种族环境下。这样一种可怕的后果依然可能出现在其他地方。

第四,这导致了非常复杂的施害人动机。在卢旺达,甚至最高级的施害人也将个人的物质目标与带有某种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种族

身份、正义和惩罚因素混在一起——有一点像殖民主义时期的美国领导人,但这与大多数纳粹则差异很大。沿权力结构再往下,混合特征就更具世俗性。对图西人的恐惧产生了正义的愤怒,而它又被野心、贪婪、道义力量的缺失、拍马屁、成为“一个男人”或得到同辈赞许的欲望、爱国主义以及对亲属的忠诚等等进一步强化。这些是支配20万卢旺达施害人中的大多数人的十分普遍的人类情感,是目前我们在本书中已见到的谋杀性种族清洗例子中最大众化的一个。

我们还像往常一样对施害人的一些核心拥护者稍微审视一眼。因为非常多的人最终加入进来,结果这些人也许不如在其他案例中那样重要,但是全国民主革命运动的特殊阶层和它关键性的西北部腹地对种族灭绝的发起和实施有着明显作用。很可能来自布隆迪和前线地区的愤怒的难民以及受伤的士兵也占比过高。他们会更服从恐惧—屈辱—愤怒的情感顺序,我发现这种顺序对解释谋杀性动机普遍有效。同样占比过高的是以前有过武器训练和暴力经验的青年人。准军事部队提供了一个环境,在此,争吵打架和打断会议的习惯让其成员更适合去追求更严重暴力的职业(如我们在纳粹冲锋队和党卫军中见到的)。

无论胡图人还是图西人都不是内在的谋杀性民族。他们也不是因为落后或者单纯而被恶意领导人操纵,所以才具有谋杀性——西方新闻报道经常微妙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卢旺达与布隆迪是贫困但组织十分有效的国家,同时主要的施害人将他们自己视为现代化的化身。胡图力量“伟大的大多数”和“大多数人的民主”的口号使人想起现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所以他们唤起了群众的支持。比其他任何个案更明显的是,卢旺达例证了本书第1个论点:谋杀性种族清洗是民主的阴暗面。

反事实案例：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到目前为止,我只研究了种族冲突确实向着谋杀方向升级的案例。这种对因变量抽样的方法可能会给人一种过分悲观又带有偏见的印象,因为许多严重的种族紧张关系存在,但似乎又成功地化解了。有些种族暴力事件中爆发冲突,然后似乎又趋于沉寂,而社区免遭大屠杀。我们也必须研究这样的案例,以看看它们与大屠杀事件之间有何区别。大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可以作为“实验室”,两国都存在程度严重的相差很大的种族和宗教紧张关系。两国都有一再发生的暴力,但其中大多数呈不太严重的暴力循环形式。然而在少数情况下会出现升级到大屠杀的行为。我们能够用我的种族论点解释这些不同的紧张关系和后果吗?在考察了两个国家之后。我将把它们与我早期最严重后果的事件相对照,以更加准确地弄清冲突或是如何升级或是如何扩散的。图 16.1 将总结我的结论,实际上是总结我对种族清洗的一般解释。

独立以来的印度

印度的 10 亿人口呈现极为丰富的种族多样性。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族群,但是它们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单凭动员对种族的忠诚即可统治国家。地区会因公共的种族争端而分裂,但整个民族不会。国家中 40% 的人确实只讲一种单一语言——印地语,但是语言不是一个根本的文化分野,这部分地是因为非常多的精英

也在日常时说英语。宗教差异更有疑问,因为超过80%的印度人是印度教徒,但12%是穆斯林,这意味着有超过1亿的穆斯林,比除印度尼西亚之外的任何国家都要多。他们主要集中在北部国家,邻近国家也有穆斯林。还有相当数量的锡克教徒、佛教徒甚至基督教少数派。有些印度教团体已经被引向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一种构成印度教特性(Hindutva)实质的理想,同时受到一个印度教国家(rashtra)的支撑,这种思想只允诺非印度教徒二等公民地位。一些激进分子呼吁对穆斯林和其他人实行现实清洗。这显然在较大的穆斯林少数派中引起了敌意,正如在旁遮普按地区集中在一起的锡克教徒中产生的敌意一样。基督徒和佛教徒人数太少而又分散,不能进行太多抵抗。他们在面临挑衅时往往会甘受侮辱。

在以往,印度教并没有为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提供肥沃的土壤。它一直是一个宽容的宗教,能够吸纳而不排斥竞争者。它不是一神教,数百年来它已经将其他宗教的神、信仰和仪式纳入了它的习俗当中。它在各个地区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人怀疑它是否真的是一个单一的信仰。直到最近它才有所改变,但它仍然没有单独的教堂、牧师或正统的教义。

印度种族民族主义只是在两次大战间隔期间兴起,而即使在那时它也不是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印度独立运动是以世俗的国大党为主导的,国家确立了一部在其中宗教只是形式上的私人事务的宪法。低等种姓和部落民族也获得了宪法中所保证的权利和特权。国大党是由行政、军事、专门职业和商界中十分世俗化的精英与印度低级种姓和宗教及少数民族领袖结合在一起的联盟。国大党统治独立的印度的头40年间,伤及种族、宗教以及种性/阶级的利益,同时受到来自其左侧的社会主义/共产党的侧面攻击,后者在印度的少数几个邦中也有着足够强大的统治实力。印度教也有种姓和阶级冲突。虽然种姓不与阶级等同,印度政治也产生了明显的左—右政治倾向,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印度教还帮助提升了国大党和左翼团体为低等种姓讲话的能力,因而也削弱了潜在的印度教种族民族主义。印度政治从未失却种族或宗教特性(尤其是在地方一级上),

然而它长期抵拒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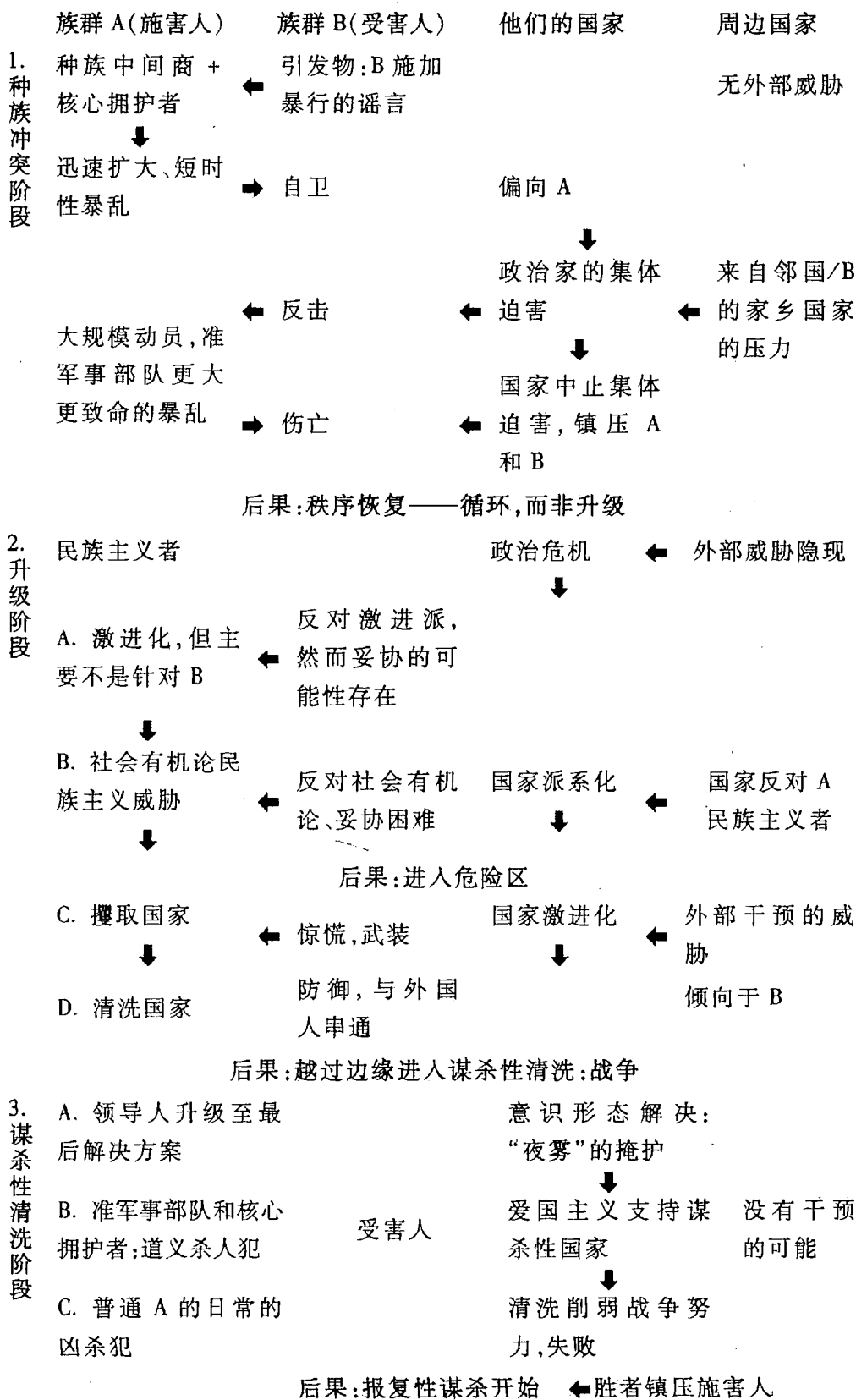
即使在今天,经过整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印度教种族民族主义的兴盛之后,大多数印度教徒、大多数穆斯林,以及大多数锡克教徒都没有相互展开暴力行动。暴力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不是日常发生的事件,除了在克什米尔。瓦希尼(2002)已计算过有 96% 的暴力事件(在克什米尔之外)发生在城市,尽管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印度人住在农村地区。另外,他发现仅八个城市提供了以上暴力事件的一半数量。而这种暴力只是罕见地升级为具有严重谋杀性的清洗,即使这时它也总是在很短时间之后就被平息。其他几个独立的严重谋杀性清洗事件的情形完全不同。第一个发生在 1947 年刚独立之后的西北边境。然后是 1950 年东孟加拉的暴力,80 年代的锡克教徒暴动,克什米尔间歇性武装冲突,以及在印度东北部的几个小范围边境争端。我试图对这些印度不同地区之间的暴力变化形式提供一些解释。

我以程度较轻的暴力形式——城市暴乱系列开始。贾弗里洛特(1996)、布拉斯(1997)和坦比亚(1996)所描述的似乎不能代表由霍罗威茨(2001)描述的全世界暴乱的典型形式。暴乱系列适用我的第一组试图解释走进冲突危险区的种族论点中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宗教一民族冲突在印度当然是古老的。英国人在 19 世纪中叶、继而又在 20 世纪 20 年代遭遇严重暴乱,又使得他们向组织更好的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作出让步,印度教徒为此产生怨恨。种族一宗教暴乱牵涉暴民,他们焚烧和抢劫少数房屋,强奸少数妇女,犯下少数谋杀行为,极少以大规模并以明显的意图去清洗少数派。绝大部分暴乱未产生死亡或仅带来少数死亡,大多是在镇压他们的过程中被警察和军队打死的暴乱者,然后是部分偶然地在被点燃的大楼中被烧死的人。严重的暴乱会带来一场暴力的狂欢,一般会在某个地方延续一到三天时间,尽管它或会从一地 toward 另一地扩散。暴乱大多始于某种普遍的不满时期,它要么由经济困境、社区之间扩大或缩小的经济不平等引起,要么是由对转移到宗教领域的国家或地方权力机关的政治不满引起的——这全在表明非己团体成了其他弊端的替罪羊。

在 1992—1993 年孟买暴乱中有 1000 多人死亡,在 2002 年古吉拉特邦集体迫害中可能有 2000 人死去。我将在后面讨论这个最近的例子。但是为什么几乎所有这些暴乱/集体迫害都很短暂,为什么它们没有向更坏的方面发展?表 16.1 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从而归纳本书的主要论点。它比较了包括在要么升级要么不升级为谋杀性清洗的例子中的发生互动的顺序。暂时而言,我以图中上面部分的暴乱周期为研究重点。它从假定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族群 A 和 B 开始;这两个族群生活在一个政府之下,附近有一个或数个同情支持少数群体的国家(在印度,这不适用于印度教—锡克教冲突的情况)。它还假定一开始没有严重的来自外部的对印度的威胁因素存在。图的上半部分注重同印度暴乱/集体迫害一类的突发事件;图的下半部分关注前面几年中描述的所有谋杀性清洗中显示出来的进一步升级行为。图中的过程假定了某种过去存在的小冲突的历史,如我的论点 3 所述。所以它假定 A 组中有一些激进派打算酝酿针对 B 组的暴力(以及反之)。这些“民族企业家”动员了暴力激进分子和核心拥护者力量。布拉斯(1997)强调怀有恶意的地方精英工具性地追求他们自己的权力目标的作用——第 1 章中讨论的精英理论的一例。坦比亚(1996)和贾弗里洛特(1996)也强调它们的重要性,但还强调更多的民间势力参与其中的意义。

477 一开始引发普遍骚乱的通常是一个似乎能证实 B 组中负面性习惯看法的事件的谣言。它也许是一名印度教妇女声称被一伙年轻穆斯林强奸,一个男人说他遭到来自另一社区的一伙人殴打,或者是穆斯林被认为在某些可疑的环境下偷了佛堂的圣像或者某种(神圣)的牛塑。印度教徒据称褻渎了某个寺庙,或某人打算在某个具有挑衅意味的地点建立一座庙宇。穷人被用贿赂或强制手段进行改宗。
478 (该)事件通常不完全是虚构的,因为也确实有什么事发生过。但经常是它被放大至完全走了样,有时是通过某个需要隐藏什么事情的人(例如,“被强奸”的妇女是一名受皮条客唆使的妓女,皮条客被说成是强奸发生的见证人,或者“被殴打”的男人是一个被当场捉住的扒手)。谣言然后到处扩散并被进一步夸大。因对受害人的真实性的

表 16.1 种族冲突的三个升级阶段



怀疑,或者因其他证人的证词,或者社区领导人或警察发起的迅速调查或对那些呼吁游行示威和鼓动暴力的人的镇压,许多谣言很快就消失了。

瓦希尼(2002)给出了这种情况何时发生的强有力解释。他说若将有暴力倾向的城市与安定然而其他方面类似的城市作一比较,则自愿的、专业的协会和政党的性质是形成差异的原因。在安定的城市中这些方面跨越了宗教分歧;而在骚乱的城市中它们就表现出宗教上的分歧。在前者的城市中这些市民社会机构能够干预并以协调的方式采取措施让两边镇静下来。一种制度化的和平体系——它由工会,企业家、商人、教师、医生和律师协会组成,以地方政党(他们在这当中占主导地位)为支撑——发挥着作用。它们直接发起或者使地方政府发起对种种牢骚和不满的调查委员会,同时它们还组织和平示威游行。它们将谣言和小的冲突扼杀在摇篮中,平息了更严重的事件。

反过来,在协会被限禁在公共边界之内的地方,要么是内部陷入分裂,有些成员实际上支持暴动分子;要么是他们可能痛恨暴力,然而没有处于另一方之上的权力而起不了作用。这里,一种看似可信、持续传播的谣言是一种发给 A 组中激进分子的邀请函,让他们就被认为的暴行对 B 组实施报复。有时它是自发开始的,但是随着其势头的增长,它越来越多地受到种族民族主义精英的操控,他们呼吁 A 组举行示威游行。当这些人让一群支持者变得胆子更大时,他们开始向事件发生地点或防卫能力薄弱的 B 组邻里进发,威胁性地要求把施害人交出来,他们会焚烧或毁掉某些财物。这种行为经常是蓄意挑衅。精英/激进分子想要 B 组反击(尽管不是实际的),因为这将会证实他们告诉群众的那种威胁。B 组不大可能报之以悔恨,因为它不相信谣言是真的。相反,它慢慢形成自己的偏执谣言,表示坚决不答应,同时试图发动反击,这只会激化 A 组的暴力行为。然后 B 组居民将退回到他们的核心邻里区,放弃边缘邻里区,同时为保卫自己作准备。冲突升级至短时间、爆炸性的暴乱行为这时很常见。这预先假定了社区之间的某种隔离,相互否定对方的习惯看法,以及

某些交通线路封锁。谣言在没有得到另一方对事件的解释而得到纠正的同时被放大了——理性选择理论所强调的信息失灵。

穆斯林与锡克教徒作为少数派感到受到威胁，但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也感到受到威胁。虽然这被认为是他们的国家，但他们说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他们说，英国人出于对他们在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统治地位的关注而赋予穆斯林特权，目前的宪法也赋予他们特权。南亚次大陆的历史让许多城市的大清真寺在那里占主导地位。他们说穆斯林有一个全球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但是印度教没有它们的宗教中心；它们被多族性、宗教和政党分隔开来。因此，在民意调查中，大多数北方的（更易受攻击地区）印度教徒赞成印度教具有像摧毁象征性阿约迪亚清真寺的权力的主张，尽管他们同时也想与穆斯林邻居和睦共处在一起（贾弗里洛特，1996：473, 476—477）。国家政府显示出的软弱迹象（特别是对穆斯林或巴基斯坦人）增加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人数。不同种族的人中最激进的人说印度应该是一个纯印度教国家，或者说穆斯林或锡克教徒应当拥有远比现在更多的地方政治权力，或能够在任何他们喜欢的地方修建属于他们的清真寺和庙宇。

他们可以随意调遣准军事部队成员、种族暴乱专家。有些是相当有组织的，比如印度教准法西斯全印志愿者组织（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和它的掩护性组织，它从初期印度国家世俗化阶段中幸存下来，然后从 60 年代起在基层复活，80 年代起活跃在国家政治中。与之并进的还有穆斯林伊斯兰促进会（Jamaat - i - Islami）。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早期的反殖民主义岁月里，这些组织受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影响。然而它们通常装备杀伤力较轻的武器——剑而非枪——同时他们中既有激进派也有温和派。其他印度教准军事部队组织更加松散。印度青年民兵、湿婆神军党的激进分子，以及其他人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摆脱了印度教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控制。一些政治家还有雇佣的“暴乱头子”负责从个别地方村庄或以擅长流氓行径闻名的亚种姓中召集士兵。许多人与其说受到纪律严明的精英战略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到当时流行情绪的影响，暴

乱过程本身又让这种情绪变得更加严重。

一些暴乱包含一种仪式化的集体行动项目,包括游行、音乐、合唱、旗帜、圣职人员或电影或摇滚乐明星、以震耳欲聋的声音广播的演讲、所有火形图案和口号的帽子及T恤衫,以及谴责所谓暴行的影视录像带等。这些内容使得参与变得令人愉悦,道德被行动的集体性质钝化,它囚禁了参与者。坦比亚(1996)强调暴乱的表述性一面;激进分子显然欣赏暴力,它的宣泄感、自我表达以及权力,这背后的支撑基础是自以为正义的对威胁性非己团体的报复行动。示威游行然后典型性地发展到遭遗弃或防卫能力薄弱的边缘邻里区——因为极少暴乱者是勇敢的。能够用于一个至今具有威胁性的敌人身上的权力感令人陶醉。抢劫与纵火很好玩,而集体抓捕是一种正义感的表现。他们正在保卫他们自己,报复和教训对方。勉强能感觉得到的边界被集体正义感跨越。有一种暂时的被授权、同质性、群体归属和身体亲近意识。他们不会单独、各自去做这件事,坦比亚说。事后没人感到后悔。酒精在此比在基督教国家作用要小,尽管印度教暴乱者有时也会得到酒精。

480

暴乱者没有失却工具理性。他们倍加小心地提防警察及抵抗力量,而大多数暴乱和抢劫发生在非己团体邻里区的边沿,这里抵抗较弱,因此伤亡也少。霍罗威茨(2001:527)说起世界上的暴乱,“没有一次暴乱,暴乱者错估自己的战术和实力、警察的意图或者他们的目标的反应,从而造成暴乱者伤亡人数比目标方更大”。唤起的激情并没有压倒理性。因为这些组织决定和确立地方控制权,所以这里面包括了物质动机。对地方邦的控制权涉及福利、开发以及就业项目的机会,而种族民族主义者精英和暴乱者正想方设法进一步加大对地方的控制权——我们在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更加严重得多的事件中看到的也是如此。选举运动特别让少数派害怕,因为选举动员使得多数派能够再次确立其对地方邦的控制权。因此戒严往往能打消暴乱,而激烈的党派竞争却加剧暴乱——第1章中提及的民主和平理论的反例之一。

那些在印度犯下严重暴力罪行的人——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

样——绝大多数是年轻、未婚的城市男性(霍罗威茨;2001:258—266页汇集了全球证据)。一些人受过准军事训练。全印志愿者组织成员通常穿得像印度士兵,尽管少数人穿得像古代战士。更加衣冠不整的湿婆神军党准军事人员嘲笑全印志愿者组织的着装和行军步态,他们更喜欢一种更加个人化的自发和世俗的暴力类型。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某孟买电影中用暴力赢得正义的英雄(们)”。(霍伊泽,1992:2189;卡曾斯坦等,1998:227)。激进分子通常不是选自边缘或没有阶级意识的一群人,而是选自学生、工厂和交通部门工人、东方市场商人和手工匠(坦比亚如此说,1996)。霍罗威茨(2001)说暴乱者以工人阶级为主,但它与暴乱中有大量学生参与者的现象相悖。贾弗里洛特(1996)说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原始核心是在上等种姓、中产阶级群体之中,但它之后就扩散到中下层群体中,尽管其绝大多数领导人依然是文人雅士*。当然,大规模暴乱的组织者与办公桌杀人者类似。他们发布命令,但自己不去参加暴乱/杀人。霍伊泽(1992)与湿婆神军党激进分子有过交往,他把他们描述为大都是受过教育或半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在相当需要体力的零活中就业不足,但他们不是处于边缘的破落的无产者,因为在印度的城市中甚至这样的临时就业也能产生高于平均的收入。他们声称他们失业了,遭到剥削,要求通过一种超越性的民族主义对他们受到的剥削状态进行补偿。他们说,少数民族与种姓的冲突,正在毁掉印度的统一,毁掉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的机会。

481

一些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穆斯林男人根本就不能被同化,所以必须被坚决地逐出印度,尽管他们一般认为穆斯林妇女能够被强制改宗。这类男性沙文主义使得非己团体的男人遭受更坏待遇。湿婆神军党的暴力几乎完全是由男人完成并且是针对男人的。但是全印志愿者组织(像周边的斯里兰卡的印度教同伴泰米尔猛虎组织一样)也组建了一个大型的妇女准军事组织——萨米提(Samiti),其手持弓箭穿过穆斯林邻里区的行军已被用来挑起印度各城市的暴动。

* Brahmin,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的幽默称呼。

萨米提成员对穆斯林男性有一种种族女性的偏执狂态度,所有的男人都被她们视为潜在的强奸犯(巴切塔,1999)。可见并非女性主义的所有方面都是美好和开明的。

但尽管激进派作了最好的努力,暴动极少能延续很长时间。坦比亚(1996)说,暴徒被拔高的精神状态不能延续很长时间。人们会因叫嚷、烟雾和奔跑而精疲力竭。他们需要食物,睡眠、家庭和工作。惊奇的因素已经消失了。群组 B 现在在保卫它自己,同时更多的暴力升级行为将会有风险。来自 B 组或警察部门的谣言使暴乱者受到惊吓。无论如何,报复“给他们点教训”都已经成功完成。种族中间商想让它继续,但却只有有限的操纵权力。群众对谣传的事件真正感到愤怒;他们已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以便让 B 组不敢再次做这件事。他们对这是谁的国家等这样的抽象问题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它们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无太多关联。因此暴乱很快沉寂。

如果 A 族群中间商能够以更高水平的准军事暴力回应 B 的反击,那么少数暴乱就会进一步升级;此种暴力指向一个威胁性和高度政治化的目标,消除这一目标将需要费一些时间,并涉及许多激进分子。1992 年由印度教暴民对阿逾陀清真寺实施的摧毁包含了激进分子协调一致和持续一贯的行动,他们已经被政府对问题的犹豫不决态度激怒了。但当暴乱开始在全国范围扩散时,帕里克(1998)指出它们的发生也取决于前印度教民族主义在某个地方上的组织优势,以及地方上对穆斯林的政治性不满。她还指出重大的种姓之间的争端削弱了种族民族主义。关于给低级种姓的“岗位预备”(定额)的争端在印度也很普遍。而在争端剧烈爆发的地方,它们通常会让反穆斯林情绪退居次要地位。在印度,胜过族性的通常不是阶级,而是种姓(我的第 2 个论点的一种变异形式)。贾弗里洛特说(1996),当阿逾陀清真寺被拆毁之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发觉他们不能为了建造一座属于他们自己新殿的这项更为世俗的任务而发动一场相似的行动。

建造计划破产,然后他们开始搜寻新的动员目标——但这些不是大量存在的东西。大规模动员只有在所谓的威胁在群众中引起回

应时才能被操纵。

升级还有一个先决条件:来自上层的政治对手的缺席。这取决于地方当局对族群 A 的偏向程度。警察可能会袖手旁观,或甚至协助暴乱者,或者地方及地区政治家可能会支持暴乱者的正当的愤怒。政治权力机关可能会鼓励将不满转移到少数社区身上,把一场暴乱变成图表 16.1 所称的政治家的集体迫害。虽然印度国家在形式上是世俗的,但它毫无疑问并越来越明显地是属于印度教的。有些印度教政治家是种族民族主义者;更多的人则认为他们必须通过对它表示出某些支持来预先转移来自种族民族主义的压力。这些是正常被选出来参加再选举的政治家。如果印度教民族主义变得更受欢迎,或者如果它们自身变得不如以前受欢迎(也许是因为与民族主义完全不相干的理由),他们通常就会试图打种族民族主义牌。这方面他们与所有地方的民主政治家都相像。地方警察可能会恐惧、有偏见或者腐败。他们不喜欢向印度教徒开枪,他们可能支持印度教暴民,或会被买通换一种看法或受诱惑去参与分赃。普通印度教徒受同样政治潮流影响,但是官方的合谋使得暴乱时间延长,让准军事部队及群众胆子更壮。暴乱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致命(基什沃,1998a:20—21;1998b:150—154;帕里克,1998:54)。

推论也是正确的:权力机关的决定性行动能够立刻阻止任何暴乱或集体迫害发生,假定他们的能力没有被其他方面的危机严重削弱的话。贾弗里洛特、坦比亚、布拉斯以及帕里克都强调印度次大陆案例中的这一特点。当权力机关失去功能或担任同谋时暴乱会继续,反之暴乱则即刻被阻止。我们在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中也看到过这种情形。但是无论沙皇或者是苏丹都不一定非要参加再选举。早期尼赫鲁以及(一开始)英迪拉·甘地夫人政权认为种族民族主义威胁着他们自己的世俗国家。他们镇压了它。但是后来的政权,面临更大的种族民族主义压力,有时顺应暴乱的气氛。这就是甘地夫人对待锡克教徒的致命错误,它最终导致她自己被锡克教保镖暗杀。

但即使权力机构起初失去功能或参与合谋,它们后来也可能有扑灭暴动/集体迫害的动机。寻找替罪羊是让人们暂时宣泄一阵被

483 压抑的情感与愤怒,将一次产业罢工或面包暴乱或政治危机转变成对锡克教徒或穆斯林的攻击的一个机会。而一旦转移视线取得成功,再继续那样做就没有意义了。第二,政权变得对公共秩序比对民族团结更加担心。持续的混乱给它带来很坏的名声并将激起两个族群中的反对意见。它们的社区领导人和许多来自有产阶级的人静悄悄地在背后催促采取行动(他们可能不喜欢公开这样做)。政治家与管理者意识到那些不能维持公共秩序的人将会倒台。第三,严重的暴乱带来国际谴责和国际干预的威胁:因此政权,甚至有时是含有偏见的政权,通常会插手进来,终止暴动,镇压双方。这些担心甚至影响到民族主义组织。在90年代早期,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人民党(BJP)以及甚至全印志愿者组织就开始担心会被印度青年民兵的“愚昧的团匪”以及他们的“种族—民族主义动员”策略胜过,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合并、培训他们和让他们更有节制(贾弗里洛特,1996:478—481)。在一种稳定的状态下,权力最终且通常都能带来责任。

因此在印度(以及大多数其他国家),甚至在有充满分歧的市民社会的城市中,通常的最终结果是对包括两路制造事端者的镇压,这也许并非完全公正,但其展示的武力足以将群众、激进分子,以及种族民族主义精英吓得逃跑。秩序得到恢复,尽管或许只是暂时的。这些是图表16.1上面部分显示的暴乱循环,不是如图表下半部分描述的升级至谋杀性清洗的行为。

但是印度教种族民族主义的兴起威胁着国大党的权力,引起了自60年代末以来的暴乱以及对80年代印度教民族主义党的更大的支持。80年代大规模的低等种姓印度人皈依伊斯兰教,威胁到更加世俗化的印度教党派监管种姓政治以及宪法中暗含的“不许改宗”妥协方案的能力。在这些压力之下,印度教开始变得团结,逐渐形成了一套更有凝聚力的礼仪、经文和众神;有些人甚至将它视为向着单一神教方面的努力。传统的文化观念“愤怒的印度教民”开始为印度教种族民族主义所利用(贾弗里洛特,1996:388—392)。当政的英迪拉·甘地夫人的国大党第一次开始在此地区迎合印度教民族主义,同时其他地方协调其传统的世俗和种姓据点。这是选举机会主

义——一种来自印度民主制度和—一个极化的选民的产物。这种前后不一致的战略产生的效果适得其反，使得印度教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更能被接受。印度人民党得票上升，然后是湿婆神军党。种族民族主义以民主方式掌握了权力。

当然，印度教种族民族主义无法简单地一下子超越种姓差异。在国大党衰落时期，种姓间暴力同样增长，特别是在北方，它同时强化了宗教—族群和种姓—阶级之间的冲突。甚至连印度教民族主义党也不能无视这一点。他们必须留心不被指认为唯一的高级族姓党——这是他们的领导人的背景所暗含的。在政府中时，他们也不得不同样保持秩序，所以他们试图抑制制造混乱的种族民族主义。在另外一面，穆斯林高度分散在印度北部。在克什米尔之外，他们的组织性太弱，以至于他们的进攻无法获得令人信服的成功机会。原教旨主义需要安全的基地而印度穆斯林无法提供——除了在克什米尔。印度的穆斯林十分世俗化，政治上较为温和。种族—宗教妥协有着强大的力量（基础）。

484

然而随着印度人民党习惯于公职的舒适和腐败，它就开始失去了它在根据地中的受欢迎程度。其中的激进派公开谴责腐败，并提出道德和宗教纯洁的要求。他们强烈要求对参与近来发生在这两个核大国之间的边境小范围冲突的巴基斯坦穆斯林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但是激进派将他们的行动重点放在在目前被毁掉的阿约迪亚清真寺遗址上建立一个印度教寺庙项目的受欢迎程度上。大量的群众在此集会，迫使印度人民党政府采取更多行动。

2002年2月，一大群支持者乘火车到古吉拉特邦——印度人民党的一个重要据点——火车刚好停在戈特拉镇。在经历印度教旅客的挑衅之后，火车不得不停在镇子外面，那里正好是最激进的穆斯林郊区之一。它很快受到一群穆斯林的进攻，他们朝火车扔石头，并点燃火车。火车像火药盒一样爆炸了，58名印度教徒被活活烧死，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印度教徒的报复迅捷而凶残。在整个古吉拉特邦估计有2000人，几乎全是穆斯林，被横冲直撞的暴徒杀死，有10万穆斯林逃往救济营。杀戮行动连续进行了好几个月之后，军队与

警察才重新控制了该州。

克沙拉姆·沙斯特教授 96 岁,是世界印度教理事会的一个大型的种族民族主义协会古吉拉特邦分部的主席,也是印度教经文的学者和令人尊敬的文学家。他承认他帮助草拟了紧接在戈特拉事件之后作为在艾哈迈达巴德城的抢劫目标的穆斯林商店名单。当被问及为什么时,他回答说:“不得已,不得以。我们不喜欢这样做,但是我们太愤怒了。欲望与愤怒是盲目的。”他接着说暴乱者是“有良好教养的印度教男孩”,似乎这也是理由。但是在此处,前所未有的是,受印度人民党控制的古吉拉特邦政府加入了合谋。一位重要的印度人民党的部长接管了对警察的控制权,同时命令警察不理睬穆斯林的求救。警察被视为暴徒的领导,同时想干预和制止暴徒的警察被调到了其他地方。古吉拉特邦广受欢迎并充满活力的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拒绝谴责暴动。事实上,他宣称古吉拉特邦的印度教民已经表现出了“惊人的克制”。他凭借蛊惑人心的印度教种族民族主义宣传,奋力拼杀并赢得了随后的邦选举。他戏剧性的选举成功在印度人民党中引起反响。他似乎为印度人民党赢取选举胜利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模式,同时将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推向了强化民族主义路线的方向。

许多印度人称这些古吉拉特邦暴乱为在印度发生的第一次由邦领导的集体迫害。虽然在暴乱过后有 5000 人因暴乱被捕,但绝大多数案件被撤销,并且没有人受到过审判。2003 年 10 月,印度最高法院说它不再对古吉拉特邦政府将暴乱者交付登记抱有信心。法院宣称:“什么是政府的职责(rajdharmā)?如果你不能起诉有罪者,你就下台。民主并不意味着你不对任何人提起公诉。”因此它坚持要求官员必须批准未来的所有原告的起诉(人权观察委员会,2002;<http://www.rediff.com/news/godhra.com>)。2002 年的古吉拉特邦起诉对于此前描述的暴乱循环是一个令人担心的例外。它源自于印度教种族民族主义力量 30 年来的增长,继而是一段时期的不稳定和执政党内部的派系主义,并与一段时期的印—巴冲突构成巧合。幸运的是,围绕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全国性不满导致了 2004 年 5

月选举之后国大党及其左翼盟友的回归。古吉拉特邦现在依然平静。

总的来说,印度暴乱到目前为止加强了 my 第 5 个论点。没有越过边缘、进入谋杀性清洗的现象会发生在在一个未面临严重危机同时又在应对种族和宗教以及阶级(种姓)冲突的稳定国家。现在让我转向印度的更坏的例子。

1. 隔离。所有事件中最坏的事件发生在印度独立以及将次大陆分割成印度和巴基斯坦时期的 1947 年。有 20 万至 40 万的人被杀,成千妇女被强奸,以及大约 1000 万人越过印巴边界各往一边逃至他们新的种姓—宗教故乡。这绝对是次大陆上至今看到的最血腥的种族宗教清洗,几乎全部发生在与两个新国家边境相邻的种族混居的旁遮普省,其中对立的宗教群体企图通过武力手段确立大多数人的主权地位。但是在这个地方,除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外,还有锡克教徒。他们缺乏对一大片地区的控制权,从而不足以形成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倾向于能够在印度境内获得对他们所在的最密集居住区的地方政府的实质性控制权。在隔离之前,他们的领导人就公开宣布他们将把当地穆斯林人口赶走,以为从巴基斯坦逃出来的锡克教徒腾出空间。

跟着出现的三路暴力不是由国家实施的,因为没有有效国家。英国正在撤出,无意卷入公共暴力。同时无论印度还是巴基斯坦都没有开始有效运转。但是一些来自这三个地区的地方管理者卷入其中,还有一些地方军事编队。旁遮普省高度军事化了,大约一半人成了英属印度军队的士兵。由前服役人员和逃兵组成的地方军事组织构成了有组织的杀手团伙的核心,他们配合反抗英属旁遮普边境部队,后者并不真心维持和平。锡克人武装(jathas)很可能是最令人生畏的,尽管准军事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全印志愿者组织首先在此出名。谋杀性种族清洗也很普遍,所有三个社区中的大量男子都参加进来。对妇女施加的暴行出现了一个惊人的转向。一群群的男人,害怕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遭到强奸或强迫改宗,杀了她们。这些妇女和姑娘还在锡克神话中被当作烈士纪念,而杀了她们的男性亲戚并

没有受到任何谴责。几个月之后,两个国家的新军事部队得以监督人口的转移,“解决了”主权问题。难民营依然是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可以预见的愤怒的种族民族主义的孕育者,就像它们在今天一样(艾哈迈德,1991:469;艾亚尔,1995;布拉斯,2003;贾弗里洛特,1996;马德霍克,1986,第5章)。

如此可怕的场景 1950 年在东孟加拉重演,此时反印度教的暴乱导致了另外 10 万人的死亡,其中大都是印度教民,还有大约 200 万人逃到了印度。然而屠杀导致了相对的种族安定,因为几乎所有印度教民都逃到了印度,而且印度终于能宽容剩下来的穆斯林少数派。这与一个实力削弱、陷入派系化的国家中的对立且又可实现的主权计划有关,激进派在这里可以随意鼓励军事暴动。

2. 锡克教—印度教冲突。这种冲突爆发于 80 年代。锡克人有他们自己的古老的政治制度,有他们自己对印度教的理解,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英国人曾鼓励锡克人实行自治,他们把这当作分而治之的战术的一部分,特别是,他们(可)将锡克人当作士兵使用。在现代印度,持不同政见的锡克人已强烈要求将印度境内处于外省的旁遮普邦归为他们自己独立所有。他们本指望印度宪法会将此确定下来,并给予旁遮普语言官方地位。然而这没有发生,而国大党依然不予支持。在 80 年代初期,锡克武装激进分子开始接管旁遮普机构。起初印度反应迟缓,给锡克恐怖主义壮了胆。但印度随后发动了全面军事镇压,这场镇压在 1983—1992 年间夺去 2.5 万人的生命。大范围的印度教—锡克教暴乱也在全印度爆发,造成大约 3000 人死亡,这发生在 1984 年印度总统英迪拉·甘地被她的锡克教卫兵遇刺身亡之后,后者是为了报复第一波镇压。这些暴乱是高度有组织的,受到了将其作为他们戒性政策一部分的国大党领导人的怂恿。暴乱起了作用。虽然锡克激进分子接受来自巴基斯坦及其他地方的武装,但他们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运动自此沉寂,很可能要在最后一次失败已被忘却之后才会再次爆发——除非被答应给予进一步的政治让步(迪隆,1998;基什沃,1998a)。

3. 查谟和克什米尔。这些邦组成了在印度西北部的一个有争议

的边境区,印度与巴基斯坦代表对立的当地印度教和穆斯林社区都对此提出主权要求(阿卡塔,1991;巴塔查吉,1994;埃文斯,1999;旁遮普,1984;拉曼,1996;斯科菲尔德,1996)。克什米尔不是 1947 年印巴分治中的一部分,因为它仍然由一个独立的印度大王(maharajah)统治,尽管它的人口大多是穆斯林。它的压迫性统治自 1930 年代以来就受到要求世俗民主形式的穆斯林团体的反对。在印度教极端主义组织协助下,它使得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超出了以往有记载的任何时期。在分治危机期间许多穆斯林被杀,穆斯林反叛分子因有来自巴基斯坦武装部落人员的支持而遭到报复。尽管有来自全印志愿组织和来自旁遮普的被激怒的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的援助,大王还是被迫向印度军队寻求援助——以签字将王国让予印度为代价。大笔一挥之下,地方属于印度了。但是进一步的冲突导致了 1972 年新的分治计划,它将该地按印度与巴基斯坦控制线一分为二。

487

在巴基斯坦控制地带的人口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几乎不存在冲突。然而在印控克什米尔,主权问题依然存在争议。印度能继续依凭武力进行统治,依凭对大王的继承权进行统治,以及依凭一个看似合理的保护印度教民和温和派穆斯林双方的理由进行统治。如果紧张关系能被缓和,温和派穆斯林或可帮助带来大多数人对在印度境内实现有限自治的支持。但是穆斯林叛乱分子能从相邻的巴基斯坦和强大的大多数主义民主言论中得到援助。这足够引起冲突并带来某种程度的种族—宗教极化现象,后者在那时足以让他们赢得任何全民公投。人口是以穆斯林为大多数——90% 在克什米尔山谷,60%—70% 在查谟(精确数字有争议并依大规模难民活动情况而呈现不同)。大多数穆斯林似乎想要比印度准备给予的更多的政治自治,而激进穆斯林要的是要么独立,要么与巴基斯坦联成一体。增加对外部武装援助的依赖驱使他们选择与巴基斯坦结成一体。印度的选举中时见腐败,而在印度的控制地位似受到威胁时,中央政府便插手采取戒严。

眼下,有超过 10 万的印度军队驻扎在该区。虽然较弱一方的穆斯林反叛分子无法在战场上面对印度军队,但他们能够发动游击战、

爆炸、暗杀活动,以及地方清洗。印度人似乎已镇压了谷中央的大多数抵抗,但是穆斯林战士还控制着山地边境一带,巴基斯坦激进分子和激进的邦中派系为他们提供了支持和物资供应。从 80 年代末期起,“客座激进分子”或“圣战士”(jihadis)就一直从整个穆斯林世界涌向这里,他们受到伊斯兰国家的赞助,并能够在世界市场上购买高端又廉价的武器。克什米尔和克什米尔难民构成了伊斯兰主义的一个主要滋生地,后者以我在下一章指出的弱者的恐怖主义武器作为武装。另一方面,如在此类冲突中常有的那样,大多数伤亡是由国家——本处即印度——的治安部队造成的。

在这种像战争一样的环境中,印度教民族主义也发展壮大,两边都变得更少世俗,更多的似原教旨主义。在 1988 年到 1990 年间有超过 100 名的温和派世俗穆斯林政治家被暗杀,230 多座世俗学校遭伊斯兰激进分子炸弹袭击。这些学校被一个不断扩大的宗教学校网络(madrassas)取代,后者受国外赞助。全世界突然知道了当地人十多年前就知道的事情。这些学校教孩子如何为他们的信仰而斗争。印度政府现在说大多数穆斯林战士是来自省外——尽管这个数字很可能包括来自原住在克什米尔的难民家庭中的男人。它们当中有许多互相竞争的准军事组织,大多由 15 岁到 25 岁或 30 岁的年轻人组成。大多数领导人是受过教育的教师和职业人士。据说在行政部门内部有大量的来自穆斯林的支持。激进分子核心由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组成,尽管动员城市和农村两种环境下的青年人的能力也表示着一种跨越阶级边界的能力。获得工作,特别是在公共部门,为许多激进分子解决了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两边都将妇女组织动员起来,主要是受过教育的妇女团体。虽然他们在言论上有时敦促妇女武装她们自己,但女性激进分子似乎将自己限于游行示威以及给不够虔诚的妇女以压力。在此,当然,两边的激进分子都携带火器和炸药,而不只是主要在印度大多数地方的种族民族主义活动中运用的钝器。

这适合我的论点 4a:弱势一方战斗中受到教友和国外家乡国家帮助的支撑,一个促成持续不断、逐渐升级的暴力与清洗的因素。40

年以来,估计大概有 5 万人被杀死,而杀戮一直在升级。埃文斯(1999:30)估计,单在 90 年代就有 3.5 万人被杀。2003 年末和 2004 初的杀戮速度是每月 300 人。超过 30 万的人作为难民住在外省,还有数万人住在其他地方。暴力水平不稳定。有时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和普遍的厌战情绪好像提供了一个达成妥协的机会。但是到目前为止,两边的激进派破坏了这一条件。暴力看来还将继续。这是一种更高水平的种族暴力,因为它关乎富有争议的貌似合理又可以实现的对主权的要求。冲突难以解决。自决原则——多数主义民主——将使穆斯林和巴基斯坦人坚定决心,它将给予他们在国外的事业以相当的合理性。我们可以谴责印度政府实行国家恐怖主义。但是印度政府没有表现出敢于冒险放弃被认为是印度既不可分割又是战略性领土一部分的迹象,而他们还可以以代表遭恐怖主义逼迫的人民宣称所进行的斗争具有合理性,这样做现在对华盛顿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尽管印巴关系紧张,两国依然对战争持谨慎态度。印度国家是稳定的,而巴基斯坦则稍差。当巴基斯坦不稳定时,克什米尔的事态容易升级,如在 1999 年。这种危险又因 2001 年美国在巴基斯坦军事政权援助下对阿富汗的入侵以及随后美—巴联合打击巴基斯坦境内激进派穆斯林的行动而增加了。

4. 东北边境。这些边境一直制造着地方种族暴力事端,经常呈现“帝国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形式。地方种族声称他们受到了帝国主义印度的剥削,要求地方民主,而印度声称正在将现代性和文明带给一个落后地区。“七姐妹”,包括阿鲁纳恰尔邦、阿萨姆邦、曼尼普耳邦、梅加拉亚邦、米佐拉姆邦、那加兰邦和特里普拉邦从未是印度的一部分。阿萨姆王国、曼尼普耳和特里普拉王侯邦以前是独立的,后来成为缅甸的一部分,直到 19 世纪被英国合并,1947 年英国说服它们加入印度。一些人认为它们这样做只有十年,同时它们保留了它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大多数邦已形成了重要的自治组织。宗教通常不是争论中的问题,因为人民要么是印度教,要么就是有许多信仰。种族分歧更深而且复杂。大多数派通常视他们自己为不同于印度人的人,但是他们经常是许多不同族群和印度集体的集合(他们是“表

列部族”，按照印度宪法中的界定），而有些少数族群觉得他们是属于印度的民族。种族分歧对日常生活也有实质影响。地方民族保留了他们自己的语言，这造成了关于谁的语言应当在教育和就业中得到承认的冲突。这些人口不足的地区还接受了带来不稳定的外来移民的流入，特别是孟加拉、缅甸以及印度其他地方的人。土著部落声称移民压垮和剥削他们。有些部落群体接受国外援助。移民受到他们在国外的同族的援助，而持不同政见的准军事部队已发现从对印度边境有争议的邻国得到武器很容易——巴基斯坦、中国、缅甸（达斯格普塔 1998；德巴马 1998；戈帕拉克里希南，1995；莱尼坦加，1994）。

我的论点 3 和 4 表明这些将是危险的区域。事实上，数万人已死于种族战争之中，数千人死于种族竞选。然而因为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要求地区自治而不是独立，以及印度的核心族群极少卷入（是土著民族反对边缘移民），这些争端似乎是可以解决的。世俗的和左派印度团体对这些领域更为积极。2002 年在特里普拉邦，一个马克思主义邦政府受到武装左翼分子的袭击。结果，印度政府在此比在克什米尔更为灵活和更有协调性。大多数人建议一种双轨政策：镇压独立组织，同时以印度宪法允许的方式协调其他团体——亦即对地方邦自治采取联盟和联合方案，对管辖部落民族提供诱惑性的行政管理安排和经济发展基金，与在更高层分享权力挂上钩。这产生了几十个与印度共和国一起出现的新的邦。全面的解决方案依然遥远，但是问题总的来说正在被控制在适度的、尽管程度不同的暴力水平之内。一些地区政府未能执行答应好的妥协方案，带来了持不同政见准军事部队的新的暴力。独立邦地位有时使得那个邦的少数派提出这是他们自己的邦的要求，一些人断言他们更加土生土长、“货真价实”，如像阿萨姆的那加人和博多人（Bodo）。一些人想在以他们为主的区域周围重新划定邦和地区的边界。小规模种族战争和暴乱继续在本区酝酿着。但是除非情况在新德里真的变糟，边境形势应当会逐渐改善。

总体上，随着世俗主义相对种族民族主义的衰落，随着新自由主

义威胁到以国家规定的积极差别待遇为基础的种族妥协,以及随着全球武器市场对持不同政见者为弱者购买武器方面更加开放等等,有些升级行为一直发生在民主制的印度国家之中。但是升级没有变为系统性的谋杀性清洗。它的无亲教信仰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它的种姓制度存活下来,而它的国家还在将发展基金调拨到落后部落地区。最坏的局面是,克什米尔和查谟之间的种族冲突有可能升级到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两者都声称民主立场),就像它过去已发生过的四次冲突一样——不过下一次可能带有核武器。这样的升级将使冲突离开种族领域转移到更常规的战争和地缘政治上来。在过去爆发的冲突中,理性的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学起到了约束两国的作用。我们必须寄希望于它的再次发生,虽然一个伊斯兰政权在巴基斯坦的出现或会诱使印度采取先发制人的动作,而在其背后,大规模的对穆斯林的谋杀性清洗或会发生在克什米尔等其他地方。

独立以来的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也具有深远的多种族历史。一般认为它的 2.1 亿人口分散在超 1.3 万个岛屿、300 多个族群,以及 200 多种语言中。但是它比印度经历的领土合并要少得多。荷兰人仅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成功地对几乎整个群岛进行了殖民化。甚至当时他们的统治也远不如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那样集中化,他们被迫更多地依赖于凶残的镇压而不是例行的管辖。地区性种族身份在殖民主义统治的最后岁月里加强了,此时荷兰人试图通过对他们进行分而治之来抓住权力不放(诺德霍尔特,2001)。1945 年之后,新独立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从它的爪哇核心向外扩张,征服新的岛屿,一直到 1975 年,其时东帝汶被占领。所以群岛经历了荷兰与爪哇帝国主义之间的帝国连续性。社会整合的主要因素是伊斯兰教,因为该国的穆斯林占到了 80% 以上。但是这从不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在殖民主义时期伊斯兰教与国家保持了距离,所以后来提政治要求也晚了一步。伊斯兰教

是市民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但它不操控国家。近来最大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在某种意义上是伊斯兰教,但因为它们差异很大,共同点极少,所以国家依然相当世俗。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像第二大穆斯林人口的印度一样,并不太为伊斯兰主义吸引。群岛上重要的种族骚乱不是宗教上的。如一贯的那样,它们是以针对国家的争端为主,而宗教则极少被政治化。

75%的印尼人口居住在爪哇和苏门答腊两个核心岛屿上,而在两个地区当中,地区/宗教差异一直在减小。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之下的深入的经济剥削削弱了地方差异,而之后当地精英才能够依靠一种共同的民族意识发动反对荷兰人的起义。在获得独立之后,凭借来自左翼和中间民族主义党派以及世俗的以爪哇人为主的武装部队的支持,印度尼西亚人逐步建立了一个相当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军队还在50年代的高度镇压性运动中确立了对外围地带的实际控制。但是国家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强加一种共同国家语言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原来自马来西亚)的教学制度。在当地人慢慢将其作为通往现代性的通行证之后,对它的接受变得更加自觉。

统一之后,国家本应该迈向宪法中隐含的权力更加分散的政体。但这一过程受挫于1959年苏加诺戒严令的宣布,继而是1965年对印尼共产党的骇人听闻的屠杀,然后是苏哈托政权之下时断时续的暴力以及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伴随着对外围领土的兼并继续进入70年代,而美国与澳大利亚佯装没看见,因此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广泛的、部分爪哇人但部分是非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但它不是一个真正代表那个民族的国家——特别是在外围(赫夫纳,1991;霍罗威茨,1985:514—516;利德尔,1999;马利,1999)。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然后面临着比他们的印度对应角色所面临的更严重的四个问题。

1. 他们仅对国家进行了初步的制度化,甚至是在核心领土上。来自一个相当世俗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军队中的民族主义者,加上不期望国家非常伊斯兰化的穆斯林组织(那些确曾有如此要求的组织已遭镇压)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不稳定的联合政府。但是无论是军

队还是重要穆斯林组织都没有能力做到维持它们当初对建立一个世俗化的民主国家的信念。国家深刻地分裂成敌对的群众团体和穆斯林组织。军队也同样分裂,包含着由大型的强硬的反叛乱特别部队新带来的不稳定。政治和军事的不稳定已经出现了。

2. 印度尼西亚人没有确立对资本主义制高点的控制。大约有占 70% 的私人经济活动是由侨居印尼的中国人控制的,后者仅占人口的 4%。这带来了将阶级与政治怨恨转移到族性身上的可能性。它还使得许多印尼人赞成一个强大的并带有种族性(即爪哇和穆斯林)的国家,因为这是他们通向社会进步的主要渠道。但是中国人没有提出任何政治主权要求,所以(尽管 Chua 说法不同,2004),反华行为比在印尼外围出现的主权争议事件——我将在后面详述——更少带有谋杀动机。

492

3. 印尼经历了核心/外围两分式的帝国主义,后者被征服但融入印尼的程度不高。它包括东帝汶摩鹿加群岛、苏拉威西岛以及西巴布亚等地相当多的基督教人口,以及几个自治或分裂的组织,它们是以政治独立继而是 50 年代痛苦的被镇压经历的遗产为基础形成的。印度尼西亚统一的晚到性意味着当一个国家身份时同化发生在核心领土上时,外围的某些地区是由军事镇压控制着。这样的军国主义之后回头作用于核心,赋予国家一个确凿无疑的军国主义特色。这一点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对外围的大量自然资源的经济开发行为增强时,显得尤其明显,因为利润回到中心——经常是回到军队自身——而外围依然贫困。

4. 帝国主义还包括一个准殖民主义移民政策。印尼政府在 70 年代早期到 90 年代末期之间,将接近 1000 万的移居者从人口过剩的中部岛屿重新安置到不发达的外围岛屿上。最近的移民是参与由国际及中国伐木和采矿公司,以及由前荷兰企业(由印尼军队经办)对外围进行的更彻底的经济剥削的工人或商人。通过以一种残酷无情和给环境带来灾难的方式夺占和榨取土地,这些加在一起的外国势力经常剥夺了土著民族的谋生机会。从加尔各答角度看,这看上去像是发展、现代化,以及参与全球化。类似的冲突激烈发生在相邻

的菲律宾南部地区,这里基督教移民得到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偏宠,激起穆斯林土著人口的强烈反对。这种争端是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布·萨耶夫恐怖组织活动的理由。这类经济冲突的危险在于它形成了一个领土上和种族上的根据地。族群开始在地区争夺主权。

因此从外围的各个不同部分看,创建一个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尝试看上去像是运用所有四种社会权力的来源——意识形态同化、经济剥削和排斥,以及军事和政治压制——的爪哇—外国帝国主义行为。因为印度尼西亚依然对这些问题存有分歧,所以政策显得不一致。镇压、对当地人分而治之,以及真正的对地方关注和自治体的敏感性等,在印度尼西亚的政策中都令人不安地会产生动摇。从这种混合物中,五个要求某种地区自治的外围组织在80年代末再次强势登场。所有组织都能将他们的要求权建立在某种历史上真实拥有的政治主权上。

493 1. 东帝汶直到1975年遭入侵之后才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并且它曾经是一个葡萄牙而非荷兰的殖民地。其绝大多数人口信基督教,同时极少居民使用印度尼西亚语言。在独立斗争中,宗教不是争议问题,因为葡萄牙统治者也是基督教徒。许多东帝汶人将印度尼西亚的统治看成是对葡萄牙统治的一种改善,更愿意在印尼境内获得某种地区自治。但是入侵以及随后的镇压和挨饿杀死了大概有1.5万至1.7万本地人,估计占到总人口的25%(基尔南,2003)。少数人还站在印度尼西亚一边,将他们视作现代人,而其他人只是受庇护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取决于当权者。因为叛乱组织也很暴力,它的一些少数派别逃往了印尼那边。所以东帝汶官员与民兵组织与印尼军队并肩作战。虽然分歧在原则上既是宗教又是种族的,但很多暴行不是以宗教或族性的名义施行的。东帝汶人、印度教徒甚至基督教徒两边都有。民兵组织是从毗邻的或就在印属西帝汶境内的区域特别招来的(鲁宾逊,2001b)。在他们这边,叛乱者也受到来自国外的支持,起初是非政府组织,后来是联合国和澳大利亚。

1999年,在国际压力下,以及在雅加达的民主化阶段中,政权暂时中止镇压,开始准备选举。但是地方军队——以具有反叛乱背景

的军官为主——在雅加达高级军官的支持下，让它的民兵扈从提高暴力级别，要么通过恐吓手段取得希望的选举结果，要么就使选举根本不可能举行。暴力终于失控。许多普通印尼人也反对地区分裂行为。然而军方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地方扈从的实力。选举中绝大多数人支持独立，尽管估计有 2000 人被杀以及超过 20 万人被横冲直撞的准军事部队逼着逃进了相邻的西帝汶。国际压力之后迫使印尼政府放弃该地区，交出联合国给它的监督国家地位的过渡的授权。这在 2001 年实现。结果东帝汶人与印度尼西亚人都生活得更加好（海恩斯沃思与麦克洛斯基，2000；英巴拉伊，1995；鲁宾逊，2001a，2001b）。

2. 亚齐省在苏门答腊大岛的北端，人口 360 万。在 20 世纪之前它有自己的苏丹统治地位，同时有自己带有神权政治特点的伊斯兰传统。它同时在种族上比较同质化。它的初期针对新印度尼西亚国家的反抗结束于 1962 年，一般认为它被授予了包括宗教文化以及教育自治权在内的“特别区”地位。然而所有地方不同政见都被极端的镇压手段压制，这激起了对实际独立地位的要求。

东帝汶和亚齐省高度接近种族暴力的危险区。他们有古老的种族文化，在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殖民行为的怨恨的滋养下，他们开始提出领土主权要求。亚齐省叛乱领袖哈桑·迪罗宣称“印度尼西亚还是一个未被肃清的殖民主义帝国，爪哇人取代荷兰人而成为敌人”（凯尔，1995：62）。亚齐省叛乱分子也因其理想受到了全球武器市场以及利比亚和马来西亚的国际支持，后两者对他们的士兵进行训练。这接近我的论点 4b，其间弱者一方因有外来支持而壮胆选择战斗而非屈服。

军队的儆戒性镇压，在地方扈从老板和民兵的帮助下，压抑了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自治要求。然而这使得地方政治家和穆斯林领导人更可能要求独立而不只是地区自治权（琼斯，1995；凯尔，1995）。宗教是一个次要问题，虽然经济剥削激起了 90 年代初期的抵抗，但这仍没有面对印度尼西亚镇压时的凶残所采取的暴怒重要（鲁宾逊，1998）。军队未能建立一个广泛的支持基础。1998 年苏哈托的倒台

和1999年印度尼西亚从东帝汶的撤退鼓励了亚齐省叛乱分子增加他们进攻的次数。90年代大约有3.6万名爪哇移民被迫逃走。2001年6月,一个地区性自治一揽子方案被提出来,方案允许亚齐省保留70%的地方收益(以前是5%),同时执行部分沙里亚律法。但是仍然是安全问题阻止了所有协议的执行。所以许多法官、检察官以及其他法律工作人员都被赶走,以致法律原则不再起作用。作为回应,军队加强了镇压手段,并且目前还看不到有结束的迹象(人权观察委员会,2003)。镇压还提高了军队在整个群岛上的权力——以及在军队内部的特殊部队的权力。叛乱分子一直很小心不让自己与像基地这样的国际恐怖组织发生关联。

3. 摩鹿加群岛和部分苏拉威西岛包含大量基督教人口。荷兰人利用这些本地人作为他们的殖民主义军队的核心,而他们的社区开始基督教化。摩鹿加士兵在40年代大多与荷兰人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1950年他们重新崛起,宣布建立南摩鹿加独立共和国。他们失败之后遭严厉镇压。但是随着印尼移居者的涌入,紧张态势再次出现,多种族的环境有被简化为一个两种宗教,即基督教—穆斯林分隔的趋势。罗德(2001)对发生在苏拉威西岛上波索的暴乱作了生动的描述,在那里对立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团伙恐吓着地方少数群体。有250多人被杀,数千个家庭被毁,有7万人沦为难民。如在印度一样,由谣言煽起的小事件引发了第一批暴乱,继而是几个阶段的升级过程,其中每一方的暴行都被宣称是自卫或对对方暴行的报复。但是罗德认为印度尼西亚近来的民主化以及权力分散或下放导致了冲突的加剧恶化,而其本是从穆斯林移民开始的。团伙是由争夺地方分肥制度控制权的地方政治家和实业家组织安排的,而中央国家对它的镇压能力已经削弱。

495

一位穆斯林学生告诉罗德难民逃离战场、流入他所在的镇的情形。他说,他们很危险,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疾病带到了这里”。这依然是种族暴力,不是争取分离出去的斗争,同时几乎没有国外支持。2002年,一项和平协议在来自两个社区的领导人之间签署,尽管两边的小规模激进群体依然还活跃着。在穆斯林这边,拉斯卡尔圣战

组织(圣战军)在美国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战争中已经臭名昭著。这种情况比起更严重的谋杀性清洗,或许更像暴乱的景象。

4. 西巴布亚/伊里安查亚省以基督徒为大多数,而种族上绝大多数是美拉尼西亚人。它的 100 万人基本上没有国籍,文化上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其他地方比与印度尼西亚有更多相同之处。1963 年遭印尼入侵,1969 年被纳入共和国。再一次,迁移移民项目激起了地方抗议,它借寻求自治或分裂出去的巴布亚民族主义组织表达出来。该地区相对的落后和缺乏足够的外国支持使得这些组织力量十分微弱,因而较少的军队镇压即可维持印尼的统治。2011 年雅加达承诺实质性地区自治,包括保留来自自然资源的 70%—80% 的收益以及一个管辖该地区和代表住在那里的 250 个部落集体的联合会。不过,主要的巴布亚组织一开始拒绝了这一提议。之后不久,在 2001 年 11 月,它的领导人被发现遭人谋杀。梅加瓦蒂政府,像之前的哈比比政府一样,可能具有调解的意图,但是它不能控制其他政权因素——凶杀犯很可能来自特别部队。局势依然不确定且紧张。30 年来已有 2 万以上的人死于那里,仅 2001 年一年就有 1500 人。

5. 西加里曼丹岛的达雅克人,有 350 万之多,构成本区人口的大多数。达雅克人受到由资本家和军队企业,加上马都拉人移居者对他们的土地的严重剥削的威胁。1997 年和 1999 年,达雅克人对马都拉人进行报复,杀死数百人,同时迫使其他大约 5 万人逃离该岛。高潮出现在 2001 年,这年他们又杀死了 500 个马都拉人(其他资料说 2000 人)。他们的攻击包括割去敌人首级,它可能成为全世界的惊悚头条新闻,激起“原始部落主义”的解读。一位受了惊吓的马都拉人向新闻记者描述了一个达雅克人在他面前挥动一个被切下的头颅的场景,达雅克人说,这是马都拉人的头。如果你爱你的命,你最好逃吧(《洛杉矶时报》,2001 年 3 月 3 日)。恐怖确实起了作用。超过 10 万的马都拉人——几乎是整个马都拉社区——逃回了他们自己的荒凉的岛屿上。这是高度成功的谋杀性清洗。

不过,这种想来极其原始的割人首级似乎是一个制造恐惧的战术举动。暴力是由现代政党组织的,是为响应印度尼西亚政府创建

地方政治制度——达雅克人作为多数群体能够得到体现——而动员起来的。东加里曼丹岛,相反,极化程度较轻。没有一个族群能形成大多数。双极性,而非异质性,是问题所在。在苏哈托的新秩序政府统治期间,地方领导人曾动用保护人—受庇护人网络支持执政党。苏哈托在其十年战争中把达雅克人当成盟友,来对付共产党叛乱分子和据推测为他们的盟友的本区华人(吕戴维森与卡门,2002)。作为回报,达雅克人领导人能够分享中央分肥制度。采矿业和伐木业的发展然后将马都拉人带了进来。分肥制度扩散到私人产业,岗位被分配给越来越带种族特点的拥护者。地方上民主制度的引入使这些经济冲突沿种族分界线政治化了。达雅克人实业家/政治家利用原始的暴力仪式来掩盖他们的角色,同时装出在所谓猛烈上升的部落感情浪潮面前感到无可奈何的样子。两边的核心战士是被安排进入由地方大人物控制的武装团伙的采矿工和伐木工。马都拉人能够倚赖一些警察支持,达雅克人可倚赖军队的支持。两边的穷人突然反目相向,而不是将矛头指向他们共同的阶级剥削者(范克林肯,2002)。由印度尼西亚军队武装和训练的民兵组织也手持着叛乱分子的头颅在其他的岛屿上挥舞,以此作为一种儆戒性镇压战术——这也会发生在你的头上,如果你敢惹麻烦的话。

在以上例子的三个当中(亚齐和东帝汶程度较浅,那里移民更少),冲突也使土著民族反对印度尼西亚国家和军队与来自核心岛屿的印尼移民结盟。但是在所有五个例子中印尼当局——像在他们之前的荷兰人——也把地方头目列入他们的受庇护人名单,试图在本地人中实行分而治之,给他们提供就业、政府合同以及处在无效的保护—受庇护状态中的诸多职务贿赂。他们还效仿荷兰运用地方领袖培养民兵组织的做法。从70年代起这套做法在印度尼西亚“全体人民的防御”军队战略中变得比在荷兰统治下更加系统化——在其中模糊预算和特别部队组织并训练了地方民兵组织,以使用游击队的战术来对付游击队。在所谓人栏战术中,成排的本地人被迫作为一道屏障走在民兵或士兵前面,而后者向着叛乱村庄挺进。专门的反叛乱部队,民兵组织,最近的伊斯兰团体青年帮,以及暴力的并经

常是受地方领袖雇佣的犯罪团伙往往脱离国家的控制。随着地方氏族或民族被定义为敌人或朋友，暴力越来越甚，越来越混乱，并且也通常越来越有种族指向（诺德霍尔特，2001；鲁宾逊，1998，2001b）。

促成了然后又不得不应付所有这些暴力事件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制度化方面不如印度牢固。在一个处在复兴当中、能动员群众的伊斯兰教的压力下，在外围的种种危机中，在程度不一地对人口造成冲击的经济周期中，政权一次次分裂。这通常增加了暴力。1965年，一次未遂的军事政变导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右翼军队分子和雇佣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消灭——不是天然盟友！正如范兰根伯格（1990：53）对这次可怕的政治灭绝的总结——它杀死了 50 万以上的人（无疑地是印度尼西亚见到的最具谋杀性的冲突），这不是一种官僚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暴行，因为没有“高效率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发布一个严密的种族灭绝或大规模根除政治敌人的政策”。赫夫纳说（2000：65）：“与减少无端的暴力相反，这种国家机器的动辄分裂只是增加了它。国家与社会处在分隔的动乱之中……对立的政治派系创建着不受宪法控制的联盟，将国家中的诸种力量与社会上反对以同样分割方式组织起来的对立财团的那些势力联系在一起。”伊斯兰教现代化组织的兴起增加了在政党之中、民政部门甚至武装部队中的圣—俗分野。因此，大多数族群—宗教暴力是因国家派系主义和激进化而变得更加严重，如在其他事件中一样。政治领导人无法控制那些招来干脏活的群众和民兵组织。这引起人们对进一步解体和混乱的恐惧。近来的民主制的权力下放似乎已恶化了问题。

但是在印度尼西亚，清洗与民主制度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关联。正如 Chua（Chua，2004）指出的，当选政党有时玩种族牌，煽动对华人的仇恨。然而，因为维权主义政府更加地依赖军队，以及因为军队是民族主义的堡垒，雅加达比较民主的政权近来更有可能去寻求包括地区自治在内的妥协的解决办法。正如我们在加里曼丹岛看到的，这会使事情更坏。不幸的是，稳定的民主化制度从未存在于印度尼西亚。危险在任何政权遭削弱时都会到来，尽管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是削弱中的威权主义政权处在更加危险的境地之中。然后它或它的

一些派别经常玩起整体—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的牌来。

大多数大规模的反华暴乱也受到了试图转移经济和政治危机责任的政府派系的帮助。1959年出现重大暴乱/集体迫害,此后大约有10万华人被逐出境外,这之后又发生在1965—1966年、1973年、1980年和1998年。1996年和1998年的反基督教和反华集体迫害(其间有1200多名华人死去)一般被视为苏哈托总统为将普遍的经济不满转移到华人企业家以及将政治不满转移到穆斯林反对派身上采取的最后一招(Chua, 2004: 43—45, 他不同意此项观点,相反他谴责民主化)。莫名其妙的是,两种场合下警方都未出现在暴乱区域,而起初的暴乱者是有组织的用卡车从外面运来的身着黑衣的准军事部队(很可能是经过伪装的警察或士兵)。然后有大量的普通印度尼西亚人加入进来,开始抢劫、杀人和强奸。1996年这些人似乎主要是住在爪哇岛东北沿海地区的马都拉人移居者,通常是温和的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支持者,该组织表面上已因政权颠覆而名声扫地。自1998年发生的摩鹿加基督徒—穆斯林暴乱——其中约有2500人被杀害——可能也是由无赖军队中的一帮人煽动的;这一次它似乎败坏了基督徒和伊斯兰强硬派两者的名声(赫夫纳, 2000: 190—193, 205—212)。这些暴乱迫使每个社区的大部分人跟在它自己的武装士兵之后,加剧了种族宗教冲突中的民众性质。据估计有数万穆斯林移居者逃离该岛回到爪哇和苏拉威西岛上,以及有数万华人自1998年后逃离了该国。

因此,印度尼西亚的核心和外围再一次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充满争议的主权地位和一个充满混乱的国家主义解释。谋杀性清洗未发生在没有针对主权的竞争或者有不受国内经济或政治危机或外部地缘政治危机困扰的牢固稳定的国家制度存在的地方;它会发生在这些条件不能够得到满足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解放组织碰撞的地方,暴力威胁也更大,一方声称代表了反对落后的文明和全球

* Nahdlatul Ulama, 印度尼西亚宗教政党 1926 年成立,旨在为印尼制订伊斯兰教法。

经济,另一方代表民主制度——而它们两者都声称代表了现代性。然而当多数主义政府在印度已变得更危险的时候,在印尼它正在削弱着似乎更危险的威权主义力量。在这两个国家,民主与种族清洗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关联。

我们不应该夸大以上印度尼西亚冲突的重要性。国际媒体聚焦印度尼西亚的坏消息,大多是从这个无规则向外伸展的群岛的外围的角度。这经常是令人恐怖的,属于我在最后一章指出的种族民族主义者在更贫困的世界前殖民主义南方——大都被世界北方回避和忽视——这更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外围创造“黑洞”倾向的一部分。在印度尼西亚核心地区,如在印度核心地区一样,种族和宗教紧张关系仍处在一触即发状态,但它们极少会发展到失控的程度。而在受它们剥削的外围情形就不一样。

印度尼西亚的未来似乎很难确定。它结合了所有三个我在下一章指出的不断恶化的趋势。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都已经下降,而世俗主义因为日益增长的政治伊斯兰化现象而变得更加严阵以待。这不是走伊斯兰主义道路并且很可能也不会这样做,因为不存在与国外帝国主义结盟的主流世俗精英阶层。但国家实力在削弱,有些政治派别正在激进化——如我的第 5 个论点所说。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水平已经恶化到资本正在从国内逃离的地步,这从而加深了危机,同时让群岛各方复杂的种族—宗教分野激进分子胆子更壮。印尼比印度有更多的感到悲观的理由。

有无一个从暴乱到谋杀性清洗的升级逻辑?

我现在可以尝试对这两种不同的事实事件和我的早期涉及大屠杀的事件之间的对照作一个总体的解释。表 16.1 下面的两个部分标明了一般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不存在的、然而出现在最坏事件中的互动过程。基本的问题是:这些最坏事件局面是以重复性种族暴乱和集体迫害——像我们在印度发现的那样——开始的吗?它们是经过表 16.1 中的第一到第二再到第三阶段而升级,还是沿着什么其

499

他路径？以下我非常简略地对本书描述的近来最恶劣的种族清洗事件作一回顾（排除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例子）。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

1915年种族灭绝之前曾发生几次较大的对亚美尼亚人的集体迫害，而最后两次是大规模的，比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的任何一次都大。在1894—1896年，5万人被杀死，1909年2万人被杀死。它们也比早期的所有事件都大得多。它们代表了奥斯曼社会的两个新特征：一个现代化的有机的政治计划加上一个更具威胁性的地缘政治形势。这类早期的集体迫害不是由土耳其种族民族主义者，而是由他们的对手犯下的。我们还可以将土耳其人对基督徒的仇恨追溯到从19世纪20年代到1913年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大规模种族清洗。在此土耳其穆斯林是主要受害人。然而亚美尼亚人根本没有参与其中。早前在俄国人、突厥部落和亚美尼亚人之间曾发生一些三向的种族冲突，但这是发生在俄罗斯帝国，不是奥斯曼帝国。虽然1894—1896年和1909年的集体迫害明显地大大恶化了土耳其—亚美尼亚关系，并增加了发生某些更糟得多的事情的可能，但它们被镇压了。在1905年到1915年间还发生了其他某些事情，使得种族紧张关系直接集中于主权问题之上，而在此前的暴行中主权问题不在争议之列。我们看到这是战争、失去领土以及赫然出现的亚美尼亚—俄国串通以摧毁奥斯曼帝国的可能等一连串事件。这些新的和主要是外部和地缘政治的危机以表16.1下方表示的方式让奥斯曼帝国失去了稳定并走向了激进化。压力来自该图表的右栏。

纳粹最后解决方案

数百年来在欧洲曾有过很多次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但在最后解决方案之前的一个多世纪的德国没有出现过重大的集体迫害。德国人的反犹主义传统曾大约处在欧洲平均水平之上。在前一个世纪，德国犹太人处在同化过程中，大都是自愿的。奥地利经历了更多的政治反犹主义，但是主要的集体迫害区域还在更远的东面：俄国和

波兰,而它们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变得更严重了。然而德国人开启了最后解决方案。又一次,各种过程干预使得德国—斯拉夫—犹太人关系政治化,并且使德国失去了稳定且走向激进化。又一次,一场世界战争将一种种族清洗政策改变成了种族灭绝。这远比亚美尼亚事件包含的连续性更少,但是又一次,大部分新的压力来自外部。

卢旺达种族灭绝

在 1962 年到 1979 年间爆发过数次集体迫害和谋杀性清洗。但是随后出现一个间歇,一直到 1990 年卢旺达爱国阵线入侵,此后一系列谋杀性事件与 1994 年的种族灭绝有紧密关联。一些人看到了一个一直发展到最后升级阶段的基本的连贯性。尽管这样,如果没有先是由图西人入侵以及随后的四年内战(它是针对主权地位的一次直接武装斗争),然后是阿鲁沙协议(它特别破坏了胡图政治的稳定),最后是由惊天事件即两位总统遭炸弹暗杀等带来的对政治稳定局面的破坏,种族灭绝发生的可能性将要小很多。从表 16.1 下部的“周边国家”一栏开始,很多方面不得不干预,然后集体迫害才成为种族灭绝。

南斯拉夫

20 世纪 90 年代的种族战争爆发之前有过 1941—1945 年间的战时谋杀性清洗,主要是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清洗,而报复在 1945 年到来。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一股外来力量,一次德国入侵所触发的,而在这之前 20 世纪还没有发生过太多次集体迫害行为。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科索沃发生过次数不少的对立种族之间的暴乱/集体迫害,但是这些没有在“二战”后的其他地方发生过。90 年代的谋杀性清洗不是在科索沃开始的。它是相当突然地开始于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那里之前没有发生过暴乱或集体迫害。又一次,为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加上失去稳定的激进化国家中争夺主权地位的斗争这一条件。

所有这些案例都牵涉过去的种族紧张关系和冲突——如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一样。然而谋杀性清洗似乎还需要除了那些表现在单单社区之间种族和宗教冲突中的原因之外的其他原因。那些原因被列在我的累进性种族论点之中。因此在表 16.1 的种族暴力阶段和升级阶段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断裂。升级不是双种族社会内生的。相反,它源于破坏国家稳定、阻止国家对公共冲突采取决定性镇压措施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危机——只剩那些因危机走向激进化,从而寻求谋杀性清洗以便得到有机性的主权地位的人去镇压冲突。主权是争议中的问题,而政治和地缘政治不稳定是让事情变得真正凶险的步骤。若没有这两者的结合,则暴乱循环会接着开始,但不是真正谋杀性的清洗。这至少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安慰。升级行为不是种族对抗和紧张关系中的普遍存在。升级需要双方变成对立的民族—国家,既从国内意义上,也从地缘政治意义上。因为谋杀性种族清洗是我们原想要的民主化民族—国家的阴暗面。

501

与当今世界种族清洗作斗争

八大论点的重新考虑

1. 谋杀性清洗是现代的。在早期,当征服者强占土地却并不需要土著劳动力,而一神教救世宗教后来试图强迫改宗时,清洗也时有发生。但是,当现代人试图在双种族环境下建立人民统治制度之后,谋杀性种族清洗的频率大大加快了。“人民”逐渐开始有了双重含义——作为民主(democracy)中的民众(demos)和作为种族集团(ethnos)或族群(ethnic group)。当种族民族主义组织声称他们自己的种族集团是主权国家之时——他们一开始打算将其构筑成一个民主政体,然而随后他们就试图排除和清洗其他人——现代种族清洗就成了民主的阴暗面。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的阴暗面。人民被等同于无产者,而在革命之后对阶级和其他敌人的清洗就开始了。

502

然而谋杀性清洗与民主的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相关关系。从定义上看,施害政权不可能是民主政体。有些是种族统治,只在种族内部是民主的,像殖民者政权一样。有些在民主化尝试过程中开始滑向谋杀性清洗,然后就成了威权主义政党国家,就如在南斯拉夫、卢旺达和布尔什维克俄国一样。青年土耳其党以民主理想开始,却也同时在滑向威权主义和种族清洗。有些是作为威权主义政党国家开始下滑,其民主过程已经在之前就被颠覆了,如纳

粹德国以及柬埔寨的例子。除了大多数纳粹以及少数个人,比如米洛舍维奇,我案例中的施害人从民主主义者,变为倡导更可疑的“社会有机论的”民主概念的人,然后再变为按照显然与任何民主概念都不相协调的方式行动的人。对民主制度的歪曲最具体地表现在成千上万的生活轨迹之中。那不是民主本身,而是它被曲解的阴暗面。

503

2. 成功了的这些组织战胜了阶级差异,把阶级剥削感情转移到了族群剥削上。谋杀性清洗不单单是产生于差异。肯定也存在着等级制度:某个群体的似乎可信的剥削故事和对民主的捍卫,以及另一个群体对文明或生存权利的捍卫——帝国主义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在红色高棉中表现得也很明显,尽管大多数共产党作了相反的联系,把国家一种族关系的侧重点放在了阶级之上,但是单单市场或职业性经济差异似乎还不够。正是在垄断兴起的地区,要么通过相互对立的对土地所有权的权利声明,要么通过国家主义的垄断,种族经济冲突现象才变得最为严重。

3. 在两个古老的(从不是新建的)族群对同一片领土宣告政治主权的地区,情况更加危险,两个族群都拥有某些合法性和似乎可靠的得到实现的机会。甚至在波斯尼亚和旁遮普,三个对立的群体自己形成了两极冲突态势。这个论点不适用于最恶劣的案例之一——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尽管如此,希特勒本人相信这一点,他妄想着对由犹太—布尔什维克敌人构成的威胁,将犹太人与斯拉夫敌人勾结在一起的这些敌人正在与德国人,特别是那些有可能成为种族灭绝受害人的德国人,争夺主权地位。但是,大浩劫具有太多特性,不能轻易地纳入一个一般模式。若将本例作为模式,所有对谋杀性种族清洗的一般解释都会有所折损。

4. 实际的大屠杀需要两个进一步出现的局面当中的一个。(a) 力量较弱小的竞争对手被鼓励进行战斗而不屈服(屈服不会产生大屠杀),相信会得到来自国外同族或盟友的援助。(b) 更强大的群体害怕权力长期趋于下降之中,但是能够运用目前的优势创建它自己的受过清洗的国家,而不会给它自己带来很大的物质或道德风险。

局面(a)产生大屠杀,因为一场种族内战之后开始升级;(b)产生种族灭绝性质的先发制人的进攻。然而殖民者案例与此是有区别的,因为殖民者往往只在弱得多的本土人口作为强烈的刺激物、而不是重大威胁出现时才会采取谋杀性清洗措施。

5. 这些局面出现的条件是国家已经失去了它正常的将协调与镇压相结合的功能。它变得派系林立,有些派系变得激进化并获得胜利,这一般几乎总是外部地缘政治压力的结果,通常包括战争。尽管激进化过程以(种族)人民的名义进行,但国家就此时而言还不是民主制。然而我们见到了不同的派系主义:有流动国家的殖民主义边疆;在整个南斯拉夫共和国以不同方式表现出分歧的国家;仅在不同机构通过种族灭绝热情争取元首恩宠的有限意义上派系化的纳粹政府。政治分裂经常由帝国的解体或一场复杂的战争引起。然而两者都未出现在殖民主义或共产主义例子中,而在纳粹的案例中,帝国解体不是一个因素,而大规模清洗和部分大屠杀(对精神病人)在战争之前就开始了。

6. 谋杀性清洗极少是一开始由施害人打算好的。他们觉得自己是被迫进入了由于早期计划 A 和计划 B 受挫之后的实际计划 C, A 计划或 B 计划可能包括镇压但不包括大屠杀。在局面 4a 中计划的转变经常是不可预测和偶然的。它能够轻易地走向其他方向,实际上,实用的政治阴谋却通常阻止了进一步的升级。4b 中的升级计划似乎是初始打算的更具逻辑性的发展结果——最明显的是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升级,继而是米洛舍维奇针对他的敌人的升级。虽然在一开始甚至连希特勒很可能也没有打算进行种族灭绝,但是可以预料到的是(若我们对他以及纳粹组织有了详尽了解),当他的“温和的”计划遭遇失败之后,种族灭绝就是必然结果。殖民主义清洗行为一般更符合 4a,但是其独特性在于整个过程包括了一系列轮番展开的清洗,每一次的施害人都随着边疆的扩大而不同。

7. 施害人既不是行动一致的国家精英,也不是整个民族。升级现象发生在领导人、激进分子和群众的互动过程之中,而大多数人无动于衷或恐惧地站在一旁,核心施害人则大量地选自赞成暴力种族

民族主义的核心选民。这经常包括把胜利送给激进派的选举——尽管没有一次选举是通过公开煽动大屠杀来赢取的。领导人总是最重要的代表。更好或更加温和的领导层能够阻止我讨论过的所有谋杀性结果。但是领导人并非是一个人在行动,同时民主制度也不是能阻止升级现象发生的工具或手段——如果群众和种族(或无产者)被混淆的话。但是随着升级的展开,暴力取代了讲坛,每个种族被迫在其激进派领导人和激进分子的保护下躲在自己的挡墙之后。此时,他们还在意识形态上全副武装起来,相信他们事业的正义性,将其界定为自卫。自卫,在法律和道义上当然都是正当的。然而骇人的是,他们成了道义上的凶杀犯。

8. 整个施害人群体受到许多动机的驱使,而在参与更世俗的社会组织的普通人中,这些动机十分常见。普通人被通常的社会过程带到种族挡墙的背后,之后被带着去施行谋杀性种族清洗。现在,领导人能够轻易地就此授权。就如领导人在战时安排对平民进行轰炸一样,死亡是一种他们没有必要直接面对的抽象概念。他们只是办公桌杀人者。他们信奉他们的事业,所以目的成了为手段辩护的理由。各个层面上的激进派借助他们的正义感去杀人。但是甚至你我都有可能干这件事,就因为职业、同伴友谊,还有爱国主义、日常工作以及其他世俗的人类动机。我们是人,有为恶的能力。

我的论点范围很广,从总体的背景条件到地方过程都有涉及。它们还包含总体的比较性归纳结论和每个案例的独特性之间的张力。有两个不同的亚群体,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案例。精确的预测是不可能的,而随着对案例的统计分析的进展,能控制所有相关因素的必要数据将会很快变得匮乏。社会科学有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处理极少有个别案例的宏观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发生互动的时候。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案例中的角色从其他国家的先驱那里吸取了教训,而有些纳粹分子知道有赫雷罗人或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希特勒和希姆莱从对印第安人的根除中吸取了教训。这是一系列过程,而不是单独的事件,过程能以无数的方式展开。

因此,我从以下事实中仅得到有限的安慰,即我的论点的总趋向

得到由政治学家已搜集到的关于今日全世界范围的种族战争和内战的统计数据的广泛支持。我的论点是种族清洗随民主化进程扩散。格尔(1993,2000)表明种族叛乱自 20 世纪 60 年代或 70 年代以来就已在南方世界出现——正是它名义上的民主化开始时期。而种族判乱在北方——以制度化的民主国家和阶级政治为主导——仍然处于低潮。50 年代,它们在共产主义国家——威权主义,且以阶级政治为主导——大为衰落。它们在中东和北非起起伏伏,1960 年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主化国家当中陡然上升,1965 年后在亚洲兴起,1975 年后出现在南美和中美。1975 年后所有南方的地区性趋势都在上升,一直到大约 1995 年。这条曲线随着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向上升。1995 年后这种趋势可能有所减缓,除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尽管总体的趋势还没有回到 1991 年前的水平(格尔,1994;2000: 图表 2.2 - 2.9;索伦伯格与沃伦斯坦,2001)。这对论点 1 和论点 2 构成某些支持,尽管显然这些地区的一些波动也有其他原因。一旦民主制在不涉及种族的情况下牢固地被制度化,我认为趋势就会下降。

外来干预也有可能迫使趋势下降。我的两个论点与外来的因而更具偶然性的压力有关。对弱势一方的外部援助和导致战争的国际压力都是我的案例中使事态恶化的地缘政治因素。但是这未必一定发生。在卢旺达和南斯拉夫,国际社会本可以出面干预、尝试制止谋杀性清洗,然而它们没有这样做(除了在南斯拉夫一切都快结束的时候)。这与柬埔寨的情形形成对照,在此越南军队推翻了施害政权,终止了杀戮行为。鉴于战时情形,很难想象外部干预可以如何阻止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但是面对不那么强大和受到保护的施害人,国际社会本可以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本章我将探讨这种可能性。

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为论点 7 提供证据。虽然所有社会组织都有核心支持拥护者,而这被假定同样也适用于极端种族民族主义者,但是关于施害人社会背景的数据较少。我们对精英了解最多,然后是激进分子,最少的是关于基层或普通士兵施害人。难民在施害人

506

中占比过高有详细的记录；来自受威胁边境地区的人也一样。在占主导地位的族群中，国家主义者——那些已经在国家中社会化或经济上依赖国家的人——通常占比过高。一旦暴力被视为应对种族冲突的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暴力专家，像警察、前士兵，以及（在更加易改变的例子中）运动员、罪犯和青少年团伙似乎也大量地凸显出来。种族民族主义者还从处在社会中主要阶级冲突领域（这些领域更多被卷入阶级而非种族冲突）之外的经济部门中产生。法西斯主义者当然是来自这样的背景（见曼，2004）。清洗者似乎来自当时从科学和技术上支持种族主义的职业亚文化群，如从事生物学和医学的。但是确定的证据有时仅来自证据最全的纳粹案例。

对包含在施害人世界观中的三种意识形态构成，即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和赞同暴力，作出区分也不容易。例如，秘密警察几乎总是表现突出，但是这是因为他们是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还是从职业上习惯于暴力？运动员是倾向于民族主义，倾向于听从年长、更有经验的权威和团队领导人，还是仅看中用体力来解决社会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但是数据非常难以找到。当施害人开口时，他们通常说谎——因为他们的生命现在通常处在危险当中。

性别与年龄构成独特的问题。谋杀性种族清洗在很显然的意义上是有性别特征的：几乎所有施害人都是男的——所有人当中最清晰的核心拥护群。但是男人也是受害人当中的绝对大多数。年轻男人在杀人者当中占大多数，而战斗年龄的男人在受害人中占大多数。谋杀性种族清洗首先与年轻男人和中年初期的男人之间的关系交往有关。但这是由于他们对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更加地投入吗？这些不成比例的现象可能只不过反映了男人在大多数公共行为当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年轻男子在军事组织中的主导地位。种族民族主义是否特别能吸引男人或年轻男子——如一些女权主义作家认为的——还没有得到证明。在南斯拉夫的例子中，我怀疑用从性别出发的父权统治而不是用更加明显的原因来解释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暴力行为的有效性，比如在受威胁边境区塞族男人对枪支的持有和

一个具体的由塞族人先发制人的激励因素——他们之后就有多得多的武器。在南斯拉夫例子中,很多的注意力被放在强奸行为上,原因是我们第一次拥有大量的证据。强奸也许是武装男子在通常的道德禁忌被打破的环境下——战争和内战——一种长期存在的行为。它可能不是特别受到民族主义的鼓励。这样的不确定因素只能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决。

种族清洗在北方的下降

欧洲正在接近我所描绘的有数百年之久的、朝着经过种族清洗和民主化制度的民族—国家方向迈进的旅程的末尾阶段。南斯拉夫战争几乎结束了,马其顿依然是那里的大面积双种族的国家,它的种族民族主义者受到了就在其边境对面的恐怖事件以及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压力的削弱。虽然欧洲和美国有过令人恐怖的种族清洗的历史,但它们现在颇具讽刺意味地拥护多元文化主义,至少在理论上。它们不支持种族民族主义,而在它们有影响力的地方,这现在成了一个强大的制约因素。北方能够影响南方的结局。

在整个大欧洲版图上只有少数国家还保持着多种族的例外情形。首先,四个更古老的西欧国家依然是多种族的——英国、比利时、瑞士和西班牙。它们的多族性是在前民族国家时期获得的,当时族性之重要性要远低于阶级。它们的族群为琐事争吵,但它们不杀戮——不过以少量并越来越少的数量出现在北欧以及巴斯克地区。所有其他欧盟国家现在至少有 80% 是单一种族,几乎所有东欧国家也一样。欧盟境内的向外移民过去 40 年来在下降,因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越来越多地(选择)呆在国内。欧盟为单一种族之间提供了联邦层面的协调作用,但它不是一个国家。

从其边界外面进入欧盟的移民占了大多数国家人口的约 10% 左右,这个百分比将随着老龄化造成更多的劳动力短缺而上升。来自东欧的移民将随着他们的国家被纳入欧盟而进一步增长。然而这样的移民没有声称这里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事实上,他们几乎未

提出什么政治要求,因而不能让人合理地相信他们通过民族主义者与某种外部的对国家的威胁联系在一起。穆斯林移民能够被联系到基督教对伊斯兰的恐惧上,同时他们加大了教育和家庭法律领域的政治困难。但是大多数移民是因为更直接的物质理由而遭怨恨——就业、教育和住房竞争——而雇主则欢迎他们的到来。间或有一些暴乱和对极右翼团体的支持,但几乎没有谋杀性清洗的危险。在欧洲,阶级、地区和性别政治占主导地位,我的论点 2 不再起作用。当然,只要美国的“反恐战争”继续沿着它效果适得其反的路径前进,招致恐怖主义进一步的强烈反对,那么某种反穆斯林的反动或对抗在北方国家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大。然后那里的种族—宗教冲突或有可能上升到新的水平。

北方世界的第二部分包括东亚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这些是大面积地单一种族的国家和地区(也许除了台湾地区),没有一个包含重大的种族冲突。北方世界的第三部分包括前白人殖民地。在过去的数百年中这里的欧洲人发起了他们最具谋杀性的种族清洗。但是一旦北美和澳大利亚受到 95% 的清洗之后,自由开明到无可挑剔的民族—国家能够在土人的万人塚上长满鲜花。前殖民者殖民地能够炫耀多元文化主义,因为移民,像在欧洲的一样,政治上没有威胁。他们可以在地方经济中占据独特的一块,并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种族紧张周期性地出现,偶尔还升级到暴乱,尽管这些在整个 20 世纪都变得远不那么暴力和频繁。无论这些紧张关系对涉及的国家可能会有多么重要,它们与本书讨论的可怕暴行相比却微不足道。

因为移民往往来自许多国家和文化,任何群体提出集体诉求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而同时移民作为整体几乎没有集体行动的基础。他们寻求自愿地部分地被东道国同化的机会,而后者反过来又通过劳动力市场、学校教育和通向完全公民身份的法律地位等发展了加快其进程的制度。在移民寻求公民身份的地方,他们是作为个人在实现它。他们既不寻求邦联也不寻求联合的集体权利。他们希望保留他们的一些原来的文化,但是他们的最大政治策略往往涉及地方

机器政治,目的是获得地方官职和为他们的族群赢得受庇护地位。在美国,圣·帕特里克日和光辉五月五(5月5日节)是文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节日——甚至在过去属于墨西哥的领土上也是如此!他们的三种颜色被展示在星星和条形旁边。自第一批白人殖民者以来,没有移民群体曾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领土提出主权要求。尽管东道国可能看似属于一个主导族性——在这些例子中是盎格鲁人——然而这个族群成功地将像爱尔兰人和犹太人这样的新的族群吸收了进来。

按我的理论预测,这些带有非政治性特点的冲突将会相当温和。最近的拉丁人和亚洲人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没有产生实际上的骚乱。这同样适合于日本,后者在对韩国人和其他移民的看法上面保留着似乎更多的种族主义色彩。但是因为这些移民中没有一个提出政治要求,则东道国也没有作出社会有机论的民族主义的反应。本土文化保护组织的主要目的是收紧边界,不是将目前在其国土上的移民清洗出去。美国人与加拿大人似乎常为他们的多元文化主义而沾沾自喜(澳大利亚人意识到对土著的虐待和反亚洲人敌意,因而没有他们得意)。他们经常将种族纷争看成是由其他不够文明的世界产生的东西,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面对过对同样的领土声称主权的相互对立的群体。然而一个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模范的世界也许与我们可能达到的多元文化主义非常接近。它们胜过欧洲的两个主要历史传统:强制同化和谋杀性清洗。但是也许南部世界能比北方世界做得更好。

少数问题区域依然在欧洲外围。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实际上业已完成,科索沃正在接近它的事实上清洗过的解决方案(正如2004年3月进一步爆发的由阿尔巴尼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清洗所揭示的那样),而马其顿依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案例。所以俄国人现在依然是许多其他国家中的唯一的真正的少数派,而俄罗斯联邦中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依然是多种族的。少数群体遭遇到很多歧视,然而相对来说,俄罗斯人与其他人之间的暴力则几乎没有。车臣是一个严重的例外。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种族冲突例子,其间一个长久统治的少数

俄罗斯殖民者群体受到了占领的俄国政府的援助。俄罗斯人与车臣叛乱分子都认为他们对同样领土拥有一个合法的和可以实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车臣的例子十分适合我的论点。俄罗斯傲慢性镇压的凶猛近来迫使叛乱分子投入了国外伊斯兰盟友的怀抱。虽然这减少了他们在车臣人心目中的受欢迎程度,但独立的愿望很可能已太普遍而无法压制下去。在2004年年初,双方继续同样杀害敌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这依然是一个未解决的谋杀性的案例。

然而在其他地方,俄罗斯少数群体选择向外移民或者接受歧视而放弃抵抗。弱势一方不选择战斗。俄罗斯人向波罗的海国家和亚洲国家的移民是最近的事,而移民者从未声称这里是他们自己的国家,独立于俄罗斯之外。任何这样的要求或声明都不具备历史或国际合理性。在一些国家,俄罗斯人往往迁回至俄罗斯,因为他们在中亚被赶出了就业领域。有些人理论上可以选择民族统一主义,将他们的边境区域与俄罗斯连成一体,但俄罗斯无意支持他们。西面的情况(特别是波罗的海共和国)不同,因为许多俄罗斯人相信他们在这里比在俄罗斯物质上富裕。另外,地缘政治环境不支持任何一方进行谋杀性清洗。所有西面的前苏联的继承国都想进入欧盟和北约。它们还寻求经济援助,主要是向欧盟,尽管也从美国。如果它们参与种族民族主义暴力的话,它们将得不到这当中的任何一样。欧洲现在是俄罗斯自己外围的一股强大的约束力量。另外,俄罗斯有足够的它自己的问题,因而不想刺激它的邻居。北方外围地带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再支持谋杀性清洗。

族性与宗教在南方的复兴

今天,几乎所有谋杀性清洗都发生在不发达的南方世界,发生在移民不是主要问题、同化不是主要解决方案的国家。最大的威胁是民族国家的理想向南方的传播,在此这种理想将普通人与种族、群众选民与族群混在一起。种族民族主义冲突中绝大多数时候是这样,

稍微调整一下,它也适用于宗教冲突。不过,并非一切全是黑暗和厄运。

1945 年以前,殖民主义帝国阻止着民族国家理想的全球化。他们是根本上的种族主义者,根据分而治之的办法进行统治。当然,在当地的族群之中,欧洲人利用特定的族群作为他们的委托统治者,更加提高了部落保护他们自己统治地位的意识。但是在殖民主义灭亡之后,世界所有国家都获得了国歌、国旗、官方语言以及教育制度,以支持一个独立的国家身份——它们所有 191 个国家一起出席一个叫联合国的机构的会议。它们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时它们(经常是欺骗性地)声称是由人民统治。

510

去殖民化产生了发展、民主和超越种族对抗的高尚希望。意识到它们的多族性之后,大多数殖民主义解放组织小心绕开了人民的种族定义,但将其与殖民主义者作出区分除外。

南方人将他们自己的传统与三种北方的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混合在一起。自由主义把一种代表了社会多元化经济,而不是种族的、利益集团的民主制度理想化了。社会主义强调阶级,而非种族冲突,并为反殖民主义组织提供了大量物质支持。世俗主义接受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而许多解放组织将它们自己的宗教看成是落后的、传统主义的和反现代的,其目的是远离国家。一个以宗教为中心的族性意识不会主导反殖民主义斗争,除了少数穆斯林受到了一种以单独的伊斯兰哈里发理想为代表的更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的诱惑。但是我们看到甘地和尼赫鲁的印度国大党寻求一个现代世俗国家,而不是一个印度教国家,它更能代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成果。

这一趋势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世俗的盟友对法西斯主义者的胜利加强了。在两次战争期间,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影响了无数的反殖民主义组织,为那些将法西斯主义与地方宗教混在一起的组织开辟了另一条通向现代性的道路。倾向法西斯的印度教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寻求培养宗族/宗教纯洁的民族的国家。但是,1945 年之后,世俗主义或反政治的宗教感受渗透

到政党和军官团之中。社会主义现在融入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非洲、阿拉伯、印度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把殖民地上的被压迫民族看作是无产阶级人民,而殖民主义列强构成了一个剥削人的帝国主义阶级。在第三世界民族内部不存在重大的阶级分歧,他们这样说。但是虽然它是社会有机的,但它不是一个种族的人民概念。阶级在反殖民主义斗争和后殖民主义时代早期正在胜过族性。

因此,统计数据没有显示出“二战”后的头20年里种族或宗教暴力的大量增长(格尔,1993;辛格与斯莫尔,1982)。同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一样,现代国家的基本建设将包括它们全部领土中的教育、卫生和税收制度,以及在精英、然后在群众中,一个十分世俗和平民的国籍概念的形成。这一阶段的成就还是留下了,表现为若干政党、军官团,而职业阶层和商业阶层依然奉持这些理想。但是他们的三个舶来的意识形态支柱随后开始削弱。社会主义衰退,政治自由主义被掏空并装入了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而世俗主义受到了原教旨主义的攻击。

1. 社会主义的衰落降低了集体行动的阶级模式的影响。正如我们看到的,共产主义国家大多抑制种族冲突,除了发生在它们帝国边沿的,在这里它们对种族分离组织施加暴行——如在高加索。它们的解体导致20世纪90年代一场种族冲突的爆发。但是社会主义影响在大多数后殖民主义的南方地区早就开始下降了。一旦殖民主义列强离开,阶级言论就不再适合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利益或经济现实。新的上层阶级控制了国家、经济和媒体并运用他们的权力否认真相,即他们现在是统治阶级。他们得到以下事实的帮助,即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之间的不平等通常比阶级之间的不平等重要,而族群往往是按地区集中在一起。许多国家更加重视调节种族而非阶级所占的财富或利益份额。

所以,虽然后殖民主义政党是作为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以及偶尔作为保守主义),或者采取不管种族特征或支持多种族的立场开始的,但大多数政党变得与地区及/或种族有关(霍罗威茨,1985:298—332)。社会主义党将成为仅代表一个地区或族群的社会主义理想的

党。或者社会主义理想将会随着党声称代表一个族群的利益而全然破灭。通常在全国层面,以及几乎在任何地方/地区层面,选举成为种族普查,党的得票与人口的种族构成高度相关。族性开始胜过阶级(论点 2)。

冷战掩盖了这一趋势的广泛性。一些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组织受到来自苏联、中国或古巴的援助而加强,而其他的则被美国干预、破坏和镇压。两边都用左一右的术语看待冲突,而不是用种族或宗教术语。随着美国开始赢得这场战争,左翼衰落。将自己界定为社会主义的南方组织被迫加入苏联一方,而苏联人能够提供给它们的不多。南方社会主义政权抓经济发展的能力降低,同时它们也不如以前受欢迎。在某些情况下,宗教领域的相通一致能支持和促进抗拒美国和苏联帝国主义。在伊朗,美国强烈支持国王的政权抗击共产主义的威胁。但是伊朗人之后转求助伊斯兰而非社会主义,推翻了国王的政权。霍梅尼的革命是这类原教旨主义高涨的第一次重要展示,这将使它置于与美国对抗的地位。

冷战的结束引发了一场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衰退。它不是普遍性的。社会主义党和纳萨尔派游击队在印度以及毛主义者在尼泊尔依然重要。共产党对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影响帮助确保了非洲统治不会在一开始即成为种族主义的。拉美左翼暴动组织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哥伦比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组织)和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等还活动着。1960 年到 1996 年间的危地马拉对左派施行了政治灭绝,杀死了约 15 万人,并把数百万人赶出家门。这种情形也包含种族色彩,因为军事政权(美国的盟友)也在实际上的地方种族灭绝中消灭了几个玛雅土著民族。但是大多数的涉及左派作为施害人或受害人的例子已经变得有点地方化了。社会主义已更多地成为一种敌对地区的而非全球变革的意识形态。非洲或阿拉伯复兴党的社会主义今日在哪? 在政治中,族性和宗教现正在南部的许多国家中超过阶级。

2. 自由主义被掏空,装入新自由主义,削弱了自由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在南部不够成功地区的吸引力。正如我们在欧洲看到的,古

典自由主义有一种强大的政治理论。它不仅关注自由市场的优点，而且更重要的，它还关注经多党制选举和议会而形成的制度化的利益集团的冲突的优点。自由民主被证明能够通过国家公民、福利国家以及凯恩斯经济学的推出来调解阶级冲突。

自由主义在今日依然是世俗和宽容的，而且它反对大多数种族民族主义和形式帝国。然而它更带有美国色彩，把远远更多的重点放在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上面，将之作为民主的先决条件。它认可个体自由，但并不认可阶级和利益团体的冲突。以美国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以向世界传播专门以反对历史上体现阶级妥协（福利国家、受监管的劳动力市场等）的种种国家干预形式为目的的自由放任经济学为重点。新自由主义还易于让南方国家服从于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它公然地反社会主义，经常在南方被视为伪装的经济帝国主义。利率的波动，大多产生在北方经济体中，也给南方带来了严厉的冲击。在70年代，低利率鼓励了南方国家为给经济发展筹集资金而大量借贷。之后利率猛升，造成了一场南方债务危机。这两个危机的结合催生美国领衔的新自由主义干预行动，目的是解决陷入萧条的南方经济体的债务危机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北方银行团的结构调整项目意味着南方国家开支、福利项目和劳动力市场监管的大幅减少。它们的最终经济效应通常是，南方的不平等和社会冲突扩大了，将“华盛顿共识”作为帝国主义标识的谴责言论的可信度增加了（见曼，2003：第2章）。正如 Chua（2004）指出的，在不平等与族性连在一起的地方，种族仇恨就加深了。

因而，世界两极化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拓宽了北方世界的范围。南欧与日本60年代加入北方，不久东亚“小虎”（即亚洲四小龙）继而加入。它们扩大了和平区域，在此战争与种族战争似乎是一种过去的事情。但是南方的大片地方不断扩大的国际国内不平等状况被资本主义回避了。南方的贸易和投资正在衰退。经济危机削弱了贫困国家的权力和合法性，加剧了地方的不满。如果种族或其他形式的混乱在那里出现，资本将更加回避它们，这就增加了混

513

乱。和平区域与日益卷入种族冲突的动乱地带数量相当。一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越高,它的国际贸易额越少,内战的机会就更大,包括种族战争(埃斯蒂等,1998;戈德斯通等,2002;哈夫,2003)。马克思主义的受到资本主义剥削的梦魇远不如后现代主义的被资本主义排除在外的梦魇那样坏。因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同时也将部分权力从劳动转移到了资本,它进一步削弱了南方的社会主义组织,促进了种族民族主义和宗教组织的激增。

3. 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削弱了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救世宗教声称掌握一种独一无二的得到上帝启示的真理。单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但不包括佛教或印度教)称有一个真上帝。一个人不能属于两个这样的宗教。宗教深深地根植于日常家庭和社会仪式当中,带来强烈的情感和道义上的坚守。那些信奉不同信仰的人可能会不宽容他人,并试图将他们的真理强加于另一个信仰之上。在早前的世纪这经常带来强迫改宗的企图,而在它与殖民化(如在爱尔兰或立陶宛)或将帝国主义政治统治强加于其他领土上(如在西班牙)的企图同时发生时则更加严厉。宗教政治化产生了最多的问题,因此,基督教,作为最少宽容的宗教,最终通过向世俗国家转变而解决了它的问题。神道教、佛教和印度教要宽容得多,所以相互之间极少争斗。过去的犹太人或穆斯林也未试图清洗或强迫改宗。即使今天,全世界大多数宗教信徒也宽容其他宗教。同基督一样,宗教已学会了把属于凯撒的归于凯撒,将属于自己的归于自己。然而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宗教暴力日益增多。这是为什么?

我的回答取决于我的第 1 个种族论点的变异形式:当代宗教暴力主要产生于神权民主的要求的兴起——要求由“我们,宗教人民”统治的政治统治。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以一个宗教社区实行自我管理观念为中心,该宗教社区坚持《古兰经》的指示,且运用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不是国家法律。历史上,它更接近西方民法,大多数案件由个人针对其他个人提出起诉,而不是由国家提出起诉。然后在 19 世纪现代化中的奥斯曼帝国开始试图将沙里亚法编集成典(凯迪,1998:708)。今天的原教旨主义者对此问题的态度依

然模棱两可。虽然他们将他们的要求建立在《古兰经》的基础之上,但他们将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成了一个宗教版的我们—人民的统治。起初他们是将神权民主——一个由 40 年代印度次大陆最重要的伊斯兰教思想家毛拉纳·毛杜迪创造的一个词——理想化了,试图表示一个“受神指引的民主政府”这样的意思(索拉特,1979:134)。所以原教旨主义者起初像民粹主义者一样动员起来,鼓动普遍的并隐含阶级色彩的针对威权主义统治者(要么是殖民主义列强,要么是被谴责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后殖民主义世俗统治者)的情绪。类似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信奉 Dharma yuddha,一种神圣或正义的战争)和甚至斯里兰卡的佛教民族主义者也崛起了。印度原教旨主义者希望强加一种源于像印地语罗摩衍那那样的神圣文本的印度观念的宗教纯洁性。

然而,随着这些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增长,它们变得不够民主。当它们攫取权力之后,如在伊朗或阿富汗,它们变成了专制兼神权政治,体现宗教伊玛目或毛拉的统治。因此,我们认为原教旨主义者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他们对群众的吸引力就是一种民主的吸引力,旨在反对地方威权主义统治者和国外帝国主义列强。事实上,把理想与实践作对比,革命的伊斯兰类似于革命的社会主义。两个组织都创造了由人民对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统治这一理想的不同版本——而两者随后都通过拥护实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背叛了它们的理想。

这个国家被认为是表达了人民的宗教纯洁性——一个社会有机论的民族—国家的变异形式。这是奇怪的,因为宗教按其教义从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民族主义的。它们主张国家应该臣服于宗教团体,而这个团体被视为是跨国家的,而非国家的,直接伸入民族国家边界(除了在尼泊尔,它在宪法上是一个印度教国家)。然而印度教与伊斯兰神权政治民主主义者已在无意间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如 1993 年的尤尔根斯迈耶指出的)。通过要求每个国家执行沙里亚即伊斯兰教法或印度教主义,他们事实上陷入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因为巴基斯坦单单属于真正的穆斯林,它的国家应该

执行沙里亚。而因为印度教以一个庞大的国家为中心,它的社会有机论者区分了一个跨国家的印度教民族,即类似径直穿越南亚的大印度,和作为民族核心的发源地的印度本身。伊斯兰没有这样的核心国家。两路神权政治民主人士断言,宗教少数将被强制同化或作为二等公民或非公民,仅允许维持私人宗教生活。“外国种族必须放弃他们的独立存在……或可以留在国中,全然臣服印度民族,并声明,没有资格享受特权……甚至公民的权利。”激进派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民族卫队(RSS)领袖戈沃克说(戈尔德,1991:566)。

种族民族主义黑洞在哪里出现?

这三个趋势为南方地区种族—宗教冲突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当然,南方世界各式各样,变化非常大。有些国家已经接近单一种族,早前就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民族文化。韩国,其他亚洲四小龙中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除了它遥远的西部外围,就是这样。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核心领土大多也是这样。它们相对的文化同质性明显地对它们的快速经济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它们在北方世界延续种族清洗的主要传统,主要同化和从文化上压制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少数派,更严重的冲突仅发生在外围殖民地化领土。

一些其他的种族配置形式也不利于对立的种族民族主义争斗。一些国家包含一种存在于更广泛的相当世俗化的文化当中的种族肤色的等级制度。在拉美,群体经常根据欧洲的、土著或黑奴血统来分层。他们的梅斯蒂索文化产生了一种在民族和族性两方面都十分微弱的意识(森特诺,2001)。种族差异密切地与阶级联系在一起,导致了比种族政治更强大的左—右政治。此处的例外又一次是针对移民(通常是梅斯蒂索人)和土著民族之间土地的外围争夺,就如在恰帕斯州、危地马拉高地以及哥伦比亚和亚马孙古陆部分地区。在这些外围地带,严重的种族清洗确实会发生,但由于土著民族不太会将这些地带称作是自己的国家,所以种族清洗的可能性会被削弱。

但是这些国家的文化经常也是跨国家的。拉丁美洲有一个超越

国家边界的共同的梅斯蒂索和天主教遗产,而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因阿拉伯语言和/或伊斯兰教而合在一起。即使是巴基斯坦的大的种族分歧也因一种共同的穆斯林文化而有所减少。再一次,例外出现在这些国家的外围——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的地方主义要求和几个国家中的库尔德分离主义。不过,这些国家的其他地方同样免遭了很多的谋杀性种族冲突。

处在另一个极端的是包含很多族性的民族。在非洲的很多地方,政治受族性支配。但是没有有一个单独的族群能够将国家占为己有。更加成功的国家体现了多种族的妥协——在政党之间或在军官团内部达成。从长期看,有些族群或许会形成一个核心的国家性大族性,逐渐同化吸收和从文化上压制许多其他的小族群,就像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已经做的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它们之前做的。

这可能需要国家具有成熟的整合能力,但是这些通常是南方较贫困地区所缺乏的。殖民主义摧毁了它们传统的基本建设和财产所有制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后殖民主义政权不能维持的外来的西方制度。在地区性一种族冲突的过度紧张之下,这些国家面临内战,其中大多是种族形式,从而日益处于分裂解体之中。费伦和莱廷(2003)将贫困国家中内战频率的增高归于弱势或失败国家。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提出,不是哪个特殊种族或宗教配置决定内战的开始或持续时间。更有决定性的是直接有利于指向对弱国的叛乱的条件——崎岖多山的地形,政治不稳定,叛乱者可利用来资助他们自己的地方经济的油水,一个提供藏身之处的庞大人口,以及贫困本身,后者使国家缺乏足够的镇压手段。事实上存在一个逐渐增强的倾向,即认为叛乱者带来了一种新的战争形式,一心想得到赃物、背着卡拉什尼科夫枪,同时不带任何严重政治灭绝意识形态的恶棍大规模杀戮地方人口(科利尔与赫夫勒,2002;卡尔多,1999)。与卡利瓦斯(2001)一样,我对此有怀疑,因为它似乎只不过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我们,文明人”与“他们,原始人”之间冲突的又一个翻版。它把旧战争的犯罪性和新战争的意识形态都降低到最低限度。大多数非洲叛乱组织都以真正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后来却在内战僵持局

516

面情况下蜕变为犯罪性质。这些黑洞与我分析的例子的不同在于它没有胜利者。两边都蓄意谋杀清洗,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创造他们自己稳定的国家或者把敌人除掉。

具有更少族性的国家呈现出的冲突更加符合我已经分析过的情况。不过,这当中只有几个包含相互对立的对主权的要求。种族特有经济通常不包括这些。在此一个少数民族集中于某些部门和职业,引发了其他人指责他们不公平竞争和剥削的声音。正如我的第二个论点,经济不满被转移到了少数群体身上。冲突一般在少数群体聚集于低水平职业当中的地方程度较轻。移民劳动力通常会经历歧视和少数骚乱周期,但不包括谋杀性清洗。他们是稀缺的低工资劳动力的来源,所以被资本家和政府认为是有用的。海湾国家的移民工人(或那些在民主德国或法国工业郊区的人)的麻烦是严重的。但是他们与本书讨论的事件相比就相形失色了,因为他们不为自己提出主权国家要求。

给予中间人族性的待遇有时更坏——像在欧洲的犹太人那样的中间承包商和贸易群体,东非的亚洲人,以及整个东南亚的中国人。这些群体典型地被来自东道国的激进派谴责为从事经济剥削。在最坏时,这些谴责助长了集体迫害和向外驱逐,使阶级矛盾成为容易遭受攻击的对象,而政权也愿意牺牲它以便安抚普遍的不满。当然,目标最终是种族——所有在印尼的华人,不只是资本家,都容易受到攻击。在普遍的暴力的压力下,东非政府驱走了他们的亚洲人口——长期被视为白人殖民主义者的帮佣下手。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区遭受了许多包括死亡的袭击,Chua(2004)对之作了生动犀利的分析。不过,虽然如此,政权和上层阶级发现中间人的族性太有用了,不能清除,并且他们最终还插手保护他们。与 Chua 不同,我不认为这样的冲突是最具谋杀性的种族清洗例子的基础。

517

虽然双种族相互对立的对国家主权的要求更加危险,升级行为极少在权力分享已经长期存在于两个族群的地方成为现实。通常,少数派主导经济,而多数派拥有国家,如在马来西亚、斐济和圭亚那。他们的后殖民主义国家然后形成确定的权力分享制度。这些非正式

协议可能会破裂,有时是在危险的暴乱当中,但它们极少进一步向下发展。每一方的剥削意识都仅是部分的,哪一方都不会产生全部的帝国主义对峙全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通常还混居在一起,因此无法轻易地离开。具体地说,少数派无法提出区域自治,更不能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特别是如果双方都得不到一个家乡国家或邻国的支持的话。权力分享已经为双方带来了某些好处。其他替代办法似乎抽象且充满风险。

卢旺达是一个部分的例外。胡图人与图西人确实相互混住在一起,并且有一段时间少数裔图西人主导了私有经济,而大多数裔胡图人占据大的国有部门。但是这种权力分配从未被制度化。卢旺达图西人往日一直控制着两种权力资源,而且他们在邻国的布隆迪现在还是这样。流亡海外的图西人还在乌干达的援助下发动过一次实际入侵。这些因素使得胡图力量激进派逐步升级到种族灭绝。然后这又以愤怒的胡图难民和愤怒的图西人惩罚性偷袭形式——在寻求矿物财富的机会主义邻国的援助之下——溢出至刚果。这些因素把刚果从一个非洲多种族解体的局面(前面描述过)变成了大规模谋杀性清洗的局面。我想不出世界上有其他任何地方拥有与卢旺达/布隆迪非常类似的情况。

今日更加危险的最接近符合我的论点的例子大多存在于更大的帝国的边沿一带——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欧洲就是这样。前面一章讨论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边沿。在前苏联的边沿的车臣、阿布哈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和费尔干纳山谷也有例子。库尔德种族民族主义者在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的外围领土鼓噪不已。缅甸的边陲领土是危险地区,一点就着;菲律宾南部也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省都包含受到边境对面援助的少数民族分裂组织。在这样的环境下叛乱分子公开谴责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缅甸、印尼、墨西哥、危地马拉、巴西等其他地方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现在也在南方出现,而对它的抗拒可能包含了对种族民主制度的要求,类似于我们在早期的欧洲看到的情形。

大多数这类冲突也发生在世界最穷最偏僻的一些地方,所以它

们成为仅有的地方黑洞。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受到毁坏,但它们的冲突没有扩散。最坏的例子卢旺达,确实将其致命的病毒传播到整个非洲大湖区,但是世界其余地方放弃它整个区而专看其外围,认为它的珍贵金属将通过更加迂回、充斥着军阀与雇佣军的路线到达北方。土耳其、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等也被给予自由行动权。大多数地方选择了镇压,因此种族冲突和清洗加剧,国际资本家对在这些不安定地区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兴趣下降。它们的经济危机加深,地方冲突升级。

宗教战士在哪出现?

大多数原教旨主义者不是非常暴力。他们以让他们自己的社区在教义上更加纯洁为重点,试图克服地方不信教者或腐败、威权主义以及通常有点世俗的穆斯林统治者的反对。伊斯兰教徒说,这就是更广泛的圣战(jihad)——意思是“以安拉的名义斗争/奋斗”——训谕的一部分。Jihad 并不一定就预示暴力并且不应该翻译成 holy war (神圣战争,圣战),因为按基督徒理解,这个词语就是指实际的战争。原教旨主义者还以二等公民待遇威胁宗教少数派,将妇女从公共领域赶出,并对所有人强制进行文化审查。但是(在我的表 1.1 的分类中)他们仅止于歧视、文化压制以及一些治安性镇压。我们不妨进一步说,穆斯林世界的大多数世俗政权也不比这好很多。

但是有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将斗争(struggle)概念带至更远,进入或“战斗”(qital)——针对伊斯兰的敌人。他们成为宗教战士,并通常被穆斯林称为圣战者(jihadis)。一切宗教都能在它们的经文中找到一些似乎拥护战斗的词句,因为宗教清晰表达了指导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准则。伊斯兰战士引用《古兰经》中一再重复的训谕来抗拒压迫——“因为压迫甚至比杀戮更坏”(2:191),所以要“与他们斗争直到再无压迫以及一切崇敬都仅献给安拉”(2:193)。压迫使他们将穆斯林世界中的一些世俗或威权主义的保守统治者界定为不再是穆斯林,从而宣布了正常的古兰经中反对推翻一个穆斯林

统治者的训谕的无效。宗教战士以真信仰的名义加入武装斗争。印度教战士将甘地的非暴力斥为软弱,而他们为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暗杀者将激进暴力行为恢复为印度教“四大支柱”之一而拍手叫好。然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组织拥护准军国主义,一个内部的、更纯粹的精英的职业(于尔根斯梅耶,1993;凯迪,1998;印度与巴基斯坦见艾哈迈德,1991;戈尔德,1991;贾弗里洛特,1996;卡曾斯坦等,1998:226;索拉特,1979:132—135)。

当地方敌人似乎与不信教的帝国主义者缠绕在一起时,对宗教战斗口号的响应也大得多。所以穆斯林谴责全球帝国主义,印度教和佛教徒则仅谴责某个地方性的南方观念。衰退的进出口交换比价,债务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改组等加强了这种响应。在美国为其地缘政治目的扶持南方政权,以武器装备帮助它们对付它们当地的敌人和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同时,原针对南方政权的不满也转向了美国。这对穆斯林世界有特别影响。美国给予像埃及和沙特阿拉伯那样的压迫和腐败政权大量的军事支持。美国要在地区冲突中站队时,这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它对伊拉克的两次入侵和对以色列的支持给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一个明确的地方/帝国主义双重敌人的意识。

以色列是当代主要的殖民—征服者的例子。半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人一直在对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当地人进行清洗,40年代末最具谋杀性,而在过去几年对犹太人的土地强占中,该记录又再次更新。以色列人主要在他们自己的被占领土之内清洗,打造典型的殖民国家:殖民者的民主制度,给予当地人次要权利——这就是由耶夫塔克(1999)给予准确命名的种族统治(ethnocracy)——只将族群(ethnos)作为平民(demos)。少数犹太人甚至进入到自己对国家的神权政治民主制度的幻想之中,在这个国家犹太人只有在服从托拉(Torah)律法的条件下——上帝与古代以色列人之间的契约——才有资格占据以色列的家园,以致他们必须将犹太律法运用于这块土地,而不管其他信仰。虽然两边开始都是带着十分世俗的物质主义目的而发生冲突,但随着局势的恶化,他们被引向了更加原教旨主义

的观念。美国被卷入了战争中帝国主义以色列一边。毕竟,它的坦克开进了西岸,而以色列远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地得到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见曼,2003:第2章)。

亨廷顿(1996)声称广泛地以宗教为基础的冲突在今日沿着宗教文明之间的断裂层爆发,尽管他仅指出它确实沿着横穿非洲和亚洲的一个断层处发生,在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佛教,或印度教交汇。正如他所指出的,大多数宗教之间的冲突发生在穆斯林与其他信徒之间,从尼日利亚北部穿过苏丹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到克什米尔,再到菲律宾南部,到摩鹿加群岛。我在第1章指出,宗教在从多样化族群中创建一个更大的大族性集合体方面特别有效。所以苏丹的种族多样性,极化为了一个单独的最重要的区分,一面是穆斯林/阿拉伯北方,一面是显得凝聚力不足的基督教和泛灵论的南方。

但是亨廷顿忽视了以下事实,即这除了是种族之间的冲突之外,还是关于宗教的冲突。它包含每一个信仰之内的剧烈斗争。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什叶派之间的分歧尤其难以处理,正如伊拉克揭示出来的一样。但是在20世纪,伊斯兰也因上一个世纪让基督教世界分裂的同样的神圣—世俗争端而陷入了分裂状态。现在,与那时一样,争端让原教旨主义者分成两类,相信国家必须坚持宗教真理的,和赞成宗教与国家之间有某种程度分离的——世俗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和大多数少数派别。然而因为后者通常控制着军事,他们也不是很宽容。在某种意义上,两类原教旨主义在每一种信仰中都相互反对,它们一个是宗教性的,一个更加世俗,不断争论着民主的性质。两边都声称不属于由人民统治的范畴。原教旨主义者只在人民是纯洁的时候才认为是由人民统治,而世俗主义者放弃民主,提出原教旨主义者如果当选之后会丢弃民主。两边都不太愿意用选举来解决问题。在伊斯兰教世界内部,这种冲突主宰着阿尔及利亚,同时威胁着穆斯林国家中所有较为世俗的国家,从埃及、土耳其经新中亚共和国到印度尼西亚。斗争经常是充满血腥的。它偶尔具有地方种族的色彩,尽管其主要问题涉及更广泛的宗教事务。

以上断层当中,有一些也同时处在北方帝国主义和南方附属国

交汇的地方。宗教战士能够调动强大的宗教感情反对地方压迫者，但是如果敌人也被认定是一个全球性的不信教的压迫者的话，那么他们的宇宙哲学还会得到更大的反响。攻击西方的伊斯兰圣战者必须被理解为反帝国主义者——一个无论亨廷顿还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都不会让其从他们嘴中流出的词，尽管理解这种现象很关键。这是一种新的反帝国主义形式，与旧的社会主义类型有很大区别，因为宗教战士谴责物质主义。他们谴责的不是经济剥削，而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既被视为基督教又被视为敌视宗教的北方世界的政治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将物质主义视为令人憎恨的北方现代性观念中世俗主义的一部分并对立加以鄙弃。不过，不应该有人怀疑，它同时也依靠穆斯林中一种真实的经济和政治压迫意识发展壮大：恢复巴勒斯坦国土，清除美国/以色列的坦克，建立一个真正的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国家，然后圣战者对巴勒斯坦人的魅力将会减少为近乎零。若从阿拉伯土地上清除掉美国基地，同样的效果会被更加普遍地感受到。

521 这些斗争包括清洗吗？尽管将原教旨主义强加到各种信仰之中不大可能会包含大量杀戮，但它们包含有可能发生的强制改宗。伊朗和阿富汗的原教旨主义统治也包含了文化清洗，歧视以及对少数群体的强制移民。最极端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赞成强制驱逐穆斯林男人以及让穆斯林妇女改宗。而在升级的冲突中，如在克什米尔或巴勒斯坦或车臣一样，谋杀性种族清洗是由两边发起的，涉及迫使另一社区人群逃走所需要的大量杀戮和恐吓行为。更大的冷酷无情还表现在对在战争中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的平民的行为态度上——莫斯科高层建筑区的居民，以色列商业大街的购物者，世贸中心的工人，马德里的上下班旅客，成千上万的车臣人，巴勒斯坦人，阿富汗人，伊拉克人等其他在报复中被袭击的人。正如我们从头到尾在本书看到的，报复大多袭击的不是初始的施害人，而是他们的同族人或同一个地区的人。一方被谴责为恐怖主义分子，另一方就被谴责为国家恐怖主义者。他们所有的行为已将现代种族—宗教冲突移入了我的表格 1.1 中含阴影的谋杀性清洗区域。这类宗教—种族对抗确

实构成了严重的危险,而起反效果的美国、以色列、俄罗斯以及印度的报复措施又加重了危险(见曼,2003)。

我已证明这一全球性宗教—种族冲突长条地带大多可以运用我的第 1 个论点的宗教版来解释:现代国家应当在本质上代表的是我们—神圣民族,而非其他或次要信仰民族的主张。如同在我的早期案例研究中一样,宗教政治化为对立的针对同样领土的主权要求增加了大规模暴力的危险——同样使军事权力关系变成关键。

我的论点 4a 说谋杀性种族冲突通常要求弱者群体变得敢于大胆选择抵抗和战斗,而不是屈服于歧视和强制同化。壮胆通常来自外部支持者。跨国资本主义也帮助了叛乱分子。冷战的结束将许多武器生产商从超级大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而他们可以更加放开地为种族或种族—宗教战士群体提供他们喜欢用的小型武器。这种产业是最为全球化的,因为它不排斥南方的穷困地区。一位俄罗斯发明者的名字成了它家喻户晓的名称。卡拉什尼科夫简化了批量生产的手持自动步枪,AK-47。在一次会议上,在我概述了我早期的一个关于种族的观点之后,当时的中非圣公会大主教沃尔特·马克赫鲁鲁转身向我评论说:“非洲问题很简单——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他说得不无道理。遍布许多国家的武装团伙能够获得低水平的武器弹药,使准军事战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对地方人口的敲诈勒索中谋得生存。这也许是软弱、失去稳定的政府现在产生了最大的种族暴力的主要原因。2001 年 9 月 11 日这一天,显示了弱者运用这类武器的一个更惊人的例子。数十名手持匕首的恐怖分子登上民航飞机,在象征美国权力的高楼大厦中杀死了将近 3000 人。这一暴行是 20 世纪日益将平民作为敌人的战争趋势的延续。它还意味着单单靠高技术军事权力不会消除宗教战士或种族民族主义者的威胁——像我们今日在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内的地方清楚看到的一样。那什么会呢?

政策含义

我们能找到消除种族冲突的方法吗? 我的论点指出了谋杀性清

洗发生的环境和它得以展开的进程。谋杀性种族清洗源于一个总体的现代性发展倾向。而站在一边做旁观者,从道义上悲叹这种趋势或者谴责恶意精英、原始民族或者人性中的邪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接受种族清洗在真实和顽固的双种族冲突中产生的事实。我们在北方的人在对种族清洗的看法上必须表现出现实主义。我们必须放弃由这样的观念带来的那种沾沾自喜:自由宽容的民主制度的出现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只有原始或恶意民族及它们的领导人才会对此回避拖延。民主的理想,即由人民统治,通过现代性得到传播,但是这也会成为社会有机论,形成排他性,给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带来危险。对此倾向我们必须持现实主义态度,为它的出现作好准备,然后帮助阻止它的发展。我们必须按世界本来的样子,而不是按其出现在我们梦中的形象,来面对世界。

种族清洗对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现代化起了关键作用。虽然不是由我们的文明发明的,但它是通过我们而完成实现的。我们的自由民主不是简单地经由在社会和谐中赠予普遍的人权而出现的,而是通过严重的社会冲突,大多是在社会阶级之间,才出现的。种族冲突最常是通过少数群体的文化压制来解决。近来这被认为是一种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尽管从时间的视角看,它似乎还不算太坏。自由主义以及随后的社会民主通过对阶级及利益集团冲突必然性的现实承认而深化了,这类冲突然后被制度化并通过互让解决。冲突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共同的公民权利来处理。任何对种族(及阶级)冲突的解决方案都要求我们承认它的常态。我们通过对邪恶领导人的伪善谴责来回避这一点。在没有更全面的行动的配合下,单是对极端主义领导人的威胁,可能实际上只会增加他们在地方上的知名度。既然我们自己居住在受过种族清洗的国家里,我们的谴责也有点虚伪的意味。

我的种族论点详尽说明了社会有机论的民主观念在哪里出现、变危险,然后越过边缘进入谋杀性清洗。因此我们能够发现其他研究者所说的种族冲突的早期预警信号(戴维斯与格尔,1998;戈德斯通等,2002;格尔,1993,2000)。他们从来自许多国家的量化数据得

出了与我相对应的结论。他们竭力预测冲突将在哪里出现,这不无成功,尽管他们承认既有错误的肯定——预测灾难即将来临然而却没有形成;也有错误的否定——看不出有什么危险却突然形成了暴力事件。他们有时暗示他们的预测失败是数据缺乏带来的结果,这可以通过更加认真的研究得到改善。我对此表示怀疑。虽然我主要研究的是少数几起最严重的事件,我已证明事情极少按照任何人的计划发展;谋杀性极少从一开始就是打算好的,而是相反,是从不可预测的互动结果中产生的。我们可以指认接近边缘的危险地带和事件,然而对谋杀性清洗的精确预测似乎是不可能的——如同施害人的理性选择理论一样。

但是我借用我的第 1 个和第 3 个论点作一个比较一般性的预测。在一个重要的少数派组织对已经由另一个种族或宗教群体主导的国家提出集体性政治要求的地方,一旦这些要求被公开提出并有条有序,它们是不会自行消失或被镇压下去的。民族—国家理想已太牢固地确立于现代世界,以致它们是不会被简单地镇压或忽视的。许多政府,从俄罗斯到印度,到以色列,再到美国,到现在还不承认这一点。它们应该承认。国家越不发达,其要求更可能随着国家进入一个崇尚民族—国家的世界而增长。这一理想毫无疑问地会传播到目前基本未受其影响的族群之中。

但不会是所有的族群。世界上大多数族群太小,无法实现它们自己的国家。它们已经在被其他民族国家同化吸收,大多数是以相对不暴力的形式。这方面的一个标志是世界上现在在讲的语言的数量持续不断地在下降,过去 50 年来减少了一半,降到了 5000 种,并有可能进一步迅速下降。对获得集体政治权利的渴望并不是普遍的。正如我的第 3 个论点强调的是,相互对立的、看似合理又可以实现的、对政治主权的诉求带来了困难,亦即,主权的一些过去的历史以及一些近来的要求的连贯性。正如我所强调的,严重的种族冲突通常发生在古老的而非新形成的族群之间。这样诉求仅限于目前缺乏自己集体政治权利的 50 个族群。这些族群很难被制止。

因此,我预测印度尼西亚将无法同化或镇压亚齐省或西巴布亚

自治组织；印度将无法同化或镇压穆斯林克什米尔人或它的几个小的边境民族；斯里兰卡将没有能力同化或镇压泰米尔人；马其顿将不能同化或镇压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将不能同化或镇压库尔德运动；中国将会遇到同类的问题；俄罗斯将不能镇压车臣人；喀土穆政权将无力遏制南苏丹组织。以色列镇压不了巴勒斯坦人。这些政权无法从这样的事实中获得很大信心：与他们对峙的自治（或恐怖）组织可能只会动员自己种族中的少数人，而他们大部分人将宁愿安静地生活在那些政权的统治之下而不惹任何政治麻烦。沉默的大多数依然沉默；他们不去帮助异族的帝国主义政权。印度尼西亚政府为在族群外团体中武装地方扈从做了认真的努力，但是未能使他们深扎在地方人口当中。政权也不应当自我欺骗，以为它们的下一次军事攻势将最终击败自治组织。政权或许能迫使它们沉寂一阵，但它们会在民族—国家理想、军火贸易及现代世界的软肋——武器——的支持下再次出现。

524

只有部分少数派组织要求建立它们自己的国家。大多数自治理想能够在现有国家边界之内得到满足。这要求政权作出真正的、要么邦联要么联合形式的让步：少数派将获得一些地区自治政府地位或在中央获得新的确定的集体权利。联合的协议包括答应给少数派在内阁议会行政部门以及军队中的一套配额，再加上对占主导地位族群的政策否决权。在极端的形式上，一个联合政府或可是一个代表所有主要族群的各党派的“大联合政府”。大多数族群极少为这一前景所吸引，因为它们能靠自己赢得选举；而且即使大联合政府起作用，它往往会减损政治反对派的力量，后者通常被视为民主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这样的计划可能会被选举激励措施有效地淡化，凭借后者，政党如果从种族两边获得选票和选民，实际中可获得更多席位。刺激计划极少直接指向族性。相反，他们对各区进行平衡，或设计另一种不同或可转换的选票制度，这制度实际上是被特别用来支持鼓励对两边种族都有吸引力的温和派次选政党的。

邦联和联合政权形式不是万应灵丹。它们在某些地方比在其他地方更有效。有时它们实际上强化了少数种族身份甚至是不满情

绪。给予一个地区层面的少数派一种全国性少数群体权力,可能会使它压迫自己的地区少数群体——包括在中央国家是多数派的地方少数群体。在实践中,没有国家会突然将宪法全部改写成有利于邦联或有利于联合的样子。当新的宪法被添加到传统的政治实践当中,这种混合可能会产生非预期的后果(见霍罗威茨,1999,对最近宪法设计的怀疑看法)。地区自治也许不会打消而会鼓励对独立的要求——迷恋国家完整统一性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者经常强调这一点。但是单单对个人权利的充分保证是不足以抚慰自治要求的。在以上背景下,大多数人认同他们自己的种族群体,得票多者当选的自由选举制度就带来了种族的统治地位,因为这样的选举相当于在进行族群人口统计——就像在北爱尔兰一样,那里拥有真正的自由政体已有 100 年了。基于个人和群体的权利观念都是必要的(如罗思柴尔德 2002 年表明的)。

有效的宪法必须根据不同情况而改变,它们不能制定得像是石头一样。任何宪法都有没有预料到的后果,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但一旦多数和少数群体被锁定在制度化的权力分配办法之中,并已习惯于其中的种种妥协,形势就安定了。魁北克最终是否属于加拿大,或苏格兰是否属于英国,或是加泰罗尼亚是否属于西班牙要紧吗?与本书讨论的案例相比,这一冲突的影响要小得多。如果魁北克、苏格兰或加泰罗尼亚从它们的帝国主义统治者中分离出去,人民不会死去或被赶出家门。相反,他们会担心投资结果和失业,要学习什么样的语言,以及一个微小国家是否会取得参加世界杯的决赛资格。即便是目前更加令人担忧的局面,也很有希望能安定下来。最终,当库尔德人在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获得和享受某种程度的地区自治之后,他们也许会寻求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但到那时库尔德人、土耳其人、伊朗人和伊拉克人很可能并不在乎。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魁北克人、苏格兰人和加泰罗尼亚人每到选举时总犹豫不决,不能决定他们是否真的想要独立。因为对他们或对他们所谓的剥削者来说,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都不是很重要。

525

在极端情形下,现实表明,分成两个民族—国家可能是坏处最少

的直接解决办法。即使在过去的暴力制造了太多的不信任,以至于权力分享不会平静地出现的地方,这也可能是对的。科索沃,大概还有亚齐省,就是这样,但是很可能在南苏丹还不是这样,那里作为主权国家的历史太短,对立的身份较弱。当然,分裂带来了它自身的问题。现在的冲突或许就是分开的国家之间的战争,而要去保护已变成新国家的内部的少数群体的那些人又很困难。对少数群体权利的集体保障是必须的,由国际机构监督执行。在某些情况下,将仇恨转移到经由相互磋商商定人口、财产交换、边界改动等等来实现的更温和的清洗阶段,比通过武力冒进一步清洗——像在科索沃和在波斯尼亚一样——可能要更好。这不是目前联合国、北约或者美国喜欢的政策。但是它们的部队还要继续镇压要求建立独立小国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以及继续骚扰剩下的难民多久?帮助人口交换,承认那些民族——独立小国,甚至允许他们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融为一体——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当然,要保证少数人的权利),会不会更好?毕竟,我们有我们的民族—国家。但是解决方案必须根据威胁的类型和水平而定。没有通用的有效方法。

我们北方的人能帮助南方国家避免最坏的局面出现吗——毕竟,那是我们自己的过去,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地缘政治背景相当重要,无论从外部援助还是从国际冲突来看。从欧洲外围,我们已看到地缘政治因素目前在抑制种族暴力方面发挥出的强大影响作用。不幸的是,这些因素极少在其他地方得到运用。不难明白应该包括哪些因素。我们应该对军火销售施加大得多的控制,包括国家恐怖主义用来镇压的重型武器,以及军国主义、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弱者的小型武器。我们应该探索一个对地区冲突和对我们的帝国主义倾向都更加敏感的国际主义政权。我们应该帮助减少南方的不平等;我们不应该把种族冲突或者反对威权主义政权的不同政见置于地缘政治游戏之下;我们应该鼓励包括族性和阶级冲突的制度化的。这将意味着,比如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对以色列的恐惧,对被大资本和与之相伴的外来移民压榨的土著民族等等有更多的敏感。当然,希望很渺茫。帝国主义者、

国际资本家、军火走私贩、宗教战士以及种族民族主义者不属于主要受高尚的情感驱动的人。目前在国际议程表上这方面还未见端倪。

一个问题是美国。在近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表现和“二战”刚一结束以后的美国在欧洲和日本的政策之间形成了可叹的对照。那时的美国政府试图鼓励欧洲与日本包括中右和中左两边的人建立协调的劳动关系和议会联盟, 孤立切实可行的阶级妥协制度之外的极端主义者, 从而先发制人地挫败他们的计划(梅尔, 1981)。现在, 相反, 国际机构试图把资本从监管的不散阴魂中解放出来, 经济被施以市场自由的“休克疗法”, 几乎不管失业、工资水平、工人保护以及政治反映等方面的后果。在不平等带有种族色彩的地方, 它们鼓励了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族群之间的种族冲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借贷机构应该考察一种新的条件, 在贷款条件中添加上要求采取有利于阶级与地区更加平等的措施, 以及有利于个人与集体权利两方面的保护。另外, 美国的“反恐战争”处于极端的失衡状态。它只将目标瞄准恐怖分子而非国家恐怖主义者(除了少数在其他方面反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新的无赖国家)。这意味着美国现在是站在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一边出面反对它们国家的种族—宗教叛乱分子。从巴勒斯坦到格鲁吉亚, 到车臣, 到克什米尔, 到菲律宾南部, 到哥伦比亚, 美国的政策倾向于国家恐怖主义者。它甚至对它们中的大多数提供了用于镇压的军事援助。

今日的美国政策或被视为是具有远见的, 因为它直接以我的论点 4a 为目标。美国试图通过国外支持者以及通过援助国家恐怖主义者来终结对恐怖分子(即叛乱分子)的越境援助。因此, 它试图削弱弱势一方的反抗意志。它能够成功吗——迫使叛乱分子在谈判桌上屈服或接受一些蝇头小利? 在少数情况下它是有可能成功的, 如果一个叛乱组织在某个持不同政见的人群中根基不牢。菲律宾南部的阿布萨耶夫组织现在似乎在地方穆斯林少数群体中得不到支持。或许美国政府能帮助菲律宾政府将其镇压下去。但是在对由人民进行统治的要求已有了牢固根基的地方, 它是否还能获得更加一般的效果则是令人怀疑的。种族民族主义现在在世界上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强盛。现在它被普遍认为是人民(两种意义上)自行统治的合法手段。自我决定权自伍德罗·威尔逊总统 1917 年对其作阐述以来已经变得全球化了。甚至在菲律宾,到目前为止新政也未能削弱根基更为深厚的穆斯林叛乱组织——摩洛哥解放阵线;事实上,菲律宾政府已经被迫采取了一种联合战略。我已在别的地方证明美国的偏见实际上增加了恐怖分子的流动——而且增加了它们袭击美国的倾向性(曼,2003)。支持用国家恐怖主义打击恐怖主义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目前伊拉克和阿富汗灾难性的现状也证实了这类政策的失败。

种族的及其他引起的内战当前正变得规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难以解决。更多的和平协议是失败多于成功。斯特德曼等(2002)观察到三个阻止它们成功的障碍——地方分肥者(不想让协议生效的权力角色),同样扮演分肥角色的周边国家以及使得交战者得以维持战争进行的地方重要商品。斯特德曼和他的合著者提出国际社会应当提供经济和军事资源来抵消以上三个障碍的力量。士兵们必须在寻找民间就业机会方面得到帮助,经济必须得到推动,邻里必须得到安抚,等等。但是他们同时也注意到国际社会距离投入这类资源还有非常长的一段距离。1994 年的卢旺达向我们表明,我们距离有效干预哪怕是并不强大的种族灭绝施害人是多么远。达莱里将军,联合国驻卢旺达小型地面监督部队的司令,发电报给他在纽约的上级说,迅速派遣 5000 人的联合国军队将能阻止一场他发现的确凿无误将要展开的种族灭绝。随后美国的一个军事咨询委员会同意了他的推断。联合国什么也没干,主要是因为安理会中的大国,特别是美国、法国和英国,阻止了所有形式的干预。他们不想把钱浪费在一个默默无闻的非洲国家或拿士兵的生命冒险,特别是如果由外国人指挥行动的话(梅尔文,2000)。相反,若是为了保护石油或我们的盟友,我们会干预,而现在我们在对欧洲外围施压。联合国对愿意被监管的敌对者之间的边境的监管是有效的,但它不能监管那些不想被监管的。美国在选择何时与多边机构商讨以及何时轰炸或入侵方面追求它自身的利益。我们距离一个能够执行全球准则的国际政权还

有很长一段距离。

种族战争之后也有对已经犯下的罪行的司法干预、起诉。两个事实上的联合国战争罪法庭已经在运转。它们相对于以前任何的战争罪法庭都是一种超前,因为它们并非简单地代表胜利者的正义定义——像纽伦堡审讯那样。两个法庭都行动缓慢,而卢旺达法庭令人痛苦地缺乏资料来源。南斯拉夫的法庭,尽管不是卢旺达的法庭,起诉了所有施害方的所有过错者。一个计划中的柬埔寨法庭在旷日持久的磋商之后搁浅了。有些国家改变了它们的法律以允许对在其他地方犯下罪行的侨民进行起诉。这使得 2001 年 6 月在比利时对四名卢旺达人的审讯和指控成为可能。2000 年和 2001 年对奥古斯丁·皮诺切特的追捕未能将其绳之以法,但是进一步推动了在未来抓捕施害人行动方面的国际合作。事实上,一个永久的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得到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同意,原则上准备举行审讯了。

528

这些法庭能够要求对过去的行为给予补偿,作出的判决制定了无人能越过的国际准则。这些是有用的作用。然而我的案例研究表明存在两种限制。第一,法庭预设了一种精英犯罪理论。除非被给予丰富的资料来源,否则他们只能处理少数过错者。然而我的案例涉及了数千名的过错者。法庭被迫采取精选,但是选择是建立在谁轻易地落入他们之手,以及谁的行为太公开以至于造成很多见证人。选择性在施害人群体中制造出这样的情感,即起诉是不公平的,这使得调解更加困难。国际审讯发出信号和惩罚了少数人,但他们无法更普遍地执行正义。国家法庭能够对许多过错者迅速而不费太大成本地采取行动,但是它们的正义可能看上去像是总结、走过场,而审讯是由胜利者对被战胜一方进行的,不利于调解。卢旺达的盖卡卡(gacaca)集体审讯就引起了不安,虽然它不是袋鼠法庭*。真相与调解委员会,如南非的那样,更善于调解,但是极少有人认为大屠杀凶手应当被宽恕,即使他们看似感到悔恨了。

* 私设公堂或非正规法庭。

我的案例研究表明审讯不大可能会把激进分子吓得不敢去参与暴行。起诉的威胁对于像希特勒或波尔布特那样的受意识形态驱使的领导人似乎并不真实,而那些更多地受偶然性驱使的人,像米洛舍维奇或青年土耳其党,觉得他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因而已经开始了筹码巨大的赌博。如果他们输了,他们难逃一死;如果他们赢了,比起被当作民族救星拥戴,将来遭起诉的风险何值一提。普通士兵心中又增加了一般罪犯的推理:他们总要先抓住我;如果我戴上面具,或者杀掉所有目击者,我就没事。现在强奸可能更容易受到起诉,因为大多数受害人依然活着,保留着对她们的侵犯人的清晰记忆。但是阿鲁沙和卢旺达法庭一个也没吓住。胡图族施害人骨干逃越刚果边境,自此一直在那边横冲直撞,蓄意行凶。刚果敌对派别在法庭开庭后的十年里已造成了300万到450万的平民死亡。

两个目标经常涉及冲突。正义应当不去管政治;协调就是政治。真正的正义应当包括对成千上万的谋杀者和强奸犯处以长期坐牢的判决,以及大批的财产归还和经济补偿。撇去它的非实用性,这似乎也不是协调的方法。补偿在南非还没有出现,尽管有真相与协调委员会宪章存在,但在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过后它们并无实效。在南斯拉夫,10万人占据了彼此的房屋,而所有种族的社区都已大幅度陷入贫困。在这种背景下,补偿与归还甚至都可能不是值得向往的,因为更多的死亡或许会从试图强加它们的行动中产生。鉴于国家的贫困,补偿在卢旺达也不可行,大多数胡图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供补偿。因为协调所需的政治在每个案例中都各不相同,这也就意味着不存在绝对的可实现正义的标准。

美国政府也反对世界刑事法庭。他们担心美国人或会因为他们在全世界数不清的干涉行为而受到起诉。事实上,对中立的柬埔寨的轰炸或者对关塔那摩和伊拉克的囚犯的虐待似乎有可能成为被起诉的战争罪。然而如果世界依赖美国作为它的全球警长,它就必须接受这个警长不时的明火执仗的干预。因为这一法庭只有在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才会有效,因此在这一点及其他方面采取妥协是需要的。尽管现实的可获得的国际干预力量和刑事法庭未取得什么成绩,但

一经扩大和制度化,它们即能领导走向一个更全面的干预主义的政权。它们能够提供将种族冲突从边缘拖回的支持性地缘政治环境,至少也使其进入表 1.1 中规定的更温和的清洗地带。但是在此期间我们应该为更多的最坏情形做好准备。

本书似乎令人沮丧。我不仅证明种族清洗本质上是现代的,是我们自己的文明的一部分,是民主的阴暗面,而且我还暗示,它很普遍,不单单是由操纵的精英弄出来的。然而我已经论证了以下概念的错误,即谋杀性清洗是人类状况中必要的特征,或者族性一般胜过暴力基础较轻的社会组织。族性并不(像许多人主张的那样)比阶级或其他社会行动基础更加强大或更能被调动。极端主义也不是说在世界上普遍要比调和妥协更强大。种族清洗源于现代社会的一个世俗趋势;就这么回事。民主的阴暗面正在渗透现代社会。它在北方已渗透完毕,现在正在席卷南方地区。但是它用不了多久就会结束,此时民主统治将以适合于多种族、特别是双种族人口的形式被牢牢地制度化。它将幸运地在 21 世纪结束。现在,我们能够认出令种族清洗产生危险并最终越过边界进入大屠杀的环境了。从这种认知中能得到构想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目前,我们缺乏将资源投入到对南方世界的解决方案当中的意愿。南方可能会被迫重复我们北方令人悲伤的种族清洗的历史。

参考文献

- 阿伦索赫恩, A., 《与土耳其人同在巴勒斯坦》(Aaronsohn, A. 1916. *With the Turks in Palestine*. London: Constable.)
- 阿博特, W. 编, 《奥利弗·克伦威尔文集与演讲, 第二卷: 共同体》(Abbott, W. [ed.] 1939.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 Vol. II: The Commonwealth 1649—16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阿达尼尔, F., 《奥斯曼帝国的非穆斯林精英》(Adanir, F. 1998. “Nicht muslimische Eliten im Osmanischen Reich,” in W. Höpken & H. Sundhassen [eds.], *Eliten in Südosteuropa. Südosteuropa Jahrbuch*, Vol. 29. Munich: Südosteuropa-Gesellschaft).
- 《1915 年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与屠杀》(“Armenian Deportations and Massacres in 1915,” in Chirot and Seligman [ed.], *Ethnopolitical Warfare*.)
- 阿达尼尔, F., 凯泽, H., 《移民, 驱逐与国家建构》(Adanir, F., & Kaiser, H. 2000. “Migration, Deport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The Ca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R. Leboutte [ed.], *Migrations et migrants dans une perspective historique*. Brussels: Peter Lang.)
- 阿德尔曼, H., 苏尔克, A. 编, 《通向种族灭绝的道路: 从乌干达到扎伊尔的卢旺达危机》(Adelman, H., & Suhrke, A. [eds.] 1999. *The Path of a Genocide: The Rwanda Crisis from Uganda to Zaire*.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 非洲人权, 《卢旺达: 死亡, 绝望与反抗》(African Rights. 1994. *Rwanda: Death, Despair and Defiance*. London: African Rights.)
- 艾哈迈德, F., 《团结主义者与奥斯曼帝国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群体的关系》(Ahmad, F. 1982. “Unionist Relations with the Greek, Armenian and Jewish

- Communities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B. Braude & B. Lewis [ed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 Holmes & Meier.)
- 《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下的战争与社会,1909—1918》(1993. "War and Society Under the Young Turks, 1909—1918," in A. Hourani [ed.],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Taurus.)
- 艾哈迈德, M. ,《南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Ahmad, M. 1991.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South Asia: The Jamaat-i-Islami and the Tablighi Jamaat of South Asia," in Marry & Appleby [eds.], *Fundamentalisms Observed*.)
- 艾亚尔, S. ,《八月动乱》(Aiyar, S. 1995. "' August Anarchy ' : The Partition Massacres in Punjab. 1947. " *South Asia*, vol. 28.)
- 阿卡姆, T. ,《土耳其国民身份与亚美尼亚问题》(Akcam, T. 1992. *Türk Ulusal Kimligi ve Ermeni Sorunu [Turkis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Armenian Issue]*. Istanbul: Iletisim Yaynları.)
-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与土耳其人的沉默》(1997. "The Genocide of the Armenians and the Silence of the Turk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oblems of Genocide"*. Cambridge, Mass. : Zoryan Institute.)
- 阿卡特, S. ,《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起义》(Akhtar, S. 1991. "Uprising in Indian-Held Jammu and Kashmir. " *Regional Studies*, vol. 9.)
- 亚历山大, S. ,《三重神话:大主教阿洛伊齐耶·斯特皮纳奇的一生》(Alexander, S. 1987. *The Triple Myth: A Life of Archbishop Alojzije Stepina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艾伦, B. ,《强奸战争:波黑不为人知的种族灭绝》(Allen, B. 1996. *Rape Warfare: The Hidden Genocide in Bosnia-Herzegovina and Croat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艾伦, M. ,《种族灭绝职业:党卫军,奴隶劳动与集中营》(Allen, M. 2002. *The Business of Genocide: The SS, Slave Labor, and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阿尔马格, T. ,《种族断层:加利福尼亚州白人优势的历史起源》(Almaguer, T. 1994. *Racial Fault Lin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White Supremacy in California*.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阿特舒勒, M. ,《两次大战期间苏联国家背景下的乌克兰与犹太人的关系》(Altshuler, M. 1990. "Ukrainian-Jewish Relations in the Soviet Milieu in the Interwar

- Period," in Potichnyj & Aster [eds.], *Ukrainian-Jewish Relations.*)
- 安塞尔, J. ,《1940—1944 年罗马尼亚的“基督教”政权及他们对犹太人、教会、神职人员与媒体的态度》(Ancel, J. 1989. "The Romanian ' Christian ' Regimes from 1940 to 1944 and Their Attitude Toward Jews, the Church, the Clergy, the Press," in Y. Bauer et al. [eds.], *Remembering for the Future: Working Papers and Addenda*, 3 vols. Oxford: Pergamon.)
- 安塞尔, J. ,《安东内斯库和犹太人》(Ancel, J. 1993. "Antonescu and the Jews." *Yad Vashem Studies*, vol. 23.)
- 《二战期间的德国与罗马尼亚关系》(1994. "German - Romanian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R. Brahmled. , *The Tragedy of Romanian Jew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安德森, B.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安多尼安, A. ,《关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官方档案》(Andonian, A. 1920. *Documents officiels concernant les massacres arméniens*. Paris: Turabian.)
- 安德烈普洛斯, G. ,《种族灭绝:理论及历史维度》(Andreopoulos, G. 1994. *Genocid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阿拉德, Y. ,《贝乌热茨,索比堡,特雷布林卡:莱因哈德行动死亡集中营》(Arad, Y. 1987. *Belzec, Sobibor, Treblinka: The Operation Reinhard Death Camps*.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 《德国文献记载的立陶宛的“最后解决”方案》(1989. "The ' Final Solution ' in Lithuania in the Light of German Documentation," in Marrus [ed.], *The Nazi Holocaust*, 4, part 2.)
- 阿拉德, Y. 等,《特别行动队报告》(Arad, Y. , et al. 1989. *The Einsatzgruppen Reports*. New York: Holocaust Library.)
- 阿雷, M. ,《青年土耳其党中的土耳其民族主义》(Arai, M. 1992. *Turkish Nationalism in the Young Turk Era*. Leeiden: Brill.)
- 阿伦特, H.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平庸之恶的报告》(Arendt, H. 1965.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Press.)
- 亚美尼亚政治审讯录 1,《索格霍蒙案宗》(Armenian Political Trials, Proceedings

1. 1985. *The Case of Soghomon Tehlirian*. Los Angeles; Varantian Gomideh.)
- 阿姆斯特朗, J., 《乌克兰民族主义》(Armstrong, J. 1963. *Ukrainian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民族主义之前的国家》(1982. *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阿什曼, C., 韦格曼, R. 《猎兽纳粹》(Ashman, C., & Wagman, R. 1988. *The Nazi Hunters*. New York; Pharos.)
- 阿斯托里安, S.,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一种阐释》(Astourian, S. 1995.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 Interpretation*. Glendale, Calif; ARF Shant Publications.)
- 阿瓦库莫维奇, J., 《南斯拉夫的法西斯运动》(Avakumovic, I. 1971. "Yugoslavia's Fascist Movements," in P. F. Sugar [ed.], *Native Fascism in the Successor States, 1918—1945*. Santa Barbara, Calif. ; ABC-Clio.)
- 巴切塔, P., 《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妇女重塑自身形象》(Bacchetta, P. 1999. "Militant Hindu Nationalist Women Reimagine Themselves."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vol. 10.)
- 巴格基安, K., 《土耳其政府对亚美尼亚人的放逐与没收》(Baghdjian, K. 1987. *La confiscation, par le gouvernement turc, des biens arméniens... dits abandonnés*. Montreal; no publisher stated.)
- 鲍尔, P. 等, 《1999年3—6月科索沃的杀戮与难民流动》(Ball, P., et al. 2002. *Killings and Refugee Flow in Kosovo, March-June 1999*. Washington, D. C. :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 巴纳赫, J., 《海德里希精英团:元首军官团、秘密警察及党卫队保安处, 1936—1945》(Banach, J. 1998. *Heydrichs Elite: das Führerkorps der Sicherheitspolizei und des SD 1936—1945*. Paderborn; Schöningh.)
- 班基尔, D., 《日耳曼人与最后解决方案》(Bankier, D. 1996. *The German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Oxford; Blackwell.)
- 巴伯, M., 《卡特里派》(Barber, M. 2000. *The Cathars*. London; Longman.)
- 巴卡伊, R. 编, 《西班牙中世纪的基督徒与穆斯林》(Barkai, R. [ed.] 1994. *Chrétiens, musulmans et juifs dans l'Espagne médiévale*. Paris; Editions du Cerf.)
- 巴卡威, T., 拉菲, M. 编, 《民主制度, 自由主义与战争: 民主和平争论再思考》(Barkawi, T., & Laffey, M. [eds.] 2001. *Democracy, Liberalism and War: Rethink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Debates*.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 巴纳特, A. ,《民主柬埔寨:高度集权的独裁政府》(Barnett, A. 1983. "Democratic Kampuchea: A Highly Centralized Dictatorship," in Chandler & Kiernan [eds.],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 巴登, J. ,《“土耳其暴行”:美国传教士关于 191—1917 奥斯曼帝国基督教社区遭遇破坏的叙述》(Barton, J. 1998. "Turkish Atrocities": *Statements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on the Destruction of Christian Communities in Ottoman Turkey, 1915—1917*. Ann Arbor, Mich: Gomida Institute.)
- 巴托夫, O. ,《东线, 1941—1945, 德国军队与战争的野蛮化》(Bartov, O. 1985. *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5, German Troops an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London: Macmillan.)
- 《希特勒的军队:第三帝国的士兵、纳粹与战争》(1991. *Hitler's Army: Soldiers, Nazis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我们之中的谋杀行为:大屠杀, 产业戕害以及表述性谋杀》(1996. *Murder in Our Midst: The Holocaust, Industrial Killing, a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巴苏, A. , 科尔利, A. 编,《印度的社区冲突与国家》(Basu, A. , & Kohli, A. [eds.] 1998. *Community Conflicts and the State in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鲍尔, F. 编,《纳粹战犯审判》, 第 22 卷. (Bauer, F. [ed] 1968—1981. *Justiz und N-S Verbrechen, 22 Vol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鲍曼, Z. ,《现代性与大屠杀》(Baumann, Z. 1989.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巴克斯, M. ,《默主歌耶:波斯尼亚农村的宗教、政治与暴力》(Bax, M. 1995. *Medjugorje: Religion,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Rural Bosnia*. Amsterdam: VU Uitgeverij.)
- 贝布勒, A. ,《政治多元化与南斯拉夫正规军》(Bebler, A. 1993. "Political Pluralism and the Yugoslav Professional Military," in Seroka & Pavlovic [eds.], *The Tragedy of Yugoslavia*.)
- 贝克尔, E. ,《当战争结束时:柬埔寨与红色高棉革命》(Becker, E. 1998. *When the War Was Over: Cambodia and the Khmer Rouge Revolutio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贝克尔, J. ,《匈牙利的幽灵:毛的不为人知的饥荒》(Becker, J. 1996. *Hungry*

-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Free Press.)
- 贝金, B., 《撒马利亚的陷落》(Becking, B. 1992. *The Fall of Samaria*. Leiden: Brill.)
- 贝多基安, K., 《我们中有些人活了下来: 一个亚美尼亚男孩的故事》(Bedoukian, K. 1978. *Some of Us Survived: The Story of an Armenian Boy*. New York: Farrar.)
- 贝德罗西安, M. 编, 《20 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 施害人及其牺牲品》(Bedrossyan, M. [ed.] 1983. *The First Genocid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Perpetrators and their Victims*. N. p. : Voskedar Publishing.)
- 贝辛格, M., 《民族主义暴力与国家》(Beissinger, M. 1998. "Nationalist Violence and the State: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in the Former USSR."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0.)
- 《民族主义动员与苏联的解体》(2002.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贝尔-菲阿尔科夫, A., 《种族清洗》(Bell-Fialkoff, A. 1996. *Ethnic Cleansing*. New York: St. Martin's.)
- 贝伦鲍姆, M. 编, 《形形色色的受害人: 受纳粹迫害与谋杀的非犹太人》(Berenbaum, M. [ed.] *A Mosaic of Victims: Non-Jews Persecuted and Murdered by the Nazi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伯纳迪尼, G., 《种族反犹主义在法西斯意大利的起源与发展》(Bernardini, G. 1989.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Racial Anti-Semitism in Fascist Italy," in Marrus [ed.], *The Nazi Holocaust*.)
- 巴塔查吉, A., 《克什米尔: 受伤的山谷》(Bhattacharjea, A. 1994. *Kashmir: The Wounded Valley*. New Delhi: UBS Publishers Distributors.)
- 比林斯基, Y.,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与乌克兰人关系研究的方法问题与哲学问题》(Bilinsky, Y. 1990.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and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Jewish-Ukrainian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Potichnyj & Aster [eds.], *Ukrainian-Jewish Relations*.)
- 伯恩, R., 《党卫队与警察高级领袖》(Birn, R. 1986. *Die Höheren SS-und Polizeiführer*. Düsseldorf: Droste.)
- 《奥地利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及其在巴尔干半岛大屠杀中的参与》(1991. "Austrian Higher SS and Police Leaders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Holocaust

- in the Balkans."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vol. 6.)
- 《对大屠杀的修正》(1998. "Revising the Holocaust," in Finkelstein & Birn [eds.], *A Nation on Trial*.)
- 布莱克, P. , 《厄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战士》(Black, P. 1984. *Ernst Kaltenbrunner: Ideological Soldier of the Third Reich*.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布劳, T. , 《心理学视野下的大屠杀罪犯》(Blau, T. 1993.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erpetrators of the Holocaust."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vol. 7.)
- 布莱, H. , 《1894—1914 德国统治下的西南非洲》(Bley, H. 1971. *South-West Africa Under German Rule 1894—1914*. Evanston, Ill.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布洛克, R. , 《凶手》(Block, R. 1993. "Killer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18.)
- 博纳特, G. , 《第三帝国与社会变革的问题》(Boehnert, G. 1981.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volution: German Officers and the SS," in V. Berghahn [ed.], *Germany in the Age of Total War*. London: Croom Helm.)
- 博戈萨维利维奇, S. , 《对塞尔维亚、黑山和以塞尔维亚人为主要民族的前南斯拉夫部分地区的统计分析》(Bogosavljevic, S. 1995. "Statistical Picture of Serbia, Montenegro and Parts of the Former Yugoslavia with a Serbian Majority," in Janjic [ed.], *Serbia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 道格·邦德, 《及时的冲突风险评估与熊猫计划》(Bond, D. 1998. "Timely Conflict Risk Assessments and the PANDA Project," in J. Davies & T. Gurr [eds.], *Preventive Measures: Building Risk Assessment and Crisis Early Warning Systems*. 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 博蒂卡, S. 等, 《克罗地亚的大规模屠杀与种族灭绝 1991/1992: 证据录》(Botica, S. , et al. 1992. *Mass Killing and Genocide in Croatia 1991/1992: A Book of Evidence*. Zagreb: Hrvatska sveucilisna naklada.)
- 布雷克曼, P. , 《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历史》(Braeckman, P. 1994. *Rwanda: Histoire d' un génocide*. Paris: Fayard.)
- 布雷厄姆, R. , 《种族灭绝的政治背景:匈牙利的大屠杀》(两卷本). (Braham, R. 1981. *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2 vols. New York: Co-

- 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种族灭绝与报应：匈牙利北特兰西瓦尼亚的大屠杀》(1983. *Genocide and Retribution: The Holocaust in Hungarian - Ruled Northern Transylvania*. Boston: Kluwer-Nijhoff.)
- 《卡缅涅茨 - 波多利斯基和戴尔维戴克的大屠杀》(1989a. "The Kamenets Podolsk and Delvidek Massacres: Prelude to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in Marrus[ed.], *The Nazi Holocaust*.)
- 《匈牙利的大屠杀》(1989b.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Role of the Hungarian Radical Right," in Marrus[ed.], *The Nazi Holocaust*.)
- 布雷厄姆, R. , 波克, A. 编, 《匈牙利的大屠杀: 五十年后》(Braham, R. , & Pok, A. [eds.] 1997.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Fifty Years Lat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布拉斯, P. , 《偷去的偶像》(Brass, P. 1997. *Theft of an Idol*.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印巴分治和旁遮普的报复性种族灭绝, 1946—1947》(2003. "The Partition of India and Retributive Genocide in the Punjab, 1946—1947."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vol. 5.)
- 布赖特曼, R. , 《种族灭绝的设计师: 希姆莱与最后解决方案》(Breitman, R. 1991. *The Architect of Genocide: Himm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New York: Knopf.)
- 布里奇曼, J. , 《英雄的反叛》(Bridgman, J. 1981. *The Revolt of the Hereros*.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托恩·布林加, 《做波斯尼亚式的穆斯林》(Bringa, T. 1995. *Being Muslim the Bosnian Way*.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英国广播公司, 《一个国家之死》, BBC 纪录片.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998. *Death of a Nation*. BBC documentary film.)
- 布罗斯扎特, M. , 《希特勒的国家》(Broszat, M. 1981. *The Hitler State*. London: Longman.)
- 布劳德, G. , 《希特勒的执行人》(Browder, G. 1996. *Hitler's Enforc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布朗, D. , 《将我的心埋于受伤的膝下: 印第安人的美国西部历史》(Brown, D.

1970. *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 An Indian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 London: Barrie & Jenkins.)
- 布朗, P. ,《西方基督教的兴起》(Brown, P. 1996.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Oxford: Blackwell.)
- 布朗宁, C. ,《最后解决方案与德国外交部》(Browning, C. 1978. *The Final Solution and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决定性的几个月:关于最后解决方案之诞生的文集》(1985. *Fateful Months: Essays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Final Solutio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通向种族灭绝的道路:关于决定最后解决方案的文集》(1992. *The Path to Genocide: Essays on Launching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普通人:预备警卫营 101 在波兰及最后解决方案》(1993.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布鲁贝克, R. ,《法国和德国的公民权与国家地位》(Brubaker, R. 1992.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重新构造的民族主义:新欧洲的国家地位及国家问题》(1996.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布鲁贝克, R. , 莱廷, D. ,《种族和民族主义暴力》Brubaker, R. , & Laitin, D. 1998. "Ethnic and Nationalist Violence." *Ame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4.)
- 布赖斯子爵,《1915—1916 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待遇:上呈外交大臣的公文,第二版》(1919 年第一版), (Bryce, Viscount. 1972. *The Treatment of Armenians in the Ottoman Empire 1915—1916: Documents Presente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2nd ed. [first ed. 1919]. Beirut: Donuigan & Sons.)
- 布克海姆, H. 等,《对党卫军国家的剖析》(Buchheim, H. , et al. 1968. *Anatomy of the SS State*. New York: Walker.)
- 布德雷基斯, A. M. ,《1941 年之前立陶宛的国家叛乱》(Budreckis, A. M. 1968. *The Lithuanian National Revolt of 1941*. Boston: Lithuanian Encyclopedia Press.)

- 布基, E., 《奥地利的纳粹统治》(Bukey, E. 1992. "Nazi Rule in Austria," in *Austria History Yearbook*, Vol. 23.)
- 邦斯, V., 《社会主义和国家的设计与毁灭》(Bunce, V. 1999. *The Design and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伯克, P., 《早期当代欧洲的流行文化》(Burke, P. 1978.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Temple Smith.)
- 伯利, M., 《德国向东转: 第三帝国的东方研究》(Burleigh, M. 1988. *Germany Turns Eastwards: A Study of Ostforschung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死亡与拯救: “安乐死”在德国, 1900—1945》(1994. *Death and Deliverance: 'Euthanasia' in Germany, 190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第三帝国: 新历史》(2000.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 布特纳勒, J., 《悄无声息的大屠杀: 罗马尼亚及其犹太人》(Butnaru, I. 1992. *The Silent Holocaust: Romania and Its Jew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坎贝尔, B., 《冲锋队将军与纳粹主义的诞生》(Campbell, B. 1998. *The SA General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 坎贝尔, J., 《英国: 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成就》(Campbell, J. 1995. "The United Kingdom of England: The Anglo-Saxon Achievement," in A. Grant & K. Stringer [eds.], *Uniting the Kingdom? The Making of British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卡普兰, J., 《没有管理的政府: 魏玛及纳粹德国的国家与行政部门》(Caplan, J. 1988. *Government without Administration: State and Civil Service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卡内基基金会, 《国际委员会关于巴尔干战争原因及行为调查报告》(Carnegie Endowment. 1914.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s and Conduct of the Balkan Wars*. Washington, D. C. ; Carnegie Endowment. Re-issued by the Endowment in 1993 under the title *The Other Balkan War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eorge Kennan.)
- 森特诺, M., 《血与债: 拉丁美洲的战争与国家》(Centeno, M. 2001. *Blood and Debt: War and the Nation-State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

versity Press.)

米歇尔·德·塞尔托, M. 等,《语言政策、法国大革命与方言:格雷戈里调查》(de Certeau, M. , et al. 1975. *Une politique de la langu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s patois: L'enquête de Gregoire*. Paris: Gallimard.)

查拉比安, A. ,《安德拉尼克将军和亚美尼亚革命运动》(Chalabian, A. 1988. *General Andranik and the Armen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No place; no publisher.)

乔克, F. , 乔纳松, K. ,《种族灭绝的历史与社会学》(Chalk, F. , & Jonassohn, K. 1990. *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Genocide*.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尚帕涅, D. ,《社会秩序与政治变迁:切罗基人,乔克托人,奇克索人,以及克里克人的立宪政府》(Champagne, D. 1992. *Social Order and Political Chang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s under the Cherokee, the Choctaw, the Chickasaw and the Creek*.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钱德勒, D. ,《柬埔寨历史的悲剧:1945年以来的政治、战争与革命》(Chandler, D. 1991.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olitics, War and Revolution since 1945*.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一号大哥:波尔布特政治传记》(1992.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Sydney: Allen & Unwin.)

《来自吐斯廉监狱的声音:波尔布特秘密监狱的恐怖与历史》(1999. *Voices from S-21: Terror and History in Pol Pot's Secret Prison*.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钱德勒, D. , 基尔南, B 编,《柬埔寨革命及其后果:论文 8 篇》(Chandler, D. , & Kiernan, B. [eds.]. 1983.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in Kampuchea: Eight Essays*.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查尼, J. ,《种族灭绝和大规模破坏》(Charny, I. 1986. "Genocide and Mass Destruction: Doing Harm to Others as a Missing Dimension in Psychopathology." *Psychiatry*, vol. 49.)

陈元珍,《龙之村》(Chen, Y. -T. 1980. *The Dragon's Village*. New York: Pantheon.)

切斯特曼, S. 编,《战争中的平民》(Chesterman, S. [ed.] 2001. *Civilians in Wars*.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种族的挑战:卢旺达与布隆迪》(1997. *Le défi de l'ethnisme: Rwanda et Burundi: 1990—1996*. Paris: Karthala.)

- 奇罗特, D., 塞利格曼, M. 编,《种族政治战争:原因,结果,及可能的解决方案》(Chiro, D., & Seligman, M., [eds.]. 2001. *Ethnopolitical Warfar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Washington, D. C.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克雷蒂安, J. P. 等,《卢旺达:媒体报道的种族灭绝》(Chrétien, J. -P., et al. 1995. *Rwanda: Les médias du génocide*. Paris: Karthala.)
- 蔡爱眉, A.,《燃烧的世界:自由市场民主的输出如何导致了种族仇恨与全球不稳定》(Chua, A. 2004.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 温世顿·丘吉尔,《当代伟人》(Churchill, Winston. 1937. *Great Contemporaries*. New York: Putnam.)
- 沃德·丘吉尔,《无关大体的种族灭绝,1492 至今美洲大陆的大屠杀与阻碍》, (Churchill, Ward. 1997. *A Little Matter of Genocide: Holocaust and Denial in the Americas, 1492 to the Present*.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 Books.)
- 西加, N.,《波斯尼亚的种族灭绝》(Cigar, N. 1995. *Genocide in Bosnia*.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 《波斯尼亚的种族灭绝:种族清洗的政策》(1995. *Genocide in Bosnia: The Policy of Ethnic Cleansing*. College Station, Tex. : Texas A&M Press.)
- 《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的战争,1991》(“The Serbo-Croatian War, 1991,” in S. Mestrovic [ed.], *Genocide After Emotion*.)
- 克利夫顿, R.,《恣意的恶?》(Clifton, R. 1999. “‘An Indiscriminate Blackness’? Massacre, Counter-Massacre and Ethnic Cleansing in Ireland, 1640—1660,” in Levent & Roberts [eds.], *The Massacre in History*.)
- 科克尔, M.,《血液之河,金银之河》(Cocker, M. 1998. *Rivers of Blood, Rivers of Gold*. London: Jonathan Cape.)
- 科恩, L.,《被破坏的纽带:南斯拉夫的解体与转型中的巴尔干政治》(Cohen, L, 1995. *Broken Bonds: Yugoslavia's Disintegration and Balkan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ulder, Colo. : Westview.)
- 科利, L.,《英国人:1707—1837 的国家建设》(Colley, L. 1992.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科利尔, P., 赫夫勒, A.,《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贪婪与怨愤》(Collier, P., & Hoefler, A. 2002.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World Bank paper, www.

econ.worldbank.org.)

柯林斯,R.，《残酷行为的三种代表》(Collins, R. 1974. "Three Faces of Cruelty: Towards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Violenc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

康诺利,S.，《宗教,法律和权力:新教爱尔兰的形成 1660—1760》(Connolly, S. 1992. *Religion, Law and Power: The Making of Protestant Ireland 1660—17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康纳,W.，《种族民族主义:追寻相互理解》(Connor, W. 1994. *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康奎斯特,R.，《悲伤的收获:苏联集体化与恐怖饥荒》(Conquest, R. 1986.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 Famine*. London: Hutchinson.)

《大恐怖:重新评估》(1990.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科温,P.，《可疑的命令:1995夏联合国波斯尼亚回忆录》(Corwin, P. 1999. *Dubious Mandate: A Memoir of the U. N. in Bosnia, Summer 1995*.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科斯特,W.，《英国内战中的屠杀和行为准则》(Coster, W. 1999. "Massacre and Codes of Conduct in the English Civil War," in Levene & Roberts [eds.], *The Massacre in History*.)

库尔图瓦,A.，等合编，《共产主义黑名簿:罪行,恐怖,镇压》(Courtois, A., et al. [eds.].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卡兽斯.E.，《从错失机会到过度补偿》(Cousens, E. 2002. "From Missed Opportunities to Overcompensation: Implementing the Dayton Agreements on Bosnia," in Stedman et al. [eds.], *Ending Civil Wars*.)

塞诺布恩雅,M.，《南斯拉夫大戏》(Crnobrnja, M. 1994. *The Yugoslav Drama*.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克鲁克,I. 克鲁克,D.，《十里亭:一个中国村庄里的大众运动》(Crook, I., & Crook, D. 1979. *Mass Move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 London: Routledge.)

罗斯比,A.，《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态扩张,900—1900》(Crosby, A. 1986.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克罗, D., 《东欧和俄国的吉普赛人的历史》(Crowe, D. 1996. *A History of the Gypsies of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New York: St. Martin's.)
- 达巴格, M., 《刽子手留下的创伤》(1994. Dabag, M. 1994. "Le traumatisme des bourreaux: à propos du livre de Taner Akcam." *Revue du Monde Arménien*, vol. 1.)
- 达德里安, V.,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亚美尼亚人遭灭绝的纳伊姆-安东尼安文献》(1986a. Dadrian, V., 1986a. "The Naim-Andonian Documents on World War I Destruction of Ottoman Armenians: The Anatomy of a Genoci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8.)
- 《土耳其医生在“一战”亚美尼亚种族屠杀中所起的作用》(1986b. "The Role of Turkish Physicians in the World War I Genocide of Ottoman Armenians."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vol. 1.)
- 《土耳其军队在奥斯曼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中的作用》(1992. "The Role of the Turkish Military in the Destruction of Ottoman Armenians: A Study in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vol. 20.)
- 《特殊团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中的作用》(1993. "The Role of the Special Organisation in the Armenian Genocid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P. Panayi [ed.], *Minorities in Wartime*. Oxford: Berg.)
- 《德国与奥地利关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文献》(1994a. "Documentation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in German and Austrian Sources," in I. Charny [ed.], *The Widening Circle of Genocide. Genocide: A Critical Biographic Review*, vol. 3.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 《土耳其军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决定性因素:对党的忠心》(1994b. "Party Allegiance as a Determinant in the Turkish Military's Involvement in the World War I Armenian Genocide." *Revue du monde Arménien*, vol. 1.)
-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历史》(1995. *The History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Providence, R. I.: Berghahn Books.)
- 《土耳其军事法庭对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煽动者的审判》(1997a. "The Turkish Military Tribunal's Prosecution of the Authors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Four Major Court-Martial Series."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vol. 11.)
-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中国家与政党的趋同作用》(1997b. "The Convergent Roles

- of the State and a Governmental Party in the Armenian Genocide,”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达尼斯泽夫斯基, J. ,《贝拉尼卡的毁灭》(Daniszewski, J. 1999. “The Death of Belanica.” *Los Angeles Times*, Special Supplement, April 25.)
- 达斯格普塔, J. ,《社群, 真实性与自治: 印度东北部的叛乱与制度建设》(Dasgupta, J. 1998. “Community, Authenticity and Autonomy: Insurgence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India’s North-East,” in Basu & Kohli [eds.], *Community Conflicts.*)
- 戴维森, K. ,《一个来自泽图恩的亚美尼亚人的艰辛旅程》(Davidson, K. 1985. *Odyssey of an Armenian of Zeitoun.* New York: Vantage Press.)
- 戴维森, J. , 卡门, D. ,《印度尼西亚的无名战争与西加里曼丹的暴力系谱》(Davidson, J. , & Kammen, D. 2002. “Indonesia’s Unknown War and the Lineages of Violence in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vol. 73.)
- 戴维斯, J. , 格尔合编,《预防性措施: 建立风险评估和危机早期预警系统》(Davies, J. , & Gurr, T. R. [eds.] 1998. *Preventive Measures: Building Risk Assessment and Crisis Early Warning Systems.* 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 戴维斯, L. ,《屠宰场: 一个美国外交官关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报告, 1915—1917》(Davies, L. 1989. *The Slaughterhouse Province: An American Diplomat’s Report on the Armenian Genocide, 1915—1917.* New Rochelle, N. Y. : Caratzas.)
- 戴维斯, M. ,《维多利亚时代末的大屠杀: 厄尔尼诺、饥荒与第三世界的形成》(Davis, M. 2001.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Verso.)
-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新月旗下的四年》(De Nogales, R. 1926. *Four Years Beneath the Crescent.* New York: Scribner’s.)
- 迪安, M. ,《乌克兰被占领期间的德国宪兵、乌克兰志愿警察与杀害犹太人的“第二波行动”》(Dean, M. 1996. “The German Gendarmerie, the Ukrainian Schutzmannschaft and the ‘Second Wave’ of Jewish Killings in Occupied Ukraine.” *German History*, vol. 14.)
- 《大屠杀中的串谋: 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地方警察的罪行》(2000. *Collaboration in the Holocaust: Crimes of the Local Police in Belorussia and the Ukraine, 1941—1944.* New York: St. Martin’s.)
- 德巴马, K. ,《特里普拉邦的叛乱与反叛乱》(Debbarma, K. 1998. “Insurgency and

- Counter Insurgency in Tripura," in N. Malla [ed.], *Nationalism, Regionalism and Philosophy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New Delhi: Regency.)
- 德尔·博卡, A. , 《埃塞俄比亚战争 1935—1941》(Del Boca, A. 1969. *The Ethiopian War 1935—194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邓, F. , 《苏丹冲突中的身份认同因素》(Deng, F. 1990. "The Identity Factor in the Sudanese Conflict," in Montville [ed.], *Conflict and Peacemaking*.)
- 德罗基, J. , 《复仇行动》(Derogy, J. 1986. *Opération Némésis*. Paris: Fayard.)
- 德福奇, A. , 《一个知情人都不留下》(Des Forges, A. 1999. *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 迪隆, K. , 《暴力的十年, 1983—1992》(Dhillon, K. 1998. "A Decade of Violence, 1983—1992," in J. Grewal & I. Bange [eds.], *Punjab in Prosperity and Violence*. Chandigarh: K. K. Publishers.)
- 迪克斯, H. , 《获得特许的大屠杀: 对若干党卫军杀手的社会心理分析》(Dicks, H. 1972. *Licensed Mass Murder: A Socio-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me SS Killers*. London: Chatto Heinemann.)
- 杰莫尔帕夏, 《一名土耳其政治家的回忆录》(Djemal Pasha, 1922.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New York: George Doran.)
- 乔尔杰维奇, D. , 《1918—1941 南斯拉夫的法西斯主义》(Djordjevic, D. 1971. "Fascism in Yugoslavia, 1918—1941," in Sugar [ed.], *Eastern European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人档案》(两卷), (1983. *Documents on Ottoman Armenians*, 2 vols. 1983. Ankara: Prime Ministry Directorate General of Press and Information.)
- 多卢克哈诺夫, P. , 《中东的环境与族性》(Dolukhanov, P. 1994. *Environment and Eth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Aldershot: Avebury.)
- 多明格斯·奥尔蒂斯, A. , 文森特, B. , 《悲剧重演: 被放逐的摩尔人》(Dominguez Ortiz, A. , & Vincent, B. 1994. "La tragédie se répète: le bannissement des morisques," in Barkai [ed.], *Chrétiens, Musulmans et juifs*.)
- 多莫维纳网. , 《从暴徒到英雄》(Domovina Net. 1999. "From Thug to Hero." Available at <http://w.w.w.xs4all.nl/frankti/Warcrimes/caco.html>)
- 唐, Y. , 《反犹太主义歧视的经济后果: 匈牙利的反犹太主义立法, 1938—1944》(Don, Y. 1989. "The Economic Effect of Anti-Semitic Discrimination: Hungarian Anti-

- Jewish Legislation, 1938—1944,” in Marrus[ed.], *The Nazi Holocaust*.)
- 多利安, E. , 《证人的品德: 一个罗马尼亚人的日记, 1937—1944》(Dorian, E. 1982. *The Quality of Witness: A Romanian Diary 1937—1944*.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 道儿, J. , 《无情的战争: 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Dower, J. 1986.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Pantheon.)
- 多伊尔, M. , 《康德, 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事务》(Doyle, M. 1983. “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s 1 and 2. ”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 戴维斯, M. , 皮奇, A. 《布隆迪年表》(Dravis, M. , & Pitsch, A. 1995—1998. “ Burundi Chronology ” [with updates]. Available at <http://www.bsos.umd.edu/ci-dcm/mar/burundi.htm>)
- 德雷克斯勒, H. , 《让我们战斗到死: 赫雷罗人与纳马人抗击德国帝国主义的斗争》(Drechsler, H. 1980. “ *Let Us Die Fighting* ” : *The Struggle of the Herrero and the Nama Against German Imperialism*. London: Zed.)
- 杜普雷, P. , 《种族灭绝: 大规模屠杀的心理学》(Du Preez, P. 1994. *Genocide: The Psychology of Mass Murder*. London: Boyars/Bowerdean.)
- 爱德华, J. ,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Edwards, J. 1999.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Stroud, Gloucestershire: Tempus.)
- 埃尔·马拉克. D. , 《斯洛伐克自治运动, 1935—1939: 对铁石心肠的民族主义之研究》(El Mallakh. D. 1979. *The Slovak Autonomy Movement, 1935—1939: A Study in Unrelenting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伊莱亚斯, N. , 《德国人》(Elias, N. 1996. *The Germ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埃默森, D. 编, 《苏哈托不能解的印度尼西亚》(Emerson, D. [ed.] 1999. *Indonesia Beyond Suharto*. Armonk, N. Y. : M. E. Sharpe.)
- 埃雷兹, Z. , 《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与海军上将霍尔蒂的计划, 1944年8月至10月》(Erez, Z. 1989. “ The Jews of Budapest and the Plans of Admiral Horthy August-October 1944, ” in Marrus[ed.], *The Nazi Holocaust*.)
- 埃斯蒂, D. 等, 《国家失败研究: 美国外交政策规划的预警研究》(Esty, D. , et al. 1998. “ The State Failure Project: Early Warning Research for U. S. Foreign Policy Planning, ” in J. Davis & T. Gurr[eds.], *Crisis Early Warning Systems*. Boul-

- der, Colo. : Rowman & Littlefield.)
- 艾奇逊, C. ,《数字:柬埔寨反人类罪的量化》(Etcheson, C. 2000. “The Number” - Quantifying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Cambodia. 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 Available at www.mekong.net/cambodia/toll.htm.)
- 埃文斯, A. ,《克什米尔:过去的十年》(Evans, A. 1999. “Kashmir: The Past Ten Years.” *Asian Affairs*, vol. 30.)
- 叶泽尔盖利斯, A. ,《拉脱维亚的大屠杀,1941—1944:消失的中心》(Ezergailis, A. 1996. *The Holocaust in Latvia, 1941—1944: The Missing Center*.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 法乔恩, L. ,《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反犹政策,1943—1945》(Fargion, L. 1989. “The Anti-Jewish Policy of the Italian Social Republic [1943—1945],” in Mar-rus [ed.], *The Nazi Holocaust*.)
- 法里斯, N. ,《殖民统治之下的玛雅社会》(Farris, N. 1984. *Maya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费伦, J. ,《理性主义者对战争的解释》(Fearon, J. 1995.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 费伦, J. , 莱廷, D. ,《不同族群间合作的原因》(Fearon, J. , & Laitin, D. 1996. “Explaining Interethnic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 《暴力与族群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2000. “Violenc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 《族性,叛乱与内战》(2003.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 费恩, H. ,《种族灭绝何以发生》(Fein, H. 1979. *Accounting for Genocide*. New York: Free Press.)
- 范戈尔德, H. ,《大屠杀有多特殊?》(Feingold, H. 1983. “How Unique Is the Holocaust?” in A. Grobman & D. Landes [eds.], *Genocide: Critical Issues of the Holocaust*. Los Angeles: Simon Wiesenthal Center.)
- 费杰斯, J. ,《1941年的喀尔巴阡—鲁塞尼亚》(Fejes, J. 1997. “Carpatho-Ruthenia in 1941,” in Braham & A. Pók [eds.],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 费勒克, J. ,《“以共和国为代价:赫林卡的斯洛伐克人民党,1929—1938”》(Felak, J. 1994. “At the Price of the Republic.” *Hlinka's Slovak People's Party, 1929—1938*.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菲尔德豪斯, D., 《十八世纪以来的殖民帝国》(Fieldhouse, D. 1965. *The Colonial Empires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
- 芬克尔斯坦, N., 伯恩, R. 编, 《一个受审的国家: 戈德哈根论点与历史真理》(Finkelstein, N., & Birn R. [eds.]. 1998. *A Nation on Trial: The Goldhagen Thesis and Historical Truth*. New York: Owl Books.)
- 费希尔, C., 《纳粹的诞生》(Fischer, C. 1995. *The Rise of the Nazi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菲茨帕特里克, S., 《作为阶级斗争的文化革命》(Fitzpatrick, S. 1978. "Cultural Revolution as Class War," in Fitzpatrick [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斯大林的农民》(1994. *Stalin's Peasa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弗雷姆, G., 《公元前 689—627 的巴比伦王国: 政治史》(Frame, G. 1992. *Babylonia 689—627 B. C. : A Political History*. Istanbul: Nederlands Historisch-Archaeologisch Instituut.)
- 弗雷德里克森, G., 《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比较视域下的美国与南非》(Fredrickson, G. 1988. "Colonialism and Rac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f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his *The Arrogance of Race*.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弗里曼, M., 《种族灭绝, 文明与现代性》(Freeman, M. 1995. "Genocide, Civilization and Modern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6.)
- 弗里德格特, T., 《沙皇俄国的劳工暴力与残酷统治》(Friedgut, T. 1987. "Labor Violence and Regime Brutality in Tsarist Russia: The Ivzovka Cholera Riots of 1892." *Slavic Review*, vol. 46.)
- 弗里德兰德, H., 《纳粹种族灭绝行动的起源: 从安乐死到最后解决方案》(Friedländer, H. 1995. *The Origins of Nazi Genocide: From Euthanasia to the Final Solu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弗里德兰德, S., 《纳粹德国与犹太人, 第一卷: 迫害的岁月, 1933—1939》(Friedländer, S. 1997.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Vol. I: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1933—1939*.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弗里德曼, E. 等, 《中国的村庄, 社会主义国家》(Friedman, E., et al. 1991.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弗里德曼, J., 《基督教的新兴替代形式》(Friedman, J. 1994. "New Christian Reli-

- gious Alternatives," in Waddington & Williamson [eds.],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 加尼翁, V. ,《塞尔维亚的族裔民族主义与国际冲突》(Gagnon, V. 1997. "Ethn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Case of Serbia," in M. Brown et al.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 加拉格尔, W. ,《西拿基立进入犹太王国的战役》(Gallagher, W. 1999. *Sennacherib's Campaign to Judah.* Leiden: Brill.)
- 加萨那, J. ,《卢旺达的战争、和平与民主》(Gasana, J. 1995. "La guerre, la paix et la démocratie au Rwanda," in Guichaoua [ed.], *Les crises politiques.*)
- 格拉特利, R. ,《盖世太保与德国社会》(Gellately, R. 1990. *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盖尔纳, E. ,《国家与民族主义》(Gellner, 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 格拉克, C. ,《预谋谋杀: 1941—1944 的德国政策对白俄罗斯经济的破坏》(Gerlach, C. 1999. *Kalkulierte Mord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s- und Vernichtungspolitik in Weissrussland 1941 bis 1944.*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 格蒂, J. A. ,《大清洗的起源》(Getty, J. A. 1985.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格蒂, J. A. , 蔡斯, W. ,《1930 年代末对苏联精英的镇压模式》(Getty, J. A. , & Chase, W. 1993. "Patterns of Repression Among the Soviet Elite in the Late 1930s: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in Getty & Manning [eds.], *Stalinist Terror.*)
- 格蒂, J. A. , 曼宁, R. 编,《苏联肃反运动的新观点》(Getty, J. A. , & Manning, R. [eds.] [1993]. *Stalinist Terror: Ne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吉布森, R. ,《当代欧洲民族意识的强化》(Gibson, R. 1994. "The Intensific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Europe," in C. Bjorn et al. [eds.], *Nations,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in the European Past.* Copenhagen: Academic Press.)
- 吉塞维厄斯, W. ,《走向终点》(Gisevius, W. 1947. *To the Bitter En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格伦尼, M. ,《南斯拉夫的陷落》(Glenny, M. 1993. *The Fall of Yugoslavia.*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 戈蒂, V., 《塞尔维亚的政党与政党制度》(Goati, V. 1995. "Serbian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in Janjic [ed.], *Serbia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 约瑟夫·戈贝尔, 《1942—1943 戈贝尔日记》(Goebbels, J. 1948. *The Goebbels Diaries 1942—1943*.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 戈尔德, D., 《有组织的印度教》(Gold, D. 1991. "Organized Hinduisms: From Vedic Truth to Hindu Nation," in Marty & Appleby [eds.], *Fundamentalisms Observed*.)
- 戈德哈根, D., 《希特勒的忠实刽子手: 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Goldhagen, D. 1996.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London: Little, Brown.)
- 戈德斯通, J. 等, 《失败国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报告》(Goldstone, J., et al. 2002. "State Failure Task Force Report. Phase III Findings." www.cidcm.umd.edu/inser/stfail)
- 戈帕拉克里希南, R., 《反叛抗拒的印度东北部》(Gopalakrishnan, R. 1995. *Insurgent North-eastern India*. New Delhi: Vikas.)
- 戈登, F., 《夹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拉脱维亚人与犹太人》(Gordon, F. 1990. *Latvians and Jews Between Germany and Russia*. Stockholm: Memento.)
- 戈登, S., 《希特勒, 德国人, 及“犹太人问题”》(Gordon, S. 1984. *Hitler, Germans,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戈迪, E., 《塞尔维亚的权力文化》(Gordy, E. 1999. *The Culture of Power in Serbia*. University Park: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戈尔斯基, P., 《对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的早期现代主义批评》(Gorski, P. 2000. "The Mosaic Moment: An Early Modernist Critique of Modernist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5.)
- 古雷维奇, P., 《我们希望你知道明天我们将与家人一起被杀死》(Gourevitch, P. 1998.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 Giroux.)
- 格雷伯, G., 《被人遗忘的车队: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Graber, G. 1996. *Caravans to Oblivion: The Armenian Genocide, 1915*. New York: John Wiley.)
- 格拉纳达电视台, 《我们都是邻居》(Granada Television. 1993. *We Are All Neighbours*. Granada TV "Disappearing World" documentary series.)
- 格雷森, A. K., 《亚述》(Grayson, A. K. 1982. "Assyria," in J. Boardman et al.

- [eds.],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I, Part 1: Prehistory of the Balkans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egean World, Tenth to Eighth Centuries B. C.*, 3r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格林菲尔德, L. , 《民族主义: 通向现代性的五条道路》(Greenfeld, L.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戈梅克, M. 等, 《种族清洗: 塞尔维亚意识形态历史文献汇编》(Grmek, M. , et al. 1993. *Le nettoyage ethnique: Documents historiques sur une idéologie serbe*. Paris: Fayard.)
- 格罗斯, J. , 《错综之网: 面对波兰人、德国人、犹太人与共产主义者之间关系的刻板印象》(Gross, J. 2000. “A Tangled Web: Confronting Stereotypes Conc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Poles, Germans, Jews and Communists,” in I. Deak et al. [eds.],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World War II and Its Aftermath*.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邻居: 耶德瓦布内犹太社区的消失》(2001.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吉乔瓦, A. 编, 《布隆迪和卢旺达的政治危机 (1993—1994)》(Guichaoua, A. [ed.]. 1995. *Les crises politiques au Burundi et au Rwanda [1993—1994]*. Lille: Université de Lille.)
- 格尔, T. , 《危险之中的少数人群- 全球种族政治冲突概观》(Gurr, T. 1993. *Minorities at Risk. A Global View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s*.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 《对种族政治反叛的风险评估模型》(1998. “A Risk Assessment Model of Ethnopolitical Rebellion,” in Davies & Gurr [eds.], *Preventive Measures*.)
- 《人民与国家: 面临危险的新世纪少数人群》(2000. *People versus States: Minorities at Risk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 古特曼, I. , 《牺牲受害的波兰人》(Gutman, I. 1990. “The Victimization of the Poles,” in M. Berenbaum [ed.], *A Mosaic of Victims: Non-Jews Persecuted and Murdered by the Nazi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古特曼, R. , 《见证种族灭绝》(Gutman, R. 1993. *A Witness to Genocide*. New York: Macmillan.)

- 哈伯勒, E. , 《德国警察与白俄罗斯的种族灭绝, 1941—1944》(Haberer, E. 2001. “The German Police and Genocide in Belorussia, 1941—1944,”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vol. 3, in three parts.)
- 黑比奇, A. , 《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1900—1940 西澳大利亚西南部的政府与土著》(Haebich, A. 1988. *For Their Own Good: Aborigines and Government in the Southwest of Western Australia 1900—1940*. Perth: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ress.)
- 哈根, W. , 《“最后解决方案”之前: 对两次大战期间的德国与波兰政治反犹太主义的比较研究》(Hagen, W. 1996. “Before the ‘Final Solution’: Towar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Interwar Germany and Poland.”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8.)
- 哈格特维特, B. , 《大众社会理论与魏玛》(Hagtvet, B. 1980. “The Theory of Mass Society and Weimar,” in S. Larsen et al. [eds.], *Who Were the Fascists? Social Roots of European Fascism*.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 海恩斯沃斯, P. , 麦克洛斯基, S. , 《东帝汶问题》(Hainsworth, P. , & McCloskey, S. 2000. *The East Timor Question*. London: I. B. Taurus)
- 汉考克, I. , 《对吉普赛大屠杀的回应》(Hancock, I. 1996. “Responses to the Porrajmos: The Romani Holocaust,” in A. Rorsenbaum [ed.], *Is the Holocaust Unique?* Boulder, Colo. : Westview.)
- 黑尼, G. 等, 《模拟监狱中的人际动力学》(Haney, C. , et al. 1973. “Interpersonal Dynamics in a Simulated Pri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Penology*, vol. 1.)
- 哈丁, N. , 《社会主义、社会与有组织的工人国家》(Harding, N. 1984. “Socialism, Society and the Organic Labour State,” in Harding [ed.], *The State in Socialist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 哈夫, B. , 《人道主义危机的预警》(Harff, B. 1998. “Early Warning of Humanitarian Crises: Sequential Models and the Role of Accelerators,” in Davies & Gurr [eds.], *Preventive Measures*.)
- 《未从大屠杀中获得教训? 对自 1955 年以来种族灭绝和政治大屠杀的风险评估》2003. “No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Holocaust? Assessing Risks of Genocide and Political Mass Murder since 195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 哈夫, B., 格尔, T., 《关于种族灭绝与政治灭绝的经验论趋势》(Harff, B., & Gurr, T. 1988. "Toward an Empirical Theory of Genocides and Politicides: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ases Since 194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 哈特, P., 《爱尔兰共和军及其敌人》(Hart, P. 1998. *The I. R. A. and Its Ene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哈滕尼安, A., 《啼笑皆非: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回忆录》(Hartunian, A. 1986. *Neither to Laugh Nor to Weep: A Memoir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2nd ed. Cambridge, Mass: Armenian Heritage Press.)
- 黑斯廷斯, A., 《国家地位的树立》(Hastings, A. 1997.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h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哈夫拉尼克, J., 《捷克斯洛伐克的法西斯主义》(Havranek, J. 1971. "Fascism in Czechoslovakia," in Sugar[ed.], *Eastern European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海登, R., 《想象的共同体与真实的受害者: 南斯拉夫的民族自治与种族清洗》(Hayden, R. 1996. "Imagined Communities and Real Victims: Self-Determination and Ethnic Cleansing in Yugoslavia."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23.)
- 黑德兰, R., 《凶杀消息: 秘密警察及保安部门特别行动队报告研究, 1941—1943》(Headland, R. 1992. *Messages of Murder: A Study of the Reports of the Einsatzgruppen of the Security Police and the Security Service, 1941—1943*.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ies Press.)
- 希尔, H., 《杀戮现场: 德国国防军与白俄罗斯的大屠杀, 1941—1942》(Heer, H. 1997. "Killing Fields: The Wehrmacht and the Holocaust in Belorussia, 1941—1942."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vol. 7.)
- 赫夫纳, R., 《现代印度尼西亚的种族、民族与民族主义》(Hefner, R. 1991. "Ethnicity,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Indonesia," in U. Ra'anan[ed.], *State and Nation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公民伊斯兰: 穆斯林与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2000. *Civil Islam: Muslim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Indonesi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海泽, R., 《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的消失》(Heizer, R. 1993. *The Destruction of California Indians.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赫尔辛基观察,《波黑的战争罪行》第一及第二卷,(Helsinki Watch. 1992, 1993. *War Crimes in Bosnia-Herzegovina*, Vols. I & II.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 亨, L., 德默雷, F., 《柬埔寨: 被压抑的微笑》(Heng, L., & Demeure, F. 1994. *Cambodge: Le sourire baillonne*. Xonrupt-Longemer: Anako.)
- 冯·亨蒂格, H., 《第三帝国对于社会史方面的贡献》(von Hentig, H. 1977. "Beiträge zu einer Sozial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ol. 16.)
- 赫尔伯特, U. 编《国家社会主义根绝政策》(Herbert, U. [ed.] 2000. *National Socialist Extermination Policies*. New York: Berghahn.)
- 赫策尔, M., 《基督教与匈牙利犹太人大屠杀》(Herczl, M. 1993. *Christianity and the Holocaust of Hungarian Jew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霍伊维林, P., 《衡量种族灭绝的方法》(Heuveline, P. 2001. "Approaches to Measuring Genocide: Excess Mortality during The Khmer Rouge Period," in Chiro and Seligman [eds.], *Ethnopolitical Warfare*.)
- 霍伊泽, G., 《湿婆神军党与“民族主义”印度教》(Heuzé, G. 1992. "Shiv Sena and 'National' Hinduis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Delhi], October 3 and 10.)
- 希尔伯格, R., 《欧洲犹太人的消失》(Hilberg, R. 1978.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New York: Octagon.)
- 《大屠杀的意义》(1980.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locaust," in H. Friedländer & S. Milton [eds.], *The Holocaust: Ideology, Bureaucracy and Genocide*. Millwood, N. Y. :Kraus International.)
- 《施害人, 牺牲品, 与旁观者: 1933—1945 犹太浩劫》(1993. *Perpetrators, Victims, Bystanders: The Jewish Catastrophe 1933—1945*. London: Lime Tree.)
- 欣特珍, H., 《对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一种解释》(Hintjens, H. 1999. "Explaining the 1994 Genocide in Rwand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7.)
- 欣顿, W., 《翻身: 一个中国村庄革命的记实》(Hinton, W. 1966.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 霍夫克斯, K., 《希特勒的政治参谋》(Höffkes, K. 1986. *Hitlers Politische Generale*. Tuebingen: Grabert.)

- 霍夫曼, D. ,《地方层面的大恐怖:莫斯科工厂的清洗,1936—1938》(Hoffman, D. 1993. "The Great Terror on the Local Level: Purges in Moscow Factories, 1936—1938," in Getty & Manning[eds.], *Stalinist Terror*.)
- 霍夫曼, P. ,《德国对希特勒的抵抗》(Hoffman, P. 1988.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霍尔布鲁克, R. ,《终结战争》(Holbrooke, R. 1998. *To End a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 霍尔奎斯特, P. ,《作为“文明国家”的俄罗斯帝国》(Holquist, P. 2003. "The Russian Empire as a 'Civilized Nation': International Law as Principle and Practice in Imperial Russia, 1874—1917."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awyer Seminar on the Dynamics of Mass Killing, Palo Alto, Calif. , March 2003.)
- 霍尼格, J. ,博思, N. ,《斯雷布雷尼察:战争罪行的记录》(Honig, J. , & Both, N. 1996. *Srebrenica: Record of a Warcrime*.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 霍罗威茨, D. ,《冲突中的族群》(Horowitz, D.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宪法设计:一种矛盾修辞?》(1999.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 Oxymoron?" *Nomos*, vol. 41s.)
- 《致命的种族暴动》(2001. *The Deadly Ethnic Riot*.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霍罗威茨, I. ,《生命的代价:种族灭绝与国家权力》(Horowitz, I. 1982. *Taking Lives: Genocide and State Power*.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 霍罗威茨, G. ,《在死亡的阴影下》(Horwitz, G. 1990. *In The Shadow of Death*. New York: Free Press.)
- 赫斯, R. 等,《党卫军眼里的奥斯威辛》(Höss, R. , et al. 1978. *KL Auschwitz Seen By the SS*. Cracow: Panstwowe Muzeum.)
- 霍瓦尼西安, R. 编,《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深度观察》(Hovannisian, R. [ed.] 1986. *The Armenian Genocide in Perspective*.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起因与进程》(1994. "Etiology and Sequence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in his *Genocid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霍克西, F. ,《最后的承诺:同化印第安人的运动,1880—1920》(Hoxie, F. 1984. A

Final Promise: The Campaign to Assimilate the Indians, 1880—1920.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休斯, R. ,《致命的海岸线》(Hughes, R. 1987. *The Fatal Shore.* New York: Knopf.)

哈卡诺维茨, R. ,《地狱第十层:波斯尼亚死亡集中营生命回忆录》(Hukanowicz, R. 1996. *The Tenth Circle of Hell: A Memoir of Life in the Death Camps of Bosnia.* New York: Basic Books.)

赫尔, I. ,《走向极端:军事文化与德意志帝国的灭绝战争(暂定名)》(Hull, I. 2004. *Going to Extremes: Military Culture and Wars of Annihilation in Imperial Germany (provisional title).*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人权观察委员会,《世界报告:布隆迪,卢旺达,苏丹》(Human Rights Watch. 1999 and 2003. "World Reports: Burundi, Rwanda, Sudan." Available at <http://www.hrw.org/hrw/wr2k/Africa>)

人权观察委员会,《1999年世界报告》(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1999. Yugoslavia. www.hrw.org/hrw2k)

《我们没有获得救你的命令》(2002. "We Have No Orders to Save You." *State Participation and Complicity in Communal Violence in Gujarat.* Available at www.hrw.org)

《达尔福尔的种族清洗》(2004. "Ethnic Cleansing in Darfur." Available at www.hrw.org/reports/2004/Sudan.)

亨恰克, T. ,《二战时期乌克兰人的伤亡情况》(Hunczak, T, 1990. "The Ukrainian Losses during World War II," in Berenbaum [ed.], *A Mosaic of Victims.*)

亨特, E. ,《土著的健康与历史》(Hunter, E. 1993. *Aboriginal Heal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亨廷顿, S.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Huntington, S.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赫塔多, A. ,《印第安人在加利福尼亚边疆的生存》(Hurtado, A. 1988. *Indian Survival on the California Frontier.*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加利福尼亚边疆的印第安与白人住户, 1860》(1994. "Indian and White Households on the Californian Frontier, 1860," in his *Indian Survival on the California Frontier.*)

哈钦森, J. ,《当代民族主义》(Hutchinson, J. 1994. *Modern Nationalism.* London: Fontana.)

- 易卜拉欣, J., 《尼日利亚的种族—宗教动员和瘫痪的民主制度》(Ibrahim, J. 1999. "Ethno-Religious Mobilisation and the Sappings of Democracy in Nigeria," in J. Hyslop[ed.], *African Democracy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 英特·维尔德, N., 《荷兰的党卫军: 1935—1945 的党卫军档案》(in 't Veld, N. 1976. *De SS en Nederland: documenten uit SS-archieven 1935—1945*. 's-Gravenhage: Nijhoff.)
- 英巴拉伊, S., 《东帝汶: 东盟的血与泪》(Inbaraj, S. 1995. *East Timor: Blood and Tears in Asean*. Chiang Mi, Thailand: Silkworm Books.)
- 亚美尼亚问题研究所,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第二卷: 文献资料, (Institut Für Armenische Frage. 1988. *The Armenian Genocide, Vol. 2: Documentation*. Munich: author[in German].)
- 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报道, 1998—2000 法庭最新材料及出版物. Institute for War and Peace Reporting. 1998—2000. Tribunal Updates & Press Releases. Available at <http://www.iwpr.net>
- 国家纪念研究所, 《耶德瓦布内案卷·卷一: 分析》(英语摘要 1).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2002. *The Jedwabne Case, Vol. I: Analyses* [English Summary 1]. Warsaw: author.)
- 国际记者培训机构, 《报告》(Internews. 2000. "Reports." <http://internews.org/projects/ICTR>)
- 约安尼德, R., 《天使之剑》(Ioanid, R. 1990. *The Sword of the Archang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布加勒斯特大屠杀, 1941 年 1 月 21 日至 23 日》(1991. "The Pogrom of Bucharest 21—23 January 1941."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vol. 6.)
- 《安东内斯库时代》(1994. "The Antonescu Era," in Braham[ed.], *The Tragedy of Romanian Jew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罗马尼亚大屠杀》(2000. *The Holocaust in Romania*. Chicago: Ivan Dee.)
- 艾哈迈德·伊泽特·帕萨, 《我要呐喊》第一卷. Izzet Pasa, A. 1992. *Feryadim* [*My Crying Out*], Vol. I. Istanbul: Nehir Yayinlari.)
- 雅各布森, H. -A., 《行政委员命令及对苏联战俘的集体处决》(Jacobsen, H. -A. : 1968. "The Commissar Order and Mass Executions of Soviet Prisoners of War," in: Buchheim et al. [eds.], *Anatomy of the SS-State*.)

- 贾法里安, B., 《再见哈尔普特》(Jafarian, B. 1989. *Farewell Kharpert*. Madison, Wis.: Mangasarian.)
- 贾弗里洛特, C., 《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Jaffrelot, C. 1996.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n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杰明, M., 《阶级之间: 挺进队领导层的社会结构》(Jamin, M. 1984. *Zwischen den Klassen: Zur Sozialstruktur der SA-Führerschaft*. Wuppertal: Hammer.)
- 贾尼奇, D. 编, 《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塞尔维亚》(Janjic, D. [ed.]. 1995. *Serbia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Belgrad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Forum for Ethnic Relations.)
- 詹森, C., 韦克贝克尔, A., 《1939—1940 年波兰德裔平民的自卫》(Jansen, C., & Weckbecker, A. 1992. "Der Volksdeutscher Selbstschutz' in Polen 1939/40," in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ol. 14. Munich: Oldenbourg.)
- 贾劳施, K., 《无自由的职业: 德国律师, 教师和工程师》(Jaraus, K. 1990. *The Unfree Professions: German Lawyers, Teachers and Engineers, 1900—19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杰利内克, Y., 《堂区共和国: 赫林卡的斯洛伐克人民党, 1931—1945》(Jelinek, Y. 1976. *The Parish Republic: Hlinka's Slovak People's Party, 1931—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最后解决”方案: 斯洛伐克式》(1989. "The 'Final Solution' - the Slovak Version," in Marrus [ed.], *The Nazi Holocaust*.)
- 詹金斯, G. 编, 《工业革命之前的威尔士语言》(Jenkins, G. [ed.] 1997. *The Welsh Language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 詹金斯, G 等, 《近代早期威尔士的威尔士语言》(Jenkins, G., et al. 1997. "The Welsh Language in Early Modern Wales," in Jenkins [ed.], *The Welsh Language*.)
- 乔纳松, K., 比约恩森, K., 《比较视野下的种族灭绝与重大人权伤害》(Jonasohn, K., with Björnson, K. 1998. *Genocide and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 琼斯, B., 《阿鲁沙和平进程》(Jones, B. 1999. "The Arusha Peace Process," in Adelman & Suhrke [eds.], *The Path of a Genocide*.)
- 琼斯, S., 《人权伤害模式》(Jones, S. 1995. "The Pattern of Human Rights Viola-

- tions," in K. Coates [ed.], *Timor: Twenty Years On*. Nottingham: Bertrand Russell Foundation.)
- 朱达, T. ,《塞尔维亚人》(Judah, T. 1997. *The Serbs*.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科索沃:战争与复仇》(2000. *Kosovo: War and Revenge*.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于尔根斯梅耶, M. ,《新的冷战? 宗教民族主义对抗世俗国家》(Juergensmeyer, M. 1993.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卡比里吉, L. ,《卢旺达种族灭绝:人类的耻辱》(Kabirigi, L. 1994. *Génocide au Rwanda: Honte pour l'humanité*. Kigali, Rwanda: PREFED.)
- 凯泽, H. ,《否认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有关:德国的作用》(Kaiser, H. 1996. "Denying the Armenian Genocide: The German Connection."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Armenian Studies*, vol. 9.)
- 《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与发展理论:关于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人主导范式的构建》(1997. *Imperialism, Racism and Development Theori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Dominant Paradigm on Ottoman Armenians*. Ann Arbor, Mich. : Gomidas Institute.)
- 《梅尔济丰 1915:伯莎·莫利日记》(1999a. *Marsovan 1915: The Diaries of Bertha Morley*. Ann Arbor, Mich. : Gomidas Institute.)
- 《巴格达铁路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1915—1916》(1999b. "The Baghdad Railway and the Armenian Genocide, 1915—1916," in R. Hovannisian [ed.], *Remembrance and Denial: The Case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从帝国到共和国:土耳其的连串否认》(2000a. "From Empire to Republic: The Continuities of Turkish Denial." Unpublished paper.)
-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期间亚美尼亚人的财产、奥斯曼法律与民族政策》(2000b. "Armenian Property, Ottoman Law and Nationality Policies during the Armenian Genocide, 1915—1918." Unpublished paper.)
-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对若干流行神话的分析》(2001a. "The Armenian Genocide: Governing Myths Revisi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Second Mediterranean

Soci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 Meeting, Florence, March 21—25.)

《埃伯哈德伯爵？关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信件》(2001b. *Eberhard Count Wolffskeel Von Reichenberg, Zeitoun, Mousa Dagh, Ourfa: Letters on the Armenian Genocide*. Princeton, N. J. : Gomidas Institute.)

卡克温齐里, J. , 卡姆卡玛, D. ,《卢旺达极端势力的形成与巩固》(Kakwenzire, J. , & Kamukama, D. 1999.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Extremist Forces in Rwanda," in Adelman & Suhrke[eds.], *The Path of a Genocide*.)

卡尔多, M. ,《新老战争》(Kaldor, M. 1999. *New and Old War*.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卡利瓦斯, S. ,《荒唐又无意义？阿尔及利亚大屠杀的逻辑》(Kalyvas, S. 1999. "Wanton and Senseless? The Logic of Massacres in Algeria."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 11.)

《“新”“老”内战,合理的区分?》(2001“‘New’ and ‘Old’ Civil War. A Valid Distinction?” *World Politics*, vol. 54.)

卡门, H. ,《1492年的地中海及对西班牙犹太人的驱逐》(Kamen, H. 1993a.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Expulsion of Spanish Jews in 1492," in his *Crisis and Change in Early Modern Spain*. Aldershot, Hants: Variorum.)

《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精神危机》(1993b. "A Crisis of Conscience in Golden Age Spain: The Inquisition Against 'Limpieza de Sangre,'" in *Crisis and Change in Early Modern Spain*.)

坎格里斯, F. ,《前苏联、法西斯主义与波罗的海问题》(Kangeris, F. 1998.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Fascism and the Baltic Question: The Question of Collaboration and War Criminals in the Baltic Countries," in S. Larsen & B. Hagtvat [eds.], *Modern Europe After Fascism, 1943—1980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坎苏, A. ,《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Kansu, A. 1997. *The Revolution of 1908 in Turkey*. Leiden: Brill.)

卡普兰, R. ,《巴尔干幽灵:穿越历史的旅程》(Kaplan, R. 1993. *Balkan Ghosts: 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卡雷, K. ,《黄色死神来临:斯卡日斯科 - 卡缅纳奴隶劳动营》(Karay, F. 1996. *Death Comes in Yellow: Skarzysko-Kamienna Slave Labor Camp*. Amsterdam: Harwood.)

- 卡帕特, K., 《N. 巴扎里亚回忆录》(Karpat, K. 1975. "The Memoirs of N. Batzaria: The Young Turks and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6.)
- 卡赛, L., 《匈牙利大屠杀的最后阶段》(KarKarsai, L. 1998. "The Last Phase of the Hungarian Holocaust: The Szalasi Regime and the Jews," in R. Braham & S. Miller[eds.], *The Nazis' Last Victims: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卡什, E., 卡什, I., 《沙土上的帝国》(Karsh, E., & Karsh, I. 1999. *Empires of the Sa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卡茨, F., 《平凡之人与非凡之恶》(Katz, F. 1993. *Ordinary People and Extraordinary Evi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卡茨, J., 《罪之诱: 为恶之中的道德诱惑与身体吸引》(Katz, J. 1988. *Seductions of Crime: Moral and Sensual Attractions in Doing Evil*. New York: Basic Books.)
- 卡曾斯坦, M., 等, 《湿婆神军党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复活》(Katzenstein, M., et al. 1998. "The Rebirth of the Shiv Sena in Maharashtra," in Basu & Kohli [eds.], *Community Conflicts*.)
- 卡赞吉安, P. 编, 《西里西亚亚美尼亚人的炼狱》(Kazanjian, P. [ed.] 1989. *The Cilician Armenian Ordeal*. Boston: HYE Intentions, Inc.)
- 基恩 F., 《流血的季节: 卢旺达之旅》(Keane, F. 1995. *Season of Blood: A Rwandan Journey*. London: Viking.)
- 凯迪, N., 《新宗教政治: "原教旨主义" 在何时、何地、为何出现?》(Keddie, N. 1998. "The New Religious Politics: Where, When and Why Do 'Fundamentalisms' Appear?"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40.)
- 凯尔, T., 《亚齐人反叛的根源, 1989—1992》(Kell, T. 1995. *The Roots of Acehnese Rebellion, 1989—1992*. Ithaca, N. Y.: 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Publication No. 74.)
- 凯利, D., 《捷克法西斯组织 1922—1942》(Kelly, D. 1995. *The Czech Fascist Movement 1922—194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凯内兹, P., 《俄国内战中的集体迫害和反动意识形态》(Kenez, P. 1992. "Pogroms and White Ideology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in J. Klier & S. Lambroza [eds.], *Pogroms: Anti-Jewish Violence in Modern Rus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肯里克, D., 帕克森, G., 《欧洲吉普赛人的命运》(Kenrick, D., & Puxon, G. 1972. *The Destiny of Europe's Gypsies*. London: Heinemann.)
- 克肖, I., 《第三帝国的流行观点与政治异议》(Kershaw, I. 1984. *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唯元首马首是瞻: 对希特勒独裁统治本质的思考》(1997. “ ‘ Working Towards the Führer ’ ;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the Hitler Dictatorship, ” in Kershaw &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 《希特勒: 1889—1936.: 傲睨神明》(1998.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Norton.)
- 《希特勒: 1936—1945: 招致天谴》(2000.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New York: Norton.)
- 克肖, I., 卢因, M. 编《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 独裁风格的比较》(Kershaw, I., & Lewin, M.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克斯滕, F., 《克斯滕回忆录, 1940—1945》(Kersten, F. 1956. *The Kersten Memoirs 1940—1945*. London: Hutchinson.)
- 克沃尔基安, R., 《对叙利亚 - 美索不达米亚集中营里的亚美尼亚人的灭绝》(Kévorkian, R. 1998. “ L' extermination des déportés arméniens ottomans dans les camps de concentration de Syrie-Mésopotamie (1915—1916): La deuxième phase du génocide. ” *Revue d' histoire arménienne contemporaine*, vol. 2.)
- 《西里西亚 (1909—1921) 》(1999. “ La Cilicie (1909—1921): Des Massacres d' Adana au Mandat Français. ” *Revue d' Histoire Armenienne Contemporaine*, vol. 3, numero special.)
- 基德, C., 《土耳其的国家与阶级: 资本主义发展研究》(Keyder, C. 1987. *State and Class in Turkey: A Study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 基德, C. 等, 《奥斯曼帝国的港口城市》(Keyder, C., et al. 1993. “ Port-Cities in the Ottoman Empire: Some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 *Review*, vol. 16.)
- 卡迪奥加拉, G., 《阿鲁沙和平协定在卢旺达的执行》(Khadiogala, G. 2002. “ Implementing the Arusha Peace Agreement in Rwanda, ” in S. Stedman et al. [eds.], *Ending Civil Wa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ace Agreements*.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基尔南, B., 《野生鸡、饲养鸡和贪婪的人: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东部》(Kiernan, B. 1983. "Wild Chickens, Farm Chickens and Cormorants: Kampuchea's Eastern Zone Under Pol Pot," in Chandler & Kiernan [eds.],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波尔布特政权》(1996. *The Pol Pot Regim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恩弗帕夏和波尔布特》(1997. "Enver Pasha and Pol Pot: A Comparison of the Armenian and Cambodian Genocid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oblems of Genocide"*. Cambridge, Mass.: Zoryan Institute.)

《柬埔寨种族灭绝中的种族因素》(2001. "The Ethnic Element in the Cambodian Genocide," in Chirot and Seligman [eds.], *Ethnopolitical Warfare*.)

《东南亚种族灭绝中的人口构成统计》(2003. "The Demography of Genocide in Southeast Asi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35.)

柯克, T., 《纳粹主义与奥地利的工人阶级》(Kirk, T. 1996. *Naz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Aust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基什沃, M., 《强盗统治:对锡克教教徒的大屠杀》(Kishwar, M., 1998a. "Gangster Rule: The Massacre of the Sikhs," in his *Religion at the Service of Nationalism and Other Essay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安全不可分割:孟买暴动的启示》(1998b. "Safety Is Indivisible: The Warning from Bombay Riots," in *ibid.*.)

克莱斯, E., 《纳粹国家的“安乐死”》(Kless, E. 1983. "*Euthanasie*" im NS - Staat. Frankfurt: Fischer.)

《“美好的往日”:施害人及旁观者眼里的大屠杀》(“*The Good Old Days*”; *The Holocaust as Seen by Perpetrators and Bystanders*. London: Hamilton.)

克利, E. 等, 《神与我们同在》(Klee, E., et al. 1989. "*Gott mit Uns*"; *Der deutsche Vernichtungskrieg im Osten 1939—1945*. Frankfurt: Fischer.)

克里尔, J., 《解剖阴谋论:对集体迫害的新观察》(Klier, J. 1993. "Unravelling of the Conspiracy Theory: A New Look at the Pogroms." *East European Jewish Affairs*, vol. 23.)

范·克林肯, G., 《印度尼西亚的新民族精英》(van Klinken, G. 2002. "Indonesia's New Ethnic Elites," in H. Schulte Nordholt [ed.], *Indonesia: In Search of Transition*. Yogyakarta: Pustaka Pelajar.)

- 尼泽维奇, A., 塔夫格齐克, V., 《改变塞尔维亚的罪行》(Knezevic. A., & Tufegdzic, V, 1995. *Kriminal koji je izmenio Srbiju* [*Crime that Changed Serbia*], Blegrade: Radio B - 92.)
- 凯尔, R., 《黑色军团: 纳粹党卫军的结构与权力斗争》(Koehl, R. 1983. *The Black Corps: The Structure and Power Struggles of the Nazi S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科姆贾西, A., 斯托克韦尔, R., 《德国少数群体和第三帝国》(Komjathy, A., & Stockwell, R. 1980. *German Minorities and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科沙尔, R., 《社会生活, 地方政治及纳粹主义: 马尔堡, 1880—1935》(Koshar, R. 1986, *Social Life, Local Politics and Nazism: Marburg, 1880—193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科西克, W., 《乌克兰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Kosyk, W. 1986. *L' Allemagne national - socialiste et l' Ukrain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 Est Europeen.)
- 科瓦塞维奇, S., 达基奇, P., 《1994 南斯拉夫危机年表》(Kovacevic, S., & Dajic, P. 1995. *Chronology of the Yugoslav Crisis 1994*. Belgrade: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 《1995 年南斯拉夫危机年表》(1997. *Chronology of the Yugoslav Crisis 1995*. Belgrad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 克劳斯尼克, H., 《希特勒与特别行动队》(Krausnick, H. 1993 *Hitlers Einsatzgruppen*. Strttgart: Taschenbuch.)
- 库马尼夫, G., 《苏联被占领土上的德国占领政权》(Kumanev, G. 1990. "The German Occupation Regime on Occupied Territory in the USSR [1941—1944]," in Berenbaum [ed.], *A Mosaic of Victims*.)
- 《1921—1959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Kuo - Chun, C. 1960. *Agrarian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59*.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 库兹马诺维奇, B., 《对待个别国家的社会距离》(Kuzmanovic, B. 1995. "Social Distance Towards Individual Nations," in M. Lazic et al. [eds.], *Society in Crisis: Yugoslavia in the Early 90s*. Belgrade: Filip Visnjic.)
- 拉·佩劳斯, J. - F., 《1786 年的蒙特雷: 加利福尼亚修道院的生活: 来自拉·佩劳斯的让 - 弗朗索瓦的刊物》(La Pérouse, J. - F. 1989. *Monterey in 1786: Life in a California Mission: The Journals of Jean Francois de la Pérouse*, ed. M.

- Margolin. Berkeley: Heyday Books.)
- 莱利, T., 《布隆迪的农民、地方社区和中央权力》(Laely, T. 1997. "Peasants, Local Communities and Central Power in Burundi."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5.)
- 莱尼坦加, P., 《米佐民族阵线运动》(Lainithanga, P. 1994. "Mizo National Front Movement," in Prasad[ed.], *Autonomy Movements*.)
- 莱廷, D., 《成长中的身份》(Laitin, D. 1998. *Identity in Formation*.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语言冲突与暴力:让骆驼背更结实的稻草》(1999. "Language Conflict and Violence: The Straw That Strengthens the Camel's Back."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 兰多, J., 《泛土耳其主义:从犹太复国主义到合作》(Landau, J. 1995. *Pan - Turkish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2nd ed. London: Hurst.)
- 范·兰根伯格, M., 《新秩序国家:语言、意识形态和霸权》(van Langenberg, M. 1990. "The New Order State: Language, Ideology, Hegemony," in A. Budiman [ed.],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Indonesia*. Clayton, Victoria, Australia: Monash University Press.)
- 拉西克, A., 《关于奥斯维辛党卫军的历史学—社会学描述》(Lasik, A. 1994a. "Historical - Sociological Profile of the Auschwitz SS," in Gutman & Berenbaum [eds.], *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 Bloomington, Ind.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 《鲁道夫·赫斯:犯罪活动总干事》(1994b. "Rudolf Hoess: Manager of Crime," in Gutman & Berenbaum [eds.], in *ibid.*)
- 劳里埃, H., 《以上帝之名暗杀》(Laurière, H. 1951. *Assassins au nom de Dieu*. Paris: La Vigie.)
- 勒布蒂, R. 编, 《从历史角度看迁移和移民》(Leboutte, R. [ed.]. 2000. *Migrations et migrants dans une perspective historique*. Brussels: Peter Lang.)
- 莱丁, M., 《意大利法西斯反犹太主义的演变》(Ledeen, M. 1989. "The Evolution of Italian Fascist Anti - Semitism," in Marrus [ed.], *The Nazi Holocaust*.)
- 李鸿永, 《中国文革的政治手腕》(Lee, H. Y. 1978.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莱夫, C., 《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冲突》(Leff, C. 1988. *National Conflict in Czee-*

boslovakia.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莱格特, L. ,《苏联对所有国家展开的驱逐走向:种族灭绝的进程》(Legters, L. 1997. “Soviet Deportation of Whole Nations: A Genocidal Process,” in S. Totten et al. [eds.], *Century of Genocide; Eyewitness Accounts and Critical Views*. New York: Garland.)

勒马钱德, R. ,《布隆迪:种族冲突与种族灭绝》(Lemarchand, R. 1995. *Burundi: Ethnic Conflict and Genoc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布隆迪种族灭绝》(1997a. “The Burundi Genocide,” in S. Totten et al. [eds.], *Century of Genocide; Eyewitness Accounts and Critical Views*. New York: Garland.)

《卢旺达种族灭绝》(1997b. “The Rwanda Genocide” in *ibid.*)

莱蒂卡, S. ,《巴尔干战争的起因》(Letica, S. 1996. “The Genesis of the Current Balkan War,” in Mestrovic [ed.], *Genocide After Emotion*.)

勒韦, E. ,《匈牙利犹太人殉难黑名册》(Levai, E. 1948. *Black Book on the Martyrdom of Hungarian Jewry*. Zurich & Vienna:)

莱文, M. ,《种族灭绝的新方向:东部战区的犹太人,1914—1920 与 1941 年》(Levene, M. 1993. “Frontiers of Genocide: Jews in the Eastern War Zones, 1914—1920 and 1941,” in Panayi [ed.], *Minorities in Wartime*.)

莱文, M. , 罗伯茨, P. 编,《历史上的大屠杀》(Levene, M. , & Roberts, P. [eds.] 1999. *The Massacre in History*. New York: Berghan Books.)

卢因, M. ,《苏维埃制度的形成》(Lewin, M. 1985.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ystem*. New York: Pantheon.)

利希滕斯坦, H. ,《希姆莱与赫夫纳》(Lichtenstein, H. 1990. *Himmlers grüne Helfer*. Köln: Bund - Verlag.)

利德尔, R. W. ,《政权:新秩序》(Liddle, R. W. 1999. “Regime: The New Order,” in Emmerson [ed.], *Indonesia Beyond Suharto*.)

利文, D. ,《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对手》(Lieven, D. 2000.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利夫顿, R. ,《纳粹医生》(Lifton, R. 1986. *The Nazi Doctors*. New York: Basic Books.)

林克莱特, M. 等,《第四帝国:克劳斯·巴比与新法西斯主义的关系》(Linklater, M. , et al. 1984. *The Fourth Reich: Klaus Barbie and the Neo - Fascist Connec-*

- tion.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 利特曼, S., 《受审的战争罪: 劳卡案件》(Littman, S. 1983. *War Criminal on Trial: The Rauca Case*. Toronto: Lester & Orpen Dennys.)
- 洛卡德, H., 《红色高棉劳改营》(Locard, H. 1996. “Le goulag Khmer rouge.” *Communisme*, nos. 47—48.)
- 《对黑书的反思: 柬埔寨民主制度的开始》(2000a. “Réflexions sur Le Livre noir: le cas du Kampuchea démocratique.” *Communisme*, nos. 59—60.)
- 《基尔南, 柬埔寨种族灭绝, 1975—1979》(2000b. “Ben Kiernan, Le génocide au Cambodge, 1975—1979: Race, idéologie et pouvoir.” *Communisme*, nos. 59—60.)
- 洛温伯格, P., 《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Loewenberg, P. 1983. “The Psycho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Nazi Youth Cohort,” in his *Decoding the Past*. New York: Knopf.)
- 洛夫特斯, J., 《白俄罗斯的秘密》(Loftus, J. 1982. *The Belarus Secret*. New York: Knopf.)
- 朗曼, T., 《卢旺达的国家, 市民社会与种族灭绝》(Longman, T. 1999.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Genocide in Rwanda,” in R. Joseph[ed.], *State Conflict and Democracy in Afric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洛佩斯·卡斯特罗, 《伊比利亚半岛刑罚: 罗马时代西班牙的腓尼基人》(López Castro, 1995. *Hispania Poenae. Los Fenicios en la Hispania Romana*. Barcelona: Crítica Grijalbo Mondadori.)
- 洛索威克, Y., 《希特勒的官吏: 纳粹秘密警察与平庸之恶》(Losowick, Y. 2000. *Hitler's Bureaucrats: The Nazi Security Police and the Banality of Evil*. London: Continuum.)
- 洛厄, W., 《“预期服从”与纳粹在乌克兰实施的大屠杀》(Lower, W. 2002. “‘Anticipatory Obedience’ and the Nazi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locaust in the Ukraine.”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Vol. 16.)
- 卢曼斯, V., 《希姆莱的助手》(Lumans, V. 1993. *Himmler's Auxiliari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卢弗, M., 《中国与俄国的权力重构》(Lupher, M. 1996. *Power Restructuring in China and Russia*. Boulder, Colo.: Westview.)
- 彼得·马斯, P., 《爱你的邻居: 战争研究》(Maas, P. 1996. *Love Thy Neighbor: A*

Story of War. New York: Knopf.)

梅斯, J., 《苏维埃乌克兰 1933 年的人为饥荒》(Mace, J. 1984. “The Man - Made Famine of 1933 in the Soviet Ukraine; What Happened and Why?” in I. Charny [ed.]. *Toward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evention of Genocide*. Boulder, Colo. : Westview.)

《苏联在乌克兰制造的人为饥荒》(1997. “Soviet Man - Made Famine in Ukraine,” in S. Totten et al. [eds.]. *Century of Genocide: Eyewitness Accounts and Critical Views*. New York: Garland.)

麦克法夸尔, R.,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MacFarquhar, R. 1974, 1983.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s. I &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麦克菲, A.,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 1908—1923》(MacFie, A. 1998.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23*. London: Longman.)

马德霍克, B., 《全印志愿者组织与政治》(Madhok, B. 1986. *The RSS and Politics*. New Delhi: Hindu World Publications.)

马德森, B., 《摩门教徒、淘金者及对肖肖尼县的入侵》(Madsen, B. 1994. “Mormons, Forty - Niners, and the Invasion of Shoshone County,” in Hurtado & Iverson [eds.],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Indian History*.)

梅尔, C., 《两次战后时期与二十世纪西欧的稳定》(Maier, C. 1981. “The Two Postwar Era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Stability in Twentieth - Century Western Europ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6.)

马克苏多夫, S., 《苏联因大屠杀而损失的犹太人口》(Maksudov, S. 1993. “The Jewish Population Losses of the USSR from the Holocaust,” in Dobroszycki & Gurock [eds.], *The Holocaust in the Occupied Soviet Union*. London: M. E. Sharpe.)

(柯齐奥) 马拉帕蒂, C., 《卡普特》(Malaparte, C. 1946. *Kaputt*. New York: Dutton.)

马尔科姆, N., 《波斯尼亚: 简史》(Malcolm, N. 1994. *Bosni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马尔基, L., 《清洗与流亡: 坦桑尼亚胡图难民的暴力, 回忆及宇宙观》(Malkki, L. 1995. *Purity and Exile: Violence, Memory and National Cosmology among Hutu Refugees in Tanzan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马利, M., 《各地区: 中央集权与反抗》(Malley, M. 1999. “Regions: Centralization

- and Resistance," in Emerson [ed.], *Indonesia Beyond Suharto.*)
- 马姆丹尼, M. ,《当受害人成为杀手:卢旺达的殖民主义,本土文化保护主义和种族灭绝》(Mamdani, M. 2001.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起源,第一卷:自开始至1760年的权力史》(Mann, M.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1760 A. 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社会权力的起源. 第二卷:阶级与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1993.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 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二十世纪欧洲工人阶级运动形式变化的起源》(1995. "Sources of Variation in Working Class Movements in Twentieth - Century Europe. " *New Left Review*, no. 212.)
- 《不断革命的矛盾》(1997.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ntinuous Revolution," in I. Kershaw & M.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 《种族灭绝的施行者是“普通人”还是“真正的纳粹”?》(2000. "Were the Perpetrators of Genocide ' Ordinary Men ' or ' Real Nazis ' ? Results from Fifteen Hundred Biographies. "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vol. 14.)
- 《不连贯的帝国》(2003. *Incoherent Empire.* London; Verso.)
- 《法西斯主义者》(2004. *Fasc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曼宁, R. ,《郊区的大清洗》(Manning, R. 1993. "The Great Purges in a Rural District: Belyi Raion Revisited," in Getty & Manning [eds.], *Stalinist Terror.*)
- 马拉什利安, L. ,《结束种族灭绝:清除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幸存者,1920—1923》(Marashlian, L. 1999. "Finishing the Genocide: Cleansing Turkey of Armenian Survivors, 1920—1923," in Hovannisian [ed.], *The Armenian Genocide in Perspective.*)
- 马丁, S. ,《土耳其革命的意识形态与信仰》(Mardin, S. 1971. "Ideology and Religion in the Turkish Revolutio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
- 马戈林, J. - L. ,《中国地下长征》(Margolin, J. - L. 1999a. "China: A Long March into Night," in Courtois et al. [eds.],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 《柬埔寨案例的挑战与启示》(2000. "Du cas cambodgien comme enjeu et comme

révéléateur." *Communisme*, nos. 59—60.)

马库斯, A., 《1788—1993 的澳大利亚种族关系》(Markus, A. 1994. *Australian Race Relations 1788—1993*. St. Leonard's, N. S. W.: Allen & Unwin.)

马库森, E., 科普夫, D., 《大屠杀与战略轰炸:20 世纪的种族灭绝与总体战争》(Markusen, E., & Kopf, D. 1995. *The Holocaust and Strategic Bombing: Genocide and Total Wa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马勒斯, M. 编, 《纳粹大屠杀 4: 德国境外的“最后解决方案”》第一卷。(Marrus, M. [ed.] 1989. *The Nazi Holocaust 4. The "Final Solution" Outside Germany*, Vol. I. Westport, Conn.: Meckler.)

马勒斯, M., 《多余者:20 世纪的欧洲难民》(Marrus, M. 1985. *The Unwanted: 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历史上的大屠杀》(1987. *The Holocaust in History*.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马蒂, M., 阿普尔比, R. 编, 《各种奉行的伊斯兰主义》(Marty, M., & Appleby, R. [eds.] 1991. *Fundamentalisms Observ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马托斯, J., 《所谓的“普通人”表现如何? 苏联被占领区上的德国秩序警察与大屠杀》(Matthäus, J. 1996. "What About the 'Ordinary Men'? The German Order Police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Occupied Soviet Union."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vol. 10.)

迈耶, A., 《怒火:法国及俄罗斯革命中的暴力与恐怖》(Mayer, A. 2000. *The Furies: Violence and Terror in the French and Russian Revolu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迈耶, A. J., 《天空为何没有变黑?》(Mayer, A. J. 1990. *Why Did the Heavens Not Darken?* London: Verso.)

梅佐沃, M., 《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希腊的内层》(Mazower, M. 1993. *Inside Hitler's Gree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博尼姆帕, M., 《卢旺达不是一座孤岛》(Mbonimpa, M. 1999. "Le Rwanda n'est pas une île," expert evidence given at the Rutaganda trial. *Ubutabera*, no. 59, April 12.)

约翰·麦卡锡, 《穆斯林与少数裔:奥斯曼安纳托利亚人口与帝国的终结》(McCarthy, J. 1983. *Muslims and Minorities: The Population of Ottoman Anatolia and the End of Empi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赴死与流亡：对奥斯曼穆斯林的种族清洗，1821—1922》(1995. *Death and Exil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 1821—1922*. Princeton, N. J. : Darwin Press.)
- 麦格雷尔, C. ,《我们看见凶手被视为英雄》(McGreal, C. 1999a. “We Saw Killers Treated as Heroes.” *The Observer* (London), March 7.)
- 《为了尊严而丢弃的生命》(1999b. “Lives Discarded to Save Face.” *The Observer* (London), April 4.)
- 麦肯齐, J. ,《加拿大的战犯》(McKenzie, J. 1995. *War Criminals in Canada*. Calgary: Detselig Enterprises.)
- 麦奎, M. ,《大规模杀伤的背景：立陶宛大屠杀的动因与前提》(McQueen, M. 1998. “The Context of Mass Destruction: Agents and Prerequisites of the Holocaust in Lithuania.”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vol. 12.)
- 梅尔森, R. ,《革命与种族灭绝：论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及大屠杀的起源》(Melson, R. 1992. *Revolution and Genocide: On the Origins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the Holocau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梅尔文, L. ,《遭遇背叛的民族：西方在卢旺达种族灭绝中的角色》(Melvern, L. 2000. *A People Betrayed: The Role of the West in Rwanda's Genocide*. London: Zed Books.)
- 门德尔松, E.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中东部的犹太人》(Mendelsohn, E. 1983. *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 《对安戈拉亚美尼亚人的驱逐与屠杀》(1920. *Les Arméniens d'Angora déportés et massacrés*. Le Caire: Hindié.)
- 默主歌耶, P. ,《我一生受驱逐的回忆》(Merdjimékian, P. 1919. *Les Mémoires de ma vie de déporté*. Aleppo: As - sabat J. Adjami.)
- 默克尔, P. ,《“卐”(纳粹万字旗)下的政治暴力》(Merkl, P. 1975 *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梅斯特罗维奇, S. 编,《激情下的种族灭绝：情绪化之后的巴尔干战争》(Mestrovic, S. [ed.]. [1996]. *Genocide After Emotion: The Postemotional Balkan War*. London: Routledge.)
- 米凯利斯, M. ,《当前关于法西斯种族主义政策的争论》(Michaelis, M. 1995. “The Current Debate Over Fascist Racial Policy,” in R. Wistrich & S. DellaPerg-

ola[eds.], *Fascist Antisemitism and the Italian Jews*. Jerusalem: Vidal Sas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米哈伊洛维奇, S. 等, 《从选举程序到自由选举》(Mihajlovic, S., et al. 1991. *Of izbornih rituala do slobonih izbora* [*From Electoral Rituals to Free Elections*]. Belgrade: University of Belgrade, Center for Political Research and Public Opinion.)

德·米尔德特, D., 《以人民的名义: 种族灭绝施害人对其战后在西德遭起诉过程的回忆: “安乐死”与“莱茵哈德行动”审讯案》(de Mildt, D. 1996.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Perpetrators Of Genocide in the Reflection of their Post - War Prosecution in West Germany: The ‘Euthanasia’ and ‘Aktion Reinhard’ Trial Cases*. The Hague: Nijhoff.)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S., 《服从权威: 一项实验性观察》(Milgram, S. 1974.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New York: Harper & Row.)

米利切维奇, A., 《投身塞尔维亚战争: 志愿者与逃兵》(Milicevic, A. Forthcoming “Joining Serbia’s Wars: Volunteers and Draft - Dodgers.” Ph. D. dissertation, UCLA.)

米勒, D., 米勒, L., 《幸存者: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口述历史》(Miller, D., & Miller, L. 1993 *Survivor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米尔考维奇, D., 《南斯拉夫种族灭绝的受害人与施害人, 1941—1945》(Mirkovic, D. 1993.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in the Yugoslav Genocide 1941—1945.”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vol. 7.)

米修纳斯, R., 塔格佩拉, R., 《巴尔干战争: 仰仗鼻息的岁月》(Misiunas, R., & Taagepers, R. 1993. *The Baltic States: Years of Dependence*, 2nd ed. London: Hurst.)

莫尔纳, J., 《塞格德第五宪兵部队辖区的地方行政与大屠杀》(Molnar, J. 1997.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Holocaust in 5th Szeged Gendarmerie District” [in Magyar], in Braham & Pok [eds.],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莫姆森, H., 《从魏玛到奥斯威辛》(Mommsen, H. 1991. *From Weimar to Auschwitz*.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作为纳粹独裁统治结构决定性因素的累积性激进化极端主义和渐进性自我毁灭》(1997. “Cumulative Radicalisation and Progressive Self - Destruction as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the Nazi Dictatorship,” in Kershaw &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蒙特维尔, J. 编,《多种族社会的冲突与调停》(Montville, J. [ed.] 1990. *Conflict and Peacemaking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Lexington, Mass. : Lexington.)

穆尔(小), B. ,《历史上的道德清洗与迫害》(Moore, B. , Jr. 2000. *Moral Purity and Persecution in History*.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摩根索, H. ,《摩根索大使的故事》(Morgenthau, H. 1918.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Garden City, N. Y. : Doubleday, Page & Co.)

默蒂尔, A. ,《向右转: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起源及发展》(Motyl, A. 1980. *The Turn to the Right: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Ukrainian Nationalism, 1919—192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米勒, J. ,《平庸的族群战争》(2000. Mueller, J. 2000. "The Banality of 'ethnic war.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穆勒-希尔, B. ,《谋杀的科学:科学挑选犹太人、吉普赛人等进行清除, 1933—1945》(Müller-Hill, B. 1988. *Murderous Science: Elimination by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Jews, Gypsies and Others, Germany 1933—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穆夏尔, B. ,《德国一般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及对犹太人的迫害》(Musial, B. 1999. *Deutsche Zivilverwaltung und Judenverfolgung im Generalgouvernemen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纳吉-塔拉维拉, N. ,《拉斯洛·安德烈:匈牙利最后解决方案的先驱》(Nagy-Talavera, N. 1997. "Laszlo Endre: The Frontrunner of the Final Solution in Hungary," in Braham & Pok [eds.],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奈马克, N. ,《仇恨之火:20世纪欧洲的种族清洗》(Naimark, N. 2001.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纳迪尼, L. ,《季索总理的政治纲领》(Nardini, L. 1983. "The Political Programme of President Tiso," in S. Kirschbaum [ed.]. *Slovak Politics*. Cleveland: The Slovak Institute.)

纳什, G. ,《红,白,黑:北美早期的民族》第三版。(Nash, G. 1992. *Red, White and Black: The Peoples of Early North America*,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Hall.)

内德爾斯基, N. ,《战时斯洛伐克:对种族民族主义与威权主义统治模式关系的

- 个案研究》(Nedelsky, N. 2001. "The Wartime Slovak State: A Case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Nationalism and Authoritarian Patterns of Governanc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7.)
- 内沙米特, S., 《纳粹占领下立陶宛的救援工作》(Neshamit, S. 1977. "Rescue in Lithuania Under the Nazi Occupation, June 1941—August 1944," in *Rescue Attempts During the Holocaust.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Yad Vashem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ference*. Jerusalem: Yad Vashem.)
- 纽伯里, C., 《高压之下:卢旺达的检查制度与族性, 1860—1960》(Newbury, C. 1988. *The Cohesion of Oppression: Clientship and Ethnicity in Rwanda, 1860—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卢旺达的族群与历史政治背景》(1998. "Ethnicity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in Rwanda." *Africa Today*, vol. 45.)
- 奈格, H., 《逃出杀人现场》(Ngor, H. 1988. *Surviving the Killing Fields*. London: Chatto & Windus.)
- 尼科尔斯, D., 《林肯与印第安人:内战时的政策与政治背景》(Nichols, D. 1978. *Lincoln and the Indians: Civil War Policy an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 尼伦伯格, D., 《暴力社区:中世纪时期对少数裔的迫害》(Nirenberg, D. 1996. *Communities of Violence: Persecution of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诺德霍尔特, H., 《暴力的系谱》(Nordholt, H. 2001. "A Genealogy of Violence."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Amsterdam/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 诺夫, A., 《斯大林主义受害者:知有多少?》(Nove, A. 1993. "Victims of Stalinism: How Many?" in Getty & Manning [eds.], *Stalinist Terror*.)
- 恩森吉马纳, N., 《卢旺达有市民社会吗?》(Nsengimana, N. 1995. "Qu'en est-il de la société civile rwandaise?" in Guichaoua [ed.], *Les crises politiques*.)
- 奥谢, S., 《完美的异端:阿尔比人充满革命性的生与死》(O'Shea, S. 2001. *The Perfect Heresy: The Revolutionary Life and Death of the Albigensians*. London: Profil Books.)
- 奥伯沙尔, A., 《南斯拉夫:从族群合作到暴力与战争》(Oberschall, A. 1998. "From Ethnic Cooperation to Violence and War in Yugoslavia." Unpublished paper.)
- 奥迪德, B., 《新亚述帝国的大规模驱逐以及被驱逐的妇女》(Oded, B. 1979. *Mass*

- Deportations and Deportees in the Neo - Assyrian Empire*. Wiesbaden: Dr. Ludwig Reichert.)
- 奥伦, N. ,《保加利亚例外:对拯救犹太社区的重新评估》(Oren, N. 1989. "The Bulgarian Exception: A Re - assessment of the Salva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Marrus [ed.], *The Nazi Holocaust*.)
- 非洲统一组织国际知名人士小组报告(2000.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IPEP Report. 2000. [Http://www.oau-org/document/ipep/report/rwanda-e](http://www.oau-org/document/ipep/report/rwanda-e))
- 奥思, K. ,《集中营党卫军:社会机构及传记研究》(Orth, K. 2000. *Die Konzentrationslager - SS. Sozial strukturelle Analysen und biographische studien*. Göttingen: Wallstein.)
- 奥图努, O. ,《对卢旺达爱国军发动的侵略的历史学分析》(Otunnu, O. 1999.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Invasion by the Rwandan Patriotic Army [RRA]," in Adelman & Suhrek [eds.], *The Path of a Genocide*.)
- 帕迪森, J. ,《焕然一新的世界:对淘金热之前的加州的第一手描述》(Paddison, J. 1999. *A World Transformed: Firsthand Accounts of California Before the Gold Rush*. Berkeley, Calif. : Heyday Books.)
- 帕纳伊, P. 编. ,《战时的少数群体》(Panayi, P. [ed.]. 1993. *Minorities in Wartime*. Oxford: Berg.)
- 帕里克, S. ,《宗教,居留地与暴动:印度种族冲突的政治背景》(Parikh, S. 1998. "Religion, Reservations and Riots: The Politics of Ethnic Violence in India," in Basu & Kohli [eds.], *Community Conflicts*.)
- 帕里斯, E. ,《附庸国克罗地亚的种族灭绝,1941—1945》(Paris, E. 1961. *Genocide in Satellite Croatia, 1941—1945*. Chicago: American Institute for Balkan Affairs.)
- 帕克, G. ,《三十年战争》(Parker, G. 1984. *The Thirty Years Wa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皮尔逊, R. ,《东欧少数民族》(Pearson, R. 1983. *National Minorities in Eastern Europe, 1848—1945*. London: Macmillan.)
- 佩雷斯 - 迪亚兹, V. ,《市民社会的回归》(Perez Diaz, V. 1993.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佩里克 - 齐莫尼奇, V. ,《巴尔干半岛为所欲为的罪犯们》(Peric - Zimonjic, V. 1998. "Criminals given a free hand in the Balkans." Available at [Http://www](http://www).

oneworld.org/ips2/mar98/balkans.html)

菲利普斯, G. ,《部落首领与挑战者:加州南部印第安人的抵抗与合作》(Phillips, G. 1975. *Chiefs and Challengers: Indian Re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rn California*.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人权医生. ,《科索沃的战争罪》(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1999. *War Crimes in Kosovo*. Boston; author.)

皮克, L. ,《越过地平线:与红色高棉在一起的5年》(Picq, L. 1989. *Beyond the Horizon: Five Years with the Khmer Rouge*. New York; St. Martin's.)

彼得罗夫斯基, T. ,《波兰的大屠杀》(Piotrowski, T. 1998. *Poland's Holocaust*. London; McFarland.)

派普斯, R. ,《俄国革命》(Pipes, R. 1991.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波尔, D. ,《纳粹在东加利西亚对犹太人的迫害》(Pohl, D. 1996. *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in Ostgalizien, 1941—1944*. München; Oldenbourg.)

《大屠杀研究与戈德哈根论文》(1997. "Die Holocaust - Forschung und Goldhagens Thesen. "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ol. 47.

波利奇尼, P. ,阿斯特, H. 编,《历史视野中的乌克兰与犹太人的关系》(Polichnyj, P. , & Aster, H. [eds.]. 1990. *Ukrainian - Jewish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monton, Alberta; 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

波拉特, D. ,《立陶宛的大屠杀》(Porat, D. 1994. "The Holocaust in Lithuania: Some Unique Aspects," In Cesarani [ed.],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波森, B. ,《安全困境与族群冲突》(Posen, B. 1993.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 *Survival*, vol. 35.)

波尔顿, H. ,《高层人物,无名之辈和新月旗:土耳其民族主义与土耳其共和国》(Poulton, H. 1997. *Top Hat, Grey Wolf and Crescent: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普兰, D. ,《柬埔寨杀人现场的孩子们:幸存者回忆录》(Pran, D. 1997. *Children of Cambodia's Killing Fields: Memoirs by Survivors*.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普拉萨德, R. 编,《米佐拉姆自治运动》(Prasad R. [ed.] *Autonomy Movements in Mizoram*. Delhi; Vikas.)

普雷蒂, L. ,《法西斯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Preti, L. 1974. "Fascist Imperialism

- and Racism," in R. Sarti [ed.], *The Ax Within: Italian Fascism in Action*.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 普罗克特, R. , 《种族卫生》(Proctor, R. 1988. *Racial Hygien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普鲁查, F. , 《安德鲁·杰克逊的印第安政策》(Prucha, F. 1994. " Andrew Jackson's Indian Policy: A Reassessment," in Hurtado & Iverson [eds.],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Indian History*.)
- 普鲁尼尔, G. , 《卢旺达危机: 种族灭绝历史》(Prunier, G. 1995.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London: Hurst.)
- 《卢旺达: 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1997. " Rwanda: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 <http://www.africanews.org/specials/glakes/prunier.html>)
- 普赖尔, Z. , 《两次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的发展》(Pryor, Z. 1973. " Czechoslovak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war Period," in V. Mamatory & L. Radomir [eds.], *A History of the Czechoslovak Republic, 1918—1948*.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旁遮普, R. , 《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种族政治》(Punjabi, R. 1984. " Communal Politics in Jammu and Kashmir State," in A. Engineer [ed.], *Communal Riots in Post - Independence India*. Bombay; Sangam Books.)
- 普西奇, V. , 《克罗地亚的民主斗争》(Pusic, V. 1997. " Croati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 *Revija za sociologiju*, vol. 28.)
- 普特南, R. , 《让民主发挥作用: 当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Putnam, R.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独自玩保龄球: 美国社会的崩溃与复活》(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拉布, T. 编, 《三十年战争: 动机, 程度及影响问题》(Rabb, T. [ed.] 1964. *The Thirty Years War: Problems of Motive, Extent and Effect*. Boston: D. C. Heath.)
- 拉布什卡, A. , 谢普斯尔, K. , 《多元社会的政治》(Rabushka, A. , & Shepsel, K. 1972. *Politics in Plural Societies*. Columbus, Ohio: Merrill.)
- 拉曼, M. , 《四分五裂的克什米尔: 印度的老问题, 新机遇》(Rahman, M. 1996. *Divided Kashmir: Old Problems, New Opportunities for India*.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 雷米特, S. P., 《巴尔干空想: 南斯拉夫的政治, 文化与宗教》(Ramet, S. P. 1992. *Balkan Bable: Politics,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Yugoslavia*. Boulder, Colo.: Westview.)
- 里德, W. C., 《流亡、改革与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崛起》(Reed, W. C. 1996. "Exile, Reform and the Rise of the Rwandan Patriotic Front." *Journal of Mos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4.)
- 杰拉尔·赖特林格, 《党卫军: 一个国家的完美借口, 1922—1945》(Reitlinger, G. 1968. *The SS: Alibi of a Nation 1922—1945*. New York: Viking Press.)
- 伦弗鲁, C., 《考古学与语言》(Renfrew, C. 1992. *Archeology and Language*. London: Cape.)
- 雷恩特珍, F., 《非洲大湖的危机》(Reyntjens, F. 1994. *L' Afrique des Grands Lacs en crise*. Paris: Karthala.)
- 《小房子, "陆军杀人小队" 与 "零网络" (1995. "Akazu, 'Escadrons de la mort' et autres 'Réseau Zero': Un historique des résistances au changement politique depuis 1990," in Guichaoua [ed.], *Les crises politiques*.)
- 《卢旺达: 种族灭绝及以后》(1996. "Rwanda: Genocide and Beyond."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vol. 9.)
- 里格斯, H., 《在亚美尼亚度过的悲惨岁月: 哈尔普特城堡的亲身体验》(Riggs, H. 1997. *Days of Tragedy in Armenia: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Harpoot, 1915—1917*. Ann Arbor, Mich.: Gomidas Institute.)
- 罗伯茨, P., 《都铎王朝的立法与 "英国语言" 的政治地位》(Roberts, P. 1997. "Tudor Legislation and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British Tongue,'" in Jenkins [ed.], *The Welsh Language*.)
- 乔治·鲁宾逊, G., 《新秩序之下亚齐省陷入混乱的起因》(Robinson, G. 1998. "Rawan Is as Rawan Does: The Origins of Disorder in New Order Aceh," *Indonesia*, vol. 66.)
- 《不问收益但求铁证: 追溯东帝汶暴力的起源》(2001a. "The Fruitless Search for a Smoking Gun: Tracing the Origins of Violence in East Timor."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UCLA.)
- 《人民的战争: 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的民兵》(2001b. "People's War: Militias in East Timor and Indonesia."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UCLA.)
- 罗杰尔, C., 《南斯拉夫的解体与波斯尼亚的战争》(Rogel, C. 1998. *The Breakup*

- of Yugoslavia and the War in Bosnia*.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 罗戈夫斯基,R. ,《纳粹地方长官与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起源》(Rogowski, R. 1977. "The Gauleiter and the Social Origins of Fasc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9.)
- 罗德,D. ,《最后阶段:斯雷布雷尼察的背叛与陷落——二战以来最惨烈的屠杀》(Rohde, D. 1997. *Endgame: The Betrayal and Fall of Srebrenica, Europe's Worst Massacre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s.)
- 罗德,D. ,《印度尼西亚解体?》(Rohde, D. 2001. "Indonesia Unravelling?" *Foreign Affairs*, vol. 80.)
- 罗恩,J. ,《领土权与看似合理的推诿:波斯尼亚战争中的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Ron, J. 2000. "Territoriality and Plausible Deniability: Serbian Paramilitaries in the Bosnian War," in B. Campbell & A. Brenner[eds.], *Death Squads in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 St. Martin's.)
- 罗西诺,A. ,《毁灭性的冲动:德国士兵与征服波兰》(Rossino, A. 1997. "Destructive Impulses: German Soldiers and the Conquest of Poland."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vol. 11.)
- 罗思,N. ,《改宗者,宗教裁判所以及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的经过》(Roth, N. 1995. *Conversos, Inquisition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from Spai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罗思柯琴,L. ,《“独立”斯洛伐克时期的梵蒂冈政策与“犹太人问题”》(Rothkirchen, L. 1989. "Vatican Policy and the 'Jewish Problem' in 'Independent' Slovakia (1939—1945)," in M. Marrus[ed.], *The Nazi Holocaust, 4: The "Final Solution" Outside Germany*. Westport, Conn. , Meckler.)
- 罗思柴尔德,D. ,《定居点恐怖与后协定时期的稳定》(Rothschild, D. 2002. "Settlement Terror and Post - Agreement Stability," in Stedman et al. [eds.], *Ending Civil War*.)
- 罗利,C. ,《土著社会的消亡》(Rowley, C. 1970. *The Destruction of Aboriginal Societ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拉梅尔,R. ,《民主灭绝:纳粹种族灭绝行动与大屠杀》(Rummel, R. 1992. *Democide: Nazi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 《政府致死》(1994. *Death by Government*.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 《民主灭绝统计:1900 以来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1998. *Statistics of Democide*: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 Muenster: LIT.)

萨布林, B. 编, 《杀人同盟: 纳粹 - 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合伙实施种族灭绝》
(Sabrin, B. [ed.] 1991. *Alliance for Murder: The Nazi - Ukrainian Nationalist
Partnership in Genocide*. New York: Sarpedon.)

萨福里安, H. , 《艾希曼之流》(Safrian, H. 1993. *Die Eichmann - Männer*. Wien:
Europaverlag.)

萨格瓦里, A. , 《他们是受命行事吗?》(Sagvari, A. 1997. "Did They Do It Under
Orde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ange of Guard and Law - Abiding Citizens in
1944" [in Magyar], in Braham & Pok [eds.],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桑德库勒, T. , 《加利西亚的“绝唱”》(Sandkühler, T. 1996. "*Endlösung*" in *Gali-
zien*. Bonn: Dietz.)

萨拉芬, A. , 《纸上跟踪: 美国国务院与亚美尼亚暴行委员会报告》(Sarafian, a.
1994. "The Paper Trail: The American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Report of Com-
mittee on Armenian Atrocities." *Revue du Monde Arménien*, vol. 1.)

索拉特, S. , 《毛拉纳·毛杜迪》(Saulat, S. 1979. *Maulana Maududi*. Karachi: Inter-
national Islamic Publishers.)

斯卡里特, J. ,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种族冲突与权力争夺》(Scarritt, J. 1993.
"Communal Conflict and Contention for Power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in
T. Gurr [ed.], *Minorities at Risk: A Global View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Wash-
ington, D. C. ; U. S. Institute of Peace.)

沙夫, M. , 《巴尔干正义》(Scharf, M. 1997. *Balkan Justice*. Durham, N. C. ;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谢赫特曼, J. , 《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Schechtman, J. 1989. "The Transnistria
Reservation," in Marrus [ed.], *The Nazi Holocaust*.)

谢赫特曼, B. , 《战后欧洲的人口转变, 1945—1955》(Schechtman, B. 1962. *Postwar
Population Transfers in Europe, 1945—1955*.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
vania Press.)

沃尔特·舍伦贝格, W. , 《舍伦贝格回忆录》, L. 哈根编. (Schellenberg, W.
1956. *The Schellenberg Memoirs*, ed. L. Hagen. London: Andre Deutsch.)

施密特·哈特曼, E. , 《人民民主: 19 世纪末一个捷克政治概念的诞生》
(Schmidt-Hartmann, E. 1988. "People's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a Czech
Political Concep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S. Kirschbaum [ed.], *East*

European History. Columbus, Ohio: Slavica.)

施密特, K. , 《斯洛伐克共和国宪法》(Schmidt, K. 1983.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lovak Republic, 1939—1945," in S. Kirschbaum [ed.], *Slovak Politics*. Cleveland: The Slovak Institute.)

斯科菲尔德, V. , 《双面夹攻中的克什米尔》(Schofield, V. 1996. *Kashmir in the Crossfire*. London: L. B. Taurus.)

舒尔茨, B. , 《津巴布韦的政治变迁与族群冲突管理》(Schutz, B. 1990.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Management of Ethnic Conflict in Zimbabwe," in Montville [ed.], *Conflict and Peacemaking*.)

施瓦茨, G. , 《纳粹集中营妓院的党卫军女看守(1933—1945)》(Schwarz, G. 1994. "SS-Aufseherinnen 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n [1933—1945]." *Dachauer Hefte*, vol. 10.)

西格夫, T. , 《邪恶的士兵》(Segev, T. 1987. *Soldiers of Evil*. New York: McGraw-Hill.)

塞弗特, R. , 《战争与强奸: 初步分析》(Seifert, R. 1994. "War and Rap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in A. Stiglmeier [ed.], *Mass Rape: The War Against Women in Bosnia-Herzegovina*. Omah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塞库里克, D. , 斯波勒, Z. , 《克罗地亚政权获得的支持》(Sekulic, D. , & Sporer, Z. 1997. "Regime support in Croatia." *Revija za sociologiju*, vol. 28.)

塞尔斯, M. , 《泄露秘密的桥: 波斯尼亚的宗教与种族灭绝》(Sells, M. 1996. *The Bridge Betrayed: Religion and Genocide in Bosnia*.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学院, 《备忘录》(Serbian Academy of Sciences & Arts. 1986 (1999 English ed.). *Memorandum*. Belgrade: author/GIP "Kultura.")

塞雷尼, G. , 《走进黑暗: 从安乐死到大屠杀》(Sereny, G. 1974. *Into That Darkness: From Mercy Killing to Mass Murd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塞洛卡, J. , 帕夫洛维奇, V. 编, 《南斯拉夫的悲剧》(Seroka, J. , & Pavlovic, V. [eds.]. 1993. *The Tragedy of Yugoslavia*. New York: M. E. Sharpe.)

肖, S. , E. ,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与当代土耳其, 第二卷: 改革, 革命与共和国: 当代土耳其的诞生》(Shaw, S. , & E. 1977.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Reform, Revolution, and Republic: The Rise of Modern Turkey, 1808—197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希恩, B., 《灭绝的种子: 杰弗逊式的慈善和美国印第安人》(Sheehan, B. 1973. *Seeds of Extinction: Jeffersonian Philanthropy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希拉, M., 《附庸国克罗地亚的种族灭绝》(Shelah, M. 1990. "Genocide in Satellite Croatia," in Berenbaum[ed.], *A Mosaic of Victims*.)
- 申菲尔德, S., 《切尔克斯人: 被遗忘的种族灭绝?》(Shenfield, S. 1999. "The Circassians: A Forgotten Genocide?" in M. Levene & P. Roberts[eds.], *The Massacre in History*. Oxford: Berghahn.)
- 希拉吉恩, A., 《遗产: 一名亚美尼亚爱国者的回忆录》(Shiragian, A. 1976. *The Legacy: Memoirs of an Armenian Patriot*. Boston: Hairenik Press.)
- 希斯勒, H., 《两个帝国之间: 艾哈迈德·阿奥卢与新土耳其》(Shissler, H. 2003. *Between Two Empires: Ahmet Agaoglu and the New Turkey*. London: Tauris.)
- 西伯, I., 《民族主义、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取向对克罗地亚多党选举的影响》(Silber, I. 1993. "The Impact of Nationalism, Values and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on Multi-Party Elections in Croatia," in Seroka & Pavlovic[eds.], *The Tragedy of Yugoslavia*.)
- 西卡维卡, S., 《军队的崩溃》(Sikavica, S. 1997. "The Army's Collapse," in Udovicki & Ridgeway[eds.], *Burn This House*.)
- 西尔伯, L., 利特尔, A., 《南斯拉夫之死》(Silber, L., & Little, A. 1995. *The Death of Yugoslavia*. London: BBC Books.)
- 辛格, J., 斯莫尔, M., 《战争的报酬, 1816—1965》(Singer, J., & Small, M. 1982. *Wages of War, 1816—1965*. Ann Arbor, MI: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 斯利温斯基, M., 《红色高棉的种族灭绝行为: 人口学分析》(Sliwinski, M. 1995. *Le Génocide Khmer Rouge: Une analyse démographique*. Paris: L' Harmattan.)
- 斯梅德利, A., 《北美的种族》(Smedley, A. 1993. *Race in North America*. Boulder, Colo.: Westview.)
- 斯梅尔策, R., 《苏台德问题: 1933—1938》(Smelser, R. 1975. *The Sudeten Problem: 1933—1938*. Folkeston: Dawson.)
- 史密斯, A., 《国家的民族起源》(Smith, A.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历史上的国家: 关于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史学辩论》(2000. *The Nation in Histo-*

- ry: *Historiographical Debates About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民族主义》(2001. *Nationalism*. Oxford: Polity.)
- 史密斯, L., 《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口》(Smith, L. 1980. *The Aboriginal Population of Australi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史密斯, R., 《人类的破坏性与政治: 二十世纪, 种族灭绝的时代》(Smith, R. 1987. "Human Destructiveness and Politics: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an Age of Genocide," in I. Walliman & Dobkowski [eds.], *Genocide in the Modern Age*. New York: Greenwood.)
- 《国家权力与种族灭绝意图》(1997. "State Power and Genocidal Intent,"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斯奈德, J., 《从选举到暴力: 民主化与民族冲突》(Snyder, J. 2000.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 Conflict*. New York: Norton.)
- 索查特, A., 《犹太人、立陶宛人与俄罗斯人, 1939—1941》(Sochat, A. 1974. "Jews, Lithuanians and Russians, 1939—1941," in B. Vago & G. Mosse [eds.], *Jews and Non-Jews in Eastern Europe 1918—1945*. New Brunswick, N. J. : Transaction.)
- 沃尔夫冈·索夫斯基, W., 《恐怖的秩序: 集中营》(Sofsky, W. 1997. *The Order of Terror: The Concentration Camp*.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索伦伯格, M., 沃伦斯坦, P., 《主要的武装冲突模式》(Sollenberg, M., & Wallenstein, P. 2001. "Patterns of Major Armed Conflicts, 1990—2000," in *Stockholm Institute of Peace Research Yearbook*, Appendix 1 A. Stockholm: Authors.)
- 斯佩克特, S., 《沃利尼亚犹太人大屠杀, 1941—1944》(Spector, S. 1990. *The Holocaust of Volhynian Jews 1941—1944*. Jerusalem: Yad Vashem.)
- 斯坦纳德, D., 《美国大屠杀: 新大陆的征服》(Stannard, D. 1992. *American Holocaust: The Conquest of the New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帝国普查, 《1933 年人口普查》(Statistische Reichsamt. 1935. *Volkzählung die Bevölkerung*, 1933. Berlin: author.)
- 斯托布, E., 《恶之根: 种族灭绝及其他群体暴力的起源》(Staub, E. 1992. *The Roots of Evil: The Origins of Genocide and Other Group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斯蒂芬·斯特德曼, 《导读》(Stedman, S. 2002. "Introduction," in S. Stedman et al.

[eds.], *Ending Civil Wa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ace Agreements*.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斯蒂芬·斯特德曼等编,《终止内战:和平协定的执行》(Stedman, S., et al. [eds.] 2002. *Ending Civil Wa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ace Agreements*.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斯坦, G. , 《武装党卫军:战争中的希特勒精英卫队》(Stein, G. 1966. *The Waffen-SS: Hitler's Elite Guard at War, 1939—1945*.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乔纳森·施坦伯格,《拥有一切还是一无所有:轴心国与大屠杀,1941—1943》(Steinberg, J. 1990. *All or Nothing: The Axis and the Holocaust 1941—43*. London: Routledge.)

《种族灭绝的类型? 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1941—1945》1994. “Types of Genocide? Croats, Serbs and Jews, 1941—45,” in Cesarani [ed.], *The Final Solution: Origins and Implem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斯蒂格梅耶, A. , 《群体强奸:波黑针对妇女的战争》(Stiglmayer, A. 1994. *Mass Rape: The War Against Women in Bosnia-Herzegovin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斯蒂特科瓦奇, E. , 《克罗地亚:第一次战争》(Stitkovac, E. 1997. “Croatia: The First War,” in Udovicki & Ridgeway [eds.], *Burn This House*.)

斯托达特, P. , 《奥斯曼政府与阿拉伯人,1922—1918》(Stoddart, P. 1963, *The Ottoman Government and the Arabs, 1922—1918*.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斯特拉德, T. , 《纳粹德国工业中的犹太劳工:以大众汽车为例》(Straede, T. 1999. “Jewish Slave Labor in Nazi German Industry: The Case of Volkswage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enter for European and Russian Studies, UCLA, January 28, 1999.)

斯特劳斯, S. , 《种族灭绝的秩序:卢旺达的种族、权力与战争》(Straus, S. 2004. “The Order of Genocide: Race, Power and War in Rwand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斯特赖特, C. , 《没有战友:1941—1945年的德国国防军和苏联战俘》(Streit, C. 1978. *Keine Kamaraden. Die Wehrmacht und die sowjetischen Kriegsgefangenen 1941—1945*.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 斯特默, H. ,《君士坦丁堡的两年战争岁月》(Stuermer, H. 1917. *Two War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
- 萨迪蒂奇, C. ,《血与仇:波斯尼亚一个家庭的战争经历》(Sudetic, C. 1998. *Blood and Vengeance: One Family's Story of the War in Bosnia*. New York: Norton.)
- 休格, P. ,《结论》(Sugar, P. 1971a. "Conclusion," in Sugar [ed.], *Eastern European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休格, P. 编,《20世纪东欧的民族主义》(Sugar, P. [ed.] 1971b. *Eastern European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hington, D. C. ;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
- 森斯坦, C. ,《协商困难? 群体为何走向极端》(Sunstein, C. 2000. "Deliberative Trouble? Why Groups Go to Extremes." *Yale Law Journal*, vol. 109.)
- 森尼, R. ,《帝国与民族: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与奥斯曼帝国的终结》(Suny, R. 1998. "Empire and Nation: Armenians, Turk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Armenian Forum*, Vol. 1.)
- 西德诺, C. ,《专事灭绝的士兵:党卫军的骷髅师部队,1933—1945》(Sydnor, C. 1977. *Soldiers of Destruction: The SS Death's Head Division, 1933—1945*.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西奈, M. ,《匈牙利政府对犹太人问题的策略,1936—1945》(Szinai, M. 1997. "The Politics of Hungarian Governments on the Jewish Question, 1936—1945." [in Magyar], in Braham & Pok [eds.],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 西塔, S. ,《被强迫在匈牙利西部边境要塞劳动的匈牙利犹太人,1944—1945》(Szita, S. 1990. "The Forced Labor of Hungarian Jews at the Fortification of the Western Border Regions of Hungary, 1944—1945," in R. Braham [ed.], *Studies on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施耐德, M. ,《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反犹太主义与种族主义法律》(Sznajder, M. 1995. "The Fascist Regime, Anti-Semitism and the Racial Laws in Italy," in Wistrich & DellaPergola [eds.], *Fascist Antisemitism and the Italian Jews*. Jerusalem: Vidal Sassoon International Center.)
- 坦比亚, S. ,《南亚的种族民族主义冲突与集体暴力》(Tambiah, S. 1996.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特克, N. ,《身陷狮穴:奥斯瓦尔德·鲁弗森的一生》(Tec, N. 1990. *In the Lion's*

Den: The Life of Oswald Rufei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泰韦斯, F., 《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Teiwes, F. 1987. “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 in R. McFarquar & J.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蒂本, C., 《暴力的历史起源》(Thibon, C. 1995. “ Les origines historique de la violence,” in Guichaoua [ed.], *Les crises politiques*.)

西恩, S., 《高棉共产主义运动年表, 1940—1982》(Thion, S. 1983. “ Chronology of Khmer Communism, 1940—1982,” in Chandler & Kiernan [eds.],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保卫柬埔寨》(1993. *Watching Cambodia*. Bangkok: White Lotus.)

托马斯, H., 《征服: 蒙特苏马, 科尔特斯及旧墨西哥的灭亡》(Thomas, H. 1993. *Conquest: Montezuma, Cortes and the Fall of Old Mexico*.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汤普森, M., 《纸房子: 南斯拉夫的解体》(Thompson, M. 1992. *A Paper House: The Ending of Yugoslavia*. London: Hutchinson.)

《1994. 煽风点火, 制造战争: 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的媒体》(1994. *Forging War: The Media in Serbia, Croatia and Bosnia-Hercegovina*. Article 19. London: International Centre Against Censorship.)

汤普森, T., 《以色列民族早期历史》(Thompson, T. 1992. *Early History of the Israelite People*. Leiden: Brill.)

索顿, R., 《美国印第安人大屠杀及其幸存者: 1492 年以来的人口史》(Thornton, R. 1997. *American Indian Holocaust and Survival: A Population History Since 1492*.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瑟斯顿, R., 《斯达汉诺夫运动: 工厂大清洗的背景, 1935—1938》(Thurston, R. 1993. “ The Stakhanovite Movement: The Background to the Great Terror in the Factories, 1935—1938,” in Getty & Manning [eds.], *Stalinist Terror*.)

托马西克, D., 《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Tomasic, D. 1946. “ Nationality Problems in Yugoslavia.”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vol. 6.)

《纽伦堡军事法庭上的战犯审讯》, 十五卷. (1946—1949. *Trials of the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15 vols. 1946—1949.)

布鲁斯·特里杰, 《早期北美土著居民对与欧洲人接触的反应》(Trigger, B.

- politicide 政治灭绝 16—17, 71, 186
 Assyrian ~ 和亚述人 40—41
 in Burundi ~ 在布隆迪 438
 in Cambodia ~ 在柬埔寨 340, 341
 in China ~ 在中国 337
 in Ethiopia ~ 在埃塞俄比亚 309, 310
 in Indonesia ~ 印度尼西亚 497
 in Ottoman Empire ~ 在奥斯曼帝国 144, 148
 in Rwanda ~ 在卢旺达 430, 431, 440
 of Serbs 塞族人的 ~ 296
 in Yugoslavia ~ 在南斯拉夫 357
- Pomaks 保加利亚穆斯林 307
- Pomiankowski, Vice-Marshal 波米亚科斯基少将 133
- “populace, the” 普通百姓 56
- population 人口
 exchanges ~ 的交流, 交换 15
 exchanges, in Greater Serbia ~ 的交流, 交换, 在大塞尔维亚 359
 in the Holy Roman Empire ~ 在神圣罗马帝国 48
 transfers ~ 的转让 354
- Porsche 波西亚 249
- Portugese 葡萄牙人 71
- Potocari 波托卡里 395
- power 权力
 biological 生物的 ~ 74, 75
 economic 经济的 ~ 30—32, 38—39, 71—72
 ideological 意识形态的 ~ 30, 37—38, 74
 military 军事的 ~ 32, 39, 74, 96
 networks, and ethnic cleansing ~ 网络, ~ 和种族清洗 30
 political 政治的 ~ 32, 39—40, 72—74
 social, sources of 社会的, ~ 来源 6, 37—40
- pre-Columbian Indians 前哥伦布印第安人口 76
- Prejedor 普里耶多尔 403, 418

- Proctor, R. (1988) 普罗克特 215
- professional ideologists 职业意识形态工作者 75
- “proletarian nation” 无产阶级民族 62
- Hutu as a 胡图人作为 ~ 431
- proletariat 工人阶级 4
- protectorates 受保护地 73, 80
- Protestant Scots, 15 又见 Scots 新教苏格兰人
-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犹太人贤士议定书》66
- Provincals 普罗旺斯人 14
- Prucha, F. (1994) 普鲁查 93
- Prunier, G. 普鲁尼尔, (1995), 442, (1997a), 434
- Prussian Germany 普鲁士德国 181
- expansion in ~ 的扩张 182
- “psychology of hard times” 艰难时代心理学 219, 223
- “psychosis of disappearance” 灭绝恐慌症 133
- Punjab 旁遮普 485
- “purge,” 32506 清洗
- qital 战斗 518
- Quakers 贵格会 86
- Qur'an 《古兰经》513—514
- Rabushka A., and K. Shepsle 拉布什卡和谢普斯尔 (1972), 24
- race 种族 85
- racial-genetic notions of human progress 人类进步的种族 - 基因理解观 180
- Rademacher, Franz 弗朗兹·拉德梅策尔 248
- Radical elites 激进派精英 8—9
- Radical Republicans (France) 激进共和党 62
- radicalization 激进化 503
- of “ordinary Germans” ~ 的“普通德国人” 206—208
- Rahami Bey 雷哈米贝伊 159
- “RAM.” 拉姆 见 Milosevic, Slobodan, Plan C for Serbia

- Ramet, S. P. (1992) 雷米特 420
- Ramsey, Governor 拉姆齐州长 91, 94
- rape, 80, 102, 136, 152, 166, 287, 357—358, 420—421, 422, 462, 463, 481, 528。又见 abuse, gender 强奸
- Ras-ul-Ain 拉苏尔艾恩 171
- Rasch, Otto 奥托·雷斯赫 268
- Rashtra 拉喜特拉(库塔) 474
- Raskovic, Jovan 乔文·拉斯科维奇 380, 384, 387, 388
- “ratio of representation” 代表性比率 223
-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理性选择理论 23, 24, 26
- rationality 理性
- instrumental 工具 ~ 188
 - value 价值 ~ 188
- Rauca, Sergeant Helmut 赫尔姆特·劳卡中士 265
- Ravens 乌鸦 287
- Raw Nazis 新纳粹 235, 237—239
- Raznatovic Zeljko 泽利科·拉兹纳托维奇 404
- Red Berets 红色贝雷帽 390, 394
- “redemptive anti-Semitism” 救赎性的反犹主义 192
- Refi, Kerim 克里姆·雷法 160
- refugee camps/associations 难民营/支援协会 196—197
- refugees 难民 67—68, 223—228
- Regat 利加塔 305, 306
- Reichenau, General 赖歇瑙上将 273
- Reichl-Kir 赖克尔-柯 384, 388
- Reichleitner, Franz 弗朗兹·赖克莱特纳 260
- Reichstag 帝国议会(德国国会) 62
- Reinecke, General 赖内克上将 273
- Reitlinger, G. (1968) 杰拉尔德·赖特林格 263
- religion 宗教 37—38
- salvation religions 救世 宗教 42—45, 57
- religious warriors 宗教战士 518—521

- Removal Act of 1830 1830年清除法案 93
- Renfrew, C. (1972) 伦弗鲁 35
- Renno, Georg, Dr. 乔盖·雷诺博士 205
- repression 镇压
- exemplary 儆戒性的 ~ 16, 77, 99, 509
 - exemplary, in America 儆戒性的 ~ 在美国 94, 96, 98
 - exemplary, in the Caucasus 儆戒性的 ~ 在高加索地区 113
 - exemplary, in Ethiopia 儆戒性的 ~ 在埃塞俄比亚 309
 - exemplary, in Indonesia 儆戒性的 ~ 在印度尼西亚 494
 - exemplary, in Ireland 儆戒性的 ~ 在爱尔兰 50, 51
 - exemplary, in the Ottoman Empire 儆戒性的 ~ 在奥斯曼帝国 113, 147, 148
 - exemplary, in Yugoslavia 儆戒性的 ~ 在南斯拉夫 357
- policed 治安性的 ~ 15
- policed, in Rwanda 治安性的 ~, 在卢旺达 435
 - policed, total cultural 治安性的 ~, 在总的文化上的 15
 - selective, in the Ottoman Empire 选择性的 ~, 在奥斯曼帝国 130, 131
 - selective, of jews 选择性的 ~, 对犹太人 185
 - selective policed 治安选择性的 ~ 15
 - selective policed, in Cambodia 治安选择性的 ~, 在柬埔寨 341
 - selective policed, in China 治安选择性的 ~, 在中国 337
 - selective policed, under Stalinism 治安选择性的 ~, 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 323
- Republic of Herceg-Bosnia 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共和国 408, 409, 410
- Republika Srbska 斯普斯卡共和国 393, 395
- Resid, Dr. 雷西德博士 172
- Reuter, Paul 保罗·路透 205
- “Revenge Operations” 报复行动 275
- “revenge-people” 复仇一族 347
- Revolutionary Fascist Party 革命法西斯党 311
- callous 冷酷无情 320
 - mistaken 错误的 ~, 弄错的 ~ 15, 88, 319, 320, 336
- Reyntjens, F. (1996) 雷恩特珍 442
- Reza, Atif 阿提弗·雷扎 144

- Rhineland Missionary Society 莱茵兰传信会 100
- Riggs, Reverend 里格斯 168
- “riot circle” 暴乱周期(循环) 475—481
- riots, escalating 暴乱,升级 481—482, 499—501
- Ritz, Lieutenant Hans 汉斯·里茨 266
- Robinson, George 乔治·鲁宾逊 83
- Röhm, Ernest 厄恩斯特·罗姆 197, 201
- Rohde, D. (2001) 罗德 494—495
- Rohrbach, Dr. Paul 保罗·罗尔巴克博士 101—102, 105, 107
- Roman Senate 罗马参议院 39
- Romania 罗马尼亚 112, 302—307
- Iron Guard in ~ 的铁卫军 282
- Plan A in ~ 的 A 计划 303
- Romanov Empire 罗曼诺夫帝国 112
- Romans 罗马人 16
- Rome 罗马 36, 39
- Ron, J. 罗恩(2000), 393
- Roosevelt, Theodore, vii 西奥多·罗斯福 94
- Rosenberg 罗森博格 198
- Ross 罗斯 51
- Roth 罗思 N. (1995), 45
- Rowley, C. 罗利(1972), 81, 83
- RPF 法兰西人民联盟 440 441, 443, 466, 470
- RSHA 帝国中央保安局 243
- RSK 见 Serb Republic of Krajina 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
- RSS 全印志愿者组织 480, 481, 483, 485
- RTL M 千丘电台 469
- Rugova, Ibrahim 易卜拉欣-鲁戈瓦 387
- Ruhengeri 鲁亨盖里 436, 447, 453
- Rummel, R. 拉梅尔(1994), 22
- Rupert, Prince 鲁珀特王子 52
- Rusengeri 鲁亨盖里 443

Russians 俄罗斯人 273

Rutaganda, George 乔治·卢塔干达 461—462

Ruzindana, Obed 奥贝德·鲁津达纳 460

Rwanda 卢旺达 6, 430, 473

African Rights (1994) report on ~ 的非洲人权(1994)报告 449

army death squads in ~ 陆军杀手小队 447

Belgian colonial rule in 在~的比利时殖民统治 433

casualties in 在~的伤亡 430

and the “cult of obedience” ~ 和服从崇拜 468—469

destabilizing pressures in ~ 失去稳定的压力 438—442

French influence in 在~的法国影响(力) 449

Human Rights Watch (1999) report on 关于~的人权观察委员会报告 449

international pressures on 在~的国际压力 439—442

mass media in 在~的大众传播媒介 444

massacre of 1959 在~的屠杀,惨案 438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on (2000) report on 在~的非洲统一组织报告 449

paramilitaries in ~ 的准军事部队 446

Plan A in ~ 的 A 计划 442

premeditated genocide in ~ 有预谋的种族灭绝 442—448

refugees from 来自~的难民 430

sources documenting genocide in ~ 记录种族灭绝的文件 449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 for ~ 结构调整项目 439

Tutsi invasion of 1990 图西族入侵~ 439

two economies in 在~的两种经济 459

U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在~的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 450

U. S. influence in 在~的美国影响(力) 449

youth groups in 在~的青年团体 445—446

S - 21 吐斯廉监狱 346—347, 348—349

SA, the 冲锋队 197—198

Sabrin, B 萨布林(1991), 189, 290

Sachsenhausen, 200 萨克森豪森

- Safa, Ismael 伊斯梅尔·萨法 161
- Safrian, H. 萨福里安(1993), 215
- Sakir, Dr. Bahaeddin 巴哈伊丁·萨柯博士 144
- Salo 萨洛 311
- Salonika 萨洛尼卡 127
- salvation religions 救世宗教 513
- Samiti 萨米提 481
- Sanborn, General 桑伯恩将军 97
- Sand Creek 桑德河 98
- Sandberger, Dr. Martin 马丁·桑德伯格 269
- Santee Sioux Indians 苏族印第安人联盟中的桑蒂人 91
- Santic, Ivan 伊万·桑蒂克 411
- Santic,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桑蒂克 414
- Sarajevo 萨拉热窝 385
- Savic, Dinko 丁科·萨维奇 296—297, 421
- Scarrit, J. 斯卡里特(1993)
- Schacht 沙赫特 193
- Scharf, M. (1997) 沙夫 418
- Schechtman, J. 谢克特曼(1962), 354
- Schellenberg, Walter 沃尔特·舍伦贝格 203—204
- Scherpe, Herbert 赫尔伯特·谢尔普 253
- Schlieffen, Chief of Staff von 冯·施利芬总参谋长 104, 106
- Schonerer 舍内雷尔 63
- Schroeder, Kurt 库尔特·施罗德 249
- Schulz, Erwin 欧文·舒尔茨 268
- Schwammberger, Josef 约瑟夫·施万伯格 254
- Scots, 11 又见 Protestant Scots 苏格兰人
- Scott, Winfield 温菲尔德·斯科特 94
- SD, the 党卫军保安处 202—204
officers in 1945 ~ 官员 217—218
- SDA 波黑穆斯林民主行动党 407
- SDB 见 Serb Security Police 塞尔维亚秘密警察

- SDP 社会民主党 380
- secularism 世俗主义 510
- security dilemma 安全困境 24
- Segev, T. 西格夫 (1987), 215
- segregation 隔离 14, 72
- in America ~在美国 88, 90, 96
 - in Australia ~在澳大利亚 82
 - in Ethiopia ~在埃塞俄比亚 310
 - of Germans 德国人的 ~ 185
 - of Jews 犹太人的 ~ 193
 - of Poles 波兰人的 ~
 - in South West Africa ~在西南非洲 100
 - of Soviet Slavs 苏联斯拉夫民族的 ~ 186
- Self-Defense Force 自卫部队 283
- Semanza, Laurent 劳伦特·西门扎 455
- Semites, Middle Eastern 闪米特人, 中东 35
- Sennacherib 西拿基立 40
- September 11, 2001 9·11 事件 3
- Serafinowicz, Szymon 塞拉菲诺威茨 287
- “Serb Adolf, the.” 见 Jelusic, Goran 塞尔维亚的阿道夫
- Serb nationalist parties 塞尔维亚民族党 389
- Serb Radical Party 塞尔维亚激进党 392
- Serb Republic of Krajina (RSK) 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 387
- Serb Security Police (SDB) 塞尔维亚秘密警察 374
- Serbia 塞尔维亚 112, 363, 366, 376, 379, 390—405
-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in 族群自我认同 363
- Serbian Guard 塞尔维亚卫兵 392
- Serbian National Council 塞尔维亚国民委员会 387
- Serbian Renewal Party 塞尔维亚复兴党 388
- Serbian Volunteer Guard 塞尔维亚志愿卫队 392
- Serbs 塞尔维亚人(塞族人) 10, 16, 18, 19—20, 274
- precani 住在其他共和国的 ~ 363—364, 365

- Serushago, Omar 奥马尔·塞拉沙戈 454
- Seselj 舍舍利 367, 380, 391, 392
- settler, democracy 殖民者民主 107, 108—110
- Shakir, Dr. 谢科博士 160
- shari'a 伊斯兰教法(或沙里亚) 513—514
- Shastri, Professor Kesharram 克沙拉姆·沙斯特教授 484
- Sheridan, General 谢里登将军 96, 97
- Sherman, General William Tecumseh 威廉·特库姆塞·舍曼将军 92, 96—97, 109
- Shiragian 希拉吉恩 171
- Shiv Sena 湿婆神军(党) 480, 481, 483
- “Shoah.” 大屠杀 见“Final Solution”
- Sholokhov, Mikhail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 324
- Shukru 舒克鲁 157
- Shukru Bey 舒克鲁贝伊 161
- Shulgin 舒尔金 66
- Siber, I. (1993) 西伯 367
- Sibley, General 西布莉将军 91
- Sikavica 西卡维卡 392
- Sikh jathas 锡克教 485
- Silica 西里卡 411
- Simpson, Sir George 乔治·辛普森爵士 88
- Sindikubwabo, President Theodore 西奥多·辛迪古布瓦博总统 456
- Sioux Indians 苏人(达科他印第安人) 91, 94
- Slavka 斯洛伐克 415
- Slavonia 斯拉沃尼亚 357
- Slavs 斯拉夫人 185
-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布尔什维克革命 183
- in the Soviet Union ~在苏联 187
- Sliwinski, M. (1995) 斯利温斯基 342—343
- Slovakia 斯洛伐克 293—294
- 1938 Manifesto ~1938年宣言 294

- Plan A in ~ 的 A 计划 294
- Slovenia 斯洛文尼亚 367, 374, 376
-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in ~ 的种族自我认同 363
- Smircina, Lieutenant, 353 斯马西纳中尉
- Smith, A. (1986) A. 史密斯 19
- Smith, L. (1997) L. 史密斯 34, 36, 40, 71
- Snyder, J. (2000) 辛德 22
- Sobibor 索比堡 259
-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79, 81, 98, 180, 181
- Social Democrats (Germany) 社会民主党 63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510, 511—512
- Socialist Party (SPS) 社会党 370, 371, 372—373, 389, 391
- Socialists of the Chair (Germany) 讲坛社会主义者 62
- “societal paranoia” “社会妄想狂” 133
- societies, stag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社会中的历史发展阶段 121
- Sofsky, W. (1997) 沃尔夫冈·索夫斯基 216
- Sonderweg 特别路径 176
- Sorbians 索布人 185
- Sorge, Gustav 古斯塔夫·索格 196—197
- South Africa 南非 6, 14
- South West Africa 西南非洲 100
- Plan A in A 计划在 ~ 106
- Plan B in B 计划在 ~ 106
- Plan C in C 计划在 ~ 106
- sovereign claims 主权要求 382—383
- Soviet Union 苏联 186—188
- Plan A in A 计划在 ~ 322, 324
- Plan B in B 计划在 ~ 323
- Plan C in C 计划在 ~ 323
- Plan D in D 计划在 ~ 324
- Plan E in E 计划在 ~ 324
- Spain. 参见 Iberian Peninsula

- during the Inquisition 西班牙 46, 47
 and Plan A ~和A计划 77
- Spain (cont.) 西班牙(续)
 and Plan B ~和B计划 78
 unification of ~的统一 45—46
- “Special Organization.” 见 Teskilat - I Mahsusa 特别组织
- Spenser, Edmund 埃德蒙·斯宾塞 50
- SPS. 参见 Socialist Party 社会党
- Srebrenica 斯雷布雷尼察 356, 358, 395, 405, 417
- SRS 塞尔维亚激进党 391
- SS, The 党卫军 198—200
 Galician Division 党卫军第14武装掷弹兵师 290
- Stahlecker 斯塔莱克 269, 283, 284
-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321—330
 phases of ~阶段 322
- Stalinists 斯大林主义者 17
- Stange, General 施坦格将军 165
- Stangl, Franz 弗伦茨·斯坦戈尔 260—261, 262
- Stark, Johannes 约翰尼斯·斯塔克 254
- state elites 国家精英 21
- statists 中央集权论者 6
- Statute of Kilkenny (1366) 基尔肯尼法案 49
- Staub, E. (1992) 斯托布 219
- Stauffenberg family 施陶芬贝格家庭 250
- Stedman, S. (2002) 斯蒂芬·斯特德曼 527
- Steinberg, J. (1990) 乔纳森·施坦伯格 311
- “Stela.” 参见 Martinovic 斯特拉
- Strauch, Colonel 施特劳赫上校 251
- Straus, S. (2004) 斯科特·施特劳斯 449, 453, 463—464, 465, 466, 467, 469
-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结构调整项目 512
- Student, General 斯图登特将军 275

- Stuermer, H. (1917) 斯特默 123, 172, 174
- Suad, Ali 阿里·苏亚德 160
- Suchomel, Franz 弗朗兹·萨科迈尔 262
- Sudan 苏丹 429
- Sudetenland 苏台德区 227—228
- Sudetic 萨迪蒂奇 398—399
- “Sugarfoot Jack” 休格富特·杰克 98
- Sukru, Midhat 米德哈特·苏克鲁 144
- Sultania 萨尔坦尼亚 146
- Sumatra 苏门答腊(岛) 491
- Sunstein, C. (2000) 森斯坦 25
- superiority, ideologies of 优势地位,意识形态的 ~ 74—75
- suppression 压制
- cultural 文化 ~ 14, 17
 - cultural, in America 文化 ~ 在美国 87
 - cultural, in Romania 文化 ~ 在罗马尼亚 303
- Susak 苏沙克 386, 408
- Switzerland 瑞士 60
- syncretic religion 调和宗教 37
- Szalasi 绍洛西 302
- Szeged Idea 塞格德观念 300
- T₄ 动物园街4号 185, 204—205, 214, 241, 256—260
- Tadic, Dusko 达斯科·塔迪奇 401
- Tahsin Pasha 塔辛帕夏 147
- taifa 泰法 114
- Talaat Pasha 塔拉特帕夏 123, 129, 132, 141, 144, 148, 149—150, 154—155
- Tambiah, S. 坦比亚(1996)22, 466, 476, 477, 479, 481, (1998), 441
- Tamil Tigers 泰米尔猛虎组织 481
- Tanic 塔尼奇 396
- Tanzania 坦桑尼亚 428
- Tartars 鞑靼人 329

- Tasmania 塔斯马尼亚 82—83
- Taylor, Zachary 扎卡里·泰勒 94
- Tekinalp 特基纳尔普 131
- Tenochtitlan 特诺奇蒂特兰 77
- Tepeaca 特皮克 77
- terra nullius 未被任何国家并入辖区的区域 84
- Teskilat-I Mahsusa 特别组织 144, 164—167
- Teslic 特斯里奇 400
- Theo-democracy 神权民主 513, 514
- Theodoric, King 狄奥多里克国王 35
- Theresianstadt 特莱西恩施塔特 293
- Thion, S. 西恩(1983), 349, (1993), 341
- Third Spanish Republic (1930s) 西班牙第三共和国 60
-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三十年战争 48, 49
- T, S. 西(1983), 349, (1993), 341
- Thompson, T. (1992) 汤普森 380, 399
- “Three Mountains, the” 三座大山 348
- Thunder Cross 雷十字组织 282
- Tibet 西藏 338—339
- “cultural genocide” in ~ “文化种族灭绝” 338
- Plan A in ~ A 计划 339
- Plan C in ~ C 计划 339
- Tiso 季索 63
- Tito, Marshall 铁托元帅 366
- toleration 宽容, 容忍 13
- Tomasic, Professor 托马西克教授 354
- Topalovic, Musan 穆桑·托帕洛维奇 418
- Torkildsen 索吉尔德森 391
- Torquemada 托尔克马达 46
- Tothill, Colonel 托西尔上校 52
- trade 贸易 71
- Trail of Tears 眼泪小道 93

- Trapp, Major 特拉普少校 267, 270
- Trawnicki training camp 特劳尼克训练营 291
- Treaty of San Stefano (1878) 圣斯特法诺条约 117
- Treblinka 特雷布林卡 259
- triangle of tension 紧张三角 81
- tribute taking。见 plunder 征缴贡赋
- Trieste, in Italy 意大利的里雅思特 310
- Trifan, Valerian 瓦莱里安·特里凡 303—304
- Trigger, B. (1994) 布鲁斯·特里杰 74
- Tripura 特里普拉邦 489
- Trotha, General von 冯·特罗塔 104, 106, 107, 109
- Trumpener, U. (1968) 特朗普纳 158
- Tudjman 图季曼 367, 377—378, 379, 380, 388, 390, 407, 425, 426
- “Tula.” * 图塔参见 Naletilic
- Tuol - Sleng. 参见 S - 21 吐斯廉监狱
- Turan 图兰 132
- Turikinkiko 图里金基科 464, 466
- Turkish nationalism 土耳其民族主义 119—124
- Turkish refugees 土耳其难民 116
- Turks 土耳其人 6, 114—115, 307
- Turner, Colonel 特纳上校 275
- Tutsis 图西人 8, 10, 17, 430, 431, 432—448
- Udovicki, J. (1997) 亚斯明科·乌多维奇基 359
- Uganda 乌干达 439
- Ukraine 乌克兰 288—293, 327
- Plan A in ~ A 计划 288
- Plan B in ~ B 计划 288
- Plan C in ~ C 计划 289
- Ukrainian Auxiliary Police Battalions 乌克兰后备警察营 290

* 原书正文为“Tuta”，此处索引疑误。

- UN War Crimes Tribunals 联合国战争罪刑事法庭 527—528
- United States, 13, 83—98 同时参见 America 美国
- UNO, 305 联合国组织
- Untermenschen (德)下等人,劣等人 187, 272
- Ustasha 乌斯达沙 16, 294—298, 362, 363, 377, 379, 380, 386, 394, 404, 421
- utilitarian genocide 功利主义的种族灭绝 71
- Uwizeye, Prefect 省长乌韦泽耶 457, 459
- Vacuum domicilium 真空住所 84
- Vajpayee, Prime Minister Atal Behari 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总理 484
- Valencia 巴伦西亚 47
- Valenta, Anto 安托·瓦伦特 408, 411
- Value-rational action 价值理性行为 26, 88
- Van 凡城 147
- Vance-Owen Plan (1992) 万斯-欧文和平计划 391, 406, 410, 423
- Vaps 自由战士同盟 282
- Varshney, A. (2002) 瓦希尼 475, 478
- Vasiljevic, General 瓦西列维奇将军 394
- Veesenmayer, Edmund 埃德蒙·费森迈耶 245
- Vekic, Ivan 伊万·韦基奇 421
- Verbannung 放逐 191
- Vernichtung 毁灭 191
- Versailles 凡尔赛 67
- Vickery, M. (1983), 349 (1984), 347 维克里
- Virginia 弗吉尼亚 84
- Visnjica 维什尼察 406
- Visigoths* 35 西哥特人
- Vitez 维泰兹 385, 406, 408, 410
- Vitezi 维泰兹 409

* 正文是 Visigoths

- Vivitsky, B. (1990) 维维茨基 291
- “Voja Chetnik” 沃贾·切特尼克 398
- Vojvodina 伏伊伏丁那 354, 363
- Vucevik 武切维奇 385, 388
- Vukcevic 武科切维奇 388
- Vukovar 武科瓦尔 356
- Vulliamy, E. 武利亚米(1994), 359, 408, 410 (1996), 403—404
-
- Waffen-SS 武装党卫队 271, 279
- Wagner, Gustav 古斯塔夫·瓦格纳 261
- Wagner, M. (1998) 瓦格纳 431, 460, 468
- Waldheim, Kurt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275
- Wales 威尔士 57—59
- Wallace, A. (1999) 华莱士 98
- Walter, Bernhard 伯恩哈德·沃尔特 254
- War Academy 战争学院 122
- “war communism” 战时共产主义 321
- war criminals 战犯
- and disrupted employment ~和中断就业 222
 - economic data on 关于~的经济数据 232—234
 - and life traumas ~和生活创伤 222—223
 - and prewar criminal marginality ~和战前处于犯罪边缘 223
 - renegade Catholics as ~作为叛教的天主教徒 228—232
 - samples of ~样本 218—239
 - from threatened border regions ~来自受威胁的边境区 223—228, 232
- wartime Nazis 战时纳粹 237—239
- wartime patriotism 战时爱国主义 194
- Washington, George 乔治·华盛顿 92
- Watkins, S. (1991) 沃特金斯 59
- Weber, Eugene 尤金·韦伯 59
-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25—26, 72, 188, 425
- “weekend Chetniks” “周末切特尼克” 421

- Wegner, B. (1990) 韦格纳 200
- Wehrmacht 国防军 272—276
- Wehrverbände 格斗联盟 195
- Weingast, B. (1998) 温加斯特 24
- Weinman, Ernst 厄恩斯特·温曼 235, 264
- Weinman, Erwin 温曼·欧文 264
- Welsh people 威尔士人 14
- Werner, Hans-Ulrich 汉斯-乌尔里克·沃纳 266
- Werth, N. (1999) 沃思 330
- Western Slavonia 西斯洛文尼亚 405
- Wexford 韦克斯福德 51
- White Eagles 白鹰 392, 403
- Whitlam, Gough 高夫·惠特拉姆 82
- Wilson, 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67
- Wimmer, A. (2002) 威默 3
- Windhoek 温德和克 102
- Winkelman, Lieutenant-General Otto 陆军中将奥托·温克尔曼 245
- Winthrop, John 约翰·温思罗普 85
- Wirth, Christian 克里斯琴·沃思 260, 269
- Wirths, Eduard 爱德华·沃思 256
- Wisliceny, Dieter 迪特尔·威斯里舍尼 244, 245
-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134, 135—136, 138
- World War I, changes to Germany as a result of 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德国带来的变化 182—183
- WVHA 经济管理总局 243
- Xinjiang 新疆 338
- Yalcin。见 Cahit, Huseyin 约尔辛
- Yalman, A. E. (1972) 亚尔曼 159
- Yathay, P. (1987) 亚塞 341, 345
- Yevdokimov, Count 叶夫多基莫夫伯爵 100

- Yiftachel, O. (1999) 耶夫塔克 22, 519
- Young Nazis 年轻纳粹 235, 237—239
- “Young Turks” 青年土耳其党 111—120, 124—131, 139
- Young Turks Congress (1902) 青年土耳其党代表大会上 120
- Yozgat Special Forces 约兹加特特别部队 166
-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6, 353, 356, 423
- casualties in ~ 的伤亡 356
 - economic conflict in ~ 的经济冲突 364
 - elections of 1990 ~ 的 1990 年选举 367—369, 384
 - organic nationalism in ~ 的社会有机论民族主义 376—381
- Yugoslav army (JNA) 南斯拉夫军队 376, 377, 389, 390, 393—394, 395
- Zagreb 萨格勒布 379
- ZANU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429
- ZAPU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 429
- Zeco, Dr 泽科博士 411, 412
- Zeitun 梓橄 146
- Zeki, Salh 萨尔·泽基 160
- Zelko 泽尔科 420
- zemstvo 地方自治会 62
- Zenica 泽尼察 409
- “Zero Network” “零网络” 447
- Zimbabwe, language in 津巴布韦, 语言 429
- Zionism 犹太复国主义 65
- Zucotti, S. (1987) 朱科蒂 311
- Zyklon B gas 齐克隆 B 毒气 187, 241